

1

釋憲言詞辯論意旨（二）狀

聲請人 王光祿

均詳卷

潘志強

代理人 陳采邑律師

文志榮律師

林長振律師

謝孟羽律師

王泰翔律師

楊志航律師

許正次律師

周宇修律師

蔡文健律師

林秉嶽律師

- 2 為進行司法院大法官會台字第 12860 號解釋案言詞辯論程序，依法
- 3 提呈言詞辯論意旨（二）狀事：

目錄

1	
2	甲、關於「爭點 2、(1)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之主張如何
3	與憲法所規定之環境與生態保護要求相平衡?」、「爭點 2、
4	(2) 野生動物保育是否屬於憲法位階的保護法益?其憲法依據
5	理論基礎、內涵及範圍為何?」, 聲請人說明如下:5
6	壹、就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文義及歷史解釋觀之, 野生動物保
7	育並非屬憲法位階之保護法益, 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政策
8	目前僅為法律位階之施政方針及保護標的, 並非人民得以主
9	張之憲法權利或憲法位階之價值決定:5
10	貳、退步言之, 即便認為野生動物保育屬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2 項環境與生態保護之一環, 然憲法保障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
12	權並非經濟或科學技術發展之行為, 無兼籌並顧條款之適用,
13	應優先於國家對環境與生態保護之義務, 且二者並不當然具
14	有衝突關係或相互消長之因果關係, 反而是唇亡齒寒、相互
15	包含之關係:7
16	參、原住民族狩獵文化遭受我國各種法令撕裂曲解破壞後, 失去
17	了捍衛山林之功能, 政府與民間先後之開發行為造成野生動
18	物棲息地之破壞, 此為我國生物多樣性減少之主要因素:17
19	肆、原住民族之在地傳統生活能有效控制政府及民間團體對於生
20	態環境之侵略, 並能有效保護野生動物之棲息地:19
21	伍、綜上所述, 原住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與其所在之自然環境乃
22	具密切之共生關係, 其狩獵文化不僅並非野生動物保護之敵
23	人, 反倒因著獵人(團)相傳之傳統生態知識及對於獵場
24	(山林、漁區)之實質守護可有效對抗外人對於棲息地之開
25	發及破壞, 進而達到維護生物多樣性之成果。.....21

- 1 乙、關於「爭點 2、(3) 國家對於原住民(族)之狩獵保育類野
2 生動物得為如何之管制，始屬合憲？」、「爭點 2、(4) 野
3 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規定，就原住民族獵捕野生動物，
4 係採事前許可制，是否合憲？除上開條文所定之「基於其傳統
5 文化、祭儀」之目的外，是否應包括自用之目的（94 年 2 月 5
6 日制定公布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參照）？」，
7 聲請人說明如下：21
- 8 壹、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為同時具有人格發展自由、信仰自由、
9 財產權、生存權等內涵之基本權，且考量到原住民(族)為
10 我國社會結構中易遭壓迫之少數族群，國家有義務積極與原
11 住民族共同重建或新建有利於原住民族文化之實踐，因此野
12 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對於原住民族狩獵保育類野
13 生動物之管制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22
- 14 貳、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屬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野生動物
15 保育僅為法律上保障之利益，自應退讓。退步言之，即便認
16 為野生動物保育屬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2 項環境與生態保
17 護之一環，惟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並非經濟或科學技術發展，
18 且基於降低行政機關管理成本及提升行政效率而採取事前許
19 可制，亦非重大迫切利益，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系爭管理辦
20 法自不得為追求前開利益，而限制具有憲法位階之原住民族
21 狩獵文化權：26
- 22 參、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以事前許可制限制原住民
23 族狩獵文化權，與達到野生動物保育平衡、管理狩獵活動之
24 目的間欠缺必要關聯，反而造成原住民族悞於其狩獵文化
25 之結果，侵害原住民族之人格尊嚴：27
- 26 肆、退步言，縱認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之事前許可

1	制與達到野生動物保育平衡之目的間具有必要關聯，在尚有	
2	其他可同時兼顧生態環境及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與自決權之	
3	手段下，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就原住民獵捕野生動物採取事前	
4	許可制，顯非最小侵害手段，實悖於比例原則而屬違憲：....45	
5	伍、綜上，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乃屬於環境生態之一部分，原住民	
6	族之狩獵行為配合其傳統生態知識，不僅與野生動物保育不	
7	相衝突，更有助於維護生態環境平衡，現行野保法第 21 條之	
8	1 以事前許可制限制原住民族之狩獵行為，甚至以刑罰制裁，	
9	顯已嚴重侵害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權、自決權及自然資源權	
10	利而屬違憲。.....53	
11	陸、承前所述，關於國家對於原住民（族）之狩獵保育類野生動	
12	物得為如何之管制，說明如下：.....53	
13	附件清單.....67	
14		

1 就鈞院所揭示爭點 2：「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與環境生態
2 保護，尤其與野生動物保育之平衡」聲請人說明如下：

3 甲、關於「爭點 2、（1）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之主張如何
4 與憲法所規定之環境與生態保護要求相平衡？」、「爭點 2、
5 （2）野生動物保育是否屬於憲法位階的保護法益？其憲法依據
6 理論基礎、內涵及範圍為何？」，聲請人說明如下：

7 壹、就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文義及歷史解釋觀之，野生動物保育
8 並非屬憲法位階之保護法益，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政策目前
9 僅為法律位階之施政方針及保護標的，並非人民得以主張之憲
10 法權利或憲法位階之價值決定：

11 一、遍查我國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文字，並無隻字片語提及「動
12 物權」或「動物保護」，因此我國憲法並未賦予動物如人民般
13 之「人格」及具此而來之基本權利，即便於國際動物福利保護
14 普遍推廣之今日，亦未見各國之憲法將動物提升至權利主體之
15 地位¹（附件 1），故即使以最寬鬆的憲法解釋，亦無法得出我
16 國（野生）動物得於主張憲法權利或請求國家保護其「法益」
17 之結論，應先敘明。

18 二、再者，我國雖有動物保護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等相關保護動物
19 福祉之法律，惟憲法及增修條文中卻對（野生）動物保護之記
20 載付之闕如，亦欠缺保護動物之基本國策宣示，而處於未入
21 憲、僅有法律保障之狀態，學者林明鏘更明白表示目前之法規
22 範實已造成「動物保護」之政策無法與憲法位階之基本權相互
23 權衡之狀態²（附件 1），故我國對於「（野生）動物保護

¹ 林明鏘，動物保護入憲，台灣動物法（第二版），第 4 頁至第 5 頁，新學林，民國 109 年 10 月。

² 同註 1，林明鏘，第 19 頁至第 20 頁。

1 （育）」之義務應僅有法律位階，而非憲法價值決定。

2 三、固然，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經濟及科
3 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下稱兼籌並
4 顧條款）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26 號及第 788 號解釋理由書
5 亦承認該條增修條文亦賦予國家「維護生活環境及自然生態之
6 義務」，可見國家有為人民維護「環境及生態」之憲法義務。
7 但此一憲法義務乃源自於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2 項，依條文所列
8 位置之體系解釋應屬基本國策性質，非同憲法本文第二章所列
9 舉之基本權，國家雖有戮力完成國民託付之義務，然而非指人
10 民就該等國家政策直接享有憲法上之權利，此從第二次修憲時
11 國民大會李宗正等 88 位代表所提出第 13 號修憲提案「請將人
12 民享有自然環境生存基本權利列入憲法第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
13 中」及馮定國等 121 位代表所提出第 74 號修憲提案「修改憲法
14 第十五條為：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環境權，應予
15 保障」最終未被採用一事亦可知悉³（附件 2），故該等環境政
16 策方針顯非憲法基本權保障內涵，至多屬憲法位階保障之法
17 益。

18 四、然而，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2 項基本國策所定憲法位階之環
19 境與生態保護是否包含（野生）動物之保育，因憲法增修條文
20 第 10 條第 2 項之修憲過程中均未見有任何國民大會代表提及動
21 物福利或權利（附件 2），若非制憲機關及憲法解釋機關事後
22 就此再以闡釋，恐難以藉由文義解釋之方式過度延伸該國策方
23 針之內涵。

24 五、綜上，從憲法及憲法增修條之文義及歷史解釋觀之，野生動物

³ 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實錄第 373 頁、第 375 頁、第 406 頁，國民大會秘書處編，民國 81 年 11 月。

1 保育應非屬憲法位階之保護法益，我國之（野生）動物保護政
2 策目前僅為法律位階之施政方針及保護標的，並非人民得以主
3 張之憲法權利或憲法位階之價值決定。

4 **貳、退步言之，即便認為野生動物保育屬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2**
5 **項環境與生態保護之一環，然憲法保障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
6 **並非經濟或科學技術發展之行為，無兼籌並顧條款之適用，應**
7 **優先於國家對環境與生態保護之義務，且二者並不當然具有衝**
8 **突關係或相互消長之因果關係，反而是胥亡齒寒、相互包含之**
9 **關係：**

10 **一、憲法保障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並非經濟或科學技術發展**
11 **之行為，無兼籌並顧條款之適用，應優先於環境及生態保護：**

12 （一）退步言之，即便認為野生動物保育屬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
13 第 2 項之「環境及生態保護」之一環（假設語氣，聲請人否
14 認之），然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乃憲法位階保障之權利
15 已如前述，而憲法要求之環境與生態保護僅屬基本國策之
16 「兼籌並顧條款」，乃賦予國家於進行經濟開發及科學技術
17 發展行為時應通盤考量環境及生態永續發展之義務，但本件
18 釋憲者所涉及者乃屬台灣這片土地最原始的主人—原住民族
19 集體自決權、自主權、自治權、土地及自然權利等權利所彰
20 顯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並非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
21 故自不得以兼籌並顧條款為據，即謂原住民（族）狩獵文化
22 權應與野生動物保育兼籌並顧。

23 （二）況且，憲法所賦予國家「兼籌並顧」之義務乃限於「經濟及
24 科學技術發展」之施政項目，完全不涉及同條第 11 項、第
25 12 項提及之原住民（族）各項權利；縱然原住民（族）之狩

1 獵文化權亦兼具財產權、工作權、生存權、信仰自由等之性
2 質，然而同前所述，該權利更涉及原住民族之個人及族群之
3 人性尊嚴（自我認同）、傳統信仰價值等，其內涵遠遠不限
4 於經濟上之實踐，誠不能以一般國家追求資本經濟發展（如
5 就業率、GDP 成長率、國際競爭力）項目等同視之，故不宜
6 適用該增修條文之規定逕予以衡量、取捨；故二者間如有衝
7 突（惟實質上並不當然存在衝突，理由後述），亦應以原住
8 民族狩獵文化權為優先保障之權利。

9 （三）再者，依我國野生動物保育第 21 條之規定，於一定情形下，
10 例如野生動物有危及公共安全或人類性命之虞者、危害農林
11 作物、家禽、家畜或水產養殖者等情形時，得獵捕宰殺野生
12 動物，毋須申請核准，惟如為保育類動物除緊急情況，應先
13 經主管機關核准⁴。又，考量農民發現農林作物遭野生動物危
14 害時，於實務上提報主管機關時，會有危害發生時間點上之
15 認定落差，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乃進一步於 96 年 7 月 11 日，
16 就野生動物保育第 21 條有關保育類動物部分增訂第 2 項規
17 定，即「於保育類野生動物有危害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
18 水產養殖之緊急情況下時，未及報請主管機關處理者，得以
19 主管機關核定之人道方式予以獵捕或宰殺以防治危害。」

20 （附件 3⁵）其立法理由並謂：「增訂第二項，為協助農民妥
21 善處理台灣獼猴危害農作物問題，確實保障農民權益，並兼
22 顧台灣獼猴自然生態保育問題，提供農民合法以主管機關核

⁴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第 1 項：「野生動物有下列情形之一，得予以獵捕或宰殺，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但保育類野生動物除情況緊急外，應先報請主管機關處理：一、有危及公共安全或人類性命之虞者。二、危害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水產養殖者。三、傳播疾病或病蟲害者。四、有妨礙航空安全之虞者。五、（刪除）。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⁵ 夏榮生，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簡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全球資訊網，農政與農情，第 182 期，2007 年 8 月，網址：<https://www.coa.gov.tw/ws.php?id=13043&print=Y>。

1 定之人道方式捕獵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法源。」（附件 4 及附
2 件 5⁶）

3 （四）自前揭規定及立法理由可知，為保護公共安全或人類生命，
4 我國主管機關係允許人民得獵捕宰殺野生動物（含保育類動
5 物，只是須經核准），甚至於為保障農民財產權，於有危害
6 農作物未及報請主管機關時，得獵捕宰殺保育類動物⁷，顯見
7 於我國現行法制下，立法者在價值取捨上，顯然認為人類的
8 生命、文化、農作財產等法益係優於野生動物保育，既然
9 「農林作物危害防治」可作為獵捕野生動物（含保育類）之
10 合法正當目的，則比之更高的「憲法位階保障之原住民族狩
11 獵文化權」自更具有正當性，亦即「憲法價值決定層次的保
12 障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係優先於「農林作物危害防治」，
13 更優先於「野生動物保育」。是以，前揭規定更加益證原住
14 民族狩獵文化權為應優先保障之權利。

15 （五）縱使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權屬於「兼籌並顧」條款之適用範
16 圍（假設語氣，聲請人否認之），基於我國原住民族之狩獵
17 文化權等基本權及人性尊嚴過去受到政府限制、剝奪，甚至
18 造成難以抹滅之傷害之歷史事實，依循憲法平等權之考量
19 （及政府誓言落實轉型正義政策之承諾），國家於適用「兼
20 籌並顧」條款時，不應將個別經濟產業活動與環境生態保護

⁶ 殺獺猴 林務局：以人道方式處理，台灣英文新聞，2015 年 1 月 5 日，網址：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2660575>。

⁷ 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規定於緊急情況下時，未及報請主管機關處理者，得以主管機關核定之人道方式以人道方式獵捕宰殺保育類動物，依農委會 103 年 12 月 5 日農林務字第 1031701205 號解釋令，「緊急情況」指保育類野生動物危害農民合法種植之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水產養殖，存有現在性危難之情狀，如不予立即獵捕或宰殺，農民將遭受不可回復財產損失之情形者，得予獵捕或宰殺最少數量，以維護其財產法益；「人道方式」指最短時間內，給予動物最小痛苦，使動物死亡之方式。對應到原住民族狩獵，依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因獵物為祖靈所賜，獵人不會事先預設其獵捕數量，亦會配合野生動物生長狀態，不會濫捕或獵捕年幼的野生動物；在獵捕方式上亦要求獵人應以帶給野生動物最少痛苦之方式為之，與現行人道觀念相符。

1 進行個別針對性之衡量，更應以「國家總體經濟」之角度去
2 衡量環境生態保護之成本（即應考量「環境成本」），在衡
3 量如何兼籌並顧時，仍應以保障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為優
4 先，以保障我國各民族間經濟發展間之實質平等。

5 二、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中之獵人（圖）乃屬於環境生態之一部分，
6 原住民族的傳統生態智慧乃與在地環境共生共榮，實質上並不
7 當然具有衝突、互斥關係，且已受到我國法律保護：

8 （一）不同於主流西方文化及漢人文化「惟人萬物之靈」之概念，
9 我國原住民族乃相信自然萬物有靈，且人與自然間的萬物均
10 有緊密、和諧之關聯，於各族、各部落歷代相傳的不同故事
11 裡甚至有竹子、石頭、百步蛇、雲豹成為族人祖先的故事，
12 亦有族人幻化成鳥類、黑熊、老虎等動物之故事⁸（附件
13 6）；此外，原住民族傳統生活之食衣住行均完全仰賴自然萬
14 物（靈）之賜予，原住民族及獵人與在地周遭之環境、動物
15 間之關係如同唇亡齒寒般緊密相連。

16 （二）在與自然韻律互動、學習的過程中，各原住民族、部落亦進
17 一步形成獨特的自然倫理（傳統生態智慧），再與人際倫理
18 相調，進而形成各原住民族、部落之傳統規範（具對內的規
19 範效力）；比如：獵人要對大自然有敬畏之心、對生命尊
20 重、對獵物心懷感謝（參王光祿補充理由書，聲證 43）⁹；故
21 對於原住民族來說「人與自然環境衝突、競爭」是殊難想像
22 的一件事。

23 （三）各原住民族、部落之獵人在地生態智慧具不可替代性，且與

⁸ 莊慶信，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環境哲學的省思，哲學與文化，第 33 期第 3 卷
頁 142。

⁹ 亞榮隆·撒可努，飛鼠、山豬、撒可努，2016 年，修訂 2 版，頁 36-37。

當代生物多樣性保育觀念不謀而合：

1. 在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中，獵人非指狩獵的人，而是「守護獵場的人」，兼具取得自然資源、捍衛部落自然領域、獲取在地環境資訊、知識的角色。如同學者官大偉之觀察：「狩獵需要豐富的動物習性與植物、地形知識，什麼動物喜歡食用什麼植物、經常在什麼樣的地形出現、狩獵時該在哪裡找到水源、什麼溪澗可以存放獵物，都是一個獵人基本應該要知道的事情，一個獵人就是一個博物學家，而一個獵人巡獵之後，也會為部落帶回獵場及周邊環境最新的狀況。」¹⁰（附件 7）
2. 雖然原住民族狩獵文化及傳統知識乃各部落及所屬獵團於當地特殊之地理環境中經年累月形成，而屬地方性之智慧知識，然而因獵人（團）與自然間的互動頻繁而親密，其資訊之淵博及應用性完全不亞於近代生態學之知識，甚至在生物多樣性之保育上多有不謀而合之處，例如：

（1）部落禁地之概念：部落附近的水源地、濕地常被族人列為神聖之禁地，例如霧臺鄉的大、小鬼湖（附件 6）¹¹，蘭嶼的天池等，族人不得隨意侵擾。

（該等禁地擁有充沛水源，物種多樣性較一般棲息地更高，應需要特別保護之，故禁地之概念實與當代保育知識相符。）

（2）獵場概念：各部落、獵團或家族均有自己的獵場¹²（參

¹⁰ 官大偉，原住民族狩獵的文化生態意義，原教界，第 72 期，第 8 頁。

¹¹ 同註 8，莊慶信，頁 150。

¹² 莊志強，泰雅族獵人養成之文化底蘊及其教育價值，頁 95-96；同註 8，莊慶信，頁 142-143。

王光祿釋憲聲請書，聲證 18、附件 6），不得越界進行獵捕，如果沒有自己的獵場就必須向其他獵場的獵團供奉部分獵物以取得狩獵的權利（附件 8）¹³。

（由於獵場的範圍有限，即便特定的獵團擁有較高的獵捕能力，亦不得逾越自己獵場去補獲更多獵物，可達到以地制量的保育功效。）

(3) 獵季概念：在動物繁殖的季節不得狩獵，太魯閣族甚至有不同獵場依年輪獵之慣習（附件 6）¹⁴。

（於禁獵的時機，野生動物得以有更多繁衍、增加族群之機會，可達到生態保育之功效。）

(4) 獵物的分類：與漢人「物以稀貴」、「稀有物種作為藥材」之觀念完全不同，族人認為可食的獵物乃當地最常見的動物（例如：山羊、山羌、山豬、山雞、猴、鹿），而奇珍異獸或兇禽（黑熊、雲豹）則往往屬於應避免狩獵、存有種種使用限制、會帶來厄運或需要特別進行祭儀來加以處理的對象¹⁵（參王光祿釋憲聲請書，聲證 21）。

（以部落當地最常見的野生動物做為飲食、生命禮俗所需用之獵物，可避免為了打到罕見之獵物，於過程中獵捕過多數量之其他獵物（因祖靈所賜的就要收下）。而金字塔頂端之獵食動物如黑熊、雲豹，因數量較為稀少，繁衍及成長亦需要較多時間，列為部落所定之禁忌

¹³ 張宏節，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判決之實證研究-以原住民文化抗辯為中心，法律扶助與社會，第一期，頁 36 頁。

¹⁴ 同註 8，莊慶信，頁 142-143。

¹⁵ 烏瑪夫，以斯瑪哈散，布農族身體經驗之獵食想像：以南投縣境明德村為例，頁 78 表格；同註 8，莊慶信，頁 143。

或特殊之獵物可達到保育之效。)

(5) 獵物的限制：部落尊重自然，視獵物為祖靈特別的贈禮，而非靠勇力即可任意獵捕。除了上述避免獵捕的動物以外，在狩獵前或狩獵過程中不得預設要獵捕的動物種類及數量（祖靈給什麼就是什麼）¹⁶。（參王光祿釋憲聲請書，聲證 18；王光祿釋憲補充理由書，聲證 48）

（狩獵並非像去市場買菜一樣先想好要買哪些食材，而是「祖靈給多少就是多少」，故如果該棲息地的族群數量已大為減少，獵人（團）在獵取數量較少之獵物後即折返部落，此「供給量決定需求量」之法則可有效防止濫捕。)

(6) 尊重生命：狩獵乃極為嚴肅之事，不得戲笑¹⁷。遇到懷孕、幼小的獵物應當場放生¹⁸。（參王光祿釋憲聲請書聲證 18、王光祿釋憲補充理由書聲證 48）

（對於原住民族之獵人而言，狩獵並非遊憩或休閒活動，而是基於生命禮俗、傳統信仰而為之崇拜儀式之一，故過程中對生命尊重之態度與近代動物福利之宗旨不謀而合。)

(7) 分享獵物、不浪費：捕獲的獵物無論數量及總類均須全數找到、帶回與族人分享與保存，包含肉類及內臟（不同部落有不同的分食規範），不得留在原地或任其腐爛¹⁹。甚至在打獵回程時也會將獵物分給相遇之人，而有

¹⁶ 同註 12，莊志強，頁 95；王皇玉，建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狩獵規範：兼評王光祿之非常上訴案，臺大法學論叢，第 47 卷第 2 期，頁 849

¹⁷ 同註 12，莊志強，頁 95。

¹⁸ 同註 16，王皇玉，頁 846。同註 8，莊慶信，頁 143。

¹⁹ 巴唐志強，臺灣原住民東魯凱族的狩獵文化與認同研究，頁 117。同註 15，烏瑪夫，以斯瑪第 13 頁，共 71 頁

「慷慨分享者為善，私自貯藏者為惡」之文化²⁰。（參王光祿釋憲聲請書，聲證 20、21）

（近代人類對於自然資源之濫用及浪費，除了人口成長外，多源自於現代化後之過量生產、消費、私有累積資源及短時間淘汰、丟棄等現象。部落對於獵物應與人分享之規範，可有效將資源「更均等地」分配與部落族人，減少各獵團進行狩獵之總次數，而達到保存動物族群數量，「物盡其用」之效。）

3. 由於獵人（團）對於自然環境（氣候、動植物）的特殊觀察及知識傳承需要親自走入山林，在不同季節、不同動植物之棲息地、不同情境下與環境互動（包含狩獵）方能獲得，又均仰賴父執兄長親自示範（身教）和口傳（言教）²¹（參王光祿釋憲聲請書，聲證 18、19），各原住民族、部落之傳統生態智慧實具不可替代性，且較當代一般知識更加容易消逝，而應須政府特別立法保護。

（四）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所形成之生態知識乃我國法律所保障之對象，足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與生態保育間並非處於衝突之地位：

1. 按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3 條規定：「政府對原住民族傳統之生物多樣性知識及智慧創作，應予保護，並促進其發展；其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2. 按聯合國之 196 位會員國於西元 1992 年簽屬之《生物多樣

哈散，頁 39-41

²⁰ 同註 15，烏瑪夫·以斯瑪哈散，頁 67-68、75。

²¹ 同註 12，莊志強，頁 89；英代·谷木·母那烈，「狩獵，非去不可？」阿美族太巴壠部落的狩獵活動，頁 75

性公約》第 8 條第 J 項約定：「依照國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維持原住民族和地方社區體現傳統生活方式而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持續利用相關的知識、創新和實踐並促進其廣泛應用，由此等知識、創新和實踐的擁有者認可和參與下並鼓勵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識、創新和做法而獲得的惠益。」

3. 基於原住民族基本法之授權及國際間尋求原住民傳統生活方式進行生物多樣性保育之趨勢，我國學者們於民國 95 年時即已提出「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法」草案（附件 9），嘗試進一步促進原住民族生態知識之研究、保存及適當利用以達到保護生物多樣性之目的。雖該草案至今尚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惟依我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3 條之法律規範，政府已明白承認原住民族傳統生態智慧之保育功效，並列為政府保護之法益之一，可見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與生態保護間乃屬共榮共存相得益彰，而非敵對之關係。

三、於原住民族目前仍持續進行狩獵文化活動之今日，所常見獵捕之動物仍維持著族群數量，甚至有增加至從保育類動物除名者，可證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並未使自然生態或野生動物之繁衍、生存趨勢受到破壞：

- （一）依張宏節法官於〈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判決之實證研究-以原住民文化抗辯為中心〉一文之統計資料（統計期間：93 年 2 月 4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附件 8）及聲請人延續前開研究之統計方法及統計資料（107 年 4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之統計結果，於野生動物保育法開放原住民依申請進行狩獵後，原住民因獵捕保育類動物而遭起訴之案件最大宗

1 都是因獵捕山羌（詳見下表），可見山羌為我國原住民族最
 2 常見之保育類獵捕物種，其次亦有紅尾伯勞鳥、臺灣野山
 3 羊、台灣獼猴、白鼻心及臺灣水鹿等。

表 1：我國刑事法院判決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案件統計表			
物種 \ 件數	93.2.4－107.3.31	107.4.1－109.12.31	共計
山羌	233	4	237
紅尾伯勞鳥	159	2	161
臺灣野山羊 (長鬃山羊)	87	1	88
台灣獼猴	59	1	60
白鼻心	34	0	34
臺灣水鹿	19	0	19

4 (二) 惟查，依行政院農委會於 108 年 1 月 9 日公布之（修正後）
 5 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山羌、台灣獼猴、白鼻心已從
 6 「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調降為「一般類動物」，臺灣水
 7 鹿及山羊亦從「珍貴稀有野生動物」調降為「其他應予保育
 8 野生動物」（附件 10），且紅尾伯勞鳥仍屬「其他應予保育
 9 野生動物」（附件 11），足證在原住民族獵人（團）仍進行
 10 狩獵活動之情形下，我國之野生動物之族群數量不減反增；
 11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於自主管理下，依循在地生態智慧所達到
 12 之效果，實與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政策之目標一致。

1 參、原住民族狩獵文化遭受我國各種法令撕裂曲解破壞後，失去了
2 保衛山林之功能，政府與民間先後之開發行為造成野生動物棲
3 息地之破壞，方為我國生物多樣性減少之主要因素：

4 一、學者紀駿傑曾在一場研習會所發表之文章中指出國人常見的謬
5 誤：「在一般人的想法裡，所謂的野生動物保護便是一隻隻看
6 得見的動物，避免他們被殺害了。然則，這種保護野生動物的
7 觀念只是另一個更重要、更高層次的保育觀念的其中一環而
8 已，這便是護衛『生物多樣性』的觀念。而根據『生物多樣
9 性』的觀念，保育需在下列三個層次著手：棲息地、物種、及
10 基因多樣性（mcneely, etc., 1990）。就棲地而言，顯而易懂
11 得，野生動物要能存活，一定要有足夠的棲息地。而不同的物
12 種所需要的棲息地（地形、氣候、生物等生存條件）種類都不
13 一樣，因此唯有將各種不同的棲地做妥善的保護，各不同物種
14 才有存活的空間。其次，維持物種多樣性也是保育的重要面
15 向。物種之間存在著緊密的，環環相扣的食物鏈及其他依存關
16 係。過去的歷史告訴我們，每當人類有心或無意的殺害或破壞
17 了某一物種，許多意想不到的甚至災難性的連鎖反應便會發
18 生。因此，保護物種多樣性是保育中極其重要的一環。最後是
19 基因多樣性的保護，這也是前述一般人最容易有的保育觀念。
20 有了足夠、安全的棲息地與其它物種多樣性的共存條件之後，
21 一個野生動物還需要有足夠的族群數以保障與延續其基因的多
22 樣性，該物種的長期存活才能得到保障。因此，對於族群數量
23 稀少的物種施與保護措施，甚至利用人工繁殖（如中國進行
24 的人工繁殖熊貓），引進外來族群（如美國黃石公園最近引進加
25 拿大的野狼），都是屬於這個層次的保育措施。有了上述生物
26 多樣性的保育觀之後，我們就不難找出台灣野生動物的真正終

1 結者是誰了。愈來愈多的學者都再再指出，近幾十年來野生動
2 物數量減少最大的原因來自棲地的破壞與減少，亦即上述第一
3 類的破壞。首先，台灣山林裡錯綜複雜的林務局產業道路、公
4 路將動物們的山林棲地切割得破破碎碎。而隨著道路所到之
5 處，各種破壞生態的活動也接踵而來（蕭新煌等，1993）。
6 （山羌被汽車撞死了之後，我們竟然還厚顏的問：山羌為什麼
7 要過馬路？）其次，在林務局於 1989 年改制為公務單位之前，
8 森林砍伐是為該局的最主要功能。即便有重新造林，在大片的
9 單一林相甚至外來種取代了原本複雜多樣的原生種的情形之
10 下，野生動物也多半難以適應這新的人工環境。再者，開礦、
11 築水庫、觀光設施與活動及山上的放牧、養殖與蔬果種植都再
12 再的搶佔、破壞了野生動物的棲地，將他們逼得走投無路。而
13 上述的行為，絕大多數都是由（漢人）政府所從事、主導、或
14 默許的。棲地的大量減少與破壞之後，野生動物的數量自然也
15 就跟著大量減少。而原住民獵殺了其中幾隻倖存的動物，卻要
16 背上「野生動物終結者」的罪名，難怪往往他們談論起來，心
17 理都忿忿不平。」²²（附件 12）

18 二、除了上述提及之政府及民間開發行為外，國民政府於接收台灣
19 後，在台陸續施行（執行）了漁業法、森林法、狩獵法、國家
20 公園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野生動物保育法、國家公園
21 法、文化資產保存法等法規，對於原住民族狩獵文化及制度之
22 限制日漸苛刻，原住民族幾乎無法依循傳統文化及智慧進行
23 「合法之狩獵活動」²³（附件 8），使得過往在部落人人尊敬有

²² 紀駿傑，從環境正義觀點看原住民的狩獵文化，發表於「原住民狩獵傳統與自然資源永續利用研習會：再造山林守護神」，魯凱族自然資源保育基金會主辦，1997 年 2 月。本狀引用之文章版本取自於網路 http://blog.sina.com.tw/sow_village/article.php?entryid=176628（最後閱覽日：110/2/23），聲請人自行重新將文字分段、排版，惟未更動任何文字。

²³ 同註 13，張宏節，頁 36-38。

1 加之獵人，一夕之間都變成了罪人。而加上刑罰之威嚇、社會
2 之標籤及汙名、不允許獵人們以獵物換取生活所需²⁴，獵人
3 （團）們的生態智慧知識無法傳承與下一代而產生了斷層；雖
4 然近年野生動物保育等法規、函釋及司法實務見解已開始產生
5 變化，政治人物亦屢掛保證原住民族自治權之實行，然而事實
6 是：我國政府在台超過 70 餘年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之控管後，
7 原住民族至今仍未恢復自主管理土地之自治權限。無法如同昔
8 日守護獵場、家園的獵人失去了過往光輝、榮耀之身分，反倒
9 背負著破壞山林（漁區）、殺害動物導致物種大量減少或滅絕
10 等黑鍋，實令人悲痛。

11 三、綜上，原住民族及其獵人在地之生活並未造成物種及族群數量
12 的瀕危，而是：非原住民族棲息的土地經歷歷代政權及外族之
13 統治、開墾後，棲息地及物種的多樣性大量減少，大多僅存一
14 般類之野生動物及家禽，故剩餘之「保育類生物」當然就僅存
15 在於目前原住民族所生活之地區。目前原住民族之地區亦是如
16 此，該地「保育類生物」之族群數量減少亦非起因於原住民族
17 之狩獵活動，而是政府與外人進入山林開設道路、砍伐、搬運
18 森林，並改種不適宜之植林或經濟作物，或是進行大規模採礦
19 或採取土石、興建水庫、高爾夫球場、坐擁山景湖景海景的豪
20 華觀光飯店等，造成棲息地根本之破壞，方為台灣山林生物多
21 樣性及野生動物保育之主要殺手。

22 肆、原住民族之在地傳統生活能有效控制政府及民間團體對於生態
23 環境之侵略，並能有效保護野生動物之棲息地：

24 一、按聯合國之 196 位會員國於西元 1992 年簽屬之《生物多樣性公

²⁴ 民國 37 年 1 月 5 日之臺灣省各縣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第 15 條第 1 項：「山地保留地上由山地人民個別自行栽種之產物及獵獲物，得自由取用販賣，但鄉公所得根據維護山地人民利益之主旨，徵詢鄉民代表會及村鄰長之意見，隨時議定介紹販賣合理辦法，遞報省民政廳核備。」

1 約》第 2 條約定：「“就地保護”是指保護生態系統和自然生境
2 以及維持和恢復物種在其自然環境中有生存力的種群；對於馴
3 化和培植物種而言，其環境是指它們在其中發展出其明顯特性
4 的環境。」同公約第 8 條第 j 項約定：「依照國家立法，尊
5 重、保存和維持原住民族和地方社區體現傳統生活方式而與生
6 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持續利用相關的知識、創新和實踐並促進其
7 廣泛應用，由此等知識、創新和實踐的擁有者認可和參與下並
8 鼓勵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識、創新和做法而獲得的惠
9 益。」

10 二、「就地保護」之精隨在於承認各物種在其自然之環境下擁有最
11 堅忍的生命力及恢復能力，故首要之務乃回復其自然棲息環
12 境。相較居住在異地之人，原住民族部落及社群（包含獵人
13 團）對於所處之自然環境之認識更為悠久且深刻，富具當地之
14 生態智慧；生物多樣性公約於「就地保護」之條文中，特別強
15 調原住民族之生態保護知識，可見聯合國之 196 位會員國亦承
16 認原住民族和地方社區之傳統生活方式有助於生物多樣性之就
17 地保護工作。

18 三、此外，同前文所述，對於野生動物保護工作之首要之務乃保護
19 牠們之棲息地。國際非政府組織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於統
20 整各國之森林保護研究後，得出結論：「1.當原住民族和當地
21 社區沒有或僅擁有薄弱之權利，他們的森林往往容易遭到濫
22 伐，而成為二氧化碳之排放來源。.....2.社區的合法森林權及
23 政府對渠等權利的保護，有助於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森林砍
24 伐。.....3. 具有合法森林權之原住民族和地方社區能維持或增
25 加森林的碳儲量。.....4. 即使社區有合法的森林權，政府損害
26 這些權利的行為會導致二氧化碳的高排放和更多的森林砍

1 伐。……5. 社區能多少克服政府對他們的森林權利的損害行
2 動。」（附件 13）²⁵

3 四、在我國實務上，農委會林務局各地林管處積極推動結合在地社
4 區或部落及志工參與山林巡護，其中以臺東林管處知本工作站
5 所輔導的社區巡守隊最為活躍，包括：利嘉社區（卑南族）、
6 溫泉社區、卡大地布部落（卑南族）、射馬干部落（卑南族）
7 及達魯瑪克部落（魯凱族）。這群社區山林巡守隊盡心參與巡
8 護，協助林、警方查獲多起違法案件、成效斐然（附件 14）
9 ²⁶。此情更加彰顯原住民族比誰都在乎自己的獵場及領域，而原
10 住民族狩獵文化權所傳承下來對於自己部落領域相關知識，讓
11 在地部落族人有能力也有智慧保護祖先代代相傳的土地與文
12 化。

13 五、綜上，原住民族之傳統生態智慧及其狩獵文化方式有助於保護
14 我國野生動物之棲息地免於受到外力之開發破壞，進而達到就
15 地保育之功效。

16 伍、綜上所述，原住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與其所在之自然環境乃具
17 密切之共生關係，其狩獵文化不僅並非野生動物保護之敵人，
18 反倒因著獵人（團）相傳之傳統生態知識及對於獵場（山林、
19 漁區）之實質守護可有效對抗外人對於棲息地之開發及破壞，
20 進而達到維護生物多樣性之成果。

21 乙、關於「爭點 2、（3）國家對於原住民（族）之狩獵保育類野生
22 動物得為如何之管制，始屬合憲？」、「爭點 2、（4）野生動

²⁵ Caleb Stevens, Robert Winterbottom, Jenny Springer and Katie Reytar, Securing Rights,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How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Mitigates Climate Change, 2014 年 7 月, 頁 42-43。中文為聲請人自譯。

²⁶ 參見農委會林務局臺東林管處，區域聯防 保護森林資源，臺東社區山林巡守隊最給力，107 年 11 月 3 日，網址：<https://taitung.forest.gov.tw/all-news/0063084>。

1 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規定，就原住民族獵捕野生動物，係採事
2 前許可制，是否合憲？除上開條文所定之「基於其傳統文化、
3 祭儀」之目的外，是否應包括自用之目的（94 年 2 月 5 日制定
4 公布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參照）？」，聲請人
5 說明如下：

6 壹、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為同時具有人格發展自由、信仰自由、財
7 產權、生存權等內涵之基本權，且考量到原住民（族）為我國
8 社會結構中易遭壓迫之少數族群，國家有義務積極與原住民族
9 共同重建或新建有利於原住民族文化實踐之制度或環境，因此
10 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對於原住民族狩獵保育類野
11 生動物之管制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

12 一、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同時具備人格發展自由、信仰自由、財產
13 權、生存權等內涵，而透過憲法第 22 條與憲法第 13、15 條與
14 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第 12 項相連結，成為具有多重面向
15 的複合式基本權，前開權利內涵均涉及保障個別原住民之自我
16 實現，因此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對於原住民族狩
17 獵文化權之管制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

18 （一）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除了滿足個人與他人生活（分享文化）
19 的需求外，與宗教信仰、歲時祭儀、生命禮俗亦產生密切的
20 關聯性。狩獵不單只是行為而已，還是重要的社會規範，包
21 括獵場制度、信仰禁忌、集體共享、土地倫理等社會結構。
22 因此，狩獵行為體現原住民族的世界觀，構成完整的價值體
23 系，原住民在這樣的價值體系下，出於自身的選擇而全心全
24 意投入從事狩獵行為，其實就是依據其信仰而實踐在生活上的
25 表現，是以，原住民族狩獵行為是一種表達信仰自由的體
26 現，故受《憲法》第 13 條信仰自由之保障（詳參王光祿釋憲

1 補充理由書第 6-9 頁、王光祿言詞辯論意旨（一）狀爭點一
2 之說明）。

3 （二）再者，原住民族經由狩獵活動獲取野生動物等自然資源，乃
4 原住民個人發展其人格所不可或缺，而依我國憲法財產權保
5 障的核心範圍，應係以個人是否獲得發展人格所需的最低程
6 度的資源為斷；另一方面，有論者指出，原住民族的漁獲
7 （狩獵）權來自於土地權，或是更上位的財產權，所以原住
8 民族狩獵權為自土地權利衍伸而來的財產權保障。基於這樣
9 的認識，原住民族的狩獵權應可間接由文化權與土地權/財產
10 權推導而出。準此，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即應受我國憲法財
11 產權之保障（詳參王光祿釋憲補充理由書第 9-11 頁、王光祿
12 言詞辯論意旨（一）狀爭點一之說明）。

13 （三）又，狩獵行為與原住民族的生活息息相關，不僅是原住民族
14 基於生存需求所為之行為，形塑原住民族與土地的關係，更
15 是族群集體對於生活方式的選擇與認同，狩獵文化已經成為
16 原住民族生活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深入原住民族生活
17 的內在肌理，難以分割，是原住民族生存的重要基礎，而憲
18 法上關於人性尊嚴的保障，包括個人將如何自我認同以及如
19 何自我確認他的認同，亦包括個人如何自處以及得以自我負
20 責形成自己的未來命運，而憲法所保障之生存權，係以「符
21 合人性尊嚴的生活」作為標準，故，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是
22 一種生存權利，受《憲法》第 15 條生存權保障（詳參王光祿
23 釋憲補充理由書第 11-18 頁、王光祿言詞辯論意旨（一）狀
24 爭點一之說明）。

25 （四）綜上可知，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權係同時具備人格發展自由、
26 信仰自由、財產權、生存權等內涵，而透過憲法第 22 條與憲

1 法第 13、15 條與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第 12 項相連結，
2 成為一個具有多重面向的複合式基本權，而前開權利內涵均
3 與保障原住民（族）之自我實現有關，而參考我國實務侵害
4 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涉及內心信仰及自我價值實現之人性
5 尊嚴之審查架構係採取嚴格審查標準（參王光祿釋憲聲請書，
6 聲證 15），因此本件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對
7 於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之管制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為違
8 憲審查。

9 二、次按，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係考量到原住民（族）
10 為我國社會結構中的弱勢，站在保障多元文化的考量之特殊憲
11 法價值決定之誠命要求，因此在審查標準上應採取較嚴格的標
12 準。再自比較法理論出發，在美國，針對有關涉及種族平等的
13 案件審查類型中，縱使在法律表面平等，只要被規範對象感受
14 到遭受到次等的對待，使規範對象成為在社會結構中的弱勢，
15 審查上均採取較嚴格的標準（請參閱王光祿釋憲聲請書，聲證
16 30）。查，原住民族佔我國國民的比例並不高，從這點角度出
17 發，站在主流文化容易壓迫到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之考量下，
18 審查標準亦應以較嚴格的標準進行審查。

19 三、此外，相較於一般種族或族群之平等案件，我國原住民（族）
20 係早於主流社會人民到來臺灣及其附屬島嶼之前，就已經定居
21 於此，並開展各族群部落之文化與生活，也就是說原住民族所
22 涉及者並非外來移民的種族保障，而是這片土地原始的主人—
23 原住民族之文化及各種權利之保障與復正，我國應該應負有更
24 多義務需積極協助原住民族重新復正或共同建構原住民族之文
25 化及各項權利，也就是說國家不僅要免於原住民（族）於實踐
26 其文化與權利時受國家干預或侵擾（不論是刑罰或行政罰），

1 國家更有義務必須積極與原住民族共同重建或新建有利於原住
2 民族實踐文化及各項權利的制度與環境。

3 四、綜上，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同時具備人格發展自由、信仰自由、
4 財產權、生存權等內涵，而透過憲法第 22 條與憲法第 13、15
5 條與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第 12 項相連結，成為具有多重
6 面向的複合式基本權，又因原住民族在社會結構上為少數族群，
7 其傳統文化易遭壓迫，且我國原住民（族）是這片土地原始
8 的主人，國家有義務必須積極與原住民族共同重建或新建有利於
9 原住民族實踐文化及各項權利的制度與環境，因此，於審查野
10 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對於原住民族狩獵保育類野生
11 動物之管制是否違憲，應採取嚴格審查基準。

12 五、查「嚴格審查標準」乃為最嚴苛的審查基準，被審查的法律須
13 為追求「極為重大迫切利益」（compelling interests），若僅具
14 單純合法之政府利益，則猶待補強，如：行政成本本身不可作
15 為重大迫切利益；且該被審查的法律所採取之限制手段必須與
16 該目的之實現具「必要且緊密剪裁」（necessary and narrowly
17 tailored），無其他方式可以達到目的，僅於此一限制手段時始
18 有合憲可能；申言之，一旦 鈞院決定採用嚴格審查標準審查
19 系爭限制人民權利之法律，原則上推定違憲，政府部門負有證
20 明法律合憲之舉證責任。

貳、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屬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野生動物保育僅為法律上保障之利益，自應退讓。退步言之，即便認為野生動物保育屬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2 項環境與生態保護之一環，惟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並非經濟或科學技術發展，且基於降低行政機關管理成本及提升行政效率而採取事前許可制，亦非重大迫切利益，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自不得為追求前開利益，而限制具有憲法位階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

一、如前所述，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乃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亦屬我國憲法極為重要之價值決定。且就憲法及憲法增修條之文義及歷史解釋觀之，野生動物保育並非屬憲法位階之保護法益，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政策目前僅為法律位階之施政方針及保護標的，並非人民得以主張之憲法權利或憲法位階之價值決定，因此自應以保障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為優先。

二、退步言之，即便認為野生動物保育屬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2 項環境與生態保護之一環，然憲法保障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並非經濟或科學技術發展之行為，無兼籌並顧條款之適用，應優先於國家對環境與生態保護之義務，且二者並不當然具有衝突關係或相互消長之因果關係，反而是脣亡齒寒、相互包含之關係。

三、再者，鈞院大法官解釋釋字 588 號解釋部份協同、部份不同意見書（**附件 15**）²⁷指出，為降低行政機關的行政成本，或提升行政效率之目的尚與特別重大公益有間，難認屬合憲的立法目的。查，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其授權訂定的系爭管理辦法及其附表就原住民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規定應經主管機關

²⁷ 大法官解釋釋字第 588 號解釋大法官許宗力、王和雄、廖義男、林子儀、許玉秀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1 事前許可，並以附表方式將各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及祭儀之獵捕
2 期間、方式及種類為限制，係為達成野生動物保育之目的，而
3 透過事前申請許可的管制手段，包裹式的管理狩獵的時間、物
4 種及數量，以降低行政機關管理獵捕野生動物之行政成本，或
5 是提升管理效率，然依前開大法官解釋協同、部份不同意見書
6 意旨，行政成本或行政管理效率並非重大迫切利益，自不得為
7 追求前開利益而限制具有憲法位階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

8 四、綜上，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屬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野生
9 動物保育僅為法律上保障之利益，自應退讓。退步言之，即便
10 認為野生動物保育屬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2 項環境與生態保
11 護之一環，惟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並非經濟或科學技術發展，
12 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以事前許可制，追求野生動
13 物保育平衡，以及降低管理野生動物保育的行政成本、提升行
14 政效率等利益，顯非重大迫切利益，自不得據以限制具有憲法
15 位階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

16 參、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以事前許可制限制原住民族
17 狩獵文化權，與達到野生動物保育平衡、管理狩獵活動之目的
18 間欠缺必要關聯，反而造成原住民族須悖於其狩獵文化之結果，
19 侵害原住民族之人格尊嚴：

20 一、原住民族狩獵文化及習慣中本有維持野生動物保育平衡的機制，
21 現代生物多樣性保育概念亦肯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及習慣於維
22 持生物多樣性之角色：

23 （一）野生動物保育的觀念已從傳統的物種保育眼變成「生物多樣
24 性」保育，「生物多樣性公約」及相關文獻指出人類社會的
25 資本主義及工業化才是破壞生物多樣性的主因，並非原住民

族，原住民族反而是長久以來與當地生態「共同演化」者，
因此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與知識實際上是有助於維持生物多
樣性，應予保護：

1. 如採取「原住民族狩獵將直接破壞野生動物保育平衡或是其他自然生態」的直線連結，顯與現代「生物多樣性」保育觀念相悖。有關生物多樣性的課題，自從 1980 年代末開始被討論，乃至於 1992 年里約地球高峰會中共有 160 個國家簽署了「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並於 1993 年 12 月 29 日正式生效之後，已經成為全球許多國家與地區所關懷的議題。雖然對於此議題的關懷，主要是著重於「生物多樣性」的三個層次—「基因多樣性」（genetic diversity）、「物種多樣性（species diversity）」，以及「生態系統多樣性」（ecosystem diversity）等三個層次的自然生態之面向。公約目標包含：1.保育生物多樣性；2.永續利用其組成；3.公平合理分享由遺傳資源所產生的效益。為此，許多亞州國家如中國大陸、日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與新加坡等紛紛成立「國家生物多樣性中心」，以加強生物多樣性的國際合作。世界各學術組織也配合國際上對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需求，在 1990 至 1991 年間，由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IUBS）、國際環境科學委員會（SCOPE）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發起一項「生物多樣性方案」（IUBS/SCOPE/UNESCO Programme on Biodiversity），其主要目的是增進對生物多樣性在物種、群聚、生態系和地景層次上的功能認識，以便加強對它們進行管理的科學基礎（附件 16²⁸）。

²⁸紀駿傑，生物多樣性保育與原住民族文化延續：邁向合作模式，生物多樣性保育策略研討會論
第 28 頁，共 71 頁

2. 除此之外，由於原住民族與自然環境之互動密切，因此近來國際上均有討論原住民族與維持生物多樣性之關聯，此可自「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序言可知：「（締約國）認識到許多體現傳統生活方式的原住民和地方社區同生物資源有著密切和傳統的依存關係，應公平分享從利用與保護生物資源及持續利用其組成部分有關的傳統知識、創新和實踐而產生的惠益。」，同時，在其第十條「生物多樣性組成部分的永續利用」條文中也指出：「（每一締約國應儘可能並酌情）保護並鼓勵那些按照傳統文化慣例而且符合保護或永續利用要求的生物資源的習慣使用方式。」；而在第八條「就地保護」中亦強調：「參照國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維持那些原住民與地方社區中，依照傳統生活方式並且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持久使用相關的知識、創新與做法，並促進其廣泛應用，由此等知識、創新和做法的擁有者認可和參與其事並鼓勵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識、創新和做法而獲得的惠益。」（附件 16²⁹），顯見關於生物多樣性的最高指導原則—「生物多樣性公約」早已肯認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與知識有助於促進維持生物多樣性，並明揭國家應予保護並促進其廣泛應用。
3. 學者紀駿傑進一步論述生物多樣性於近代遭破壞的演變，以及原住民族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係：「絕大多數的原住民都直接仰賴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各種資源作為生存的唯一依據。但是除此之外，土地也更是提供原住民生命意義、歷史、傳說、宗教、祭儀等部落文化、族群認同與凝聚力的來源。離

文集：http://biodiv.ntu.edu.tw/biodivctr/upload/conf_200109/09.htm

²⁹同註 28，紀駿傑。

1 開了土地及土地之上的樹木、作物、花草、溪流、山岳等這
2 些孕育原住民文化的自然環境泉源，原住民便失去了與大自
3 然界連結為一體的憑據，而原住民也就不再繼續成為原住民
4 了。西雅圖酋長語重心長的告白便是全球原住民與自然環境
5 之關係的最好寫照。.....『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就強調原住
6 民能提供現代社會關於森林、旱地等複雜的生態區資源管理
7 的經驗（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8 Development, 1987: 12）。而由於絕大多數原住民並未發展出
9 書寫文字，他們對於自然生態的知識並不容易被外人所知悉
10 與流傳。因此，當原住民族群逐漸消失時，他們也將帶走這
11 些千百年來所累積的寶貴生態知識。更有甚者，但全球原住
12 民族群被資本主義社會所吞噬，他們長期所處之地的生物多
13 樣性以及提供人類社會文化活力的文化多樣性也將隨之消失。
14 如此一來，人類社會的生存及文化的延續都將倍受威脅。...
15 然而，人類自從實施農業定耕之後，對於土地使用的單一化
16 亦逐步提高，而這個狀況隨著『工業化』以及『資本主義全
17 球化』的愈來愈深化，只有更加嚴重。而伴隨著『資本主義
18 全球化』的『世界貿易組織』所鼓吹的是「世界分工」——在
19 一個地方（國家）生產少數專門化的產品以減低生產成本，
20 增加競爭力。然而，所謂「專門化」，從生態的角度來看，
21 便是「單一化」；美國、加拿大廣大的農業種植面積是最好
22 的例子，而台灣的「出口成長」經濟定位，也在過去十幾年
23 來漸次地吞噬了許多的沿岸與山丘地。在這些農業與工業生
24 產方式及文化之下，對於沒有被開墾成農地，整為建地、廠
25 房與道路之土地，便被視為『荒地』了。上述這些人類社會
26 的發展，才是破壞「生物多樣性」最根本的動力。生物多樣

性保育的重要性，在此情況下便顯得相當重要與急迫。然而，重點是我們必須懂得『區辨』，區辨出對於生物多樣性保育造成壓力的真正來源為何，而非不加區辨地將所有人類都一視同仁地當成破壞的來源。今天，全球陸地上生物多樣性最高的地方（也因此往往被選為需要『保護』的地方），大多是原住民居住的地方，主要原因便是在於過去的歷史中，他們並不是破壞者，而是長久以來與當地生態「共同演化」（co-evolution）的夥伴（Maffi, et al., 2000; Smith, 2001）。過去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常常犯的錯誤，便是未能區辨這些原住民（以及其它當地居民）以及造成保育壓力的其它人類與社會組織。因此，愈來愈多的學者提出證據並主張，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之間有複雜的密切關係（Durning, 1992; Maffi, 2001）。世界野生生物協會（World Wildlife Fund International）在近年來所研究的 900 個生態區域中，指認出 238 個最重要的生物多樣性區域，而這些區域證實了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之間的關連性（Maffi, et al., 2000）。這些發現與主張，漸漸地改變了過去對於『自然生態』與人類之間之關係的觀念。」（附件 16³⁰），由此可知，人類社會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發展才是破壞「生物多樣性」最根本的原因，而非原住民族，反而認為全球陸地上生物多樣性最高的地方，大多是原住民居住的地方，主要乃因在於過去的歷史中，他們並不是破壞者，而是長久以來與當地生態「共同演化」者。

4. 而國內研究生物多樣性之學者林曜松，早就提出現代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已從限制物種的利用演變成「永續利用」，

³⁰同註 28，紀駿傑。

- 1 對於原住民族的角色也從限制演變成「重視原住民傳統利用
2 資源的智慧，人與環境共存」，茲引述傳統物種保育工作與
3 現代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工作差異表如下（附件 17³¹）：

	傳統物種保育工作	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
保育目的與重點	物種及保護區保護為主	重視生態系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基因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強調全面、整體與永續性（時間、空間、內涵的擴大）
利用方面	限制利用	永續利用
參與人士	保育科、保育人士	涉及影響、利用、保護、買賣生物多樣性之政府、民間、企業等單位（例如從事農、林、漁、牧相關人士，並強調非生氣專長人一，如法規，經濟、外交等方面）
參與官員位階	中層為主（處、署等）	各階官員參與 各國最高首長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
生物技術	未強調	用生物技術開發新藥

³¹林曜松，1998，生物多樣性保育，社教雜誌 245 期，10-13 頁，轉引自楊舜行，台灣生物多樣性工作之省思與未來願景：

http://file.wra.gov.tw/wra_ext/deveinfo/%E7%B0%A1%E8%A8%8A/1%E6%9C%9F/%E7%B0%A1%E8%A8%8A1%E5%B0%88%E8%AB%963.htm

		物、食物、防污染新材料等管制生物技術安全
利益	未強調	公平合理分享利益
保護區內之原住民	限制	<u>重視原住民傳統利用資源的智慧，人與環境共存</u>
國際性	參與較少	國際合作頻頻、分享知識與經驗，具軟性約束
受破壞地區	閒置	保育生物、環境工程、遺傳工程指導下恢復或重建自然環境
資訊	較少流通	主張資訊共享，並促進流通

- 1 5. 綜合以上，學者盧道杰、吳雯菁總結：「現代的生物多樣性
2 觀念已從過往強調物種本身的保育以及國家的單一責任，演
3 變成必須跨越社區部落、地方區域、國家聯盟與國際等地理
4 尺度，且在地與原有的知識應受到尊重，並與科技知識融整
5 以發揮最大的功效。在現今台灣的社會裡，生物多樣性保育
6 呈現著多樣的論述，有以宗教護生為基礎的保育觀點，有以
7 野生動物植物資源永續利用為主的論調，也有再見荒野隔離
8 塵世的主張等，但卻都還比較侷限在本位的執著與生物生態
9 的架構裡。由國際社會的經驗與論辯的進展，從本土個案實
10 證的觀察，國內相關生物多樣性保育的論述與文化多樣性間
11 的連結，尚有許多尚待發掘與加強的空間，尤其政治經濟與
12 社會人文的考量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與尊重。」（附件 18³²，

³² 盧道杰、吳雯菁，2006。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的互動連結—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收錄於
第 33 頁，共 71 頁

第 243 頁)。由此可見，自現代生物多樣性的觀念而言，原住民族並非破壞生態平衡之殺手，實際上反而是透過狩獵等與大自然互動之方式，扮演著維持生物多樣性的重要角色，因此原住民族的狩獵顯然是維持生物多樣性不可或缺之一環。

(二) 我國原住民族透過所屬族群文化的社會機制、傳統規範、生態知識所串連控制狩獵行為，達到維持生物多樣性的結果：

1. 國內研究自然環境、野生動物領域之學者多指出：我國原住民族透過所屬族群文化的社會機制、傳統規範所串連控制狩獵行為，來達到維持生態的平衡。如有論者指出：「若從行為與過程進一步分析狩獵的內容，可以把狩獵細分成：獵人、獵法（具）、獵季、獵區、獵物等元素。每一項元素都還可以因為時空、族群不同而有不同的內涵，而由所屬族群文化的社會機制所串連控制。在部落裡，誰可以成為獵人？怎樣成為獵人？誰或怎樣的程序來認定獵人的身份？獵人應遵守哪些規範？規範是誰訂的？如何修改調整？誰來執行？雖未行之如文，卻都有著約定成俗的行事規則。而『獵人』與其所奉行的『行為規範』，即是狩獵所指涉的社會制度的核心，也是串連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族或在地社群生活實作與生產行為的關鍵。一般來講，獵人的行為規範包括：獵具的種類與使用、狩獵時間與區域（獵季與獵區）、哪些動物可以打？哪些不能打？哪些是視情況而定？有哪些不同情況的組合？與獵物處理的方式等。這些行為規範多是以經驗法則累積行之有年的風俗習慣，外加一些超自然的信仰，以嚇阻不當的行為或避免災害的產生」（附件 19³³，第 8 頁）。亦有論者

「生物多樣性社會經濟篇」第十四章，279-297 頁，生物多樣性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推動辦公室主編。台北市：教育部。

³³ 盧道杰、吳雯菁、裴家驊、台邦·撒沙勒，建構社區保育、原住民狩獵與野生動物經營管理第 34 頁，共 71 頁

指出：「狩獵文化涉及極為龐大的知識體系，包含：狩獵文學、獵場、宗教信仰、狩獵組織、狩獵方式、狩獵方法、獵物分配、飲食文化、狩獵工藝、狩獵常識及其他，透過從獵場平時的巡繞、觀察、管理、祭祀，接著發現動物、決定出獵、占卜（夢占及鳥占）、祭祀、追逐、捕獵宰殺、獵物解剖與分配、以及返家後的獵物處理、食用、供奉神靈等過程，是文化的連續實踐行為。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文化是指具有文化內涵與社會規範所從事之捕獵活動。（王光祿釋憲補充理由書，聲證 39）³⁴。

2. 自上可知，我國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涉及層面多元，從獵具、獵物等狩獵行為本身到狩獵表彰的意義等，每一面相都有著所屬族群的社會機制、傳統文化及規範所串連控制，並於相關法規施行前早已長久運行多年，已形成既有的狩獵行為規範，約可分為以下「狩獵禁忌」、「狩獵時節及禁獵期間」、「對自然資源的謙卑與珍惜」幾個面相：

(1) 狩獵禁忌

在原住民族狩獵的習慣中，有許多禁忌，觸犯禁忌者除了會遭受到天譴或者族群的唾棄，促使族人在狩獵中遵循著一定的規範。也因著這些禁忌，讓原住民族與自然生態能夠達到平衡，有著相輔相成的效果。如布農族獵人 Lumav（魯馬夫）：「在獵場中有一個特別的禁忌，就是語言禁忌，即不能 Tusungsung（直接講）……若有人問你打甚麼獵物，便要用改過後的名稱來回答，不可直接講原本的名稱。這樣的禁忌一直要持續到整個狩獵過程結束後才能說

間的連結，地理學報第四十六期(2006)，頁 1-29。

³⁴浦忠勇教授，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辦理「臺灣原住民族狩獵暨漁撈文化研究」委託專業服務勞務採購案，106 年 3 月。

1 出原本的名稱」，「狩獵中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獵人
2 要去山上以前，我們講說不要 atmangatmang，
3 atmangatmang 的意思就是說不要誇大其詞」（附件 20³⁵），
4 其實在各個族群中皆有諸如此類用語及說話的禁忌。在狩
5 獵前，族人不能說要去打獵，也不能說要獵捕甚麼獵物，
6 狩獵過程中也要用較於婉轉或其他詞彙代替指稱物，直到
7 狩獵結束後，才可以解除此等禁忌，這樣的禁忌說明了原
8 住民族對於獵場、獵物甚至是獵具的謙卑。

9 (2) 狩獵時節及禁獵期間

10 就狩獵時節而言，各個族群也因著不同場域、氣候等自然
11 環境而有所調整，例：布農族獵人 Lumav（魯馬夫）提及：
12 「春天不能狩獵是因為正是獵物繁殖的時間，而冬天乃由
13 於果樹不長果子，獵物不會走動覓食」（附件 20³⁶）；太
14 魯閣族獵人黃長興亦謂：「概略在春夏兩季，是保育期和
15 天然效應所形成停止狩獵時期」、「每年的秋冬兩季，群
16 山是一片林木茂盛，蒼翠蓊鬱，山區裡的獵物們時值秋高
17 馬壯的活躍於山林原野，又因正逢農閒時期，是世代以來
18 族人的『狩獵季節』」（附件 20³⁷）等。過往，因農田耕
19 作需投入大量人力，又各地區農忙時節不同，狩獵期間也
20 隨之調整。藉由因地制宜的禁獵時段，讓動物得以擁有完
21 整時間進行繁殖、生長與遷徙，使山林及動物得以永續發
22 展，不致滅亡。

23 (3) 對自然資源的謙卑與珍惜

³⁵ 論壇一：原住民獵人說狩獵—引言人魯馬夫（布農族）引言記錄，原住民族狩獵 105 年度原住民狩獵文化與國家法律衝突法制座談會論文集，2016 年 2 月 3 日。

³⁶ 同註 35，魯馬夫（布農族）引言紀錄。

³⁷ 同註 35，黃長興（太魯閣族）引言記錄。

此外，大多數原住民族於狩獵時，對於大自然多抱持謙卑之情，對於獵得之獵物則存有「珍惜」與「感激」，譬如布農族獵人說：「布農族人乃是把握獵得足夠生存的數量即可得到溫飽。這在布農族人休獵的觀念裡，獵物就可以得以永續生存，這便是布農族獵人的自然生態法則」、「對布農族而言，獵物是有 Isang 生命、靈魂，獵殺太多獵物，獵物也會反擊。Dihanin（天神）會 Pidila（破壞），整句翻譯是天神會處罰，所以獵殺太多動物食，天神會處罰我們」、「務必要把獵物看為寶貴，每一塊肉都不能浪費」（附件 20³⁸）；就獵捕的對象也有所區分，例如大型獵物以山豬、山羊和山羌居多，小型動物方面，則以樹棲類的鼯鼠和鳥類的竹雞較為多見、不食幼小動物等（附件 20³⁹），排灣族獵人亞榮隆-撒可努也提到：「『等待』是獵人訓練的一部分，牽涉獵人人格的養成……過程中，那是身體也在進行的一種過程，等待，未必是停止、休息與完全的被動，相對的，是另一個層面的看見及準備與出發，更是身體獲得力量的一種方式。」、「父親說過一段很棒的獵人哲學，他說：『獵人的孤獨和寂寞，是精神和力量最大的來源之處；兒子，你要學做一個好的獵人，就要學會『等待』的耐性。』（附件 20⁴⁰），闡述了原住民族獵人在狩獵時，除了必須擁有智慧與果速的判斷力，也必須擁有過人的耐性與毅力，因為在要成為一個獵人以前，必須先學會觀察與忍耐，而非「看到黑影就開槍」。同時為鄒族獵人及學者的浦忠勇老師亦以獵人諺語精準闡述原住

³⁸ 同註 35，魯馬夫（布農族）引言紀錄。

³⁹ 同註 35，黃長興（太魯閣族）引言紀錄。

⁴⁰ 同註 35，黃長興（太魯閣族）引言紀錄。

1 民族狩獵文化與生態是相互揉合在一起的，缺一不可：

2 「讓筆者想起一句動人的獵人諺語：「'e hupa zou feango ta
3 haahocnga」（獵場是男人的身體）。身體要暢旺，就需細
4 心養護，不會只顧獵殺，其中的態度、技術與心靈內涵必
5 然符合社會期待，這應該就是獵人該追尋的感覺結構。千
6 百年來原住民累積的知識體系，狩獵文化絕非人類中心主
7 義，亦非動物中心主義，而是講求生態的整體性，部落獵
8 人的真正價值更在於兼顧社會、生態、宗教性的連結。獵
9 場，埋藏著太多族群文化的記憶、知識，它根本就是獵人
10 的生命基因，獵人的身體在此揉搓磨盪，難分難捨。」

11 （參王光祿釋憲補充理由書，聲證 39）⁴¹

- 12 3. 自前述原住民族狩獵的行為規範可知，狩獵文化除在心態上
13 教導獵人必須要有一顆虔敬的心，要崇敬大自然，對於獵物
14 應滿懷感激並珍惜對於人類聲明的滋養，狩獵的禁忌與規範
15 也說明了原住民族在狩獵時，不僅會「物盡其用」，也體現
16 對生命的尊重與敬畏，重視該生態環境的永續發展，因而維
17 護了生物多樣性，讓各個族群與山林資源的以永續生存及發
18 展。

19 **（三）因此，近代自然環境、野生動物領域之學者多疾呼維持生物**
20 **多樣性之機制及系統應結合原住民族狩獵文化及生態知識，**
21 **顯見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之事前許可制失靈，**
22 **無助於達到生態平衡、物種保育之目的：**

- 23 1. 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雖為原住民族狩獵之除罪
24 化規定，然而其仍是在原住民族各族群文化、習慣外，增加
25 「事前許可」之行政管制，期透過行政管制來掌控原住民族

⁴¹ 同註 34，浦忠勇教授，第 146 頁。

1 狩獵的時間、物種及數量，以達生態平衡與物種多樣性。然
2 而，原住民族各族群本身的狩獵文化、習慣即有維持物種多
3 樣性、自然生態平衡之機制，甚至更進一步地，有助於維持
4 生物多樣性，因此近代研究自然環境、野生動物領域之學者
5 多疾呼國家推動生物多樣性之管理應借重、結合原住民族狩
6 獵的傳統文化及習慣。

7 2. 有論者認為，國家透過野生動物保育法等法令限制原住民族
8 的狩獵，不僅無益於維持物種多樣性，更是加深主流社會對
9 於狩獵文化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除過度侵害原住民族文化
10 權，更造成對於原住民族的污名化指控，導致政府與原住民
11 族間呈現緊張的關係：「近代臺灣的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
12 係依循西方傳統人與自然隔離的策略，採政府集權的管理方
13 式，嚴格限制在地社群（尤其是原住民）的利用，甚至將其
14 視為最大威脅，其不僅不見得有成效，政府與原住民間也呈
15 現長期的緊張關係。特別自 1972 年全面禁獵與 1989 年野生
16 動物保育法頒佈以來，狩獵在法規上受到禁止，國內原住民
17 族也飽受『野生動物殺手』惡名之苦（Eu, 1969; McCullough,
18 1974,cited in Patel and Lin, 1989; 紀駿傑與王俊秀，1996；陳
19 永禹，2000；趙啟明，2002；台邦·撒沙勒，2004；巴蘇亞·
20 博伊哲努，2005）謝孝同（1985）曾質疑禁獵的規定不是
21 無法執行就是未被執行，而最重要的是，原住民族在山區的
22 狩獵也一直未停止（附件 19⁴²，第 5 頁）」、「現在是國家
23 統一治理山林及野生動物，政府使用同一套森林法、國家公
24 園法、野生動物保育法在管理全台灣，但這樣子的治理模式

⁴²同註 33，盧道杰、吳雯菁、裴家騏、台邦·撒沙勒，第 5-6 頁。
第 39 頁，共 71 頁

從 1949 年以來都已經呈現是無效的。」（附件 21⁴³，第 157 頁）」、「但原住民的狩獵行為除受到《野生動物保育法》以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的嚴格限制，也受制於主流社會對狩獵文化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並常有污名化指控。然而，筆者認為這是國家及主流社會欠缺對於狩獵／漁撈文化的正確認知。」（參王光祿釋憲補充理由書，聲證 39）⁴⁴。

3. 因此，自維護生物多樣性角度，相關領域之學者均疾呼檢討現行野生動物保育政策與法令、正視原住民狩獵現況，並基於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之間的關連性，應將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習慣納入生態保育之系統與制度：「本文從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來談近年來，全球有關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開始重視當地原住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本文主張，過去對於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的那套『原始、未經人類干預的自然野地』的浪漫化認知，已經逐漸被更符合事實的『人類在自然中活動、運作』之認知所取代。因此，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必須同時兼顧自然生態與當地住民的生活、文化，如此才有成功的可能性。本文也引美國、加拿大與澳洲的國家公園與當地原住民『共同經營』的例子來說明新型態的、合作式的保育工作如何可能。總結而言，作者認為我們談論生物多樣性保育時必須同時關照原住民族參與的主要理由有下列三點：（1）這是符合社會正義與環境正義的作法；（2）這是國際上正確的趨勢；（3）更重要的，這才是真正有效的生物多樣性保育方式。台灣過去有著許多原住民與保育機構，尤其國家公園之間的嚴重性衝突，

⁴³裴家騏，原住民獵場管理與野生動物保育的夥伴關係，思想；33期（2017/06/01），頁157。

⁴⁴同註34，浦忠勇教授。

1 最主要原因便是在於當地原住民不但被排除於國家公園規劃
2 與執行工作之外，他們更因為這些國家公園的成立而在經濟、
3 文化與傳統資源使用活動上遭受莫大的限制。因此，如何重
4 新設計、規劃出符合本文所討論的合作模式便是當前國家公
5 園管理機構最重要的任務了。」（**附件 16**⁴⁵）、「現在是國
6 家統一治理山林及野生動物，政府使用同一套森林法、國家
7 公園法、野生動物保育法在管理全台灣，但這樣子的治理模
8 式從 1949 年以來都已經呈現是無效的。未來如果能夠回到過
9 去，將台灣的山區化整為零，以數千個上萬個的原住民族獵
10 場為單位，推行各地的在地狩獵自主管理，取代現在的中央
11 集權式管理機制，再搭配野生動物的族群監測，相信會更有
12 效、更實質的管理狩獵活動，也才能做到名副其實的野生動
13 物保育。」（**附件 21**⁴⁶，第 157 頁）。

- 14 4. 自上可知，顯見野保法對於原住民族狩獵的事前管制，乃以
15 政府集權的管理方式，採取將人與自然隔離的策略，嚴格限
16 制原住民的利用，甚至將其視為最大威脅，仍未脫離生態保
17 育即是要讓自然變成「原始、未經 人類干預的自然野地」的
18 浪漫化認知，卻忽略人終究是自然環境的一份子，而在自然
19 中活動、運作，維持人與自然的良好互動才是維持生物多樣
20 性的正確之道，因此，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必須同時兼顧自
21 然生態與當地住民的生活、文化，因此，**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22 **及系爭管理辦法之事前許可制以行政管制取代原住民族自有**
23 **的狩獵文化及習慣，將狩獵文化及習慣排除在生態保育系統**
24 **之外，無助於維持包含野生動物保育在內的生物多樣性目的。**

⁴⁵同註 28，紀駿傑。

⁴⁶同註 43，裴家騏，頁 157。

1 二、事前許可制不僅違背自然界的運作模式，更因為原住民狩獵文
2 化本身即理解自然界的運作乃浮動、不確定的，因而蘊含獵物
3 乃上天賜予的禮物的價值觀，因此事前許可制亦違背其文化內
4 涵，除造成獵人都不會去申請，行政機關無從管理狩獵活動外，
5 無法達到規範目的，更嚴重侵害原住民族文化權，貶損其人格
6 尊嚴：

7 （一）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採取事前許可制，除與達
8 到野生動物保育平衡之目的間欠缺必要關聯，更與原住民族
9 原有狩獵文化及習慣相悖，致原住民族不願意適用，即無法
10 達到管理狩獵活動的目的。諸多文獻均指出，因狩獵行為本
11 身即是與自然互動的過程，同時涉及獵場、獵物、天氣等變
12 動因素，實際上即是一個不確定概念，再加上原住民族各族
13 群的信仰、文化蘊含狩獵乃上天賜予的禮物的價值觀，使得
14 狩獵活動除滿足人類生理需求以外，更有追求人格實現、與
15 神靈互動等意義，造成原住民族的狩獵活動具有浮動、彈性、
16 無法掌控等特色，即不可能於事前得以預估狩獵時間、區域
17 以及獵物的物種及數量，尤有甚者，事前許可制在多數原住
18 民族的狩獵禁忌中即是驕傲地向神靈炫耀狩獵的成果，此更
19 是原住民族的大忌，輕者，一無所獲，重者，更可能招致災
20 禍：「徒法不足以致行，原住民不願意遵循狩獵管理辦法，
21 其實是該辦法本身的問題，因為許多規定並未符合傳統文化
22 之狩獵需求，在部落採訪獵人的過程中，均認為若依狩獵管
23 理辦法手續太麻煩，不確定性太高，申請時間無法配合實際
24 的狩獵需求，而且也無法兼顧諸多狩獵的禁忌規範，等
25 等。...該辦法第四條規定『申請人，以原住民、部落或依法
26 立案且會址位於申請獵捕所在地鄉（鎮、市、區）轄內之原

1 住民人民團體為限』，換言之，狩獵申請人必須是原住民人
2 民團體，但原住民實際狩獵習俗而言，除了部落祭儀需要透
3 過部落組召集發動，其餘的大多為家族性狩獵，或者是核心
4 家庭的活動，而且狩獵時間並不固定，完全依照獵人的工作
5 以及家庭需求來決定是否出獵。幾乎每個族群都有一種習俗，
6 就是獵人出獵之前保持低調與隱祕，不會對外聲張，更不會
7 跟沒有參與狩獵的外人報告，所以獵人通常會在清晨早早出
8 發，最好不要遇見任何外人，就算巧遇他人，也不會說出自
9 己要去狩獵，更不會說出預定捕獵的物種、數量，因為獵人
10 觀念中，獵物是土地神所恩賜的禮物，不能強求，獵到是好
11 事，要感恩，如果獵不到也無妨，當然如果幾次出獵都沒有
12 獵獲物，那麼獵人就必須反省自己的狩獵活動是否符合傳統
13 規範，這是行之多年的重要習俗。如果把狩獵的事宣傳出去，
14 或預先表明獵物種類數量，就是犯了禁忌，筆者認為，這樣
15 的習俗意味著狩獵者與土地神之間的約定和默契，此約定和
16 默契已在卜夢、鳥占以及祈福儀式中完成，跟他人沒有太大
17 關係。....這樣的申請流程雖然詳細，但對獵人而言是極為麻
18 煩，有些內容也不符合狩獵禁忌和習俗，獵人出獵通常會依
19 據諸多條件方可出發。舉個例子，以陷阱獵為主的狩獵活動，
20 獵人必須七八天左右就去巡繞一次獵場，看看陷阱有無獵物，
21 如果不按時巡獵，很可能獵物就腐敗無法食用，所以放陷阱
22 是幾個月時間按時上山，獵人根本不知道要如何依辦法申請。
23 再舉例子，申請狩獵需於二十天之前提出申請，但諸多狩獵
24 活動是有原因和條件才能舉行，而且有些原因和條件是無法
25 預知的，例如透過狩獵作為除喪儀式，獵人是無法在二十天
26 之前就預知喪事，更不知道是不是要上山狩獵。另外，獵人

1 狩獵會依據天候狀況，天氣好可以出獵，風雨天出獵會有風
2 險，如果二十天之前完成申請，但天候惡劣也照樣無法出獵，
3 也許又要再申請一次。當然，狩獵結束之後三十日之內，還
4 要提出狩獵執行報告書，內容同樣繁瑣。這樣的申請手續也
5 完全柑制了獵人正常的狩獵方式，有的獵人就抱怨，『不是
6 不想申請，而是根本不知道要怎麼申請』，於是依法申請的
7 案件數量不多，而『非法狩獵』的情形其為普遍，甚至成為
8 主要方式。」（王光祿釋憲補充理由書，聲證 39⁴⁷）、「日
9 常自用的狩獵本身就是原住民族的文化，本身就是生活中不
10 可分割的一部分。現行規定不但限制了原住民族選擇生活方
11 式的自由，甚至還因為事前申請制度與傳統信仰嚴重的抵觸，
12 而不被大多數原住民部落所接受與遵行，該項規定也形同虛
13 設，不但沒有達到尊重文化的目的，更無益於野生動物之保
14 育。這種雙輸局面亟待改善。」（附件 21⁴⁸，第 150 頁）、
15 「在獵場中有一個特別的禁忌，就是語言禁忌，即不能
16 Tusungung（直接講）……若有人問你打甚麼獵物，便要用
17 改過後的名稱來回答，不可直接講原本的名稱。這樣的禁忌
18 一直要持續到整個狩獵過程結束後才能說出原本的名稱……
19 狩獵中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是，獵人要去山上以前，我們講
20 說不要 atmangatmang，atmangatmang 的意思就是說不要誇大
21 其詞。」（附件 20⁴⁹）。

22 （二）前述種種說明了原住民族的文化與信仰上要求獵人必須對於
23 獵場、獵物甚至是獵具的謙卑，這樣的文化與信仰除維繫了
24 生物多樣性，更賦予獵人在堅守這樣的規範及禁忌後，進一

⁴⁷ 同註 34，浦忠勇教授，頁 146。

⁴⁸ 同註 43，裴家驊，頁 157。

⁴⁹ 同註 35，魯馬夫（布農族）引言紀錄。

步被其族群所認同之意義，也真實反應了自然界的運作方式及型態：大自然是千變萬化的，人類無法預測、控制自然界中的種種，不論是天氣、季節、動物的習性、動物的物種、蹤跡，都只能順其自然地讓一切發生，這也是原住民族長期以來與土地、自然緊密互動後留下來的經驗法則，再透過族群文化的闡釋與解讀，深化成狩獵的禁忌與規範，因此，事前許可制不僅悖於自然界運行的法則，而毫無達到管理生態目的的可能，更是要求獵人違背族群文化內化在其身心靈的誠命，致其蒙受不遵守文化、信仰的痛苦，造成嚴重貶損其人格尊嚴的結果，獵人們為了避免這樣的結果，只能硬著頭皮，冒著遭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嚴重刑罰的風險將狩獵轉為地下化，造成原住民族狩獵不斷被入罪，但行政機關也無法完整掌握狩獵活動的僵局。

（三）是以，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採取事前許可制，除與達到野生動物保育平衡之目的間欠缺必要關聯，更與原住民族原有狩獵文化及習慣相悖，致原住民族不願意適用，既無法達到政府管理狩獵活動的目的，也嚴重侵害原住民族的文化權，形成了原住民族不合法也不舒服地狩獵，行政機關永遠也無法完整管理狩獵活動的必然結果。

肆、退步言，縱認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之事前許可制與達到野生動物保育平衡之目的間具有必要關聯，在尚有其他可同時兼顧生態環境及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與自決權之手段下，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就原住民獵捕野生動物採取事前許可制，顯非最小侵害手段，實悖於比例原則而違憲：

一、按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

1 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
2 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即我國憲法揭示之比例
3 原則，係要求行政、立法及司法行為，其手段與所欲實現之目
4 的間，應有合理比例關係，不得不成比例。在有不同手段可達
5 成目的時，自應選擇對人民權利侵害最小之手段。又，於刑罰
6 權之使用上亦同，如以其他手段亦能有效防止不法行為時，即
7 不應使用刑罰手段，此乃刑法之「最後手段性」，或可謂刑法
8 之「謙抑原則」，即刑罰僅屬社會管制手段之一，非唯一手段
9 且為輔助性，故在尚有其他手段可達成同樣目的時，不應輕易
10 動用刑罰，否則將破壞其最後手段性及謙抑性，更將使人民動
11 輒得咎，使其權利受到嚴重限制與侵害（附件 22⁵⁰）。

12 二、查，現行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雖允許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
13 化、祭儀之情形得獵捕野生動物，然依第 21 條之 1 第 2 項之規
14 定，仍應事先申請許可並受系爭管理辦法相關規定之限制，如
15 有違反時，依野保法第 51 條之規定於獵捕一般類野生動物，受
16 行政罰鍰制裁；倘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固然最高法院 106 年
17 度第 2 次刑事庭會議（一）決議⁵¹認為不能因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8 51 條之 1 僅規定對於未經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

⁵⁰ 司法院大法官第 646 號解釋。

⁵¹ 最高法院 106 年度第 2 次刑事庭會議（一）決議：「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五日公布施行之原住民族基本法，落實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其中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項明定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儀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獵捕「野生動物」之非營利行為，並未將保育類野生動物排除在外。又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於九十三年二月四日自第二十一條第五款移列而單獨立法，亦明定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用以特別保護原住民族之傳統獵捕文化。是原住民族於其傳統文化、祭儀期間，若供各該傳統文化、祭儀之用，且符合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項授權規定而訂頒之「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第六條及其附表之各項規定，僅事先未經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持自製獵槍獵捕屬上開辦法第六條第二項附表所列准許獵捕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台灣水鹿」，不能因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五十一條之一僅規定對於未經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動物」科以行政罰，即認同法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謂野生動物僅指一般類野生動物而不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題旨並無同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處罰規定之適用。」

動物」科以行政罰，即認同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所謂野生動物
僅指一般類野生動物而不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因此即便未事
先申請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亦僅能處以行政罰，而不得依野
保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1 款處以刑罰。然實務上仍有法院在此情
形下仍以刑罰相繩⁵²。

三、然而，不論從原住民族既有之狩獵規範等傳統文化角度，抑或
已日趨成熟之狩獵自主管理機制來看，顯然存在可達成同時兼
顧生態環境及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與自決權之手段：

（一）原住民族既有之狩獵規範等傳統文化即具有自然資源管理之
機制，亦可藉由原住民族之傳統狩獵文化結合現行技術科技，
建構出一套部落在地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制度：

1. 參酌原住民族之相關研究文獻，部分學者主張將原住民族之
傳統狩獵作為在地之自然資源經營管理體制，具體而言，狩
獵者為了進行狩獵行為必須具備一定條件以及傳承與累積狩
獵相關知識與經驗，同時透過信仰禁忌、獵區、漁場分配與
承襲及貢賦制度等社會機制，建置部落對山林空間與資源的
控制，亦即原住民族部落自身及原住民傳統狩獵行為係具有
管理自然資源之一套傳統規範制度存在（**附件 18**⁵³）。

2. 學者亦主張可提出整合原住民族狩獵、以部落（社區）為基
礎的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架構，以部落作為與國家政府對
應之主體與窗口，亦為社會體制與文化傳承運作的平台，由
部落推動動植物採集、獵物處理、儀式典章等事宜，亦建議

⁵² 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6 年度原訴字第 59 號判決，認野保法第 21 條之 1「當是允許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利用之必要，即可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及一般類野生動物，惟仍須合於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第 2 項之規定」，本件被告既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則核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及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規定之立法精神相違，難以該等規定免其涉犯之刑事責任。

⁵³ 同註 32，盧道杰、吳雯菁，頁 236。

1 管制規則執行獎懲，並建議一套獵人認證制度（包含成為獵
2 人應具備之條件、篩選、培訓、考試、職業與終身學習等），
3 由獵人掌管傳統生態知識與技術及實際執行者，而國家現代
4 制度之公權力則適度介入（附件 18⁵⁴）。

5 3. 換言之，狩獵一事，或可謂自然資源管理一事，未必須由國
6 家公權力主導，而係可藉由部落內部傳統規範及文化，型塑
7 出一套以部落在地自然資源管理之制度，運用獵人熟悉野生
8 動物資源、獵場地型、環境生態變動等知識經驗，同時建議
9 獵人認證制度，並訂定相關內部規則，適時再引入政府機關
10 相互合作接軌。

11 4. 以霧台鄉魯凱族為例，其狩獵制度本身即為在地野生動物經
12 營管理體制，例如以季節性狩獵提供野生動物喘息機會、散
13 佈式的獵區及同一獵區中狩獵地點會逐年調整以分散狩獵壓
14 力、每一獵區均被不狩獵區域包圍，提供動物繁殖生育的環
15 境等（附件 18⁵⁵）。此外，學者亦主張可藉由魯凱族特有之
16 百合花頭飾制度⁵⁶作為獵人認證制度：「部落中現存以公開
17 獲頒百合花頭飾的獵人直接認證為『獵人』，尚未公開授予
18 百合花頭飾但部落周知有從事打獵活動的獵人為『助理獵
19 人』。『獵人』可獨立帶團從事狩獵行為，而因獵槍多是獵
20 人自行製造，為避免刀槍使用產生意外，也因為法規的限制
21 與保險的適用問題，建議僅由『獵人』執行狩獵行為。『助
22 理獵人』則必須隨團或依文化狩獵的條款申請自行獵獲五或
23 六隻公山豬，公開獲頒百合花頭飾後，方能成為可獨立帶團

⁵⁴ 同註 32，盧道杰、吳雯菁，頁 237-238。

⁵⁵ 同註 32，盧道杰、吳雯菁，頁 241-242。

⁵⁶ 魯凱族中，獵得五至六頭公山豬之獵人，在公開與族人分享後可公開獲頒百合花頭飾，為部落英雄。

作業的『獵人』。『獵人』為現場作業需要可聘請『助理』隨行，『助理』與『助理獵人』在整個『獵人』養成教育裡，除野外時數外，均需接受教育訓練，以吸收其他相關的知識與技能，如：地理資訊系統與衛星定位系統的使用、判圖、測量方位與收集相關野生動植物資訊、溝通解說、民俗動植物學等。這樣的認證制度結合原有的社會機制與現代山林保育巡護的技能，除能活化文化的傳承，兼顧榮譽表揚外，也能在林務、保育或其他單位有巡護山林機會時，拓展獵人的就業機會。」（附件 18⁵⁷）

5. 是以，上述內容在在彰顯部落及原住民族傳統規範與狩獵文化自有其自然資源管理之機制存在，現行野生動物保育管理並非須由政府機關以公權力予以限制規範，實可藉由原住民族之傳統狩獵文化結合現行技術科技，建構出一套部落在地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制度。

（二）現行已有數個部落及獵人協會組織與野生動物保育之主管機關林務局及學術單位合作進行狩獵自主管理試辦計畫，藉由獵人證發放制度及蘊含族群傳統規範之自治自律公約進行組織管理及約束獵人之狩獵行為，同時進行獵物回報機制，將狩獵種類數量或相關狀況提供予學術單位，達到野生動物族群數量監測，維持生態保育平衡之功能：

1. 現行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系爭辦法係規定原住民族應事前逐次於狩獵前申請許可，於狩獵之後事後逐次備查，因其申請流程繁雜，且規範細節有諸多違反狩獵禁忌與習俗之情況，例如需事前提出預定狩獵的物種及數量，然而究竟是否會打到獵物、打到什麼及數量為何，實無法事先預知，且獵物為

⁵⁷同註 32，盧道杰、吳雯菁，頁 242。

1 土地神所恩賜之禮物，預先表明獵物種類數量將犯了狩獵的
2 禁忌，除此之外，申請期間未必有適合上山狩獵的天氣狀況，
3 且各族祭儀不一，系爭辦法附表所列與各族祭儀活動未必相
4 符，亦有狩獵遭過度限縮在祭儀之情形，前揭種種問題導致
5 原住民族狩獵行為受到束縛，因此實際上提出申請者甚少
6 （參王光祿釋憲補充理由書，聲證 39）⁵⁸。

7 2. 為解決現行狩獵法制與實際運作困境，同時作為獵捕宰殺辦
8 法修訂之基礎，林務局於 106 年起開始於全台 12 個地區試
9 辦「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計畫」（**附件 23**⁵⁹），嘗試藉由
10 主管機關、學術單位與部落之共同合作管理，以取代現行事
11 前許可之「上對下」、「單方性」的行政行為。試辦狩獵自
12 主管理計畫係基於野保法第 18 條有關學術目的例外得獵捕
13 保育類動物之規定，由原住民族部落或團體，與學術單位合
14 作，向主管機關申請試辦狩獵自主管理，由縣市政府給予
15 「一定期間」之自用狩獵許可。原住民族部落或團體內部制
16 定其自治自律公約，組成自主管理之組織，原住民個人加入
17 組織並於符合一定資格下⁶⁰，由原住民族部落或團體發給
18 「獵人證」，作為合法自用狩獵之證明。取得獵人證之原住
19 民個人於試辦期間內任何時間均得狩獵，並於狩獵後將狩獵
20 結果回報予自主管理之組織⁶¹，原住民族部落或團體並於試
21 辦期間結束後，向主管機關提供試辦期間之狩獵結果備查。
22 同時，自主管理之組織亦將狩獵結果提供予學術單位，以供

⁵⁸同註 34，浦忠勇教授，頁 128-130；

⁵⁹獵人最怕的不是毒蛇猛獸，而是警察——台灣如何讓原住民「自己狩獵自己管」，關鍵評論網，2019 年 9 月 19 日，網址：<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4240>。

⁶⁰例如具備一定年紀、定期參與相關講習課程。

⁶¹回報獵捕之動物種類及數量

- 1 學術單位進行生態研究及族群數量監測（**附件 23**⁶²）。
- 2 3. 全台最早實行狩獵自主管理計畫之地區為嘉義林管處與阿里
3 山鄒族，其後亦陸續於屏東縣、花蓮縣等地區實行，各原住
4 民族部落亦凝聚出共識及力量，於 107 年 1 月 13 日屏東縣
5 來義鄉排灣族成立「來義鄉傳統狩獵文化協會」（**附件**
6 **24**⁶³）；107 年 5 月 4 日嘉義縣阿里山鄉鄒族成立「嘉義縣
7 鄒族獵人協會」，於 108 年 3 月 20 日首次頒發獵人證予 89
8 位獵人（**附件 25**⁶⁴）；109 年 3 月 14 日則有花蓮縣秀林鄉太
9 魯閣族成立「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並於 109 年 8 月
10 1 日首次頒發獵人證共 294 張（**附件 26**⁶⁵）。
- 11 4. 上述各協會各自訂有其協會章程與自治自律公約，以嘉義縣
12 鄒族獵人協會與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之自治自律公約為
13 例（**附件 27**⁶⁶；**附件 28**⁶⁷），兩者之公約中均將其族群之傳
14 統慣習規範（鄒族為 einu；太魯閣族為 Gaya）加入公約中如
15 兩者之自治自律公約第 2 條規定：「鄒族/太魯閣族獵人應
16 本於自治自律之精神，積極且誠實執行職務、遵守狩獵 einu、
17 接受 nsou 和 piepia（命格）/遵守狩獵 Gaya、砥礪品德、維
18 護信譽、精研狩獵事務、維護鄒族/太魯閣族民族尊嚴、榮
19 譽及價值，並促進自然生態之保育與動物之福祉。」，除了
20 將 einu 或 Gaya 放入其獵人之精神、任務及使命，亦明列鄒

⁶² 同註 59。

⁶³ 來義成立狩獵者協會 建立部落主體機制，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2018 年 1 月 15 日，網址：<http://titv.ipcf.org.tw/news-36003>。

⁶⁴ 鄒族獵人協會全台首發獵人證 最年輕獵人是 26 歲女性，中時電子報，2019 年 3 月 20 日，網址：<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320004687-260405?chdtv>。

⁶⁵ 東部首創狩獵共管 太魯閣族發獵人證，自由時報，2020 年 8 月 1 日，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246665>。

⁶⁶ 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之自治自律公約。

⁶⁷ 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之自治自律公約。

1 族/太魯閣族獵人應遵守 einu/Gaya⁶⁸，其中太魯閣族獵人協
2 會之公約更細部就獵徑及獵場範圍予以規範⁶⁹，且兩者之公
3 約亦均定有違反相關規範之懲戒規定，最嚴重時得將獵人除
4 名⁷⁰。

5 5. 由此可知，試辦狩獵自主管理計畫係事前申請一定期間（及
6 數量）之狩獵許可，並於期間結束後事後一次備查，相較於
7 現行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獵捕宰殺辦法，狩獵自主管理計
8 畫係以部落或團體作為對外窗口，對內原住民個人只要於獵
9 捕期間及獵捕區域內⁷¹隨時可自用狩獵，並搭配獵人證發放
10 以管理獵人資格，內部以蘊含族群傳統規範之自治自律公約
11 進行組織管理及約束獵人之狩獵行為，同時以獵物回報機制
12 來協助學術單位進行族群數量監測，維持生態保育平衡。

13 6. 隨著政府部門與各原住民族團體在狩獵自主管理的合作上日
14 趨成熟，未來亦預計朝向由各地區原住民族部落或團體與主
15 管機關簽訂「行政契約」之方式進行狩獵共管，取代現行須
16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制度，並藉由科學監測及原住民族自治自

⁶⁸ 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之自治自律公約第 11 條：「鄒族獵人應遵守之 einu 如左：一 於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後不狩獵。二 維護野生動物棲息地，維護自然環境、不棄置垃圾、不破壞他人之農林作物；並禁止電魚、毒魚、炸魚。……」

⁶⁹ 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之自治自律公約第 11 條：「太魯閣族獵人應遵守之 Gaya 如下：有關獵徑修建規範如下：一 範圍包括槍獵、陷阱獵及漁獵。二 行為觸犯禁忌 bsanig、偷竊、傲慢、詐騙、破壞他人獵具獵寮等違背 gaya 的各項行為。……」；第 12 條：「有關獵場範圍規範如下：一 部落獵人不得超越協會公告及所屬部落之地區狩獵範圍進行狩獵。二 於獵人會議中，由各部落家族(分會)推派之獵人耆老共同決議統一規範各家族獵場位置。三 獵人需在自己所屬之獵場從事捕獵活動，未經同意或邀請，不得進入他人之獵場，避免產生糾紛。……」

⁷⁰ 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之自治自律公約第 15 條：「協會獵人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付懲戒：一 有違反第十二條之行為者。二 有其他違背本公約或獵人協會章程之行為，情節重大者。」、第 18 條：「懲戒處分如左：一 警告。二 申誡。三 停止協會獵人資格二年以下。四 廢止獵人證書。五 除名。……」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之自治自律公約亦於第 15 條及第 18 條訂有相同規範。

⁷¹ 以鄒族獵人協會為例，其於 2019 年申請獲准之獵捕時間為 2019 年 5 月 23 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30 日（全年性），獵捕區域為嘉義縣阿里山鄉；以銅門/文蘭部落為例，其於 2019 年申請獲准之獵捕時間為 2019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

1 律，達到維護生態環境之目標（**附件 29⁷²**），同時實踐部落
2 自治及達到自然資源共管之狀態。

3 四、綜合前揭說明可知，現行確實存在其他更有效且侵害文化權較
4 小的方式，或者至少具有建構出事前許可制以外手段之可能性，
5 透過部落內部規範輔以相關證照制度，抑或由部落或原住民族
6 團體與行政機關簽訂行政契約共同管理之方式，不僅得達成維
7 護生態環境保育，亦可兼顧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與自決權及自
8 然資源權利；反觀事前許可制不僅動輒以刑罰相繩，有違刑法
9 最後手段性及刑法謙抑原則不符，嚴重侵害原住民族狩獵文化
10 權，亦對於族群數量監測等生態保育措施無助益，相關論述與
11 資料在在顯示事前許可制顯非最小侵害手段，有悖於比例原則，
12 更與憲法、憲法增修條文、原住民族基本法及兩公約保障原住
13 民族之自然資源權利及應建立自然資源共管機制之意旨不符，
14 應屬違憲。

15 伍、綜上，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乃屬於環境生態之一部分，原住民族
16 之狩獵行為配合其傳統生態知識，不僅與野生動物保育不相衝
17 突，更有助於維護生態環境平衡，現行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以事
18 前許可制限制原住民族之狩獵行為，甚至以刑罰制裁，顯已嚴
19 重侵害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權、自決權及自然資源權利而屬違
20 憲。

21 陸、承前所述，關於國家對於原住民（族）之狩獵保育類野生動物
22 得為如何之管制，說明如下：

23 一、依現行我國法制，有關狩獵行為係遭切割於各個不同法規下予
24 以規範限制，依其規範內容可區分為：對「人/身分」的限制、

⁷² 「行政契約」共管狩獵將入法 獵人自律、科學監測保生態永續，環境資訊中心，2020 年 11 月 5 日，網址：<https://e-info.org.tw/node/227884>。

1 對「地域/範圍」的限制、對「工具」的限制、對「對象/物種」
2 的限制以及對「目的/用途」的限制，以下分別就各項限制是否
3 合理及建議之管制措施予以說明（有關「工具」之限制，請詳
4 後述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論述）：

5 （一）對「人／身分」的限制

- 6 1. 依原基法第 19 條及第 21 條之 1 之規定，原住民族於一定條
7 件下得從事狩獵行為，亦即依法得狩獵之人至少需具有「原
8 住民」身分。有關原住民族及原住民之定義及原住民身分之
9 認定與取得，原基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及原住民
10 身分法第 2 條等規範定有明文。如前所述，狩獵文化與原住
11 民族文化及其日常生活具密不可分之關係，因此以具備原住
12 民身分作為從事狩獵行為主體之要件，應無疑義。
- 13 2. 除具有原住民身分外，隨著生活及工作型態改變，部分原住
14 民未必能時常接觸狩獵之環境與機會，因此聲請人主張可進
15 一步將原住民族傳統狩獵規範及獵人養成文化與現代管理概
16 念接軌，建立一套獵人認證制度或狩獵證照制度，除了可確
17 保實際狩獵的獵人具有一定技術、知識及經驗，減少槍枝、
18 陷阱等獵具使用上或對山林、地形不熟悉而發生意外，更可
19 使獵人清楚瞭解狩獵的歷史、狩獵物種、獵場生態及相關環
20 境知識，亦將有助於消弭外界對於原住民狩獵之汙名（附件
21 18⁷³）。
- 22 3. 在具體實踐上，參酌前述肆、三、部分之內容，可透過部落
23 或原住民族團體為組織單位，由該組織審核該原住民之資格，
24 並於該原住民符合一定條件時（例如前述魯凱族以獵得五至

⁷³ 同註 32，盧道杰、吳雯菁。

六頭公山豬可獲佩百合花成為「獵人」，成為「獵人」前為「助理獵人」，須跟隨「獵人」學習相關技能與知識（附件 18⁷⁴；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則要求應參加一定時數狩獵傳統文化、狩獵技術、文化傳承、生態保育及法令規定等培訓課程始具有獵人資格，並採行獵人證分級制，以年齡區分獵人等級，並依級別限制其槍枝使用及是否可單獨從事狩獵行為（附件 30⁷⁵），授予獵人證照。獵人於狩獵後適時回報獵獲種類、數量與成果，該組織單位亦可與相關主管機關及學術單位合作，回報相關獵獲資訊或相關突發狀況（例如發現某物種大量死亡或某地山林遭破壞），協助族群物種數量監測，發揮獵人為「山林守護者」之角色與功能。

（二）對「地域／範圍」的限制

1. 現行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對於原住民族狩獵並無明文規定其地域或範圍，有關原住民族從事狩獵行為地域範圍限制之法源係回到原基法第 19 條，其明文規範原住民族得於「原住民族地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海域」從事狩獵行為，其中「原住民族地區」依原基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係指「原住民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地區」，即經行政院核定之 55 個原鄉（鎮、市、區）（附件 31⁷⁶）。

2. 而現行實務上部分見解則肯認位於前述原住民族地區或於原

⁷⁴ 同註 32，盧道杰、吳雯菁。

⁷⁵ 以 16 歲及 20 歲為年齡分界，分為紅色、黃色及藍色之獵人證；紅色獵人證為初階太魯閣族獵人（16 歲以下），不可使用槍獵，參與狩獵行為需由持藍色獵人證者陪同；黃色獵人證為準太魯閣族獵人（16 歲以上至 20 歲以下），不可使用槍獵；藍色獵人證：為太魯閣族獵人（20 歲以上），可使用槍獵，但自製槍械需登記在案；參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臉書，2020 年 3 月 31 日，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115187466518334/posts/232651944771885/>。

⁷⁶ -行政院 91 年 4 月 16 日院臺疆字第 0910017300 號函。

住民族傳統領域內⁷⁷，即得從事狩獵行為。惟，縱使於前述原住民族地區或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範圍內，原住民族之狩獵行為仍因國家公園法⁷⁸、文化資產保存法（下稱文資法）等法規限制而不得狩獵，亦即只要原住民族地區或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經劃定在國家公園或自然保留區之範圍內，原住民族狩獵之行為即遭全面禁止⁷⁹，如有違反則得以行政罰或刑罰相繩，例如曾有台東縣達仁鄉排灣族族人於 108 年間在達仁溪漁獵，因該漁獵地點屬大武山自然保留區範圍，而經台東地方法院以違反文資法第 86 條改變或破壞自然保留區內自然狀態而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附件 32**⁸⁰）；另有多位太魯閣族人於其傳統領域範圍內獵捕山羌或臺灣野山羊，惟因狩獵地點屬太魯閣國家公園範圍，因而涉犯國家公園法第 13 條禁止於國家公園內狩獵之規定，雖法院審認結果為情節尚非重大而未處以刑罰，然仍使太魯閣族本得於其傳統領域狩獵之權利完全遭到剝奪，並使其處於恐受刑罰制裁之不安定狀態（**附件 33 至 35**⁸¹）。

3. 前述於國家公園或自然保護區等特定區域內即一律禁止狩獵之似有予以檢討改進之必要。自法律層面而言，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並無明文限制或排除原住民族獵捕野生動

⁷⁷ 如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5 年度原訴字第 74 號判決，肯認被告狩獵地點為太魯閣族傳統獵場。

⁷⁸ 國家公園法第 13 條第 2 款：「國家公園區域內禁止左列行為：...二、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第 25 條規定：「**違反第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六款、第九款、第十六條、第十七條或第十八條規定之一者，處一千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致引起嚴重損害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⁷⁹ 國家公園法第 13 條第 2 款規定國家公園區域內禁止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如有違反，依同法第 25 條處一千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致引起嚴重損害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另，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86 條規定自然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依同法第 103 條，如有違反，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⁸⁰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109 年度原訴字第 15 號判決。

⁸¹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2 年度原花簡字第 62 號判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39 號判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93 年度花簡字第 366 號判決。

1 物之區域或範圍，似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疑義，國家公園
2 法及文資法該等禁獵規定亦與原基法第 19 條及野保法第 21
3 條之 1 有所衝突，且相關主管機關亦承認國家公園法第 13
4 條第 2 款對於原住民「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之限制本屬依
5 原基法第 34 條第 1 項應加以修正但尚未完成修正之規定，
6 主管機關亦有意於修法前依原基法第 34 條第 2 項以解釋令
7 之方式排除國家公園法第 13 條第 2 款對於原住民狩獵行為
8 之限制（參原住民族基本法未完成成立（修）法之相關子法辦
9 理情形及預定期程表，**附件 36**）。

10 4. 再者，現行國家公園內一方面允許興建建物道路、礦物及土
11 石採取及興建纜車等機械化運輸設備等大舉破壞棲地、造成
12 野生動物滅絕之行為⁸²，另一方面卻對於不會造成生態環境
13 破壞、甚至可有助於生態環境平衡之原住民族狩獵行為完全
14 禁止，甚至得以刑罰相繩，顯屬輕重失衡，對原住民族狩獵
15 文化]權造成嚴重限制與侵害。另於文資法部分，其規範文
16 字為「改變或破壞自然保留區之自然狀態」，然何謂改變或
17 破壞自然狀態，應屬不確定之概念，似有違反罪刑明確性原
18 則之虞。

19 5. 又，現行逕以一定地域或範圍劃定是否可以狩獵，顯與原住
20 民族（狩獵）文化有所扞格，蓋傳統領域之範圍本非屬固定
21 不變，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可能隨著族群的消長、遷移或環
22 境狀態改變而有所變化（**附件 37**⁸³），獵場亦係如此，從獵
23 場之取得通常來自先佔、交換、贈予、共享及功勳捐贈，且

⁸² 參酌國家公園法第 13 條及第 20 條之規定，國家公園內並無限制不得採採礦，僅係須符合一定要件及申請核准。

⁸³ 96 年度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後續計劃《成果報告 1》，鄒族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單位），頁 249-250。

1 須靠獵人時常巡獵來維護，亦有可能受到他人入侵（王光祿
2 釋憲補充理由書，聲證 39）⁸⁴，亦彰顯獵場範圍或界線係屬
3 動態而非不會改變。更何況許多部落在日治時期或中華民國
4 政府時間，曾遭移居、混住及遷村，此等「飛地部落」⁸⁵如
5 果硬是要求必須花費許多時間到舊部落傳統領域進行狩獵
6 （往往會因安全因素而禁止回到舊部落，例如屏東縣霧台鄉
7 及來義鄉多處被劃定為莫拉克颱風災區特定區域），而不容
8 許其於鄰近之山區狩獵，亦將對狩獵文化之傳承延續產生不
9 利影響。故現行法制及實務多認原住民族之傳統領域為固定、
10 永久不變之範圍，視原住民族為博物館內靜止不動之展覽品
11 或猶如圖書館內之書本內之固定不變的歷史文字記載，忽略
12 族群跟部落領域持續動態互動演變的過程，用主流社會之眼
13 光誤解原住民族文化，難謂合理。

14 6. 再者，在狩獵區域上，原住民族亦可能於同一獵場內切分為
15 數個狩獵之區域，並於不同獵區輪流狩獵，以給予野生動物
16 喘息生長之空間，然現今不顧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獵場範圍，
17 逕以國家公園或自然保留區等區域劃分，造成同一部落/家
18 族或獵人之獵場遭切分為部分可狩獵、部分不得狩獵，造成
19 只能於部分允許狩獵之獵場範圍內狩獵，反而恐壓縮野生動
20 物生長空間，而無法達成野生動物保育及生態平衡之目的。

21 7. 此外，試想野生動物並非化石不會移動，其在被獵捕過程中
22 自然會奔逃，當然更無可能受國家公園或自然保護區此區域
23 範圍而限制其移動路徑，野生動物因獵人之追逐而從一般山
24 區跑到國家公園內之狀況屢見不鮮，獵人自然會隨著追逐獵

⁸⁴ 同註 34，浦忠勇教授，頁 32。

⁸⁵ 例如霧台鄉好茶村（新新好茶），遷村至瑪家鄉禮納里部落形成飛地部落。霧台鄉阿禮村、吉露村，遷村至長治鄉長治百合部落形成飛地部落。

1 物而追逐至國家公園內，於此情形下，仍一律認該獵人之狩
2 獵行為係違反國家公園內不得狩獵之規定而予以處罰，而無
3 其他配套處理方式，似不合情理。

4 8. 又，政府於劃設治理機關時，應經原住民族同意且與原住民
5 族建立共管機制，乃原基法第 22 條所明文揭示之內容，故
6 自應尊重國家公園或自然保留區等自然資源治理區域內之原
7 住民族其自然資源權利及自決權，以行政機關與原住民族共
8 同管理之方式，取代現行行政機關單一、上對下，甚至動用
9 行政法或刑罰權之管制方式，實屬妥適，此亦有原民會於行
10 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之會議中，肯認應於國家公園建
11 立共管機制可資參照（附件 36）。

12 9. 是以，現行對於特定地域內如國家公園或自然保留區即全面
13 一律禁止狩獵之規定，不僅有違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及其獵場
14 係動態、非固定不變之概念，更對大部份傳統領域位於該等
15 禁獵區域之原住民族其狩獵權將造成極大侵害，亦因該地域
16 限制與實際狩獵狀況之衝突，使獵人一不小心即入罪，似應
17 有加以檢討調整之必要。在管制手段上，現階段或可由主管
18 機關發布解釋令或修法之方式調整為開放一定程度狩獵而非
19 全面禁獵，配合科學監測數據，僅對特定物種予以限制，罰
20 則上以行政罰代替刑罰，而非動輒課以刑罰制裁，並逐步朝
21 向共管機制之建立邁進。惟須注意者，相關法令制定均應依
22 原基法第 21 條第 2 項：「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前
23 項土地及自然資源時，應與原住民族、部落或原住民諮商，
24 並取得其同意；受限制所生之損失，應由該主管機關寬列預
25 算補償之。」取得原住民族、部落或原住民之同意，方屬正
26 辦。

1 (三) 對「對象／物種」的限制

2 1. 現行法制上，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雖允許原住民族得獵捕野
3 生動物，惟其獵捕之物種仍應受系爭辦法附表明列之物種所
4 限制。然該附表於所列物種與原住民族慣習實有落差，因而
5 造成實務上曾有法院以原住民族所獵捕之保育類動物不在該
6 附表上而判決有罪（**附件 38 及附件 39**⁸⁶）。此情形雖於實
7 務上經最高法院 106 年第二次會議決議作成後獲得部分緩解，
8 然對於獵捕物種之限制仍應隨著野生動物族群數量動態調整
9 為宜。

10 2. 具體實踐上，或可藉由野生動物族群監測數據，參酌原住民
11 族實際常狩獵之物種，明列適宜獵捕及瀕臨絕種而不宜獵捕
12 之物種，調整現行附表所規定獵捕之物種以符合實際原住民
13 族狩獵狀況，例如山羌、臺灣野山羊、水鹿等為原住民族常
14 獵捕之物種，部分野生動物（如黑熊）則本身在原住民族之
15 文化中即屬神聖不可獵捕之物種，自然不會主動獵捕之（**附
16 件 40**⁸⁷）。

17 3. 除此之外，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所側重者在於對於狩獵文化
18 傳承及利用土地與自然資源之智慧，原則上不宜以其狩獵之
19 物種作為是否入罪的絕對標準。由於狩獵時不一定能知曉其
20 將獵捕到何等物種而有誤獵之可能性存在（例如使用自製槍
21 獵狩獵通常係於夜晚進行，黑暗中僅憑獵物眼睛未必能得知
22 其物種；或者以陷阱獵方式獵捕時，即便陷阱放在特定物種
23 之獸徑，亦可能獵捕到其他物種），抑或狩獵或巡守時遭野

⁸⁶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6 年度原訴字第 2 號判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7 年度原訴字第 38 號判決

⁸⁷ 從原民文化和狩獵 看布農族與黑熊的人熊情誼，環境資訊中心，2019 年 2 月 28 日，網址：
<https://e-info.org.tw/node/216604>。

生動物攻擊，為了自保而獵捕等等。上開情形或可藉由建立
相關通報機制，課予族人個案突發情形予以回報之義務，並
將此種情形記錄下來以利管理，藉此取代課予相關罰則
之方式，應更能兼顧原住民族狩獵權益並達到物種族群數量
控管之目標。此外，如有外來物種或未曾發現之物種，只要
不導致該物種數量大幅減少或滅絕，亦不宜以此為由使原住
民遭受行政罰或刑罰。

（四）對「目的／用途」的限制

1、原住民族狩獵起源乃作為生活使用，傳統文化及祭儀則是負
有特殊意義的生活，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對
於狩獵目的的管制卻過度簡化原住民族狩獵活動之內涵，限
於傳統文化及祭儀，忽略了一般生活使用，顯無法達到保障
原住民族文化權之目的，而與除罪化的立法目的不符：

（1）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係指原住民族為在自然環境中謀
生，與自然環境互動密切，因而衍生出於與山林鳥獸共
存、共生、共榮之獨特生活與思考方式，其內涵除單純
的飲食需求以外，更包含在與自然環境互動的情境下所
孕育出的文化意涵。深究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起源，是
來自於滿足飲食、補充身體所需能量的生理需求，但過
往獵人辛辛苦苦地上山狩獵、背獵物回來之後，往往會
因為欠缺食物保存科技及設備，獵物若未能馬上吃完，
就會面臨腐敗的結果，然而獵人從小就被教育獵物是上
天恩賜的禮物，一絲一毫都不能夠浪費，否則以後就會
沒有獵物了，但肉就是吃不完能怎麼辦呢？於是獵人想
到了可以分給部落的鰥寡孤獨還有老弱婦孺，因為這些
人沒有能力上山或是因為是女生不能上山，所以無法吃

1 到肉類，可是他們也需要蛋白質，還有這些人之中的老
2 人家可能是曾經照顧過獵人的長輩，小孩則是部落未來的
3 的支柱，所以獵人有責任照顧這些人，更何況獵人也可
4 用肉可以跟他們交換小米或是其他作物，因此獵人就把
5 剩下的獸肉與部落的人分享，這樣不僅不會遭天譴，也
6 符合部落是彼此照顧的觀念，甚至還可以彼此交換食物，
7 這樣的互動方式建構了原住民族的生活，也對於原住民
8 族集體以及原住民個人都有不同的深層意涵。集體而言，
9 狩獵活動維繫了部落自給自足、相互扶持的生活型態，
10 甚至是穩固社會組織、維繫部落運作的功能；個別而言，
11 因為狩獵往往需要克服惡劣環境與氣候，因此獵人需要
12 具備過人智慧與堅忍毅力，因此狩獵為獵人帶來自我實
13 現的意義，讓獵人存有榮譽感，也是讓部落中無法狩獵
14 的族群感受到被照顧、守護的感覺，也因為狩獵為部落
15 集體及成員個人帶來如此多的意義，而賦予獸肉展現獵
16 人和部落精神的崇高意涵，因此能夠奉獻給神靈，表達
17 部落對神靈看顧的感謝，也因此獵人才會在祭儀的時候
18 以獵物感恩神靈。因此，**如深入討論原住民族狩獵的始
19 源，應是基於謀生、維持部落運作、與部落成員互動等
20 生活目的互動下的行為，並非單純為祭儀之目的。**

21 (2) 縱使隨著時代及科技的演進，改變了原住民族的狩獵方
22 法，然而狩獵對於原住民族的意義並未改變，對於本件
23 聲請人王光祿亦同。聲請人王光祿年約 62 歲，為布農族
24 人，於部落成長、生活，年輕時自長輩習得狩獵技巧，
25 成為獵人，狩獵對他來說，是取得食物溫飽自己及家人，
26 也是透過狩獵這樣的勞動來展現過人的毅力與勇氣，獲

得照顧部落、榮耀家人及祖靈的自我實現感及榮譽感，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也因此縱使到了現代，出現了菜市場、超市等可以輕鬆取得肉類的場所，也因為經濟型態改變而不再需要以狩獵餬口，聲請人王光祿仍然上山狩獵，這也正代表了狩獵對他來說不只是讓自己和家人吃飽而已，更具有實踐自己族群文化的意義，並展現身為布農族人的驕傲，對聲請人王光祿的母親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對她來說山肉不只是佳餚，是家鄉的味道，更是個提醒自己是布農族人的火種，當然，有個厲害的獵人兒子也是身為布農族母親的驕傲，這些意涵在原住民文化逐漸式微的現代，對於聲請人王光祿及其母親而言更彌足珍貴，也因此縱使國家法制對於狩獵行為施以嚴刑峻罰，聲請人王光祿仍堅持上山狩獵，因為文化代表了他的人格尊嚴，而人格尊嚴不能犧牲、退讓。

(3) 再就所謂原住民族「祭儀」的意義而言，字義解釋包含了「祭典」與「儀式」。復按原民會架設的「台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的定義如下：「原住民傳統祭儀的舉行經常是在依山傍水的環境裡，以天地為舞台，以夜幕為背景，是一種敬拜神明、崇敬祖先的部落倫理與社會生活實踐的重要一環。以泰雅族為例，各種傳統祭儀的施行，其實就是對祖靈信仰的實踐。祭儀多與農業生計、狩獵及獵頭順利等有關，例如開墾祭、播種祭、除草祭、收割祭、豐年祭、收藏祭、開倉嘗新祭、獵頭祭、祖靈祭等等。」（附件 41）⁸⁸，其指出祭儀包含幾個面相的意

⁸⁸原住民族委員會，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認識原住民族—傳統信仰、傳統祭儀、當代信仰：http://www.tipp.org.tw/aborigines_info.asp?A_ID=1&AC_No=5。

1 義：「崇敬神靈」、「社會生活實踐」、「祈求日常生
2 活順利」等，綜上可知，祭儀對於原住民族的意義不只是
3 與神靈互動的過程，更是維持生計、日常生活密切相
4 關。

5 **2、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除罪化條款顯過度簡化原住民族狩獵活**
6 **動之內涵，忽略生活乃傳統文化及祭儀的本質，與除罪化的**
7 **立法目的不符：**

8 (1) 觀諸系爭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2 款對於「傳統文化」、「祭
9 儀」之定義：「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傳統文化：
10 指存在於原住民族社會已久，並藉由世代相傳而延續至
11 今之價值、規範、宗教、藝術、倫理、制度、語言、符
12 號及其他一切生活內容之總稱。二、祭儀：指原住民族
13 傳統文化中，依其宗教、信仰或習慣，藉由世代相傳而
14 反覆實踐之祭典活動及儀式行為。」，觀其修法脈絡可
15 知修法目的乃為保障原住民族文化權利，減低刑事責任
16 的方向進行修法（王光祿釋憲聲請書，聲證 33、34），
17 則其條文內涵自應包含與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相關之所有
18 面相，即所有一切與生活有關的使用。

19 (2) 而系爭管理辦法第 2 條條文所指「傳統文化」乃「一切
20 生活內容之總稱」，「祭儀」則具有「依宗教、信仰或
21 習慣」、「世代相傳」、「反覆實踐」等特色，均指出
22 文化、祭儀的本質為生活，文化、祭儀是被賦與特殊意
23 義的生活，此也是俗諺「文化即生活」之真諦，也因此
24 在討論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既一時均不應忽略作為生活
25 使用的本質，否則即失所附麗。

1 (3) 然而，系爭管理辦法第 2 條在「傳統文化」、「祭儀」
2 的解釋上顯然混淆了「生活」與前兩者的層次關係，有
3 生活才有傳統文化及祭儀，生活乃傳統文化及祭儀的本
4 質，但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第 51 條之 1 之文字解釋顯非
5 採取這樣的概括概念，而是將原住民族的狩獵去脈絡化
6 地限定於特定傳統文化、祭儀之用途，而排除作為生活
7 使用等自用目的，顯然是違背保障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
8 的立法目的，也似認原住民族僅有在特定傳統文化及祭
9 儀時才有狩獵必要而會有狩獵行為，此乃對於原住民族
10 狩獵文化之錯誤認知，並過度限縮狩獵文化，與原住民
11 族實際生活情形完全不符，即失去了野保法及系爭管理
12 辦法為保障原住民族文化權而除罪化之目的。

13 **3、自用即可包含傳統文化、祭儀概念及一般生活使用，亦能避**
14 **免營利性質的大規模盜獵，並使原住民族得以預見規範範**
15 **圍，以符法律保留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並真正保障原住**
16 **民族狩獵文化權：**

17 (1) 查，依系爭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2 款傳統文化之定義使用
18 「價值」、「規範」、「倫理」、「一切生活內容之總
19 稱」等抽象用詞，可知傳統文化本身屬浮動而非固定不
20 變之概念，則其文義上即容易因不同族群、不同背景、
21 不同專業而有不同解讀，顯屬不確定法律概念，而「祭
22 儀」之定義又過於狹窄，與原住民族除了在歲時祭儀時
23 狩獵之外，日常生活也在狩獵的實際生活情形不符，除
24 妨礙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的實踐，更造成原住民族事先無
25 法預見何種狩獵目的始屬合法，且司法實務上確實也因
26 個別法院對於傳統文化解釋不一，形成無罪或有罪之巨

大差異，顯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因此實不應將除罪化的目的限縮於「傳統文化」、「祭儀」。

(2) 從上述論述可知，傳統文化、祭儀皆屬原住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原住民族狩獵的目的應解為作為生活目的使用。又「自用」的概念可包含因「傳統文化」、「祭儀」、「一般生活」而使用，且若為與野生動物保育相平衡，所謂「自用」即可排除具商業規模營利性質之使用。如此一來透過具有一定資格認定的獵人，出於「自用」之目的，在一定地域範圍內之傳統領域，以適當且安全之狩獵工具獵捕特定之物種，並課予獵人回報獵物之義務，動態且滾動式地檢討當地物種數量的變化，始能達到規範、管理文化性狩獵的目的，更重要的，才真正符合憲法增修條文保障原住民族文化權的意旨。因此，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系爭管理辦法對於狩獵目的之管理，不應限於「傳統文化」、「祭儀」，而應改以「自用」之目的，方屬合憲。

二、綜上，現行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之事前許可制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造成極大侵害外，前述內容已明白顯示我國原住民族之狩獵行為在「人／身分」、「地域／範圍」、「工具」、「對象／物種」及「目的／用途」等各個面向係受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其他法制不合理之限制，現行制度實有加以檢討改進之必要，爰提出狩獵自主管理、建立獵人認證制度、事後回報狩獵成果、特定區域適度開放狩獵、禁獵物種調整、以自用涵蓋傳統文化與祭儀等建議措施。惟，不論採行何種制度管理原住民族之狩獵行為，基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及第 12 項規定，國

1 家就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文化、建立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
2 友善原住民族之制度與社會環境等事項具責無旁貸之義務，為
3 實踐該等憲法增修條文之憲法誠命，於建構及制定相關法規制
4 度時，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及第 22 條，踐行諮商同意
5 與共管機制等程序，與原住民族對等溝通協商，始能達成建立
6 平等尊重及符合原住民族文化之法制，落實原住民族之狩獵文
7 化權，維護原住民族文化之延續與發展。

8 此致

9 司法院大法官 公鑒

10 附件清單

附件 1： 林明鏘，動物保護入憲，台灣動物法(第二版)，第 1 頁至第 24 頁，新學林，民國 109 年 10 月。

附件 2： 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實錄第 373 頁、第 375 頁、第 406 頁，國民大會秘書處編，民國 81 年 11 月。

附件 3： 夏榮生，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簡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全球資訊網，農政與農情，第 182 期，2007 年 8 月，網址：<https://www.coa.gov.tw/ws.php?id=13043&print=Y>。

附件 4：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第 2 項立法理由。

附件 5： 殺獼猴 林務局：以人道方式處理，台灣英文新聞，2015 年 1 月 5 日，網址：<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2660575>。

附件 6： 莊慶信，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環境哲學的省思，哲學與文化，第 33 期第 3 卷，第 137 頁至第 163 頁。

附件 7： 官大偉，原住民族狩獵的文化生態意義，原教界，第

72 期，第 8 頁至第 9 頁。

附件 8：張宏節，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判決之實證研究-以
原住民文化抗辯為中心，法律扶助與社會，第一期，第
31 頁至第 68 頁。

附件 9：民國 95 年 8 月版「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
法」草案。

附件 10：農委會 108 年 1 月 9 日臺灣地區陸域野生動物保育等級
調整表。

附件 11：農委會 108 年 1 月 9 日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節
錄）。

附件 12：紀駿傑，從環境正義觀點看原住民的狩獵文化，發表於
「原住民狩獵傳統與自然資源永續利用研習會：再造山
林守護神」，魯凱族自然資源保育基金會主辦，1997 年
2 月。

附件 13：CalebStevens,RobertWinterbottom,JennySpringerandKatie
Reytar，SecuringRights,CombatingClimateChange--
HowStrengtheningCommunityForestRightsMitigatesClimat
eChange，2014 年 7 月，第 1 頁至第 56 頁。

附件 14：農委會林務局臺東林管處，區域聯防保護森林資源，臺
東社區山林巡守隊最給力，107 年 11 月 3 日，網址：
<https://taitung.forest.gov.tw/all-news/0063084>。

附件 15：大法官解釋釋字第 588 號解釋大法官許宗力、王和雄、
廖義男、林子儀、許玉秀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影
本。

附件 16：紀駿傑，生物多樣性保育與原住民文化延續：邁向合作
模式，生物多樣性保育策略研討會論文集：[http：](http://)

//biodiv.ntu.edu.tw/biodivctr/upload/conf_200109/09.htm。

- 附件 17： 林曜松，生物多樣性保育，社教雜誌 245 期，10-13 頁，民國 87 年，轉引自楊舜行，台灣生物多樣性工作之省思與未來願景：<https://reurl.cc/v56Wle>。
- 附件 18： 盧道杰、吳雯菁，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的互動連結—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收錄於「生物多樣性社會經濟篇」第十四章，279-297 頁，民國 95 年，生物多樣性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推動辦公室主編，台北市：教育部。
- 附件 19： 盧道杰、吳雯菁、裴家騏、台邦·撒沙勒，建構社區保育、原住民狩獵與野生動物經營管理間的連結，地理學報第四十六期，1-29 頁，民國 95 年。
- 附件 20： 論壇一：原住民獵人說狩獵—引言人魯馬夫（布農族）、黃長興（太魯閣族）、亞榮隆·撒可努（排灣族）引言記錄，原住民族狩獵 105 年度原住民狩獵文化與國家法律衝突法制座談會論文集，民國 105 年 2 月 3 日。
- 附件 21： 裴家騏，原住民獵場管理與野生動物保育的夥伴關係，思想；33 期，頁 157，民國 106 年 6 月 1 日。
- 附件 22： 司法院大法官第 646 號解釋。
- 附件 23： 獵人最怕的不是毒蛇猛獸，而是警察——台灣如何讓原住民「自己狩獵自己管」，關鍵評論網，2019 年 9 月 19 日，網址：<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4240>。
- 附件 24： 來義成立狩獵者協會建立部落主體機制，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2018 年 1 月 15 日，網址：<http://titv.ipcf.org.tw/news-36003>。

- 附件 25： 鄒族獵人協會全台首發獵人證最年輕獵人是 26 歲女性，中時電子報，2019 年 3 月 20 日，網址：<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320004687-260405?chdtv>。
- 附件 26： 東部首創狩獵共管太魯閣族發獵人證，自由時報，2020 年 8 月 1 日，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246665>。
- 附件 27： 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之自治自律公約。
- 附件 28： 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之自治自律公約。
- 附件 29： 「行政契約」共管狩獵將入法獵人自律、科學監測保生態永續，環境資訊中心，2020 年 11 月 5 日，網址：<https://e-info.org.tw/node/227884>。
- 附件 30： 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臉書，2020 年 3 月 31 日，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115187466518334/posts/232651944771885/>。
- 附件 31： 行政院 91 年 4 月 16 日院臺疆字第 0910017300 號函。
- 附件 32：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109 年度原訴字第 15 號判決。
- 附件 33：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2 年度原花簡字第 62 號判決。
- 附件 34：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39 號判決。
- 附件 35：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93 年度花簡字第 366 號判決。
- 附件 36： 原住民族基本法未完成立（修）法之相關子法辦理情形及預定期程表。
- 附件 37： 96 年度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後續計劃《成果報告 I》（摘錄版），鄒族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單位），頁 249-250。

附件 38：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6 年度原訴字第 2 號判決。

附件 39：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7 年度原訴字第 38 號判決。

附件 40： 從原民文化和狩獵看布農族與黑熊的人熊情誼，環境資訊中心，2019 年 2 月 28 日，網址：<https://e-info.org.tw/node/216604>。

附件 41： 原住民族委員會，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認識原住民族－傳統信仰、傳統祭儀、當代信仰：http://www.tipp.org.tw/aborigines_info.asp?A_ID=1&AC_No=5。

1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2 月 2 6 日

2 【以下空白，下接狀尾】

聲 請 人 王光祿、潘志強



代 理 人 謝孟羽律師

王泰翔律師



陳采邑律師



楊志航律師



許正次律師



林長振律師



文志榮律師



周宇修律師



蔡文健律師



林秉欽 律師



動物保護入憲

目次

壹、前言

貳、動物保護入憲之相關議題

一、動物權或動物保護入憲爭議問題

二、動物保護入憲之重要外國先例

三、動物保護入憲條文類型分析

參、結語

壹、前言

動物保護的一般基本概念與確認推行，如：不虐待及殺害動物，近廿年來已漸漸成為臺灣一般人民的主流價值，不僅 1998 年制定了「動物保護法」，而且各地方政府，也紛紛發布其自治團體之「動物保護自治條例」（例如：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桃園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高雄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等），以更周全地執行保護動物福利之行政措施。惟不斷發生之臺灣不理性虐待或殺害動物案件，經媒體社群報導後，備受社會矚目，法院對此種虐殺動物案件裁判結果也動見觀瞻，例如：最近苗栗地院 108 年度易字第 254 號無罪判決，即受到眾多人民對法院判決的批評¹。因此，是否應該在憲法上明定動物保護之意旨，以便有效引導行政權、司法判決及增強立法密度，即被民間動物保護團體所不斷提倡。問題關鍵是將「動物保護」或是「動物權」入憲？若僅為動物保護入憲，是否仍存有實際功能？又入憲條文之具體內容、文字如何形成？即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以下乃循此種社會討論問題之主要爭點，循序提

出本書見解，以供我國未來動保入憲時之參酌。此外，由於德國、瑞士現行對動物保護議題業已入憲或已明文規定，故其憲法條文文字形成為何，亦頗有供我國修憲時之參考價值，爰併為平行介紹，以收他山之石的功效，因為動物保護議題目前已有全球化之趨勢，故我國亦不宜故步自封，或坐井觀天，致失與全球動保趨勢接軌之契機²。

貳、動物保護入憲之相關議題

一、動物權或動物保護入憲爭議問題

第一個首要被討論的問題即屬：將「動物保護」或「動物權」入憲？兩者不同內容在動保運動中有極大之差別³。申言之，「動物保護」入憲，僅係將人類保護動物之本旨，在憲法上加以明白宣示，此種宣示類似國家之基本國策規定（例如：保護自然環境、保護婦女兒童政策、保障教育、藝術工作者生活等），並沒有賦予動物有任何憲法上之權利地位，諸如：防禦權、請求權或分享權等地位；相反地，「動物權」入憲，則係在憲法上明白賦予動物享有法規範之權利地位，成

1 苗栗地方法院 108 年度易字第 254 號判決涉及一位越南外籍勞工及二位本國人殺害領養之寵物犬，並加以食用之案件。法院認為檢察官無法盡「舉證責任」，證明被告三人有殺害動物行為，故依「無罪推定原則」判決被告無罪，掀起社會議論紛紛，因該判決完全無視本案有諸多合理之間接證據。該判決全文得參見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MLDM,108%2c%e6%98%93%2c254%2c20190925%2c1>（最後瀏覽日：2020/01/24）。

2 有關全球動物保護在各國憲法上之規範初探，網路上資料甚多，例如：<https://www.globalanimal.org/database/national/index.html>（最後瀏覽日：2019/12/06）。

3 有關動物權（animal rights）與動物福利（animal welfare）之基本主張及主要區別，併得參閱費昌勇／楊書璋，〈動物權與動物對待〉，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應用倫理研究中心出版，《應用倫理評論》，51 期，2011 年 10 月，頁 75-103。

為權利主體，而不再是受權利主體支配之權利客體，或與「物」一般之地位，例如：賦予動物在法律上享有「肖像權」、「繼承權」、「生命權」或「動物尊嚴」(Tierwürde)⁴。至於動物權利地位，究竟比照「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或「準法人地位」，目前各種學說仍屬萌芽討論階段⁵，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法規範中，承認動物之「權利地位」，所以「動物權」一旦入憲，除將全部且重大地改變現行之實定法及程序法規定外，另一方面對於「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為權利主體之基本假設，均將被大幅調整，在法律執行上是否可能？即備受法律人之高度質疑，亦恐無法受全民共識所支持，例如：若動物享有「繼承權」，則飼主之遺產將可由動物與自然人共同繼承，其「應繼分」如何計算？遺產如何分配執行？由誰代理（表）動物？諸如此類之一系列問題，將十分棘手。如何在法規範中加以有效設計，而不致劇烈衝擊現行之「法秩序」，造成「秩序大亂」或「人道淪喪」之憂慮結果？

綜合言之：依目前各主要國家的法律基本架構與規範體

系，似無國家將動物提升到權利主體地位；相反地，動物福祉之保障，已成為各國憲法、國際條約⁶與各動物保護法上之明文規定。申言之，動物雖非權利主體，但也非權利客體（即被人類支配之物），而係介於權利主體與權利客體間之法律地位。就如同德國 1990 年 9 月 1 日間開始生效之民法第 90a 條規定般：「動物非物，其受到特別法律之保護（Tiere sind keine Sachen. Sie werden durch besondere Gesetze geschützt.）」所呈現之表面意義，將「動物保護」形成其法律地位改變之誘因，其規定僅消極否定動物是純粹權利客體之物！但卻未積極明示動物的地位，而含糊地規定：受特別法律之保護，即受動物保護法、民法等特別保護而已。從而，依目前世界各國的共通作法，似乃將「動物保護」入法或入憲，但卻未承認動物成為權利主體⁷。

其次，具有爭議而待釐清的第二個問題是：「動物保護」規定於憲法或法律中有何差別？在對動物福祉之提升或確保效力上不都一樣嗎？對於此一問題之回答，必須回到「法規範位階理論」。依照法位階理論，憲法規範具有最高效力（拘束行政權、立法權及司法權之行使）；法律規範則不得與上位之憲法規定相互牴觸，牴觸時，法律規範「無效」（我國憲法

4 動物尊嚴 (die Würde des Tieres) 與「人性尊嚴」(Menschenwürde) 乃屬相類似之概念，人類享有作為「人」的基本尊嚴，動物也應該比照辦理。有關「動物尊嚴」之用語及定義，目前已出現於瑞士動物保護法第 1 條規定中，其深入討論分析動物尊嚴之意涵，併得參閱 Ammann/Christensen/Engi/Michel (Hrsg.), Würde der Kreatur, 2015。

5 有關「動物權」之動物地位應如何定性，併得參閱 Hirt/Maisack/Moritz, TierSchG, 3. Aufl., 2016, Einführung, Rn. 21 f.; Saskia Stucki, Die tierliche Person als Tertium datur, in: Ammann/Christensen/Engi/Michel (Hrsg.), Würde der Kreatur, 2015, S. 287 ff.; 青木人志，《日本の動物法》，東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二版，頁 222 以下。

6 例如：歐洲動物運送保護公約（1968 年 2 月 13 日）；歐洲保護農場動物公約（1976 年 7 月 23 日）；歐洲保護受屠宰經濟動物公約（1979 年 5 月 10 日）；歐洲保護實驗動物公約（1988 年 6 月 21 日）、歐洲保護家庭動物公約（1988 年 6 月 21 日）等。

7 如果動物成為權利主體，則應停止動物實驗，而且不得宰殺經濟動物，供人類食用，因為動物不得再視為人類之「財產」，費昌勇／楊書瑋，前揭註 3 文，頁 81，動物權之三大基本主張。

第 171 條第 1 項規定)。因此，動物保護條款若僅規定於法律位階規範上，如同我國之現況規定於動物保護法上，因為位階過低，不僅無法有效改變目前諸多對動物不友善之法律，例如：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3 條第 2 項第 3 款之禁止住戶飼養動物之特別約定、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之不法侵害他人人格權之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包含侵害動物之生命在內、民法第 67 條之動產範圍包含動物，不合動物保護之基本概念……等。若將「動物保護」上升到憲法位階，認為保護動物為行政權、立法權與司法權之義務條款時，則不僅立法機關應全面檢視牴觸動物福利之相關法律規定，各級法院也不得漠視動物保護之特別意旨而作出違憲裁判，而行政權更應編列充足預算及人力，努力提升全國動物保護工作，不得再藉口：動物只是人類的財產而已，為保障人民的財產權（憲法第 15 條）及學術自由（憲法第 11 條），所以人民宰殺動物或從事動物實驗，雖不盡符合動物保護之基本要求，行政機關只得「依法行政」，甚至於消極坐視不管。一旦「動物保護」條款入憲，則「動物法益」與人民「財產權」、「學術自由」及「宗教（信仰）自由」保障之法益，彼此相互衝突時，則行政權、立法權及司法權即得依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⁸，衡量相關法益間之損害與利益大小，做成合憲性判斷，而非因位階不對等，致無法以「動物保護」法益，對抗財產權之保障，以及對於學術自由與宗教（信仰）自由之尊重的憲政價值。從而，動物保護入憲與入法最大之區別，除

⁸ 有關憲法上比例原則之運作，具體說明得參閱林明鏞，〈比例原則之功能與危機〉，《月旦法學雜誌》，231 期，2014 年 8 月，頁 65-79。

消極效果上可以排除因位階不對等，致無法與財產權、學術自由及宗教（信仰）自由抗衡之困擾外，積極效果更可以要求立法者，修改牴觸動物福利之法律，要求司法權不得悖於動物保護作成違憲裁判，更可以透過公益訴訟要求行政機關履行其保護動物之法定義務，不得藉口人力不足或經費短絀，而坐視目前動物持續、大量承受痛苦。

最後動物保護入憲後，此種基本國策規定是否能夠拘束行政權、立法權與司法權？此問題之提出，淵源於我國憲法學說長期誤認：憲法上之基本國策只是訓示效力及參考效力而已，各權力主體縱使未戮力執行，亦不生違憲之效果⁹。此種「積非成是」的陳舊理論，隨著憲法理論的進步，有不斷新的學說認為：基本國策具有拘束行政權、立法權與司法權之效力¹⁰後，已逐漸取得穩定見解的通說效力，因此「動物保護條款」入憲，不再僅是對權利主體之價值及方向的參考提示而已，同時也具有拘束權力主體之效力，故其有義務來努力達成基本國策所設定之目標；從另外的角度來看，既然是國家權力主體之義務，則相對地人民即得因「法規範狀態反面理論（Zustandstheorie）」¹¹（或稱為反面理論），而享有

⁹ 有關我國傳統憲法對基本國策效力之定性及批評，得參閱林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釋論〉，1993 年改訂第 56 版，頁 359-360，認為：「基本國策僅指示立法行政目標，無強行之性質」尚非無商榷餘地，其應「具有強行規定之性質」。

¹⁰ 例如：林明鏞，〈基本國策之規範效力及其對社會正義的影響〉，《臺大法學論叢》，第 45 卷特刊，2016 年 11 月，頁 1305-1358；林明鏞，〈論基本國策：以環境基本國策為中心〉，收於：《現代國家與憲法：李鴻禧教授六秩華誕祝賀論文集》，月旦出版社，1997 年 3 月，頁 1465-1504。

¹¹ 「反面理論」或「法規範狀態理論」係德國行政法通說，文獻介紹得參閱

對權力主體之請求權。因此，若權力主體怠於履行其憲法義務時，人民尚且得依公益訴訟對權力主體提起積極作為之請求或訴訟，從而，基本國策之條款，不僅是有消極匡正法規範之功能，而且更具有積極引導權力主體實踐基本國家價值之憲政效力，而具有高度教育功能，故不宜小觀「動物保護條款」入憲之實質功用！

二、動物保護入憲之重要外國先例

以下所指之「動物保護入憲」係指除於憲法上明示動物保護之立法權限外（即僅單純明示屬中央或地方立法權限），並於憲法上有明文規定：國家權力主體負有保護人類動物之條款或基本國策者¹²，以下乃以西方重要法治國家（rule of

Erichsen/Ehlers (Hrsg.),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4. Aufl., 2010, § 12 Rn. 10 f.

12 有關動物保護法之立法權限，德國基本法第 74 條第 20 款於 1971 年即明文規定：聯邦及各邦對動物享有競合立法權；瑞士聯邦憲法第 25 條之 1（1963 年）及第 80 條（1973 年）增訂中央有動物保護之立法權限，且再於 1999 年明定動物保護為聯邦事務。聯邦得公布之動物保護法令包含有：

- (a) 動物飼養及照顧法令；
- (b) 動物實驗及對活體動物為侵害法令；
- (c) 利用動物法令；
- (d) 動物及其產製品進法令；
- (e) 動物交易與運送法令；
- (f) 宰殺動物法令。

奧地利聯邦憲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8 款（2013 年）亦明定動物保護屬聯邦立法權限。印度（1976 年）、巴西（1988 年）、斯洛維尼亞（1991 年）、盧森堡（2007 年）、埃及（2014 年）均有類似權限立法。併得參見 <https://www.globalanimal.org/database/national/index.html>（最後瀏覽日：2019/12/07），Animal legislations in the world at national level animal laws, Civil Code Provisions and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law state）規定為說明比較：

（一）德國

1. 聯邦法

德國（聯邦）基本法於 2002 年 6 月增訂第 20a 條規定，將「國家應保護自然生態基礎及『動物』」加以明文化，成為全歐洲第一個將「國家應保護動物」理念入憲的國家¹³。該條文在明文化過程時雖有部分爭議，例如：有認為保護自然生態基礎已包含保護動物在內，但德國聯邦議會仍然將國家應保護動物此一理念，形成德國基本法之基本國策之一，具有拘束行政權、立法權與司法權之強制效力，並宣示：此一世代對未來世代肩負世代責任之意旨¹⁴。

其實，德國動物保護入憲並非一步登天或一蹴即成的過程；相反地，德國動物保護入憲乃經過相當多的階段努力，最後才能水到渠成。申言之，德國首先在 1990 年增訂德國民法（BGB）第 90a 條時，即第一步明文宣示：「動物非物，動物應依特別法律加以保護，若無其他法律特別規定者，準用（民法）物之規定。」首先將動物脫離民法「物」之支配（即不受民法「動產」之定性），使得動物在民法上之地位雖

13 瑞士雖曾早於 1893 年，舉行全國公民投票，並通過「禁止未經麻醉之動物放血及其他宰殺動物行為」，但因未更動瑞士聯邦憲法，僅事實上形同憲法位階的動物保護先驅國家。Vgl. Thomas Fleiner, Das Tier in der Bundesverfassung, in: Antoine F. Goetschel (Hrsg.), Recht und Tierschutz, 1993, S. 9 ff. (11).

14 Vgl. Albert Lorz/Ernst Metzger, Tierschutzgesetz, 5. Aufl., 1999, Rn. 89 ff.; Hirt/Maisack/Moritz, (Fn. 5), S. 57 ff.

未完全與人類平等對待，惟明顯獲得巨大的改善¹⁵。1994 年 6 月 30 日，德國聯邦議會因受德國聯邦行政法院裁判指責，認為動物保護之立法有「立法赤字（不足）（das gesetzgeberische Defizit）」之現象，第一次進行動物保護入憲之投票，差點過關。拖延 8 年後，終於在 2002 年德國基本法第 20a 條中，建立動物保護之「灘頭堡條款」。此種立憲之成功以及理論之成熟，亦應歸功 1987 年於斯圖加特（Stuttgart）成立之「法律人為動物協議會（Juristen für Tierrechte）」，匯集德國、奧地利及瑞士法律人，一起為非人類之動物爭取最大權利，使動物在法律上「由物轉變成為法律創立之主體（von der Sache zur Rechtskreatur）」，居功厥偉，蓋其等乃確信：「誰在法律上享有權利，即會被尊重；誰在法律上沒有權利，就會被鄙視（Wer Rechte hat, wird geachtet; wer keine Rechte hat, wird verachtet）。」的法理，其亦是動物法律地位之爭取運動中最為核心的努力目標¹⁶。

2. 各邦憲法規範¹⁷

德國各邦（目前共計有 16 邦）亦定有邦憲法，受動物權

爭取運動的蓬勃發展，在聯邦基本法 2002 年將動物保護入憲之前後，紛紛在其邦憲法中引入「動物保護」之條文，藉以正面揭櫫該邦重視動物保護並有努力確保落實之邦施政目標。最早定入邦憲法者乃 1990 年加入西德之東德各新邦憲法規定，尤其值得注意，以下循發布邦憲法之早晚，加以臚列說明：

（1）Sachsen 邦憲法（1992 年 5 月 27 日公布生效）

Sachsen 邦（東德新邦）新憲法第 10 條明文規定：「邦應特別保護土地、空氣、水、動物與植物，以及完整生態（Landschaft als Ganzes），包含保護其生態賴以發展之棲息環境（Siedlungsräume）。」將保護動物視為整體生態維護永續發展的必要環節之一，有效結合目前高漲之環境保護主流意識，誠屬另外一個境界，表達了動物保護之重要性。申言之：動物保護當然屬於環境保護任務中不可或缺之面向，也是確保環境永續發展的充分必要條件。一旦動物的棲息環境受到破壞，諸如澳洲大火及巴西亞馬遜森林之過度開發，人類的基礎整體生態，亦將岌岌可危，如氣候劇烈變遷，故不可不慎重加以保護。

（2）Brandenburg 邦憲法（1992 年 8 月 20 日公布施行）

布蘭登堡邦 1992 年新憲法（東德新加入邦）第 39 條明文規定：「動物與植物為生命體，應予尊重（geachtet），並應保護及維持適合物種之生存空間。」此一新邦憲法，首次將動物正面定性為「生命體」，而非「物」或人類之隸屬財產，

¹⁵ 但德國民法第 251 條有關對主對傷害動物之加害人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Schadensersatz in Geld）」（即慰撫金）時，仍受該條第 2 項限制：「基於治療動物（受傷動物）所生之費用，若其費用超越動物價值者，該費用請求即屬不合比例（unverhältnismäßig）。」並未一併加以完整修改。

¹⁶ Vgl. Eisenhart von Loeper, Tierrechte als Ausdruck menschlicher Wertordnung, in: Jan C. Joerden/Bodo Busch (Hrsg.), Tiere ohne Rechte?, 1999, S. 267 ff.

¹⁷ 德國各邦憲法有關動物保護條文之彙整及說明，併請參閱 Tierschutzrecht, Beck-Tezte im dtv, 3. Aufl., 2014, S. 20 ff.

除應尊重其生命外，也應保護並維持其適合各該物種之生存空間，不得藉口開發，而破壞動物與植物之棲息環境與生存空間。此一文字對於臺灣盲目開發、野蠻破壞野生動物日益減少的棲息生存環境，甚具警告作用，例如：六輕開發與白海豚棲息地受破壞、苗栗石虎因道路開闢而遭大量路殺，即屬反面案例。

(3) Mecklenburg-Vorpommern 邦憲法 (1993 年 5 月 23 日公布施行)

Mecklenburg-Vorpommern 邦新憲法 (東德新加入西德邦) 第 12 條規定：「邦政府、鄉鎮市及其他邦公權力主體在其管轄權範圍內，應保護及照顧 (pflegen) 自然生態基礎之現在及未來的生命與動物。」課予各邦以下行政機關，有保護及照顧現在與未來的生命或動物之義務。此種憲法義務課予之目的在警醒各公權力主體機關，應恪遵保護動物與生命之永續存在，因為這些乃構成人類存活之自然生態基礎，行政主體一旦加以漠視或破壞，將也會危及人類自身之生存環境，不可不慎重！

(4) Thüringen 邦憲法 (1993 年 10 月 25 日公布施行)

Thüringen 邦 (東德邦) 新憲法第 32 條規定：「動物為生命體即上帝之共創體 (Mitgeschöpfe)¹⁸，並應保護動物免受不合物種方式之飼養管理 (nicht artgemäßer Haltung) 及可避

免之痛苦。」該邦憲法特別提出「應符合物種方式之飼養管理」，其主要目的雖亦屬避免動物遭受痛苦 (Leiden)，但此種例示提醒文字，對於人類大量飼養之經濟動物、展演動物、寵物，有直接的規制效力，避免人類以不適合物種特性的飼養管理方式，例如：籠飼蛋雞等，對動物帶來極大且終生之痛苦，此種用語，別出心裁！

(5) Berlin 邦新憲法 (1995 年 11 月 23 日公布生效)

東柏林加入西柏林後成立之柏林邦，其邦憲法第 31 條規定：「動物為生命體 (Lebewesen)，應予尊重，並應保護動物不遭受可以避免之痛苦 (vermeidbaren Leiden zu schützen)¹⁹。」柏林邦特別強調：應保護動物不受可以避免之痛苦，將痛苦之避免不再停留在道德倫理之層面，而置於法規範之實踐要求。因此，動物之宰殺即應嚴格執行麻醉程序；實驗動物之進行，也必須有避免痛苦之 3R 原則配套，否則即有違憲之虞。

(6) Nordrhein-Westfalen 邦憲法 (2004 年 6 月 22 日修正公布)

Nordrhein-Westfalen 邦 (西德舊邦) 憲法第 7 條規定：「青少年 (Die Jugend) 應以人性文明精神 (Geiste der Menschlichkeit)、民主、自由精神教養之，寬容並尊重他人

¹⁸ 有關基督教之動物倫理介紹：Vgl. Hirt/Maisack/Moritz, (Fn. 5), Eiof., Rn. 10 ff.

¹⁹ 與 Berlin 邦憲法相類似之規定者，尚有 Bayern 邦 (巴伐利亞) 憲法第 141 條、Baden-Württemberg 邦憲法第 36 條、Bremen 邦憲法第 11b 條、Niedersachsen 邦憲法第 6b 條、Rheinland-Pfalz 邦憲法第 70 條、Saarland 邦憲法第 59a 條等規定。

的確信信念 (der Überzeugung)，對動物負責任 (Verantwortung für Tiere) 並且維護自然生態基礎，對家鄉及民族之熱愛，心繫國際社會及國際和平。」將青少年的指導理念：愛國、愛家、愛人以及愛動物置於邦憲法之明文，可以凸顯出動物與人之地位相當，形成地球村內之平等夥伴。此種以教育理念及目標條款並列動物保護，尤其對青少年的教育目標中，置入動物保護概念，與自由、民主、人性關懷、寬容、維護自然生態環境相提並論，的確是巧妙的憲政安排。蓋該邦立憲者，確信認為：對非人類動物不能負責的人，根本不配當現代的國民，因此也不可能熱愛國家與寬容其他人民之不同理念。

3. 小 結

德國聯邦憲法 (基本法) 於 2002 年，在基本法第 20a 條有關保護自然生態基礎之基本國策規定中，修正增加「及動物 (und die Tiere)」三個字，成為歐洲第一個將「動物保護」概念入憲國家²⁰。其入憲之文字非常簡單，乃將「保護動物」並列於「保護自然生態」旁，共同成為國家的基本國策 (Staatsziel) 性質規定，具有拘束行政權、立法權及司法權之效力。

惟德國各邦 (尤其是舊東德之五個邦) 新憲法中，對於

保護動物，亦有入憲規定。其文字有採簡易型者，例如：柏林邦「應該保護動物，避免其遭受不必要之痛苦」；亦有採取較複雜型規定者，例如：「動物應符合其物種特性予以飼養管理」或「青少年教育應以對動物負責任為宗旨」、「保護動物之棲息環境」。總體而言，聯邦憲法上之文字並沒有對動物保護之具體內涵詳細加以展開，其留待法律位階之規範加以補充，則屬共通之特徵，因為德國聯邦基本法及各邦憲法均將動物保護列為「基本國 (邦) 策」，所以僅提點價值，而不必做鉅細靡遺的內容開示，已足以達成「基本國 (邦) 策」訂定之目標矣。

德國將「動物保護」提升到憲法位階之主要理由在於：使「動物保護」法益得與其他基本人權之利益，原則上得處在平等對待與相互平衡之狀態。例如：動物保護得與學術研究自由 (Forschungsfreiheit) 之利益相提並論，而非如入憲前，學術研究自由因具有支配性之優先法益，而難以兼籌並顧地落實對「實驗動物」之保護。如今「動物保護」既已成為基本法第 20a 條之保護法益，則即得與「財產權」、「學術自由」、「宗教 (信仰) 自由」或「經濟自由」等法益，平起平坐或相互抗衡，並能在合憲解釋上努力達成「最大平衡原則 (Prinzip der schonendsten Ausgleich)」，以兼顧「動物保護法益」與「學術自由」(管制實驗動物)、「宗教 (信仰) 自由」(伊斯蘭教徒主張應不麻醉待屠宰動物)、「經濟自由」(農場經濟動物飼養管理利用應兼顧動物保護) 之憲法法益。

²⁰ 北非國家埃及於 2014 年於其憲法第 45 條中明定：「國家應保護受滅絕及瀕臨危險動物；並確保對動物之人性對待 (guarantee humane treatment of animals)。」也是另一個將動物保護入憲之國家。併請參閱 <https://www.globalanimallaw.org/database/national/egypt> (最後瀏覽日：2019/12/06)。

上的平衡²¹。

(二) 瑞士

瑞士於 1893 年之公民投票提案：「禁止未經麻醉之動物放血及宰殺」，雖經公民投票通過，但瑞士聯邦憲法當時仍無「動物保護」之文字，直到 1963 年瑞士聯邦憲法增訂第 25 條之 1，將動物保護列為「聯邦事務」（以前動物保護均為各邦權限而非聯邦權限）；1973 年瑞士聯邦憲法在第 80 條規定中經全國公投 104 萬人贊成、19 萬人反對的懸殊比例下，增訂聯邦有動物保護之「立法權限」，且於 2005 年 12 月 16 日順利制定並公布聯邦動物保護法²²，將瑞士刑法第 264 條規定之虐待動物罪，移置於瑞士聯邦動物保護法第 26 條至第 31 條規定中（最重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後，瑞士曾發動全國性公投，企圖修改瑞士聯邦憲法第 25 條規定，明文禁止瑞士境內「對脊椎動物為活體解剖（Vivisektion）或進行其他殘忍之動物實驗」。惟此一公投提案審查未過關，而宣告失敗²³，但在眾多瑞士公投中，留下對實驗動物之反省性公投之歷史遺跡。

最後，瑞士聯邦憲法於 1999 年 4 月 18 日，修正公布其第 80 條規定，詳細將一般動物保護內容入憲外，並有具體憲法授權。其憲法第 80 條規定，共有下列三項內容：

「（一）聯邦得公布動物保護之法令（Vorschriften）」

²¹ Vgl. Hirt/Maisack/Moritz, (Fn. 5), § 8 Rn. 12.

²² 瑞士聯邦動物保護法於 2005 年 12 月 16 日公布，2008 年 9 月 1 日生效，共計有 46 條規定。

²³ Vgl. Thomas Fleiner, (Fn. 13), S. 12.

（二）動物保護法令包含有：

- (a) 動物飼養及照顧法令。
- (b) 動物實驗及活體動物侵害法令。
- (c) 利用動物法令。
- (d) 動物及其產製品之進口法令。
- (e) 動物買賣交易及運送法令。
- (f) 宰殺（屠宰）動物法令。

（三）執行動物保護事項屬各邦之權限。」

瑞士聯邦憲法第 80 條之動物保護條款與德國基本法不同，並非宣示「國家有保護動物」之義務（基本國策之宣示），而在使聯邦享有明文列舉之動物保護立法權，並於次項條文中將立法權之範疇明白列示為六種事項，對於瑞士聯邦一向權力不大的歷史傳統而言，深具重大意義。因為聯邦議會正式明文享有動物保護主要事項之立法權，諸如：如何建立飼養及照顧動物之一般標準、管制動物實驗及經濟動物之利用、動物進口、買賣交易、運送及宰殺規定，全部由憲法授權聯邦議會制定聯邦法律進行有效保護，各邦不再享有動物在前揭六大領域內之立法權限；相反地，各邦僅享有執行上述法律規定之權限與義務。一方面在消極上，可以統一各邦不同之動物保護規定，另一方面更可以積極有效提升動物保護之立法品質，將瑞士已加入之歐洲公約或國際條約中所建立之動物福祉原則與指標，有效置入瑞士聯邦動物保護法中，加以實踐並貫徹之²⁴。

²⁴ 瑞士加入之有關動物保護公約，例如：歐洲動物飼養公約（ETÜ）及歐洲實驗動物公約（Europäisches Versuchstier Übereinkommen）；奧地利聯邦憲法

三、動物保護入憲條文類型分析

我們分析德國與瑞士之「動物保護入憲」條文後，可以粗略將「入憲」條文之型態分成「簡易型」（諸如：德國基本法第 20a 條規定）與「複雜型」（諸如：瑞士聯邦憲法第 80 條）兩種不同類型。以下對此兩種類型之優缺點進行分析：

（一）簡易型

德國在基本法中僅於國家有保護自然環境外，增列「及保護動物（und die Tiere）」三個字，可認定為最簡易型之入憲方式，一方面搭具有絕對共識之「環境保護」之便車，另一方面也得以開闢除保護無生命之自然環境外，也應擴大保護有生命之動物，以求圓滿完整保護。

此種基本國策型之動物保護入憲條款，其功能在於將動物保護法益提升到憲法層級，得與「學術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及「經濟（財產）自由」之憲法法益相互平等，在比例原則的利益衡量架構中，拘束立法權、司法判決及行政措施，不致於任由學術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或財產自由宰制或剝奪動物保護面向之利益。

惟此種簡易型入憲存在一個缺陷：有關動物保護之具體內容及最低標準闕如，須有一部夠水準之動物保護法始能相輔相成，發揮憲法基本國策之功能；若無一部面面俱到且具有明確保護各類動物之法律，此種基本國策宣示即易流於形

式，無法有效執行（例如：埃及憲法雖有明文規定保護動物，但卻缺乏一部有規範效力之動物保護法以資相互支援配套）。

（二）複雜型

相對於德國之簡易型立憲，瑞士的入憲型態可稱為複雜型之立憲，因為瑞士除在聯邦憲法中宣示「國家有保護動物之義務外，並且明文賦予聯邦有六種列舉事項之立法權限，各邦則僅有執法權限」，在憲法中明示動物保護之重要六種態樣（飼養、買賣、輸入、運送、屠宰與利用）。

此種立憲型態之優點在於：透過憲法明文規定，一併指出動物保護之六大主要內涵，並且一併解釋「動物保護」立法究屬中央或地方之權限爭議，明示六大規範要點由中央立法，而地方僅有執行權限，具有一槌定音之功能；其缺點則在於條文較為複雜，而且哪些重要之點屬於聯邦立法權限，亦有見仁見智之看法，例如：狩獵及釣魚立法權限是否亦應歸屬中央（聯邦），即具有爭議。

（三）我國動物保護入憲策略

我國雖已制定「動物保護法」（1998 年公布生效）及「野生動物保育法」（1989 年公布生效），但在憲法上既無「動物保護」立法權限係分配中央或地方之明文，又欠缺保護動物之基本國策宣示，所以僅僅是「有法律」、「無入憲」的狀態。

此種狀態的最大缺點是：一方面中央頒定有動物保護

第 11 條第 1 項第 8 款於 1996 年修改時，亦如瑞士聯邦憲法第 80 條之體制賦予聯邦有動物保護立法權，各邦保有者僅為其執行權限。

法，但地方亦各自制定「動物保護自治條例」，彼此互相不同調（例如：是否承認 TN(V)R），而且管制密度亦不相同（例如：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應否繫繩²⁵？）。一國數制，不利法律之執行，因此當「動物保護」與「學術自由」相互牴觸時（例如：（殘忍）實驗動物之進行），或「動物保護」與「財產自由」相互牴觸時（例如：大量籠飼蛋雞或集約飼養豬隻）或「動物保護」與「宗教（信仰）自由」相互牴觸時（例如：三峽祖師廟神豬之殘忍飼養增胖），因彼此法律位階高低不同，其結果是動物保護必須向「學術自由」、「財產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退讓，形成動物保護之漏洞或不足。

從而，為彌補此種漏洞，我國入憲之策略宜兼採簡易型及複雜型之入憲模式，雙管齊下，才能有效解決我國特有之問題。首先，我國應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中，即在環境保護條款後，增訂「國家應尊重並保護動物、維護動物棲息環境，避免動物受到不必要之痛苦」，將動物保護法益提升到憲法位階，受到憲法之直接保護，從而得與「學術自由」、「財產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法益平等對待，保持各法益間的最大平衡，矯正目前動物保護邊陲化的失衡現象。將「動物保護」列為我國憲法之基本國策外，並且進一步將「動物保護」之面向，清楚框架出：維護動物棲息環境及避免動物受不必要之痛苦，以強化對「動物保護」基本國策規定之引導，匡正及教育功能，不至於言人人殊，

²⁵ 有關寵物犬隻管理問題，併得參閱陳正根，〈從動物權與秩序法探討畜犬管理規定〉，《興大法學》，5 期，2009 年 5 月，頁 1-74。

致無法凝聚其核心概念，使入憲目的功虧一簣。

其次，因為我國欠缺「動物保護立法」究屬中央或地方權限，造成中央法律與地方自治條例相互競合，但又難以明顯判斷地方自治條例是否牴觸中央動物保護法，致形成一國數制的結果，例如：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 20 條規定：得有條件施行街貓 TN(V)R，但是否與動物保護法第 5 條第 3 項相互牴觸？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 10 條規定，寵物於公共場所時，應使用鍊繩、箱籠或其他適當防護措施，但動物保護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卻只有 7 歲以上人之伴同，惟有具攻擊性之寵物才應由成年人之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毋須一律繫繩或採取適當防護措施，是否相互牴觸？南投縣動物放生保育自治條例允許有條件之放生行為，但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32 條規定卻禁止釋放動物，並有罰則規定……凡此種種，皆源於動物保護立法權限屬於中央或地方，憲法欠缺明文，致中央與地方爭論不休。從而，我國亦應仿瑞士、德國及奧國憲法體制於憲法第 108 條第 1 項第 21 款增訂：「動物保護屬於中央立法權限，得交由地方自治團體執行。」以杜爭議外，並得以進統一全國之動物保護立法水準，避免各縣市政府因各行其道，甚至於違反動物福祉的立法都不知的狀況，例如：禁止所有犬貓進入公園或校園，或禁止犬貓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等地方相關規定，例如：臺北捷運淡水信義線，最近始試辦寵物車可以在特定時間及站區，才可以搭乘措施²⁶，可見一斑，明確將動物保護之立法權收

²⁶ 參見自由時報，2020 年 1 月 3 日，A16 版。

歸中央，但保留地方自治團體有執行法律的權限與義務。中央與地方相互配合，才能有效提升我國動物福利及動物保護效能，在中央立法、地方執行的分工合作下，似才能有效提升全國一致的動物保護立法、執法及引導司法裁判的見解走向，為我們下一個世代的後代子孫負起責任。

參、結語

從動物保護入憲的功能剖析，我們可以清楚發現其具有下述三大功能：

1. 引導功能：引導未來立法修正朝向動物保護之終極目的，例如：全面檢討現行動物保護法、野生動物保育法及畜牧法等法規範基本價值。
2. 匡正功能：公正目前過度傾斜保護「財產自由」、「學術自由」及「宗教（信仰）自由」之立法、執法及司法裁判。
3. 教育功能：因為憲法之明示「動物保護」為我國之基本國策，所以不僅各級教育機關應具體落實於生活教育外，也對立法者、行政官僚及法官有相當之教育（化）功能。

觀察德國及瑞士憲法中，動物保護入憲之條文型態大致可分為「簡易型」與「複雜型」兩種不同態樣。反省並衡諸我國憲法現況，不僅沒有「動物保護」條款，而且亦乏「中央或地方權限」之明確劃分。因此，較為理想之入憲方式，

為求畢其功於一役，宜採取「簡易型」加上「複雜型」雙管齊下手段，才能一勞永逸達成「動物保護」之目標。申言之：

首先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3 項下增訂：「國家應尊重並保護動物、維護動物棲息環境，避免動物受到不必要之痛苦。」得與「人道關懷」的世界潮流相互接軌。

其次，於憲法第 108 條第 1 項第 21 款中明定：「動物保護屬中央立法權限，得交由地方自治團體執行」。明確釐清中央與地方權限分際，統一全國動物保護之法秩序程度，亦符合目前世界動物保護入憲之潮流作法，有效摒除地方自治團體消極不立法或不執法之「陋習」。蓋囿於地方人情包袱及選舉壓力，致地方自治團體常有不執行動物保護必要措施之前科紀錄，例如：地方故意不准設置私立「動物收容處所」，或消極阻擋民間動物收容所之申請設立。

至於「動物保護」立法範疇，是否宜採攷瑞士聯邦憲法第 80 條規定之體例，明文加以規定包含：飼養管理、輸入、運送、買賣、屠宰及實驗動物管理等六大面向？基於我國動物保護法及野生動物保育法對於前述六大範疇問題均已具有相當規範，為免立法疊床架屋，故有關具體明示動物保護立法之核心框架內容在我國似無急迫需要。從而，僅明示「中央立法／地方執行」之原則文字即可。

最後，依我國的政黨政治目前氛圍而言，短期內似難以達成超越黨派、合作共同修（制）憲之互信，縱使各黨派對於動物保護似無重大歧見，但缺乏修憲時機而使修憲可能性似乎不高。因此，在修憲須有政治高度動員之角度上而言，

可能不易推動本書所倡議之「動物保護」入憲之主張。縱使透過政黨協商機制，在朝野雙方目前缺乏互信基礎下，似根本不可能達成修憲共識，且在短期間內沒有其他急迫修憲議題可資配合運作等不利前提下，「動物保護入憲」似乎僅是一個遙遙無期的「書生之見」，無實現或「被附載」可能，在沒有入憲的急迫考量下，或許上述主張與倡議只能在歷史文獻上留下「曾經嘗試」入憲的紀錄，然而「不信春風喚不回」，只要仍有一大群團體及關心動物的人民不放棄此種主張，此種入憲主張非毫無實現的一天，蓋憲政時刻²⁷須高度動員，或許 2020 年元月爆發之武漢肺炎就是一個潛在契機：告訴人類不可以大量任意屠殺與食用野生動物，反而應該與動物和諧共存，才能創造一個永續的未來。

（本論文曾發表於台灣制憲基金會主辦，
「新憲法下的動物友善藍圖」論壇，2019 年 11 月 16 日）

論動物保護法制之基本問題

目次

- 壹、保護動物之範圍與分類
- 貳、動物權與動物福利
- 參、我國各類動物保護制度之法規體系及其問題
 - 一、寵物
 - 二、野生動物
 - 三、實驗動物
 - 四、經濟動物
 - 五、展演動物
- 肆、動物保護之行政程序
 - 一、公權力介入之時機（程序開始）
 - 二、重要行政流程
- 伍、結語

²⁷ 有關「憲法時刻」的理論分析，併得參閱葉俊榮，〈消散中的憲法時刻〉，收於《現代國家與憲法：李鴻禧教授六秩華誕祝賀論文集》，月旦出版社，1997 年 3 月，頁 237-292。其所講的「憲法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係指人民在代議制度下，在特定時空條件下之高度動員所形成的憲法政治（時刻）。

；應制定法律以保護科技創新之成果，維護並發揚文化財產；應於中央及省縣市預算中編列相當之教育、科技、文化經費；憲法第一五八、一五九、一六〇、一六一、一六二、一六三、一六四、一六五、一六六及一六七條之規定停止適用。」案。

修憲提案第七十六號

馮代表定國等九十人提：修改憲法第一六七條第一項為：「國內私人經營之學校，其私校學生與同級公立學校學生之單位成本之差距由政府補足」案。

修憲提案第九十三號

吳代表建國等九十三人提：建議憲法增修條文如左：

「教育文化發展之內涵，除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五十九條與第一百六十條之規定外，尤應注重國民民主精神、法治精神之培養。國家應充分提供國民平等受教育之機會，使六歲至十八歲之學齡兒童，一律接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國家並應加強辦理高等教育、技術職業教育、特殊教育與成人教育，以提昇國民素質與謀生能力」。

修憲提案第九十五號

吳代表建國等九十九人提：建議憲法增修條文為：「國家應鼓勵獎助私人興辦教育文化事業，使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得以公平合理享有教育文化資源」案。

（以上各案為教育基本原則）

三、與人民權利及義務有關之修憲提案，提請併案討論。

修憲提案第五號

張代表一熙等九十二人提：修正憲法第二十條人民有依法服兵役或警察役之義務案。

修憲提案第十一號

傅代表崑成等九十五人提：（關於基本人權保護之原則）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與權利上一律平等；應依天賦之理性良知，和睦相處，互助互利案。

修憲提案第十二號

法代表治斌等九十七人提：（關於隱私權之保障）憲法應增列「人民之隱私權應予保障」條款案。

修憲提案第十三號

李代表宗正等八十八人提：請將人民享有自然環境生存基本權利列入憲法第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中。其內

刑事案件之被告得拒絕不利於己之陳述；得拒絕提供不利於己之證人或證據；得要求與不利於己之證人對質。

任何人，如其行為發生時為合法，或已宣告無罪，或行為時法律無明文規定，不負刑事上之責任。同一犯罪亦不使其再負刑事上之責任。

處罰不得重於行為時法律之規定。」

提請討論 公決。

修憲提案第四十五號

陳代表照娥等八十三人提：建議修正憲法第二十條條文為：「人民於戰時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平時國家兵源以募兵為主」案。

修憲提案第六十五號

傅代表岷成等一一一人提：（關於國籍與國民之義務）人民有對國家忠誠之義務案。

修憲提案第七十四號

馮代表定國等一二一人提：修改憲法第十五條為：「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環境權，應予保障」案。

修憲提案第九十二號

吳代表建國等九十八人提：建議憲法增修條文內容如左：

「國民應依法納稅，唯國家應本公平賦稅的原則，擴大稅基，訂定合理稅率、稅則，並不得重複計算所得，要求國民納稅。」

修憲提案第一二七號

蔡代表重吉等九十一人提：憲法第十九條原文：「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修正條文：「人民納稅之義務，應基於徵納雙方公平之精神，並嚴守徵稅證據原則。」案。

修憲提案第一二八號

蔡代表重吉、吳代表茂雄等八十四人提：增訂條文：除現行犯之逮捕外，禁止夜間偵訊被告，日間訊問不得連續四小時，並嚴格規定羈押之條件案。

修憲提案第一三三號

陳代表菊等八十二人提：憲法第二章「基本權利與義務」修正案。（具體條文詳見「修憲提案」第三八二（四一七頁）

三)。

肆、審查結果

本委員會對於所有修憲提案，審查結果如次：

一、經決議：建請大會進行二讀討論決定者，計有左列各案之增修條文：

第一五一號、第七十號、第十四號、第一三七號、第九十四號、第五十五號、第九十五號、第五號、第十一號、第十二號、第六十五號、第八十五號、第七號、第七十七號、第八號、第八十九號、第一〇八號、第一五〇號、第一五二號、第五十九號、第六十九號、第六十一號、第六十七號、第八十六號、第九十六號、第十六號、第十七號、第三十八號、第一四三號、第十八號、第八十七號等三十一案（按：第一審查委員會決議建請大會進行二讀討論決定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一覽表詳見原審查報告書附件一）。

二、經決議：建請大會不予討論者，計有：第一號、第五十二號、第一四六號、第三十號、第五十號、第一二五號、第一二六號、第一二九號、第一三〇號、第一四五號、第一三二號、第五十四號、第一四二號、第二號、第四十一號、第一一七號、第十號、第一一六號、第一一三號、第七十二號、第九十三號、第十三號、第二十二號、第二十四號、第二十五號、第三十三號、第三十六號、第四十五號、第七十四號、第一三三號、第一四八號、第一五五號、第六號、第八十一號、第一一一號、第六十八號、第七十八號、第一〇九號、第一一〇號、第一一二號、第一二四號、第一四四號、第二十八號、第一三六號、第二十九號、第四十八號、第八十號、第九十七號、第一三五號、第三十一號、第三十二號、第三十七號、第四十二號、第六十三號、第一三八號、第三十九號、第四十號、第四十九號、第九十八號、第一〇三號、第九號、第二十七號、第七十五號、第九十號、第九十一號、第一〇七號、第一四七號、第三十四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全球資訊網

現在位置: 首頁 > 統計與出版品 > 農業出版品 > 農政與農情 > 96年(第175-186期) > 96年8月(第182期) > 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簡介

統計與出版品

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簡介

林務局保育組 夏榮生

為保育台灣野生動物資源，政府於78年6月23日制定公布「野生動物保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為當前野生動物管理及棲地保護之重要法律依據。本法立法意旨係維護物種多樣性，與自然生態之平衡，後應環境變遷及為符合實際需要，於83年、91年、93年及95年配合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之施行、行政程序法施行、尊重原住民傳統文化慣俗及刑法修正等因素，增刪及修正部分條文。

為協助農漁民處理野生動物危害農林作物情形及禁止馬戲團輸出入保育類野生動物進行表演，本法最近完成修正事宜，於96年7月11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600088041號令修正公布。修正重點一為協助農民妥善處理保育類野生動物危害農作物問題，保障農民權益，並兼顧保育類動物保育問題，提供農民合法以主管機關核定之人道方式捕獵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法源；二為基於考量動物福利、生態保育、提升國家形象、環境教育及國際潮流等理由，刪除輸入保育類野生動物供馬戲團表演之規定。修正內容如下：

一、增訂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保育類野生動物有危害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水產養殖，在緊急情況下，未及報請主管機關處理者，得以主管機關核定之人道方式予以獵捕或宰殺以防治危害。」，其立法理由為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野生動物危害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水產養殖者，得以獵捕或宰殺，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以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但保育類野生動物除情況緊急外，應先報請主管機關處理。是以，農民發現農林作物遭野生動物危害時，可依該條文規定予以處理，惟有於實務上提報主管機關時，會有危害發生時間點上之認定落差，爰增訂本項。

二、刪除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保育類野生動物活體，其輸入或輸出，以學術研究機構、大專校院、公立或政府立案之私立動物園供教育、學術研究及馬戲團供表演之用為限。」，此係考量馬戲團動物表演有違動物福利、野生動物保育與生態平衡及環境教育解說面向，並順應國際潮流，提升國家形象，爰將條文中「及馬戲團供表演」文字刪除，並相應刪除第二十五條第二項「前項輸入供馬戲團表演用之保育類野生動物，應於輸入後6個月內結束表演並復運輸出。其有延長之必要者，應於期限屆滿20日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以及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者。」之規定。

本網站刊載之「農政與農情」其所有內容，包含文字、圖像等皆可轉載使用，惟須註明出處。

©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全球資訊網 www.coa.gov.tw

<https://www.coa.gov.tw/ws.php?id=13043>

2021/02/25

【條文內容】

法規名稱：野生動物保育法 [英]

修正日期：民國 102 年 01 月 23 日

第 21 條 野生動物有下列情形之一，得予以獵捕或宰殺，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但保育類野生動物除情況緊急外，應先報請主管機關處理：

- 一、有危及公共安全或人類性命之虞者。
- 二、危害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水產養殖者。
- 三、傳播疾病或病蟲害者。
- 四、有妨礙航空安全之虞者。
- 五、（刪除）。
-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保育類野生動物有危害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水產養殖，在緊急情況下，未及報請主管機關處理者，得以主管機關核定之人道方式予以獵捕或宰殺以防治危害。

歷史條文及立法理由

民國 96 年 07 月 11 日修正（現行有效條文）

第 21 條 野生動物有下列情形之一，得予以獵捕或宰殺，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但保育類野生動物除情況緊急外，應先報請主管機關處理：

- 一、有危及公共安全或人類性命之虞者。
- 二、危害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水產養殖者。
- 三、傳播疾病或病蟲害者。
- 四、有妨礙航空安全之虞者。
- 五、（刪除）
-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保育類野生動物有危害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水產養殖，在緊急情況下，未及報請主管機關處理者，得以主管機關核定之人道方式予以獵捕或宰殺以防治危害。

立法理由

增訂第二項，為協助農民妥善處理台灣獼猴危害農作物問題，確實保障農民權益，並兼顧台灣獼猴自然生態保育問題，提供農民合法以主管機關核定之人道方式捕獵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法源。

民國 93 年 02 月 04 日修正

第 21 條 野生動物有下列情形之一，得予以獵捕或宰殺，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但保育類野生動物除情況緊急外，應先報請主管機關處理：

- 一、有危及公共安全或人類性命之虞者。
- 二、危害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水產養殖者。
- 三、傳播疾病或病蟲害者。
- 四、有妨礙航空安全之虞者。
- 五、（刪除）
-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立法理由

照黨團協商條文通過。

民國 83 年 10 月 29 日修正

第 21 條 野生動物有下列情形之一，得予以獵捕或宰殺，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但保育類野生動物除情況緊急外，應先報請主管機關處理：

- 一 有危及公共安全或人類性命之虞者。
- 二 危害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水產養殖者。
- 三 傳播疾病或病蟲害者。
- 四 有妨礙航空安全之虞者。
- 五 臺灣原住民族於原住民保留地，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典，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
- 六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民國 78 年 06 月 23 日訂定

第 21 條 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有騷擾或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必要者，應經中央主管機關之核准。

立法理由

明定保育類野生動物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應經申請核准始得騷擾、獵捕。

資料來源：法源法律網 www.lawbank.com.tw

2021/2/25

殺獼猴 林務局：以人道方式處理 | 台灣英文新聞 | 2015/01/05



漢 En



台灣英文新聞

Taiwan News 漢文

[首頁](#) / [未定義](#)

殺獼猴 林務局：以人道方式處理

[Tweet](#)[分享](#)[分享](#)[讚 0](#)

By 社會組, Taiwan News, Staff Reporter

2015/01/05 00:00

台灣英文新聞
Taiwan News
VOICE OF THE PEOPLE · BRIDGE TO THE WORLD

針對媒體4日報導「政府開放殺獼猴5千潑猴死期近 挨批"國際笑話"」乙節，林務局澄清沒有開放殺獼猴5千，而是如何讓農民在緊急情況下，以人道方式獵捕、宰殺獼猴，以維護農民的財產權，在保育獼猴與農民權益間取得平衡點。

林務局表示，「人道方式」係指最短時間內，給予動物最小痛苦，使動物死亡之方式。林務局進一步說明，解釋令的要點是：(1)野生動物的危害是當下存在的一種緊急危難；(2)如果不予處理，農民的財產將有不可回復的損失；(3)處理時，採取最少數量；(4)方式以最短時間及最少痛苦讓動物死亡。

林務局說，獼猴危害農作是長久以來存在的問題，政府必須有所做為，讓人民有感，當然也要保育臺灣獼猴。96年7月11日立法院修正野生動物保育法時，特別增訂第21條第2項規定，在「緊急情況」下，未及報請主管機關處理者，得以

主管機關核定之「人道方式」予以獵捕或宰殺。

立法理由係為協助農民妥善處理臺灣獼猴危害農作物問題，確實保障農民權益，並兼顧臺灣獼猴自然生態保育問題，提供農民合法，以主管機關核定人道方式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的法源。由於緊急情況與人道方式都是一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為讓農民在依第21條第2項辦理時，不致違反法律，農委會特別在去年12月5日發布解釋令：「緊急情況」指保育類野生動物危害農民合法種植之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水產養殖，存有現在性危難之情狀，如不予立即獵捕或宰殺，農民將遭受不可回復財產損失之情形者，得予獵捕或宰殺最少數量，以維護其財產法益。

林務局表示說，政府在防治獼猴危害農作的方式，採公開透明並建立基礎資料，並持續推動現行套袋、人力驅趕、燃放鞭炮、瓦斯音爆器、收音機、養狗驅趕、架設電圍籬及使用誘捕籠捕捉移除等8種防治措施。2015/01/04

Tweet

0 0

0 0

0 0

更新時間：2021-02-25 11:16 GMT+08:00

最受歡迎



對獎不求人！台彩手機 App 掃描刮刮樂、彩券立知是否中獎

台中捷運何時通車？預計9日完成載重測試 列車春節持續試運轉



2021台中元宵限量牛年小提燈人氣超夯 免排隊可網路下載DIY



【武肺快訊】AZ疫苗接種最新策略出爐! 台灣指揮中心2/23宣布：兩劑至少間隔8週



法國傳奇電音雙人組Daft Punk解散! 成軍28年爆炸性結束經典曲目在這裡



士林官邸鬱金香展 春節過後亮麗登場



陳時中：新冠疫苗已取得1981萬劑 最多有4500萬劑



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新春開工首檔住房閃購



【台灣國安團隊新布局】國防部舉行部長布達及交接典禮 邱國正、嚴德發均未致詞



【投資理財老生常談】台灣生醫通路股值得尋寶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環境哲學的省思

The Eco-Wisdom and Eco-Justice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A Reflection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doi:10.7065/MRPC.200603.0137

哲學與文化, 33(3), 2006

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33(3), 2006

作者/Author: 莊慶信(John B. Chuang)

頁數/Page: 137-16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06/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7065/MRPC.200603.013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環境哲學的省思

莊慶信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內容摘要：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研究法」為主，兼採「科際整合」法及「深度訪談法」，特別由環境哲學角度檢視台灣原住民是否擁有獨特的生態智慧及遭受環境正義問題的困擾？身為一個環境哲學研究者，探索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的背後是否有其理論基礎，是責無旁貸的。

其次，本論文期望能整合各學門的環境共識，一面可提供漢族群寶貴的生態智慧，一面可為弱勢的原住民爭取某程度的環境正義。最後，本研究的結果歸納出五種寶貴的環境倫理規範，討論六項環境正義的問題，以及提供三項解決之道。

關鍵詞：生態智慧・環境正義・環境哲學・環境倫理・原住民

壹、前言

在原住民當中，可能以泰雅族來台最早，然而「在泰雅族之先，台灣當已有先住民居於此焉」，¹由於這些矮黑人先住民的滅絕，學者對這些先住民的探索迄今仍無定論。台灣的熟番及化番在清代以後，逐漸合稱為平埔族（plain tribe），有別於古代生番及今台灣的原住民十族。原住民十族為阿美（Amis）、泰雅（Tayal，含泰雅亞族及賽德克族 Sedek）、排灣（Paiwan）、布農（Bunun）、魯凱（Rukai）、卑南（Puyuma）、鄒（Tsao）、賽夏（Saisiat）、達悟（Tao）、邵（Thao）等族；平埔族八

¹ 廖守昇：《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台北：世新專校，1984，頁 14-17。廖氏推測泰雅族佔了優勢，矮黑人先住民稍後便滅絕。

族為西拉雅族 (Syraya, 又分西拉雅、馬卡道 Makatao、四社平埔 Taivoran 三支族)、洪雅族 (Hoanya, 又分兩支族)、巴布薩 (Babuza)、拍辜海 (Pazeh)、拍瀑拉 (Papora)、道卡斯 (Taokas)、凱達格蘭 (Ketagalan)、噶瑪蘭 (Kavalan 卡瓦蘭) 等族。其實平埔族和山胞都是台灣的原住民。古來以漢化為化分的標準, 將原住民一分無為二, 是「大漢沙文主義的表現, 在民族學、人類學上本就沒有根據, 不論所謂山胞或平埔族皆應正名為臺灣原住民, 應(共)區分為十八族」。²以此觀點看台灣原住民, 就不再是少數的弱勢族群了, 但問題是大部分的平埔族後裔早已隱沒在漢人的主流社會裡而不自知。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原住民環境作法及思想方面, 已有社會學、人類學等等學術性的研究, 筆者發現這些研究大多以描述性的田調法或社會學或人類學研究法為主, 可是仍缺環境哲學的研究, 因此, 本論文在此領域是首次全盤性的研究。本研究從環境哲學角度出發, 以科際整合法, 整合各學門的環境共識, 一面可提供漢人族群寶貴的生態智慧, 一面可為弱勢的原住民爭取某程度的環境正義(或生態公義)。再次, 本研究成果, 未來可與國外原住民相比較, 匯聚出生態智慧的結晶。最後, 這些原住民生態智慧為整個國際社會—地球村—或許成為寶貴的遺產。

傅君曾將台灣研究原住民的學者劃分為兩類而以兩極來形容, 第一類專家譴責原住民是「野生動物殺手」, 第二類專家認為原住民有「生態智慧」, 是能和大自然和平共存的「保育者」。³事實上, 這種兩分法有其缺點, 因為台灣的所述學者不僅有這兩極端, 也有持中間型的各種不同的學者專家, 如紀駿傑、王俊秀等人。根據紀駿傑, 有些學者認為原住民固然發展出許多讓他們不「快速破壞環境的文化機制」, 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就是有意識的「環境保護者」。但紀氏的研究依然肯定台灣百分之六十的森林生態系主要都是台灣原住民的傳統居地、獵場與採集區, 也表示幾千年來原住民並未大肆破壞當地自然生態與減低當地生物多樣性, 亦因此當前生物多樣性的保存必須考慮原住民的權利及文化, 並結合他們長期累積下來的生態智

² 潘英:《臺灣平埔族史》, 台北:南天書局, 1996, 頁 31-38。原住民分為幾族有多種說法, 有八族、九族、十族(含 2001 年承認的邵族)。若加上稍後所宣布的太魯閣族(一名太魯閣)族則為十一族, 但依學者的研究, 此族為在花蓮太魯閣一帶的賽德克族(Sedek)人。

³ 傅君:〈台灣原住民「生態智慧」與野生動物保育〉,《山海文化雙月刊》, 17 期(1997.11): 48-49。

慧；同時也研究原住民的哪些文化及行為模式不符合「生態原則」或環境倫理原則。⁴這也就是在紀氏之前，傅君所提問的「原住民生態智慧」和「現代的『保育觀念』是否契合？」⁵這實是值得探索的課題。由於台灣深受工業資本主義擴張的影響，生態環境快速遭到破壞，而台灣的種種公共措施衍生「環境正義」⁶問題，這是本文的關懷重點之一。

簡言之，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一面為本土的環境哲學找尋草根性的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一面為處於弱勢的原住民伸張其環境正義，同時引導原住民大學生畢業後為族人服務作準備。

二、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研究嘗試從環境哲學的角度，儘可能將所搜集到的資料理出頭緒，一面整理出本土原住民的生態智慧，尤其在於環境倫理方面對於以漢人佔優勢的社會之具體貢獻，並嘗試尋找原住民的環境倫理的理論基礎；另一面，也要指出台灣原住民遭遇環境正義的困難，以及漢人社會調整政經制度，使處於弱勢的本地原住民的生活，以符合環境正義的可能性。相對而言，台灣平埔族的文獻比「原住民」十族為少，所以本研究以後者之資料為主，以前者為輔。

因此，本論文採用之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獻分析研究法」，藉以整理、分析、綜合國內對於原住民環境思想的各學門之研究與論述。同時兼採「科際整合」研究法，博採觀光學、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生態學、森林學、環境哲學等等環境相關的研究成果，將這些各種不同視域的實證及理論研究成果，加以整合。並輔以筆者及各族（如阿美、卑南、達悟、泰雅等）之六位輔大宗教學系原住民同學共同執行的「深度訪談法」，以印證一些可疑之文獻或資料，期能獲致比較客觀而可行的另類生態智慧及達致環境正義的途徑。

⁴ 紀駿傑：〈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文化〉，生態關懷者協會等主辦，《「生物多樣性面面觀」研討會》（2000.08.21.）頁46、50。

⁵ 傅君：〈台灣原住民「生態智慧」與野生動物保育〉，頁43。

⁶ 紀駿傑、王俊秀：〈環境正義：原住民與國家公園衝突的分析〉，《山海文化雙月刊》第19期（1998.07）：88。本論文的「環境正義」根據紀氏及王氏的定義指：「因環境因素而引發的社會（不）正義，尤其是關乎強勢與弱勢團體間不對等關係的議題。不論是透過實質正義（如，社會或自然資源分配平均）或程序正義（在非自願狀況下，遭環境毒害的威脅）的原則來檢視，社會上的強勢團體均無法自圓於將污染物棄置於最弱勢且最沒有能力應付污染問題的人們家園之作法。」

三、問題的陳述

本研究特別由環境哲學角度檢視台灣原住民是否擁有獨特的生態智慧及遭受環境正義問題的困擾？換言之，本論文在於探索：（1）台灣原住民有哪些環境倫理規範？（2）台灣原住民環境倫理的背後是否有理論基礎或實踐的依據？（3）台灣原住民有無環境正義的難題及補救措施？所以，本文共分為三部分來討論，（一）台灣原住民的環境倫理規範，（二）台灣原住民環境觀的理論基礎，（三）台灣原住民「環境正義」問題的省思。

貳、台灣原住民的環境倫理規範

有的學者批評「原住民固然發展出許多讓他們不大量、快速破壞環境的文化機制，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就是有意識的『環境保護者』，能夠維持生態平衡更重要的原因可能還在於他們受制於有限的科技、人口的稀少等因素，加上他們並未沉迷於追求永無止境的物質成長」，相對地來說，原住民比起非原住民更能與大自然和諧相處，保持生態的平衡。⁷本文在此將台灣原住民對待大自然的傳統態度與行為標準，歸納為合乎自然、保護生態多樣性、維生需要的簡樸生活、獵物共享、聖化自然等五項，稱之為台灣原住民的環境倫理規範。

一、合乎自然

早期中南部的平埔族，「為避免因焚燒獵場而導致破壞鹿群生存的空間，所以採用日曬法」，而未採用燒田式火耕法；一般而言，台灣平埔族的傳統耕作、收成方法都很原始，「亦可謂順乎自然」。他們的飲食文化「以方便、自然取得為主」，如採食野菜、水果、貝類等，而少加工的食品。⁸泰雅族「知道土地需要休息，所以不會過度使用它，採取休耕方式讓土地有足夠的時間來復原，讓土地保持肥沃」，馬太安的

⁷ 紀駿傑：〈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文化〉，頁 48-51。

⁸ 劉還月等：《我是不是平埔人 DIY》，台北：原民文化，2001，頁 132；又見潘英：《臺灣平埔族史》，頁 238-240。

阿美族也有這種「輪耕」的習慣。⁹

台灣原住民在日常生活上，以直接運用大自然的產物，而不耗時加工為原則。在飲食方面，他們都普遍地採食野菜。其中以阿美族特別「因嗜食野菜而發展出一套非常特殊的飲食文化」，山苦瓜、藤心（Lunets）、芒草心、檳榔心、龍葵（Dardugun）、過貓、山蘇、昭和菜、野菜（Lukul）都是阿美族的傳統野菜。阿美族對於野生植物的辨識能力及取用野菜的習慣，優於其他各族，至今仍以野生植物為主要蔬菜的來源，因而被戲稱為「吃草的民族」。布農族也習慣在山上採集可食用的野菜（如龍葵、鴨菜 Samah、鳥巢蕨等）、野果（如百香果、野草莓）、調味料（如山鹽青 Qualus）等，並以樺木當房屋之結構骨架。¹⁰

在住屋方面，平埔族傳統的住屋材料為木或竹，房子的構造則以樁上住屋，比漢人的土墩式住屋對人體健康更好。¹¹排灣族人和布農族人均運用居住地的板狀頁岩當建材蓋成石板屋、砌石板牆，以石板鋪地及當床板。¹²

在綜合類方面，蘭嶼（Pongso No Tao 人類的島嶼，Botel Tabago, Orchid Island）的植物以林投和五節芒分布最廣，而達悟人在食物（含主食類、水果類、野菜類、刺激品）、服飾、住屋、漁具、祈福驅靈、醫藥、柴薪、飼料、用具等九類¹³方面都

⁹ 何發隆講，馬幸費慈譯，〈泰雅族的傳統土地習慣〉；許介麟：《原住民族權利國際研討論文集》台北：國立台大法學院，1999，頁 68；又見李亦園等著：《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中研院民族所專刊之二，台北：中研院民族所，1962，頁 32；受訪者 D，訪談員 D，〈賽德克亞族德魯固群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花蓮：銅門部落，2003/01/27。又見受訪者 E，訪談員 E，〈賽德克亞族德魯固群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花蓮：秀林部落，2003/02/13。依訪談結果顯示：德魯固群人的習慣是田地兩三年輪耕及休耕。

¹⁰ 達西烏拉灣·畢馬（田哲益）：《台灣的原住民——阿美族》，台北市：臺原，2001，頁 188-200；黃藤心今日已為森林法所禁止，阿美族不得已改為人工種植，而成了經濟作物；達西烏拉灣·畢馬（田哲益）：《台灣的原住民——布農族》，台北市：臺原，2003，頁 155-159。受訪者 A2，訪談員 A2，〈東河阿美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台東東河：北源村美蘭部落，2003/02/08。

¹¹ 李亦園：《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台北：聯經出版社，1982，頁 61；又見潘英：《臺灣平埔族史》，頁 258-259；以及明立國：《台灣原住民的祭禮》，台北：臺原出版社，1989，頁 190-191。

¹² 陳奇祿：《臺灣土著文化研究》，臺灣研究叢刊 16，台北市：聯經，1992，頁 27-68，113-120；及王煒昶：《台灣原住民之美》，台北：行政院文建會，2002，頁 112，144；達西烏拉灣·畢馬：《台灣的原住民——布農族》，頁 174-176。

¹³ 鄭漢文：〈雅美族的民俗植物〉，《東臺灣研究》1 期（1996.12）：71-79。達悟人的野菜與台灣島上的其他原住民大同小異，如，林投、五節芒、山蘇、龍葵、昭和草、過溝菜蕨、白竹仔菜（鴨跖草）等等。

以自然界的植物為資料，其中以當地木材雕刻出全球原住民中技術最進步的「拼板船」。台灣所有原住民各族都以竹或籐編成運搬用（如背囊）、提帶用（如淺籃）、貯存用（如魚籠）、盛置用（如竹籩）、漁撈用（如魚筊）等日用編器。鄒族和卑南族的竹筒；排灣族和頭社平埔族的竹杯；阿美族以竹子做成湯匙，以竹節做成杯子¹⁴；排灣族和各平埔族均有使用竹木製的竹器、木杯等日用廚具的現象。昔日鄒族人鑽木取火時以台灣芭蕉葉（引火物）、雀榕皮（火繩），以削尖的箭竹為起火（popsusana），櫟樹板為起火板（popsusa）等等，¹⁵都是取自自然，使用之後，易被大自然所分解，顯出台灣原住民的日常生活以合乎自然為規範。這和今日人們幾乎樣樣以化合的人工製品為生，不能相提並論。

由上述的證據不但顯示台灣原住民與自然相互依存的密切關係，更顯出昔日台灣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在食、衣、住等方面，均以「合乎自然」為原則，而不在於追求精製而不環保的飲食及居住的「品質」。

二、保護生態多樣性

從台灣原住民的傳說、故事中，可推知他們認為人與大自然的動物有關連。例如，阿美族人傳述著鯨魚救人、以及女人與鹿或山豬的故事，泰雅人和賽夏人都有人變成猴子和老鷹的故事，布農人傳說帕帕多西鳥也是人變成的，卑南族人傳說人變成了鳥、黑熊和老虎，魯凱人傳說雲豹利庫勞變成了人，魯凱族和排灣族人傳說百步蛇的蛋產生頭目的祖先以及女人嫁給百步蛇，鄒族人甚至認為「太古時候，鳥獸蟲魚並沒有什麼差別，都具有人的形象」。¹⁶達悟人更奇怪地傳說竹子和石頭¹⁷是他們的祖先。竹子是植物，而石頭則是無生物，均被視為人類的祖先。可見以上這些代代傳誦的故事背後，隱含著台灣原住民愛護野生動植物，並希望多樣物種能持續於自然界的心聲和環境態度。

在狩獵方面，昔日賽德克亞族的太魯閣族群將獵區劃分為數個區域，每個家族

¹⁴ 受訪者 C，訪談員 C，〈玉里阿美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花蓮玉里：東豐部落，2003/02/04。

¹⁵ 湯淺浩史（Yuasa Hiroshi）著：《台灣原住民影像誌：鄒族篇》，台北：南天書局，2000，頁 156-157。

¹⁶ 林道生編著：《原住民神話·故事全集》第 1 冊，台北：漢藝色研，2001，頁 24-125；林道生編著：《原住民神話·故事全集》第 2 冊，台北：漢藝色研，2002，頁 138-168；達西烏拉灣·畢馬，〈台灣的原住民——魯凱族〉，台北：臺原，2002，頁 13。

¹⁷ 林道生編著：《原住民神話·故事全集》第 1 冊，頁 183。

又將獵區分為幾個小區域，分區輪流進獵。若有三區，每區進獵一年，其他兩區則是禁獵區，禁獵的作用在於保護動物繁殖的機會。¹⁸卑南族獵人不捉小野生動物，只獵取成熟的獵物。¹⁹「布農人獵熊有一定的節期，非獵熊季節，禁忌獵熊。」²⁰日本學者鈴木質認為昔日鄒族人禁食熊肉、豹肉，是「因迷信之故」。²¹其實，台灣原住民，以馬太安的阿美族為例，狩獵時，沒有嚴禁狩獵的動物，但卻有許多迷信行為禁止他們打獵，這就是所謂的禁忌。再者，他們出獵時，若聽到 shishil 的叫聲是 'shishil' 而非 'e— e—'，就立刻走避而不捕殺此種鳥，可見此禁忌本身即有護鳥之寓意。²²此外，台東阿美族將獵殺豹、熊視同殺人，必遭死靈報仇，所以只要遇到此二獸，就立即迴避，讓牠們逃走。²³這些原住民的禁忌除了宗教上的意義之外，還隱含著保護生態多樣性的意涵。

近來台灣原住民為了保護大自然，而開始有封溪禁漁的風氣。如布農族和鄒族共同保護高雄三民鄉楠梓仙溪，鄒族保護嘉義阿里山鄉山美村的達娜伊谷溪，阿美族護守台東東河鄉的馬武窟溪等等。²⁴達悟人在護魚方面，則非常週詳，他們將魚區分為可食及不可食兩大類，不可食（禁忌）的魚如鰻魚、河豚；可食的魚分為男人魚（壞魚）、女人魚（好魚）及老人魚三類。由於女性禁食男人魚，男人為了供應母親、妻女副食品，須要耗時去追捕女人魚，如此免除了較易捕捉的男人魚被趕盡殺絕的可能性。²⁵再者，達悟人不論以木材或鐵材製作傳統的魚鉤時，大多不帶倒勾²⁶，那麼，萬一釣到禁止的魚類，就可以安全地放生，而有保護魚類的意味。

在植物方面，就生態多樣性的觀點而言，蘭嶼島屬於亞熱帶，植物約有八八六種，從田調記錄已知達悟人使用的植物就有二〇四種，其中以毛柿、欖仁舅、麵包樹、台東龍眼、烏心石、五節芒、山欖、林投、蘭嶼赤楠等為多用途植物；他們「長期累積下來的森林資源使用知識」，有助於推動原始森林的保護。²⁷或許有人反對原

¹⁸ 黃長興：〈太魯閣族的狩獵文化(下)〉，《山海文化》20期（1999.10.）：122-123。

¹⁹ 受訪者 A1，訪談員 A1，〈卑南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台東：南王部落，2003/02/12。

²⁰ 達西烏拉灣，畢馬：《台灣的原住民——布農族》，頁 139。

²¹ 鈴木質著，吳瑞琴編校：《台灣原住民風俗誌》，台北：臺原出版社，1992，頁 99。

²² 李亦園等著：《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頁 48。

²³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阿美族、卑南族》，頁 151。

²⁴ 戴永祺：〈原住民生態智慧與自然保育〉，《原住民教育季刊》16期（1999.11）：38。

²⁵ 參閱 <http://www.pongso.org/js/js.htm>，此網頁資料引自中央研究院〈達悟族〉。

²⁶ Hsu, Ying-chou (徐瀛洲), *Yami Fishing Practices: Migratory Fish*,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1982, pp.214-215, 217。

²⁷ 王相華等：〈蘭嶼雅美族之植物使用方式〉，《國家公園學報》10，2（2000.12）：228-232。

住民取用森林資源。然而有人已看出：在某種程度之內，「伐木、採藤等活動，不僅不妨礙，且有助林木繼續生長，使其有新陳代謝作用」。²⁸

總之，不論就傳說故事而言，或由漁狩獵角度而言，或由植物而言，台灣原住民的生活習俗上，充分顯示他們對於保護生態環境的多樣性，極其用心。今日世界能否生存下去，與多樣性密切相關，就從語言的角度看多樣性，目前全球有二五〇〇種語言正瀕臨滅絕的危險。既然今日世界難以應付的生態危機與文化的多樣性扮演息息相關的角色，而不同的原住民文化可提供不同的生態智慧，因此，生物多樣性公約（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就肯定「原住民在持續地管理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重鎮裡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²⁹換言之，台灣原住民在保護生態的多樣性方面的貢獻毋庸置疑。

三、維生需要的簡樸生活

台灣原住民漁獵的主要對象分為鳥獸及漁類，鳥獸類包括鹿、山豬、羌、猴子、狸、山羊、松鼠、豹、熊、雉雞、竹雞、斑鳩等等。以馬太安的阿美族為例，他們打獵的方法，可分為圍獵、焚獵、追跡獵、陷獵等等。平埔族取用自然食物的原則是只取所需的量，而不多取；當蔬果不夠時，則輔以捕鹿等獸肉來補足。³⁰魯凱族人則有世襲的獵場制度，不可至他人獵場打獵，以維持不過度狩獵的現象。³¹阿美族人打獵時，一般都遵守固定的獵場之規範，蓋茅屋時不會砍超量的樹。³²賽夏人平常吃的只是些蔬菜、野菜，「鳥、獸之肉只有在狩獵有所收穫及祭典當日才可吃到」。³³至於台灣原住民漁撈的主要魚類包含鯉、鰱、石伏魚、鰻、龜、鱉、蝦、蟹、

²⁸ 衛惠林、劉斌雄：《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62，頁10。

²⁹ Henrietta Fourmile, "Indigenous Peoples, the Con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Global Governance," Nicholas Low (ed.), *Global Ethics & Enviro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225-229. 由於「生態多樣性」(eco-diversity)所應用的範圍比「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更為寬廣，不僅指生物，本研究乃以前者取代後者。

³⁰ 李亦園等著：《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頁51；劉還月：《我是不是平埔人 DIY》，頁132-133；以及潘英：《臺灣平埔族史》，頁241。

³¹ 達西烏拉灣·畢馬：《台灣的原住民—魯凱族》，頁119。

³²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阿美族、卑南族》，頁35-36；受訪者B，訪談員B，〈玉里阿美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台北：土城，2003/03/05。

³³ 鈴木實著：《台灣原住民風俗誌》，頁94。

飛魚等等。達悟人對於捕飛魚有許多禁忌和季節的規定，如飛魚季節禁捕非飛魚。³⁴充分顯示捕魚僅是爲了維持生命，並保護其它珍貴的魚能持續生存下去。

基本上，台灣原住民無論是狩獵、漁撈或農耕，取用自然資源時，目的僅在於維持生活（生命）的需要，而不在於囤積財富。他們「爲了保持生活秩序的平衡和生態，衍生出各種規範，在泰雅族稱之爲 Gaya」。³⁵也就是說，整體而言，台灣原住民在取用大自然的資源時，都以能維持生命的基本需要爲考量，以它爲衡量的標準或規範，而不致像漢人或現代文明人一樣，常以收入經濟利益爲主要考慮因素。

從當代環境觀點來看，台灣南方澳的泰雅族人，挖掘沙灘以取得海龜卵的行爲。³⁶阿美族竟然會採用的焚獵（火獵）式，以捕獲可觀的獵物。馬太安的阿美族所捕獲之鳥類若其羽毛美麗，通常作爲裝飾的用途。³⁷早期馬太安的阿美族、賽夏族和鄒族都以魚藤汁麻醉溪魚的方式捕捉溪流魚類，³⁸而有一網打盡之嫌。花蓮的阿美族竟然將河川裡的打魚活動視爲「日常之娛樂」，因爲這是他們「最喜愛的娛樂，一有餘暇，他們就跑到池沼、小溪去捕魚」，而且大小魚都捕捉。³⁹布農族人獵鹿並不是一種日常維生的必需品，「鹿可以說是最珍貴的一種獵物了，除了因爲比較值錢，而且可以用來與人易物之外，獵獲山鹿的人還會被族人視爲英雄」。⁴⁰以上這些作法，不易爲現代環保人士所理解，因爲這些均超出了人類的基本需要，顯然帶有某程度的奢侈、娛樂成份，其做法仍值得再商榷。

有一位受訪的七十六歲泰雅族耆老，聲稱自己曾「打過三、五百頭山豬」⁴¹，亦即，他平均大約每兩個月捕獲一頭。另有一賽德克亞族太魯閣族群的研究者曾爲

³⁴ 林道生編著：《原住民神話·故事全集》，第1冊，頁181-182；又見受訪者F，訪談員F，〈達悟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台東蘭嶼：朗島部落，2003/09/15。

³⁵ 達西烏拉灣·畢馬：《台灣的原住民——魯凱族》，頁127。

³⁶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泰雅族》，頁99。

³⁷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研院民族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阿美族、卑南族》第二卷，台北：中研院民族所，2000，頁33，151；又見李亦園等著：《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頁47，51。

³⁸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賽夏族》，頁63；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鄒族》，頁99；李亦園等著：《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頁68-72。

³⁹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阿美族、卑南族》，頁37，39；受訪者A2，訪談員A2，〈東河阿美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台東東河：北源村美蘭部落，2003/02/08。

⁴⁰ 明立國：《台灣原住民的祭禮》，頁119。

⁴¹ 陳茂泰編著，吳玉珠、陳勝榮協同研究：《臺北縣烏來鄉泰雅族耆老口述歷史》，板橋市：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1，頁58-59。

原住民辯護，認為古今在台灣原住民各族的社會中，「靠山吃山」「山產野味饗食貴賓」的習俗，均甚為盛行，而其中獵殺野生動物的一主因是玉米、小米、蕃薯等農作物，「正是山豬、獼猴及各類鼠科、雉類野生動物爭奪的食物」。⁴²或許這理由可以解釋上述不易理解的部分。

就算在某些方面原住民的行為有瑕疵，但是昔日台灣原住民的「維生需要的簡樸生活」規範，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四、獵物共享

台灣原住民，團體狩獵所獲得的獵物，依慣例均能與各種不同付出的同行者（甚至無法同行的人）分享。如鄒族人習慣將團體獵的成果部分分給射殺者及獵狗的主人，其餘的平均分配給同行的人，甚至未能出去打獵的家庭也能分到獵肉；⁴³阿美族對於團體獵的獵獲物則有更細節的規定，按部落階級的高低分配獵物的多寡，依序由長老、壯丁團至少年組，年長者所得的份，往往比年輕人還多。即使是較弱勢的婦女和兒童亦同樣可分得獵肉。⁴⁴昔日魯凱族的狩獵規範強制規定，「獵獲物不可一家人獨享，所得獵物，採集體分配。」魯凱族男人只要獵獲六隻大山豬，並與族人尤其是老弱婦孺分享的獵人，就可經由頭目獲得配戴百合花的資格。⁴⁵賽德克亞族太魯閣（Truku, Tuluku）族群的「獵人捕獲之獵物，非供買賣，而是平均分配給親朋家族各戶，分享其獵場上的成果，以維繫家族的和諧與團結。」如此不會導致「驚動獵場，危及山林的生態環境」，德克塔亞（Tukutaya）族群亦有類似的作法。⁴⁶達悟人在捕飛魚時，常常為了部落人際關係的和諧，而有等待大家到齊才進行下一個動作，捕魚回來必等到「各個船組都到齊了，大家一起把飛魚卸下在船邊」，每戶家

⁴² 黃長興：〈太魯閣族的狩獵文化（下）〉，頁 112。

⁴³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研院民族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鄒族》第四卷，台北：中研院民族所，2001，頁 98-99；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研院民族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泰雅族》第一卷，台北：中研院民族所，1996，頁 107。

⁴⁴ 達西烏拉灣·畢馬：《台灣的原住民——阿美族》，頁 184；又見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阿美族、卑南族》，頁 35，152；又見李亦園等著：《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頁 57。

⁴⁵ 達西烏拉灣·畢馬：《台灣的原住民——魯凱族》，頁 119，126。

⁴⁶ 黃長興：〈太魯閣族的狩獵文化（下）〉頁 123；又見簡鴻模：〈台灣原住民傳統宗教與生態環保——以泰雅族賽德克亞群為例〉，《輔仁宗教研究》2 期（2000.冬）：59，63。太魯閣（Truku, Tuluku）族群及德克塔亞（Tukutaya）族群均屬於泰雅族的賽德克亞族。

庭平均分配，有特殊需要的人則多分一些，船夫及船員另有特殊的分法，然而都以公平分享為原則。⁴⁷達悟人的這種「共享制度」，撈得的魚隻依人口平均分配，或分贈給親朋，不似漢人的文明社會，常有獨吞獨享，貪婪無窮的現象。⁴⁸

由以上各族分享獵物的現象來看，傳統原住民的作法既然不以野生動物為經濟標的，就不致大量濫捕野生動物，如此可使自然生態達到持續平衡的狀態，在今日物慾橫流的台灣，此種規範及其價值觀值得文明的漢人師法。然而，筆者以為如果這個獵物分享的做法可以擴大至所有自然資源的分享，對於大自然的保護就更有利、更為完整了。

五、聖化自然

根據魯凱族傳說，雲豹變成人之後，他們的祖先就在發生此靈異事件的地點搭建靈屋（宗教廟堂），供族人祭祀之用，直到今天。再者，魯凱族人將北大武山聖化為聖山，認為那是祖靈之所在神聖不可冒犯；大鬼湖（他羅瑪琳）和小鬼湖（巴油池）過去被魯凱族人視為「聖湖」，使得附近山區的自然生態都受到極佳的保護。再者，達悟人雖然捕食飛魚，但一則傳說提及，一條大飛魚託夢給老人說：「不能隨便捕捉飛魚，你們要知道捕飛魚的季節和規則，遵守禁忌，才不會生病。」老人照做了，並傳授給各部落，這些規則、禁忌直到今天，依舊受到族人的嚴格遵守而絲毫未變。⁴⁹再者，達悟人對九條河流及山泉，賦予了神聖的意義，無形中也聖化了大自然。⁵⁰鄒族人也有類似之處，他們在神聖之地—集會所—的露台前種植赤榕樹，把此樹視為靈樹；⁵¹並在頭目家內外及聚會所種植金草蘭（fiteu, sacred orchid, 聖草），認為此草是「神所寄寓的植物」。⁵²由於篇幅及時間的限制無法詳列他例。僅就以上數例，我們已不難窺知台灣原住民常把大自然的動植物、山河湖泊等神聖化，也因此而達到奇特的環保效果，不容鄙視。

綜觀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之中，隱含著合乎自然、保護生態多樣性、維生需

⁴⁷ 夏本奇伯愛雅（周宗經）：《雅美族的社會與風俗》，台北：臺原，1994，頁180-181。

⁴⁸ 劉其偉編著：《蘭嶼部落文化藝術》，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82，頁143。

⁴⁹ 林道生編：《原住民神話·故事全集》第1冊，頁71，181；達西烏拉灣·畢馬：《台灣的原住民——魯凱族》，頁16-17，19。

⁵⁰ 關華山：〈雅美族的生活實質環境與宗教理念〉，《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7期（1989.10）：

⁵¹ 鈴木質：《台灣原住民風俗誌》，頁100。

⁵² 湯淺浩史：《台灣原住民影像誌：鄒族篇》，頁75-76。

要的簡樸生活、獵物共享、聖化自然等五種環境倫理規範。比對美國學者針對美國印地安人的研究結果，發現印地安人擁有四大規範：效益式的保育（*utilitarian conservation*）、宗教的尊敬（*religious reverence*）、環境覺醒（*ecological awareness*）、環境倫理（*environmental ethics*）⁵³，其中台灣原住民較不明顯的是環境覺醒，而這一點科倍德（J Baird Callicott）也不以為是這些印地安人的特徵。再者，筆者曾根據中國四環境學派及西方四環境學派所整合出環境哲學的新典範「中西整合論」（*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hinese-Wester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而提出「靜觀自然、誠敬自然、不擾不傷、合乎自然、關愛自然、簡樸生活、環保政策、環保企業、聖化自然」等九個環境倫理規範。⁵⁴兩者相較之下，可知合乎自然、簡樸生活、聖化自然是兩者的共通點，雖然其他六個規範是台灣原住民生態智慧中較不明顯或闕如的，然而，僅就保護生態多樣性、獵物共享兩項特色，對於全球環境倫理已有莫大貢獻，由此亦可推知，他們具有豐富的生態智慧，是某種程度的環境保護者。接著，我們要進一步追問：台灣原住民環境倫理的背後是否有理論基礎或實踐的依據？

參、台灣原住民環境觀的理論基礎

學者傅君的研究指出：建立在傳統宗教信仰基礎上的原住民「生態智慧」與西方建立在科學、理性基礎上的「保育觀念」不相容。⁵⁵傅氏所舉的例子偏重農耕，並非保育概念的重點；他所認為宗教信仰是一種意識型態，與講理性、講科學的保育觀背道而馳。其實不必然如此，不是所有宗教都是意識型態，也不是所有講科學的環保觀就沒有意識型態；就以天主教環保學者貝瑞神父（Thomas Berry）為例，⁵⁶他顯然一面是個信仰堅定而深入的人，一面同時也很有創意地貢獻於環保和自然保育的領域。可見建基於宗教信仰的環保思想及生活型態，不一定水火不相容。看來

⁵³ J Baird Callicott, "American Indian Land Wisdom?: Sorting out the Issues," *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lbany, N. 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9), pp.207-210.

⁵⁴ 莊慶信：《中西環境哲學——一個整合的進路》，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頁543-550。

⁵⁵ 傅君：〈台灣原住民「生態智慧」與野生動物保育〉，《山海文化雙月刊》17期（1997.11）：47-48。

⁵⁶ 莊慶信：〈基督宗教哲學與中華文化「生命倫理」的對話——以貝瑞神父與朱熹的環境哲學為例〉，《輔仁宗教研究》5期（2002.06）：197-227。

傅君所論述的問題癥結或許在於有迷信色彩的宗教行為（如鳥占），這些材料是否涉及迷信成分，不在本文論述的範圍之內。

要深入理解原住民的環境倫理規範，就得繼續挖掘它背後的理論基礎。筆者僅就原住民傳統的宗教信仰與大自然的關連性及其契合度來討論。

一、傳統信仰與大自然的關連性

百步蛇在魯凱人心目中是地位崇高的守護神；其族裡流傳著一則女子芭嫩與大鬼湖的蛇郎君（百步蛇）愛情及迎娶的故事。在排灣族的傳說中，兩兄弟拾回一個裡頭有顆百步蛇蛋的陶壺，經太陽照射之後，誕生一嬰兒，後來成部落的頭目及祖先。⁵⁷這兩族的傳說故事中對於大自然（百步蛇、太陽）的信仰，正顯示原始宗教信仰是其尊重大自然的基礎。再者，魯凱族與排灣族均將大武山視為其祖先起源之地。⁵⁸達悟人將兩處山林視為神地，在神地「不可亂動當地的石頭，不可伐木或者砍竹子。」此外，達悟人更將宇宙分成數層，住地上的是人（*tao ro teiraem*），住上面的是神（*tao do to*，上面的人），住地下的則是鬼（*anito*），他們認為神主宰自然現象。⁵⁹根據簡鴻模的研究，賽德克亞族的德克塔亞族群祖傳的生活規範（*Gaya*）之所以能發揮作用在於「其對 *Utux* 的特殊信仰」，而 *Utux* 常指「祖靈」（祖先的靈魂）而言，它含有亡靈、惡靈、神的意思，甚至偶而也以「織造人的神」（*Utux Tumuninun*）來暗指這樣的 *Utux* 造了人。⁶⁰

由以上所舉各族的例子，可知台灣原住民相信原始信仰與大自然兩者之間有著必然的關連性。換言之，只要他保有信仰，不論是原始信仰，或基督信仰，他們就會將大自然的許多元素（動、植物或山水）當作是神聖之物，應當加以尊重，不可隨便對待。由此，便可覺察信仰與大自然的關連性，使得信仰成了原住民恪守環境倫理規範的動力。

⁵⁷ 王煒昶：《台灣原住民之美》，頁 98、144。

⁵⁸ 達西烏拉灣·畢馬：《台灣的原住民——魯凱族》，頁 16。

⁵⁹ 關華山：〈雅美族的生活實質環境與宗教理念〉，頁 153；

又參見 <http://www.pongso.org/js/js.htm>，此網頁資料引自中央研究院〈達悟族〉。

⁶⁰ 簡鴻模：〈台灣原住民傳統宗教與生態環保——以泰雅族賽德克雅群為例〉，頁 48-50；受訪者 E，訪談員 E，〈賽德克亞族德魯固群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花蓮：秀林部落，2003/02/13。

二、傳統信仰與大自然的契合度

台灣原住民的傳統信仰不但僅相對地、外在地與自然界有所關連而已，其信仰大都還與大自然密切地相契合。⁶¹以達悟人為例，他們相信「飛魚是天神賜予達悟人的珍貴食物。因此捕撈飛魚要經過一連串的祭祀與儀典。對於飛魚的處理和食用方式都有一套嚴謹的規範，不得逾越。充分顯示達悟人對飛魚的敬重。」⁶²古代大豹社的泰雅族人出門時就以西列克鳥的叫聲來判斷吉凶，這種鳥便成了泰雅人的好朋友，因此他們不會獵殺西列克鳥。⁶³再者，泰雅族人相信若不遵守生活規範（Gaya），「就會遭受祖靈的懲罰，就以越區到別人的生活領域為例，必定會遭逢山難或野獸攻擊的厄運。」因為原始信仰的緣故而相信及敬畏祖靈，此規範在昔日確實具有「非常強的約束力」。⁶⁴又如「雙鬼湖」是魯凱族「原始宗教的禁制林地，歷代族人不容侵犯，違者必遭天譴。因此，在以前，這裡的野獸即使再多，族人也不敢進入狩獵。」，如此提供了「野生動物不受人為干擾的環境」，其中小鬼湖如今已列入台灣重要濕地之一。更有學者將此「雙鬼湖」視為「結合原住民與保育自然生態體系最好的範例」。為了避免過度狩獵而造成野生動物絕跡的現象，魯凱族有許多有關狩獵的禁忌，如禁止獵殺小動物及雲豹等，⁶⁵與其宗教信仰的關係均達致密不可分的地步。布農人為了「維持野生族群的數量」，要獵人遵守三十條左右的禁忌，⁶⁶其他各族亦有數量不等的相關禁忌，不勝枚舉。貝瑞神父曾指出美國印地安人留給美國人的六大資產之一，便是靈修上的知覺和獨特的表達。也就是那些原住民有自己一套特別的「自然神祕主義」（nature mysticism）靈修做法。⁶⁷本文僅以上述這些實例推知，台灣原住民傳統的信仰與大自然契合無間，他們的靈修雖不敢說已達到印地安人的境界，但已有某程度的密契特徵了，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地說，原住民的宗教信仰成了守護山林的泉源。

⁶¹ 童春發：〈從基督教的角度談原住民傳統宗教的維護〉，麗依京、尤瑪主編：《台灣原住民民族權、人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主辦（1998.11.17-19），頁398。

⁶² 王煒昶：《台灣原住民之美》，頁168。

⁶³ 林道生編著：《原住民神話·故事全集》，第1冊，頁27。

⁶⁴ 王棟：《打開山海的門窗——台灣原住民報告》，頁112。

⁶⁵ 達西烏拉灣·畢馬：《台灣的原住民——魯凱族》，頁19-20，126-127；陳玉峰：《台灣生態史話》，台北市：前衛，1997，頁193。

⁶⁶ 達西烏拉灣·畢馬：《台灣的原住民——布農族》，頁146-150。

⁶⁷ Thomas Berry, CP.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American Indian," *The Dream of the Earth*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88), pp.184-185.

不管由關連性或契合度來看，原住民的宗教信仰實維繫著他們對自然生態的護愛之心，若由這向度切入，便可理解他們為何反核廢、反馬告，以及處心積慮想「恢復傳統領域」等事件了。台灣原住民對於地球如此盡心盡力，但是資本主義掛帥的今日，他們是否遭遇了某種環境正義的難題及有否補救措施，就需要根據學者專家的研究重新檢視了。

肆、台灣原住民「環境正義」問題的省思

在執政者的觀點下，台灣能否生存於國際間，目前最重要的因素似乎僅在於「拼經濟」，相形之下，其他的議題自然就淪為庸僕的次等地位了。所以原住民在這大環境下便遭遇了一些環境不正義的難題，需要更多的學者多方探索，以探尋這些困境的解決之道。

一、環境正義的難題

在此僅就採礦、核廢料、土地、打獵、國家公園、觀光等六項環境正義的難題稍作討論。

（一）採礦

泰雅族賽德克亞族人尤稀·達哀曾以秀林鄉為例，分析了在三十個山地鄉共有的現象，九家礦石公司在秀林鄉開採砂石和風景石，卻造成了幾項負面結果，1.「已對秀林鄉得天獨厚的自然生態，造成難以彌補之損失。」2.平地財團企業憑其雄厚資本開發山地資源，「造成山胞社會經濟結構和價值觀念急遽變遷和轉型」。3.亦導致損害了原住民的權益，原住民無法公平地同享經濟開發之成果。4.這些礦業公司在外地繳稅，不能增加該鄉之地方稅收。⁶⁸簡言之，政府或漢人社會無視於原住民的平等權益，導致原住民對政府的不信任，而無法配合各項環保措施，繼續護守大自然。

⁶⁸ 尤稀·達哀（孔文吉）：《讓我的同胞知道》，台中：晨星，1993，頁 80-83。

（二）核廢料

蘭嶼島自從一九七四年被行政院原委會選為核廢料貯存場，一九八二年在蘭嶼龍門地區的核廢第一儲存場完工，並開始接收、貯放核廢。一九八八年達悟人啟動了第一次反核廢運動。一九九四年台電核廢料儲存場的千百個儲存桶腐蝕，而有輻射外洩之虞。學者研究自從貯放核廢之後，癌症及畸形兒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因此造成了達悟人的恐慌，乃要求核廢退出蘭嶼島，並將土地的主權歸給達悟人。⁶⁹從環境哲學整合論的觀點看，核能、核廢料或核輻射對人類而言，僅有近利，卻將遺禍萬年、遺毒萬代子孫，這萬不可行。但政府囿於「拼經濟」以圖生存的迷思，並為了討好與大選有關的大財團或企業界，而不敢快刀斬亂麻，提前實現「非核家園」，以致為原住民帶來了極大的恐懼及困擾。

（三）土地

土地是台灣原住民認同的根，⁷⁰然而根據日本學者藤井志津枝的分析，台灣原住民在日本政府及國民政府前後兩次的「國有地」政策之下，喪失了傳統的土地權⁷¹。台灣光復之後，原住民土地的問題有三大主因：1.平地原住民因知識不足或被迫捐地，而快速喪失「私有地」；2.山地原住民生存空間被限定在「保留地」內；3.政府擴大原住民保留地的「所有權」，同時准許在當地上班的平地人承租保留地，甚至鼓勵國營及私人企業（如公司、農林畜牧工礦業者）申請開發保留地，以拼經濟，亦即，政府可隨時徵收原住民的保留地，原住民不解為何自己的土地，一夜之間竟然變成國家的。⁷²

既然台灣的原住民保留地約四分之一為天然林及林地，只有三分之一強的面積是「權屬不清」的原住民使用地，因此，所謂的原住民保留地，事實上是名實不符。

⁶⁹ 田雅各：〈永遠的劫難——核廢料的處置〉，許世楷等編著：《原住民族人權與自治》，台北：前衛，2001，頁 6-10；受訪者 F，訪談員 F，〈達悟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台東蘭嶼：朗島部落，2003/09/15。受訪者 F 認為她所送去就醫的五位癌症患者均受核廢的影響。

⁷⁰ 布興，大立（高萬金）：《原住民的台灣認同》，嘉義：信福，1999，頁 173-174。

⁷¹ 受訪者 A1，訪談員 A1，〈卑南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台東：南王部落，2003/02/12。

⁷² 藤井志津枝：〈探討台灣原住民的土地問題〉，許介麟主編：《原住民族權利國際研討論文集》，台北：國立台大法學院，1999，頁 34-43；受訪者 F，訪談員 F，〈達悟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台東蘭嶼：朗島部落，2003/09/15。

張茂桂認為大部分原住民儘管不滿現行的保留地制度，但均反對完全取消保留地制度。因保留地仍是「原住民的生存保障」。顯然各族之間看待保留地的態度有所差異，土地糾紛的嚴重性也因地而有所不同，土地糾紛越多之地區就越是強烈地反對開放。由於原住民與保留地的關係，似乎社會要求他們承擔「生態保護」「生態保育」的壓力，此乃假借環保之名而遂行其「典型之經濟種族主義」之實。⁷³其實，台灣原住民在懵懵懂懂的情況下賣了田地，但至今年輕力壯的移民成為都市原住民以外，大部分年紀大的，都得留在家種田，⁷⁴卻又苦於無土地可耕種。「原住民追求目標是要恢復原住民固有的土地，以及資源開採的享有。在原住民的世界裏，認同是根植於土地，若失去了對土地的控制權，原住民生存的意義就不知如何重新界定。」

再說，原住民從未放棄土地的主權，而是墾殖者的國家主權侵犯了原住民本有的主權。⁷⁵約言之，原住民目前在台灣所發生的問題，真正背後的癥結在於沒有土地，於是他們千方百計想「光復傳統領域」，要回土地，為其後代尋找一條生路。

（四）打獵

戴永祺曾指出「台灣野生生物固然承受相當大的狩獵壓力，然而棲息地遭受人為過度開發與破壞，才是造成野生生物資源大量銳減的重要因素。」⁷⁶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論，而不像一些學者將責任完全推給原住民。以布農人為例，布農男人為了追求「英雄」的名號和聲望，將布農人造就成「狩獵的民族」。狩獵是他們的重要經濟及生產方式之一，也是一種生命學習，他們上山打獵，除了在於取得獸肉的蛋白質以外，「還在於探求生命的意義和精神的價值」。野生動物繁殖期間，大部分的部落都視為「禁獵期」。達西烏拉灣·畢馬認為「無論原住民生態智慧背後的動因和機制是否符合自然資源保育的原理，如果產生保育的效果時，也同樣值得學習。」⁷⁷目前政府已逐漸有條件地容許原住民，為祭典而獵取某些野生動物。但對原住民而言，狩獵原是他們的生存之道及生活方式，若不再放寬一些，對他們的文化傳承及留居家鄉，將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

⁷³ 張茂桂：〈原住民保留地問題與「原漢」關係〉，麗依京、尤瑪主編：《台灣原住民民族權、人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30-262。

⁷⁴ 陳美惠編，劉斌雄等採訪紀錄：《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雅美、布農、卑南族及都市原住民採訪紀錄》，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5，頁 193-195。

⁷⁵ 施正峰：〈原住民自治與台灣前途〉，許世楷等編著：《原住民族人權與自治》，頁 86-87。

⁷⁶ 戴永祺：〈原住民生態智慧與自然保育〉，頁 39。

⁷⁷ 達西烏拉灣·畢馬：《台灣的原住民——布農族》，頁 124-127，150-151。

（五）國家公園

一九八〇年美國的「阿拉斯加國家利益土地保育法」特許原住民愛斯基摩人以維生為目的的「傳統漁獵活動」。這是為了保障在文化公園（cultural parks）內人民的「傳統生活權利」，也就是對於當地居民的「基本維生經濟規模必須加以尊重」。⁷⁸反觀過去十幾年來，台灣為了生態保育而陸續成立的太魯閣、玉山、雪霸等國家公園，主要都是位於原住民的傳統居地與生活區，而由於政府在設立這些國家公園及制定法規時並未徵得當地原住民同意，也未顧及原住民的生計、文化等需求，導致原住民一波波地反國家公園運動。⁷⁹清楚地說，「國民政府延續了日本的保留地政策，以國家公園之名強取豪奪了原住民固有的土地。」他們喪失了土地之後，不得不湧向都市求生存，淪為「城市獵人」。⁸⁰

國家公園在設置及開發之前，部分原住民已世代居住其中，重劃後，不但喪失了土地，也喪失了工作的機會。目前雖然有一些原住民留在家鄉，任職於國家公園，可是他們僅從事「巡山員、清潔工、解說教育人員」而已。⁸¹歐美的國家公園由於沒有人類居住活動而採禁止主義，但台灣情況則有所差異，卻未加調整就禁止漁獵及採折花木，建物的建拆必須先取得許可。就當地原住民而言，國家公園不但未帶來好處，反而帶來「生活的枷鎖」，如，不能撿拾少量維生的玫瑰石，亦不准獵取少許野生動物；卻允許漢人財團大肆開採，破壞自然生態。⁸²

〈國家公園法〉旨在於保護生態環境、野生物、古蹟、並供國人休閒育樂及研究，而未明文顧及原住民文化生活的維護與發展。美國環境哲學家科倍德就誠懇指出國家公園是第一世界（美國）的產物，受到錯誤的「荒野」概念影響，誤認為人類只是荒野的訪客，而無視於長久生活其中的原住民的存在。在亞非兩洲（如台灣）為了設置此種美式國家公園，強行驅離了原住民，導致原住民無法調適，甚至「逐漸失去人性」，⁸³也就是說，它不能一成不變地引進第三或第四世界。就達悟人而言，「為了孫留下美好的樂土」固然很重要，「但對於蘭嶼雅美族而言，種植芋頭捕食飛

⁷⁸ 張茂桂：〈蘭嶼國家公園的矛盾〉，《國家政策》3期（1989.09）：101。

⁷⁹ 紀駿傑：〈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文化〉，頁50。

⁸⁰ 布興·大立：《原住民的台灣認同》，頁165-166；又參閱受訪者E，訪談員E，〈賽德克亞族德魯固群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花蓮：秀林部落，2003/02/13。

⁸¹ 王棟：《打開山海的門窗——台灣原住民報告》，頁112。

⁸² 紀駿傑、王俊秀：〈環境正義：原住民與國家公園衝突的分析〉，頁92-97。

⁸³ 科倍德（J. Baird Callicott）著，陳慈美譯，〈第三、第四世界對西方保育哲學的批判〉，《當代》165期，（2001.05）：60-61。

魚，剝木造船等無拘無束的生活恐怕比設立國家公園來得重要。」⁸⁴學者從社會學角度研究指出，觀光客可以學習達悟人的順應自然生活方式，達悟人也可「適度走出來迎接環境挑戰與互動」，使國家公園法或今日山地法規更適合達悟人的未來發展。⁸⁵但這些學者早已知道某些國家公園內的原住民的文化權、生存權之重估及改善，應是政府的當務之急。

（六）觀光

台灣原住民地區的觀光如部落體驗、自然生態教育、文物展示等，常以四種型態出現，亦即集中展演（九族文化村、台灣文化園區）、生活區（蘭嶼）、都市情境（花蓮模式）、社區動員（烏來、日月潭德化社）。原住民地區由於美景、生態多樣性、文化特色等三者的結合，而成為吸引遊客的基本因素。雖然發展觀光一方面可以使原住民的收入及就業機會增加，又可促進文化保存及強化族群意識；另一方面，卻導致生態環境大受衝擊，即道路髒亂、垃圾量增加或亂扔、假日塞車等。這些問題源於沒有一套專為原住民的教育及任用制度，也缺乏像美、加、印尼的觀光配套規畫。⁸⁶學者曾以蘭嶼及烏來為例，指出開放觀光的三大弊端，亦即，民風隨之墮落、土地因而流失，文化商品化。⁸⁷尤其是蘭嶼島的觀光客，隨身攜帶相機，不顧達悟人的尊嚴，要他們擺姿勢讓相機捕捉美景美物，卻留下滿地的垃圾，污染了整個蘭嶼島，⁸⁸觀光設施耗損了當地寶貴的自然資源（如飲水、海灣污染及噪音）。⁸⁹除了上述這些負面看法，常是「抗爭型原住民知識菁英」所持的觀點外，觀光也會為當地原住民帶來一種「專為觀光而設計的文化形式」，而以此來認定自己的族群身份，正面地促進該族「族群性再塑現象」，及再造族群意識。⁹⁰

國內觀光部門為了推動觀光業，以「生態」包裝「觀光」，試圖開發更多的賣點，以吸引更多觀光客的消費，卻忽略了「當地居民（部落）的自主性」、地區的持續發

⁸⁴ 尤稀·達哀：《讓我的同胞知道》，頁 203。

⁸⁵ 謝政諭：〈兩岸少數民族問題〉，洪泉湖等著：《兩岸少數民族問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頁 233。

⁸⁶ 王棟：《打開山海的門窗——台灣原住民報告》，頁 71-74。

⁸⁷ 史邁克撰，廖碧英譯：〈觀光事業與台灣原住民〉，林美瑤編：《原住民與觀光》，台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花東社區發展中心，1991，頁 23-36。

⁸⁸ 明立國：《台灣原住民的祭禮》，頁 193-195。

⁸⁹ 張茂柱等：〈蘭嶼國家公園的矛盾〉，頁 102。

⁹⁰ 謝世忠：〈觀光過程與「傳統」論述——原住民的文化意識〉，行政原文建會主編：《原住民文化會議論文》，台北：行政原文建會，1994，頁 14-15。

展、資源的持續。至今成功的案例僅有達娜伊谷，而藉用生態旅遊招攬生意的墾丁國家公園南仁山生態保護區，就承受要求開放自然地區的壓力。⁹¹再看蘭嶼島的實例，它自從成了國家公園之後，達悟人無法依照傳統的生活方式過日子；依一九九二年鑑統計，每年約有四百五十人次至該島觀光，造成生態的巨大衝擊，同時也摧殘了達悟族人的文化。⁹²從以上種種可知，觀光措施應與原住民學者專家妥善而公開地規畫，否則造成的困擾及傷害，難以估計。

二、補救措施

為解決以上六個「環境正義」的難題，筆者認為最好整體規劃，且有配套措施，但須由「自治」、「補償正義」、「分配正義」三大重點著手，方是釜底抽薪之計。

（一）自治

自從九年代以來，台灣便陷入中國國家主義及台灣國家主義的爭論，以及台灣尋求獨立與中共武力威脅的局面，此時原住民亦爭取由「山胞」改稱「原住民」、要求確立其原住民文化、語言（母語）、泛原住民意識（pan-aboriginalism），進而要求自決（self-determination）自治。⁹³

原住民地區的觀光事業應多讓原住民知識份子及民意代表等參與決策。⁹⁴倪貴榮對國家公園與原住民議題研究之後，根據國際人權法，建議政府建立蘭嶼文化特區，使得原住民享有自決權（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土地和自然資源權（The right to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決策之參與和決定權（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and determine in process of policy-making）等三種權利。⁹⁵也許可同步採行鴻義章的建議，將原住民傳統領域，區分為中央山脈、玉山山脈、阿里山、花東、大武山、蘭

⁹¹ 黃躍雯等著：〈台灣原住民部落發展生態旅遊的概念架構與實踐方針〉，《國家公園學報》11,2, (2001.11): 201-202。

⁹² Ni, Kuei-Jung (倪貴榮), "The National Park Vs. Indigenous Peoples: The Yami's Practice in the ROC on Taiwan" (國家公園與原住民——中華民國臺灣雅美族人的實踐研究), 《東吳法律學報》9卷2期, (1996.08): 66-72。

⁹³ Kung, Wen-chin (孔文吉),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Press: A Study of Taiwan*, (Taipei: Wen-chin Kung, 2000), pp. 82-84.

⁹⁴ 王棟：《打開山海的門窗——台灣原住民報告》，頁84。

⁹⁵ Ni, Kuei-Jung, "The National Park Vs. Indigenous Peoples: The Yami's Practice in the ROC on Taiwan" 頁56-61。

嶼島等六個自治區及日月潭自治州。⁹⁶並參照瓦歷斯·貝林的建言，從土地權利、自決權利、自治制度、行政區劃、自治法人、自治法令、自治財政等七個面向⁹⁷去做整體規畫及配套措施。換句話說，除非將原住民納入規畫及管理的高層人事之內，否則無法徹底解決時下層出不窮的「環境正義」問題。

（二）補償正義

在國家公園問題上，台灣原住民並非只適於擔任巡山員等基層職務而已，可以一面參考原住民的生活規範以制訂相關的法規，一面以專設的原住民教育機構，以培訓原住民之管理人才，投入其熟悉的山區、森林的管理大自然之重要工作，或者國家公園內的原住民地區若有任何投資經營事業時，「得優先輔導原住民團體投資經營」。⁹⁸可參考美、加、澳三國長期探索出來的政府與當地原住民「共同經營」的模式，甚至可以明訂原住民的保障名額，以透過文化傳承的維護而達致護守大自然的目的。⁹⁹此外，可採紀駿傑、王俊秀的建言，在幾個有原住民的國家公園（如玉山、太魯閣、雪霸）宜設置「緩衝區」，以確保原住民的生存權及文化權。目前原住民的生活水準大都在社會下層結構，為使他們早日跨入正確的門檻，而有尊嚴地與漢人平起平坐，最有效的措施便是設法補償他們過去因政府的處置失當而遭致的損失，那麼，社會才有真正的正義及公平。

（三）分配正義

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的理念指將個人的財物視為社會大眾的資源，要求社會成員依照其職位、地位、能力去分配義務及權利。過去分配正義的執行只歸於國家或公務員的職責。如今由於時代的變遷，這個使命已經逐漸轉移到每個公民身上，每個人都有責任投入整個社會的運作，以達到公平分配的目標。若僅鼓吹某

⁹⁶ 鴻義章：〈台灣原住民自治區之概分〉，許世楷等編著：《原住民族人權與自治》，台北：前衛，2001，頁 103-104。

⁹⁷ 瓦歷斯·貝林：〈原住民自治區〉，許世楷等編著：《原住民族人權與自治》，台北：前衛，2001，頁 105-107。

⁹⁸ 王棟：《打開山海的門窗——台灣原住民報告》，頁 112-115。

⁹⁹ 紀俊傑：〈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文化〉，頁 51。

族群的利益而損及他族的利益，便違反了分配正義的原則。¹⁰⁰爲了真正的解決原住民的分配正義問題，對於過去政府所沒入的原住民土地，必要時，找出原始資料，按戶重新公平地分配等值的土地，以伸張社會的正義，進而達致環境正義。

若能做到以上三點，接著乃依上述五個不正義的要項逐步改善，如此，台灣的原住民不但不會成爲環境問題人物，也不會繼續成爲社會問題。

伍、結 語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台灣原住民正遭遇著慘痛的生存掙扎，搖擺於六項不正義的處境中，而根治之道卻僅須三劑藥引子——自治、補償正義、分配正義，如果有責任的政府人員、教育人員、民意代表再不用心處理，來日的台灣或許就不再是「寶島」了。其實，台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對今日台灣，甚而全球而言，是無價之寶，也就是說，那些植基於傳統宗教信仰的合乎自然、保護生態多樣性、維生需要的簡樸生活、獵物共享、聖化自然等五種環境倫理規範，多少在生態智慧上是不可磨滅的。

本研究的結果與建議可做爲（1）環保決策單位擬訂具體可行的環保措施之重要參考。（2）政府制訂與原住民生活及工作相關的環境政策的參考。（3）可在大專院校的通識教育的環境課程上作爲教材及參考資料。至於將來的研究可再擴大現有的各方面學者的研究成果，並鎖定較小的課題，好比〈原住民的宗教觀與生態智慧〉或〈原住民的狩獵觀與環境倫理〉等議題，始能有較深入的洞識。

參考文獻

- Berry, Thomas, C. P. *The Dream of the Earth*. San Francisco : Sierra Club Books, 1988.
Callicott, J. Baird. *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lbany, N. 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9.
Hsu, Ying-chou, *Yami Fishing Practices: Migratory Fish*,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¹⁰⁰古尚潔：〈正義〉（Justice），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編：《神學辭典》，台北：光啓，1996，頁149-150。

- Center, 1982.
- Kung, Wen-chin (孔文吉),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Press: A Study of Taiwan*, Taipei: Wen-chin Kung, 2000.
- Low, Nicholas (ed.), *Global Ethics & Enviro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Ni, Kuei-Jung (倪貴榮), "The National Park Vs. Indigenous Peoples: The Yami's Practice in the ROC on Taiwan" (國家公園與原住民——中華民國臺灣雅美族人的實踐研究), 《東吳法律學報》9卷2期 (1996.08): 45-76。
- 尤稀·達袞(孔文吉):《讓我的同胞知道》, 台中: 晨星, 1993。
- 王相華等:〈蘭嶼雅美族之植物使用方式〉,《國家公園學報》10, 2 (2000.12): 228-248。
- 王棟:《打開山海的門窗——台灣原住民報告》, 出版地不詳, 2002。
- 王煒昶:《台灣原住民之美》, 台北: 行政院文建會, 2002。
- 布興·大立(高萬金):《原住民的台灣認同》, 嘉義: 信福, 1999。
- 李亦園:《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 台北: 聯經出版社, 1982。
- 李亦園等著:《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中研院民族所專刊之二, 台北: 中研院民族所, 1962。
- 受訪者 A1, 訪談員 A1, 〈卑南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 台東: 南王部落, 2003/02/12。
- 受訪者 A2, 訪談員 A2, 〈東河阿美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 台東東河: 北源村美蘭部落, 2003/02/08。
- 受訪者 B, 訪談員 B, 〈玉里阿美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 台北: 土城, 2003/03/05。
- 受訪者 C, 訪談員 C, 〈玉里阿美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 花蓮玉里: 東豐部落, 2003/02/04。
- 受訪者 D, 訪談員 D, 〈賽德克亞族德魯固群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 花蓮: 銅門部落, 2003/01/27。
- 受訪者 E, 訪談員 E, 〈賽德克亞族德魯固群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 花蓮: 秀林部落, 2003/02/13。
- 受訪者 F, 訪談員 F, 〈達悟族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訪談紀錄〉, 台東蘭嶼: 朗島部落, 2003/09/15。林美瑤編:《原住民與觀光》, 台東: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花東社區發展中心, 1991。
- 林道生編著:《原住民神話·故事全集》第1冊, 台北: 漢藝色研, 2001。

刪除:

- 林道生編著：《原住民神話・故事全集》第2冊，台北：漢藝色研，2002。
- 洪泉湖等著：《兩岸少數民族問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
- 科倍德 (Callicott, J. Baird) 著，陳慈美譯，〈第三、第四世界對西方保育哲學的批判〉
《當代》165期，(2001.05)：56-61。
- 紀俊傑：〈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文化〉，生態關懷者協會等主辦，〈「生物多樣性面面觀」研討會〉(2000.08.21.)：46-53。
- 紀駿傑、王俊秀：〈環境正義：原住民與國家公園衝突的分析〉，《山海文化雙月刊》19期(1998.07)：86-104。
- 夏本奇伯愛雅：《雅美族的社會與風俗》，台北：臺原出版社，1994。
- 張茂桂：〈蘭嶼國家公園的矛盾〉，《國家政策》3期(1989.09)：97-103。
- 莊慶信：〈基督宗教哲學與中華文化「生命倫理」的對話——以貝瑞神父與朱熹的環境哲學為例〉，《輔仁宗教研究》5期(2002.06)：197-227。
- 莊慶信：《中西環境哲學——一個整合的進路》，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 許介麟主編：《原住民族權利國際研討論文集》，台北：國立台大法學院，1999。
- 許世楷等編著：《原住民族人權與自治》，台北：前衛，2001。
- 陳玉峰：《台灣生態史話》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7。
- 陳美惠編，劉斌雄等採訪紀錄：《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雅美、布農、卑南族及都市原住民採訪紀錄》，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5。
- 傅君：〈台灣原住民「生態智慧」與野生動物保育〉，《山海文化雙月刊》17期(1997.11)：42-51。
- 湯淺浩史 (Yuasa Hiroshi) 著，瀨川孝吉 (Segawa Kohkichi 1930) 攝：《台灣原住民影像誌：鄒族篇》，台北：南天書局，2000。
- 黃長興 (Rowse-Lakaw)，〈太魯閣族的狩獵文化(下)〉，《山海文化》20期(1999.10)：110-124。
- 黃躍雯等著：〈台灣原住民部落發展生態旅遊的概念架構與實踐方針〉，《國家公園學報》11,2, (2001.11)：192-212。
- 達西烏拉灣・畢馬 (田哲益)，《台灣的原住民——布農族》，台北：臺原，2003。
- 達西烏拉灣・畢馬 (田哲益)，《台灣的原住民——阿美族》，台北：臺原，2001。
- 達西烏拉灣・畢馬 (田哲益)，《台灣的原住民——魯凱族》，台北：臺原，2002。
- 鈴木質著，吳瑞琴編校：《台灣原住民風俗誌》，台北市：臺原出版社，1992。
- 廖守臣：《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台北市：世新專校，1984。
-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研院民族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 阿美族、卑南族》第二卷，台北：中研院民族所，2000。
-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研院民族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泰雅族》第一卷，台北：中研院民族所，1996。
-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研院民族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鄒族》第四卷，台北：中研院民族所，2001。
-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研院民族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賽夏族》第三卷，台北：中研院民族所，1998。
- 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編：《神學辭典》，台北：光啓，1996。
- 劉其偉編著：《蘭嶼部落文化藝術》，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82。
- 劉還月等：《我是不是平埔人 DIY》，台北：原民文化公司，2001。
- 潘英：《臺灣平埔族史》，台北：南天書局，1996。
- 衛惠林、劉斌雄：《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62。
- 鄭漢文：〈雅美族的民俗植物〉，《東臺灣研究》1期（1996.12）：67-104。
- 戴永祺：〈原住民生態智慧與自然保育〉，《原住民教育季刊》16期（1999.11）：37-42。
- 謝世忠：〈觀光過程與「傳統」論述——原住民的文化意識〉，行政原文建會主編：《原住民文化會議論文》，台北：行政原文建會，1994。
- 簡鴻模：〈台灣原住民傳統宗教與生態環保——以泰雅族賽德克亞群為例〉，《輔仁宗教研究》2期（2000.冬）：43-65。
- 關華山：〈雅美族的生活實質環境與宗教理念〉，《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7期（1989.10）：143-175。
- 麗依京、尤瑪主編：《台灣原住民民族權、人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主辦，1998.11.17-19。



初稿收件：2003 年 11 月 03 日 二稿收件：2003 年 11 月 14 日
審查通過：2004 年 07 月 10 日 責任編輯：吳明峰

作者簡介：

莊慶信：

輔仁大學哲學博士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通訊處：242 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 510 號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E-mail：reli1002@mails.fju.edu.tw

The Eco-Wisdom and Eco-Justice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 A Reflection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John B. Chuang

Abstract :

The study mainly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also uses the methods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deep interview. It i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have any unique environmental wisdom and any difficult on the problems of Eco-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s a philosopher, to explore whether there is any basis for the environmental wisdom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is our main job in the study. And hoping that this study may integrate the disciplinary insights from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order to offer some precious environmental wisdom to Han tribe in Taiwan in one hand, and enhanc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minority to reach certain degree of eco-justice in another hand.

Finally, the research finds five norms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from thou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analyses six problems regarding eco-justice, and offers three approaches to solve their problems in the future.

Key Terms : Environmental Wisdom • Eco-Justice •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 Environmental Ethics • Indigenous Peoples



原住民族狩獵的文化生態意義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の生態的意義

The Ethno-ecological Meaning of Aboriginal Hunting

官大偉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文化和生態的關係，是許多學科共同關心的議題，早期的環境決定論認為人類的社會文化的表現乃受生態環境決定，地理學的可能論、人類學的文化生態研究，則提出不同生態環境有不同的演化路線之多元演化觀點，漸漸地有生態人類學者提出人類社會的文化創造，會主動地塑造、調節環境（而非單向地被影響）的證據，亦有學者指出不同文化之生計活動都蘊含了其對所處環境之知識，而主張應該採取民族生態取徑（ethno-ecological approach），貼近一個文化的脈絡，理解其對世界的認識方式，更有研究駁斥社會演化論，指出各種的生計活動都是人類社會在其所處之生存關係網絡中採取的策略，有時候甚至會採取多種生計活動的組合以降低風險，因此沒有哪一種較為高尚或低下的位階差別。

台灣原住民各族，大多有狩獵的活動，這些狩獵活動往往不僅僅是為了蛋白質的攝取，



而是和環境管理、社會組織、信仰結合在一起，它們是人群社會和生態環境長期互動的結果，若少了貼近的理解，則常常會對其做出片面武斷的評價，而看不到多重的文化生態意涵。



狩獵文化的多重意涵

舉例來說，就環境管理而言，狩獵需要豐富的動物習性與植物、地形知識，什麼動物喜歡食用什麼植物、經常在哪裡找到水源、什麼溪澗可以存放獵物，都是一個獵人基本應該要知道的事情，一個獵人就是一個博物學家，而一個獵人巡獵之後，也會為部落帶回獵場及周邊環境最新的狀況。

在社會組織的面向，雖然原住民各族狩獵文化中，不是以現代生態學中計算和控制物種數量的方式來維持生態的平衡，但透過棲地的維護，仍可達到使獵物維持永續的效果，而棲地的維護就和社會組織有很大的關係，例如：在泰雅族有個人的獵寮、家族使用的獵徑、部落或部落群的獵場等，受到一層一層的gaga規範；而布農族的獵場常以氏族為單位擁有和使用；排灣族的獵場則和貴族系統有關。這些方式都形成和社會組織結合的棲地管理。

狩獵也和信仰有很大的關連，就筆者的認識，一個好的獵人通常在部落中謹言慎行、維持好的品德，因為進到山林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能夠有好的收穫則會認為是受到祝福，而能否受到祝福又取決於平常是否有好的言行和品性，因此狩獵不僅是知識、技術和社會組織規範的結合，也涉及信仰的實踐。

台灣原住民各族，大多有狩獵的活動，這些狩獵活動往往不僅僅是為了蛋白質的攝取，而是和環境管理、社會組織、信仰結合在一起，它們是人群社會和生態環境長期互動的結果，苦少了貼近的理解，則常常會對其做出片面武斷的評價，而看不到多重的文化生態意涵。



從內部脈絡去理解狩獵

就像所有的文化表現一樣，狩獵會因為時空脈絡下的需要而被維持，可能隨著時空脈絡的變遷而有所調整，也可能在新的脈絡下被重新賦予意義，最重要的是，若忽略原住民族社會內部的觀點、從外在的價值觀給予評價，不論是強制其維持不變或強制其必須改變，都容易受限於自身的文化偏見，犯下自我中心主義的錯誤。在原住民族社會已經置身於和國家政治、市場經濟，乃至各種社會團體利害交織的網絡之中的當前，獵人學校的出現，正好可以扮演讓我們重新整理狩獵相關知識、體現狩獵的文化生態意義、進行內部觀點的論述和實踐，乃是檢視現況、展望未來的平台。在這個

意義上，本期的《原教界》以狩獵與獵人學校為題，正是為當代原住民族社會在狩獵文化之維持和調適間的努力，提供了發聲的園地，也是為更廣大的社會對話，提供了重要的機會。

角度觀察，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第11項分別規定「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乃是生態保育與原住民文化兩種基本國策衝突；若以肯認環境權及文化權均屬基本權利性質，屬第三代人權，並為集體權立場，則是環境權與文化權兩種權利衝突。面對兩種價值（或權利）衝突時，應如何權衡取捨，有零和賽局及兼籌並顧、相互調和兩種立場，採取零和賽局立場，一方價值凌駕他方，有位階順序，而偏袒一方，全有全無，則必須說明並說服何以其一價值位階高於另一價值。若採兼籌並顧、相互調和立場，不偏袒任何一方，致作出全有或全無之認定，而是盡可能兼顧、傷害最小的前提下，作出適當之調和，避免對任何一方造成過度侵害，則必須檢視現行法規是否已有符合比例原則之調和機制，能夠兼顧兩種價值。又司法實踐是否能做到價值的衡平，本文根據CBD之精神⁵及大法官之見解⁶，顧及兩種價值不可逆性⁷，採取兼

籌並顧、相互調和之立場。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雖已規定：「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而實質將原住民文化抗辯納入除罪化要件，似已有調和機制，然原住民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判決，仍爭議不斷⁸。因此究竟現行法對於兩種價值取向之衝突，是否確為達到兼籌並顧、相互調和適當規範，或係司法實務對於前開衝突，在適用法規上，無法達到兼顧調和之目的，即有探究之必要。

就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與原住民傳統文化衝突議題，研究者多以個

度侵害，否則將構成錯誤、違憲的利益衡量」；學說上亦認為原則上衡量上並無一定位階次序，學理上則有「實踐和諧原則」，參吳信華，憲法釋論，2017年修訂2版，頁223。

7 站在生物多樣性角度，物種絕種後，即無從挽回，站在文化多樣性角度，傳統文化喪失後，亦難以回復，均不可逆。

8 其中最具爭議的案件，當屬王光祿案，布農族原住民王光祿以土造獵槍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及臺灣野山羊（長鬃山羊）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6月，經提起上訴，復經最高法院以104年度台上字第3280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嗣經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則經最高法院於2017年9月28日以106年度台非字第1號裁定停止審判，並就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及野保法第18條第1項至第3項、第21條之1第1項、第2項，有無抵觸憲法乙節，提出釋憲聲請，為最高法院法官有史以來，首次提出釋憲聲請。參最高法院2017年9月28日新聞稿：http://tps.judicial.gov.tw/ms_news/index.php?mode=detail&SEQNO=288249（最後瀏覽日：2018年5月30日）。

⁵ CBD除保育自然生態資源外，亦強調國家應立法尊重、保存、維持原住民傳統生活方式而與生物多樣性維護與永續利用有關之傳統知識（CBD第8條j款）。

⁶ 縱使是基本權衝突，司法院釋字第656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部分協同意見書，認為「權衡相衝突之基本權，總不得任憑衡量者自身之恣意與好惡，最基本的要求是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基本權，致作出全有或全無之認定，而是必須在對雙方基本權盡可能兼顧，盡可能都傷害最小的前提下，作出適當之調和，以避免對任何一方基本權造成過

案評釋指標性案件，或闡明原住民自決權、文化權、狩獵權等抽象權利，或就法律應如何解釋適用加以評論⁹，欠缺實證研究基礎¹⁰，為瞭解案件特性及實務取向，釐清問題根源，再以存在面之事實為基礎，尋求當為的法律規範。本文先以原住民及國家管制雙重視角，配合國際潮流，以時間為軸，檢視關於獵捕野生動物行為法律規範之演進及原住民文化抗辯之發展趨勢，觀察消長情形。並以實證研究（empirical study/research/analysis）方法，全面性針對自2004年2月4日野保法新增第21條之1起至2018年3月31日止¹¹，各級法院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之確定判決（包括原住民與非原住民）進行統計分析，就原住民族文化抗辯之實務見解，則以時間軸角度，觀察其取向及變化，並分析最新發展趨勢，檢討現行法律規定，評釋法院法律適用疑義，並提出建議。

貳、獵捕野生動物法律規範演進及原住民文化抗辯成文化之發展

一、獵捕野生動物法律規範演進

法律規範，係指「於社會規範中，某些可透過該社會所共同承認的權威機關的強制力，加以貫徹執行的規範」¹²。自古即在臺灣生活的原住民，在受到外來統治前，各部落有其自己的文化、社會組織及習慣規範，及依其習慣所形塑的法律體系¹³。原住民族法共通的思想淵源，來自固有文化中強烈的崇祖觀念，認為只要是祖先流傳下來的東西，即具存在的合理性及正當性，相信靈魂不滅，祖靈或神靈依然與族人共同生活在一起，若違反固有習俗、禁忌，祖靈必然降災禍，故須探求祖靈意志，祈求冥護¹⁴。這些出現祖靈或神靈以訓誡族人遵守的規範，若由社會所公認的權威以強制力貫徹，即相當於法律規範，並以口語相傳的方式傳承法規內容¹⁵。

以原住民族法視角出發，原住民族自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開始，歷經鄭成功家族、清朝、日本及1945年來

⁹ 吳志強，尋求原住民族基本法與野生動物保育法間規範衝突的緩衝地帶——以「違法性意識之可能性」的視角淺析，東吳法律學報，27卷2期，2015年4月，頁183-186。

¹⁰ 有論者業已指出透過實證研究所得經驗脈絡，可供刑事審判實務有主流價值面外之思考及判斷。參吳志強，刑事案件採納實證研究之必要性——以原住民傳統習慣為中心，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21期，2017年6月，頁98-99。

¹¹ 以宣判日為準。

¹² 王泰升，在法學與國家法中看見原住民族法律，政大法學評論，134期，2013年1月，頁4。

¹³ 蔡志偉，從客體到主體：台灣原住民族法治與權利的發展，臺大法學論叢，40卷特刊，2011年10月，頁1507、1520。

¹⁴ 王泰升，臺灣法律史概論，3版，2012年，頁20-21。

¹⁵ 王泰升，同註12，頁4。

研究論文

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判決之實證研究^{*}

——以原住民文化抗辯為中心

張宏節^{**}／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法官

目次

- 壹、前言
- 貳、獵捕野生動物法律規範演進及原住民文化抗辯成文法化之發展
- 參、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判決實證研究結果及分析
- 肆、實務取向評析
- 伍、結論及建議
- 參考文獻

摘要

狩獵或漁獵為原住民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國家為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多樣性，與自然生態平衡，在野生動物保育法中限制獵捕野生動物，並訂立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國家規範與原住民狩獵文化產生衝突。同法第 21 條之 1 雖實質將原住民文化抗辯納入除罪化要件，然相關判決，仍爭議不斷。為瞭解案件特性及實務取向，釐清問題根源，本文先檢視法規範之演進，並以實證研究方法，全面性針對自 2004 年 2 月 4 日野生動物保育法新增第 21 條之 1 起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各級法院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判決進行統計分析，就原住民族文化抗辯之實務見解，以時間軸角度，觀察其取向及變化，並分析最新發展趨勢，檢討現行法律規定，評釋法院法律適用疑義。

關鍵詞：原住民（族）、實證研究、野生動物保育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文化抗辯。

* 投稿日：2018 年 5 月 31 日；接受刊登日：2018 年 7 月 24 日。

本文部分內容曾發表於 2018 年 1 月 27 日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財團法人小米穗原住民族文化基金會主辦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與憲法保障座談會」及 2018 年 7 月 14 日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主辦之「第四屆台灣法律扶助論壇——法律扶助與法律再造」。本文由衷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細心審閱，並提供寶貴意見，使本文能就疏漏及說理部分修正補充，以臻完善。

**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法官。

壹、前言

臺灣得天獨厚，同時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¹及文化多樣性²，而兩者均具有普世價值³，需要全人類用心保護。又

以原住民的視角觀察，原住民自治時期乃是過著狩獵與游耕自給自足的生活，受禁忌與規範之約束，各族群、部落有其法律規範。外來政權統治之後，由於法令的管制及傳統領域逐漸喪失，獵捕野生動物（包括狩獵及漁獵）受到限制，然獵捕野生動物仍被認為是原住民傳統文化的一部分⁴。而我國在環境權受到重視及國際壓力下，為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多樣性與自然生態平衡，在野生動物保育法（下稱野保法）中限制獵捕野生動物行為，並在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非法獵捕野生動物罪，則除非保育類野生動物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否則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行為可能受刑事制裁，於是國家規範即與原住民狩獵文化產生衝突；以背後價值取向角度觀察，則是生物多樣性取向（國家為保護保育類野生動物而限制原住民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及文化多樣性價值取向（為尊重、保護原住民族多元文化中之狩獵文化，而開放原住民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兩種重要價值的衝突。另以憲法

¹ 臺灣面積僅占世界面積0.0277%，但物種有57,439種，占世界之3.8%，其中哺乳類有121種，占世界之2.5%，鳥類有707種，占世界之6.9%，魚類有3,131種，占世界之9.6%。臺灣特有種比率，哺乳類約64%，鳥類13%，爬蟲類18%，兩棲類25%。參許晚華，永續臺灣——臺灣的生物多樣性，科學發展，501期，2014年9月，頁44-45。

² 數萬年前人類逐漸抵達臺灣定居，成為臺灣原住民族，現法定原住民共有16族。16世紀以來，開啟漢人移民來台。17世紀航海時代，荷蘭及西班牙短期占領部分地區。18世紀漳泉客移民落地生根，歷經鄭氏、清國統治，漢民族與平埔族共同生活。19世紀受日本統治，1949年後國民政府退守臺灣，又帶來新移民。20世紀末，臺灣經濟繁榮，又帶進東南亞外籍勞工及配偶，形成豐富文化多樣性。

³ 就生物多樣性而言，1973年3月3日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前言認野生動植物華麗多姿，乃自然系統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必須予以保護，野生動植物具永恒增長價值，人類及國家為野生動植物最佳保護者。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CBD）序言載明締約國意識到生物多樣性的價值，確認生物多樣性保護是全人類共同關切事項，各國有責任保護其生物多樣性以可持久的方式使用其生物資源，關切一些人類活動正導致生物多樣性的嚴重減少。就文化多樣性而言，2001年11月2日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認為文化多樣性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是人類共同遺產，應當從當代及後代利益考慮予以承認肯定。2005年10月20日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文化多樣性公約）前言確認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一項基本特性，是人

類的共同遺產，應當為了全人類的利益加以珍愛與維護；承認傳統知識的重要性，特別是原住民知識體系，其對可持續發展的積極貢獻，及其得到充分保護和促進的需要。關於文化多樣性公約內容，參徐揮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障及促進文化表現多樣性公約」對文化權及傳播權之影響：以2007年歐體視聽媒體服務指令為中心，新聞學研究，98期，2009年1月，頁98-103。

⁴ 鄭川如，論兩公約中原住民狩獵權漁獵權的內涵，台灣原住民族研究，7卷3期，2014年秋季號，頁84。

台統治的中華民國、1949年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等外來政權統治，而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後，原住民族成為政治及法律上主體，法制仍具有外來性¹⁶。又原住民族中，尚可分為「平埔族」¹⁷及「高山族」¹⁸，前者指居住在平原地帶，且遭荷蘭、鄭氏家族、清朝統治的族群，後者則指稱沒有前述歷史經驗，居住於高山或平原且較晚近才遭日本、中華民國統治之族群¹⁹，由於平埔族固有法律體系已遭外來政權破壞，法律傳統因漢化而消逝²⁰，為避免討論複雜化，以下所指原住民族，除特別論述外，不包含平埔族。

獵捕野生動物，為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本有原住民法規範。以下以原住民法及國家管制雙重視角，輔以國際潮流，以時間為軸，說明獵捕野生動物法律規範之演進，及原住民文化抗辯成文法化之發展趨勢，並觀察兩種法制間之交替變化及未來趨勢。

（一）原住民自治時期（史前至1895年）

由於原住民族以口述方式歷代傳遞其法律規範，目前僅能透過歐洲人、漢人及日本人所留下的文字，來認識其規範內涵。日本於1921、1922年出版之「臨時臺灣舊慣習調查會第一部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8冊）及1921年「臺灣蕃族慣習研究」（8冊）²¹因調查時間接近原住民自治時期，具較高參考價值。又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編製「臺灣原住民族民事傳統習慣調查彙編（試行本）」（下稱彙編）²²亦有關於狩獵、漁獵慣習之記載，可窺得部分原住民自治時期關於獵捕野生動物之法律規範²³。例如關於排灣族狩獵，記載「獵場是屬於頭人所有，因此進入每一獵場狩獵時，必向其主人繳納獵租，一般

²¹ 同前註，頁5。

²² 參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蔡明誠、蔡志偉（Awi Mona）、官大偉、浦忠勇（編著），臺灣原住民族民事傳統習慣調查彙編（試行本），2017年。此彙編係原民會委託蔡明誠、蔡志偉、官大偉、浦忠勇等諸位教授，根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之「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14族原住民族傳統習慣之調查、整理及評估納入現行法制（民國94年至100年）」、「調查公聽會與座談會（民國103年至104年）」及「其他文獻資料」，加以研究、編輯彙整。

²³ 然「彙編」主要以現行民法體例為軸加以編輯，並非針對刑事及獵捕野生動物規範加以整理，筆者曾自行整理「彙編」中有關各族群狩獵、漁獵內容，僅約12頁11,428字，且各族群內容豐富、簡要不一，許多族群並無具體規範內容，難以充分描述各族群在原住民自治時期有關獵捕野生動物之法律規範。

¹⁶ 詳細的論述，參王泰升，台灣法律史上的原住民族：作為特殊的人群、地域與法文化，臺大法學論叢，44卷4期，2015年12月，頁1639-1704。

¹⁷ 漢人及清朝稱之為「熟番」。

¹⁸ 漢人及清朝稱之為「生番」，日本政權稱之為「蕃人」或「高砂族」，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則稱之為「高山族」，嗣後改為山地同胞，1994年8月1日國民大會將山地同胞正名為原住民。

¹⁹ 王泰升，同註12，頁10。

²⁰ 同前註，頁10-14。

係以兩隻前腿及胸部充為獵租 (vadis)。其他獵物則依狩獵時所作貢獻，分配獵獲。頭目是其部落附近方圓幾十或幾百方公里內的土地領主，平民在此範圍內得自由耕種與狩獵，所獲皆須提出部分向頭目納租」²⁴、「各黨各有所屬之獵場，不得濫行至他黨領域狩獵。如有犯者，不僅其獵獲物遭沒收，尚須課以罰財。獵場有被一黨占有者，亦有數黨所共有者，或有些黨無獵場而得他黨許諾至其獵場行獵者，複黨番社大抵共有其獵場。獵獲者必將其獵獲物之一部分予地主頭目，稱vadis」²⁵。可見就排灣族而言，狩獵有其慣習，並有權威以強制力貫徹，而屬原住民法。

(二) 日治時期 (1895 年至 1945 年)

相對於平埔族及漢人，日治時期初期認對原住民族的統治不須適用現代意義法制，對於原住民族的民事、刑事、程序法等事項，是由理蕃警察就個案為裁決，於是原住民族法被視為「習慣」或「舊慣」，而成為警察為個案裁斷時的選項之一，但未被具體轉化為現代法院裡操作可普遍適用的法規範²⁶。

日治時期雖允許原住民打獵，然利用推動農業，降低原住民對狩獵的需求，以教育方式降低部落對兒童傳授狩

獵技能的機會²⁷，及管制槍枝方式²⁸，限制原住民獵捕野生動物之行為及態樣。合理推論，當因狩獵問題產生紛爭時，理蕃警察亦將參考先前狩獵的習慣或舊慣，作為個案裁決之依據。

(三) 狩獵法時期 (1948 年 11 月 2 日至 1989 年 6 月 23 日)

1. 狩獵法

狩獵法於 1948 年適用在臺灣地區²⁹，原則上不禁止狩獵，但採取狩獵許可制，若違反禁止或限制規定，則課處行政罰鍰並撤銷狩獵證書³⁰。主要係管制以狩獵為經濟或娛樂活動行為³¹，以是否傷害人畜、有害或有益禾稼、林木、可供食用或珍奇鳥獸，決定狩獵限制之程度³²。從而狩獵法時期，獵捕野

²⁴ 原民會 (委託)，蔡明誠等 (編著)，同註 22，頁 323。

²⁵ 同前註，頁 322-323。

²⁶ 王泰升，同註 12，頁 18-20。

²⁷ 王皇玉，第六章：原住民犯罪的文化困境與除罪化，收錄於：刑罰與社會規劃——台灣刑事制裁新舊思維的衝突與轉變，2009 年 4 月，頁 231。

²⁸ 日治時期因認持有槍械之原住民為理蕃事業的最大危害，因而追查沒收槍枝。於 1911 年公布「貸與槍」措施，雖沒收原住民槍彈，但由於原住民有狩獵需要，因此在「蕃務官吏駐在所」設置槍彈，借給原住民使用，藉以操縱原住民。同前註，頁 238-239。

²⁹ 王皇玉，文化衝突與台灣原住民犯罪困境之探討，臺大法學論叢，36 卷 3 期，2007 年 8 月，頁 280-281。另參立法院全球資訊網：<https://lis.ly.gov.tw/lglawc/lglawkm?700b00303000000A0100000^10000030000000000000150000E89C4151>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5 月 29 日)。

³⁰ 狩獵法 (該法已於 1989 年 6 月 23 日廢止) 第 5、7、17 條。

³¹ 王皇玉，同註 29，頁 281。

³² 狩獵法 (該法已於 1989 年 6 月 23 日廢止) 第 3、4 條。

生動物，原住民與其他國人並無不同，均受狩獵法之規範，原住民原則上仍可上山打獵³³。

2. 生態保育黑暗期

1948年至1970年間，生態保育未受重視，標本外銷市場的興起、食補與飼養野生動物的風氣日盛，造成了市場對於野生生物的需求，標本製造業在1960年達到最高峰，每年獵捕水鹿數百隻，臺灣野山羊與山羌，則超過了1,000隻，每年也有數以萬計的紅尾伯勞鳥，於過境時被獵捕當街販賣燒烤，野生的梅花鹿則於1969年於野外絕跡，此期間為生態保育黑暗期³⁴。

3. 禁獵令

由於野生動物交易猖獗，台灣地區於1970年針對觀光區禁獵，並於1972、1975年二次頒布禁獵令，1978年11月16日始恢復狩獵許可制³⁵。

4. 保育啟蒙期(國家管制與原住民狩獵文化衝突之開始)

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動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

1972年制定國家公園法，進入保育啟蒙時期，然因將許多原住民傳統領域劃定為國家公園，並規定國家公園區域內禁止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違反可處行政罰鍰及刑事處罰³⁶，限制原住民獵捕野生動物之區域。另1982年制定之「文化資產保存法」設立生態保育區與自然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捕獵、網釣、採摘、砍伐或破壞指定之珍貴稀有動植物者，則定刑責³⁷。亦限制部分原住民獵捕野生動物之行為。國家管制與原住民狩獵文化開始產生衝突。

(四) 環境權之國際潮流及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條約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縮寫:CITES; 常簡稱為華盛頓公約) 之影響 (1973年)

1960年代起，自然環境的保護與人類永續生存的關聯漸受重視，聯合國1972年於斯德哥爾摩召開世界環境會議，發表人類環境宣言，環境權被界定為人類享有自由、平等與在一個優質環境中過有尊嚴與幸福生活必需條件的基本權利，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成為國際潮流。嗣締約國於1973年在美國首府華

³³ 鄭川如，由生存權、文化權而來的狩獵權——從美國最高法院判決談台灣原住民的狩獵權、漁權，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2卷1期，2012年春季號，頁120。

³⁴ <http://www1.geo.ntnu.edu.tw/jiaen/1-1.htm> (最後瀏覽日：2018年7月12日)。

³⁵ 戴鼎盛、莊武龍、林祥偉，國家野生動物保育體制、社經變遷與原住民狩獵：制度互動之太魯閣實證分析，台灣政治學刊，15卷2期，2011年12月，頁19。

³⁶ 國家公園法第25條。

³⁷ 1982年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2條、第56條第2款。

盛頓簽署CITES。以絕種危險程度分為三個附錄分級管制，及依需要核發許可方式處理野生動物國際貿易，以保護野生動植物物種及其永續利用目的³⁸。環境權及保護瀕臨絕種野生動物成為國際潮流。

(五) 野保法之制定 (1989 年 6 月 23 日)

由於我國自然環境發生甚大變化，野生動物棲息環境不斷減少，若干原有及特有野生動物絕種或瀕臨絕種，為避免繼續惡化，行政院因此於 1986 年函請審議「野生動物法」及廢止「狩獵法」³⁹。於 1989 年制定「野生動物保育法」，以保育野生動物，維護自然生態之平衡為立法目的⁴⁰。將野生動物區分為一般類及保育類野生動物，保育類野生動物則包括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⁴¹。原則上人民（包括原

住民、非原住民）均可狩獵、採集一般類野生動物，但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證，至於保育類野生動物，則無分原住民、非原住民，原則上不得騷擾、虐待、獵捕、買賣、交換、非法持有、宰殺或加工，非法宰殺、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則有刑責⁴²。

(六) 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縮寫: CBD) (1992 年)

1980 年代末期生物多樣性議題開始被討論，1992 年里約地球高峰會所簽署之 CBD⁴³，成為全球關心議題。確定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方法與概念，承認風險預防原則、就地保育必要性、科學發展及技術轉讓、傳統生態知識及惠益分享等原則⁴⁴。而 CBD 除主要議題即生物多樣性三層次（基因、物種及生態系統多樣性）外，部分內容並重視原住民生活及傳統知識與生物多樣性的密切關係⁴⁵。

³⁸ CITES 內容，參陳貞如，買賣奇珍異獸罰不罰，月旦法學雜誌，197 期，2011 年 10 月，頁 213-221；葉俊榮，華盛頓公約與瀕臨絕種動植物的保護——臺灣面臨全球環境議題的挑戰與因應系列（一），律師通訊，172 期，1994 年 1 月，頁 76-82；葉錦鴻，華盛頓公約遵約制度及其運用，臺灣國際法季刊，3 卷 4 期，2006 年 12 月，頁 189-225。

³⁹ 立法院院總第 540 號議案關係文書。

⁴⁰ 1989 年野保法第 1 條。

⁴¹ 1989 年野保法第 4 條；同法第 3 條第 3、4、5、9 款「三、瀕臨絕種野生動物：係指族群量降至危險標準，其生存已面臨危機之野生動物。四、珍貴稀有野生動物：係指各地特有或族群量稀少之野生動物。五、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係指族群量雖未達稀有程度，但其生存已面臨危機之野生動物。……九、獵捕：係指以藥品、獵具或

其他器具或方法，捕取或捕殺野生動物之行為」。

⁴² 1989 年野保法第 5、18、32 條。

⁴³ CBD 詳細內容，參秦天寶，第六章：生物多樣性保育國際法的理論與實踐，收錄於：生物多樣性國際法導論，2010 年 5 月，頁 251-253、285-287。

⁴⁴ 同前註，頁 285。

⁴⁵ 如 CBD 第 8 條] 款：「參照國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維持原住民和當地社區中，依照傳統生活方式並且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持久使用相關的知識、創新與作法，並促進其廣泛應用，由此等知識、創新和作法而獲得的惠益。」、第 10 條：「每一締約國應

(七) 野保法 1994 年 10 月 29 日之修正

由於我國對於瀕臨絕種野生動物如犀牛、老虎保育不力，我國在國際上面對貿易制裁威脅，包括美國源自CITES的培利修正案⁴⁶。我國雖非CITES的會員國，但為順應國際潮流，避免背負「犀牛終結者」之惡名，野保法於 1994 年 10 月 29 日修正全文，以避免遭受貿易制裁⁴⁷。在第 40 至第 43 條規定刑事犯罪，其中第 41 條第 1 項第 1 款「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即在該次修正中制定⁴⁸，除非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否則不得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並呼應生物多樣性維護之趨勢，就立法目的增加「維護物種多樣性」⁴⁹，另於同法第 21 條第 5 款規定「臺灣原住民族於原住民保留地，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典，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

之必要者」不受野保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18 條第 1 項、第 19 條限制之規定⁵⁰。

(八) 憲法增修條文(1992 年 5 月 28 日、1997 年 7 月 26 日)

憲法增修條文於 1992 年增訂第 18 條第 2 項「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現移列為第 10 條第 2 項)，以呼應國際保護環境生態之潮流。於 1997 年修正時，則增訂第 10 條第 9 項(現移列為第 10 條第 11 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及第 11 項(現移列為第 10 條第 12 項)：「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⁵¹前開規定，與「第三代人權」保障集體權趨勢有關⁵²。惟前開憲法增修條款因列於基本國策，與憲法第 7 條以下基本權利並不相同⁵³，多數見解認

盡可能並酌情保護、鼓勵按照傳統文化慣例而且符合保護或永續利用要求的生物資源的習慣使用方式。」另參紀駿傑，生物多樣性保育與原住民族文化延續：邁向合作模式，國立台灣大學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保育策略研討會，2001年9月。

⁴⁶ 葉俊榮，同註38，頁76-77。

⁴⁷ 陳貞如，同註38，頁215。

⁴⁸ 野保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一、未具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條件，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第18條第1項第1款規定：「保育類野生動物應予保育，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殺或為其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在此限：一、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者。」。

⁴⁹ 1994年野保法第1條。

⁵⁰ 1994年野保法第21條第5款。然在實際案件中，在法學檢索系統中查無援引該條之判決。

⁵¹ 修憲過程，參劉建宏，原住民族之人權保障，華岡法粹，31期，2004年5月，頁229-231。

⁵² 李震山，第7章集體權，收錄於：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障為中心，2007年2版，頁303。

⁵³ 李建良，淺說原住民族的憲法權利——若干初探性的想法，台灣本土法學雜誌，47期，2003年6月，頁123；林孟玲，從原住民族的文化權內涵評文創條例——以國際法觀點出發，中正財經法學，2015年1月，頁174。

為不能直接據以為憲法上的請求權⁵⁴，是否能以集體權性質的文化權作為憲法上的請求權，亦有疑義⁵⁵。

(九) 原住民文化抗辯成文化化
——2004年2月4日野保
法新增第21條之1

1. 何謂「文化抗辯」？

「文化抗辯」(cultural defense)為美國訴訟審判實務，因應不同文化背景之被告，所發展出來排除刑責之抗辯手段，理論基礎在於每個人行為選擇及動機都根植於文化背景，因此司法審判必須尊重個人的文化脈絡，尤其是具有特殊族群身分或文化背景之人，若行為源自特殊的族群慣習或文化背景，與刑法規範衝突時，被告可提出文化抗辯，法院有義務審酌此等消極犯罪要件。審查要件為(1)被告是否為特定文化族群的一部分；(2)該文化族群是否具特殊傳統；(3)被告犯罪時是否受該特殊文化傳統影響⁵⁶。則原住民若提出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係出於原住民傳統文化而來之辯解，應屬「文化抗辯」之範疇⁵⁷。

2. 野保法2004年修正時新增第21
條之1，將「傳統文化」、「祭儀」
納入成為除罪化要件，係屬「文
化抗辯」成文化化

野保法2004年修正時刪除1994年野保法第21條第5款，新增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從而依野保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法律規範架構，原住民族若基於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必要時，不受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限制，無論保育類野生動物族群量是否逾越環境容許量，均可獵捕、宰殺、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將原住民因傳統文化、祭儀為目的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除罪化⁵⁸，係屬「文化抗辯」成文化化。

(十) 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2001年
11月2日)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01年通過
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認文化多樣性就

⁵⁴ 劉建宏，同註51，頁236-237。

⁵⁵ 林孟玲，同註53，頁175-176。

⁵⁶ 王皇玉，原住民犯罪的文化抗辯及其實踐，臺灣原住民族法學，1卷1期，2016年7月，頁32-33。

⁵⁷ 同前註，頁43。

⁵⁸ 王皇玉，原住民犯罪不法意識之研究——評新竹縣尖石鄉風倒木竊取案件，收錄於：林山田教授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刑與思——林山田教授紀念論文集，2008年11月，頁127。

像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是人類共同遺產，應當從當代及後代利益考慮予以承認肯定（第1條）；文化多元化是與文化多樣性這客觀現實相應的一套政策（第2條）；文化權利是人權的組成部分（第5條），明確提出文化多樣性之重要性。

（十一）原住民族基本法之制定
（2005年2月5日）

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我國於2005年制定原住民族基本法（下稱原基法），立法理由係謂：「本法之制定，係認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二項規定及總統政見『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原住民族政策白皮書』。」⁵⁹。並於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一、獵捕野生動物。……前項各款，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立法理由認：「一、原住民族為歲時祭儀或供生活之用，常需利用部落週邊自然資源……為避免過度利用可能導致之弊端，本條允許之行為，僅限於『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且必須是『非營利』行為，亦即取得之物不得作為買賣交易或其他商業利益用途，並必須『依法』從事，亦即

相關行為之規範仍以各相關法律之規定為之。二、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基於傳統文化祭典之需要，得在原住民保留地獵捕野生動物，已初步保障原住民之狩獵文化。」⁶⁰。肯認野保法第21條第1項第5款保障原住民狩獵文化之意旨。另原基法第19條於2018年6月20日修正，第1項增加「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海域」要件，並增訂第2項：「前項海域應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公告。」以維護原住民海洋文化、祭儀⁶¹。

（十二）文化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2005年10月20日）

確認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一項基本特性及人類的共同遺產，應當為了全人類的利益加以珍愛與維護。將抽象的文化保障理念，以「文化表現」（cultural expression）之概念具體化，以促使及保

⁵⁹ 同前註。

⁶¹ 原基法第19條修正為「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海域依法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一、獵捕野生動物。二、採集野生植物及菌類。三、採取礦物、土石。四、利用水資源。」、「前項海域應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公告。」、「第一項各款，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

⁵⁹ 參立法院法律系統：<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0B4EF7025D000000000000014000000004000000^01212094012100^000C5001001>（最後瀏覽日：2018年5月30日）。

障文化表現的多樣性，作為公約之主要宗旨。

(十三) 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2007 年 9 月 13 日)

聯合國大會於 2007 年通過「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做為全球保障原住民族人權最基本的標準⁶²。此一宣言建構在聯合國與各國，透過與原住民族建立伙伴關係、諮商關係、合作關係，藉由原住民族權利的法制化工作，保障原住民族的各項人權⁶³，宣言第 3 條確立原住民族的自決權，第 27 條宣示：「原住民族有依國際人權標準，促進、發展及維護其機構組織、獨特習俗、精神文化、傳統、程序、作法及符合實際案例之司法系統或習俗的權利。」，足徵原住民族自決權⁶⁴及促進、發展、維護原住民族獨特習俗、文化與傳統成為國際潮流。

(十四) 兩公約 (2009 年 12 月 10 日)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以下合稱兩公約)，係國際上人權保障最根本之法源。我國於 2009 年通過兩公約，並制定兩公約施行法，明訂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ICCPR 第 27 條及第 23 號一般性意見認文化本身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包括與土地資源的使用有聯繫的特定生活方式，原住民的情況更是這樣。這種權利可能包括漁獵等傳統活動和受到法律保障的住在保留區內的權利。ICESCR 第 15 條規定人人有權參加文化生活⁶⁵。ICESCR 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亦認個人決定是否獨自、或與他人聯合行使參加文化生活的權利，是一種文化選擇，並應在平等的基礎上予以確認、尊重和保護。這對於所有原住民族尤其重要，他們無論作為集體或個人都有權充分享有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和國際人權法和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所確認的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原住民族文化生活強烈的族群性對於其生存、福祉和充分發展是不可或缺的，並且包括對於其歷來擁有、占有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或獲得的土地、領土和資源的權利。原住民族與其祖先的土地及其與大自然的關係相連的文化價值觀和權利應予尊重和保護，以防止其獨特的生活方式受到侵蝕，包括喪失維生方式、自然資源，乃至最終的文化認同⁶⁶。最高法院認依兩公約施行法第 2、3 條、

⁶² 蔡志偉，聯合國中的原住民族國際人權，臺灣國際研究季刊，4卷2期，2008年夏季號，頁92-95、99-100。

⁶³ 同前註，頁102-103。

⁶⁴ 原住民族自治相關論述，參蔡志偉，原住民自治，台灣原住民研究學報，6卷1期，2016春季號，頁135-143。

⁶⁵ 參法務部編印，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一般性意見，頁47、49。

⁶⁶ 同前註，頁323-325、333。

兩公約、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均具有我國內國法之效力。至其與我國其他法律之效力位階如何，法無明文。於二者發生法律衝突時之適用順序，基於人權保障之法治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人權保障密度較高之兩公約規範⁶⁷。

論者即認為兩公約內國法化後，對於原住民族文化權之保障，已具備權利之內涵，欲充實原住民族的文化權內涵，可由兩公約關於文化權之規定著手⁶⁸。論者雖亦認為兩公約條文內容，看不出任何原住民狩獵權或漁業權，但從一般性意見書可以發現原住民狩獵、漁業權的保障內容，其權利來源來自ICESCR第15條第1項(a)款之「人人有權參與文化生活」及ICCPR第27條之「少數民族的文化權。」⁶⁹。然ICESCR第15條第1項(a)款係屬文化權的基礎，是「人人」均可主張之權利，並非原住民族特有之權利；而ICCPR第27條之規定乃是原住民基於其「固有文化」所享有的權利，而非脫離文化權範圍，另外創設原住民之狩獵權、漁業權。應僅於文化權脈絡下的狩獵文化受到保護，而非即可指稱原住民享有與固有文化無關的狩獵權、漁業權，從而臺灣「原住民狩獵權」之用語，似乎不夠精確。況就一般類野生動物，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權利及限制均相同，且不會成立犯罪，

是否適宜額外賦予原住民狩獵一般類野生動物權，尚待斟酌。而原住民文化與國家法制規範衝突者，乃是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行為可能成立犯罪，賦予原住民無論是否基於傳統文化均有狩獵保育類野生動物權，則顯與保護野生動物、生物多樣性、生態保育價值及國際潮流背道而馳，若無調和機制，亦難以獲得普遍支持。

(十五)「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之訂定(2012年6月6日)

野保法第21條之1雖於2004年即已新增，然迄於2012年6月6日農委會及原民會始訂定發布「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依管理辦法第4條、第5條之規定，獵捕活動應事前提出申請，並經主管機關核准。第6條復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申請案時，應考量各地區原住民族之傳統領域、文化、祭儀、獵捕區域、期間、方式及動物種類、數量之獨特性；核准獵捕野生動物之數量，應以傳統文化、祭儀所需為限，並應參考轄區野生動物資源現況及上年度實際獵捕野生動物種類、數量決定之。」、「前項各地區原住民族之傳統領域、文化、祭儀、獵捕區域、期間、方式及動物種類如附表。」。

⁶⁷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984號判決意旨。

⁶⁸ 林孟玲，同註53，頁176。

⁶⁹ 鄭川如，同註4，頁87-96。

二、現行法形式上雖具調和機制，實際運作上仍迭起爭議

由原住民及國家法制雙重視角，輔以國際潮流趨勢，依時間軸線觀察狩獵行為，在原住民自治時期，透過固有習俗、禁忌、祖靈觀念，由權威強制力貫徹，依照各族群部落，有其獨特原住民法規範體系。隨著外來政權統治，在日治時期，基於傳統文化的習慣或舊慣，尚成為理蕃警察個案裁決之依據，加上原則上不禁止狩獵，只是以各種方式管制、限制，狩獵文化得以習慣的樣貌持續存留。直至國民政府遷至臺灣，施行狩獵法後，原住民與其他國人相同，原則上仍可狩獵。然由於棲息地的破壞，狩獵活動頻繁，野生動物族群量下降，進入生態保育黑暗期，隨著國際環境權保護意識受到重視、CITES制定的影響及野保法制定下，狩獵野生動物受到限制，嗣因我國關於野生動物保護執行效果不佳，在國際壓力下，野保法於1994年修正，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成為犯罪，國家法律規範即與原住民狩獵文化發生衝突。又隨著原住民意識的覺醒及原住民運動的影響，野保法於2004年新增第21條之1，將「文化抗辯」納入成為除罪化要件，使原住民與傳統文化及祭儀有關之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行為予以除罪。我國並陸續制定原基法，簽訂兩公約，進一步保障原住民之人權。

觀察原住民法及國家管制各個階段消長變化，由原住民法的角度、獵捕野

生動物行為規範，其與國家接觸、碰撞的結果，符合論者所述：存在→弱化→滅亡→回復的循環及交錯關係⁷⁰。以國家管制的角度，則是管制→受到國際壓力及潮流嚴格管制→規定為犯罪→部分行為除罪化，目前則受到原住民文化權等集體權衝擊。則由獵捕野生動物法律規範演進及原住民文化抗辯成文法化之發展趨勢觀之，野保法既有「文化抗辯」除罪化要件，當可逐漸回復其狩獵文化，似不會再發生國家規範與原住民文化的衝突，然在司法審判實際運作上，卻產生爭議，引起社會矚目，其問題之根源為何，自宜透過實證研究加以釐清。

參、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判決實證研究結果及分析

一、實證研究範圍及其限制

原住民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所引發之爭議，研究者多針對個案進行分析評釋，較難以掌握該類案件之全貌⁷¹，為釐清問題之根源，本文嘗試以實證研究方法（法實證研究方法）⁷²，以自2004

⁷⁰ 李建良，憲政變遷中的原住民族權利——原住民族自治權的法理論述，憲政時代，31卷1期，2005年10月，頁23。

⁷¹ 少數文章，如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王皇玉教授曾針對95年至98年，4年內地方法院判決中刑事被告或被告之一具有原住民身分之所有案件，作為研究標的，探討原住民犯罪實貌。參王皇玉，原住民持有槍械問題之研究，台灣原住民族研究，5卷1期，2012年春季號，頁11-15。

⁷² 所謂「實證研究」(empirical study/research/analysis)係指有系統透過實驗、觀察、訪問、調查、爬梳檔案與文件等方式獲得經

年2月4日野保法新增第21條之1⁷³起至2018年3月31日止⁷⁴，各級法院有關野保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確定判決⁷⁵為研究對象，進行統計分析⁷⁶，觀察判決整體的趨勢與取向，並爬梳實務對於原住民文化抗辯的取向及理由，以實

證方法描述法律論證⁷⁷。所選取之判決來源為法官版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⁷⁸，惟早期判決書並未每篇均標示被告是否為原住民⁷⁹，筆者以交叉比對歷審判決書及起訴書內容之方式，盡量探求被告是否具有原住民身分⁸⁰，然經統計歸類為非原住民案件中，應仍有部分案件被告實際上具有原住民身分，亦無從由被告所屬族群予以統計⁸¹，無法反應全貌，此為本研究之限制與缺憾。

驗事實資訊，而後予以分析、推論，以回答研究者所欲探討的問題。研究者可以提出假設、以既有理論預測答案，最後以統計方法分析數據，以檢驗假設、理論預測之正確性。而法實證研究，研究素材則是法律制度、法律體系、司法行為及其他法律現象。參王鵬翔、張永健，經驗面向的規範意義——論實證研究在法學中的角色，中研院法學期刊，17期，2015年9月，頁207-209。有關實證研究方法的詳細介紹，除參考前開文章外，亦可參劉尚志、林三元、宋皇志，走出繼受，邁向立論：法學實證研究之發展，科技法律評論，3卷，2006年10月，頁1-48；黃國昌，法學實證研究方法初探，月旦法學雜誌，175期，2009年12月，頁142-153；何漢波、張永健，法實證研究方法進階導論——固定效果、隨機效果、群聚標準誤，月旦法學雜誌，259期，2016年12月，頁167-181。

⁷³ 2004年2月4日修正前野保法第21條第5款雖有臺灣原住民族於原住民保留地，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典，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同法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各款限制之規定，然經搜尋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並無案件提出該款抗辯，因此僅就2004年2月4日野保法第21條之1新增後之案件予以統計分析。

⁷⁴ 以宣判日為準。

⁷⁵ 係以被告或被告之一涉犯野保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經起訴、判決者為對象，如同時涉犯同條項第2款、第3款者，亦包含在內。但不包含單純涉犯同法第40條、第42條之罪者。

⁷⁶ 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案件數量龐大，內容繁多，前開統計為筆者個人自行整理，疏漏難免。另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法官助理王意淇利用公餘時間協助整理、統計，特此誌謝。

⁷⁷ 學者將實證研究分成三類，第一類檢驗「差異製造事實」，第二類檢驗法律的實效性，並刻劃制定、適用法律之制度性行為。第三類則是以實證方法來描述法律論證。傳統判例研究或個案研究，是微觀層次描述法律論證，實證研究分析大量判決或其他法律活動，是巨觀層次的描述法律論證。如研究在職災補償訴訟中，法院以何種方式詮釋因果關係。王鵬翔、張永健，同註72，頁264-279。因此大量分析判決描述法律論證，仍屬實證研究方法的一部分。

⁷⁸ 因而得以檢索之判決包括標示不公開之判決。

⁷⁹ 司法院自102年1月1日起在各級法院設置原住民專業法庭或專股後，各級法院判決書在案號上才逐漸標示如「原訴」、「原易」、「原簡」、「原上訴」、「原上易」，並在判決內容中標示被告是否為原住民。

⁸⁰ 例如判決書雖未標明被告為原住民，但檢視起訴書或判決書內容（通常隱身在量刑審酌事由），則有如被告為泰雅族、魯凱族等個別族群身分之記載者，亦可認為屬原住民案件。

⁸¹ 另外，縱使判決標示原住民，但亦非所有判決均會具體記載所屬族群，因此原本針對各族群（16族）細部統計分析，然因資料不足而無法進行。

二、統計結果

(一) 數量統計

2004年2月4日至2018年3月31日各級法院宣判之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判決合計675件。其中原住民280件(41.48%)⁸²，非原住民395件

(58.52%)。三審確定判決32件，其中原住民14件(43.75%)，非原住民18件(56.25%)(表一)；二審確定判決47件，其中原住民23件(48.94%)，非原住民24件(51.06%)(表二)；一審確定判決596件，其中原住民243件(40.77%)，非原住民353件(59.23%)(表三)。

表一：三審確定判決：32件

原住民	14件(43.75%)
非原住民	18件(56.25%)

表二：二審確定判決：47件

	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臺南分院	高雄分院	花蓮分院	金門分院
原住民	1件	2件	1件	5件	14件	0件
非原住民	1件	4件	2件	11件	6件	0件

表三：一審確定判決：596件

	臺北	士林	新北	宜蘭	基隆	桃園	新竹	苗栗	臺中	彰化	南投
原住民	1件	0件	0件	10件	1件	2件	4件	6件	4件	0件	24件
非原住民	2件	2件	4件	10件	4件	3件	0件	4件	5件	1件	0件

	雲林	嘉義	臺南	高雄	橋頭	屏東	花蓮	臺東	澎湖	金門	連江
原住民	1件	4件	0件	35件	0件	14件	53件	84件	0件	0件	0件
非原住民	2件	9件	12件	25件	1件	195件	40件	34件	0件	0件	0件

資料來源：以上均為本文彙整。

(二) 獵捕保育類動物種類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種類前10名，

分別為山羌(233件；將調降為一般類)；紅尾伯勞鳥(159件)；臺灣野山羊(長鬃山羊)(87件；將調降為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台灣獼猴(59件；將調降為一般類)；白鼻心(34件；將調降為一般類)；食蛇龜(27件；將調升為

⁸² 只要其中1位被告具有原住民身分之案件，即歸此類。但僅統計判決件數，並未統計被起訴之原住民人數。

瀕臨絕種野生動物)；高身鏟頰魚(25件)；鱧鰻(20件)；臺灣水鹿(19件)；將調降為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灰面琵鷺(12件)。

(三) 原住民被告案件是否坦承

坦承 247 件(88.21%)；未坦承 33 件(11.79%)。

(四) 原住民是否援引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或原基法第 19 條原住民族文化抗辯

未援引 240 件(85.71%)；有援引 40 件(14.29%)。

(五) 原住民被告量刑

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 189 件(67.5%)；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 91 件(32.5%)。

(六) 原住民被告諭知緩刑(包括附條件緩刑)

諭知緩刑 210 件(75%)；未諭知緩刑 70 件(25%)。

三、統計結果分析

由前開統計結果，可觀察出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具原住民案件約占 41.48%⁸³，以原住民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 2.39%的比例⁸⁴來看確實偏高，係屬

原住民常見犯罪，當與原住民對於土地及其上自然資源之利用及傳統文化有關。另外由所獵捕之保育類野生動物種類以觀，原住民以獵捕山羌、臺灣野山羊(長鬃山羊)為大宗，非原住民則以紅尾伯勞鳥為大宗，只有零星個案原住民曾獵捕紅尾伯勞鳥或食蛇龜。其中獵捕山羌之比例亦顯著偏高，幸農委會於 2018 年 6 月 25 日召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會議」，因應現況，將山羌、臺灣獼猴、白鼻心調降為一般類野生動物，將臺灣野山羊(長鬃山羊)、臺灣水鹿調降為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⁸⁵。未來將大幅降低原住民涉犯該罪之案件量。而以管轄法院而言，以地方法院確定者為例，原住民案件集中在臺東、花蓮、高雄、南投等地方法院，均屬原鄉法院，非原住民案件則集中在屏東、花蓮、臺東、高雄等地方法院。

而就原住民案件中，答辯方向及訴訟策略採取坦承犯行比例高達 88.21%⁸⁶；參以量刑上有 67.5%量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諭知緩刑(包括緩刑附條件)比例亦達 75%。

人口約占全國人口 2.39%，內政部統計月報：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1/month/month.html(最後瀏覽日：2018 年 7 月 13 日)。

⁸³ 參林務局網站：<https://www.forest.gov.tw/0000014/0062487>(最後瀏覽日：2018 年 7 月 12 日)。

⁸⁶ 備受矚目的王光祿案件，於第一、二審亦坦承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山羌、長鬃山羊各 1 隻，明知祭典打獵前要先申請許可，

⁸³ 此數字尚不包含被告實際上具有原住民身分但判決中未記載者，若包含前開判決，原住民比例會更高。

⁸⁴ 2018 年 6 月原住民人口數為 562,395 人；全國總人口數則為 23,011,879 人，從而原住民

而野保法雖自 2004 年 2 月 4 日新增第 21 條之 1，將文化抗辯明文化，然援引該條或原基法第 19 條文化抗辯者，僅占 40 件（14.29%）比例偏低，在 93 至 99 年度僅合計 5 件，100 年度後才有較

多案件援用，並於 104 年度達於頂峰，然之後亦未顯著增加⁸⁷（表四）。此或因法定最輕本刑係得以易科罰金，或被告符合緩刑宣告之資格，而為坦承之答辯方向及訴訟策略⁸⁸。

表四：未援引 240 件（85.71%）；有援引 40 件（14.29%）

年度	93 年度	94 年度	95 年度	96 年度	97 年度	98 年度	99 年度
案件數	1 件	1 件	0 件	1 件	1 件	0 件	1 件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4 件	6 件	4 件	4 件	10 件	2 件	5 件	0 件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

四、以實證方法描述法律論證 ——以判決內容整理、分析 原住民文化抗辯之實務見 解及其取向

檢視 395 件非原住民案件，除少數非原住民認其雖非原住民，但生活習性

與原住民無異⁸⁹，或深受原住民狩獵文化所影響⁹⁰，而提出原住民文化抗辯外，其餘均未實質討論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檢視 280 件原住民案件判決，其中 240 件未援引文化抗辯者，多採坦承犯行之訴訟策略，請求從輕量刑或給予緩刑，因而數量龐大的案件，亦未實質論述文化抗辯內涵。而逐一整理、分析 40 件援引原住民文化抗辯（包含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原基法第 19 條）判決之法律論證，概以指標判決（最高法院 104 台上字第 243 號判決）為分水嶺，在該判決前，因實務見解或逕認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不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或尚須符合同條第 2 項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尚須遵行管理辦法第 6 條暨附表規定之期間及得獵捕之野生動物種類始能除罪，如同設下獵捕對象及程序上

而這次打獵前，並未先申請許可，亦非為祭典而上山獵捕等情，而係就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提出抗辯，參臺東地方法院 102 年度原訴字第 61 號、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3 年度原上訴字第 17 號判決；雖提起第三審上訴，然就違反野保法部分，因於最高法院判決前仍未敘述理由，上訴不合法而駁回，參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3280 號判決。

⁸⁷ 107 年 1 月 1 日起至同年 3 月 31 日宣判之原住民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案件（合計 4 件：屏東地方法院 107 年度原簡字第 19 號、106 年度原訴字第 45 號、花蓮地方法院 107 年度原訴字第 7 號、臺東地方法院 107 年度東軍原簡字第 1 號等判決）更全部係坦承犯行，未提出文化抗辯。

⁸⁸ 相對於持有土造長槍，而提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抗辯者，比例較低，或亦可認受到法定最輕本刑之影響。

⁸⁹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6559 號判決。

⁹⁰ 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2237 號；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4 年度上訴字第 4 號判決。

障礙，因而大部分案件均在此層次即被認不符合除罪化要件，縱提出原住民文化抗辯，法院鮮少就何謂「傳統文化」、「祭儀」內容實質闡釋，並涵攝認定，除非因不符合野保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要件外，亦甚少無罪判決⁹¹。迨指標判決變更見解後，事實審始出現較多實質闡釋文化抗辯內容之判決，且在具體適用後出現較多無罪判決。茲將有援引文化抗辯判決法律論述分析如下：

（一）指標判決前之階段

1. 以一般類野生動物為限

有認依臺灣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典需要獵捕野生動物管理事項第5點之規定，可認原基法及野保法所指之野生動物，應以一般野生動物為限，而不及於保育類野生動物⁹²；有認野保法對於原住民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並無相關免除或減輕其刑之規定⁹³；亦有認為如解釋同法第21條之1第1項包括保育類及一般類之野生動物，而認原住民縱未經許可獵捕瀕臨絕種之野生動物，亦僅科

以罰鍰，則該瀕臨絕種之野生動物豈非果成絕種？此豈無法達成野保法為保護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立法目的⁹⁴。

2. 須經主管機關核准

採此見解者，基於以下幾種思考路徑：

（1）直接由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第2項之規範結構觀察

依野保法第21條第2項及第1項認原住民族之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除須基於傳統文化、祭儀必要外，尚須經主管機關核准⁹⁵。從而臺灣原住民雖係基於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必要，但如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自仍應受野保法第18條第1項之限制⁹⁶。

⁹¹ 如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3年度上訴字第640號判決認：「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有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主觀犯意，而為被告違反野保法部分無罪之諭知，經核洵無違誤。」

⁹² 南投地方法院101年度投刑簡字第172號、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99年度上訴字第238號、臺東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71號等判決，經提起上訴後，僅因未依減刑條例減刑經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以96年度上訴字第249號判決撤銷。

⁹³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2年度上訴字第58號判決。

⁹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99年度上訴字第238號判決。

⁹⁵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572號判決。案例事實為排灣族原住民6人於2010年11月14日進入臺東縣金峰鄉都魯烏外部落山區，接續以土造獵槍開槍獵捕之方式，獵得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7隻。就目的部分，抗辯乃是基於除喪狩獵撫慰人心乃不得已之文化慣行。該案原審即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0年度上訴字第184號判決認為族人「除喪祭」所用，合於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但未依同條第2項經主管機關核准，仍應回歸一般處罰規範。

⁹⁶ 高雄地方法院103年度原訴字第6號、94年度簡字第4470號判決。

(2) 由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第 51 條之 1 合併觀察

認野保法第 51 條之 1 規定僅就一般類野生動物予以規範⁹⁷，而未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是以原住民違反第 21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仍應依野保法第 41 條規定受刑事處罰，蓋情節較輕微之未經許可獵捕一般類野生動物尚須處以行政罰鍰，情節較重之未經許可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既無行政責任，倘又無刑事責任，自屬輕重失衡⁹⁸。

(3) 除由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第 51 條之 1 外，另依立法院附帶決議及立法目的觀察

認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增訂公布時，立法者作有附帶決議：有關第 21 條之 1 第 2 項之許可辦法，應特別尊重原住民族之傳統飲食文化，對「一般類野生動物」之種類、區域及數量予以妥適訂定。可資說明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2 項僅授權主管行政機關就原住民族獵捕、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動物之相關許可事項訂定法規命令，而未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況保育類野生動物可包括瀕臨絕

種、珍貴稀有及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三類，瀕臨絕種野生動物係指族群量降至危險標準，其生存已面臨危機之野生動物，如認為原住民族縱未經許可亦可任意獵捕瀕臨絕種野生動物，維護物種多樣性之立法目的豈不落空⁹⁹。並認立法者就原住民權益及野生動物保護之調和已作有決定，即原住民未經許可獵捕一般類野生動物者，施以行政制裁；未經許可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者，則應有刑罰之適用¹⁰⁰。而立法者此一區分是否得當，容有隨時空環境之變遷加以調整之情形，然在立法者修法前，法院亦僅得依此一管制模式適用法律¹⁰¹。

3. 尚須遵行管理辦法第 6 條暨附表規定

認原住民族向來有狩獵之習慣，基於其人格之自我實現而實施狩獵活動時，不免與保育野生動物之公共利益產生價值衝突，此等衝突如何調和或取捨，應由立法者善加抉擇。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雖就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或祭儀所為之獵捕野生動物行為予以除罪化，惟為維護生物多樣性，復於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

⁹⁷ 野保法第 51 條之 1：「原住民族違反第 21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動物，供傳統文化、祭儀之用或非為買賣者，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但首次違反者，不罰。」

⁹⁸ 臺東地方法院 102 年度原訴字第 46 號、第 9 號、100 年度訴字第 315 號、第 35 號判決。

⁹⁹ 臺東地方法院 101 年度重訴字第 8 號、101 年度訴字第 209 號判決。

¹⁰⁰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0 年度上訴字第 252 號、臺東地方法院 103 年度原訴字第 46 號判決。

¹⁰¹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0 年度上訴字第 1884 號、臺中地方法院 101 年度選訴字第 2 號、宜蘭地方法院 97 年度訴字第 160 號判決。

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中，另以附表方式將原住民各族舊有之傳統文化及祭儀就得獵捕期間及野生動物獵捕種類予以限制，此將原住民狩獵之傳統文化限縮於相當期間，錯開野生動物種類，乃為使野生動物休養生息，即是表現原住民族順應時序與自然共存共榮，所採之取之於山林，用之於山林之精神，兼顧野生動物之保育與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傳承。故不論是基於傳統文化或祭儀而為狩獵行為，均須遵行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第6條暨附表所規定之期間及得獵捕之野生動物種類¹⁰²。

（二）分水嶺——指標判決之見解

4名布農族原住民為供小米豐收季慶典使用，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基於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獵捕山羌10隻案件，經事實審法院各判處有期徒刑6月，得易科罰金¹⁰³，經上訴後，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541號判決變更見解，認管理辦法第6條第2項關於野生動物之種類，除一般類野生動物外，列為「其他應予保育」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屬「珍貴稀有」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台灣水鹿」、「台灣野山

羊」，亦包含在內。似證明原住民族依野保法第21條之1規定並不限於一般類野生動物。則野保法第51條之1「一般類野生動物」是否係立法文字之疏誤所致，不無疑義。而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

更審判決經上訴後，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43號判決認原住民族符合管理辦法內容而獵捕野生動物行為，與違反管理辦法而違反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不同。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已自同法第21條第1項第5款移列，而單獨立法，用以特別保護原住民族之傳統獵捕文化。則原住民族依同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規定，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之獵捕行為，自不得漠視上開規定，及該條單獨立法以加強保護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意旨，再以違反上開第17條至第19條之有關規定為由，逕依該法第41條各款予以處罰。被告係布農族原住民，獵捕山羌，係為供小米豐收季慶典，基於傳統祭儀，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雖因未經主管機關之許可而違反該法第21條之1第2項之規定，縱立法時有所保留，但既疏漏而未定有處罰之明文，自無從違反罪刑法定及類推適用禁止原則，而予以比附援引、擴大適用範圍，逕以同法第41條論處罪刑之餘地。

¹⁰² 花蓮地方法院104年度原訴字第12號判決。更為詳細內容參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2年度上訴字第186號、臺東地方法院103年度原訴字第35號等判決。

¹⁰³ 臺東地方法院101年度重訴字第10號、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2年上訴字第39號判決。

（三）後指標判決時期

1. 最高法院見解漸趨統一

（1）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2815 號判決

就卑南族原住民手持土造長槍 1 支獵得山羌 2 隻案件，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2815 號判決認被告基於供自己食用之目的，未事前申請許可，也非因傳統文化或祭儀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不合管理辦法第 6 條附表之基於傳統文化之行為，應論以刑罰，亦即肯認基於傳統文化或祭儀而為狩獵行為，尚須遵行管理辦法第 6 條暨附表之規定，始能除罪之見解。

（2）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3166 號判決

排灣族原住民三人共同基於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獵得山羌 2 隻案件，經事實審判決有罪。上訴意旨雖援引指標判決見解，認前案緩起訴案件，公訴人在處分書中詳載「獵殺動物之目的在過年節慶之用」，屬依法應為不起訴處分或無罪之案件，並無違法性，自不得以前案資為本案緩刑撤銷之考量，然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3166 號判決認前案並非以不具違法性而為上訴人不起訴處分，仍維持被告有罪判決。

（3）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3280 號判決後¹⁰⁴，迄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最高法院未就原住民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案件作出判決。

（4）最高法院 106 年度第 2 次刑事庭會議（一）決議

106 年 2 月 7 日最高法院 106 年度第 2 次刑事庭會議（下稱 106 年決議），就「原住民未經向主管機關申請，於豐年祭期間，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持自製之獵槍，上山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臺灣水鹿及山羌各三隻，是否違反野保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問題，決議原住民族於其傳統文化、祭儀期間，若供各該傳統文化、祭儀之用，且符合管理辦法第 6 條及其附表之各項規定，僅事先未經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獵捕屬附表所列准許獵捕之保育類野生動物，不能因野保法第 51 條之 1 僅規定對於未經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動物科以行政罰，即認同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所謂野生動物僅指一般類野生動物而不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

從而 106 年決議明確表示不採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不包括保育類野生

¹⁰⁴ 惟該案就違反野保法部分未敘述理由，上訴不合法，未就違反野保法表示意見。其原審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3 年度原上訴字第 17 號判決則採不論是基於傳統文化或祭儀而為的狩獵行為，均須遵行管理辦法第 6 條附表所規定之期間及得獵捕之野生動物種類之限制規範之見解。

動物，及尚須符合同條第 2 項經主管機關核准始能除罪之見解，然須符合管理辦法第 6 條暨附表規定之程序性限制仍在。

2. 事實審見解則多元而分歧

後指標判決時期，事實審見解多元而分歧，並非均採取指標判決或 106 年決議之見解，且呈現有罪及無罪互見之情形，經歸納、整理如下：

(1) 仍認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限於一般類野生動物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原上訴字第 52 號判決（該案經上訴最高法院，尚未確定，不納入上開統計，但因見解特殊，仍列入分析）認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以及原基法第 19 條第 1 款所指「野生動物」均未明確規範是否包含保育類野生動物在內。參野保法立法目的，係為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多樣性，並維持自然生態之平衡，準此，應認該法第 21 條之 1 所指「野生動物」並不包含保育類野生動物，否則，即與野保法立法目的有違，再參照臺灣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典需要獵捕野生動物管理事項第 5 點前段已將保育類野生動物排除在外，則保育類野生動物乃為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所排除，並非原住民得以獵捕之動物。

宜蘭地方法院 105 年度原訴字第 11 號判決認核心問題，在於憲法中明文保障之原住民文化，與保育野生動物兩價值，應如何調和其衝突，供自己或族人

食用為目的之狩獵，確為應予保障之原住民傳統文化，但狩獵「保育類野生動物」並不包括在內，不論任何傳統文化、祭儀，都不能狩獵保育類野生動物。縱同意為了傳統文化可將某一野生動物滅絕，此一傳統文化也將隨著該物種死亡，無以為繼而滅絕，或被迫改變傳統的方式。不論從維護生物多樣性的目的或保障傳統文化本質的觀點，保護保育類野生動物的價值均高於保障原住民傳統文化¹⁰⁵。

(2) 採 106 年決議見解，不論是基於傳統文化或祭儀而為的狩獵行為，均須按管理辦法第 6 條附表所規定之期間及得獵捕之野生動物種類為限制¹⁰⁶。

(3) 雖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仍實質認定是否符合「傳統文化」及「祭儀」之要件

如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5 年度原上訴字第 8 號判決引用指標判決見解，根據卷證資料，認定魯凱族原住民獵捕山羌 1 隻係因其同事之父過世，要打獵送給同事作為「除喪」（生命禮俗）使用，獵物合於管理辦法第 6 條附表，縱未於 5 日前申請，仍合於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之除罪規定。

¹⁰⁵ 此案經高等法院 105 年度原上訴字第 75 號判決駁回上訴，並諭知附條件緩刑確定。類似見解，宜蘭地方法院 104 年度原訴字第 6 號判決。

¹⁰⁶ 臺東地方法院原訴字第 4 號、花蓮地方法院 104 年度原訴字第 12 號判決。

如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4 年度原上訴字第 26 號判決引用指標判決見解，認被告於 103 年度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之狩獵期間，未經許可，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應屬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不罰之行為¹⁰⁷。

如臺東地方法院 103 年度原訴字第 32 號判決認被告狩獵活動乃屬未經主管機關許可，違反該法第 21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之行為，然實質認定係基於布農族傳統文化及祭儀目的所需，屬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不罰之行為¹⁰⁸。

- (4) 雖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亦違反管理辦法第 6 條暨附表規定，亦實質認定行為是否符合「傳統文化」、「祭儀」要件，而可依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除罪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6 年度原上訴字第 11 號判決認被告係基於傳統文化、祭儀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雖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亦違反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狩獵期間之規定，仍不得逕以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論處罪刑¹⁰⁹。

- (5) 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及原基法第 19 條第 1 項所稱「祭儀」、「自用」，屬傳統文化之例示，只作為認定「傳統文化」之輔助，非獨立要件，並實質認定是否符合「傳統文化」要件

南投地方法院 104 年度原訴字第 8 號判決，認原基法第 19 條與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之准許規定屬文化權保障的具體實現，核心價值係在「文化」，無論「祭儀」或「自用」，皆為傳統文化在特定面向的呈現，應屬傳統文化之例示，只作為認定「傳統文化」之輔助，非別傳統文化而獨立存在。就布農族基督教之信仰，聖誕節亦成為布農族之重要祭典，被告或許是為幫太太「坐月子」，或是為迎接聖誕慶典，而前往部落獵場狩獵乙節，該法院認為狩獵存在於原住民布農族社會已久，並藉由世代相傳延續至今，為原住民布農族生活一部分，是原住民布農族之所以為原住民的識別符號，按照向來的生活與思考方式進行狩獵，本身就是履踐傳統文化，亦

¹⁰⁷ 但該案並未具體說明是否符合管理辦法第 6 條暨附表之規定。

¹⁰⁸ 該案事實為舉行 103 年度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主辦單位就狩獵期間、狩獵區域範圍、獵捕種類、數量及方式、參加狩獵均有法申請核准。被告為布農族原住民，於射耳祭開放狩獵期間前往山區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水鹿。

¹⁰⁹ 該案原審花蓮地方法院 105 年度原訴字第 79 號判決，參酌吳月雪、杓日昇、吉宏，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化盤點及口述歷

史之研究、杓日昇、吉宏，太魯閣族部落史與祭儀樂舞傳記、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維護之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網站，認太魯閣族依其等信仰，確有為部落集體活動到個人在現實生活中事件，而舉行祭把分食，且為藉由世代相傳而反覆實踐之儀式行為，合於祭儀之意。實質認定被告辯稱其獵捕目的係基於自用分食，及因其母罹患口腔癌、其與配偶均出車禍，故其母認需要祭拜祖先以保平安，合於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所稱之傳統文化及祭儀。檢察官則認為被告行為違反管理辦法第 6 條暨附表之規定，而提起上訴。

符合上開管理辦法所稱之「傳統文化」，且其目的不僅在於祭儀（包括融入基督教信仰之聖誕節），亦擴及自用。

(6) 實質認定非營利行為之自用，屬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一部分

太魯閣族原住民在花蓮縣壽豐鄉白鮑溪山區，以自製獵槍獵捕山羌之案件，花蓮地方法院 105 年度原訴字第 74 號判決認原住民族之文化實踐並非必然以祭儀方式表達，即使在飲食、起居的日常活動中，亦可理解為文化之實踐，且原住民族部落之傳統依山而居，與其山林土地依附共存，原住民族獵取其山林所產供自己食用，若無任何營利之行為，該行為仍屬原住民族文化活動之實踐方式，故「非營利行為之自用」既屬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一部，而應依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認被告將誤擊之山羌帶回欲供本人或親屬或依傳統文化供分享之用時，不成立野保法第 41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經檢察官提起上訴後，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6 年度上訴字第 36 號判決肯認前開見解。

(7) 若符合原基法第 19 條之限制及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之要件，均不受刑罰所處罰

排灣族原住民在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活動中心後方山區等地，獵捕灰面鵲鷹案件，屏東地方法院 106 年度原訴字第 2 號判決認若符合原基法第 19 條就原

住民獵捕野生動物行為之三項限制：1、於原住民族地區內；2、非營利行為；3、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及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之必要，無論獵物為一般類野生動物或保育類野生動物，均不受刑罰所處罰。為求保護生物多樣性，以公平合理分享遺傳資源所生惠益，不過度耗用生物資源造成生物多樣性迅速衰減，進而帶來多數物種滅絕之浩劫，維繫環境保護之永續發展，原住民族固得依照其傳統生活習慣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含一般類及保育類），然仍須視個案情節檢視其行為是否確實為祭儀或自用所需，而不應以被告具有原住民身分逕行推定其獵捕行為必然與傳統文化有關。並依卷證資料，具體認定被告獵捕之初並非因傳統文化，亦非供祭儀或自用所需，故不得依據原基法第 19 條、野保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免除刑事責任。

(8) 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及原基法第 19 條均屬刑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依法令行為

太魯閣族原住民在秀林鄉銅門林道龍溪處獵殺臺灣野山羊 1 隻案件，花蓮地方法院 106 年度原訴字第 3 號判決認原住民在原住民族地區基於非營利行為之傳統文化、祭儀目的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行為，依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規定，不認其具有違法性與可罰性，而基於自用目的者，依原基法第 19 條規定，

不認其具有違法性與可罰性，均為現行法令所規定之容許行為，並認本案被告係為供自己及家人食用之目的而為上開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為，實已展現太魯閣族「與自然共存」、「識別族群」、「展現勇氣及膽識」之價值，並依習慣將獵物視為食物來源，雖與行政機關訂頒之規定不符，然合於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所規定之「傳統文化」，亦合於原基法第 19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非營利行為之自用」，屬刑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依法令行為而不罰。

肆、實務取向評析

後指標標判決時期，各級法院見解多元而分歧，然已無須經主管機關核准始能除罪之見解，扣除僅限於一般類野生動物之見解，實務發展的趨勢，大致可分成四種取向，惟每一種趨勢都有其疑慮及困境，尚待克服，茲析述如下。

一、採取 106 年決議見解，必須遵守管理辦法第 6 條暨附表始能除罪取向

依此取向，法院只要認為不符合管理辦法第 6 條暨附表之要件，即毋庸實質審酌被告的行為是否與傳統文化、祭儀有關，實務上有容易操作及認定的優點，且附表所列，仍具有部分傳統文化、祭儀之內容。

然細究管理辦法附表，除阿美族及部分泰雅族（桃園市、苗栗縣）、排灣族、卑南族、部分魯凱族（屏東縣、高雄市、

臺東縣）、鄒族、撒奇拉雅族有生命禮俗之傳統文化內容外，其餘均與「祭儀」有關，難認已窮盡原住民各族之傳統文化，且規範內容簡略，亦未見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智慧之關連，似無法充分代表原住民狩獵文化，以此作為形式上要件審查是否適當，並非無疑。

研究者亦認管理辦法固然可以成為法院在解釋時的參考依據，但管理辦法並非法律，仍應考量個別限制的合宜性，且應觀察法規命令限制，是否逾越母法合法要素的授權界線¹¹⁰。

反面言之，如花蓮縣政府准許秀林鄉太魯閣族銅門部落於「感恩祭」狩獵，卻直接依照附表內容准予「限時、限量、限地」開放 5 種保育類野生動物獵捕，包括穿山甲，而穿山甲甫經CITES公布列在附錄一嚴禁國際貿易，引起軒然大波¹¹¹，惟穿山甲並非銅門部落主要獵物及習慣食用物種，則倘銅門部落獵捕穿山甲，形式上符合附表之規範，實質上卻違反其傳統文化，反而無法彰顯狩獵文化價值。

再者，原住民依照管理辦法第 6 條暨附表，是否即能兼顧生態保護，達到生物多樣性及文化多樣性兼籌並顧、相互調和之目的，亦無客觀科學化的調查

¹¹⁰ 許恒達，持有獵槍、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與原住民慣習間的衝突及解套：評宜蘭地方法院104年度原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臺灣原住民族法學，1卷2期，2017年4月，頁58-59。

¹¹¹ <https://www.peopo.org/news/320329>（最後瀏覽日：2018年5月31日）。

與數據予以佐證，復無依據保護類野生動物數量予以調整機制，從而現行管理辦法第6條暨附表之規範，亦難認為妥適之調和機制。

二、個案實質認定是否符合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傳統文化」、「祭儀」要件之取向

此取向優點是符合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規範意旨，在個案中具體實質認定「傳統文化」、「祭儀」要件，符合文化抗辯的本旨，較能彰顯個案正義，然而在採取此種取向時，仍有以下的障礙要克服，適用後亦非無疑慮。

（一）106年決議之障礙

106年決議既仍採須符合管理辦法第6條暨附表始能除罪之見解，則各級法院是否會勇於挑戰該決議，實質認定傳統文化及祭儀要件，情況不明。又事實審縱採實質認定見解，經上訴後最高法院是否會因違反該決議為由撤銷原判決，亦不明確，增加不確定性。

（二）法院心態的調整

偏見往往來自不瞭解，及依刻板印象直觀判斷，各級法院（即便是原住民法庭）是否能夠去除成見，以學習心態充分理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甚至採取貼近原住民視角出發，尊重多元文化，正確適用文化抗辯要件，仍要看個案法官態度，可能因個案有異，而不同其命

運。為摒除偏見，法院在審理時，或可透過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提出原初立場(original position)方式，讓法院想像他們被擋在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後，對自己所擁有的性別、種族、能力、地位、社會階層和職位一無所知，以確保理性選擇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¹¹²。

（三）何謂「傳統文化」認定不易

1. 文化是動態且無明文定義的概念，當「傳統文化」成為除罪化要件，其內涵本即不易認定

依ICESCR第21號一般性意見，文化是一個廣泛、包容性的概念，包括人類生存的一切表現。是一個歷史的、動態的和不斷演變的生命過程，有過去、現在和將來¹¹³。因此文化原本即為具有時代性、動態而演進的概念，並無明文定義，內涵亦不易界定，屬不確定概念。在刑法理論脈絡下，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及慣習，本不能「直接」作為構成或排除刑事責任的理由，除非將原住民傳統文化或慣習融入既有刑法體系，否則只是犯罪結構的文化或族群感情問題¹¹⁴。

¹¹²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36-42 (2005)。

¹¹³ ICESCR, general comment 21, para 11.

¹¹⁴ 許恒達，國家規範、部落傳統與文化衝突——從刑法理論反思原住民犯罪的刑責問題，台灣原住民族研究，6卷2期，2013年夏季號，頁45-46。反觀在民事領域，則有研究者主張應適用原住民族傳統慣習作為法院民事裁判之準據法。參黃居正，適用

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直接將「傳統文化」作為除罪化要件，即將不確定的概念成文化，倘無其他輔助規範予以界定（如不符合管理辦法附表之情形），在個案審查上即不易認定。

又原住民族自從被外來政權統治，原住民法弱化為慣習，再弱化為傳統文化，實際上破碎不全，產生斷層，甚至是暫時性遺忘，在長期禁獵與限制狩獵之歷史背景下，狩獵文化是否仍具有反覆實踐之特性，有待探討，從而狩獵文化之內涵，在個案中必須調查探究。加上係口耳相傳，資料蒐集不易¹¹⁵，往往必須透過詢問部落耆老、專家證人的方式為之，然將會產生代表性是否充足的問題，又當不同耆老間證詞矛盾時，應如何評價，亦為審判上困難之處。

2. 各原住民族族群、部落狩獵文化並非相同

各原住民族族群，均有其獨特的狩獵文化，且並非所有族群均有狩獵文化¹¹⁶。目前法定原住民族有 16 族，加上同一族群不同部落間，狩獵文化亦可能

有差異。而刑事案件乃是針對被告之特定行為之非難評價，則在個案文化抗辯，就被告是否為原住民族群的一分子，又該族群特殊的狩獵文化為何，被告犯罪時是否受該特殊狩獵文化影響¹¹⁷，均必須調查審認。此時並非可直觀以二分法或刻板印象，遽認只要是原住民即有獵捕特定「保育類野生動物」文化，而係應具體區分各族群甚至部落予以調查審認，更增添認定之難度。

（四）人、時、地、物等要素之挑戰

由判決事實觀察，案件類型複雜而多元，在具體個案上，在認定何謂傳統文化時，實務上面臨包括人、時、地、物各種挑戰，必須克服面對：

1. 「人」的要素——何謂原住民

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始能主張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文化抗辯，為認定原住民身分，我國制定有原住民身分法，將原住民分為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¹¹⁸，然究竟應依血緣或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族傳統慣習作為法院民事裁判之準據法，臺灣原住民族法學，1卷1期，2016年7月，頁5-16；許茹嫻，原住民族傳統土地權利與習慣法物權，萬國法律，206期，2016年4月，頁58-73。

¹¹⁵ 有關原住民各族群狩獵文化的內容，縱使是原民會出版的文獻（例如，原民會（委託），蔡明誠等（編著），同註22），其內容中有關狩獵文化的論述，能夠作為判決參考者，亦屬有限。

¹¹⁶ 世居蘭嶼的達悟族有漁獵文化，然難認有狩獵文化。

¹¹⁷ 依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具原住民身分之被告必須基於傳統文化、祭儀，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始得主張文化抗辯，然由於部落遷出傳統領域，且部落老年化，青壯年移居都市，成為都市原住民，許多原住民早已非居住山林，加上漢化教育之普及，現今並非所有原住民均深受傳統文化之影響，從而縱使該族群或部落有其特殊狩獵文化，但特定之被告是否基於該特殊狩獵文化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以及該傳統文化對其狩獵之影響與關聯，仍應個案認定，惟此並非易事。

¹¹⁸ 參原住民身分法第2條。

法之取得戶籍登記來認定，實務上有所爭議，最高法院採應依原住民身分法第11條第1項在戶籍資料及戶口名簿上註記始生原住民身分取得之法律效果之標準¹¹⁹，最高行政法院則採原住民身分，係因血緣關係而來，身分之有無，是與生俱來，非國家權力所恩賜，更非登記取得或未及登記而喪失之標準¹²⁰。其中採戶籍登記標準之見解，具有認定容易之便利，然可能因原住民身分法規定之不完善，如「姓氏綁身分」主義，導致原住民女性無法將其原住民身分傳承其子女缺陷¹²¹。而採血緣標準，在原漢通婚、不同原住民族間通婚之情形，亦非不普遍，究竟應依何種之族群之傳統文化為認定依據，在具體個案上將產生爭

議。且若戶籍上未登記為原住民身分，可否持DNA血緣分析檢驗報告，主張自己具有原住民身分，而有除罪化要件適用，亦有待觀察。

又原住民身分認定，究應採「血統」或「文化認同」，本即有爭議。血統固然為界定原住民身分之主要標準，但從原住民族自決與自決立場，文化認同則有關鍵性與決定性¹²²。然原住民族因歷經不同統治者統治，不免受主流文化之影響，甚至受到同化，而喪失傳統文化的自我認同。以平埔族為例，臺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105年9月21日府族綜字第1050879384號函雖認西拉雅族迄今仍保有傳統狩獵文化，然依內政部81年3月4日台81內民字第8174921號函釋，種族欄登記為「熟」或「平埔番」，目前早已漢化，且居住在平地行政區域，與非山胞生活、語言幾無二致，非「山胞身分認定標準」適用範圍，認定不具原住民身分¹²³，亦即因平埔族已漢化，無文化認同，而不具原住民身分。另外，已有案例出現，被告主張雖非原

¹¹⁹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07號判決認依原住民身分法第11條第1項要在戶籍資料及戶口名簿內註記或塗銷山地或平地原住民身分及族別，始生原住民身分得喪變更回復之法律效果。依被告提出之戶籍登記簿固可認被告之祖父母輩具平地原住民血統，然歷經臺灣光復之親屬，既未依規定於政府開放登記期間內登記為原住民，依原住民身分法之規定，自難認已取得平地原住民身分，是被告應屬非原住民與非原住民所生之子女，當不具備原住民身分。

¹²⁰ 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240號判決認原住民身分，係因血緣關係而來，身分之有無，是與生俱來，非國家權力所恩賜，更非登記取得或未及登記而喪失。原住民身分法第2條僅係為管理便利方區分山地和平地原住民，非認於登記期間外即無再取得原住民身分之可能。國家就原住民身分設登記制度，是出於行政管理便利性考量，該項登記之性質，乃行政上的確認手續，不能因未完成系爭登記者即非原住民。

¹²¹ 鄭川如，「原住民身分法」中「姓氏綁身分」條款的違憲分析，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40期，2013年7月，頁1-39。

¹²² 王皇玉，同註29，頁292-293。

¹²³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6年度上訴字第34號判決，該案被告辯稱其祖父母在戶籍謄本上均登記為「熟」，且經富里鄉公所為符合西拉雅（平埔）族原住民身分之認同登記，屬西拉雅族，應以「血統主義的原住民」從寬認原住民身分。然經原審法院經函詢原民會，認依原基法第2條第1款及原住民族別認定辦法第2條，目前經行政院核定之法定原住民族有16族，其他均非「原住民族」。又依內政部前開函文，認定被告不具原住民身分。

住民，但生活習性與原住民無異¹²⁴，或深受原住民狩獵文化所影響¹²⁵，而提出野保法第21條之1原住民文化抗辯者，倘採文化認同觀點，似也應認具原住民身分¹²⁶。

2. 「物」的要素——獵物的傳統文化關連

野保法刑事處罰，係以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為行為客體，然並非所有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均與傳統文化有關。如屏東排灣族原住民因工作緣故，至綠島從事裝設冷氣兼職浮潛教練，為己食用為目的，與非原住民共同獵捕曲紋唇魚（龍王鯛）¹²⁷，或原住民漁船船長獵捕、宰殺弗氏海豚¹²⁸，前開太魯閣族銅門部落認無獵捕穿山甲之傳統文化¹²⁹，或原住民獵捕非原住民常獵捕之食蛇龜¹³⁰，均難認與原住民文化間有何關連。從而依照原住民傳統文化，得以獵捕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亦必須在具體傳統文化脈絡中認定。

¹²⁴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559號判決。

¹²⁵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237號；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4年度上訴字第4號判決。該案被告主張原住民有食用飛鼠胃腸內未消化之植物嫩葉及果實，以有效改善腸胃疾病之習俗，為改善同居人之胃疾，而獵捕赤腹松鼠及山羌。

¹²⁶ 然前開二案，判決均認不具原住民身分。

¹²⁷ 臺東地方法院106年度原上訴字第22號判決。

¹²⁸ 臺東地方法院102年度原東簡字第83號判決。

¹²⁹ 然確有原住民獵捕穿山甲之案件，如新竹地方法院106年度原訴字第21號、屏東地方法院106年度原訴字第45號判決。

¹³⁰ 宜蘭地方法院103年度簡字第533號判決。

又傳統狩獵文化上，亦非無對於獵物之禁忌與限制，如泰安鄉泰雅族北勢八社即有禁止獵捕臺灣野山羊、穿山甲、臺灣獼猴、臺灣黑熊、山豬之禁忌¹³¹，如屬該部落之原住民獵捕臺灣野山羊，違反禁忌，此時該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為，是否仍能認為屬野保法第21條之1傳統文化的範疇，即有爭議。

3. 「時」的要素

文化具歷史性，有過去、現在和將來，狩獵文化，隨著部落組成、獵場、氣候、遷徙等變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容有不同內涵，在時間概念上，究竟應採取何種時期的文化內容作為依據，即容有爭執。又在證據資料上，如採日治時期「臺灣蕃族慣習研究」記載或耆老之證詞，然因時空變化，是否仍能適當說明為傳統文化內涵，且延續至今，亦可能有爭執。

另原住民狩獵，有其狩獵季節之限制，以泰雅族為例，絕大多數以歲時祭儀及農作休閒（如冬季）為季節，禁獵期間，任何人不得進出獵場打獵¹³²。則倘泰雅族原住民並非在祭儀或狩獵季節狩獵，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違反狩獵規範，是否仍屬符合「傳統文化」要件之行為？

¹³¹ 王進發、童信智，由原住民狩獵文化看國家與部落間之規範衝突及未來因應，台灣原住民族研究，5卷1期，2012年春季號，頁66。

¹³² 同前註，頁51。

4. 「地」的要素

原住民族因為傳統領域的喪失、部落及人民的遷徙，加上國家公園、自然保育區的設置，得以狩獵地點，往往非傳統獵場，而狩獵文化與部落所在土地及獵場息息相關，所得獵捕的保育類野生動物種類也會因獵場而有異，在獵場變化的情形下，獵捕地點及獵捕的種類，是否與狩獵文化相關，亦造成認定上的困難。

另原住民狩獵，有獵區獵場之相關規範，如屏東縣霧台鄉魯凱族人仍維持傳統的獵區狩獵制度，獵人只有在固定的地區，使用固定的路徑進行狩獵活動，國有林班地中，許多地區，如大小鬼湖附近，是獵人傳統不利用的地區¹³³；又如泰雅族亦有嚴格進入他人獵場，且不可破壞進出獵場之獵徑，嚴格禁止盜取他人獵區的獵物之狩獵規範¹³⁴。則倘至他族群或部落的獵場狩獵，違反狩獵規範，是否符合狩獵文化，亦有探究之必要¹³⁵。

由於野保法除罪化要件「傳統文化」、「祭儀」屬不確定概念，且各族群、部落內涵亦有差異，加上前開「人」、「物」、「時」、「地」要素均有挑戰需克服，並無法律明文之規範，因此法院在審查

除罪化要件，即容有較高之裁量空間，增加個案結果之不確定性。

三、「傳統文化」包含「非營利自用」取向

此取向優點在於毋庸援引原基法第19條規定，即可在野保法第21條之1要件中處理，避免兩種規範適用順序上之諸多爭議¹³⁶。且難以排除有部分「非營利自用」行為，與傳統文化息息相關，從而此取向有其正當、合理性。

然在論理上，基於「非營利自用」（通常為供自己或家人食用）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行為，若本即在「傳統文化」範圍內，「非營利自用」此要件即無獨立存必要。且並非所有「非營利自用」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行為，均與原住民傳統文化有關，如為供己或家人食用為目的，而獵捕曲紋唇魚、弗氏海豚、穿山甲或食蛇龜等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為，即難認包含在「傳統文化」的概念中。縱使屬原住民傳統上會獵取之保育類野生動物，然係在偶然情況下，為食用而獵捕之行為，如泰雅族原住民至宜蘭縣南澳鄉山區進行舊部落田野調查，因糧食匱乏而獵捕臺灣野山羊、山羌食用果腹¹³⁷，是否合致基於「傳統文化」之要件，亦容有討論之空間。而此取向在論述上若過度寬鬆，僅認原住民獵取

¹³³ 戴家驥，魯凱族的狩獵知識與文化——傳統生態知識的價值，台灣原住民族研究論叢，8期，2010年12月，頁73-74。

¹³⁴ 王進發、童信智，同註131，頁51。

¹³⁵ 如屏東魯凱族原住民至宜蘭員山鄉獵捕山羌1隻（宜蘭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52號判決）。

¹³⁶ 實務上即有三種論罪模式：直接適用、從法從事或特別法優先，吳志強，同註9，頁180-182。

¹³⁷ 宜蘭地方法院104年度原訴字第1號判決。

其山林所產供自己食用，若無任何營利行為，該行為即屬原住民族文化活動之一部，其並非針對個別族群、部落加以細說，容易流於對原住民之刻板印象直觀判斷，說理較為牽強，若要採此取向，說理上更應細緻嚴謹。

而狩獵之主要目的無非食用，作為動物高蛋白食物來源，此為自古人類的傳統，所謂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概念，難認為原住民族特有文化，非原住民世代居住在山林，或世居原住民部落，為食用為目的狩獵，亦可能為其或家人之傳統。舉例而言，如非原住民因長年與原住民居住，長期有狩獵行為，又逢年節而獵捕山產（臺灣野山羊）供家人食用，即因不具原住民身分，而成立犯罪¹³⁸，則從反面角度思考，同樣世居山林，有狩獵活動之人民，同樣因食用之目的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是否僅因不具原住民身分，而有不同的待遇，此種差別待遇，是否有正當性基礎，仍屬優惠性差別待遇，而符合平等原則，亦尚有討論空間。

此種取向，因將完全契合文化抗辯之本旨，為四種取向中較為足採者，然較第二種取向，調查審認之難度更高，個案差異性將會更大。

四、原基法第 19 條「非營利自用」亦作為除罪化要件

此種取向直接將原基法第 19 條「非

營利自用」的要件，適用在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優點在於大多數案件均屬非營利自用，因而原住民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行為可大幅除罪，符合原住民族視角下，補償正義的期待。農委會及原民會會銜函釋亦為野保法第 21 條之 1，包括原住民在原住民族地區基於自用之非營利目的而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等行為，所謂自用係指非藉此獲取利益，僅供本人、親屬或依傳統文化供分享之用¹³⁹。

然原基法性質上屬「基本法」，與其他實施法律之關係，具有優越性、指導誘導性、非母法與子法之關係及準憲法意義，為原住民族領域或政策措施之基本原理原則或基本方針。一般而言，內容屬抽象概括性及一般全面性，無法對特定規範主體課以特定義務，亦無法以強制規範定之，僅得以訓示規範或努力義務規範定之，必須透過實施法律加以具體化，難以作為限制原住民權益之直接依據，原住民亦難僅以抽象基本原則或方針，作為裁判請求權之依據¹⁴⁰，則是否適當以原基法「非營利自用」直接作為野保法除罪化要件，實非無疑。且原基法第 19 條立法理由已認修正前野保法第 21 條第 1 項第 5 款（現為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已初步保障原住民

¹³⁸ 花蓮地方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139 號判決。

¹³⁹ 106 年 6 月 8 日農委會（106）農林務字第 1061700971 號、原民會（106）原民經字第 10600235541 號函釋。

¹⁴⁰ 蔡秀卿，基本法之意義與課題，收錄於：當代公法新論（中）——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2002 年 7 月，頁 246-250。

之狩獵文化，並未認為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未列「非營利自用」要件，違反原基法之規定，或不符合原基法的精神，立法者似認在實施法即野保法，以基於「傳統文化」或「祭儀」作為除罪化要件，即為已足。再者，為落實基本法，在實施法層次，本來就應根據其規範之特性，調整落實基本法內涵之要件，而非直觀的將基本法所有要件移植到實施法中，始認為落實基本法¹⁴¹。如就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而言，乃是國家基於治安、公共安全維護，而就狩獵「工具」所為限制，從而衝擊所有持槍狩獵行為（不管狩獵一般類或保育類野生動物），而野保法乃是國家基於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多樣性，與自然生態之平衡，而就獵物之種類（保育類）所為之限制，則槍砲彈藥刀械條例及野保法兩種規範對原住民狩獵文化之限制及影響不同，所容許之範圍本即不同，因此除罪要件自然不盡然相同，此由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上之觀察，自屬當然，從而並非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無「非營利自用」要件，即認為未落實原基法。

又以「非營利自用」作為除罪化要件，僅有「原住民」身分加上基於「非營利自用」目的兩要件，文義射程範圍甚廣，解釋上亦可能包含與原住民狩獵文化無關之食用保育類野生動物行為，

如前開為供己或家人食用為目的，而獵捕曲紋唇魚、弗氏海豚、穿山甲或食蛇龜等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為，均在文義射程範圍內，適用範圍是否過廣，即值斟酌。

再者，以「非營利自用」作為要件，只要供本人或家屬食用，無需考慮是否基於傳統文化，究其實際無非以是否具原住民身分作為除罪化要件，除了採取所謂「基進法學主義路線」，只要身分上是原住民，就必須審酌原住民族特性¹⁴²，或從「民族」的角度去思考管制規範刑事懲罰的正當性觀點¹⁴³，否則僅以原住民、非原住民二分法作為標準，是否具有優惠性差別待遇，符合平等原則，亦有疑慮。縱使採轉型正義觀點¹⁴⁴，然轉型正義，乃是恢復原住民族諸權利，且必須了解原住民族傳統法規範¹⁴⁵，亦非與傳統文化脫勾，則是否容許跳脫傳統文化，賦予「非營利自用」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的權利，更非無疑。而此種放寬除罪化要件取向，對於保育類野生動物的衝擊較大，是否仍

¹⁴² 邱志義，法官審判時之認事用法應否考量原住民族之特性（下），月旦裁判時報，28 期，2014 年 8 月，頁 122。

¹⁴³ 劉維新，淺評宜蘭地方法院 104 年度原訴字第 1 號刑事判決：基於「民族」觀點就管制正當性的再思考，臺灣原住民族法學，3 期，2017 年 12 月，頁 107-112。

¹⁴⁴ 有關轉型正義議題，參陳昱園，轉型正義的思考與實踐，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6 卷 3 期，2016 年秋季號，頁 145-160。

¹⁴⁵ 吳豪人，「野蠻」的復權：台灣修復式正義與轉型正義實踐的困境與脫困之道，台灣人權學刊，1 卷 3 期，2012 年 12 月，頁 67、89、90。

¹⁴¹ 否則原基法第 19 條第 1 項尚有「在原住民族地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海域」之要件，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在適用上是否受前開要件之限制？

能夠達到兼籌並顧、相互調和的目的，也未經科學實證研究。

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背後價值乃是生態保護及維持生物多樣性，亦屬普世之重要價值，當野保法規範與原住民狩獵文化衝突時，就憲法角度，乃是要探討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傳統文化」及「祭儀」除罪化要件，是否過度限制原住民狩獵文化，不符合比例原則，而需加入「非營利自用」要件加以調整之問題。然當考慮是否加入「非營利自用」要件，則仍應進一步審酌加入此射程範圍較大之要件，是否仍能達到與自然生態兼籌並顧、相互調和之目的，並與平等原則相符。前開規定是否違憲，既經最高法院聲請釋憲，即有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就此兩種普世價值，進行權衡判斷。

伍、結論及建議

原住民文化抗辯既已成文法化，若妥善運用當可適度減緩國家規範對狩獵之傳統文化的衝擊，不至出現爭議判決，引起原住民族群的普遍不滿。本文由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原住民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案件，多採取坦承，尋求緩刑之訴訟策略，援引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或原基法第 19 條文化抗辯除罪化條款者，為數不多。而法院判決，在指標判決前，如同設下獵捕對象及程序上障礙，多數案件因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無法通過前開障礙，未實質調查審酌原住民文化抗辯。指標

判決及 106 年決議雖除去部分障礙，不再限於一般類野生動物，亦無須事先經主管機關許可，然仍需符合管理辦法第 6 條暨附件始能除罪，而事實審法院見解則多元及分歧，且四種實務見解取向，均有所疑慮尚待克服，足見現行法制容有缺陷，並非兼顧調和生態保護、生物多樣性及保護原住民文化、文化多樣性之妥適法律規範，本文建議以新的眼光及作法重新訂立規範¹⁴⁶。

原住民族需要的是建構真正尊重原住民獨特歷史、文化，能夠彌補數百年來不合理的對待，並能夠永續發展的制度¹⁴⁷。自古即有狩獵文化的原住民族，在原住民自治時期，發展出原始而有效的生態倫理與保育措施，包括獵區、獵團、占卜祈福、禁忌及記點儀式與分享等內涵，使原住民與野生動物在臺灣山林保持長久的動態平衡，保存生態體系，維持生物多樣性¹⁴⁸，在建立新規範

¹⁴⁶ 論者亦有認為建構原住民狩獵專法之必要性，參王皇玉，建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狩獵規範：兼評王光祿之非常上訴案，臺大法學論叢，47卷2期，2018年6月，頁877-880。

¹⁴⁷ 范麗娟，原住民與永續發展，台灣原住民族研究，3卷4期，2010年冬季號，頁88-89。

¹⁴⁸ 紀駿傑，從環境正義觀點看原住民的狩獵文化，發表於「原住民狩獵傳統與自然資源永續利用研習會：再造山林守護神」，魯凱族自然資源保育基金會主辦，1997年2月；雖有學者批評原住民並非有意識的環境保護者，然亦有研究者經研究後，歸納台灣原住民有合乎自然、保護生態多樣性、維生需要的簡樸生活、獵物共享、聖化自然等原住民環境倫理規範。參莊慶信，臺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環境哲學的省思，哲學與文化33卷3

時，自宜參酌CBD的精神，調查並利用每個原住民族群狩獵的傳統知識及文化，去蕪存菁，佐以野生動物、生態保育專家科學上的意見，納入新的狩獵規範中。作法上亦宜依原住民自治權，由各原住民族群甚至部落，透過原基法第21條諮商同意及第22條共同管理機制，與野生動物、生態保育專家協商，建立各原住民族群獨特又符合傳統文化的詳細狩獵規範，並有有效約束機制，促使族人願意遵守¹⁴⁹。另外亦應設置監控保育類野生動物數量機制，在因放寬原住民狩獵保育類野生動物的同時，若數量顯著減少，則能夠即時修正規範，而達到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兼籌並顧，相互調和的目標。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王皇玉，文化衝突與台灣原住民犯罪困境之探討，臺大法學論叢，36卷3期，頁255-304，2007年8月。
- 王皇玉，原住民犯罪不法意識之研究——評新竹縣尖石鄉風倒木竊取案件，收錄於：林山田教授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刑與思——林山田教授紀念論文集，頁125-146，2008年11月，臺北：元照。
- 王皇玉，第六章：原住民犯罪的文化困境與除罪化，收錄於：刑罰與社會規範——台灣刑事制裁新舊思維的衝突與轉變，頁203-250，2009年4月，臺北：元照。
- 王皇玉，原住民持有槍械問題之研究，台灣原住民族研究，5卷1期，頁1-37，2012年春季號。
- 王皇玉，原住民犯罪的文化抗辯及其實踐，臺灣原住民族法學，1卷1期，頁31-44，2016年7月。
- 王皇玉，建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狩獵規範：兼評王光祿之非常上訴案，臺大法學論叢，47卷2期，頁839-887，2018年6月。
- 王泰升，臺灣法律史概論，3版，2012年，臺北：元照。
- 王泰升，在法學與國家法中看見原住民族法律，政大法學評論，134期，頁1-45，2013年1月。

¹⁴⁹ 期，2006年3月，頁137-163。
台東縣卑南族卡地布部落曾在2008年大獵祭前由部落獵人簽署「狩獵公約」，現場包括林務局、台東縣府農業處、警政署森林保育隊長以及警察局台東分局長，都參與簽署，宣誓不濫獵殺、不濫採集，即為適例。<http://e-info.org.tw/node/40045>（最後瀏覽日：2018年5月31日）。

-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上的原住民族：作為特殊的人群、地域與法文化，臺大法學論叢，44 卷 4 期，頁 1639-1704，2015 年 12 月。
- 王進發、童信智，由原住民狩獵文化看國家與部落間之規範衝突及未來因應，台灣原住民族研究，5 卷 1 期，頁 39-72，2012 年春季號。
- 王鵬翔、張永健，經驗面向的規範意義——論實證研究在法學中的角色，中研院法學期刊，17 期，頁 205-294，2015 年 9 月。
- 何漢藏、張永健，法實證研究方法進階導論——固定效果、隨機效果、群聚標準誤，月旦法學雜誌，259 期，頁 167-181，2016 年 12 月。
- 吳志強，尋求原住民族基本法與野生動物保育法間規範衝突的緩衝地帶——以「違法性意識之可能性」的視角淺析，東吳法律學報，27 卷 2 期，頁 173-222，2015 年 4 月。
- 吳志強，刑事案件採納實證研究之必要性——以原住民傳統習慣為中心，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21 期，頁 43-104，2017 年 6 月。
- 吳信華，憲法釋論，2017 年修訂 2 版，臺北：三民。
- 吳豪人，「野蠻」的復權：台灣修復式正義與轉型正義實踐的困境與脫困之道，台灣人權學刊，1 卷 3 期，頁 67-93，2012 年 12 月。
- 李建良，淺說原住民族的憲法權利——若干初探性的想法，台灣本土法學雜誌，47 期，頁 115-125，2003 年 6 月。
- 李建良，憲政變遷中的原住民族權利——原住民族自治權的法理論述，憲政時代，31 卷 1 期，頁 1-31，2005 年 10 月。
- 李震山，第 7 章集體權，收錄於：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障為中心，2 版，頁 293-319，2007 年 9 月，臺北：元照。
- 林孟玲，從原住民族的文化權內涵評文創條例——以國際法觀點出發，中正財經法學，頁 167-217，2015 年 1 月。
- 邱忠義，法官審判時之認事用法應否考量原住民族之特性（下），月旦裁判時報，28 期，頁 112-122，2014 年 8 月。
- 紀駿傑，從環境正義觀點看原住民的狩獵文化，發表於「原住民狩獵傳統與自然資源永續利用研習會：再造山林守護神」，魯凱族自然資源保育基金會主辦，1997 年 2 月。
- 紀駿傑，生物多樣性保育與原住民文化延續：邁向合作模式，國立台灣大學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保育策略研討會，2001 年 9 月。
- 范麗娟，原住民與永續發展，台灣原住民族研究，3 卷 4 期，頁 71-96，2010 年冬季號。
- 徐揮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障及促進文化表現多樣性公約」對文化權及傳播權之影響：以 2007 年歐體視聽媒體服務指令為中心，新聞學研究，98 期，頁 98-103，2009 年 1 月。
- 秦天寶，第六章：生物多樣性保育國際

- 法的理論與實踐，收錄於：生物多樣性國際法導論，頁 251-305，2010 年 5 月，臺北：元照。
- 莊慶信，臺灣原住民的生態智慧與環境正義——環境哲學的省思，哲學與文化 33 卷 3 期，頁 137-163，2006 年 3 月。
- 許恒達，持有獵槍、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與原住民慣習間的衝突及解套：評宜蘭地方法院 104 年度原訴字第 1 號刑事判決，臺灣原住民族法學，1 卷 2 期，頁 49-60，2017 年 4 月。
- 許恒達，國家規範、部落傳統與文化衝突——從刑法理論反思原住民犯罪的刑責問題，台灣原住民族研究，6 卷 2 期，頁 33-82，2013 年夏季號。
- 許茹媛，原住民族傳統土地權利與習慣法物權，萬國法律，206 期，頁 58-73，2016 年 4 月。
- 許曉華，永續臺灣——臺灣的生物多樣性，科學發展，501 期，頁 44-49，2014 年 9 月。
- 陳旻園，轉型正義的思考與實踐，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6 卷 3 期，頁 145-160，2016 年秋季號。
- 陳貞如，買賣奇珍異獸罰不罰，月旦法學雜誌，197 期，頁 213-221，2011 年 10 月。
- 黃居正，適用原住民族傳統慣習作為法院民事裁判之準據法，臺灣原住民族法學，1 卷 1 期，頁 5-16，2016 年 7 月。
- 黃國昌，法學實證研究方法初探，月旦法學雜誌，175 期，頁 142-153，2009 年 12 月。
- 葉俊榮，華盛頓公約與瀕臨絕種動植物的保護——臺灣面臨全球環境議題的討戰與因應系列(一)，律師通訊，172 期，頁 76-82，1994 年 1 月。
- 葉錦鴻，華盛頓公約遵約制度及其運用，臺灣國際法季刊，3 卷 4 期，頁 189-225，2006 年 12 月。
- 裴家騏，魯凱族的狩獵知識與文化——傳統生態知識的價值，台灣原住民族研究論叢，8 期，頁 67-84，2010 年 12 月。
- 劉尚志、林三元、宋皇志，走出繼受，邁向立論：法學實證研究之發展，科技法律評論，3 卷，頁 1-48，2006 年 10 月。
- 劉建宏，原住民族之人權保障，華岡法粹，31 期，頁 227-253，2004 年 5 月。
- 劉繼蔚，淺評宜蘭地方法院 104 年度原訴字第 1 號刑事判決：基於「民族」觀點就管制正當性的再思考，臺灣原住民族法學，3 期，頁 107-115，2017 年 12 月。
- 蔡志偉，聯合國中的原住民族國際人權，臺灣國際研究季刊，4 卷 2 期，頁 81-108，2008 年夏季號。
- 蔡志偉，從客體到主體：台灣原住民族法治與權利的發展，臺大法學論叢，40 卷特刊，頁 1499-1550，2011 年 10 月。
- 蔡志偉，原住民自治，台灣原住民研究學報，6 卷 1 期，頁 135-143，2016

春季號。

蔡秀卿，基本法之意義與課題，收錄於：
當代公法新論（中）——翁岳生教授
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頁 235-257，
2002 年 7 月。

蔡明誠、蔡志偉、官大偉、浦忠勇，臺
灣原住民族民事傳統習慣調查彙編
（試行本），2017 年 4 月，臺北：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鄭川如，由生存權、文化權而來的狩獵
權——從美國最高法院判決談台灣原
住民的狩獵權、漁權，台灣原住民族
研究學報，2 卷 1 期，頁 101-130，2012
年春季號。

鄭川如，「原住民身分法」中「姓氏綁身
分」條款的違憲分析，國立中正大學

法學集刊，40 期，頁 1-39，2013 年 7
月。

鄭川如，論兩公約中原住民狩獵權漁獵
權的內涵，台灣原住民族研究，7 卷 3
期，頁 83-120，2014 年秋季號。

戴興盛、莊武龍、林祥偉，國家野生動
物保育體制、社經變遷與原住民狩
獵：制度互動之太魯閣實證分析，台
灣政治學刊，15 卷 2 期，頁 4-65，2011
年 12 月。

二、外文部分

Rawls, John (2005). A THEORY OF
JUSTICE. London, U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法」草案

謝銘洋 台灣大學法律學系

陳昭華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李崇信 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郭華仁 台灣大學農藝學系

2006-08

草案總說明

公佈施行於二〇〇五年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三條明文規定：「政府對原住民族傳統之生物多樣性知識及智慧創作，應予保護，並促進其發展；其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據此，特制訂本法，並暫訂名稱為「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法」。

原住民廣義之「傳統知識」，係指基於傳統而產生之文學的、藝術的或科學的作品、表演、發明、科學發現、外觀設計、標記；名稱或符號、未公開之資訊，以及其他一切基於傳統在工業、科學、文學或藝術領域內智能活動所生之發明與創作之統稱。基於原住民知識整體性的特質，上述各類知識原本不宜強制切割分類，但由於外觀設計、標記、名稱或符號等文學的、藝術的創作，已規範在「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法」草案之內，因此本草案暫時專就生物多樣性相關原住民傳統知識〈以下簡稱傳統知識〉之保護予以研擬。

傳統知識乃原住民歷代在其傳統領域內，與環境互動下的長期生活過程所產生、累積，對於環境之認識、保育與利用的相關知識。原住民因傳統知識而能永續地與環境共存，因此一般認為原住民族乃生物多樣性保育最重要之關係者。由於過去與外界的接觸、交流、雖然引入主流社會大量的知識與工具，然而經由調查與研究，原住民傳統知識亦不斷地為外界瞭解，更進一步經由科學研發而獲得商業利益，卻未能適當地回饋原住民，甚至於遭受直接剽竊傳統知識，申請專利，將之轉化為其私有財產，不僅有害於傳統知識之保存及維護，亦有損原住民之權益。

除了損及原住民傳統知識權益外，外來文明之衝擊亦導致原住民族傳統生活習慣以及既有社會體制之變遷，而傳統知識維持與創新所仰賴之機制，已經受到相當大之戮傷，對於原住民族之衝擊，更非傳統知識權受到侵害之能比擬。因此原住民傳統知識之保護，應兼顧知識權益之保障，以及知識創新與傳承機制之維持，兩者不可偏廢。

本「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法」草案，主要乃基於「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八條j項，尊重、保存及促進永續利用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之精神、事先告知同意與利益分享等原則，以及締約方大會針對第八條j項所採納的 Akwé:Kon 準則而擬定。本草案共分七章三十五條，除規定政府應成立專責機關外，並分別就權利之歸屬與內容、原住民族傳統知識資料庫、未公開傳統知識之調查與使用、傳統知識與智慧財產權之關係、傳統知識之延續與創新，以及侵害之救濟等加以規定。

第一章「總則」首先陳述本法之立法目的〈第一條〉，其次針對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已公開知識、部落會議等加以定義〈第三條〉，並且明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為本法之主管機關〈第二條〉；再者要求主管機關設立專責機構或委託專業機構〈第四條〉，並且成立傳統知識審議及調解會〈第五條〉，以期有效協助原住民族各部落進行傳統知識保護之諸項工作。

第二章「權利之歸屬及內容」規定傳統知識權利之歸屬於產生或發展該傳統知識之原住民族或其部落，而權利行使之決定權在原住民族或部落會議〈第六條〉；第十條則規定傳統知識權利所不及之五種情形。至於權利內容，第七條旨在防止他人非經同意取得或主張權利，或者以不正當方式使用傳統知識。而第八與第九條則將傳統知識區分為已公開與未公開兩大類，兩類知識之權利內容有所不同。已公開之傳統知識依照智慧財產權之原則，允許他人使用，然而若因商業之需要需用到之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名稱者，原住民有權要求給付權利金〈第八條〉。對於未公開之傳統知識，任何他人須先經同意並簽訂契約，方得使用或揭露〈第九條〉。

第四章「未公開傳統知識之調查與使用」進一步針對原住民族或部落如何受理與同意外人調查與使用未公開之傳統知識，加以規定；本章分為調查與使用之同意、監督機制等兩小節。第十三條為申請使用未公開傳統知識之基本原則；第十四至第十六條規定外人提出申請之程序、文件；第十七、十八條則設定契約內容以及如何達成契約協定；第十九、二十條進一步規範契約內容之影響評估以及利益公平分享之原則。達成契約協定後如何確保申請者遵行之監督機制則包括按期提交調查報告與報告之內容〈第二十、二十一條〉、使用許可之如何轉移至第三者〈第二十二條〉，以及如何防止未公開知識之擁有者或管理者對之加以外洩〈第二十三條〉。

已公開之傳統知識，由於他人得使用，一般建議採用「消極性之保護」，以防止他人惡意逕行申請專利權，竊為己有；因此需要製作資料庫，以方便各國專利局之篩檢，避免誤予以通過他人之專利申請。第三章第十一、十二條乃針對原住民族傳統知識資料庫加以規範。第十一條責成傳統知識專責機關成立國家資料庫，用以整理已公開或擬可公開之知識；而未公開知識經同意後，或原住民仍不擬公開者，則可以存放於部落自行管理之資料庫中加以保密。第十一條要求主管機關針對資料庫之運作等事宜訂定辦法。至於未公開傳統知識之智財權課題，由於傳統知識能否申請專利，其權責在專利法主管機關，因此本草案不予以處理；但本法案處理傳統知識或其衍生知識申請專利時之來源揭露事宜〈第五章第二十六條〉。

相對於第二至第四章之處理傳統知識權利課題，第五章「延續及創新傳統知識之方法」旨在建立法制，以期維持知識創新與傳承之機制。第二十四條明訂主管機關應提供適當之教育與培訓，提供「身教」課程與適當之「言教」教材，以提供學習傳統知識之機會。基於尊重各民族或部落之基本人權，因此本法不擬要求原住民族恢復傳統生活慣俗，但於第二十五條要求政府鼓勵之。

第六章「民事救濟及罰則」乃為貫徹本法所賦予原住民族或部落對其傳統知識之權利，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侵害原住民族或部落之權益者，設置侵害排除、救濟方法與請求損害賠償等民事救濟之規定〈第二十七條〉；而於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三條設置各項罰則，用以處分違反本法各項規定之行為者。

草案內容

草 案 條 文	立法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立法目的) 為保護原住民族之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及維護原住民族對該知識之權益，以促進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之永續利用及創新，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本法目的乃是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三條，並參考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第八條j款之規定及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之討論，以保護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為出發

	點，並維護原住民族對其傳統知識之權益，進而達成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永續利用與開發之目的，而加以制定。
<p>第二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p> <p>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p>	<p>本會主管全國原住民族事務，且綜合管理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爰明定本會為本法之主管機關。</p>
<p>第三條 （用詞定義）</p> <p>本法用詞定義如下：</p> <p>一、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以下簡稱傳統知識）：係指原住民族為永續生存所產生，與下列各項有關之知識、創作及操作方法，而經世代相傳者：</p> <p>（一）生物，包括其組成部分、生活過程、行為及特性。</p> <p>（二）生物以外之自然環境。</p> <p>（三）人類與環境之互動。</p> <p>（四）人類對於生物或非生物之取得及利用。</p> <p>二、已公開：係指於所屬原住民族或部落外，已公開發表、已公開使用或已為公眾所知悉者。</p> <p>三、原住民族會議：為原住民族集體意思之形成機關。</p> <p>四、部落會議：為部落集體意思之形成機關。</p> <p>前項原住民族會議及部落會議之組成與議事規則，由主管機關另以辦法訂之。</p>	<p>一、由於本法之用詞有其特殊內涵及用法，故先行定義以求解釋上之一致。</p> <p>二、第一項第一款有關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之定義，係參考太平洋區域保護傳統生態知識、創新及實施模範法（Model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Innovations and Practices）中對於傳統生態知識之規定，並參考 WIPO 文件 <u>WIPO/GRTKF/IC/7/9</u> 及巴拿馬第 20 號法律(Régimen Especial de Propiedad Intelectual sobre los Derechos Colectivos de los Pueblos Indígenas)等立法例。以狩獵為例，傳統知識包括(一)原住民對動物生理與生態行為之認識，(二)對動物出沒環境之認識，(三)決定獵區、獵季以及獵捕方法，以及(四)對陷阱製作所用植物及方法之認識等。</p> <p>三、第一項第二款有關已公開之</p>

	<p>定義，係參考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p> <p>四、為凝聚原住民族之集體意思，以確保原住民族或部落之權益，爰於第一項第三款與第四款規定原住民族會議與部落會議為原住民族或部落之集體意思之形成機關。</p> <p>五、至於本法中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定義參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之規定。</p>
<p>第四條 （專責機關之設置）</p> <p>主管機關應成立專責機關或委託專業機構，並編列預算，協助原住民族或部落調查、整理、保存及開發利用傳統知識。</p> <p>前項專責機關或受委託之專業機構，於原住民族或部落依本法所保障之權益受侵害時，應協助原住民族或部落維護之。</p>	<p>一、有鑑於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傳統知識逐漸流失與散佚，故明訂主管機關應成立專責機關或委託專業機構，並編列預算，以協助調查、整理、保存及開發利用相關傳統知識。</p> <p>二、為避免原住民族或部落於依本法所賦予之權益受侵害時，無法負擔龐大訴訟費用，致使相關權益無法主張，形同虛設，特規定專責機關或受委託之專業機構之協力義務。</p>
<p>第五條 （審議及調解會之設置）</p> <p>主管機關應成立傳統知識審議及調解會，辦理下列事項：</p> <p>一、傳統知識歸屬之審議與爭議之調解。</p> <p>二、第八條規定權利金爭議之調解。</p> <p>三、其他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間關於傳統知識爭議事項之審議與調解。</p> <p>前項審議及調解會之組織、設置、審議、調解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p>	<p>傳統知識歸屬之認定、權利金及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間關於傳統知識等爭議事項，宜由獨立客觀之委員會進行審議或調解。</p>

第二章 權利之歸屬及內容	
<p>第六條 (傳統知識之權利歸屬)</p> <p>與傳統知識有關之權利，歸屬於產生或發展該傳統知識之原住民族或部落。</p> <p>依本法之規定，應經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者，由原住民族會議或部落會議行使之。</p>	<p>一、傳統知識之權利，屬於產生或發展該傳統知識之原住民族或其部落所有，爰參考秘魯第 27811 號法律第一條、第十條，巴西第 2186-16 暫行條例第八條、第九條規定之。</p> <p>二、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權，應由代表原住民族或部落集體意思形成機關之原住民會議或部落會議行使之。</p>
<p>第七條 (防止他人取得或主張權利及以不正當方式使用傳統知識)</p> <p>傳統知識所屬之原住民族或部落以外之人，非經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不得就該傳統知識取得智慧財產權或主張其他權利，或以不正當方式使用該傳統知識。</p> <p>前項所稱之不正當方式使用，係指以扭曲、污蔑或其他方式使用，致有損害原住民族或部落之聲譽或尊嚴之虞者。</p>	<p>為賦予傳統知識所屬之原住民族或部落權利，以防止他人未經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對傳統知識主張權利或以不正當方式利用傳統知識，爰參考 WIPO/GRTKF/IC/7/6 文件、秘魯第 27811 號法律第四十二條規定之。</p>
<p>第八條 (已公開傳統知識之來源表彰權及權利金請求權)</p> <p>就已公開之傳統知識，為商業上之使用，且欲表彰該傳統知識所屬之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名稱者，應事先徵得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並給付適當之權利金。</p> <p>前項權利金，由原住民族或部落會議與使用人協議之，協議不成，由傳統知識審議及調解會調解之。</p>	<p>一、本法將傳統知識區分為已公開及未公開之傳統知識，並分別賦予不同程度之保護。</p> <p>二、已公開之傳統知識屬公共領域之知識，原則上任何人均得使用，惟使用之際若表彰該知識所屬之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名稱，以獲取商業上之利益者，應事先徵得該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並給付適當之權利金，以示尊重。</p> <p>三、權利金之金額，原則上由原住民族或部落與傳統知識之</p>

	<p>使用人自行協議，如有協議不成之情事，則由審議及調解會調解之。</p>
<p>第九條 (未公開傳統知識之揭露、取得與使用)</p> <p>未公開之傳統知識，非事先徵得所屬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並簽訂契約，他人不得揭露、取得或使用之。</p> <p>未公開傳統知識所屬之原住民族或部落，對於相關傳統知識之揭露或使用行為，有主張表彰來源之權利。</p>	<p>一、傳統知識屬於原住民族或其部落所有，為保障原住民族之傳統知識及促進其永續發展，故參考 WIPO/GRTKF/IC/7/6 文件、秘魯第 27811 號法律第四十二條、巴西第 2186-16 暫行條例第九條之規定，欲揭露、取得、使用未公開之傳統知識，必須經由該傳統知識所屬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及簽訂契約始得為之。</p> <p>二、針對未公開之傳統知識，賦予其得請求表彰來源之權利。參考巴西第 2186-16 暫行條例第九條之規定予以定之。</p>
<p>第十條 (權利內容之例外)</p> <p>原住民族或部落對其傳統知識之權利，不及於下列各款情事：</p> <p>一、各原住民族或部落間之傳統交換行為。</p> <p>二、研究或個人之非營利之使用。</p> <p>三、他人善意使用未公開傳統知識之行為。</p> <p>四、為保存、發展傳統知識及促進傳統創新之必要措施。</p> <p>五、國家為因應緊急情況或增進公共利益之非營利使用行為。</p>	<p>傳統知識之權利範圍，應考量相關因素予以限縮。</p> <p>一、為尊重原住民族或部落間關於傳統知識之傳統交換行為，參酌 WIPO/GRTKF/IC/7/6 文件、巴拿馬第十二號行政命令第十一條、秘魯第 27811 號法律第四條、巴西第 2186-16 暫行條例第四條等規定，將其排除於權利範圍之外。</p> <p>二、為促進傳統知識之相關研究及發展，參酌 WIPO/GRTKF/IC/7/6 文件之規定，將研究行為及個人非營利上之使用行為排除於權利範圍之外。</p>

	<p>三、他人善意使用未公開傳統知識之行為，應非本法所賦予之權利效力所及，故參酌 WIPO/GRTKF/IC/7/6 文件，予以排除於權利範圍之外。</p> <p>四、為促進傳統知識之永續利用及創新，故為保存、發展傳統知識及促進傳統創新所採取之必要措施，參酌 WIPO/GRTKF/IC/7/6 文件之規定，予以排除於權利範圍之外。</p> <p>五、將涉及公共利益之非營利使用行為排除於權利範圍之外，參酌 WIPO/GRTKF/IC/7/6 文件之規定予以定之。</p>
--	--

第三章 原住民族傳統知識資料庫

<p>第十一條（登記機關及登記申請人）</p> <p>傳統知識所屬之原住民族或部落，得將其傳統知識中欲公開之部分，登記於原住民族傳統知識國家資料庫；其不欲公開之部分，得登記於原住民族傳統知識部落資料庫。</p> <p>前項之原住民族傳統知識國家資料庫，由本法第四條所稱之專責機關成立之。原住民族傳統知識部落資料庫由主管機關協助部落會議成立之。</p> <p>第一項未公開之傳統知識內容應予以保密。</p>	<p>為維護及保存傳統知識，故參考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及太平洋區域傳統生態知識、創新及實施之保護模範法（Model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Innovations and Practices）之規定，建立國家與地方部落兩級制資料庫，由傳統知識所屬之原住民族或部落主動登記。</p> <p>原住民族傳統知識國家資料庫由第四條之專責機關加以成立，原住民族傳統知識國家資料庫屬公開資料庫，而部落資料庫由主管機關協助部落會議成立，登記於部落資料庫之傳統知識並不公開，並應予以保密。</p>
<p>第十二條（資料庫之設置）</p>	<p>授權主管機關另以辦法規範原住民族傳統知識資料庫之建置及運</p>

<p>原住民族傳統知識資料庫之建置、運作、管理、取得及保密辦法，由主管機關另訂之。</p>	<p>作、管理、取得及保密原則。</p>
<p>第四章 未公開傳統知識之調查與使用</p>	
<p>第一節 調查與使用之同意</p>	
<p>第十三條 (使用未公開傳統知識之基本原則)</p> <p>就未公開之傳統知識之調查或使用，應符合原住民族權益、公共利益及永續發展等原則。</p>	<p>調查或使用應符合原住民權益，公共利益及永續發展，為傳統知識調查或使用之最高原則。參酌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四條。</p>
<p>第十四條 (申請調查或使用)</p> <p>調查或使用未公開之傳統知識者，應事先向原住民族會議或部落會議提出申請，徵得其同意，並簽訂調查或使用契約後，始得為之。</p>	<p>為徵得原住民族或部落的事先同意，應提出申請並訂定契約，參照生物多樣性公約 UNEP/CBD/WG8J/3/6 與原住民族和部落參與決策的過程以及交流機制的能力建設。</p>
<p>第十五條 (調查申請文件)</p> <p>申請調查傳統知識，應備具申請書及調查計畫書。</p> <p>申請書之格式與應記載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p> <p>第一項之調查計畫書應記載下列事項：</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 調查目的。 二、 調查地、調查之對象、調查進行之期間與方式。 三、 擬蒐集之生物或非生物材料。 四、 預期調查成果及其用途。 五、 定期報告及結案報告之日期。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 關於申請調查所需要之文件，參考安地斯組織第 391 號決議、哥斯大黎加「生物多樣性法」等立法例。本法參照上述規定，僅明文要求申請人出具申請書表明申請之意願，並以調查計畫書說明其所欲從事之調查活動相關內容細節，以做為原住民族或部落審核之依據。 二、 申請書之格式與應記載事項，純屬主管機關作業上考量，故於第二項明文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 三、 調查計畫書乃原住民族或部落審核之重要依據，應揭露關於調查活動之各種細節。

	<p>本法列舉四款較為重要之項目作為調查計畫書之應記載事項。爰規定於第三項。</p>
<p>第十六條（使用申請文件）</p> <p>申請使用傳統知識，應備具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p> <p>申請書之格式與應記載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p> <p>第一項之使用計畫書應記載下列事項：</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 使用之傳統知識。 二、 使用目的。 三、 使用地、使用進行之期間與方式。 四、 預期使用成果及其用途。 五、 定期報告及結案報告之日期。 <p>具商業目的之使用計畫，除提出第一項之文件外，並應備具商業利用說明書及利益分享方式。</p>	<p>關於申請使用所需要之文件，本法明文要求申請人出具申請書表明申請之意願，並以使用計畫書說明其所欲從事之使用傳統知識相關內容細節，以做為原住民族或部落審核之依據。</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 申請書之格式與應記載事項，純屬主管機關作業上考量，故於第二項明文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 二、 使用計畫書乃原住民族或部落審核之重要依據，應揭露關於使用活動之各種細節。本法列舉五款較為重要之項目作為調查計畫書之應記載事項。爰規定於第三項。 三、 於具商業目的之使用計畫，配合利益分享之原則，宜於申請時提出商業利用說明書以及利益分享方式。爰規定於第四項。參考祕魯 27811 號法律第七條。
<p>第十七條（調查或使用契約內容之協議）</p> <p>調查或使用契約之內容，由原住民族會議或部落會議與申請人協議決定之。</p> <p>主管機關應協助原住民族或部落進行前項之協議。</p> <p>具商業目的之使用，其契約內容應包含利益分享條款。</p> <p>原住民族或部落得遴選代表協商契約之內容。</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 根據契約自由原則，原住民族會議與申請人應經由充分協議以達成契約內容之共識。爰規定第一項。 二、 原住民族或部落會議與申請人協議之進行，於訂立契約之技術事項主管機關應主動協助進行。參考生物多樣性公約，文件 UNEP/CBD/WG8J/3/7。參照巴拿馬第二十條及行政命令

	<p>第二條第十三項、行政命令第十七條；菲律賓 Community Intellectual Rights Protection Act 第六條。爰規定第二項。</p> <p>三、具有商業目的之使用，在相關契約內容應包含利益分享條款，以期能保障原住民族或部落的權益。參考祕魯 27811 號法律第七條。爰規定於第三項。</p> <p>四、原住民族或部落得自治，經由部落會議遴選適任代表參與協商契約之內容，原住民族或部落之最後決定權，仍歸於原住民族會議或部落會議。爰規定第四項。</p>
<p>第十八條（訂約時應考慮之原則）</p> <p>原住民族會議或部落會議於訂立契約時，應評估所申請之調查或使用計畫對原住民傳統生活、文化、社會、環境，以及其他對部落權益可能之影響。</p> <p>主管機關應協助原住民族或部落進行前項之影響評估。</p>	<p>一、原住民生活相關開發活動進行時應該評估文化、環境和社會影響。參考生物多樣性公約中 UNEP/CBD/WG8J/3/5，2004 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七次會員大會所訂定之「Akwé：Kon 自願性準則」。</p> <p>二、主管機關具有較充裕的資源，應主動提供協助以進行前項評估。</p>
<p>第十九條（利益分享之原則）</p> <p>未公開之傳統知識經商業使用所得之直接或間接利益，應以合理公平之方式，由相關部落共同分享之。</p> <p>前項利益之分享，得約定以金錢或非金錢之方式給付之。</p>	<p>一、參考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條第八款，開發所獲得的利益，應與提供遺傳資源的締約國公平分享，爰作本條之規定。</p> <p>二、利益分享可以包括：分享利潤、給付使用費、技術移轉、提供產品，以及進行人力資</p>

<p>以金錢方式給付利益者，得一次或分次給付之。</p> <p>以非金錢方式給付利益者，得以提供資訊、技術、培訓或其他方式為之。</p>	<p>源能力建設等。參考巴西 2001 年 8 月 23 日第 N.2186-16 號臨時措施第 25 條。</p> <p>三、從生物資源和相關傳統知識的獲得中預期可得利益的性質，大致可以分為兩類：金錢利益和非金錢利益。《波恩準則》附錄 II 中載有這兩者的提示性清單。由於在某些情況下直接向原住民族/部落給付金錢利益可能有所不便或不妥，因此可以考慮其他形式的利益。CBD 8(j) 第 3-7 會議中提到：獲得與利益分享安排應該考慮非金錢利益。這一類利益可以採取能力建設的形式，包括提供資訊、技術和培訓等，以扶植當地新行業的發展，並進而實現可持續經濟增長。</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二節 監督機制</p>	
<p>第二十條 (傳統知識調查者之義務)</p> <p>依本法申請調查傳統知識者，應依計畫內容按期向部落會議提交調查報告。</p> <p>前項調查報告應包含調查過程，與所調查結果之完整書面及影音記錄資料。</p>	<p>一、為使原住民族或部落得定期知悉調查之進度，申請調查者應定期提交報告，爰規定本條。</p> <p>二、調查結果應記錄原住民或部落的意見。除了用書面表達，還應將調查結果透過錄影或錄音記錄下來以除去語言障礙的因素。參考生物多樣性公約 UNEP/CBD/WG8J/ 3/5，「Akwé：Kon 自願性準則」規定。</p>
<p>第二十一條 (傳統知識使用者之義務)</p>	<p>一、為使原住民族或部落得定期</p>

<p>依本法申請使用傳統知識者，應依計畫內容按期向部落會議提交使用報告。</p> <p>前項使用報告應包括傳統知識發表、出版或其他商業利用之完整資料。</p>	<p>知悉申請者之使用進度，申請使用者應定期提交報告，爰規定本條。</p> <p>二、若使用的方式為發表或出版的形式，應該要有完整的資料，以供原住民或部落確保其傳統知識之正確被使用。</p>
<p>第二十二條 （未經代表機關事先同意之再授權限制）</p> <p>依本法申請使用傳統知識者，非經傳統知識所屬之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不得將其使用權轉讓與第三人。</p> <p>違反前項規定之讓與行為，無效。</p>	<p>為保障傳統知識所屬之原住民族或部落，申請並得同意之傳統知識使用者，不得再將其使用權利轉讓予第三人。參照巴拿馬行政命令第二十二條、秘魯第三十三條、太平洋模範法第十一條。</p>
<p>第二十三條 （秘密性之維護）</p> <p>原住民族或部落之成員，非經原住民族會議或部落會議之同意，不得將未公開之傳統知識洩露或交付予該知識所屬之原住民族或部落以外之人。</p> <p>違反前項規定者，依原住民族或部落之規範或習慣處理之。</p> <p>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未公開之傳統知識者，不得將之洩露或交付他人。</p>	<p>一、原住民族或部落之成員應認識到他人擬調查或使用皆須經過申請，由原住民族會議或部落會議同意、簽訂契約等步驟，才得以調查或使用其傳統知識，爰規定第一項。</p> <p>二、若違反第一項之原則，係屬原住民族或部落自治之事項，本法不予干預。</p> <p>三、因資料庫或因辦理申請業務而知悉未公開之傳統知識者，應該謹慎遵守第一項，不得將傳統知識未經同意而洩漏或交付於他人，參考太平洋區域保護傳統生態知識、創新及實施模範法第十一條。爰規定第三項。</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五章 延續及創新傳統知識之方法</p>	
<p>第二十四條 （傳統知識之教育）</p> <p>主管機關應提供適當之教育與培訓，促進</p>	<p>一、傳統知識之保護，首重其傳承，因此適當之教育及培訓相關人才乃為必要，故課與</p>

<p>原住民對傳統知識及其保護制度重要性之瞭解，以達成傳統知識保護、永續利用及創新之目的。</p> <p>原住民族地區各級各類學校相關課程及教材之設計，應提供學生學習傳統知識之機會，課程內容應與部落生活相結合，並應包括校外教學。</p> <p>前項課程屬於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三條第三項所稱之民族教育事項，其規劃應符合部落自主之精神。</p> <p>原住民族之各級各類學校或其他推廣教育機構為實施前二項傳統知識之教學或培訓，得由部落會議遴選原住民族耆老或具相關專長人士教導之。</p> <p>主管機關應訂定辦法獎勵前項之耆老或具相關專長人士。</p>	<p>主管機關提供適當教育與培訓之義務。爰參考「Akwé：Kon 自願性準則」，規定於第一項。</p> <p>二、第二、三項參考生物多樣性公約會議 UNEP/CBD/ WG8J/3/4 文件，要求學校相關之課程及教材應酌情納入傳統知識。然而考慮傳統知識與環境共生共榮之本質，因此引用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三條之精神，強調傳統知識相關課程應由部落主導，加強校外之生活教育。</p> <p>三、傳統知識的傳承仰賴口耳相傳，耆老或具相關專長原住民之教導，較諸課本更為有效。爰於第四項規定由部落會議遴選適當之傳統知識傳承師；為表示對傳承師之尊重，第五項規定主管機關訂立相關之獎勵辦法。</p>
<p>第二十五條 （輔導、獎勵與補助）</p> <p>主管機關應輔導、獎勵與補助原住民維持其基於生物多樣性知識之傳統生活。</p> <p>前項輔導、獎勵與補助之措施，由主管機關另以辦法訂之。</p>	<p>保護傳統知識，除在教育上設計傳承機制，使之得以相傳以外，原住民維持慣習生活方式，使生活與環境之互動得以繼續，更是傳統知識創新知之所賴。然而現今依慣習之生活方式，已無法維持生計，因此本條明訂主管機關輔導、獎勵與補助之義務。</p>
<p>第二十六條 （載明來源地）</p> <p>依本法申請使用傳統知識並經開發者，於申請專利時，除依專利法規定外，應事先經</p>	<p>本法規範傳統知識來源揭露之目的係為了防止傳統知識被剽竊，且為傳統知識有效管理之必要措施，但為避免傳統知識來源之揭</p>

<p>該傳統知識所屬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且於其申請書載明所使用傳統知識之來源地，並提出與該原住民族或部落訂定之契約。</p>	<p>露與專利作過多的連結，是以未依規定揭露傳統知識來源者並不影響專利之授予，違反之法律效果，完全依本法之規定處理。</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六章 民事救濟與罰則</p>	
<p>第二十七條 （民事救濟）</p> <p>違反本法規定，致侵害原住民族或部落之權益者，原住民族或部落得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p>	<p>基於傳統知識之抽象特性，及傳統知識之權利歸屬於原住民族或部落，因此違反本法規定而侵害該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傳統知識權益者，應賦予該原住民族或部落有向侵害人請求損害賠償、排除侵害與請求防止侵害之權利，爰制訂本條規定。</p>
<p>第二十八條 （以不正當方式使用傳統知識之處罰）</p> <p>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就傳統知識取得智慧財產權或主張其他權利，或以不正當方式使用傳統知識者，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p>	<p>基於原住民族或部落對其傳統知識發展與使用之關係，以及為維護原住民族或部落之聲譽及尊嚴，爰制定違反本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者，應予處罰。</p>
<p>第二十九條 （未經同意而揭露、取得或使用未公開傳統知識之處罰）</p> <p>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未經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而揭露、取得或使用未公開之傳統知識者，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停止使用，逾期不停止使用者，得按次連續處罰。</p>	<p>傳統知識之權利歸屬於發展該知識之原住民族或部落，因此若未經其同意而揭露、取得或使用未公開之傳統知識者，應予處罰。經通知限期停止使用仍不停止者，得按次連續處罰。</p>
<p>第三十條 （未經同意而調查或使用之處罰）</p> <p>未依本法徵得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而從事傳統知識之調查者，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停止，逾</p>	<p>為保障原住民族或部落之權益，故未徵得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訂定契約而擅自對傳統知識進行調查或商業上使用者，應予處罰。且因商業上使用行為可能已經獲取利益，故對此規範較高之罰鍰額度。經通知限期停止仍不</p>

<p>期不停止者，得按次連續處罰。</p> <p>未依本法徵得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而從事傳統知識之商業使用者，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停止，逾期不停止者，得按次連續處罰。</p>	<p>停止者，得按次連續處罰。</p>
<p>第三十一條 （逾期未改正之處罰）</p> <p>違反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一條之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改正，逾期未改正者，得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之罰鍰。</p>	<p>違反本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一條未為報告之規定，可能使該原住民族或部落處於資訊不對等之地位，不利其對傳統知識之管理與保存，爰制訂本條規範其處罰。</p>
<p>第三十二條 （違反職務上保密義務之處罰）</p> <p>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未公開之傳統知識而洩露或交付之者，處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p>	<p>為避免原住民族或部落未公開之傳統知識被不當洩露，爰參考刑法第 132 條規定職務或業務上保密義務，若有違反應予處罰。</p>
<p>第三十三條 （違反專利申請規定之處罰）</p> <p>違反第二十六條之規定，未於專利申請書載明傳統知識之來源地者，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p>	<p>為維護傳統知識之完整、避免被盜用，以及便於專利審查機關審查相關專利，乃課予專利申請人有說明其所使用相關傳統知識來源地之義務，若有違反應予處罰。</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七章 附則</p>	
<p>第三十四條 （施行細則）</p> <p>本法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p>	
<p>第三十五條 （施行日）</p> <p>本法自公布日施行。</p>	

臺灣地區陸域野生動物保育等級調整表(新增 17 種，移除 8 種)

變動情形	哺乳類	鳥類	兩棲爬蟲類
一般類調升為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	無	林三趾鶉、臺灣朱雀、長尾鳩、紅腰杓鶉、栗背林鶉、黃胸薺眉、白耳畫眉、黑頭文鳥、冠羽畫眉、岩鶉、董雞、黑尾鶉、大濱鶉及紅腹濱鶉自一般類野生動物調升為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計 14 種。	草花蛇 1 種。
一般類調升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	無	青頭潛鴨、金鵝，計 2 種。	無
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調升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	水鼩 1 種	琵嘴鶉 1 種	無
珍貴稀有野生動物調升為瀕臨絕種野生動物	無	無	食蛇龜、柴棺龜，計 2 種。
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調降為一般類	臺灣獼猴、山羌及白鼻心，計 3 種	大田鶉，計 1 種	眼鏡蛇、龜殼花、雨傘節、短肢攀蜥，計 4 種。
珍貴稀有野生動物調降為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	棕簑貓、黃喉貂、臺灣野山羊、臺灣水鹿，計 4 種。		
瀕臨絕種野生動物調降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		黃鶉、林鶉、遊隼，3 種	金龜、阿里山山椒魚，計 2 種。

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修正規定

說明：

一、名錄中保育等級符號說明如下：

I：表示瀕臨絕種野生動物

II：表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

III：表示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二、本名錄包括之物種以下列方式表示：

(一) 物種學名(中文名稱僅供參考)。

(二) 比種較高階之分類元中的所有物種或其中被指定的部分物種。

三、縮寫字『spp.』係代表在某一比種較高階之分類元中的所有物種。

四、名錄中其他出現與保育物種相關之種較高階分類元，係作為查詢相關保育物種分類之參考。

Interpretation：

1. Protected Species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I：Endangered Species

II：Rare and Valuable Species

III：Other Conservation-Deserving Wildlife

2. Species included in the list are referred to:

a. by the name of the species. (The Chinese common name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b. as being all of the species included in a higher taxon or designated part thereof.

3. The abbreviation 'spp.' is used to denote all species of a higher taxon.

4. Other references to taxa higher than species are for the purposes of information or classification only.

<i>Pseudochelidon sirintarae</i>	白眼河燕	I
Icteridae 擬黃鸝科 Blackbird		
<i>Xanthopsar flavus</i>	橙頭黑鸝	I
Laniidae 伯勞科 Shrikes		
<i>Lanius cristatus</i>	紅尾伯勞	III
Leiiothrichidae 噪眉科 Laughingthrushes		
<i>Actinodura morrisoniana</i>	紋翼畫眉	III
<i>Garrulax canorus</i>	畫眉	II
<i>Garrulax taewanus</i>	臺灣畫眉	II
<i>Ianthocincla poecilorhyncha</i> (Synonym : <i>Garrulax poecilorhynchus</i>)	棕噪眉(竹鳥)	II
<i>Ianthocincla ruficeps</i> (Synonym : <i>Garrulax albigularis</i>)	白喉噪眉(白喉笑鸝)	II
<i>Liocichla omeiensis</i>	灰胸薮鵲	II
<i>Liocichla steerii</i>	黃胸薮鵲	III
<i>Heterophasia auricularis</i>	白耳畫眉	III
Meliphagidae 食蜜鳥科 Honeyeater		
<i>Lichenostomus melanops cassidix</i>	頭盔食蜜鳥	II
Monarchidae 王鵲科 Monarch flycatchers		
<i>Terpsiphone atrocaudata</i>	紫壽帶(綬帶鳥)	II
Muscicapidae 鶇科 Old World flycatchers		
<i>Myiomela leucura</i> (Synonym : <i>Cinclidium leucura</i>)	白尾鶇	III
<i>Cyornis ruckii</i>	魯克氏仙鶇	II
<i>Dasyornis broadbenti litoralis</i> (possibly extinct)	棕色刺鳥(可能已滅絕)	I
<i>Dasyornis longirostris</i>	長尾刺鳥	I
<i>Enicurus scouleri</i>	小剪尾	II
<i>Niltava vivida</i>	黃腹琉璃	III
<i>Phoenicurus fuliginosus</i> (Synonym : <i>Rhyacornis fuliginosus</i>)	鉛色水鶇	III
<i>Picathartes gymnocephalus</i>	禿頭岩鶇	I
<i>Picathartes oreus</i>	灰頭岩鶇	I

從環境正義觀點看原住民的狩獵文化

紀駿傑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壹、環境正義的基本主張

自從它在 1980 年代被提出以來，環境正義的觀點與研究取向就廣為全球，尤其是美國的環境學者與環境運動者所支持與引用。影響所及，美國政府也在 1994 年由克林頓總統頒佈了名為「聯邦政府針對少數民族與低受入人民的環境正義議題之行動」的行政命令。此行政命令除了責成各級政府需關注其施政範圍內環境正義原則的尊奉之外，並組織一個跨部門的環境正義委員會來統籌相關事項的推行（引自 bryant, 1995b: 221-6）。

截至目前為止，已有相當多有關環境正義的理論性及經驗性研究出現(如：bullard, 1990, 1993b; capek, 1993; hofrichter, 1993; bryant, 1995b)。雖然不同的學者對於環境正義有不盡相同的見解，但他們的基本觀點都是大同小異的。bryant 主張，環境正義是有關「由文化規範與價值、法則、規則、行為、政策、以及決斷力來支持的永續社區，在此社區裏的居民可以放心的在一個安全的、滋養的與有生產力的環境之下互動」(bryant, 1995a: 6)。本文作者則認為，環境正義觀點最重要的面項在於表達下述主張：(a) 人類社會在大量的剝削大自然以創造物質文明，產生交換價值及累積資本之餘，其所產生的社會不可欲物質（包括垃圾、有毒廢棄物、核廢料等），往往被社會中（或國際上）的強勢群體及資本家以各種手段強行迫使弱勢群體接收及承擔；(b) 由於生產與消費的無止境擴張，各種資源漸行匱乏，弱勢群體於是被迫限制或禁止使用這些資源。然而這些弱勢群體本來就已經是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受害者（實質不正義），他們對各種危害也最缺乏認識與最不具抵抗力；如今卻仍得在非自願的狀況下遭受各種由生活環境的毒害所帶來的威脅以及資源的限制使用（程序不正義），可說是雙重的社會不正義。然則，也正是因為強勢群體可以恣意地、廉價地解決廢物與取得資源，他們便不須立即面對及有效的處理這些廢物與資源匱乏的問題，地球環境也就一天天的遭受破壞。基於此，環境正義的基本主張包括少數民族及弱勢團體有免於遭受環境迫害的自由，社會資源的平均分配，資源的永續利用以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質，及每個人、每個社會群體對乾淨的土地、空氣、水，和其他自然環境有平等享用權的權利。

環境正義觀點雖然反對弱勢群體的家園被當成社會中的垃圾場，它的終極目標卻不是將這些社會不可欲的垃圾及有毒廢物送回原生產者（雖然這可以是其達成終極目標的手段），而是從根本防止不當資源剝削行為的

發生及危害環境之廢棄物的生產與擴散。人類對待大自然的方式終究會複製於人群間的關係；當有一些企業肆無忌憚的剝削與破壞大自然時，必定會有另一些弱勢群體要被迫承受後果。因此，唯有當人類社會能以一個新的、友善的態度與永續經營的方式對待大自然，人類社會之間的剝削關係才有可能獲得改善。基於上述的信念，美國第一屆「全國有色人種環境領袖會議」(first national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ummit)在 1991 年十月草擬了一份〈環境正義基本信條〉，在十七個條文中包括下列各項：

- 1、環境正義確認地球之母的神聖性，生態調和，物種間的互賴性以及他們免於遭到生態摧殘的自由。
- 2、環境正義要求公共政策是基於所有人種的相互尊重與正義而制訂，去除任何形式的歧視與偏見。
- 3、環境正義要求我們基於人類與其它生物賴以維生的地球永續性之考量，以倫理的、平衡的以及負責的態度使用土地及可再生資源。
- 4、環境正義呼籲普遍保障人們免於受核子試爆及採取、製造、和棄置有毒廢棄物與毒品之威脅；這些威脅侵犯了人們對於享有乾淨的空氣、土地、水及食物之基本權利。
- 5、環境正義確認所有族群有基本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環境之自決權。
- 6、環境正義要求停止生產所有的毒素、有害廢棄物及輻射物質，而過去及目前的生產者必須負起全責來清理毒物以及防止其擴散。
- 7、環境正義要求在所有決策過程的平等參與權利，包括需求評估、計畫、付諸實行與評估。
- 8、環境正義強調所有工人享有一個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而不必被迫在不安全的生活環境與失業之間做一個選擇的權利。它同時也強調那些在自家工作者免於環境危害的權利。
- 9、環境正義保障環境不正義的受害者收到完全的賠償，傷害的修繕以及好的醫療服務。
- 10、環境正義認定政府的環境不正義行為是違反聯合國人權宣言及聯合國種族屠殺會議（convention on genocide）的行徑。
- 11、環境正義必須認可原住民透過條約、協議、合同、盟約等與美國政府建立的法律及自然關係來保障他們的自主權及自決權。
- 12、環境正義主張我們需要都市與鄉村的生態政策來清理與重建都市與鄉村地區，使其與大自然保持平衡。尊重所有社區的文化完整性，並提供公平享用所有資源的管道。
- 13、環境正義要求嚴格執行告知(被實驗/研究者)而取得其同意的原則，並停止對有色人種施行生育、醫療及疫苗的實驗。
- 14、環境正義反對跨國企業的破壞性行為。
- 15、環境正義反對對於土地、人民、文化及其它生命形式實施軍事佔領、

壓迫及剝削。

16、環境正義呼籲基於我們的經驗及多樣文化觀，對目前及未來世代進行社會與環境議題的教育。

17、環境正義要求我們個人做出各自的消費選擇，以消耗最少地球資源及製造最少廢物為原則；並立志挑戰與改變我們的生活型態以確保大自然的健康，供我們這一代及後代子孫享用。(hofrichter, 1992: 236-9，作者譯)

這些信條包含了廣闊的國內及國際間的環境議題，並道出了人類與自然間關係的基本主張。由這些條文中，我們也可以確定環境正義的命題是具有高度規範性意義的。它一方面關懷自然環境被人類破壞，另一方面更是認為強勢族群與團體對於弱勢者的迫害是造成自然環境破壞的主要原因。因而，它主張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平等而和諧的對待；任何違反此原則的行為與主張，都是它所批判與打擊的對象。

此外，環境正義也必然是關乎各種政治經濟不平等之去除的要求與行動。前述少數民族或弱勢團體的家園之所以成為強勢群體環境殖民的對象，最主要的客觀原因便是兩者間的不平等。強勢團體藉著優勢的政治經濟甚至軍事力量，對於弱勢團體的土地與資源之使用權與使用方式行使主導權或根本的搶奪，而後者往往沒有能力來反抗這種環境入侵。更有甚者，愈是貧窮地區的人民，愈有可能基於眼前的經濟利益而接受各種半強迫、「飲鴆止渴」式的環境殖民，如接受有毒廢料或核廢料的掩埋。因此，許多環境正義學者都主張，唯有去除貧窮，減低社會及國際的各種不平等，環境正義的目標才能逐漸達成 (bullard, 1990; bryant, 1995a)。即使短期內這些要求平等的實質正義目標無法達成，我們也有必要透過程序正義的手段來達到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環境權益。

capek(1993)便提出個人，社區或少數民族在面對可能的環境不正義時，應有的四個基本權利，他們是：(1) 充分資訊的權利 (2) 公開聽證的權利 (3) 民主的參與及社區團結 (4) 賠償的權利。這些基本權利的提出，除了最主要在保障居民的自主性、資訊權與參與權的程序正義之外，也兼顧了萬一居民受害時應得到的補償之實質正義。不過，作者認為 capek 至少應再加第五個基本權利才較符合環境正義的基本精神，那就是**污染清除與被破壞環境復原的權利**。如此一來，不但能確立政府或污染者/破壞者必須負起生態回復的責任，當地居民的長久環境安全也才能得到保障。由於環境正義的議題在過去十年間在族群關係極端敏感的美國社會引起了廣泛的關懷，美國政府也在 1994 年由克林頓總統頒佈了名為「聯邦政府針對少數民族與低收入人民的環境正義議題之行動」的行政

命令。此行政命令除了責成各級政府需關注其施政範圍內環境正義原則的尊奉之外，並組織一個跨部門的環境正義委員會來統籌相關事項的推行（引自 bryant, 1995b: 221-6）。當然，上述措施固然是一個好的開端，環境正義並不會因為政府的這些措施而得到應有的關注。況且，這道行政命令的影響力僅止於美國國內政府機構。對於私人企業的作為，以及眾多跨國企業在全球持續進行的環境殖民行徑，如輸出有毒廢物、煙草，中南美洲的農業殖民，以及全球各地的開採礦產等，並不具任何的約束力。環境正義的實踐，仍是必須仰賴民眾的積極行動才可能獲致。在全球眾多的環境（不）正義議題中，原住民所遭受的迫害可說是最大的。

貳、全球原住民概說

一般而言，原住民泛指在一地居住數代以上，有獨特的語言，風俗，習慣，過著與該國強勢族群不同的，且較少使用現代科技的生活方式。根據一項統計，目前全球約有五至六千個原住民族群，散布於各大洲、諸島嶼(durning, 1992)。從冰冷的北極到炙熱的沙漠；從全球物質生活最富裕的北美、歐洲到最貧窮的非洲都有原住民的蹤跡，其中尤其以熱帶雨林區最多。然而，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原住民的生活領域已經比五百年前歐洲白人開始大肆掠奪全球土地與資源之前減少大半了。原住民過去曾佔有全球絕大多數土地，現在則依不同的定義，僅保有地表的百分之十二到十九的土地。就人口而言，它們的數量約在兩億到六億之間，視我們是否包括一些未建立國家的大族群，如庫得族、藏族、祖魯族等(davis, 1993; durning, 1992)。

原住民在過去由於生活方式簡單，且大都仰賴當地自然資源維生，他們與周遭環境多能保持和諧的關係，不至於大肆破壞當地生態。然而，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廣化和深化，他們舊有的生活方式甚至族群的生存都飽受威脅。近年來，國際社會逐漸重視原住民的生存權及他們所能提供現代社會學習與醒思的地方。而 1992 年的地球高峰會及 1993 年的國際原住民年都在提醒視人必須重視原住民的生活及他們傳統知識的貢獻。然而，這些呼聲卻抵擋不住資本主義的巨輪，每年在全球各地仍有許多原住民族遭受不同的摧殘。

原住民族群的遭迫害不但是嚴重的人權問題，它也是全人類寶貴文化遺產的消失，以及重要生態知識的從此消失。更有甚者，一旦全球原住民族群被資本主義社會所吞噬，他們長期所捍衛的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及提供人類社會文化活力的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將隨之消失。如此一來，人類社會的生存及文化的延續都將被受威脅。從生態的觀點而言，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地表上非原住民居住與活動的自然環境大都已

經被人類破壞殆盡，而唯有原住民傳統活動領域內的生態體系得以被完整的保留下來。這些生態體系也因此成為全球生物多樣性的最後堡壘。國家地理雜誌在 1992 年完成的一項中美洲原住民與森林研究就證實了巴拿馬 kuna 原住民對該地所說的話：有森林的地方就有原住民；有原住民的地方就有森林(durning, 1992)。同樣的，從南美的亞馬遜河流域到非洲、東南亞、及新幾內亞的熱帶雨林裡都居住著一群群的原住民部落。而熱帶雨林正是目前全球生物多樣性的最重要區域。換句話說，原住民是全球生物最多樣地的捍衛者，由於他們的存在，維繫自然生態體系的動植物基因庫的保存才有可能。此外，原住民在雨林裡和在高山上也肩負了保護水源，維持氣候穩定的功能。

除了上述原住民以他們的生活方式保存了完整的生態體系與維持生物多樣性之外，由於他們長期與大自然互動，他們對於當地生態環境有著豐富的知識。這些包括四時的運行、氣候的變化、動物昆蟲的習性、植物的藥用等等寶貴的知識都保留在他們語言、風俗習慣與生活中。「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就強調原住民能提供現代社會關於森林、山地、旱地等複雜的生態區資源管理的經驗(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12)。而由於絕大多數原住民並未發展出書寫文字，他們對於自然生態的知識並不容易被外人所知悉與流傳。因此，當原住民族群逐漸消失時，他們也將帶走這些千百年來所累積的寶貴生態知識。

參、全球原住民所共同面臨的危機

即使有著上述對全球人類的多重意義，原住民目前在世界各地仍遭受各種無情的迫害，甚至滅族的威脅。這些迫害與威脅主要來自下列：

(一) 外來人口的侵入與逼近(encroachment)及強勢文化的滲入

由於大多數開發中國家耕地分配不均，人口增加迅速，農業用地愈來愈顯不足，原住民的家園便成為各方覬覦的焦點。在此同時，這些國家的政府往往也漠視，甚至鼓勵外人的入侵。以巴西為例，這個百分之十的富人擁有百分之九十的土地的國家，許多沒有耕地的農民只好前往原住民居住的亞瑪遜林區砍伐樹木以成為農地與牧場。巴西政府在過去非常鼓勵民眾的這種行徑，因為它可以延遲國內對於土地改革要求的壓力(adams, 1990)。我們將在待會對這點作更深入的探討。外來人口的入侵，使得原住民的活動領域逐漸減少，生計更形困難，甚至因傳染病、與外來者的衝突等而導致族群存亡的危機。此外，強勢文化挾其優越的資源，藉宗教、教育系統及大眾傳播媒介滲入原住民部落，對原住民傳統文化造成強大的衝擊，甚至導致政治組織與文化信仰解組，人們無

所是從。上述現象尤其是容易造成年長者與年輕一輩之間的「隔代衝突」(linden, 1991)

(二) 政府有計劃的消滅原住民族群

目前，全球仍有少數國家對其轄區內的原住民施與滅種或摧毀其語言、文化的措施。緬甸及瓜地馬拉的軍政府對於其國內的原住民實施計劃性的屠殺；印尼政府對於其佔領的東地汶人民的屠殺與壓迫，及中國對於其佔領的西藏實施大規模的計劃移民於摧毀其傳統文化均屬之(durning, 1992; cultural survival, 1993)。雖然國際社會對於上述國家的暴行不斷提出譴責，但似乎都不造成明顯的效果。

(三) 國家常以私有化及更有效使用為理由搶奪原住民土地

對全球多數原住民而言，土地並非一種商品，可被私人所擁有與買賣的。相反的，人才是被土地這「大地之母」所擁有；土地具有無可侵犯的神聖性及賦予活動於其上人民的生存與認同之泉源。同樣的，土地上的樹木、動植物，水裡的魚蝦等也不屬於人類的「資源」，而是與天、地、人息息相關的生命(beings)，共同構築了社會與精靈世界(davis, 1993)。即是我們認為無生命的山岳、河流與石頭，都被虔敬的對待，如同西雅圖酋長視河流為兄弟，山岩峭壁為一家人一般。

因此，相對於市場經濟下的土地私有化原則，原住民僅有對土地共同經營、使用的「部族共享」制，而無地契、所有權狀等土地私有制下的文件。然而，多數國家的政府並不認可原住民對其世代居住領域內土地的共同擁有權，即便原住民的擁有權被認可，他們也往往不受到尊重與保護。國家往往以「國有化」的名義接管原住民所居住的森林、水域，結果不但造成原住民經濟、社會、文化的崩解，更加速了該地的森林砍伐與各種資源的剝削(durning, 1992)。

此外，全球許多原住民仍實施傳統的燒墾與游耕，讓土地可以休養生息，而不過度剝削。然而，在強勢民族看來，這些土地並沒有被好好的利用，並以此名目而將其收歸國有或轉為私人所有。在這種外人虎視眈眈的壓力之下，有些原住民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而作了違反傳統土地經營的措施。例如瓜地馬拉原住民為證明土地是他們所有且正有效的被使用，只好將森林砍伐並開闢為他們並不真正需要的牧場

(四) 所謂的「開發」，包括森林砍伐、採礦、水力資源利用（水庫、發

電廠)、放牧等行為。

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及深度化正發展到了巔峰(巔瘋?)，而此時期的特性之一便是，過去幾百年的擴張行動，已經將地球表面容易獲取的資源消耗殆盡，因而必須更深入高山上、雨林裡、偏遠地區尋求新的耕地、牧場、礦藏、原木、水資源等物質。然而，這些地方又往往是原住民長期居住也是他們唯一能適應的家園。主流社會的「開發」行為，往往也就代表著原住民的浩劫。「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中就強調，「人類社會正進行著一極度諷刺的現象，當發展擴及雨林、沙漠、及其他孤立的環境之後，它傾向於將唯一能在此環境下生存的文化給摧毀掉」(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115)。

在南美的厄瓜多爾，石油的開採加上外人的入侵正嚴重的威脅 quichua 族人的生存(macdonald, et al., 1993)。在印尼所屬的西部新幾內亞，印尼政府執意開發當地的木材，並建築了許多道路貫穿這個饒富生物多樣性的原始森林及原住民生活的地方。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一個將會淹沒近三分之一個台灣大的水庫計劃 james bay project 正威脅著當地的 cree 族的生存。該族的一位酋長就曾喧稱：「唯一有資格在我們土地上建水庫的是水獺。」

(五) 以成立國家公園及保護區的名義，侵佔原住民的歷史家園，並限制原住民的許多傳統活動，包括傳統狩獵行為。

由於國際保育的呼聲逐漸升高，全球各國紛紛在近幾十年來成立國家公園及野生動物保護區。然而，就如同前述的開發現象一般，國家公園及保護區一定是選在偏遠的地區及高山上，人類活動較不頻繁的區域。這些區域，往往又是原住民的家園與活動場域。在「生態保育」的美名之下，原住民往往被迫遷出家園及改變傳統生活習性(如禁止狩獵、採集野生植物等)，造成他們生計與文化上極大的傷害。

台灣的原住民在過去三百年來，也不斷的遭受到上述的各種影響，以至於原住民的處境一年不如一年，如今全台三十多萬的原住民多已淪為台灣社會經濟社會狀況最悲慘的居民。近一、二十年來，雖然來自前述一至三項的壓迫已少有發生，但第四、五項的壓力卻有增無減。水庫的興建仍持續威脅著許多原住民的傳統生活，如最近政府執意要推動的瑪家水庫就將淹沒才遷村不久的新好茶部落。而台灣在十年前開始陸續設立的玉山、太魯閣及雪霸國家公園更因佔用當地原住民傳統家園及獵場，並限制了他們的許多傳統活動，因而引起了原住民極大的反感，並不斷的招致反抗與衝突(紀駿傑、王俊秀，1995)。

肆、原住民為野生動物終結者的迷思(myth)

在過去幾年，台灣政府為了各種保育類動物及其產品在台灣買賣與使用而倍受西方社會的指責，一環保團體甚至指稱台灣為「犀牛終結者」。對於這些指責，作為國界社會一員的我們固然必須虛心檢討與改正，但「犀牛終結者」的封號，台灣卻是受之有愧。非洲犀牛的大量被捕殺，其實是從歐洲人到非洲殖民就開始了。殖民政府除了因擴展耕地而嚴重的侵害了犀牛的棲息地之外，當時到非洲狩獵的白人還有所謂獵「五大獸」的習慣，犀牛便是其中的一獸。等非洲國家在二次大戰後紛紛獨立了，非洲的犀牛也已經被大量的屠殺了。在南部非洲，犀牛甚至已經瀕臨絕種的命運了。這時，西方人的保育觀念開始慢慢建立，矛頭一轉，立刻喧稱仍鼓舞殘殺僅存犀牛的台灣、香港、葉門等國為「犀牛終結者」。同樣的，在台灣，原住民在山林裡與野生動物相處了數百年以上之久，都大致能保持野生動物種類與數量的平衡。其主要原因便是下文會提到的，原住民部落發展出來的生態倫理與狩獵文化。然而，自從外來的漢人、荷蘭人、日本人陸續來到之後，野生動物便開始遭受到空前的浩劫。這個現象，在 1949 年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更為迅速與嚴重。在一般人的想法裡，所謂的野生動物保護便是一隻隻看得見的動物，避免他們被殺害了。然則，這種保護野生動物的觀念只是另一個更重要、更高層次的保育觀念的其中一環而已，這便是護衛「生物多樣性」的觀念。而根據「生物多樣性」的觀念，保育需在下列三個層次著手：棲息地、物種、及基因多樣性 (mcneely, etc., 1990)。就棲地而言，顯而易懂得，野生動物要能存活，一定要有足夠的棲息地。而不同的物種所需要的棲息地（地形、氣候、生物等生存條件）種類都不一樣，因此唯有將各種不同的棲地做妥善的保護，各不同物種才有存活的空間。其次，維持物種多樣性也是保育的重要面向。物種之間存在著緊密的，環環相扣的食物鏈及其他依存關係。過去的歷史告訴我們，每當人類有心或無意的殺害或破壞了某一物種，許多意想不到的甚至災難性的連鎖反應便會發生。因此，保護物種多樣性是保育中極其重要的一環。最後是基因多樣性的保護，這也是前述一般人最容易有的保育觀念。有了足夠、安全的棲息地與其它物種多樣性的共存條件之後，一個野生動物還需要有足夠的族群數以保障與延續其基因的多樣性，該物種的長期存活才能得到保障。因此，對於族群數量稀少的物種施與保護措施，甚至利用人工繁殖（如中國進行的人工繁殖熊貓），引進外來族群（如美國黃石公園最近引進加拿大的野狼），都是屬於這個層次的保育措施。有了上述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觀之後，我們就不難找出台灣野生動物的真正終結者是誰了。愈來愈多的學者都再再指出，近幾十年來野生動物數量減少最大的原因來自棲地的破壞與減少，亦即上述第一類的破壞。首先，台灣山林裡錯縱複雜的林務局產業道路、公路將動物們的山林棲地切割得破破碎碎。而隨著道路

所到之處，各種破壞生態的活動也接踵而來（蕭新煌等，1993）。（山羌被汽車撞死了之後，我們竟然還厚顏的問：山羌為什麼要過馬路？）其次，在林務局於1989年改制為公務單位之前，森林砍伐是為該局的最主要功能。即便有重新造林，在大片的單一林相甚至外來種取代了原本複雜多樣的原生種的情形之下，野生動物也多半難以適應這新的人工環境。再者，開礦、築水庫、觀光設施與活動及山上的放牧、養殖與蔬果種植都再再的搶佔、破壞了野生動物的棲地，將他們逼得走投無路。而上述的行為，絕大多數都是由（漢人）政府所從事、主導、或默許的。棲地的大量減少與破壞之後，野生動物的數量自然也就跟著大量減少。而原住民獵殺了其中幾隻倖存的動物，卻要背上「野生動物終結者」的罪名，難怪往往他們談論起來，心理都忿忿不平。

在非洲的肯亞，有一很有名的遊牧民族叫馬賽人(maasai)。馬賽人以身材高大，驍勇善戰而聞名於東部非洲。然而，十九世紀末英國人殖民了東非地區之後便強佔了許多馬賽人的土地並試圖改變他們的生活。由於英國人只懂得定居的生活方式，並且認為此生活方式為較文明，因而希望將遊牧的馬賽人能逐漸定居在一個地方。此外，英國人也認為遊牧的馬賽人對東非大草原上的野生動物具有很大的威脅性，因而劃定了國家公園與動物保護區，並禁止馬賽人進入。然而，英國殖民政府的政策卻是忽視了馬賽人世代居住在該地，與該地自然環境、動植物建立了和諧相處，並善用自然資源的歷史事實。

馬賽人的遊牧生活正是適應東非大草原的乾溼兩季之特性，且藉由季節性遷移的手段，馬賽人不但順應大自然的韻律（而非改變大自然），而且對當地資源做最有效且永續的利用。此外，馬賽人長期以來以他們所飼養的牛肉、牛奶為主食，對於四周的野生動物很少加以殺害，反倒是由於他們的存在，動物們得到了相當大的保護作用。英國殖民者對於上述馬賽人與其周遭自然環境和諧相處的特色不了解且不加以研究，便貿然的採取了許多不當的措施，因而造成了許多嚴重的後果，包括迫使馬賽人與野生動物爭奪草原及水資源，引發人與動物的敵對關係，引來了動物保護區內的盜獵者，甚至曾有馬賽人故意殺害犀牛、大象等以洩忿的行為。因此，尊重當地居民的生活習性與生態智慧，應該是成功的保育措施之第一步(wells and brandon. 1992)。

伍、台灣原住民的狩獵文化

原住民能夠長期居住山林裡，使用當地的野生動植物而大體上不餘匱乏，其主要原因便是經過了千百年來的共同相處經驗，原住民透過各種方式與野生動物達成「動態平衡」。這些不同的方式，我們現在統稱之為「狩獵文化」。台灣原住民的狩獵文化的實質內容因不同族群所處的自然環境

及特殊文化習性而各不相同，但大體上包含了下列元素（參考黃應貴，1992；洪田俊，1995；裴家騏，1996；台灣原住民與自然資源關係研討會，1996）：

（一）獵區：原住民各部族都有各自的獵區，獵區之間很少有重疊，獵人們只能在自己的獵區內狩獵。在過去，若獵人越界打獵，很可能引來殺身之禍或部落之間的衝突。同一族群內也有依氏族而區分獵場的（如鄒族），非本氏族的獵人不得隨意侵入該氏族獵場，若因追趕動物而進入它氏族獵場，則捕獲的動物必須分給該獵場主人。獵區的劃定，一方面讓各部族能護衛各自的野生動物資源，另一方面也避免了過多的動物或同一種動物在短時間內於山林裡被補殺。

（二）獵團：原住民的狩獵活動並不是個人行為，而是一種社會行為。一般而言，部落裡的獵人都會組成獵團一起出去打獵，而個人打到的獵物也要分配給獵團的其他成員。獵團之社會組織將狩獵行為置於團體規範下，同時達到資源共享的分配功能。

（三）占卜與祈福：以往，打獵是件嚴肅，非隨時想到便可從事的活動，而是必須先經過一些儀式活動。往往，原住民獵團在狩獵之前會先請巫師、巫婆舉行祈福儀式，預祝狩獵豐收與平安。此外，在打獵前一天要舉行「夢占」，由頭目或巫師從事，若夢見凶兆，則隔天的狩獵活動必須停止。即使前一天晚上的夢占是吉夢，獵團在出發前或出發後仍須舉行「鳥占」，及視某種鳥類的叫聲與飛行方向來決定凶吉。若是吉兆即可繼續前行，否則凶兆便須終止此次狩獵活動。

（四）禁忌：原住民各族基於不同的理由，發展出了各種狩獵的禁忌，主要包括性別、季節性、圖騰、祖靈地／聖地等禁忌。一般而言，原住民女性是被排除於狩獵行為之外的，女性甚至不得觸摸獵具以免帶來壞運氣（當然，以現代角度來看，女性禁忌是值得再議的）。許多的部族也有季節性的禁忌與規定，其中尤其以雅美族的捕魚季節最為明顯。雅美族規定某些魚只有在某些季節才能捕；此外，還將捕獲的魚分為老人魚、男人魚、女人魚及小孩魚，如此一來，魚類便不會被過分捕撈且得以休養生息。有些布農族則規定只能在六、八、十月殺熊。再者，有些原住民族群有他們特別的圖騰，如魯凱族的雲豹與排灣族的百步蛇，這些圖騰動物便是該族會善家保護而不刻意殺害的。最後，祖靈地／聖地的禁忌也往往自然形成了各族群的「生態保護區」。屏東縣霧台鄉的大小鬼湖地區，自來是該地魯凱族與排灣族的禁地，族人不得進入禁地狩獵，因為該地是他們的祖靈聖地，不得驚擾他們安寧。近年來的研究則顯示出，大小鬼湖為該區的主要水源地，富饒生物多樣性，許多動物也都仰賴該湖的水源滋養，休養生息及繁衍後代。因此，大小鬼湖可說是該處山林裡生命的泉源，而魯凱族與排灣族的禁忌正好提供了保護這個生命泉源，讓野生動物得以生生不息繁殖的最好保護。

（五）祭典儀式與分享：各個部族都有他們獨特的祭典儀式，如卑南族的猴祭與布農族的打耳祭。而在狩獵之後，也往往要舉辦祭典以表示對大自然的敬意。打到的獵物，除了前述獵團的人要分享之外，獵團成員也各自分給氏族成員及朋友，充分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很多人會認為，作為台灣山林裡最兇猛與稀少的野生動物之熊，一定是原住民獵人最希望獵到，甚至是一個獵人一生中的最大願望。然而，這種想法只是又證明了漢人偏頗、帶征服意味的價值觀。幾個月前，一位布農族獵人就親口告訴了我他多年前獵到熊的過程以及事後族人如何舉行繁複的祭拜儀式（祭熊、山、與槍）與分食熊肉。在他描述的過程中，絲毫沒有自豪或驕傲的神情，反而再三的表達他「碰到了，沒辦法」的心情。此外，他也強調，他們族人並不會有「希望能獵到熊」的心結，一方面是其高度的危險性，另一方面則因為獵到熊後的祭典要花不少的酒肉錢及耗費許多時間精力。

透過上述的「狩獵文化」，原住民在台灣的山林裡與野生動物相處了數百年以上之久，一方面以虔敬與戒慎的心情來對待自然，另一方面則透過各種文化機制來對野生動物資源做有節制、最有效且永續的利用。除了此外，原住民在過去僅擁有相當有限的科技，這也實質地達到了免於物種被大量消滅的效果。

「狩獵文化」背後所代表的，除了是許多原住民文化及社會組織發展的基石之外，更是展現了原住民敬畏自然，試圖與自然生態和諧相處的環境倫理。這樣子的倫理，正是我們當前工業資本主義急欲駕馭自然，剝削生態環境之主流社會所應當學習的。然而，上述原住民的「狩獵文化」在歷經荷蘭人、日本人及漢人勢力的漸漸入侵之後，已然殘破不全。一方面，原住民部落的經濟活動已漸漸納入了台灣資本主義體系的一環，狩獵已不再是主要的生計活動之一；另一方面，漢文化、基督教及現代官僚體制的不斷入侵，逐漸瓦解了原住民原有的社會組織與文化再生能力，因而「狩獵文化」也難以在繼續維繫下去。獵區變成了林務局的第 x 林班或國家公園的管轄範圍；獵團成員四散了；占卜與祈福儀式隨著巫師漸漸凋零；禁忌與儀式已少有人記得，更遑論去尊行了；祭典更是大多觀光意味勝於其他。

「狩獵文化」殘破之後，原住民獵人的狩獵變成了單純的「狩獵行為」，而不再受各種文化與組織的規範。過去那種原住民與野生動物維持動態平衡的關係也就不再可能，而一個久遠的，自然生成的生態保育典範也就從此消失。去年一月份在台北召開的「生態教育與原住民狩獵文化」研討會中，一位原住民獵人就指出，過去，打到野獸是很光榮的事，而

獵物也都必須與部落的人分享。自從禁獵及國家公園成立以來，獵人打到了獵物後只能偷偷摸摸的從後門回家，而且不動聲色的自己吃掉，吃不住的也只能丟掉，造成浪費的情形。而曾如布農族小說家田雅各在他的小說「最後的獵人」(1987)中所表達的，曾幾何時，代表原住民驕傲與地位象徵的獵人竟淪落為偷偷摸摸，怕遭人指責的賊一般！另一方面，長時期的禁獵措施也對原住民部落造成許多的困擾。許多原住民部落都抱怨當地野生動物氾濫，尤其是獼猴與山豬等，經常會來破壞與偷吃他們的農作物，使他們辛苦耕種結果都歸於烏有，但又不能動這些動物一根汗毛。相較於經常成群出來「挑釁」的獼猴，有些原住民甚至半開玩笑的主張他們才是瀕臨絕種而需要受到保護的。有錢有閒的漢人之保育觀點與法令，在此又成了最弱勢之原住民追求基本生存權的桎梏。這豈是一個追求公平正義之民主國家所能容許的事情？

陸、結論

作為台灣生態環境最早的經營者，原住民曾發展出了最原始而有效的生態倫理與保育措施。包括獵區、獵團、占卜祈福、禁忌及祭典儀式與分享等內涵的「狩獵文化」曾始得原住民與野生動物在台灣的山林裡保持了長久的「動態平衡」。如今，這個古老而久遠的保育文化已隨著原住民的成為台灣之「黃昏民族」而殘破不堪，而同時，台灣的山野倫理也蕩然無存，僅剩國家運用值得爭議的強制力來對野生動物作保育管理。而在這過程，原住民不但再次成為犧牲品，也背負了不屬於他們的原罪。當然，歷史是不可能走回頭路的，原住民的狩獵文化絕不可能再回到過去那樣的景況。然而，在新一代的保育觀念面臨從新檢討，而政府也有意局部放寬狩獵活動之即，或許是我們來向原住民學習傳統的保育觀與生態倫理，看看是否有那些元素可以被納入新的保育觀與法令裡。同時，我們也得要思索，在漢人將野生動物逼得奄奄一息之後，我們再來要求原住民與我們一起合作來做好保育工作，我們拿什麼來回愧原住民，拿什麼來補償他們所失去的呢？我們從這樣子的觀點來思考問題，才會符合環境正義的基本理念。

最後，作者認為，作為一個強勢團體的一員（不管是哪一種團體，種族、階級、或性別），首先要學習的便是謙遜與虛心。台灣野生動物的最大殺手不是與其相處數百年仍相安無事的原住民，而是過去由政府主導與默許的開山挖路、築水庫、開礦、砍伐森林、種植蔬果等工程與活動。若上述的破壞活動不能有效的被制止，台灣各級政府所要宣導的野生動物保育將不可能獲得真正、重大的改善。試想，政府一方面邀請原住民朋友一起來參加保育的行列，另一方面行政院長及總統卻一再的主張南橫國道一定要開、瑪家水庫勢在必行，那我們（漢人）還有什麼臉（與權利）來要求原住民不要狩獵呢？現在，是我們（漢人與原住民）丟棄「開

發」的意識型態與膚淺、口惠的「保育」假面具，一起誠意與虛心探討如何再造山林守護神的時候了。

參考書目

- adams, w. m. 1990. gree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 bryant, bunyan. 1995a. "introduction." in environmental justice: issues, policies, and solutions. edited by bunyan bryant. bryant, bunyan. (ed.) 1995b. environmental justice: issues, policies, and solution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 bullard, r.d., 1984. "unplanned environs: the price of unplanned growth in boomtown houston." california sociologist 7: 85-101.
- bullard, robert. 1990. dumping in dixie: race, class,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boulder: westview.
- bullard, robert. 1993a. "anatomy of environmental racism." in toxic struggl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edited by richard hofrichter. bullard, robert. (ed.) 1993b. confronting environmental racism: voices from the grassroot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burger, julian. 1990. the gaia atlas of first peoples. new york: anchor books.
- capek, stella m. 1993.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frame: a conceptual discussion and an application." social problems 40, 1:5-24.
- crosby, alfred. 1986.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shelton. 1991. "globalization and traditional cultures." northeast indian quarterly, spring.
- davis, shelton. 1993. "introduction." in indigenous views of land and the environment, edited by shelton davis.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 no. 18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de onis, juan. 1992. the green cathed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mazon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rning, alan thein. 1992. guardians of the land: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health of the earth. worldwatch paper 112. washington, d.c.: worldwatch institute.
- gedicks, al. 1993. the new resource wars: native and environmental struggles against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gedicks, al. 1995. "international native resistance to the new resource wars." in the ecological resistance movements: the global emergence of radical and popular environmentalism, edited by raymond taylor. albany: suny press.
- hofrichter, richard (ed.) 1993. toxic struggl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 hurst, philip. 1990. rainforest politics: ecological destruction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zed books.
- macdonald theodore. 1992. "from reaction to planning: an indigenous response to deforestation and cattle raising." pp. 213-34 in development or destruction: the conversion of tropical forest to pasture in

latin america, edited by theodore e. downing, ec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mcneely, jeffrey a. etc. 1990. conserving the world's biological diversity.
gland, switzerland: iucn. mohai, paul and bunyan bryant. 1992.
"environmental racism: reviewing the evidence." in race and the incidence of
environmental hazards: a time for discourse. edited by bunyan bryant and
paul mohai. boulder: westview press. rawls, john.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bison, wm. paul.
1992. "uranium production and its effects on navajo communities along the
rio puerco in western new mexico." in race and the incidence of
environmental hazards: a time for discours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schnaiberg, allen and kenneth alan gould, 1994.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the enduring conflic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1987. toxic wastes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ational report on the
racial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ies surrounding
hazardous waste sites. new york. wells, michael and katrina brandon. 1992.
people and parks: linking protecting area management with local
communitie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west, patrick, c. 1991.
"introduction." pp. xv-xxiv in resident peoples and national parks: social
dilemma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conservation, edited by p.c. west
and s.r., brechin. tucson, ariz.: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wilmer, franke.
1993. indigenous voice in world politic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wilson, edward o. 1992. the diversity of life. london: penguin books. world
commi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年生態教育與原住民狩獵文化研討會
會議資料。台北：1996 年一月。田雅各，1987 《最後的獵人》。台北：
晨星。洪田俊，1995 〈台灣原住民與野生動物的關係〉。《原報》26：9
—15。紀駿傑、王俊秀，1996 〈環境正義：原住民與國家公園衝突的分
析〉，收於《台灣的社會學研究：回顧與展望》論文集。台中：東海大
學。裴家騏，1996 〈原住民傳統獵區之聯合管理制度初探〉。引自 1996
年生態教育與原住民狩獵文化研討會。黃應貴，1992 《東埔社布農人
的社會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蕭新煌，1980 〈社會
學與「環境」：環境社會學的基本看法〉，《思與言》18(2):127-35。蕭新
煌、蔣本基、劉小如、朱雲鵬，1993 《台灣 2000 年》。台北：天下文化。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SECURING RIGHTS,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How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Mitigates Climate Change*

CALEB STEVENS, ROBERT WINTERBOTTOM, JENNY SPRINGER, KATIE REYTAR





Design and layout by:
Cerni Klirs
cklirs@wn.org

An aerial photograph of a forest landscape. A dirt path or road cuts through the forest, leading from the foreground towards the background. On the path, a person is riding a motorcycle. The forest is dense and green, with some areas appearing to be cleared or logged. The sky is visible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image, showing a hazy blue color.

TABLE OF CONTENTS

v Foreword

1 Executive Summary

2 About This Report

3 Findings

4 Recommendations

7 I. An Undervalued Approach To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13 II. Legal Recognition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14 What Are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14 How Are They Protected?

17 III.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Methodology

23 IV. The Climate Impact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nalysis And Findings

24 No or Weak Legal Recognition and Negative Government Action

27 Legal Recognition and Positive Government Action

33 Legal Recognition and Negative Government Action

41 V. Conclusion

42 Findings

43 Recommendations

46 Appendices

48 References

52 Notes

56 Acknowledgments



FOREWORD

That the empowerment of local peoples and recognition of their customary rights has powerful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is not news for researchers. A study of 80 forest areas in 10 countries in South Asia, East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shows that community-owned and -managed forests have delivered both superior community benefits and greater carbon storage. In Brazil, 27 times mor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were produced in areas outside of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These forests also contain 36 percent more carbon per hectare. In some community forests of Honduras, forest loss was 140 times lower under community-led forest rights initiatives. A further look at Brazil shows that it is precisely the government's recognition of indigenous and community rights to forestland that has driven the most successful conservation movements in modern history.

Ye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trengthening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forest rights and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is rarely made. Governments continue to overwhelmingly claim ownership of forestland instead of recognizing the rights of the communities who depend on and are best positioned to protect the forests. But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already have ownership rights to at least one eighth of the world's forests—which store more carbon than all

of North America's forests. With the knowledge and wisdom cultivated through generations, not only are forest communities able to protect their forests more effectively than governments do—they protect them less expensively.

This report on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nd climate change provides much-needed evidence at the global scale to demonstrate the tremendous potential for reducing emissions by strengthening communities' forest rights. It analyzes examples from 14 forest-rich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Africa, and Asia that include over two thirds of all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The report also present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world leade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dvocates, and others who, if they are seriously committed to finding a far-reaching and concrete climate change solution, will call upon forested nations to strengthen community rights in their forests.

For too long this approach to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has not received the attention it deserves. We hope this report will turn that around and draw the world's focus to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turning the tide against climate change and saving the world's forests: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ho depend on them.



Andrew Steer
President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Andy White
Coordinator
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



EXECUTIVE SUMMAR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grees on the urgent need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With 13 million hectares of forest cleared every year, such efforts are critical to curbing climate change before it reaches a dangerous tipping point. But we are missing a vital opportunity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strengthening the land and resourc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hose well-being is tied to their forests.

This approach to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has long been undervalued. Although governments claim ownership over most of the world's forests, the real stewards of much of these areas ar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ith deep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 to the land. Around the world, millions of communities depend on forests for basic needs and livelihoods. Thes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can help avoi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orests and associate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instead maintain their forests as carbon sinks, absorbing harmful carbon dioxide from the atmospher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today have legal or official rights to at least 513 million hectares of forests, only about one eighth of the world's total. Collectively these forests contain approximately 37.7 billion tonnes of carbon, about equal to the carbon in all the forests of North America. Much larger areas of forest are held by communities under customary rights that are not legally recognized by governments. Most community forests are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with strong deforestation pressures. Yet governments, donors, and other climate change stakeholders tend to ignore or marginalize the enormous contribution to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that expanding and strengthening communities' forest rights can make.

With deforestation and other land uses now accounting for about 11 percent of annual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eak legal protection for forest communities is not just a land or resource rights problem. It is a climate change problem. Preventing actions that undermine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is part of the solution. This report aims to encourag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rioritize support for forest communit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s a bulwark against rising global temperatures.

About This Report

This publication analyzes the growing body of evidence link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with healthier forests and lower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It presents a compelling case for expanding and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based on evidence drawn from comparative studies, advanced quantitative research, case studies, and original deforestation and carbon analyses by th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The findings center on examples from 14 forest-rich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Africa, and Asia. Together, these countries contain about 323 million hectares of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68 percent of the estimated total in all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as well as large areas of community forests without legal or official recognition. Our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links between legal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or lack thereof), the extent of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those rights, and forest outcomes.








Findings

1. **Whe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have no or weak legal rights, their forests tend to be vulnerable to deforestation and thus become the source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Deforestation of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in Brazil would likely have been 22 times higher without their legal recognition. In Indonesia, the high levels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re driven in part by no or weak legal rights for forest communities. For example, oil palm concessions cover 59 percent of community forests in part of West Kalimantan.
2. **Legal forest rights for communities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their rights tend to lower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deforestation.** In Brazil, deforestation in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from 2000 to 2012 was less than 1 percent, compared with 7 percent outside them. The higher deforestation outside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led to 27 times mor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than were produced from deforestation on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And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contain 36 percent more carbon per hectare than other areas of the Brazilian Amazon.

Summary of Analysis of How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nd Government Action Impact Forests

COUNTRY	LEGAL RIGHTS	GOV. ACTION	FOREST OUTCOMES	COUNTRY	LEGAL RIGHTS	GOV. ACTION	FOREST OUTCOMES
Bolivia (Amazon)				Nicaragua (Bosawas)			
Brazil (Amazon)				Peru (Amazon)			
Colombia (Amazon)				Niger			
Ecuador (Amazon)				Tanzania			
Guatemala (Petén)				Nepal			
Honduras (Rio Platano)				Indonesia			
Mexico				Papua New Guinea			

CHART KEY	LEGAL RIGHTS	GOVERNMENT ACTION	FOREST OUTCOMES
	 = Legal Recognition  = No/Weak Legal Recognition	 = Positive Government Action on Strength of Rights  = Negative Government Action on Strength of Rights	 = Positive Forest Outcomes  = Negative Forest Outcomes

The specific legal rights recognized vary across countries. Please see Table 2 and the case discussions in Section IV for more information.

3.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ith legal forest rights maintain or improve their forests' carbon storage.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the forest rights of communities in Niger added 200 million new trees, absorbing 30 million tonnes of carbon over the past 30 years. Support for community forestry in Nepal has improved forest health and generated a carbon stock of more than 180 million tonnes across 1.6 million hectares.

4. Even when communities have legal rights to their forest, government actions that undermine those rights can lead to high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deforestation. The forests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Peru, where government actions weaken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re deforested at a higher rate than other parts of the Peruvian Amazon.

5. Communities can partially overcome government actions that undermine their forest rights. In Honduras and Nicaragua, indigenous communities have been able to partially forestall deforestation despite insufficient government efforts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In some cases community forest loss is 0.01 percent, compared with 1.40 percent in the surrounding area.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authors make five practical, evidence-based recommendations to donors, governments, civil society, and other stakeholders working on climate change, land rights, and forestry.

1. Provid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ith legal recognition of rights to their forest. Attention must be given to the millions of forested communities without legal rights to their forest. In Indonesia, where communities generally have no or weak legal rights, new legislation is pending to recognize communities' ownership of their forests. Where communities have some legal forest rights, governments and their partners should strengthen these rights.

2. Protect the legal forest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Governments and their partners should help protect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by, for example, mapping community forest boundaries, helping to expel illegal loggers, and not granting commercial concessions over community forests. In Brazil, the government maps and registers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helps communities remove illegal settlers, and is generally barred from granting commercial use of community forests to companies.

3. Support communities with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training. Governments, donors, and civil society should provide training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communities and should undertake capacity building activities. For example, in Mexico some communities receive training and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sustainable forest use and market access.

4. Engage forest communities in decision-making on investments affecting their forest.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e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that government planning is 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that investments do not violate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In Peru, the government's failure to comply fully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contributes to high deforestation of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5. Compensate communities for the climate and other benefits provided by their forest. Governments and their partners should commit funds and invest in supporting communities and their civil society partners to increase the economic incentives for communities to manage their forests sustainably. In addition, stakeholders should support the strengthening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s part of a futur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on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degradation.





SECTION I

AN UNDERVALUED APPROACH TO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Despite a growing volume of evidence, the positive connection between strengthening the forest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and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is rarely made and often ignored. This report seeks to correct that bias by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the evidence that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is associated with healthy forests and therefore an effective means to avoid carbon dioxide (CO₂) emissions and to maintain or increase forest carbon storage.

BOX 1 | DEFINITIONS OF TERMS IN THIS REPORT

Deforestation means a change from a forest to a non-forest state.

Forest loss means tree cover loss and thus may include deforestation or degradation.

Forest degradation means human-induced reduction in a forest's ability to provide forest products and ecosystem services, such as carbon capture.

Healthy forests means forests that maintain their biological diversity, productivity, regenerative capacity, and vitality so they are able to provide a full range of ecosystem services now and in the future.

Reforestation means reestablishing the tree cover on land through the protection, regeneration, and planting of trees.

Sustainable forest use means the harvesting of timber and 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 to benefit the community directly or for sale to non-community members in a way that restores or maintains a healthy forest.

Source: Adapted from Zedeno et al., 2007.

Many of the world's remaining forests are under the stewardship of local communities or Indigenous Peoples. Globally, at least 513 million hectares, or about one eighth of the world's forests, are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¹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se—478 million hectares—are in low- or middle-income countries where pressures to exploit forests are strong.² (See Box 1 for definitions.)

Yet governments claim ownership of the majority of forests.³ These include large areas to which communities hold customary rights that are not legally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Lack of legal recognition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leaves these forests vulnerable to clearance for commercial logging, pasture, cropland, oil palm, or mining. In some areas, forest loss has even resulted from drug trafficking.⁴

The failure to establish and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se forest communities has been costly not only in human terms but for earth's climate. Globally, 13 million hectares of forests are cleared every year—the equivalent of 50 soccer fields a minute.⁵

The CO₂ this and other land uses generates accounts for 11 percent of all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⁶ (These emissions consist of CO₂, methane, nitrous oxide, and fluorinated gases. Carbon dioxide makes up about 82 percent of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⁷



Despite this destruction, the world's forests still act as an enormously valuable carbon sink without which climate change would be even greater. Collectively, the world's forests store more carbon than the atmosphere does,⁸ absorbing about 50 percent of fossil fue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2009.⁹

If communities are not provided with the legal recognition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they need and deserve, their forests will likely become the source of CO₂ emissions.^a Once deforested, these community forests are also lost as carbon sinks, creating a doubly negative climate impact.^b

Across Latin America, Africa, and Asia, community forests are under pressure from large-scale land deals and investment projects (so-called land grabs).¹⁰ For example, mining, oil, and natural gas concessions granted in recent years now cover nearly three quarters of the Peruvian Amazon, the home of many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¹¹ And around half of heavily forested Liberia is allocated for commercial use, primarily by foreign mining and oil palm companies.¹²

With the exception of some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to reduce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degradation (REDD+) (see Box 2), development agencies, governments, and others have failed to give enough weight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nd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For example, the 2014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by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hardly mentions that clear land rights, enforcement, and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 are important to mitigation, and it merely concludes that “more research is needed.”¹³ Leading development agencies have also missed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 central plank of their climate change policies or programs. Th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world's largest aid donor,¹⁴ barely mentions the issue in its *Climat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2012–2016*.

BOX 2 | IMPLICATIONS FOR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DEGRADATIO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convention under negotiation will determine the combination of rules, finance, and information required for countries to not deforest or degrade but rather conserve and manage forests sustainably and even to enhance forest carbon stocks. This approach is known as REDD+. A number of REDD+ initiatives identify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Many countries with REDD+ strategies identified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s part of their own strategy. In addition, respect for the rights of local communi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is an internationally agreed safeguard to ensure REDD+ does not harm people or the environment.

A new property right to forest carbon may also be part of REDD+. If a community's forest rights are weak or non-existent, then the community will also likely lose their rights to carbon in the forest. This will undermine their ability to engage in REDD+ initiatives equitably, effectively, and independently. Legal uncertainty could contribute to governments nationalizing carbon property rights, leaving communities without the right to benefit from payments for carbon in their forests. Nationalizing carbon could also lead to carbon trading that dispossesses forest communities of their existing forest rights or that creates an additional barrier to the future recogni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ir rights.

But progress to ensure community forest and carbon rights has been halting. New laws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re not forthcoming.¹⁵ Moreover, many heavily forested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no clear laws defining carbon rights nor legal frameworks governing trade in carbon.¹⁶ Governments and companies often have legal rights to forests but communities do not. If REDD+ payments for carbon begin to flow in such a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s and companies rather than communities will capture the benefits.¹⁷ Yet payments under REDD+ could incentivize governments to reform their legal frameworks and strengthen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if they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a REDD+ agre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plan.¹⁸

FAO, 2014a; WRI, 2012; O'Keefe et al., 2008; FAO, 2014b; FAO, 2014c; FAO, 2014d; FAO, 2014e; FAO, 2014f; FAO, 2014g; FAO, 2014h; FAO, 2014i; FAO, 2014j; FAO, 2014k; FAO, 2014l; FAO, 2014m; FAO, 2014n; FAO, 2014o; FAO, 2014p; FAO, 2014q; FAO, 2014r; FAO, 2014s; FAO, 2014t; FAO, 2014u; FAO, 2014v; FAO, 2014w; FAO, 2014x; FAO, 2014y; FAO, 2014z; FAO, 2015a; FAO, 2015b; FAO, 2015c; FAO, 2015d; FAO, 2015e; FAO, 2015f; FAO, 2015g; FAO, 2015h; FAO, 2015i; FAO, 2015j; FAO, 2015k; FAO, 2015l; FAO, 2015m; FAO, 2015n; FAO, 2015o; FAO, 2015p; FAO, 2015q; FAO, 2015r; FAO, 2015s; FAO, 2015t; FAO, 2015u; FAO, 2015v; FAO, 2015w; FAO, 2015x; FAO, 2015y; FAO, 2015z; FAO, 2016a; FAO, 2016b; FAO, 2016c; FAO, 2016d; FAO, 2016e; FAO, 2016f; FAO, 2016g; FAO, 2016h; FAO, 2016i; FAO, 2016j; FAO, 2016k; FAO, 2016l; FAO, 2016m; FAO, 2016n; FAO, 2016o; FAO, 2016p; FAO, 2016q; FAO, 2016r; FAO, 2016s; FAO, 2016t; FAO, 2016u; FAO, 2016v; FAO, 2016w; FAO, 2016x; FAO, 2016y; FAO, 2016z; FAO, 2017a; FAO, 2017b; FAO, 2017c; FAO, 2017d; FAO, 2017e; FAO, 2017f; FAO, 2017g; FAO, 2017h; FAO, 2017i; FAO, 2017j; FAO, 2017k; FAO, 2017l; FAO, 2017m; FAO, 2017n; FAO, 2017o; FAO, 2017p; FAO, 2017q; FAO, 2017r; FAO, 2017s; FAO, 2017t; FAO, 2017u; FAO, 2017v; FAO, 2017w; FAO, 2017x; FAO, 2017y; FAO, 2017z; FAO, 2018a; FAO, 2018b; FAO, 2018c; FAO, 2018d; FAO, 2018e; FAO, 2018f; FAO, 2018g; FAO, 2018h; FAO, 2018i; FAO, 2018j; FAO, 2018k; FAO, 2018l; FAO, 2018m; FAO, 2018n; FAO, 2018o; FAO, 2018p; FAO, 2018q; FAO, 2018r; FAO, 2018s; FAO, 2018t; FAO, 2018u; FAO, 2018v; FAO, 2018w; FAO, 2018x; FAO, 2018y; FAO, 2018z; FAO, 2019a; FAO, 2019b; FAO, 2019c; FAO, 2019d; FAO, 2019e; FAO, 2019f; FAO, 2019g; FAO, 2019h; FAO, 2019i; FAO, 2019j; FAO, 2019k; FAO, 2019l; FAO, 2019m; FAO, 2019n; FAO, 2019o; FAO, 2019p; FAO, 2019q; FAO, 2019r; FAO, 2019s; FAO, 2019t; FAO, 2019u; FAO, 2019v; FAO, 2019w; FAO, 2019x; FAO, 2019y; FAO, 2019z; FAO, 2020a; FAO, 2020b; FAO, 2020c; FAO, 2020d; FAO, 2020e; FAO, 2020f; FAO, 2020g; FAO, 2020h; FAO, 2020i; FAO, 2020j; FAO, 2020k; FAO, 2020l; FAO, 2020m; FAO, 2020n; FAO, 2020o; FAO, 2020p; FAO, 2020q; FAO, 2020r; FAO, 2020s; FAO, 2020t; FAO, 2020u; FAO, 2020v; FAO, 2020w; FAO, 2020x; FAO, 2020y; FAO, 2020z; FAO, 2021a; FAO, 2021b; FAO, 2021c; FAO, 2021d; FAO, 2021e; FAO, 2021f; FAO, 2021g; FAO, 2021h; FAO, 2021i; FAO, 2021j; FAO, 2021k; FAO, 2021l; FAO, 2021m; FAO, 2021n; FAO, 2021o; FAO, 2021p; FAO, 2021q; FAO, 2021r; FAO, 2021s; FAO, 2021t; FAO, 2021u; FAO, 2021v; FAO, 2021w; FAO, 2021x; FAO, 2021y; FAO, 2021z; FAO, 2022a; FAO, 2022b; FAO, 2022c; FAO, 2022d; FAO, 2022e; FAO, 2022f; FAO, 2022g; FAO, 2022h; FAO, 2022i; FAO, 2022j; FAO, 2022k; FAO, 2022l; FAO, 2022m; FAO, 2022n; FAO, 2022o; FAO, 2022p; FAO, 2022q; FAO, 2022r; FAO, 2022s; FAO, 2022t; FAO, 2022u; FAO, 2022v; FAO, 2022w; FAO, 2022x; FAO, 2022y; FAO, 2022z; FAO, 2023a; FAO, 2023b; FAO, 2023c; FAO, 2023d; FAO, 2023e; FAO, 2023f; FAO, 2023g; FAO, 2023h; FAO, 2023i; FAO, 2023j; FAO, 2023k; FAO, 2023l; FAO, 2023m; FAO, 2023n; FAO, 2023o; FAO, 2023p; FAO, 2023q; FAO, 2023r; FAO, 2023s; FAO, 2023t; FAO, 2023u; FAO, 2023v; FAO, 2023w; FAO, 2023x; FAO, 2023y; FAO, 2023z; FAO, 2024a; FAO, 2024b; FAO, 2024c; FAO, 2024d; FAO, 2024e; FAO, 2024f; FAO, 2024g; FAO, 2024h; FAO, 2024i; FAO, 2024j; FAO, 2024k; FAO, 2024l; FAO, 2024m; FAO, 2024n; FAO, 2024o; FAO, 2024p; FAO, 2024q; FAO, 2024r; FAO, 2024s; FAO, 2024t; FAO, 2024u; FAO, 2024v; FAO, 2024w; FAO, 2024x; FAO, 2024y; FAO, 2024z; FAO, 2025a; FAO, 2025b; FAO, 2025c; FAO, 2025d; FAO, 2025e; FAO, 2025f; FAO, 2025g; FAO, 2025h; FAO, 2025i; FAO, 2025j; FAO, 2025k; FAO, 2025l; FAO, 2025m; FAO, 2025n; FAO, 2025o; FAO, 2025p; FAO, 2025q; FAO, 2025r; FAO, 2025s; FAO, 2025t; FAO, 2025u; FAO, 2025v; FAO, 2025w; FAO, 2025x; FAO, 2025y; FAO, 2025z; FAO, 2026a; FAO, 2026b; FAO, 2026c; FAO, 2026d; FAO, 2026e; FAO, 2026f; FAO, 2026g; FAO, 2026h; FAO, 2026i; FAO, 2026j; FAO, 2026k; FAO, 2026l; FAO, 2026m; FAO, 2026n; FAO, 2026o; FAO, 2026p; FAO, 2026q; FAO, 2026r; FAO, 2026s; FAO, 2026t; FAO, 2026u; FAO, 2026v; FAO, 2026w; FAO, 2026x; FAO, 2026y; FAO, 2026z; FAO, 2027a; FAO, 2027b; FAO, 2027c; FAO, 2027d; FAO, 2027e; FAO, 2027f; FAO, 2027g; FAO, 2027h; FAO, 2027i; FAO, 2027j; FAO, 2027k; FAO, 2027l; FAO, 2027m; FAO, 2027n; FAO, 2027o; FAO, 2027p; FAO, 2027q; FAO, 2027r; FAO, 2027s; FAO, 2027t; FAO, 2027u; FAO, 2027v; FAO, 2027w; FAO, 2027x; FAO, 2027y; FAO, 2027z; FAO, 2028a; FAO, 2028b; FAO, 2028c; FAO, 2028d; FAO, 2028e; FAO, 2028f; FAO, 2028g; FAO, 2028h; FAO, 2028i; FAO, 2028j; FAO, 2028k; FAO, 2028l; FAO, 2028m; FAO, 2028n; FAO, 2028o; FAO, 2028p; FAO, 2028q; FAO, 2028r; FAO, 2028s; FAO, 2028t; FAO, 2028u; FAO, 2028v; FAO, 2028w; FAO, 2028x; FAO, 2028y; FAO, 2028z; FAO, 2029a; FAO, 2029b; FAO, 2029c; FAO, 2029d; FAO, 2029e; FAO, 2029f; FAO, 2029g; FAO, 2029h; FAO, 2029i; FAO, 2029j; FAO, 2029k; FAO, 2029l; FAO, 2029m; FAO, 2029n; FAO, 2029o; FAO, 2029p; FAO, 2029q; FAO, 2029r; FAO, 2029s; FAO, 2029t; FAO, 2029u; FAO, 2029v; FAO, 2029w; FAO, 2029x; FAO, 2029y; FAO, 2029z; FAO, 2030a; FAO, 2030b; FAO, 2030c; FAO, 2030d; FAO, 2030e; FAO, 2030f; FAO, 2030g; FAO, 2030h; FAO, 2030i; FAO, 2030j; FAO, 2030k; FAO, 2030l; FAO, 2030m; FAO, 2030n; FAO, 2030o; FAO, 2030p; FAO, 2030q; FAO, 2030r; FAO, 2030s; FAO, 2030t; FAO, 2030u; FAO, 2030v; FAO, 2030w; FAO, 2030x; FAO, 2030y; FAO, 2030z; FAO, 2031a; FAO, 2031b; FAO, 2031c; FAO, 2031d; FAO, 2031e; FAO, 2031f; FAO, 2031g; FAO, 2031h; FAO, 2031i; FAO, 2031j; FAO, 2031k; FAO, 2031l; FAO, 2031m; FAO, 2031n; FAO, 2031o; FAO, 2031p; FAO, 2031q; FAO, 2031r; FAO, 2031s; FAO, 2031t; FAO, 2031u; FAO, 2031v; FAO, 2031w; FAO, 2031x; FAO, 2031y; FAO, 2031z; FAO, 2032a; FAO, 2032b; FAO, 2032c; FAO, 2032d; FAO, 2032e; FAO, 2032f; FAO, 2032g; FAO, 2032h; FAO, 2032i; FAO, 2032j; FAO, 2032k; FAO, 2032l; FAO, 2032m; FAO, 2032n; FAO, 2032o; FAO, 2032p; FAO, 2032q; FAO, 2032r; FAO, 2032s; FAO, 2032t; FAO, 2032u; FAO, 2032v; FAO, 2032w; FAO, 2032x; FAO, 2032y; FAO, 2032z; FAO, 2033a; FAO, 2033b; FAO, 2033c; FAO, 2033d; FAO, 2033e; FAO, 2033f; FAO, 2033g; FAO, 2033h; FAO, 2033i; FAO, 2033j; FAO, 2033k; FAO, 2033l; FAO, 2033m; FAO, 2033n; FAO, 2033o; FAO, 2033p; FAO, 2033q; FAO, 2033r; FAO, 2033s; FAO, 2033t; FAO, 2033u; FAO, 2033v; FAO, 2033w; FAO, 2033x; FAO, 2033y; FAO, 2033z; FAO, 2034a; FAO, 2034b; FAO, 2034c; FAO, 2034d; FAO, 2034e; FAO, 2034f; FAO, 2034g; FAO, 2034h; FAO, 2034i; FAO, 2034j; FAO, 2034k; FAO, 2034l; FAO, 2034m; FAO, 2034n; FAO, 2034o; FAO, 2034p; FAO, 2034q; FAO, 2034r; FAO, 2034s; FAO, 2034t; FAO, 2034u; FAO, 2034v; FAO, 2034w; FAO, 2034x; FAO, 2034y; FAO, 2034z; FAO, 2035a; FAO, 2035b; FAO, 2035c; FAO, 2035d; FAO, 2035e; FAO, 2035f; FAO, 2035g; FAO, 2035h; FAO, 2035i; FAO, 2035j; FAO, 2035k; FAO, 2035l; FAO, 2035m; FAO, 2035n; FAO, 2035o; FAO, 2035p; FAO, 2035q; FAO, 2035r; FAO, 2035s; FAO, 2035t; FAO, 2035u; FAO, 2035v; FAO, 2035w; FAO, 2035x; FAO, 2035y; FAO, 2035z; FAO, 2036a; FAO, 2036b; FAO, 2036c; FAO, 2036d; FAO, 2036e; FAO, 2036f; FAO, 2036g; FAO, 2036h; FAO, 2036i; FAO, 2036j; FAO, 2036k; FAO, 2036l; FAO, 2036m; FAO, 2036n; FAO, 2036o; FAO, 2036p; FAO, 2036q; FAO, 2036r; FAO, 2036s; FAO, 2036t; FAO, 2036u; FAO, 2036v; FAO, 2036w; FAO, 2036x; FAO, 2036y; FAO, 2036z; FAO, 2037a; FAO, 2037b; FAO, 2037c; FAO, 2037d; FAO, 2037e; FAO, 2037f; FAO, 2037g; FAO, 2037h; FAO, 2037i; FAO, 2037j; FAO, 2037k; FAO, 2037l; FAO, 2037m; FAO, 2037n; FAO, 2037o; FAO, 2037p; FAO, 2037q; FAO, 2037r; FAO, 2037s; FAO, 2037t; FAO, 2037u; FAO, 2037v; FAO, 2037w; FAO, 2037x; FAO, 2037y; FAO, 2037z; FAO, 2038a; FAO, 2038b; FAO, 2038c; FAO, 2038d; FAO, 2038e; FAO, 2038f; FAO, 2038g; FAO, 2038h; FAO, 2038i; FAO, 2038j; FAO, 2038k; FAO, 2038l; FAO, 2038m; FAO, 2038n; FAO, 2038o; FAO, 2038p; FAO, 2038q; FAO, 2038r; FAO, 2038s; FAO, 2038t; FAO, 2038u; FAO, 2038v; FAO, 2038w; FAO, 2038x; FAO, 2038y; FAO, 2038z; FAO, 2039a; FAO, 2039b; FAO, 2039c; FAO, 2039d; FAO, 2039e; FAO, 2039f; FAO, 2039g; FAO, 2039h; FAO, 2039i; FAO, 2039j; FAO, 2039k; FAO, 2039l; FAO, 2039m; FAO, 2039n; FAO, 2039o; FAO, 2039p; FAO, 2039q; FAO, 2039r; FAO, 2039s; FAO, 2039t; FAO, 2039u; FAO, 2039v; FAO, 2039w; FAO, 2039x; FAO, 2039y; FAO, 2039z; FAO, 2040a; FAO, 2040b; FAO, 2040c; FAO, 2040d; FAO, 2040e; FAO, 2040f; FAO, 2040g; FAO, 2040h; FAO, 2040i; FAO, 2040j; FAO, 2040k; FAO, 2040l; FAO, 2040m; FAO, 2040n; FAO, 2040o; FAO, 2040p; FAO, 2040q; FAO, 2040r; FAO, 2040s; FAO, 2040t; FAO, 2040u; FAO, 2040v; FAO, 2040w; FAO, 2040x; FAO, 2040y; FAO, 2040z; FAO, 2041a; FAO, 2041b; FAO, 2041c; FAO, 2041d; FAO, 2041e; FAO, 2041f; FAO, 2041g; FAO, 2041h; FAO, 2041i; FAO, 2041j; FAO, 2041k; FAO, 2041l; FAO, 2041m; FAO, 2041n; FAO, 2041o; FAO, 2041p; FAO, 2041q; FAO, 2041r; FAO, 2041s; FAO, 2041t; FAO, 2041u; FAO, 2041v; FAO, 2041w; FAO, 2041x; FAO, 2041y; FAO, 2041z; FAO, 2042a; FAO, 2042b; FAO, 2042c; FAO, 2042d; FAO, 2042e; FAO, 2042f; FAO, 2042g; FAO, 2042h; FAO, 2042i; FAO, 2042j; FAO, 2042k; FAO, 2042l; FAO, 2042m; FAO, 2042n; FAO, 2042o; FAO, 2042p; FAO, 2042q; FAO, 2042r; FAO, 2042s; FAO, 2042t; FAO, 2042u; FAO, 2042v; FAO, 2042w; FAO, 2042x; FAO, 2042y; FAO, 2042z; FAO, 2043a; FAO, 2043b; FAO, 2043c; FAO, 2043d; FAO, 2043e; FAO, 2043f; FAO, 2043g; FAO, 2043h; FAO, 2043i; FAO, 2043j; FAO, 2043k; FAO, 2043l; FAO, 2043m; FAO, 2043n; FAO, 2043o; FAO, 2043p; FAO, 2043q; FAO, 2043r; FAO, 2043s; FAO, 2043t; FAO, 2043u; FAO, 2043v; FAO, 2043w; FAO, 2043x; FAO, 2043y; FAO, 2043z; FAO, 2044a; FAO, 2044b; FAO, 2044c; FAO, 2044d; FAO, 2044e; FAO, 2044f; FAO, 2044g; FAO, 2044h; FAO, 2044i; FAO, 2044j; FAO, 2044k; FAO, 2044l; FAO, 2044m; FAO, 2044n; FAO, 2044o; FAO, 2044p; FAO, 2044q; FAO, 2044r; FAO, 2044s; FAO, 2044t; FAO, 2044u; FAO, 2044v; FAO, 2044w; FAO, 2044x; FAO, 2044y; FAO, 2044z; FAO, 2045a; FAO, 2045b; FAO, 2045c; FAO, 2045d; FAO, 2045e; FAO, 2045f; FAO, 2045g; FAO, 2045h; FAO, 2045i; FAO, 2045j; FAO, 2045k; FAO, 2045l; FAO, 2045m; FAO, 2045n; FAO, 2045o; FAO, 2045p; FAO, 2045q; FAO, 2045r; FAO, 2045s; FAO, 2045t; FAO, 2045u; FAO, 2045v; FAO, 2045w; FAO, 2045x; FAO, 2045y; FAO, 2045z; FAO, 2046a; FAO, 2046b; FAO, 2046c; FAO, 2046d; FAO, 2046e; FAO, 2046f; FAO, 2046g; FAO, 2046h; FAO, 2046i; FAO, 2046j; FAO, 2046k; FAO, 2046l; FAO, 2046m; FAO, 2046n; FAO, 2046o; FAO, 2046p; FAO, 2046q; FAO, 2046r; FAO, 2046s; FAO, 2046t; FAO, 2046u; FAO, 2046v; FAO, 2046w; FAO, 2046x; FAO, 2046y; FAO, 2046z; FAO, 2047a; FAO, 2047b; FAO, 2047c; FAO, 2047d; FAO, 2047e; FAO, 2047f; FAO, 2047g; FAO, 2047h; FAO, 2047i; FAO, 2047j; FAO, 2047k; FAO, 2047l; FAO, 2047m; FAO, 2047n; FAO, 2047o; FAO, 2047p; FAO, 2047q; FAO, 2047r; FAO, 2047s; FAO, 2047t; FAO, 2047u; FAO, 2047v; FAO, 2047w; FAO, 2047x; FAO, 2047y; FAO, 2047z; FAO, 2048a; FAO, 2048b; FAO, 2048c; FAO, 2048d; FAO, 2048e; FAO, 2048f; FAO, 2048g; FAO, 2048h; FAO, 2048i; FAO, 2048j; FAO, 2048k; FAO, 2048l; FAO, 2048m; FAO, 2048n; FAO, 2048o; FAO, 2048p; FAO, 2048q; FAO, 2048r; FAO, 2048s; FAO, 2048t; FAO, 2048u; FAO, 2048v; FAO, 2048w; FAO, 2048x; FAO, 2048y; FAO, 2048z; FAO, 2049a; FAO, 2049b; FAO, 2049c; FAO, 2049d; FAO, 2049e; FAO, 2049f; FAO, 2049g; FAO, 2049h; FAO, 2049i; FAO, 2049j; FAO, 2049k; FAO, 2049l; FAO, 2049m; FAO, 2049n; FAO, 2049o; FAO, 2049p; FAO, 2049q; FAO, 2049r; FAO, 2049s; FAO, 2049t; FAO, 2049u; FAO, 2049v; FAO, 2049w; FAO, 2049x; FAO, 2049y; FAO, 2049z; FAO, 2050a; FAO, 2050b; FAO, 2050c; FAO, 2050d; FAO, 2050e; FAO, 2050f; FAO, 2050g; FAO, 2050h; FAO, 2050i; FAO, 2050j; FAO, 2050k; FAO, 2050l; FAO, 2050m; FAO, 2050n; FAO, 2050o; FAO, 2050p; FAO, 2050q; FAO, 2050r; FAO, 2050s; FAO, 2050t; FAO, 2050u; FAO, 2050v; FAO, 2050w; FAO, 2050x; FAO, 2050y; FAO, 2050z; FAO, 2051a; FAO, 2051b; FAO, 2051c; FAO, 2051d; FAO, 2051e; FAO, 2051f; FAO, 2051g; FAO, 2051h; FAO, 2051i; FAO, 2051j; FAO, 2051k; FAO, 2051l; FAO, 2051m; FAO, 2051n; FAO, 2051o; FAO, 2051p; FAO, 2051q; FAO, 2051r; FAO, 2051s; FAO, 2051t; FAO, 2051u; FAO, 2051v; FAO, 2051w; FAO, 2051x; FAO, 2051y; FAO, 2051z; FAO, 2052a; FAO, 2052b; FAO, 2052c; FAO, 2052d; FAO, 2052e; FAO, 2052f; FAO, 2052g; FAO, 2052h; FAO, 2052i; FAO, 2052j; FAO, 2052k; FAO, 2052l; FAO, 2052m; FAO, 2052n; FAO, 2052o; FAO, 2052p; FAO, 2052q; FAO, 2052r; FAO, 2052s; FAO, 2052t; FAO, 2052u; FAO, 2052v; FAO, 2052w; FAO, 2052x; FAO, 2052y; FAO, 2052z; FAO, 2053a; FAO, 2053b; FAO, 2053c; FAO, 2053d; FAO, 2053e; FAO, 2053f; FAO, 2053g; FAO, 2053h; FAO, 2053i; FAO, 2053j; FAO, 2053k; FAO, 2053l; FAO, 2053m; FAO, 2053n; FAO, 2053o; FAO, 2053p; FAO, 2053q; FAO, 2053r; FAO, 2053s; FAO, 2053t; FAO, 2053u; FAO, 2053v; FAO, 2053w; FAO, 2053x; FAO, 2053y; FAO, 2053z; FAO, 2054a; FAO, 2054b; FAO, 2054c; FAO, 2054d; FAO, 2054e; FAO, 2054f; FAO, 2054g; FAO, 2054h; FAO, 2054i; FAO, 2054j; FAO, 2054k; FAO, 2054l; FAO, 2054m; FAO, 2054n; FAO, 2054o; FAO, 2054p; FAO, 2054q; FAO, 2054r; FAO, 2054s; FAO, 2054t; FAO, 2054u; FAO, 2054v; FAO, 2054w; FAO, 2054x; FAO, 2054y; FAO, 2054z; FAO, 2055a; FAO, 2055b; FAO, 2055c; FAO, 2055d; FAO, 2055e; FAO, 2055f; FAO, 2055g; FAO, 2055h; FAO, 2055i; FAO, 2055j; FAO, 2055k; FAO, 2055l; FAO, 2055m; FAO, 2055n; FAO, 2055o; FAO, 2055p; FAO, 2055q; FAO, 2055r; FAO, 2055s; FAO, 2055t; FAO, 2055u; FAO, 2055v; FAO, 2055w; FAO, 2055x; FAO, 2055y; FAO, 2055z; FAO, 2056a; FAO, 2056b; FAO, 2056c; FAO, 2056d; FAO, 2056e; FAO, 2056f; FAO, 2056g; FAO, 2056h; FAO, 2056i; FAO, 2056j; FAO, 2056k; FAO, 2056l; FAO, 2056m; FAO, 2056n; FAO, 2056o; FAO, 2056p; FAO, 2056q; FAO, 2056r; FAO, 2056s; FAO, 2056t; FAO, 2056u; FAO, 2056v; FAO, 2056w; FAO, 2056x; FAO, 2056y; FAO, 2056z; FAO, 205

There is strong evidence that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is associated with healthy forests. For example, a recent study measured carbon in 30 community forests over three to four years, covering Guinea Bissau, India, Mali, Nepal, Papua New Guinea, Senegal, and Tanzania. The 30 community forests showed an overall average increase in forest carbon storage of 4.9 tonnes per hectare per year.¹⁶ In three forests, total carbon stock decreased due to illegal clear-cutting for cropland by non-community members.¹⁷ A separate analysis of 80 forests in 10 countries across Latin America, East Africa, and South Asia found that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 is associated with high levels of carbon storage.¹⁸

Globally, an estimated 37.7 billion tonnes of carbon stock are held in the living biomass of the 513 million hectares of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¹⁹—about equal to the carbon in all the forests of North America.²⁰ If this carbon were released into the atmosphere as CO₂, it would be approximately equal to 29 times the annual CO₂ emissions produced by all the passenger vehicles in the world.²¹

Strengthening the rights of these communities and extending them to other community forests can provide a new front in the battle against climate change and should be recognized and prioritized as such by policymakers and aid agencies.

This report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 **SECTION II** provides background on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includ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 **SECTION III** presents the report's methodology.
- **SECTION IV** discusses three categories of legal recognition and government act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forest health.
- **SECTION V** concludes with a summary of the analysis,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ction by donors, governments, business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Globally, an estimated 37.7 billion tonnes of carbon stock are held in the living biomass of the 513 million hectares of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about equal to the carbon in all the forests of North America.





SECTION II

LEGAL RECOGNITION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Legal recognition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forest rights differ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as well as within countries and across communities.

What Are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Many communities in practice exercise a range of rights over their forests but are granted only limited legal recognition of these rights by their governments. These allow them, for example, to use forest resources for specific purposes such as harvesting timber or medicinal plants.²² Many other communities have no legal rights at all over the forest they call home, exercising rights that are entirely unofficial or customary.²³

There are several rights that communities may enjoy and that governments have the power to legally recogniz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report we use the bundle of rights framework developed by the 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 (RRI), which includes:

- **ACCESS:** right to enter or pass through the forest.
- **WITHDRAWAL OR USE:** right to benefit from the forest's resources.
- **MANAGEMENT:** right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forest resources and for a forest area over which the community has rights of access and withdrawal or use.
- **EXCLUSION:** right to refuse access to and use of the forest.
- **DUE PROCESS AND COMPENSATION:** right to legally challenge a government's efforts to take one, several, or all of the community's forest rights.
- **DURATION:** the length of time a community may exercise their rights—either limited or recognized in perpetuity.
- **ALIENATION:** right to transfer the forest to another by sale, lease, or some other means.²⁴

Legal recognition is generally stronger where it includes a fuller bundle of these rights, with the exception of alienation, and where implementation is more widespread. Many of these rights can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helping communities resist deforestation pressures and maintain healthy forests. For example, without the right to exclude outside interests such as loggers or mining companies, communities have no legal recourse to stop encroachments.²⁵ Communities with the healthiest forests are often those that make their own rules and retain management authority.²⁶ Countries where research has shown this association to be

true are Honduras, Nicaragua, and Tanzania.²⁷ An analysis of 84 communities in Africa and Asia found a similar correlation.²⁸

Likewise, a community's right to use or harvest forest resources can provide positive economic returns that then give communities strong incentives to invest in sustainably managing and protecting their forest.²⁹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can prompt increased local investment in the improved management of forests. And improvements in forest management can increase the flows of valued goods and services and reinforce the economic incentives for protecting forests.

How Are They Protec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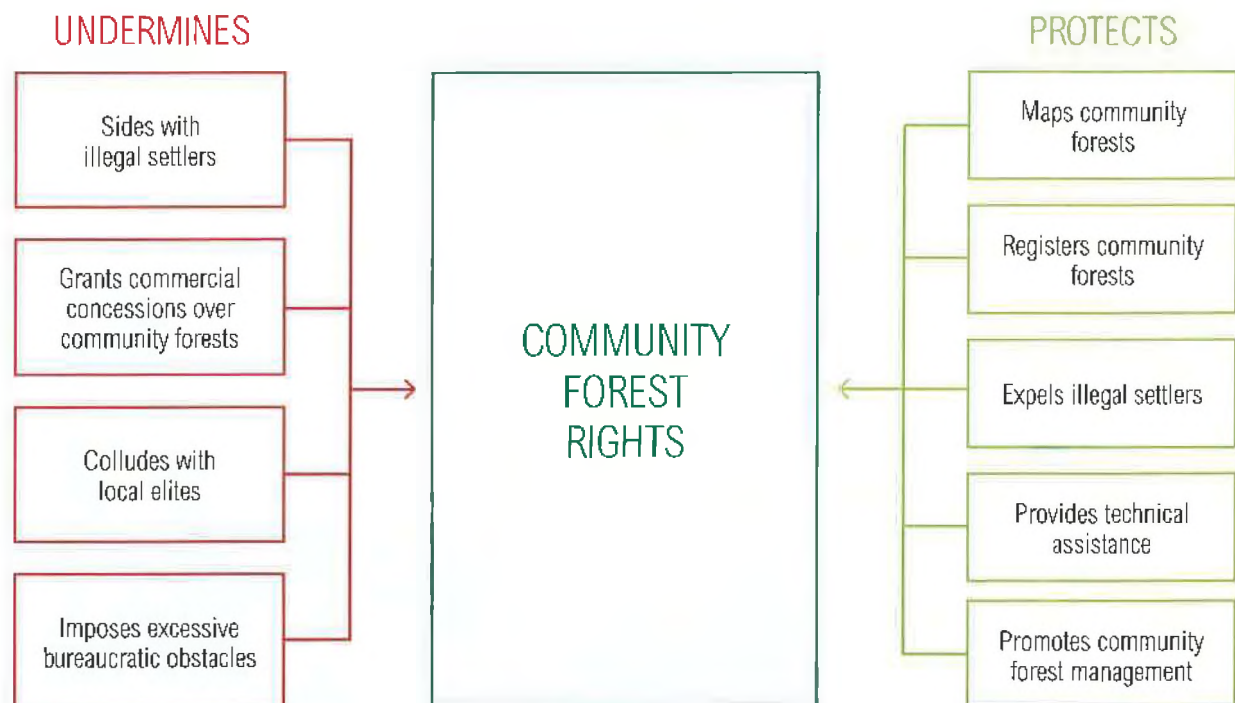
Beyond recognition of strong legal rights, many factors affect the security of a community's forest rights, including the level of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in communities.³⁰ But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acts to protect those rights, using the resources and legal authority at its disposal.³¹ (See *Figure 1.*) Government protection can increase the security of a community's legal forest rights and help ensure the community obtains the full benefits of legal rights b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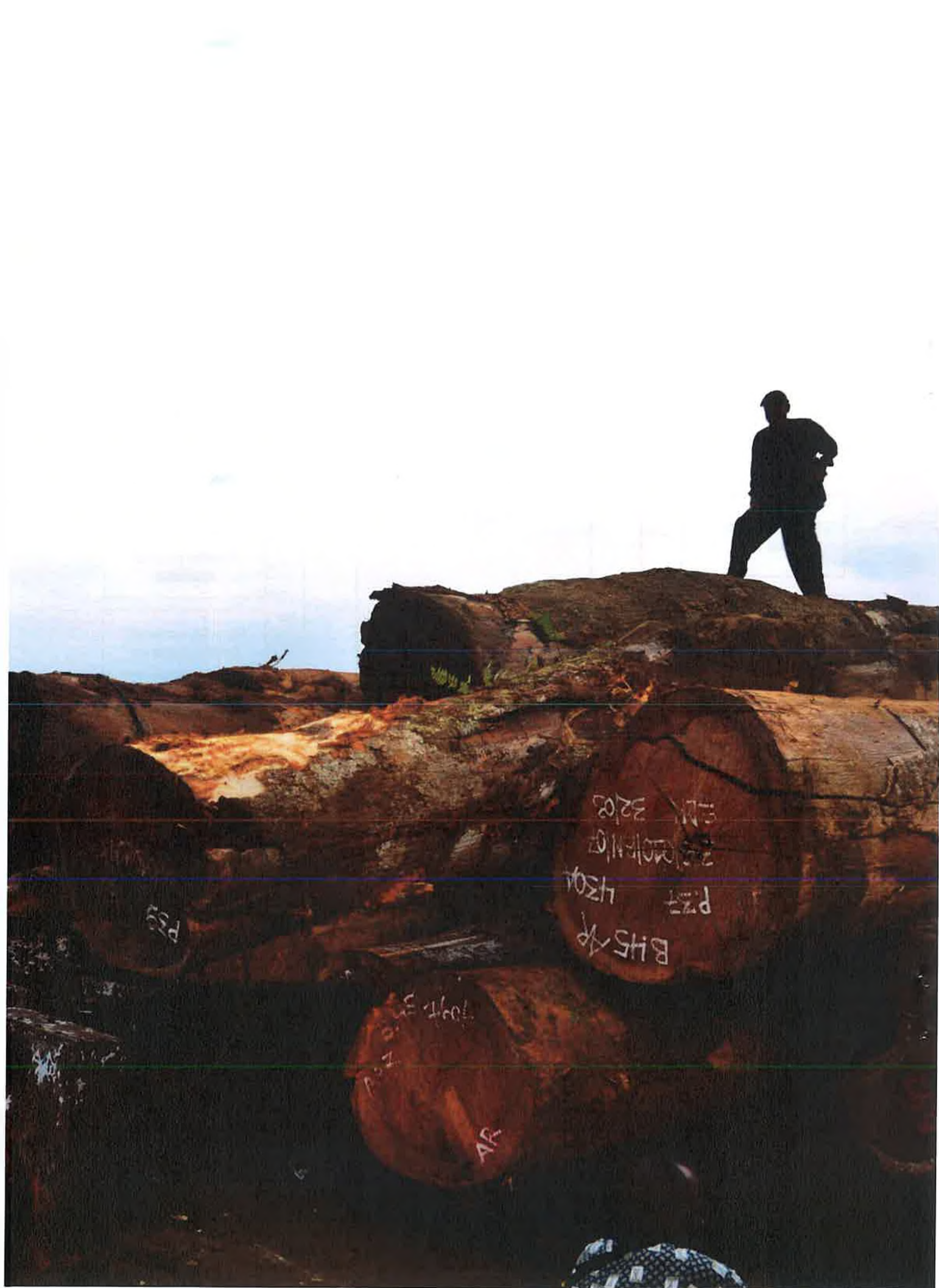
- Documenting rights, such as by mapping and registering a community forest;
- Enforcing rights, such as expelling illegal settlers and loggers; or
- Providing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incentives to improve sustainability and market access.³²

Equally, government actions ca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a community's forest rights and increase the risk of high CO₂ emissions through neglect or activities that undermine a community's forest rights. These may include:

- Imposing excessive bureaucratic obstacles, such as delaying government approval for communities to use and benefit from forest resources;³³
- Failing to act against, or siding with, illegal settlers;³⁴
- Granting mineral and oil concessions within a community's forest;³⁵ or
- Colluding with local elites to capture high-value forest resources.³⁶

Figure 1 | **Some Government Actions That Can Protect or Undermine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SECTION III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METHODOLOGY

This report's findings are based on analysis of about 130 studies on the intersection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health, and climate chan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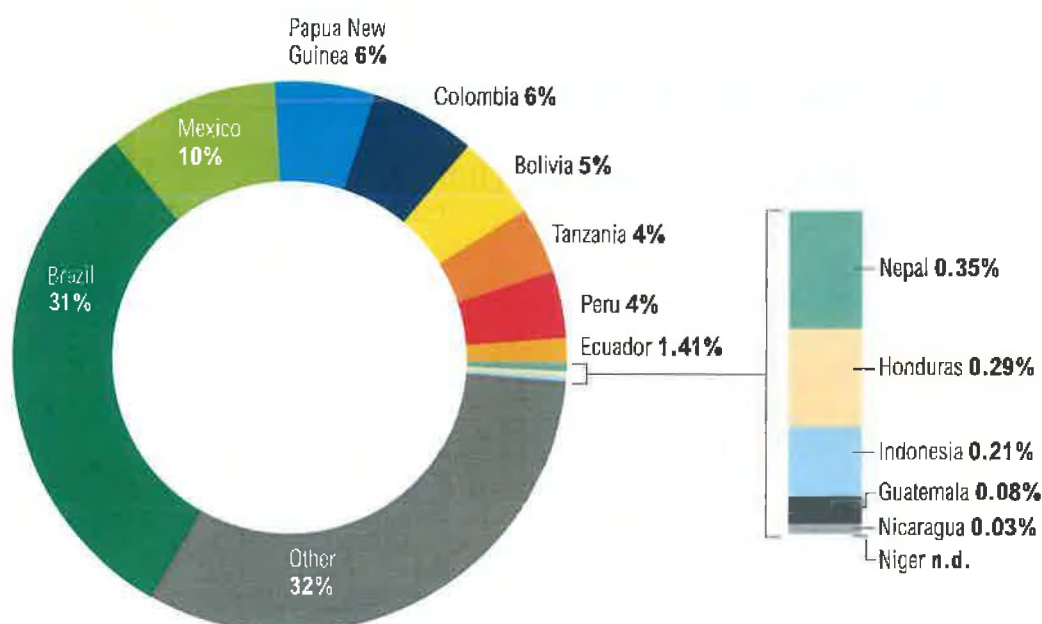
The studies were identified with key word searches and reference to two recent literature reviews: Seymour et al. and Zulu et al.³⁷ They includ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ase studies, meta-studies (which analyze results from multiple studies), and literature reviews. Almost all were published in the last 10 years, and some of the more recent studies use satellite data. The studies use various measurements of forest health, including percentage of forest cover and changes in the density, size, volume, or total biomass of trees.³⁸ Th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lso conducted new carbon and satellite data analyses of forest loss and gain in relation to community forests. (See Appendix A.)

Together, the studies contained in the literature provide powerful evidence of the links between forest health and community rights, which can be organized into three types:

- **META-STUDIES AND LARGE COMPARATIVE STUDIES** provide robust evidence that legal recognition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re associated with low deforestation.
- **MATCHING AND SIMILAR STUDIES** control for numerous variables and determine whether legal recognition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likely prevent forest loss.
- **CASE STUDIES** provide more context and deep analysis.















The literature—and therefore this report—focuses on 14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Africa, and Asia. Together, these contain about 323 million hectares of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68 percent of the estimated total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see Figure 2)—as well as substantial community forests without legal recognition.³⁹ In six of the countries, including Brazil and Indonesia, forest covers at least half the land area.⁴⁰ (See Table 1.)

Figure 2 |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 by Country as Percentage of Total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 in Low- or Middle-Income Countries



Source: RRI, 2014c. Data on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in Ecuador are from *Red Amazónica de Información Socioambiental Georreferenciada* (RAISG, 2012). Data on the amount of community forest in Nicaragua are from *Inventario Nacional Forestal*, 2008.

Table 1 | Forest-Related Data for 14 Countries

SOUTH AMERICA	BOLIVIA  53% Total forest cover OF WHICH 44% is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BRAZIL  62% Total forest cover OF WHICH 28% is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COLOMBIA  55% Total forest cover OF WHICH 49% is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ECUADOR  36% Total forest cover OF WHICH 55% is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GUATEMALA  34% Total forest cover OF WHICH 10% is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HONDURAS  46% Total forest cover OF WHICH 27% is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MEXICO  33% Total forest cover OF WHICH 71% is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NICARAGUA  26% Total forest cover OF WHICH 49% is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PERU  53% Total forest cover OF WHICH 26% is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AFRICA	NIGER  1% Total forest cover No Data on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TANZANIA  38% Total forest cover OF WHICH 63% is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INDONESIA  52% Total forest cover OF WHICH 1% is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NEPAL  25% Total forest cover OF WHICH 49% is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PAPUA NEW GUINEA  63% Total forest cover OF WHICH 97% is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ASIA			

Note: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 may include types of community forest not covered in the case discussions in Section IV. For example, Brazil includes Indigenous Lands, sustainable-use community forest, and Afro-Brazilian communities, among others. The Brazil case discussion here concerns only Indigenous Lands.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as a percentage of national forest was calculated using data on total hectares of forest from FAO, 2010, with data on total hectares of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 from RRI, 2014c. Data on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in Ecuador are from RAISG, 2012. Data on the amount of community forest in Nicaragua are from Inventario Nacional Forestal, 2008.

BOX 3 | RESEARCH LIMITATIONS

Substantiating a causal relationship—as opposed to an association—between legal recognition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for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nd reduced deforestation is difficult. The causes of deforestation have many variables,¹ precise location data for community forests are hard to come by,² and researchers define terms and concepts differently.³ Factors besides the strength of a community's forest rights can also affect deforestation levels and forest health. These include community links to support networks,⁴ the location and size of a community's forest,⁵ and the value of the land or forest resources to potential investors.⁶ Nevertheless, the analysis here is based on a large volume of robust and compelling evidence.

1. Zulu et al., 2014; Baughton-Trevis and Woodard, 2014; Baughton-Trevis et al., 2013.

2. Zulu et al., 2014; Arceva and Chinnai, 2005; Ferrali-Dallier and Busch, 2014; in Baughton-Trevis et al., 2013.

3. Baughton-Trevis and Vassilakis, 2014.

4. Lundy, 2013.

5. Larson et al., 2010.

6. Adeney, 2009; Anderson, 2012; Wapstad et al., 2006.

The remainder of this report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in these 14 countries, between legal forest rights, government action to protect those rights (or not), and associated deforestation and CO₂ emissions. Community forests in each country are assessed against two key factors: legal forest rights and government action.

As defined in Section II, *forest rights* are access, withdrawal/use, management, exclusion, due process/compensation, duration, and alienation. Determination of communities' legal rights for each type of community forest discussed is based on a country legal review done by RRI and on supplemental research.

Government actions are broadly grouped into two categories:

- **POSITIVE GOVERNMENT ACTION (+):** Government protects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by securing the rights or helping the community obtain the full benefits of their legal rights through, for example, mapping or registering their forest or providing technical assistance.

- **NEGATIVE GOVERNMENT ACTION (-):** Government weakens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by neglecting to protect or undermining their rights by, for example, allocating their forest to companies for mining or oil palm production.

Government action was determined to be positive or negative primarily by relying on studies found during the review. Communities' experiences vary, and government may be protective overall but fall short in other instances, or vice versa.

As mentioned, this report relies on studies that use various measures of forest health. In general, the studies compare deforestation or the health of community forest with neighboring areas or government-protected forests. Consistent with this, the report determines forest outcomes broadly as follows:

- **POSITIVE FOREST OUTCOME:** Observed reforestation, improvements in forest health, or low deforesta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est.
- **NEGATIVE FOREST OUTCOME:** Observed high deforestation or degrada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est.

The 14 country cases are first classified by legal rights and how governments act in relation to those rights. (See Table 2.)

The analysis of forest health and findings is then presented in three categories:

- Communities with no or weak legal recognition of their forest rights.
- Communities with some legal rights bolstered by positive government action.
- Communities with some legal rights but where negative government action undermines these rights.

The findings draw on studies that link low deforestation to legal recognition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or that demonstrate that the absence of legal rights tends to make forests vulnerable to deforestation and associated CO₂ emissions. (See Box 3 for a discussion of research limitations.)

Table 2 | **Categorization of Country Cases by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nd Government Action**

REGION	COUNTRY	OFFICIAL TERM/ LEGAL CATEGORY	LEGAL RIGHTS RECOGNIZED	GOVERNMENT ACTION
Latin America	Bolivia (Amazon)	Original Community Titles	A WN WT M E D U	
	Brazil (Amazon)	Indigenous Lands	A WN WT M E D U	
	Colombia (Amazon)	Indigenous Reserves	A WN WT M E D U	X
	Ecuador (Amazon)	Indigenous Territories	A WN WT M E ⁱ U	X
	Guatemala (Petén)	Community Concessions	A WN WT M E D	
	Honduras (Rio Plátano)	Community Concessions	A WN WT M E ⁱⁱ	X
	Mexico	Ejidios and agrarian communities	A WN WT M E D AL ⁱⁱⁱ U	
	Nicaragua (Bosawas)	Communal Lands	A WN WT M E U	X
Africa	Peru (Amazon)	Native Community Lands	A WN WT ^{iv} M E D U	X
	Niger	Agroforests	A WN WT M E ^v	
Asia	Tanzania	Village Land Forest Reserves and Joint Forest Management	A WN WT M ^{vi} D U ^{vii}	
	Nepal	Community Forests	A WN WT M E AL ^{viii} U	
	Indonesia	Various	Varies ^{ix}	X
	Papua New Guinea	Common Customary Lands	A WN WT M E D AL U	X

Key to Legal Rights: A = access WN = withdrawal and use of non-lumber forest resources WT = withdrawal and use of timber forest resources M = management E = exclusion D = due process and compensation AL = alienation U = unlimited duration.

Key to Government Action: = positive government action; X = negative government action.

- i No data on whether Ecuadorian Indigenous Territories enjoy the right of due process and compensation.
ii No data on whether Honduran Community Concessions enjoy the right of due process and compensation.
iii For agrarian communities, alienation includes the right to lease the land and use the land as collateral for a loan only.
iv Law provides only a subsistence withdrawal right.
v No data on whether rights are for an unlimited duration.
vi Law provides the community with the right to sit on a management board.
vii Village Land Forest Reserves are for an unlimited duration. Joint Forest Management is for a limited duration.
viii Right to use forest as collateral for a loan only.
ix Pre-2013 Constitutional Court ruling, communities had legal rights to their forest but only if the government issued licenses, which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for only a few communities. As a result, most communities have no legal rights to their forest.



SECTION IV

THE CLIMATE IMPACT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NALYSIS AND FINDINGS

Dozens of studies described in this section confirm an association between low deforestation and legal recognition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for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The converse is also true. When communities have no or weak legal rights, their forests tend to be vulnerable to deforestation and associated CO₂ emissions.

No or Weak Legal Recognition and Negative Government Action

In many countries, governments do not legally recognize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or do so only weakly. For example, governments retain legal administrative control over 99 percent of forests in the Congo Basin region, 99 percent of forests in peninsular Southeast Asia, and all the forest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⁴¹

Yet, recent meta-studies and matching studies provide evidence that no or weak legal recognition likely results in high deforestation. A meta-study by Robinson et al. analyzed 118 cases of different forest rights, including for community forests, derived from 150 publications. Their conclusion: weak community rights are “tightly linked” to high deforestation while strong rights are linked to low deforestation.⁴² (See Box 4 on how matching studies apply to additionality and leakage.)

By controlling for multiple variables, advance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lso suggest that no or weak legal forest rights likely result in deforestation of community forests. Nolte et al. analyzed legally recognized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in Brazil, as well as government-protected areas and sustainable-use forests, controlling for multiple variables (including location, topography, and travel time to major cities, among other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legal recognition.⁴³ From 2001 to 2005, legally recognized indigenous forests in Brazil on average experienced deforestation of only 0.21 percent compared with a business-as-usual deforestation of 4.47 percent.⁴⁴ In other words, deforestation of the indigenous forests would likely have been 22 times higher if they had not been legally recognized and protected. This result is supported

b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where most communities have no legal recognition of their forest rights combined with negative government action.

Indonesia

Indonesia’s large forest areas are under threat. While the country boasts the sixth highest above-ground biomass in the world,⁴⁵ it is also the second largest emitter of CO₂ from land uses,⁴⁶ mainly because of extensive deforestation. This situation is partly the result of a lack of legal recognition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s well as government actions harmful to those rights.

The Indonesian National Forest Law empowers the government to manage the forest. The law provides for two forest categories: National Forest (*Hutan Negara*) and Private Forest (*Hutan Hak*). To date, no private forests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Four types of licenses can be issued to communities to recognize rights over National Forest,⁴⁷ but few potentially eligible communities have obtained legal recognition under the Forestry Law.⁴⁸ Out of at least 42 million hectares of forests customarily held by communities,⁴⁹ only 1 million hectares are legally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routinely allocates community forests for oil palm concessions, industrial timber plantations for pulp and paper, and other conflicting land uses.⁵⁰ In 2008, for example, oil palm was responsible for 27 percent of total deforestation in one district of West Kalimantan, with commercial oil palm concessions covering 59 percent of community forests, whether legally recognized or not.⁵¹ By 2011, the number of community forests overlapping with oil palm concessions more than doubled in that district.⁵²

Original WRI analysis of deforestation from 2000 to 2012 in the Sakapat indigenous community in West Kalimantan is provided in Figure 3. The community mapped its forest and registered its claim with the National Indigenous People's Alliance of the Archipelago (AMAN), an Indonesian NGO, which submitted the maps for official recognition. The government, however, has yet to recognize the community's forest rights. And since 2005, deforestation increased noticeably.

Other communities in Indonesia have similar experiences. In the Papua region, governments and companies are converting the forests of Mali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o commercial agriculture. In the absence of proper information from government or companies that their forest will be irreversibly lost, communities are consenting to long-term commercial use of their land for less than US\$1 per hectare per year. Violent conflicts have erupted as a result.⁵³

In 2013 the Indonesian Supreme Court declared unconstitutional a provision in the Forestry Law limiting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to National Forests. The ruling recognized community ownership over forests for the first time.⁵⁴ New legislation that will implement this ruling and recognize communities' legal ownership of their forests is pending and will lay the groundwork for potentially significant reductions in Indonesia's CO₂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BOX 4 | ADDITIONALITY AND LEAKAGE

"Additionality" is a climate change term that means a particular action, like strengthening a community's legal rights to its forest, has an added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benefit. In other words, additionality is concerned with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had no action been taken. This is relevant to community forests because in some cases community rights are legally recognized over a forest area that is not subject to deforestation pressures. It is unlikely to be deforested anytime soon. Thus,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ty's rights did not provide an added climate benefit because the forest would not have been lost in any case.

To address this issue, a number of studies use research methods that control for multiple variables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at would likely have happened to the "forest" if the communities' rights had not been recognized. Several studies do this by "matching" legally 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with unprotected forests with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For example, a global matching analysis conducted by Nelson and Chomitz found that legally recognized and protected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forests are as effective as strictly protected government areas, or more so, in preventing deforestation, particularly in Latin America.

These kinds of techniques are not perfect measures of avoided deforestation and CO₂ emissions. They do not address the issue of leakage, a critical part of additionality. Leakage occurs when efforts to stop deforestation in one area serve to push it into another area that would otherwise have remained untouche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thus move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rather than being prevented altogether. When this happens, the added mitigation benefits are reduced.⁵⁵

⁵³ See Harce et al., 2014.

⁵⁴ Nelson and Chomitz,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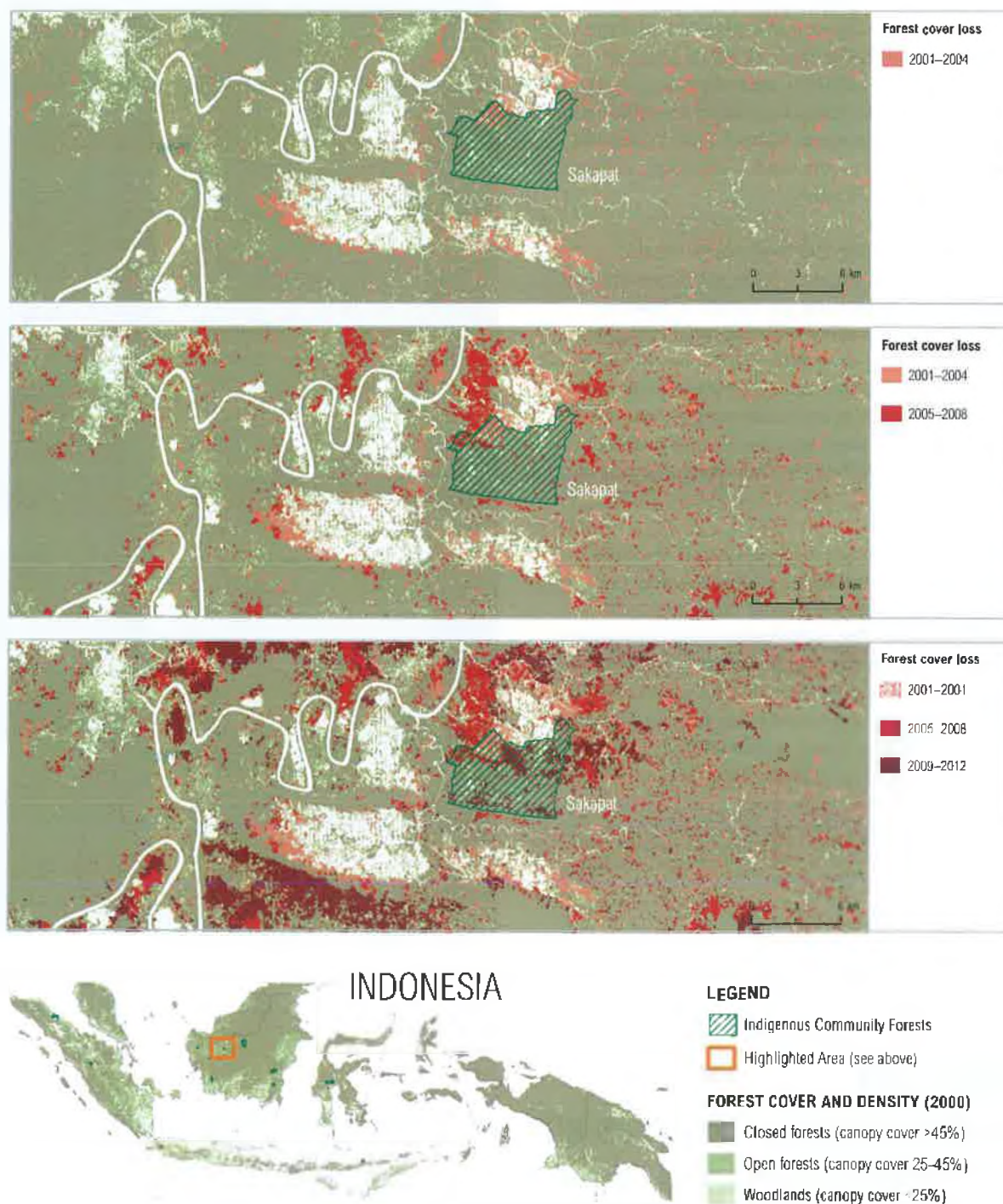
⁵⁵ Ribstad et al., 2006.

iv DDI, undated.

FINDING #1:

Whe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have no or weak legal rights, their forests tend to be vulnerable to deforestation and thus become the source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igure 3 | **Satellite-Detected Forest Cover Loss in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2000–12, for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 without Official Recognition**



Source: Forest cover loss data are from Hansen et al., 2013, and depict forest change at a spatial resolution of 30 meters across the globe. Data for the community forest are from the Ancestral Domain Registration Agency in Indonesia and are based on community mapping undertaken by SEKALA, the Participatory Mapping Network, and AMAN. Using these data sets, WRI created the above analysis and graphic visualization.

Legal Recognition and Positive Government Action

Seven focus countries include community forests that enjoy legal recognition and have governments that generally protect those rights: Bolivia, Brazil, Guatemala, Mexico, Nepal, Niger, and Tanzania. These rights are linked to healthy forests and low deforestation, with resultant benefits for reducing CO₂ emissions.

Bolivia (Amazon)

Bolivia's Indigenous Peoples are entitled to obtain Original Community Titles (OCT) recognizing their rights to manage and benefit from the land. The government retains no formal ownership. Communities are prohibited from selling their land, but they may exploit forest resources for commercial use subject to a government-approve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plan.⁵⁵ An area of 22 million hectares, slightly larger than Greece, is held by Indigenous Peoples in Bolivia under OCTs.⁵⁶

OCTs in Bolivia have experienced low deforestation. From 2000 to 2010, only about 0.5 percent of land on recognized OCTs was deforested, compared with 3.2 percent overall deforestation in the Bolivian Amazon.⁵⁷ Rates of deforestation were thus six times lower in forests where Indigenous Peoples have OCTs than in other forests. Detailed analysis of two OCTs shows more dramatic findings. The Tsimane and Multiethnic OCTs were created in 1990 covering 400,000 hectares each, although some of this area has since been reallocated to others.⁵⁸ From 1986 to 2009, the Tsimane OCT lost 5,100 hectares or 3.5 percent of its forest, with the Multiethnic OCT losing only 0.25 percent. Meanwhile, neighboring privately owned forestlands lost about 25 percent of their old-growth forest.⁵⁹

Brazil (Amazon)

With about 63 billion tonnes of carbon locked in its biomass, Brazil has the most carbon-rich forests in the world.⁶⁰ The Brazilian Amazon contains about half the world's remaining tropical rainforest and 10 percent of the carbon stored in all land ecosystems.⁶¹ Much of this carbon is in community forests, including a large number of legally recognized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However, Brazil is also one of the largest emitters of greenhouse gases from deforestation in the world⁶² and the site of most Amazon deforestation.⁶³ Yet, analysis shows that recognition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deforestation, indicating CO₂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would almost certainly be worse i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did not have legal forest rights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From 1980 to 2007, about 300 Indigenous Lands were legally recognized in Brazil, although completion of the official mapping and registration process has proved slow. Indigenous Lands vest the community with the perpetual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and to manage and use the forest sustainably, with the government retaining formal ownership. Forest resources may be used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subject to an approved sustainability plan, but cutting trees for sale requires approval by the National Legislature. Importantly,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extends to subsurface minerals, with the government generally barred from allocating mineral rights in these areas.⁶⁴

Numerous studies show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igenous Lands at resisting deforestation pressures in Brazil. A matching analysis by Nolte et al. compared the ability of government-protected areas, sustainable-use areas, and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to resist deforestation and concluded that Indigenous Lands "were consistently estimated to face the highest levels of deforestation pressures and to have achieved the greatest avoided deforestation."⁶⁵ Similarly, Nepstad et al. found that Indigenous Lands "strongly inhibited deforestation in the active agricultural frontier."⁶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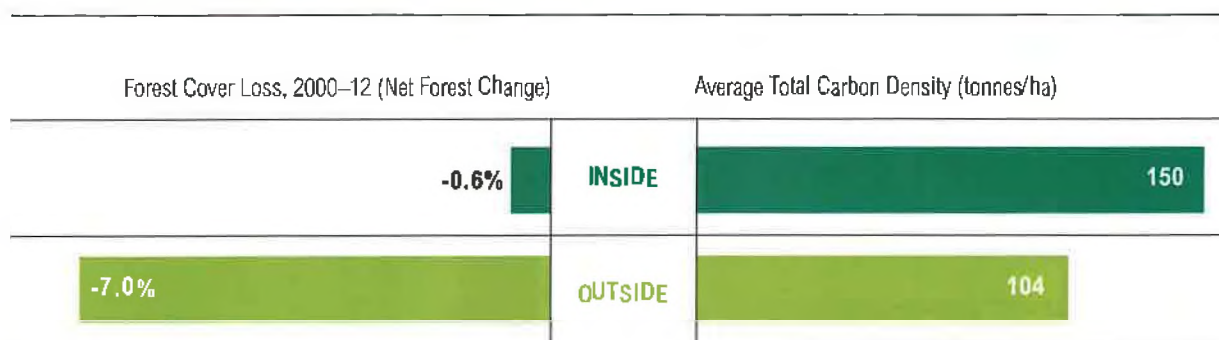
These findings are supported by a WRI deforestation analysis for the Brazilian Amazon. From 2000 to 2012, forest loss was only 0.6 percent inside Indigenous Lands compared with 7.0 percent outside. (See Figure 4.) Figure 5 shows a section of the Brazilian Amazon under intense deforestation pressure. Forest loss between 2000 and 2012 is clustered close to, but rarely inside, the borders of Indigenous Lands.

Figure 5 | Satellite-Detected Tree Cover Loss in Brazil, 2000–12, for Indigenous Lands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Brazilian Amazon



Source: Forest cover loss data are from Hansen et al., 2013, and depict forest change at a spatial resolution of 30 meters across the globe. Data for Indigenous Lands are from the Ministry of Justice's National Indian Foundation (Fundação Nacional do Índio, 2013). The number of Indigenous Lands in the dataset is 371, which includes both fully recognized territories and those still in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NOTE: FUNAI's data on community lands show about 35 million fewer hectares than data from RRI. The reason for the discrepancy is FUNAI's data are for Indigenous Lands—not, as in the RRI data, for other tenure types: Extractive Reserv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rves, Agro-Extractive Settlement Projects, Forest Settlement Projec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Quilombolas (peoples of African descent) Territories.

Figure 4 | **Comparing Forest Cover Loss, 2000–12, and Average Carbon Density Inside and Outside Indigenous Lands in the Brazilian Amazon**



Source: Hansen et al. 2013. Carbon data from Saatchi et al., 2011.

The Brazilian government generally protects Indigenous Peoples' forest rights, but Indigenous Peoples often forcefully defend their own forest by expelling loggers, ranchers, and other intruders.⁶⁷ Indigenous Lands are the only areas of the Amazon with roads cutting across them that have not succumbed to deforestation.⁶⁸ The roads do not always go around Indigenous Lands, but the deforestation does.

As a result, community forests in the Brazilian Amazon tend to be relatively carbon-rich, containing 36 percent more carbon per hectare than areas of the Brazilian Amazon outside Indigenous Lands (see Figure 4).⁶⁹

WRI analysis of deforestation and carbon stock found that 27 times more CO₂ emissions were produced outside Indigenous Lands than inside from 2000 to 2012. Forest cover loss of 22.5 million hectares in the Brazilian Amazon outside Indigenous Lands resulted in 8.7 billion tonnes of CO₂ emitted during those years. In the same period, 311 million tonnes of CO₂ emissions were produced from deforestation of about 677,000 hectares of forest on Indigenous Lands.

Brazil's Indigenous Lands therefore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keeping CO₂ emissions from the atmosphere. One estimate suggests that Indigenous Lands and government-protected areas in the Brazilian Amazon could prevent 27.2 million hectares of deforestation by 2050, an area slightly larger than the United Kingdom. If the carbon in this large forest area were emitted as CO₂, it would amount to approximately 12 billion tonnes of CO₂⁷⁰—the

equivalent of about three years' worth of CO₂ emissions from all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countries.⁷¹

Guatemala (Petén)

The Petén Maya Biosphere Reserve of Guatemala was established in 1989 as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protecting 2.1 million hectares of lowland forests. The Reserve includes Protected Areas where use of any forest resources is prohibited, adjacent buffer zones, and "multiple use zones" where 12 community concessions and two industrial logging concessions are located. The community concessions recognize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to management, exclusion, and use, among others, and operate under management agreements for renewable 25-year terms. Sustainable commercial use of forest resources is permitted,⁷² but communities must prepare forest management plans and obtain certification from the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FSC). This highly regarded international body that sets forest standards only certifies a community concession if it meets the FSC's principles and criteria, such as clearly defined forest rights.⁷³ Eight community concessions are FSC-certified, but four small concessions have not obtained certification because of encroachments by cattle ranchers.⁷⁴ Guatemala's National Council of Protected Areas, a government agency, oversees the community concessions but delegates much of its authority to a trained and accredited forestry technician. The forestry technician is mostly paid for by the communities and responsible for enforcing regulations, management plans, and other official duties.⁷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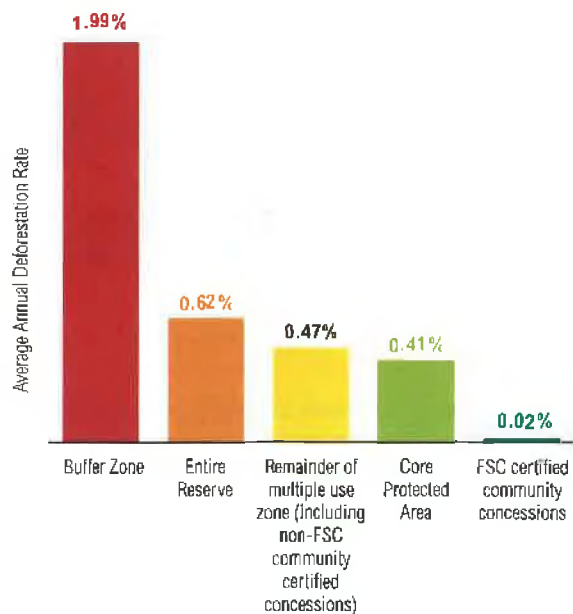
A comparison of FSC-certified community concessions with non-certified community concessions and nearby buffer zones and Protected Areas revealed that the lowest rates of deforestation occurred in FSC-certified community concessions. From 1986 to 2007 they experienced only 0.02 percent deforestation compared with 0.41 percent in the Protected Areas—about 20 times less deforestation.⁷⁶ (See Figure 6.)

Mexico

In Mexico, *ejidos* and “agrarian communities” (community lands) account for 71 percent of the nation’s forests.⁷⁷ Since 1986, the country’s Forestry Law has recognized communities’ full legal rights over their forests, including commercial use rights,⁷⁸ although sale of forested community lands is prohibited.⁷⁹ In the late 1990s the Mexican government increased institutional and resource support for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 establishing a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wo government programs to support sustainable forest use. These programs helped train communities to improve sustainability and market access, among other things,⁸⁰ and the government paid for some community lands to receive FSC certification, which increased benefits to the community through the sale of certified timber.⁸¹ As of October 2010, some 8.1 million hectares of Mexico’s forests were under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 plans.⁸²

This practical management and livelihood support has helped *ejidos* and agrarian communities with common forest resources to minimize deforestation.⁸³ Community-managed forests in the Yucatan Peninsula have recorded lower deforestation rates than even government-protected areas designated

Figure 6 | **Average Annual Deforestation Rates in the Maya Biosphere Reserve, Guatemala, 1986–2007**



Source: Hughell and Butterfield, 2008.

for strict conservation.⁸⁴ For example, from 2000 to 2005 the Calakmul Biosphere Reserve in Yucatan experienced a deforestation rate of 0.7 percent, compared with a rate of practically zero (0.002 percent) from 2000 to 2004 for a nearby community-managed forest.⁸⁵ From 1990 to 2006, two *ejidos* without community forest programs lost up to 11 times more forest than two *ejidos* with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⁸⁶

FINDING #2:

Legal forest rights for communities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their rights tend to lower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deforestation.

In addition, some *ejidos* have fully individualized parcels, with no common forest resources remaining, whereas others retain common forest resources. The privatized *ejidos* show higher deforestation than the *ejidos* that retain common forest resources.⁸⁷

The carbon mitigation potential here is enormous as community-managed forests improve their carbon storage and reduce Mexico's CO₂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 sample of only five community-managed forests totaling 375,500 hectares estimated their carbon storage potential to be 64.1 million tonnes.⁸⁸ The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benefits would be even greater if extended to include the thousands of community forests in Mexico.

Nepal

Nepal is a well-documented case where legal recognition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has halted tree clearance and helped maintain healthy forests,⁸⁹ particularly in the hills and mountains of the country, where 75 percent of remaining forests are located.⁹⁰ The government has devolved forest management rights to communities over the past 35 years⁹¹ and suppor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legally recognized community associations or Community Forest User Groups (CFUGs).⁹² Communities are banned from clearing forests for agricultural use, but they can use them for subsistence and commercial purposes.⁹³ Twenty-five percent of CFUG revenues must be invested in rehabilitating the community forest, while surplus funds can be allocated to other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vestments.⁹⁴

As of 2013, over 17,000 CFUGs manage about 1.6 million hectares of forests, benefiting more than 2 million households.⁹⁵ The community forests are sprea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being found in 74 of 75 districts.⁹⁶ With 32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benefiting from community forestry,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important poverty reduction programs, and it generates substantial livelihood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 benefits.⁹⁷

Ninety-three percent of CFUGs report improvement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ir community forests.⁹⁸ In the Chitwan valley of Nepal, researchers observed improvements in forest health from 1989

to 2000 in areas managed by CFUGs. Communities actively protected and restored degraded forests, helping achieve a 22 percent increase in vegetation density. In 2008, a forest assessment in the Koshi Hills showed a 21 percent increase in biomass over 14 years.⁹⁹

Improving the health of CFUG-managed areas also increased the forests' performance as a carbon sink. In 2009, an estimated 1.2 million hectares of community forests in Nepal accounted for a carbon stock of 183 million tonnes.¹⁰⁰ From 2004 to 2008, carbon stored in some Nepalese community-managed forests increased by 3 tonnes per hectare per year.¹⁰¹ These impressive results demonstrate how communities backed by a government acting to secure and support their legal rights are capable of halting or even reversing trends in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¹⁰²

Niger

In Niger, strengthening the rights of farmers to manage trees on cropland has resulted in the restoration of tree cover on a massive scale, sequestering at least 30 million tonnes of carbon over the past 30 years.¹⁰³ The government's support of farmer-managed natural regeneration of trees serves as a cost-effective approach for addressing a range of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cluding desertific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 relatively modest investment in the 1980s and 1990s by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gencies and NGOs to strengthen community land and forest rights through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local training has generated about US\$900 million in annual economic benefits.¹⁰⁴

Rural communities in Niger exercise long-standing customary rights to manage trees and forest resources in combination with farming.¹⁰⁵ In the 20th Century these rights were weakened by colonial regimes, national policies, and Forest Service regulations that decreed all trees and forests to be government property, including economically valuable "protected" trees growing in cultivated fields. Government ownership of trees was enforced through a system of permits issued by the Forest Service for cutting trees and through fines for unauthorized tree felling. These laws aimed to conserve forests and high-value tree species, but they had the opposite effect. They discouraged communities from managing trees by limiting their ability to

FINDING #3: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ith legal forest rights maintain or improve their forests' carbon storage.

benefit from them, and they increased dependence on an ineffective and under-resourced government bureaucracy.¹⁰⁶

After deforestation and land degradation took its toll, the government embarked on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in the 1990s.¹⁰⁷ Community land rights were recognized in an updated Rural Code, and th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Forest Service were revised to recognize and strengthen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 rights. In cooperation with NGOs working to promote tree regeneration, the Forest Service agreed to no longer fine farmers who cut branches or otherwise manage the trees on their farms.¹⁰⁸ The Forest Service and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lso respected the rights of farmers to harvest and sell timber from their trees and to prevent others from cutting them.¹⁰⁹ As a result of these reforms and incentives, land degradation was reversed and rural landscapes transformed.¹¹⁰ Further, over the past 20 years farmers protected and regenerated some 200 million trees across 5 million hectares of agricultural land, leading to significant carbon benefits.¹¹¹

Tanzania

Tanzania has achieved notable progress in supporting the legal recognition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More than 1,800 villages are engaged in legally recognized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forests, covering 3.6 million hectares or about 10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total forest area.¹¹² The result has been a demonstrable improvement in forest health within legally 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 which have lost less forest than government-controlled forests.¹¹³

Village Land in Tanzania is legally recognized community land, which includes the trees found there.¹¹⁴ Communities have the option of obtaining an additional layer of legal recognition of their forest as Village Land Forest Reserves,¹¹⁵ but few do so. All community forests, including Village Land Forest Reserves, recognize community rights to manage and benefit from forests with minimal government involvement (known as community-based forest management).¹¹⁶ Sustainable commercial use of forest resources is allowed if the community establishes a government-approved management plan, although to date few communities have obtained commercial use rights to their forests.

Outside Village Land, the government manages forests, including a network of National or Local Authority Forest Reserves. For a few of these the government developed joint management programs with communities living next to the forest. Under joint forest management, community representatives have the right to a place on these Reserves' management boards,¹¹⁷ and sustainable commercial use is permitted—also with a government-approved management plan.¹¹⁸

Research by Blomley et al. compared community-based management on Village Land Forest Reserves, jointly managed National or Local Authority Forest Reserves, and forests managed solely by the government. They found marked improvements in forest health on both community-based and jointly managed forests as compared with solely government-managed ones.⁷⁴

Legal Recognition and Negative Government Action

This section highlights the experiences of countries where communities have legal rights but where these are undermined by negative government actions such as allocating community forests for commercial use or failing to remove illegal settlers who encroach on community lands. Research on these countries—Colombia, Ecuador, Papua New Guinea, Peru, Honduras, and Nicaragua—provides compelling evidence of the link between lack of government support for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nd negative outcomes for forest and climate protection. Two exceptions are Honduras and Nicaragua. In Honduras, communities created a union to advocate for better protection of their forestry concessions. In Nicaragua, communities have been effective at protecting their borders despite the government's neglect.

Colombia (Amazon)

In Colombia, indigenous communities enjoy legal rights to their forest. The inhabitants of official Indigenous Reserves enjoy legal rights similar to those in Brazil, including the right to exclude outsiders, manage their forest, and benefit from timber and non-timber forest resources. However,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protect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is limited by decades of armed conflict.¹²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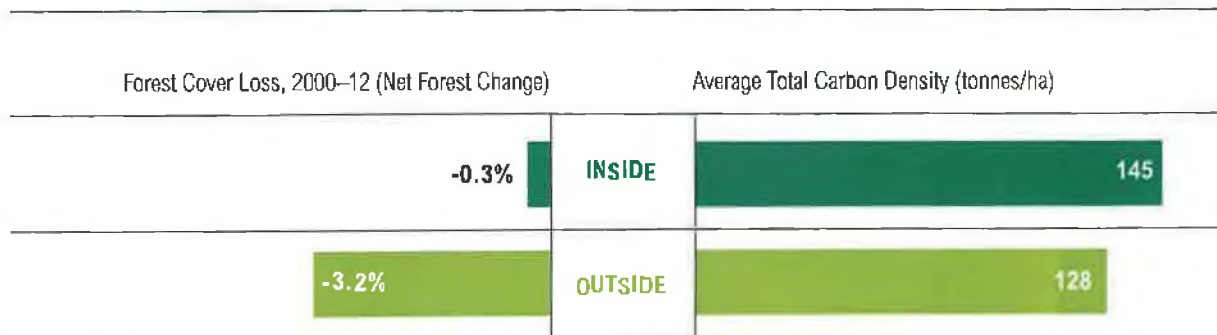
Colonization pressures stemming in large part from armed conflict have rendered community forests vulnerable to deforestation. Large areas of the Colombian Amazon were occupied by armed group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and thus effectively outside

government control. In particular, in the 1980s armed conflict triggered a wave of settler migration onto Indigenous Reserves close to settler pressures from the Andes Mountains.¹²¹

Overall deforestation has been low on Indigenous Reserves. From 2000 to 2012, forest cover loss across these areas was only 0.3 percent compared with 3.2 percent in the wider Colombian Amazon. (See Figure 7.) On average, 5–7 percent of forest on the Reserves' border areas was lost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armed conflict and coca farming.¹²² Two indigenous lands with the highest deforestation rates, *Barranco Colorado* and *La Fuga*, are dissected by roads built after a wave of forest exploitation.¹²³ (See Figure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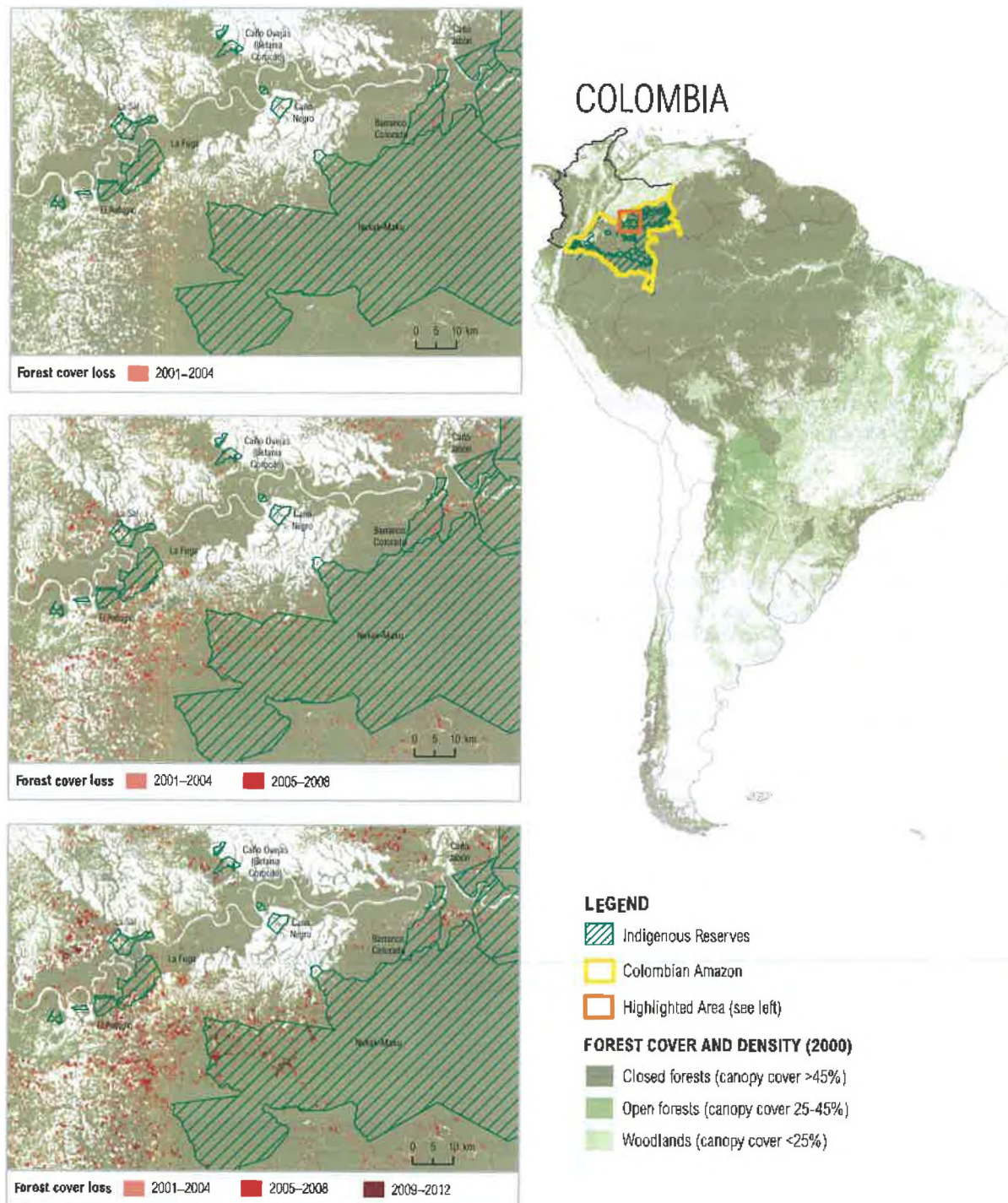
Low deforestation rates on Indigenous Reserves in Colombia have resulted in relatively low CO₂ emissions. According to WRI calculations, Indigenous Reserves have higher carbon density, at 145 tonnes per hectare, than other Amazonian forest, with 128 tonnes per hectare. (See Figure 7.) From 2000 to 2012, loss of about 70,000 hectares of forest on Indigenous Reserves resulted in about 34 million tonnes of CO₂ emissions, equal to 484 tonnes of CO₂ per hectare.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Colombian Amazon outside Indigenous Reserves lost 694,000 hectares of forest, resulting in 316 million tonnes of CO₂ emitted (456 tonnes per hectare). To ensure that deforestation and CO₂ emissions on Indigenous Reserves remain low in the post-conflict environment, the Colombian government will need to protect and support the Reserves as effective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the area is restored.

Figure 7 | Comparing Forest Cover Loss, 2000–12, and Average Carbon Density Inside and Outside Indigenous Reserves in the Colombian Amazon



Source: Hansen et al. 2013. Carbon data from Saatchi et al., 2011.

Figure 8 | Satellite-Detected Forest Cover Loss in Colombia, 2000–12, for Indigenous Reserves in the Colombian Amazon



Source: Forest cover loss data are from Hansen et al., 2013, and depict forest change at a spatial resolution of 30 meters across the globe. Data for Indigenous Reserves are from the Instituto Geográfico Agustín Codazzi (IGAC) Subdirección de Geografía y Cartografía. The number of Indigenous Reserves in the dataset is 209.

Ecuador (Amazon)

Under Ecuador's 2008 Constitution, many Indigenous Peoples enjoy the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their forest and to use it sustainably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with an approved management plan.¹²⁴ Yet these rights are undercut by the many oil and mining concessions that overlap with officially recognized indigenous lands.¹²⁵

From 2000 to 2008, stand-alone indigenous lands (those that do not overlap with government-protected areas) in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Sucumbíos and Orellana suffered some of the highest deforestation rates in the country, losing 6.5 percent of their forest,¹²⁶ partly as a result of oil and mining concessions.¹²⁷ Concessions then bring roads that trigger an influx of settlers who, in part because of earlier government policies, consider much of the Amazon open for settlement.¹²⁸

By contrast, some indigenous lands fall within government-protected areas, where only subsistence use of forest resources is permitted.¹²⁹ In these areas, where government oversight is stronger, only 1.5 percent of forest cover was lost from 2000 to 2008.¹³⁰

Papua New Guinea

In Papua New Guinea, the Constitution recognizes community ownership of 97 percent of forests as Common Customary Land.¹³¹ Ownership includes access, management, exclusion, due process and compensation, and use rights to timber and non-timber forest resources.¹³²

Yet between 2003 and 2010 the government issued leases of up to 99 years to private companies, giving them the right to exploit Common Customary Lands covering about 4 million hectares—an area the size of Switzerland. These “special agricultural or business leases” were used to dramatically expand lucrative oil palm and other commercial concessions beyond public land and onto Common Customary Land.¹³³ If logged to convert the forest to oil palm or other non-forest uses, areas covered by special leases could release almost 3 billion tonnes of CO₂.¹³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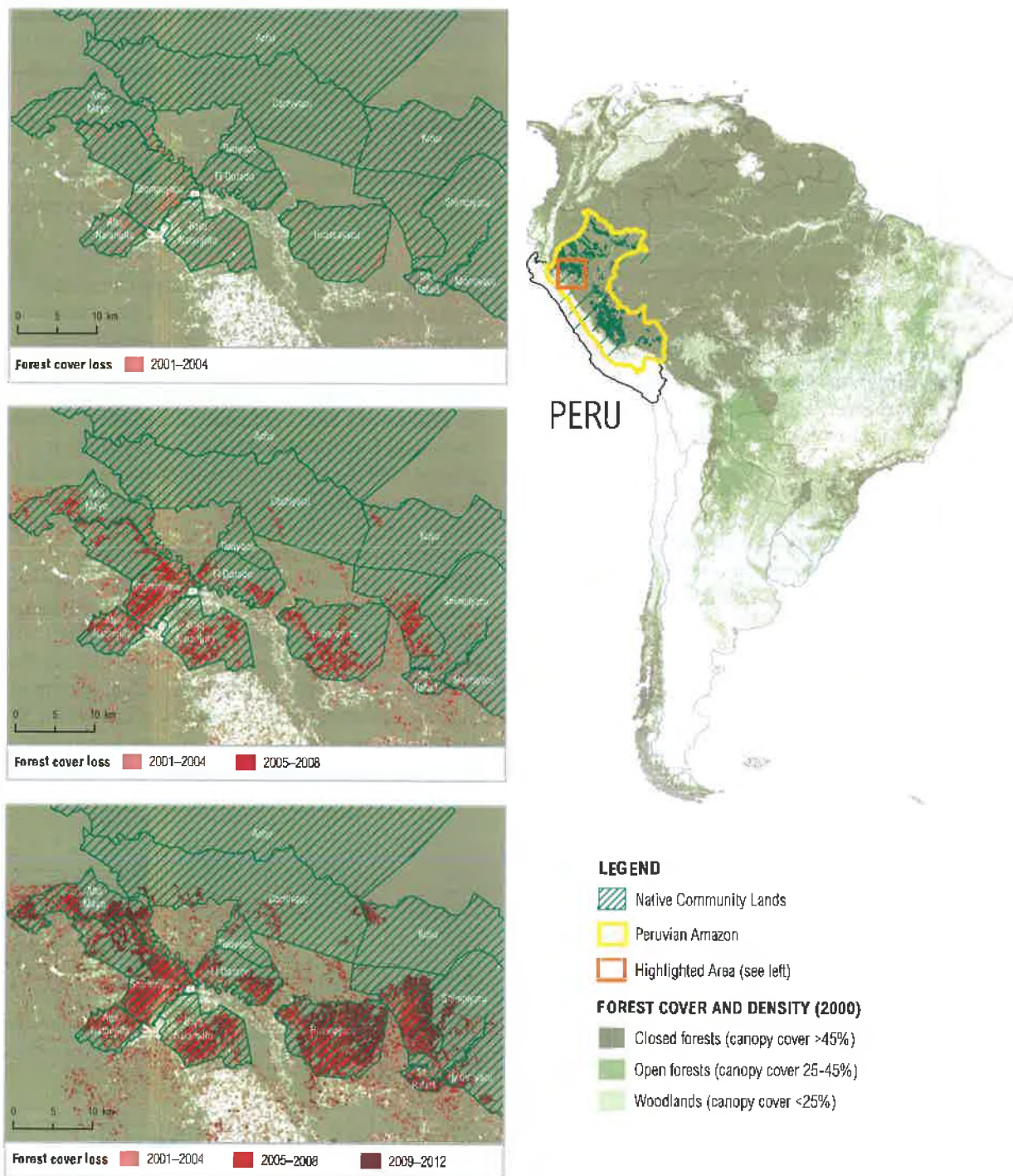
This situation arose after the government instituted a lease-leaseback scheme in 1979, with the intention of leasing Customary Land from communities and then leasing it back to them. The arrangement was planned as a temporary measure to compensate for the absence of a legal mechanism to register Common Customary Land titles.¹³⁵ But the government also granted itself the authority to issue the controversial 99-year leases of Customary Lands to third parties.

Not only are communities having their ownership rights overridden, they are being deprived of financial benefits from the special leases in the form of rental payments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Instead, Papua's elites and foreign companies are the prime beneficiaries.¹³⁶ A Government Commission of Inquiry created in 2011, in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condemnation, recommended revoking some of the leases, but the government has so far failed to act.¹³⁷

FINDING #4:

Even when communities have legal rights to their forest, government actions that undermine those rights can lead to high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deforestation.

**Figure 9 | Satellite-Detected Forest Cover Loss in Peru, 2000–12,
for Native Community Lands in the Northwest of the Peruvian Amazon**



Source: Forest cover loss data are from Hansen et al., 2013, and depict forest change at a spatial resolution of 30 meters across the globe. Data for Native Community Lands are from the Initiative for the Conservation in the Andean Amazon, a project of USAID and the U.S. Department of Interior.

Peru (Amazon)

In the Peruvian Amazon, 83 percent of deforestation occurs within 20 kilometers of a road.¹³⁸ Legally recognized indigenous lands, called Native Community Lands, succumb to these pressures.¹³⁹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Amazon NGO RAISG, three Native Community Lands in the northwest of Peru—*Huascayacu*, *Alto Mayo*, and *Shimpiyacu*—lost, respectively, 51 percent, 33 percent, and 24 percent of their forest between 2000 and 2010—some of the worst deforestation in the entire Amazon,¹⁴⁰ due to a combination of poverty, migrant pressures, and hydrocarbon concessions. (See *WRI analysis in Figure 9*.) As a consequence, from 2000 to 2010 forest loss inside Native Community Lands (2.2 percent) was higher than forest loss in the entire Peruvian Amazon (2.1 percent).¹⁴¹

Government allocations of indigenous lands to mining, oil, and natural gas concessions are a major cause of these devastating deforestation levels. Oil and gas concessions cover nearly 75 percent of the Peruvian Amazon.¹⁴² Fully 87 percent of Peruvian indigenous lands in part of Madre de Dios overlap with mining, oil, and gas concessions and other conflicting land uses.¹⁴³ Although Indigenous Peoples have legal rights to the forest, including subsistence use, management, and exclusion, the government retains the right to subsurface minerals. Indigenous communities cannot legally exclude government-sanctioned mining operations, and the mining companies bring roads and infrastructure, which attract settlers and illegal loggers. Nevertheless, a recent matching analysis covering part of Madre de Dios concluded that things would likely be worse without Native Community Lands. From 2006 to 2011, their presence likely reduced deforestation, saving 0.59 percent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forests from deforestation.¹⁴⁴

Honduras (Rio Plátano)

The Rio Plátano Biosphere Reserve in Honduras,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is home to 12 community concessions managing 107,000 hectares of broadleaf tropical forest. Communities enjoy rights to access, use, manage, exclude, and benefit from the forest for renewable 40-year periods, but the government retains formal ownership. Seven of the 12 community concessions are FSC-certified, enabling the inhabitants to sell sustainably sourced timber. Similar to the Maya Reserve in Guatemala, the Rio Plátano Reserve is divided into a cultural zone and a buffer zone. Both contain community concessions where sustainable commercial use is permitted, with settlers found mostly in the buffer zone.¹⁴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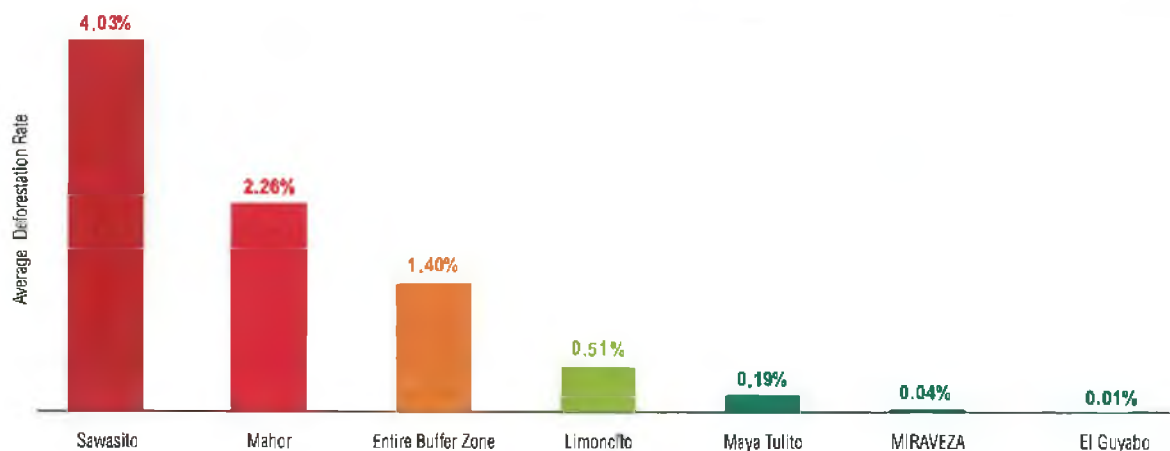
In 2006, the community concessions created the Union of Agroforestry Cooperatives of the Rio Plátano Biosphere Reserve¹⁴⁶ to collectively overcome problems created by inadequate government protection and support. These included excessive delays in government approval of forest management plans and harvesting permits, government inaction in the face of illegal logging by non-community members, and lack of government financial support for developing management plans.¹⁴⁷

Overall, this arrangement to empower communities has paid forest and climate dividends, leading to lower deforestation rates inside community concessions than in surrounding areas. A comparison of nine community concessions found that seven lost less forest cover than the surrounding Reserve area, whether in the buffer or cultural zone. From 2006 to 2011, four community concessions in the buffer zone experienced deforestation rates between 0.01 percent and 0.51 percent compared with 1.40 percent across the buffer zone.¹⁴⁸ Thus, deforestation was up to 140 times lower in some community concessions compared with the buffer zone as a whole. (See *Figure 10*.)

FINDING #5:

Communities can partially overcome government actions that undermine their forest rights.

Figure 10 | **Average Deforestation Rates for Six Community Concessions in the Rio Plátano Biosphere Reserve, Honduras, 2006–11**



Source: Forest Trends, 2013.

Nicaragua (Bosawas)

Together with the neighboring Rio Plátano Reserve in Honduras and two other protected areas, Nicaragua's Bosawas Biosphere Reserve forms one of the largest protected tropical forests in Central Ame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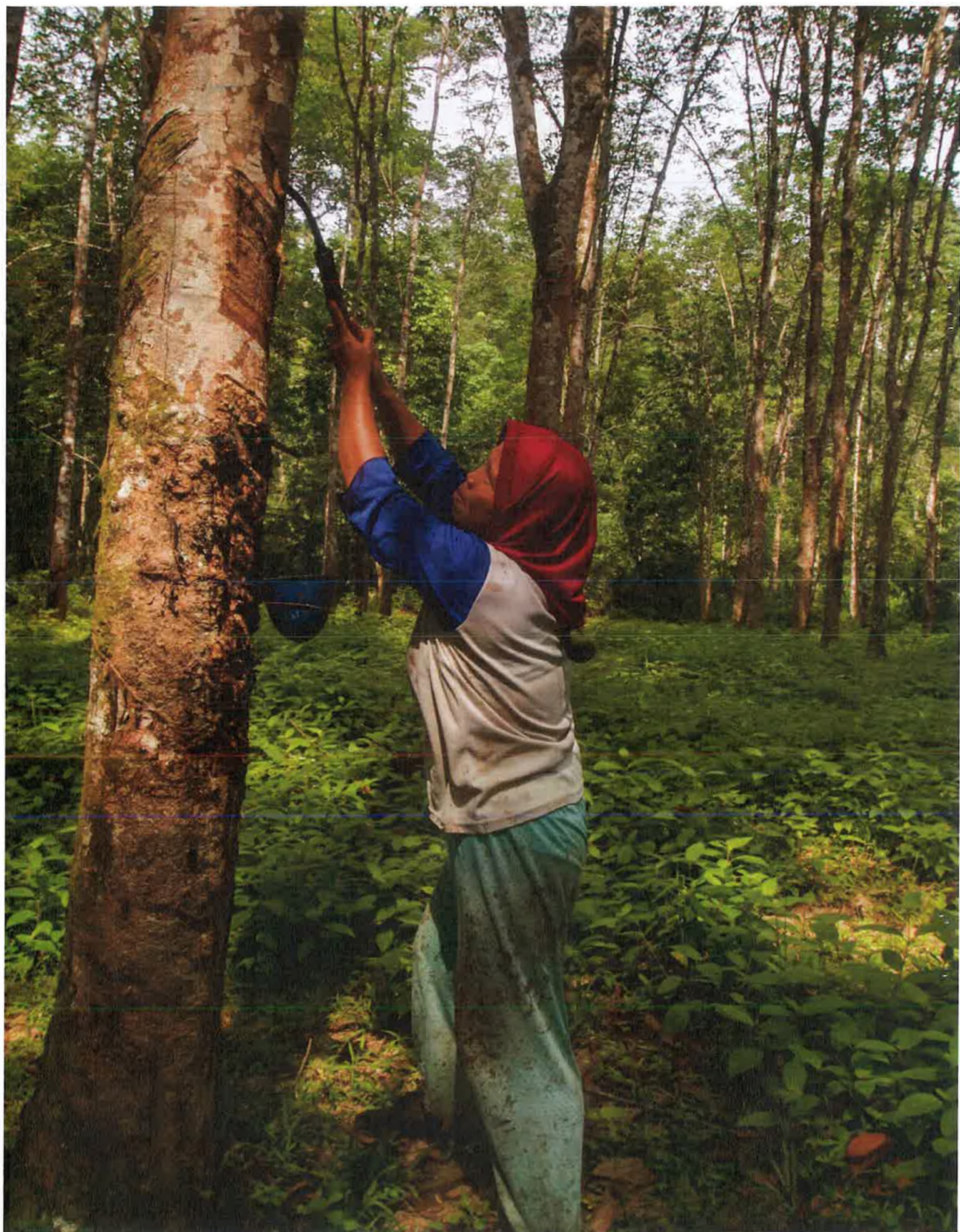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s issued at least six titles to indigenous Miskito and Mayanga people in the Reserve,¹⁴⁹ with communities operating under sustainable use plans not officially recognized by the authorities. These rights were a long time coming, with communities and their partners spending over a decade fighting to implement constitutional recognition of their forest rights.¹⁵⁰ The first titles for indigenous Communal Lands were eventually issued in 2009 in line with Nicaragua's 2003 Communal Lands Law. This provides "full recognition of rights over communal property, [and] use,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raditional lands and natural resources."¹⁵¹ Although the right to exclude

is not expressly mentioned, non-natives are not permitted on indigenous lands.¹⁵²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now issued titles for most indigenous Communal Lands, its efforts to restrict encroachments on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have been weak.¹⁵³ The communities have stepped into the breach and are generally successful at policing their own borders.¹⁵⁴

Deforestation data show that indigenous communities protect their forests and resist deforestation pressures from settlers. In 2001–02, about 2,400 hectares of Communal Lands in the Bosawas Reserve were deforested compared with a rate 14 times higher in neighboring Reserve areas occupied by settlers.¹⁵⁵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ree times more forest was lost in the settler area bordering the Communal Lands than in the indigenous occupied border area.¹⁵⁶





SECTION V

CONCLUSION

The preceding sections make a compelling argument for the support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s a bulwark against climate change. The evidence they provide reveal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legal recognition along with government protection and a community's ability to resist deforestation, maintain forest health, and lower CO₂ emissions.

If communities have no or weak legal rights, as is the case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ir forest is vulnerable to defores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many communities with legal rights coupled with government protection see less forest loss and CO₂ emissions. Communities that have legal rights but lack government protection can lose their forest to illegal encroachments unless—as in Honduras and Nicaragua—they take steps to partially overcome negative government action. When governments recognize some legal rights but act in ways that undermine them, high deforestation and CO₂ emissions commonly result. Papua New Guinea and Peru are prime examples, with governments weakening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forest rights by giving companies the legal right to convert forest for mining, oil palm, or other

commercial uses. Figure 11 summarizes the results of this analysis.

Findings

1. **Whe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have no or weak legal rights, their forests tend to be vulnerable to deforestation and thus become the source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Deforestation of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in Brazil would likely have been 22 times higher without their legal recognition. In Indonesia, the high levels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re driven in part by no or weak legal rights for forest communities. For example, oil palm concessions cover 59 percent of community forests in part of West Kalimantan.

Figure 11 | Summary of Analysis of How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nd Government Action Impact Forests






COUNTRY	LEGAL RIGHTS	GOV. ACTION	FOREST OUTCOMES	COUNTRY	LEGAL RIGHTS	GOV. ACTION	FOREST OUTCOMES
Bolivia (Amazon)				Nicaragua (Bosawas)			
Brazil (Amazon)				Peru (Amazon)			
Colombia (Amazon)				Niger			
Ecuador (Amazon)				Tanzania			
Guatemala (Petén)				Nepal			
Honduras (Rio Platano)				Indonesia			
Mexico				Papua New Guinea			

CHART KEY	LEGAL RIGHTS	GOVERNMENT ACTION	FOREST OUTCOMES
	 = Legal Recognition  = No/Weak Legal Recognition	 = Positive Government Action on Strength of Rights  = Negative Government Action on Strength of Rights	 = Positive Forest Outcomes  = Negative Forest Outcomes

2. **Legal forest rights for communities and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their rights tend to lower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deforestation.** In Brazil, deforestation in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from 2000 to 2012 was less than 1 percent, compared with 7 percent outside them. The higher deforestation outside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led to 27 times mor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than were produced from deforestation on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And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contain 36 percent more carbon per hectare than other areas of the Brazilian Amazon.
3.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ith legal forest rights maintain or improve their forests' carbon storage.**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the forest rights of communities in Niger added 200 million new trees, absorbing 30 million tonnes of carbon over the past 30 years. Support for community forestry in Nepal has improved forest health and generated a carbon stock of more than 180 million tonnes across 1.6 million hectares.
4. **Even when communities have legal rights to their forest, government actions that undermine those rights can lead to high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deforestation.** The forests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Peru, where government actions weaken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re deforested at a higher rate than other parts of the Peruvian Amazon.
5. **Communities can partially overcome government actions that undermine their forest rights.** In Honduras and Nicaragua, indigenous communities have been able to partially forestall deforestation, despite insufficient government efforts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In some cases community forest loss is 0.01 percent, compared with 1.40 percent in the surrounding area.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and findings, the authors make the following five practical, evidence-based recommendations to donors, governments, civil society, and other stakeholders working on climate change, land rights, and forestry.

1. **Provid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ith legal recognition of rights to their forest.** Attention must be given to the millions of forested communities without legal rights to their forest. In Indonesia, where communities generally have no or weak legal rights, new legislation is pending to recognize communities' ownership of their forests. Where communities have some legal forest rights, governments and their partners should strengthen these rights. While this recommendation applies to all relevant countries, those that are heavily forested and have weak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re of critical importance. In addition, stakeholders should support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s part of a future agreement on REDD+.
2. **Protect the legal forest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Governments and their partners should help protect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by, for example, mapping community forest boundaries, helping to expel illegal loggers, and not granting commercial concessions over community forests. In Brazil, the government maps and registers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helps communities remove illegal settlers, and is generally barred from granting commercial use of community forests to companies. Governments and their partners should commit funds and invest in supporting communities and their civil society partners. In addition, governments and donors should include programs to support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in their climate change strategies.

3. **Support communities with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training.** Governments, donors, and civil society should provide training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communities and should undertake capacity building activities. For example, in Mexico some communities receive training and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sustainable forest use and market access. In addition, governments, donors, and civil society should help ensure that people and local communities are able to participate genuine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and policy frameworks related to REDD+.
4. **Engage forest communities in decision-making on investments affecting their forest.**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e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that government planning is 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that investments do not violate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In Peru, the government's failure to comply fully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contributes to high deforestation of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 For example, national laws should require that the statu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y forest is determined well in advance of any decisions affecting the community. Also, if legal commercial extraction of subsurface minerals does occur on indigenous or local community forestlands, ensure that the extraction is conducted in the least invasive way possible and only after 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 of the affected communities.

5. **Compensate communities for the climate and other benefits provided by their forest.** Governments and their partners should commit funds and invest in supporting communities and their civil society partners to increase the economic incentives for communities to manage their forests sustainably. In addition, stakeholders should support strengthening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s part of a future agreement on REDD+. Ensure that communities receive payments for protecting their forests as part of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DD+.

If all these recommendations are fully implemented by donors, governments, business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he evidence presented in this report suggests that communities can and will increase the carbon in their forests. In so doing, they will help reduce CO₂ emissions, support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efforts at the same time as protecting their own rights and benefits.

The authors strongly urge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and tenure, and forestry communities to use the evidence in these pages to press for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a climate policy priority.



APPENDIX A: METHODOLOGY FOR FOREST COVER CHANGE AND CARBON STORAG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and deforestation, th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conducted an original analysis using geospatial data on community lands in combination with satellite-derived data on forest cover change and carbon density. The analysis was done for Brazil and Colombia. In addition, forest cover change analysis was done for a portion of Peru. These countries were chosen primarily because accurate spatial data on community forest boundaries were available, given that such data are limited overall. Furthermore, these countries are all located in the Amazon basin, wher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could be expected to be relatively similar.

The satellite-derived data on forest cover change are from Hansen et al., who produced a global dataset of annual forest cover loss between 2000 and 2012 and of forest cover gain for the collective period of 2000 to 2012.¹⁵⁷ The global dataset represents forest cover change as detected through analysis of Landsat satellite images at a resolution of 30 meters, starting with baseline forest cover data for the year 2000.

Hansen et al. data measure forest cover loss and gain across all land. Forest cover is defined as “all vegetation taller than 5 meters in height” and forest cover loss is defined as “the complete removal of tree cover canopy at the Landsat pixel scale.”¹⁵⁸ Therefore the data capture all types of tree cover loss, whether or not it meets the definition of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loss used in this report. For example, tree cover loss on natural forests, removal of trees within working tree plantations (e.g., oil palm), and loss of trees due to natural causes (e.g., fire) are all captured as forest cover loss under this algorithm. Thus these data are an imperfect measure of deforestation, and the WRI report authors use the terms “forest cover loss,” “forest loss,” “forest change,” and “deforestation” in relation to data from Hansen et al. with this qualification in mind.

WRI analysis of forest cover loss and gain in the Amazon regions of Brazil and Colombia from 2000 to 2012 permits a simple comparison of forest cover change within community lands and outside of community lands in the Amazon biome. The analysis does not consider other types of land uses that would influence deforestation

rates, such as protected areas or working plantations. Therefore, the analysis represents a simple comparison of the average forest cover loss and gain to supplement the literature review.

WRI performed a basic spatial analysis in 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to estimate how much carbon is stored in community forests in the Amazon region of Brazil and Colombia. Using spatial carbon data from Saatchi et al.,¹⁵⁹ the authors compared carbon stored within legally 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 with carbon stored outside of legally 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 but within the Amazon biome. The Saatchi et al. data cover the global extent of the tropics, roughly between latitudes 20N and 20S, at a resolution of 1 kilometer. The dataset includes aboveground and belowground biomass carbon in metric tons (tonnes). This analysis is a simple estimat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otal carbon storage and average carbon density between legally 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and other forests. As with the forest cover change analysis, the carbon analysis does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forest uses, such as commercial agroforestry plantations or government-protected conservation areas. This is a straightforward comparison that includes settlements and non-forest uses in the Amazon, and for Brazil it captures officially recognized Indigenous Lands and those undergoing the recognition proc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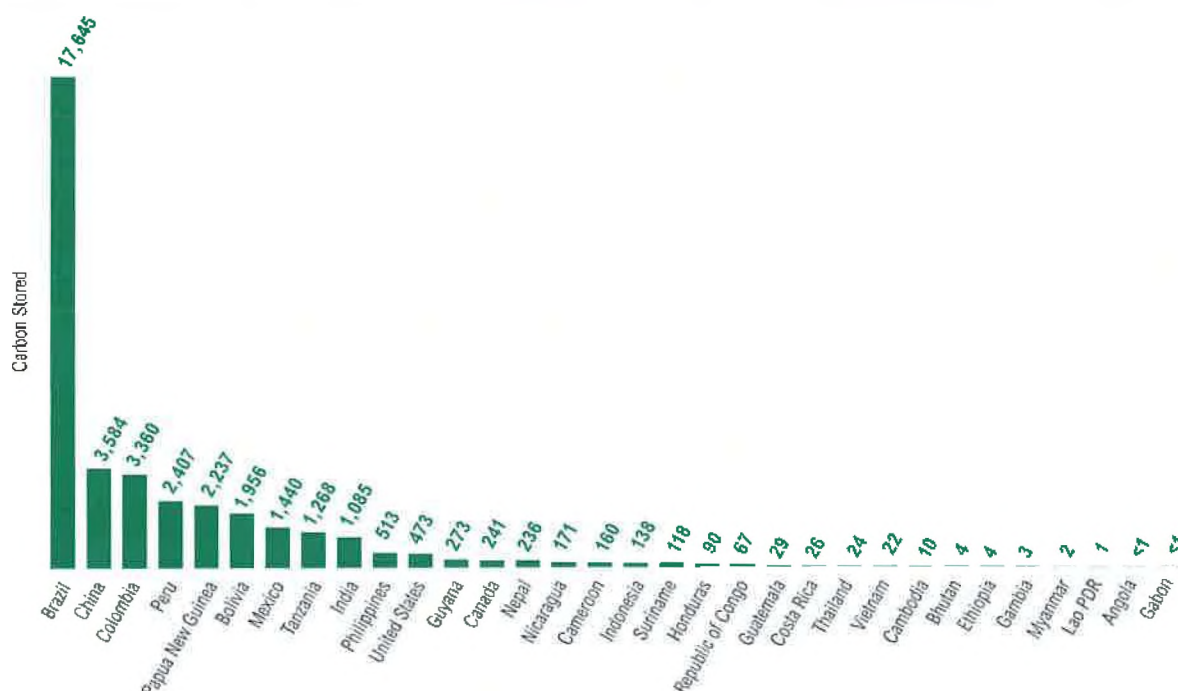
Taking the analysis one step further, WRI estimated how much carbon had been lost (and gained) due to forest cover change in Brazil and Colombia and then translated that estimate into CO₂ emissions. To perform this analysis, forest cover loss and gain data from Hansen et al. (representing the collective period of 2000 to 2012) was overlaid with the carbon stock data from Saatchi et al. (representing approximately the year 2000). Using GIS, the carbon stock data were “assigned” to the locations of forest loss and gain to create a proxy for the amount of carbon stored in the forests in 2000 that was subsequently lost (or potentially gained). Summing the resultant datasets to balance the carbon gains with carbon losses produced an estimate of carbon loss associated with forest cover change in the Amazon region of each country, which was used to estimate total CO₂ emissions and average CO₂ emissions per hectare.

APPENDIX B: CARBON IN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

Figure B-1 presents national-level estimates of carbon stored within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totaling 37.7 billion tonnes. The carbon for each country was estimated by multiplying the total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 area (in hectares) with a national-level average carbon density value (tonnes per hectare). The forest tenure data are from the 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 which compiled data for several countries in 2013,¹⁶⁰ and from the 2008 *Inventario Nacional Forestal for Nicaragua*¹⁶¹ and from RAISG for Ecuador.¹⁶² The carbon data are from the 2010 *Global Forest Resources Assessment* of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and represent carbon stock in living forest biomass.¹⁶³

FAO carbon data for 2010 were used as a proxy for 2013, and 2012 and 2008 for Ecuador and Nicaragua, respectively, since carbon data were not available specifically for those years. Given that the forest tenure data and carbon data are not spatially explicit and represent national-level averages, the data in Figure B-1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very rough estimate of carbon stored in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 Also note that these carbon estimates differ from those for Brazil and Colombia in Section IV because of the differing methodologies. The estimates in Section IV are based on spatially explicit data of community lands and carbon data from Saatchi et al.¹⁶⁴

Figure B-1. | Carbon in Government-Recognized Community Forests, 2013 (million tonnes)



Source: Community forest data from RRI, 2014c. Community forest data for Ecuador and Nicaragua from, respectively, RAISG, 2012, and the *Inventario Nacional Forestal*, 2008.

REFERENCES

- Adeney, J. M., N. L. Christensen, and S. L. Pimm. 2009. "Reserves Protect against Deforestation Fires in the Amazon." *PLoS One* 4(4): e5014.
- Agrawal, A., and A. Chhatre. 2005. "Explaining Success on the Commons: Community and Forest Governance in the Indian Himalaya." *World Development* 34(1): 149–166.
- AMAN (Aliansi Masyarakat Adat Nusantara). 2014. "Indicative Map of Indigenous Territories Launched, January 29,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aman.or.id/2014/01/29/indicative-map-of-indigenous-territories-launched/#.U3C7KPIdUmM>.
- Andersson, K. 2012. *CIFOR's Research on Forest Tenure and Rights*. Bogor, Indonesi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 Anup K. C., G. Bhandari, G. R. Joshi, and S. Aryal. 2013.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Potential from Carbon Sequestration of Community Forest in Mid Hill Region of Nep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3(7): 33–40.
- Armenteras, D., N. Rodriguez, and J. Retana. 2009. "Are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Effective in Avoiding the Deforestation of the Colombian Guyana Shield?"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42: 1411–1419.
- Barbier, E., and A. Tesfaw. 2012. "Can REDD+ Save the Forest? The Role of Payments and Tenure." *Forests* 3: 881–895.
- Barismantov, J., and J. N. Antezana. 2012. "Forest Cover Change and Land Tenure Change in Mexico's Avocado Region: Is Community Forestry Related to Reduced Deforestation for High Value Crops?" *Applied Geography* 32: 844–853.
- Blomley, T. 2013. *Lessons Learned from Community Forestry in Africa and Their Relevance for REDD+*. Report prepared for USAID. Arlington, Virginia: Forest Carbon, Markets and Communities Program.
- Blomley, T., K. Pflieger, J. Isango, E. Zahabu, A. Ahrends, and N. Burgess. 2008. "Seeing the Woods for the Trees: An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Participatory Forest Management on Forest Condition in Tanzania." *Oryx* 42(3): 380–391.
- Bluffstone, R., E. Robinson, and P. Guthinga. 2012. "REDD+ and Community-Controlled Forests in Low-Income Countries: Any Hope for a Linkage?" *Ecological Economics* 87: 43–52.
- Bock, M. 2012. "Formalization and Community Forestry in Jambi, Indonesia: Indigenous Rights, Rural Migrants, and the Informal Divide." *Josef Korbel Journa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4: 48–73.
- Bray, D. B. 2010. *Toward Post-REDD+ Landscapes: Mexico's Community Forest Enterprises Provided a Proven Path to Reduce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Bogor, Indonesi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 Buizer, M., D. Humphreys, and W. de Jong. 2014. "Climate Change and Deforestation: The Evolution of an Intersecting Policy Doma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35: 1–11.
- Carlson, K., L. M. Curran, D. Ratnasari, A. M. Pittman, B. S. Soares-Filho, G. P. Asner, S. N. Trigg, D. A. Gaveau, D. Lawrence, and H. O. Rodrigues. 2012. "Committed Carbon Emissions, Deforestation, and Community Land Conversion from Oil Palm Plantation Expansion in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 7559–7564.
- Charnley, S., and M. R. Poe. 2007. "Community Forestr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Where Are We Now?"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6: 301–336.
- Chhatre, A., and A. Agrawal. 2009. "Trade-Offs and Synergies between Carbon Storage and Livelihood Benefits from Forest Comm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6(42): 17667–17670.
- Clerc, J. 2012. *Unpacking Tenure Security: Development of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 to the Case of Oil Palm Expansion on Customary Land in Kapuas Hulu district,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Working Paper 102. Bogor, Indonesi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 Community Forestry Association. 2013. "Illegal Invaders Threaten Sixteen Years of Responsible Forest Management in Copen, Honduras." *CFA Newsletter* No. 61.
- Corbera, E., M. Estrada, P. May, G. Navarro, and P. Pacheco. 2011. "Rights to Land, Forests, and Carbon in REDD+: Insights from Mexico, Brazil, and Costa Rica." *Forests* 2(1): 301–342.
- Cronkleton, P., D. Bray, and G. Medina. 2011.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Multi-Scale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Lessons for REDD+ Development from Mexico, Brazil and Bolivia." *Forests* 2(2): 451–473.
- Davis, D. C. 2013. "Land in the Second Decade: The Evolution of Indigenous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Energy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 *Energy Law Journal* 34: 667–686.
- De Wit, P. 2012. "Land Inventory and Land Management Planning in Sino County (FED/2011/270957)." Available at http://eeas.europa.eu/delegations/liberia/documents/press_corner/20130916_02.pdf.
- De Wit, P., and C. Stevens. 2014. "100 Years of Community Land Rights in Liberia: Lessons Learned for the Future." Paper prepared for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Land and Poverty, Washington, DC, March 24–27.
- DiGiano, M., E. Ellis, and E. Keys. 2013. "Changing Landscapes for Forest Commons: Linking Land Tenure with Forest Cover Change following Mexico's 1992 Agrarian Counter-Reforms." *Human Ecology* 41: 707–723.
- Durán-Medina, E., J.-F. Mas, and A. Velázquez. 2005. "Land Use/Cover Change in Community-Based Forest Management Regions and Protected Areas in Mexico," in *The Community Forests of Mexico*. D. B. Bray, L. Merino-Pérez, and D. Barry, eds. Austin,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Ellis, E., and L. Porter-Bolland. 2008. "Is Community-Based Forest Management More Effective than Protected Areas? A Comparison of Land Use/Land Cover Change in Two Neighboring Study Areas of the Central Yucatan Peninsula, Mexico." *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 256: 1971–1983.
-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10. *Global Forest Resources Assessment 2010*. Rome: FAO.
- Ferretti-Gallon, K., and J. Busch. 2014. *What Drives Deforestation and What Stops It? A Meta-Analysis of Spatially Explicit Econometric Studies*. Working Paper 361.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 Filer, C. 2011. "The New Land Grab in Papua New Guinea." *Pacific Studies* 34: 269–294.
- Filer, C. 2012.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Special Agricultural and Business Leases in Papua New Guinea: Fresh Details for the Portrait of a Process of Expropri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 Land Grabbing II,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ew York, October 17–19.
- Fonseca, S. A. Undated. *Forest Management in the Community Enterprise of Santa Catarina Ixtepeji, Oaxaca, Mexico*. Washington, DC: 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
- Forest Trends. 2013. "Community Forestry in Honduras." Info Brief #8, August.
- Fortin, R., R. Butterfield, and B. D. Hodgdon. 2010. *The Impacts of Training,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New Market Access for Community Forest Enterprises in the Rio Plátano Biosphere Reserve, Honduras*. New York: Rainforest Alliance.
- Fundação Nacional do Índio. 2013. "Terras Indígenas do Brasil." Brasília: Ministério da Justiça do Brasil, Fundação Nacional do Índio.
- Garrett, J. 2014. "PNG's Land Scandal Inquiry Names an Australian-Led Company." *Australia News Network*, February 12.
- Global Witness. 2013. *Logging in the Shadows: How Vested Interests Abuse Shadow Permits to Evade Forest Sector Reforms: An Analysis of Recent Trends in Cameroon, Ghana,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and Liberia*. London: Global Witness Limited.
- Gómez, I., and V. E. Méndez. 2007. *Association of Forest Communities of Petén, Guatemala: Context, Accomplishments and Challenges*. Bogor, Indonesi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PRISMA, 2007.
- Greenpeace. 2012. "Up for Grabs: Millions of Hectares of Customary Land in PNG Stolen for Logging." *Ultimo*, Australia: Greenpeace Australia Pacific.
- Hansen, M., P. V. Potapov, R. Moore, M. Hancher, S. A. Turubanova, A. Tyukavina, D. Thau, S. V. Stehman, S. J. Goetz, T. R. Loveland, A. Kommareddy, A. Egorov, L. Chini, C. O. Justice, and J. R. G. Townshend. 2013. "High-Resolution Global Maps of 21st-Century Forest Cover Change." *Science* 342(6160): 850–853.
- Hayes, T. 2007. "Controlling Agricultural Expansion in the Mosquitia: Does Tenure Matter?" *Human Ecology* 35(6): 733–747.
- Hayes, T., and L. Persha. 2010. "Nesting Local Forestry Initiatives: Revisiting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 in a REDD+ World."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12: 545–553.
- Holland, M. B., F. De Koning, M. Morales, L. Naughton-Treves, B. E. Robinson, and L. Suárez. 2014. "Complex Tenure and Deforestation: Implications for Conservation Incentives in the Ecuadorian Amazon." *World Development* 55: 21–36.
- Hughell, D., and R. Butterfield. 2008. *Impact of FSC Certification on Deforestation Incidence of Wildfires in the Maya Biosphere*. New York: Rainforest Alliance.
- IDB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12. *Challenges for Low-Carbon Agriculture and Forest Conservation in Brazil*, Technical Notes No. IDB-TN-385. Washington, DC: IDB.
- Informe PRISMA. 2014. *Pueblos Indígenas y Comunidades Rurales Defendiendo Derechos Territoriales*.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agronoticias/agro-publicaciones/agro-publicacion-detalle/en/c/219006/>.
- Inventario Nacional Forestal. 2008. *Resumen de Resultados del Inventario Nacional Forestal: 2007–2008*. Nicaragua.
-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14.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Geneva: IPCC.
- IRIN News. 2014. "Conflict in Indonesia's Papua Region." March 28.
- Iltuarte-Lima, C., C. L. McDermott, and M. Mulyani. Forthcoming. "Assessing Equity in National Legal Frameworks for REDD+: The Case of Indonesia."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 Karsenty, A., A. Vogel, and F. Castell. 2014. "Carbon Rights, REDD+ and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35: 20–29.
- Klooster, D. 2011. "The Local Instrumentality of Global Standards: How Mexica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Use FSC Certification to Foster a Furniture Production Network," in *Governing through Standards: Origins, Drivers, and Limitations*. S. Ponte, P. Gibbon, and J. Vertergaard, eds. New York: Palgrave.
- Klooster, D., and O. Masera. 2000.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 in Mexico: Carbon Mitiga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rough Rural Development."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0: 259–72.
- Larson, A. 2011. "Forest Tenure Reform in the Age of Climate Change: Lessons for RED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1: 540–549.
- Larson, A. 2012. *Tenure Rights and Access to Forests: A Training Manual for Research*. Bogor, Indonesi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 Larson, A., and G. Dahal. 2012. "Forest Tenure Reform: New Resource Rights for Forest-Based Communities?" *Conservation and Society* 10(2): 77–90.
- Larson, A., and J. Lewis-Mendoza. 2012. "Decentralisation and Devolution in Nicaragua's North Atlantic Autonomous Regi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ommons* 6(2): 179–199.
- Larson, A., and J. Pulhin. 2012. "Enhancing Forest Tenure Reforms through More Responsive Regulations." *Conservation and Society* 10(2): 103–113.
- Larson, A., P. Cronkleton, D. Barry, and P. Pacheco. 2008. *Tenure Rights and Beyond: Community Access to Forest Resources in Latin America*. Occasional Paper No. 50. Bogor, Indonesi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 Larson, A. M., D. Barry, and G. R. Dahal. 2010. "New Rights for Forest Based Communities? Understanding Processes of Forest Tenure Reform."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view* 12(1): 78–96.
- Larson, A., M. Brockhaus, W. D. Sunderlin, A. Duchelle, A. Babon, T. Dokken, T. T. Pham, I. A. P. Resosudarmo, G. Selaya, A. Awono, and T. Huynh. 2013. "Land Tenure and REDD+: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3: 678–689.
- Lawry, S. 2013. "Customary Land Rights in Sub-Saharan Africa as System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paper prepared for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Land and Poverty, Washington, DC, April 8–11.
- Luintel, H., H. Ojha, B. Rana, R. Subedi, and H. Dhungana. 2009. *Community Forestry in Nepal: Promoting Livelihoods,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Kathmandu, Nepal: DFID/Forest Action, Livelihoods and Forestry Programme.
- Magrath, W. B., A. Shrestha, B. Subedi, H. B. Dulal, and R. Baumbach. 2013. *Nepal Forest Sector Survey: Policy Priorities and Recommendation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rogram on Forests.
- Nagendra, H. 2010. "Reforestation and Regrowth in the Human Dominated Landscapes of South Asia," in *Reforesting Landscapes*, J. Southworth, ed. Springer Netherlands, pp. 149–174.
- Nagendra, H., and Y. Gokhale. 2008. "Management Regimes, Property Rights, and Forest Biodiversity in Nepal and India."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41: 719–733.
- Nagendra, H., S. Pareeth, B. Sharma, C. M. Schweik, and K. R. Adhikari. 2008. "Forest Fragmentation and Regrowth in an Institutional Mosaic of Community, Government and Private Ownership in Nepal." *Landscape Ecology* 23: 41–54.
- Naughton-Treves, L., and K. Wendland. 2014. "Land Tenure and Tropical Forest Carbon Management." *World Development* 55: 1–6.
- Nelson, A., and K. Chomitz. 2011. "Effectiveness of Strict vs. Multiple Use Protected Areas in Reducing Tropical Forest Fires: A Global Analysis Using Matching Methods." *PLoS One* 6(8): e22722.
- Nepstad, D., S. Schwartzman, B. Bamberger, M. Santilli, D. Ray, P. Schlesinger, P. Lefebvre, A. Alencar, E. Prinz, G. Fiske, and A. Rolla. 2006. "Inhibition of Amazon Deforestation and Fire by Parks and Indigenous Lands." *Conservation Biology* 20(1): 65–73.
- Newton, P., M. Fournier, M. Cornwall, J. DeBoer, D. Rosenbach, B. Schaap, R. Stock, J. Whittemore, M. Yoders, G. Brodnig, and A. Agrawal. In press.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 and REDD+*.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Nittler, J., and H. Tschinkel. 2005.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 in the Maya Biosphere Reserve of Guatemala: Protection Through Profits*. Washington, DC: USAID.
- Nolte, C., A. Agrawal, K. M. Silvius, and B. S. Soares-Filho. 2013. "Governance Regime and Location Influences Avoided Deforestation Success of Protected Areas in the Brazilian Amaz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doi: 10.1073/pnas.1214786110.
- ODI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Undated. "Additionality, Non-Permanence and Leakage." Infosheet 8. Available at: <http://www.odi.org.uk/sites/odi.org.uk/files/odi-assets/publications-opinion-files/6086.pdf>.
- Ojha, H., L. Persha, and A. Chhatre. 2009. *Community Forestry in Nepal: A Policy Innovation for Local Livelihoods*. Discussion Paper 913.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Oliviera, P. J. C., G. P. Asner, D. E. Knapp, A. Almeyda, R. Galván-Gildemeister, S. Keene, R. F. Raybin, and R. C. Smith. 2007. "Land-Use Allocation Protects the Peruvian Amazon." *Science* 317: 1233–1236.
- Oxfam. 2014. *Geographies of Conflict: Mapping Overlaps between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Agricultural Land Uses in Ghana and Peru*. Oxfam Research Report. Boston: Oxfam America.
- Pan, Y., R. A. Birdsey, J. Fang, R. Houghton, P. E. Kauppi, W. A. Kurz, O. L. Phillips, A. Shvidenko, S. L. Lewis, J. G. Canadell, P. Clais, R. B. Jackson, S. W. Pacala, A. D. McGuire, S. Piao, A. Rautiainen, S. Sitch, and D. Hayes. 2011. "A Large and Persistent Carbon Sink in the World's Forests." *Science* 333(6045): 988–993.
- Paneque-Gálvez, J., J. Mas, M. Guéze, A. C. Luz, M. J. Macía, M. Orta-Martínez, J. Pino, and V. Reyes-García. 2013. "Land Tenure and Forest Cover Change: The Case of Southwestern Beni, Bolivian Amazon, 1986–2009." *Applied Geography* 43: 113–126.
- Persha, L., A. Agrawal, and A. Chhatre. 2011. "Social and Ecological Synergy: Local Rulemaking, Forest Livelihoods,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cience* 331(6024): 1606–1608.
- Pokharel, R. K. 2012.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anagement Regime of Nepal's Community Forestry."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17: 13–17.
- Pokorny, B., and J. Johnson. 2008. *Community Forestry in the Amazon: The Unsolved Challenges of Forests and the Poor*. Natural Resources Perspectives 112.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 Porter-Balland, L., E. A. Ellis, M. R. Guariguata, I. Ruiz-Mallén, S. Negrete-Yankelevich, and V. Reyes-García. 2012. "Community Managed Forests and Forest Protected Areas: An Assessment of Their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across the Tropics." *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 268: 6–17.
- Pye-Smith, C. 2013. *The Quiet Revolution: How Niger's Farmers Are Re-Greening the Parklands of the Sahel*. ICRAF Trees for Change No. 12. Nairobi: World Agroforestry Centre.
- Radachowsky, J., V. H. Ramos, R. McNab, E. H. Baur, and N. Kazakov. 2012. "Forest Concessions in the Maya Biosphere Reserve, Guatemala: A Decade Later." *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 268: 18–28.
- Rainforest Foundation UK. 2013. "What Has REDD Done for Land Rights in the Congo Basin?" November 18. London.
- RAISG (Red Amazónica de Información Socioambiental Georreferenciada). 2012. *Amazonia Under Pressure*. Available at www.raisg.socioambiental.org.
- Reij, C., G. Tappan, and M. Smale. 2009. *Agro-Environmen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Sahel: Another Kind of "Green Revolution"*. Discussion Paper 914,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Resosudarmo, I. A. P., S. Atmadja, A. D. Ekaputri, D. Y. Intarini, and Y. Indrialmoko. 2014. "Does Tenure Security Lead to REDD+ Project Effectiveness? Reflections from Five Emerging Sites in Indonesia." *World Development* 55: 68–83.
- Ricketts, T. H., B. Soares-Filho, G. A. B. da Fonseca, D. Nepstad, A. Pfaff, A. Peterson, A. Anderson, D. Boucher, A. Cattaneo, M. Conte, K. Creighton, L. Linden, C. Maretti, P. Moutinho, R. Ullman, and R. Victorine. 2010. "Indigenous Lands, Protected Areas, and Slowing Climate Change." *PLoS Biology* 8(3): e1000331.
- Robinson, B., M. Holland, and L. Naughton-Treves. 2013. "Does Secure Land Tenure Save Forests?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Tenure and Tropical Deforestati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doi:10.1016/j.gloenvcha.2013.05.012.
- RRI (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 2012a. "Tanzania: General Comments." May. Available at http://www.rightsandresources.org/documents/files/doc_4692.pdf.
- RRI (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 2012b. *What Righ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National Legislation on Community and Indigenous Peoples' Forest Rights*. Washington, DC: RRI.
- RRI (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 2014a. *Lots of Words, Little Action: Will the Private Sector Tip the Scales for Community Land Rights?* Washington, DC: RRI.
- RRI (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 2014b. *Status of Forest Carbon Rights and Implications for Communities, the Carbon Trade, and REDD+ investments*. Washington, DC: RRI.
- RRI (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 2014c. *What Future for Reform? Progress and Slowdown in Forest Tenure Reform since 2002*. Washington, DC: RRI.
- Ruiz, R., and G. Kallis. 2013. "Caught in the Middle, Colombia's War on Drugs and Its Effects on Forest and People." *Geoforum* 46: 60–78.
- Saalchi, S. S., N. L. Harris, S. Brown, M. Lefsky, E. T. A. Mitchard, W. Salas, B. R. Zutta, W. Buermann, S. L. Lewis, S. Hagen, S. Petrova, L. White, M. Silman, and A. Morel. 2011. "Benchmark Map of Forest Carbon Stocks in Tropical Regions across Three Continen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8(24): 9899–9904.
- Schoene, D., W. Killmann, H. von Lüpke, and M. LoycheWilkie. 2007. *Definitional Issues Related to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ests and Climate Change Working Paper 5. Rome: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 Scullion, J., K. A. Vogt, A. Sienkiewicz, S. J. Gmur, and C. Trujillo. 2014. "Assessing the Influence of Land-Cover and Conflicting Land-Use Authorizations on Ecosystem Conversion on the Forest Frontier of Madre de Dios, Peru."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71: 247–258.
- Searchinger, T., C. Hanson, J. Ranganathan, B. Lipinski, R. Waite, R. Winterbottom, A. Dinshaw, and R. Heimlich. 2013. *Creating a Sustainable Food Future: A Menu of Solutions to Sustainably Feed More than 9 Billion People by 2050*. Washington, DC: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 Sendzimir, J., C. P. Reij, and P. Magnuszewski. 2011. "Rebuilding Resilience in the Sahel: Regreening in the Maradi and Zinder Regions of Niger." *Ecology and Society* 16 (3): 1.
- Seymour, F., T. La Viña, and K. Hite. 2014. *Evidence Linking Community-Level Tenure and Forest Condition: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San Francisco: Climate and Land Use Alliance.
- Sizer, N., M. Hansen, and R. Moore. 2013. "New High-Resolution Forest Maps Reveal World Loses 50 Soccer Fields of Trees per Minute." Available at <http://www.wri.org/blog/2013/11/new-high-resolution-forest-maps-reveal-world-loses-50-soccer-fields-trees-minute>.
- Skutsch, M., and S. Solis. 2011. "How Much Carbon Does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 Save?" in *Community Forest Monitoring for the Carbon Market: Opportunities Under REDD*. M. Skutsch, ed. London: Earthscan.
- Stickler, M. 2012. "Brief: Rights to Trees and Livelihoods in Niger." Washington, DC: Focus on Land in Africa.
- Stocks, A., B. McMahan, and P. Taber. 2007. "Indigenous, Colonist, and Government Impacts on Nicaragua's Bosawas Reserve." *Conservation Biology* 21(6): 1495–1505.
- Stocks, A., A. Noss, M. Bryja, and S. Aree. 2012. "Deforestation and Waodani Lands in Ecuador: Mapping and Demarcation amidst Shaky Politics," in *Deforestation Around the World*. P. Moutinho, ed. Rijeka, Croatia: InTech.

Tanzania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2006. "Participatory Forest Management in Tanzania: Facts and Figures." Forestry and Beekeeping Division.

Taylor, P. 2006. *Country Case Study: Forest Tenure and Poverty in Colombia*. Bogor, Indonesi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USAID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1. "Ecuador Country Brief." Available at <http://usaidlandtenure.net/ecuador>. Washington, DC: USAID.

USAID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2. *Climat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2012–2016*. Washington, DC: USAID.

USAID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3. *Nature, Wealth and Power 2.0: Leveraging Natural and Social Capital for Resilient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USAID.

USAID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ndated. "Nicaragua Case Study: Indigenous Communities Get Land Titles." Washington, DC: USAID.

Veit, P., D. Vhugen, and J. Miner. 2012. "Threats to Village Land in Tanzania: Implications for REDD+ Benefit-Sharing Arrangements," in *Lessons about Land Tenure, Forest Governance and REDD+: Case Studies from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L. Naughton-Treves and C. Day, eds. Madison, Wisconsin: UW-Madison Land Tenure Center and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halen, J. 2012. "To What Extent Can New Farmer Managed Natural Regeneration Initiatives in Niger Benefit from Carbon Finance?" Working paper. Amsterdam: Face the Future.

Williams, L. G. 2013. *Putting the Pieces Together for Good Governance of REDD+: An Analysis of 32 REDD+ Country Readiness Proposals*.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DC: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ily, L. A. 2011. *The Tragedy of Public Lands: The Fate of the Commons under Global Commercial Pressure*. Rome: International Land Coalition.

WRI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2008. *World Resources Report*. Washington, DC: WRI.

Zulu, L., R. Yin, and J. Qi. 2014. *Empirical Linkages between Devolved Tenure Systems and Forest Conditions*. Washington, DC: Tenure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Program,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NDNOTES

1. RRI, 2014c; FAO, 2010.
2. RRI, 2014c.
3. Bluffstone et al., 2012.
4. Informe PRISMA, 2014.
5. Sizer et al., 2013.
6. Searchinger et al., 2013.
7. See <http://www.epa.gov/climatechange/ghgemissions/gases.html>.
8. Buizer et al., 2014, p. 2.
9. Pan et al., 2011.
10. Wily, 2011.
11. Scullion et al., 2014; Oxfam, 2014.
12. De Wit, 2012.
13. IPCC, 2014, WG3 Chapter 11, p. 55, and Chapter 15, p. 42 of 102.
14. Data on Overse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piled by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ac/stats/data.htm>.
15. USAID, 2012.
16. Skutsch and Solis, 2011.
17. Ibid.
18. Chhatre and Agrawal, 2009.
19. Please see Appendix B for an explanation of how this calculation was made.
20. FAO, 2010. According to FAO, as of 2010 the total carbon stock in the aboveground and belowground biomass of Canada,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 35.259 billion tonnes.
21. This comparison was made by multiplying 37.7 billion tonnes of carbon by 3.666 to determine its CO₂ equivalent of 138 billion tonnes. Equivalency to annual global car emissions was determined by the Greenhouse Gas Equivalencies Calculator, available at <http://www.epa.gov/cleanenergy/energy-resources/calculator.html#results>.
22. Larson and Pulhin, 2012.
23. RRI, 2014a.
24. RRI, 2012b; Larson, 2012. Although alienation is a part of the bundle of rights, it is not included in our determination of the strength of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This is because alienation has often contributed to the dispossession of communities.

25. Larson et al., 2010.
26. Blomley, 2013.
27. Hayes and Persha, 2010.
28. Persha et al., 2011.
29. Seymour et al., 2014.
30. Clerc, 2012; Resosudarmo et al., 2014.
31. Larson et al., 2008.
32. Barbier and Tesfaw, 2012.
33. Larson, 2011.
34. Community Forestry Association, 2013.
35. Oxfam, 2014.
36. De Wit and Stevens, 2014; Global Witness, 2013.
37. Seymour et al., 2014; Zulu et al., 2014.
38. Zulu et al., 2014.
39. RRI, 2014c.
40. FAO, 2010.
41. RRI, 2014c.
42. Naughton-Treves et al., 2013.
43. Nolte et al., 2013.
44. Ibid.
45. FAO, 2010; from most to least, the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forest carbon stock are Brazil, Russia,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Indonesia, with approximately 13 billion tonnes.
46. FAOSTAT, available at <http://faostat3.fao.org/faostat-gateway/go/to/browse/G2/GF/E>. FAOSTAT defines emissions from land u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PCC to include CO₂ and othe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ssociated with forestland converted to other uses and other land management activities. <http://faostat3.fao.org/faostat-download-js/PDF/EN/GL.pdf>.
47. RRI, 2014c; Bock, 2012.
48. RRI, 2014c; AMAN, 2014.
49. AMAN, 2014.
50. Carlson et al., 2012.
51. Ibid.
52. Ibid.
53. IRIN News, 2014.
54. Ituarte-Lima et al., forthcoming.
55. Larson and Dahal, 2012; Pokorny and Johnson, 2008.
56. RRI, 2014c.
57. RAISG, 2012.
58. Paneque-Gálvez et al., 2013.
59. Ibid.
60. FAO, 2010; carbon stock in aboveground living biomass of Brazil's forests totaled 62.607 billion tonnes in 2010.
61. IDB, 2012.
62. FAOSTAT, available at <http://faostat3.fao.org/faostat-download-js/PDF/EN/GL.pdf>.
63. RAISG, 2012.
64. Davis, 2013 (references Brazilian Constitution, art. 231).
65. Nolte et al., 2013, p. 4957.
66. Nepstad et al., 2006, p. 69.
67. Ibid.
68. Ibid.
69. Saatchi et al., 2011.
70. Ricketts et al., 2010. The authors found: "Simulation models suggest that ILPAs established between 2003 and 2007 could prevent 272,000 km² of deforestation through 2050, equal to 3.3 +1.1 GtC, more than 1/3 of the world's annual CO₂e emissions." To obtain 12 billion tonnes of CO₂, the conservative estimate of 3.3 GtC was converted to billions of tonnes and then multiplied by 3.666, the weight ratio of carbon to CO₂.
71. This equivalency was calculated by reference to WRI's Climate Data Explorer. Available at [http://cait2.wri.org/profile/Latin%20America%20&%20the%20Caribbean#Country GHG Emissions](http://cait2.wri.org/profile/Latin%20America%20&%20the%20Caribbean#Country%20GHG%20Emissions).
72. Gómez and Méndez, 2005; Hughell and Butterfield, 2008.
73. The FSC 10 principles and 57 criteria can be found at <https://us.fsc.org/mission-and-vision.187.htm>.
74. Radachowsky and Ramos, 2012.
75. Nittler and Tschinkel, 2005.
76. Hughell and Butterfield, 2008.
77. RRI, 2014c; Cronkleton et al., 2011; Charnley and Poe, 2007.
78. Barismantov and Antezana, 2012.
79. Corbera et al., 2011.
80. Fonseca, undated.
81. Klooster, 2011.

82. Bray, 2010 (Table 1).
83. Durán-Medina et al., 2005.
84. Bray, 2010.
85. Ellis and Porter-Bolland, 2008.
86. Barsimantov and Antezana, 2012.
87. DiGiano et al., 2013.
88. Klooster and Masera, 2000.
89. Ojha et al., 2009.
90. USAID, 2013, Annex 3.1; Luintel et al., 2009.
91. Anup et al., 2013.
92. Nagendra, 2010; Pokharel, 2012.
93. Zulu et al., 2014.
94. USAID, 2013.
95. Ibid.
96. Nagendra and Gokhale, 2008.
97. Magrath et al., 2013.
98. Luintel et al., 2009.
99. Ibid.
100. Ibid.
101. Skutsch, 2011.
102. Nagendra et al., 2008.
103. Carbon storage per tree is extrapolated from Trees of Hope project's allometric equations for *Faidherbia albida*, cited in Whalen, 2012. Estimated average density of 40 trees/hectare across 5 million hectares based on consultation with Tony Rinaudo, Natural Resources Advisor at World Vision, and on surveys by G. Tappan,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 Field surveys by USGS in 2005–06 estimated 12.6 tonnes of aboveground woody biomass/hectare in regenerated agroforestry formations. With a conversion factor of 0.45, this amounts to 5.67 tonnes of carbon per hectare. G. Tappan, private communication, June 4, 2014.
104. Surveys by ICRAF and others (Pye-Smith, 2013) indicate that the value of wood, fodder, fruit, pods, leaves, and other tree products amounts to approximately US\$1,000 per household per year. The estimated value of firewood alone amounts to about US\$250 per household, while benefiting women by reducing the distance travel and time required to harvest firewood. Approximately 4.5 million people live in the areas where FMNR has been scaled up; with an average household size of five persons, this equals 900,000 households (Reij, 2006, cited in Sendzimir et al., 2011).
105. Large areas of natural forests and woodlands were set aside as government-owned and -managed national forests and forest reserves. Local communities sometimes retained limited usufruct rights in these forest reserves, but they were largely excluded from the management except in the case of donor-funded participatory forest management projects.
106. Sendzimir et al., 2011.
107. Reij et al., 2009.
108. Stickler, 2012.
109. Pye-Smith, 2013.
110. USAID, 2013, Annex 3.2.
111. WRI, 2008.
112. Zulu et al., 2013 (citing Blomley et al., 2008).
113. Blomley, 2008.
114. Veit et al., 2012.
115. Ibid.
116. Tanzania Ministry of Nation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2006.
117. RRI, 2014c.
118. RRI, 2012a.
119. Blomley et al., 2008.
120. Taylor, 2006.
121. Armenteras, 2009.
122. Ibid.; Ruiz and Kallis, 2013.
123. RAISG, 2012; Porter-Balland et al., 2012.

124. USAID, 2011.
125. Holland et al., 2014; Stocks et al., 2012.
126. Holland et al., 2014.
127. Ibid.
128. Ibid.
129. Ibid.
130. Ibid.
131. RRI, 2014c.
132. Ibid.
133. Filer, 2011.
134. Greenpeace, 2012.
135. Filer, 2011.
136. Filer, 2012; Greenpeace, 2012.
137. Garret, 2014.
138. Oliveira et al., 2007.
139. Ibid.
140. RAISG, 2012.
141. Ibid.
142. Oxfam, 2014.
143. Scullion et al., 2014.
144. Ibid.
145. Forest Trends, 2013.
146. Fortin et al., 2010.
147. Ibid.
148. Forest Trends, 2013.
149. USAID, undated.
150. Larson, 2011.
151. Larson and Lewis-Mendoza, 2012.
152. Hayes, 2007.
153. Stocks, 2007.
154. Ibid.
155. Hayes, 2007.
156. Stocks, 2007.
157. Hansen et al., 2013. Data available at <http://earthenginepartners.appspot.com/science-2013-global-forest>.
158. Hansen et al., 2013, p. 2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and p. 850.
159. Saatchi et al., 2011.
160. RRI, 2014c.
161. Inventario Nacional Forestal, 2008.
162. RAISG, 2012.
163. FAO, 2010.
164. Saatchi et al. 2011.

ACKNOWLEDGMENTS

This report is the result of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and the 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 (RRI). The authors would like to give special thanks to Frances Seymour, Tony LaViña, and Kristen Hite, who graciously provided an advance copy of their global literature review on community tenure and forest health prepared for the Climate and Land Use Alliance (CLUA). We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Devika Jaipuria of WRI for preparing a similar review. This report began with their excellent work.

The report benefited greatly from the USAID-funded Tenure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project team. Led by Dr. Runsheng Yin and Dr. Leo Zulu of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the team reviewed the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st health and devolving forest rights to communities. This report also profited from a workshop discussing Drs. Yin and Zulu's findings held in December 2013.

We are deeply indebted to Peter Veit, Craig Hanson, Crystal Davis, David Waskow, Gaia Larsen, Fred Stolle, Mark Freudenberger, Bruce Cabarle, Peter Newton, Andy White, Alexandre Corriveau-Bourque, David Kaimowitz, Penny Davies, Steve Rhee, Kevin Currey, and Daniel Zarin for providing invaluable comments on earlier versions.

We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Anne Rosenbarger, Andika Putraditama, Chip Fay, and Chris Bennett for lending us their expertise on Indonesia, as well as Jason Scullion, Free de Koning, and Andrew Davis for their help with the Peru, Ecuador, and Guatemala case discussions, respectively.

Special thanks to Hyacinth Billings, Francis Irwin, Linda Starke, and Polly Ghazi, whose editorial guidance helped bring the report to life, as well as to Kemen Austin for aiding with carbon measurements and to Danielle King for excellent research assistance.

WRI's experienced Science & Research team, most notably Daryl Ditz, Ashleigh Rich, and Allison Meyer, ushered this report through the publication process.

We are grateful for the financial support provided by the Ford Foundation, CLUA, and RRI.

ABOUT THE AUTHORS

Caleb Stevens, Property Rights Specialist,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Contact: cstevens@wri.org

Robert Winterbottom, Senior Fellow,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Contact: rwinterbottom@wri.org

Jenny Springer, Director of Global Programs,
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

Contact: jspringer@rightsandresources.org

Katie Reytar, Research Associat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Contact: kreytar@wri.org

ABOUT WRI

WRI is a glob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that works closely with leaders to turn big ideas into action to sustain a healthy environment—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opportunity and human well-being.

Our Challenge

Natural resources are at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opportunity and human well-being. But today, we are depleting Earth's resources at rates that are not sustainable, endangering economies and people's lives. People depend on clean water, fertile land, healthy forests, and a stable climate. Livable cities and clean energy are essential for a sustainable planet. We must address these urgent, global challenges this decade.

Our Vision

We envision an equitable and prosperous planet driven by the wise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We aspire to create a world where the actions of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communities combine to eliminate poverty and susta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for all people.

ABOUT THE 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 (RRI)

RRI is a global coalition of 14 Partners and over 140 international, regional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dvancing forest tenure, policy and market reforms. RRI leverages the strategic collaboration and investment of its Partners and Collaborators around the world by working together on research, advocacy, and convening strategic actors to catalyze change on the ground. RRI is coordinated by the Rights and Resources Group,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based in Washington, DC.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rightsandresources.org.

SUGGESTED CITATION

Stevens, C., R. Winterbottom, J. Springer, and K. Reytar. 2014. "Securing Rights,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How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rest Rights Mitigates Climate Change." Washington, DC: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Accessible at www.wri.org/securing-rights.

PHOTO CREDITS

Cover Photo, pg. 10, 11,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ide cover, pg. 23 Aulia Erlangga, CIFOR; pg. iv Andre Lichon; pg. vi Tomas Munita, CIFOR; pg. 2 Ryan Woo, CIFOR; pg. 5 Waks; pg. 6 Neil Palmer, CIAT; pg. 8, 15 Olivier Girard, CIFOR; pg. 16 Jane Boles; pg. 39 Iddy Farmer, CIFOR; pg. 40 Tri Saputro, CIFOR; pg. 45 Rini Sulaiman, CIF

Each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report represents a timely, scholarly treatment of a subject of public concern. WRI takes responsibility for choosing the study topics and guaranteeing its authors and researchers freedom of inquiry. It also solicits and responds to the guidance of advisory panels and expert reviewers.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however, all the interpretation and findings set forth in WRI publications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Copyright 2014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ative Works 3.0 License. To view a copy of the license, visit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3.0/>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0 G STREET NE
SUITE 800
WASHINGTON, DC 20002, USA
+1 (202) 729-7600
WWW.WRI.ORG

ISBN 978-1-56973-829-0

區域聯防 保護森林資源，臺東社區山林巡守隊最給力 14

2018/11/03

11月2日傍晚4時30分林務局臺東林管處邀集知本工作站轄內輔導的5個社區山林巡守隊齊聚在溫泉社區巡守隊辦公室辦理一場社區林業-森林保護篇座談會，共有60多名巡守隊員參加。會議中邀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的盧道杰教授進行專題分享，保七總隊第九大隊臺東分隊森林警察也蒞臨與會。

近年來林務局積極推動結合在地社區或部落及志工參與山林巡護，其中以臺東林管處知本工作站所輔導的社區巡守隊最為活躍，包括：利嘉社區、溫泉社區、卡大地布部落、射馬干部落及達魯瑪克部落。這群社區山林巡守隊盡心參與巡護，協助林、警方查獲多起違法案件、成效斐然。

為了提升社區夥伴的巡護效能及巡護時所看到的各項環境資訊記載，臺大盧道杰教授跟巡守夥伴們分享「手機APP在社區巡護的應用」，有趣的議題及方便性，引起社區夥伴熱烈討論，來自達魯瑪克的巡守隊員胡敏杰，分享臉書上討論軟體操作的社團資訊；利嘉巡守隊隊長林肯毅分享使用手機軟體記錄巡護路線、動物等資訊的心得。會後盧道杰教授團隊也允諾協助輔導有興趣的社區巡守隊進行APP使用教學。

臺東林管處劉瓊蓮處長表示：國有林地周邊的山村部落社區是共同守護森林資源的好夥伴，在資源永續惠益後代的共同目標下，繼續為守護山林一起出力。

相關照片

下列為本網站使用鍵盤操作相簿功能說明：



[回列表](#)

瀏覽人次:914

最後更新日期:2020-03-12

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王和雄

大法官 廖義男

大法官 林子儀

大法官 許玉秀

本件係在審查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各款作為違反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程序之拘提管收事由，是否符合憲法意旨，以及拘提管收制度之正當法律程序。在正當程序方面，多數意見主張必須拘提與管收分開成兩個不同程序，分別聲請、審查與裁定，不得再有一次同時申請拘提、管收，一次同時裁定發出拘票與管收票之情事發生，並要求法官裁定管收必須開庭審理，單純書面審查尚屬不足等等，如果管收作為強制執行手段合憲的話，本席等對此正當程序之要求極表贊同，並認為經此程序面之改善，應可大幅並有效提昇人權之保障。惟本席等對以管收作為實現公法上金錢債權之強制執行手段，根本就持否定態度。關於系爭管收制度是否合憲之審查，多數意見持部分違憲、部分合憲見解：違憲部分指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五、六款等管收事由，就此，本席等敬表同意，惟所持違憲之理由尚與多數意見所持者有所不同；至於合憲部分之第一、二、三款管收事由，本席等認亦屬違憲，爰提出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如後。

按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各款管收事由中，第一至第三款屬不履行金錢給付義務的管收事由，第四至第六款則屬不履行協力義務的管收事由，其合憲與否的考量因素與理由構成不同，故以下分別情形說明之。

一、管收作為強制人民履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手段（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至第三款）

管收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而人身自由又可謂其他自由權之基礎，政府欲採取限制人身自由作為達成一定目的之手段，應慎重為之。故即使管收期限最長不得逾三個月（行政執行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參照），其合憲與否仍當以嚴格審查標準審查之。

管收制度的立法目的，乃在保全並實現各種公法上之金錢債權，俾滿足公共財政之需求，確保國家各項任務之實現。按公共財政需求如未能滿足，致國家任務無從實現，國家存在正當性也因此瓦解，是管收制度所追求實現公法金錢債權之目的，應可認屬特別重要公共利益，其目的自屬合憲，合先敘明。

管收制度的存在，對於公法上金錢債權之實現，確屬有助於達成目的之有效手段，縱此「成效」並非由於管收制度可直接作用於應供執行之財產，使金錢債權得以保全、實現，而係因管收制度作用於人民的心理，使人民在不欲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壓力下履行義務，為金錢之給付，或不敢為妨礙執行之行爲，就其欲達到的目的而言仍屬有效，只是在所謂的執行績效內，當然不免夾雜著部分確無資力的義務人，四處告貸、八方舉債的無奈。另一方面，管收制度對某些打定主意堅不履行義務的個案，仍起不了作用，因此，管收制度的有效性仍有一定之界限，惟尚無礙其通過手段適合性的檢驗。

然以人身自由之限制促使人民履行金錢給付義務，手段可謂極其嚴苛，如國家尚有其他同等有效且對人民基本權較小侵害的手段可資運用，仍應優先採用該其他較小侵害手段。在通常情形，行政上強制執行於法定義務人資力已不足以清償公法上金錢債務時，即應終結（行政執行法第八條第一項

第三款參照)；惟當執行實務陷於「人民究竟尙有無可供執行之財產」之懷疑，執行機關又認定「應有某種執行標的存在卻始終找不到」時，就會產生如何突破困局的問題。我國現行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至第三款之規定，有把這種困局的發生先推定爲由法定義務人所造成，再由法定義務人負擔確無資力的舉證責任之嫌疑。因爲邏輯上，當執行機關「懷疑」義務人仍有履行可能，執行卻無效果時，前提一定是認定義務人有積極隱匿、減少應供執行財產之行爲，否則上開「困局」並不成立。此三款規定並列的結果，則變成第一款概括規定爲法定義務人「顯有履行之可能，故不履行」之情況，第二、三款再分別將「故不履行」具體化爲義務人「顯有逃匿之虞」之情狀，以及「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於是，執行機關幾乎只要把執行成本投擲在某些「看得到」但「與其本身之經濟能力並沒有必然關係」的事物上——例如衣飾華麗、吃喝玩樂、出入轎車依舊等「奢侈」、「浪費」行徑——，就可轉以管收爲手段，製造義務人之心理壓力，逼使其履行，而不須盡力去調查並防止人民有隱匿、脫產等較難證明的妨礙執行之行爲，造成執行成本分配的本末倒置。無履行能力的義務人可能獲得親友照顧或選擇舉債度日，使其表面上看起來「顯有履行可能」，但是系爭規定卻使其僅因錦衣玉食的表象，就要面臨遭管收的危險，而且往往即使努力證明也未必獲得信任，因此系爭規定的弊端，實非執行上嚴加把關即可避免。另一方面，執行機關果能證明法定義務人確有隱匿財產之情事，本應盡力爲發現財產必要之調查並直接予以執行，即使對義務人亦可能造成其他基本權之限制，惟應不致更強於拘束其人身自

由。

德國在面臨類似上開「困局」時所採取之手段，頗有參考之價值。德國法制是設定一個要件非常具體、客觀的十字路口（註一），並使義務人在十字路口上作為選擇方向的主人，並不令其陷在與執行機關在真相上纏鬥的困局內。德國聯邦行政執行法第五條第一項、租稅通則第二八四條等所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八九九條以下，在合乎一定之要件時，課予義務人提出財產清冊以揭示其財產狀況及於一定期間內曾為之特定財產處分行為之義務（註二），並就其真實性作成替代宣誓之保證（註三）。義務人亦瞭解自己在十字路口的選擇將發生一定之法律效果：亦即，執行機關將以義務人所揭示並保證其真實之財產清冊為依據，尚有財產則續行程序，若無財產即終結程序，若所提出經過代宣誓之保證之財產清冊有虛偽不實之情形，亦將構成德國刑法第一五六條、第一六三條以下之以虛偽保證代替宣誓罪，得處三年以下或一年以下不等之有期徒刑或罰金。義務人作成代宣誓之保證後，不僅列入被稱之為黑名單之債務人名冊，也產生信用破產之結果。只有當義務人連自我決定及自我負責都拒絕，亦即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財產清冊、或拒絕作成代宣誓之保證時，才可由執行官署依據民事訴訟法之有關規定聲請法院命令管收（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九百零一條參照），促其作出此不具可替代性之選擇。綜上，德國之制度乃以信賴人民以及要求人民為自己行為負責為基礎：既非一開始即動用管收手段作為恫嚇，強迫人民履行，當人民主張其確無履行能力時，國家亦尊重該等主張，轉以為代宣誓之保證終結執行程序，並使之發生一定之法律效果——確不具履行能力者，將因此受到經濟地

位之不利益；其為虛偽報告者，將面臨刑事責任之追究。相較於我國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至第三款之規定，足證德國代宣誓之保證制度，係屬效果相同而侵害較小之手段，系爭規定以管收作為實現公法上金錢債權之間接強制手段也因此難以通過必要原則之檢驗。

二、管收作為強制人民履行協力義務之手段（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至第六款）

以管收作為強制人民履行到場、陳述、報告財產狀況等協力義務之手段，因同樣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故應以嚴格標準審查其合憲性，前已述及。在嚴格標準檢驗下，本席等認為，系爭三款管收事由，旨在經由強制人民履行協力義務，以取得人民財產資訊，達到降低執行機關行政執行的執行成本，或提升執行效率之公益目的，而行政成本與效率尚與特別重大公益有間，難認屬合憲之立法目的。即使退一步言，減低行政成本與增進效率可屬合憲之立法目的，以管收作為手段，仍不符比例原則之要求。詳言之，第六款之到場義務，僅須以短暫拘束人身之拘提即可達到履行狀態，管收顯非最小侵害手段。第四、五款情形，即使找不到與管收相同有效，並比管收較小侵害之手段，然無論如何，取得義務人財產資訊本身究非本案行政執行之最終目的，只是使執执行程序更為便捷的手段之一而已，若犧牲人身自由，為的只是減低執行成本，提升執行效率，使國家金錢債權能加快實現，其於手段與追求目的之不合比例性更顯無疑。在此尚須進一步說明的是，前述德國之代宣誓保證制度應提出財產清冊，與系爭第五款報告財產狀況之義務乍看固十分相似，惟德國執执行程序所設計的遊戲規則，乃以自我決定與自我負責為前提

，財產清冊之提出義務，是執行程序續行或終結之重要依據，執行機關必須絕對尊重經義務人保證真實的財產清冊，其地位已非僅用以促進執行程序便捷之協力義務。我國執行機關一方面以管收為後盾嚴促義務人協助執行，一方面對於義務人的協助又持不信任之立場，義務人無履行能力之主張並不容易被採認，提出報告後仍不能免於冗長之調查、詢問，甚至還可能遭以同項第一、二、三款事由管收。因此，二者得否管收之理由及法理基礎仍有重大不同，並不容逕予相提並論。

三、對人民妨礙行政強制執行之行為加以制裁，屬立法形成自由

惟需強調者，即使本席等不認同以管收作為強迫人民履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與協力義務之手段，並不表示本席等就同意人民可肆無忌憚地打著人身自由的防護傘，拒不履行法定義務。因為實現公法上金錢債權，或要求人民履行協力義務，均屬具有正當性之公益，國家在不違反比例原則範圍內，仍得以管收以外之其他各種有效手段來達成，例如對人民財產管理之強化，有效防止人民以妨害國家債權為目的所為之財產處分或隱匿等行為，積極地避免國家金錢債權執行之落空；或於一定的條件下，以人民具有法律上可非難性之行為為前提，使人民遭受到某種程度之制裁或不利益，在可非難性特別嚴重情形，其制裁甚至不排除為刑事上之人身自由之拘束。換言之，國家可分別對人民之違法行為為一定的法律評價，並對應以相當的法律效果，以兼顧人權之保障以及公益目的之達成。具體而言，若具有履行能力的義務人，以隱匿、脫產等方式，導致行政執行無效果，或於程序中為積極的阻撓（如虛偽報告財產狀況）或消極的不配合（如不為

報告)，其「阻礙國家公權力實施」之行爲，即具有可非難性。例如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四、五款所規定之「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以及「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爲報告或爲虛偽之報告」，或第二款之「逃匿」，皆爲可非難之行爲。至於法律效果應爲刑事罰或秩序罰，體系地位應置於刑法或行政執行法專章，對應於各該行爲的處罰內容及程度如何等等，則應由立法者在比例原則的規制下自由形成之。

四、結語

關於公法上金錢債權之強制執行，本席等的基本立場是，在查明義務人有可供執行之財產時，由執行機關直接依法逕就義務人財產執行之；確定義務人已無可供執行之財產時，不得強制執行，已進行之執执行程序應即終結；在懷疑債務人有履行能力，卻無法證明之情形，應參酌德制精神，改採較小侵害之命義務人出具經代宣誓保證真實之財產清冊的執行方式，向來以拘束人身自由威嚇人民履行義務之管收手段應即放棄，且本席等要特別強調的是，這不是任由立法裁量之制度選擇，毋寧是比例原則之要求。管收作爲金錢債權之執行手段，現制雖仍披以「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而故不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外衣作爲要件，仍不難看出係中國傳統對積欠錢糧人民「押交」之遺緒，甚至還可嗅出西方傳統社會所盛行之「監禁逼債」(imprisonment for debt)或多或少之影響，其由於具強大嚇阻之功效，方便又有效，而爲主事者樂爲採用，自不足爲奇，惟除與憲法保障人權意旨不符外，甚至難掩以人身作爲國家單純統治客體或手段的威權統治

色彩。國人過去或習而不查其違反人權之印記，而視為當然，或甚至以「貫徹人人平等遵守履行金錢給付義務」為由，而為政府管收不履行義務者的嚴正執法形象大聲喝采，不啻把對不履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者的譴責與報復，打著確保國家金錢債權的旗幟而遂行違反比例原則的討債程序，其中的法理扭曲與人權戕害，實在難以視而不見。本席等因此呼籲相關機關，應隨著人權保障的深化，重新檢視既有制度，革除違憲印記！

註一：德國民事訴訟法第八百零七條第一項將其要件規定為：查封不足以使債權人完全受償、債權人證明經由查封無法完全受償、債務人拒絕搜索、執達員踐行告知程序仍持續無法在債務人之住所遇見債務人。

註二：德國民事訴訟法第八百零七條第二項規定，財產清冊應記明：一、債務人於為代宣誓之保證所定第一次期日前二年，對其有密切關係之人所為之有償讓與；二、債務人於為代替宣誓之保證所定第一次期日前四年內所為之無償處分，但以民間習慣上偶為之小額贈與為標的者不在此限。

註三：債務人應以代替宣誓之筆錄，保證其應要求所為之陳述，係本諸良知及良心，正確且完整為之。

一部協同意見書及一部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彭鳳至

壹、一部協同意見書

本件多數意見係以立法機關基於重大之公益目的，得藉由限制人民自由之強制措施，以督促其履行法定義務，行政執行法關於拘提、管收之規定，於符合憲法上比例原則之範圍內，應為憲法所許；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所稱「法定程序

生物多樣性保育與原住民文化延續：邁向合作模式

紀駿傑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一、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

有關生物多樣性的課題，自從1980年代末開始被討論，乃至於1992年里約地球高峰會中共有160個國家簽署了「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並於1993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之後(French, 1995)，已經成為全球許多國家與地區所關懷的議題。雖然對於此議題的關懷，主要是著重於「生物多樣性」的三個層次——基因多樣性(genetic diversity)、物種多樣性(species diversity)、以及生態系統多樣性(ecosystem diversity)等三個層次的自然生態之面向(McNeely, etc., 1990)，但是也有愈來愈多的研究者與非政府組織開始致力於有關「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之間的關連性之研究，而其中尤其以對於全球原住民與生物多樣性保育之關係的研究最為重要。

一般而言，原住民泛指在一地居住數代以上，有獨特的語言、風俗、習慣，過著與該國強勢族群不同的、且較少使用現代科技的生活方式。根據一項統計，目前全球約有五至六千個原住民族群，散布於各大洲、諸島嶼(Durning, 1992)。從冰冷的北極到炙熱的沙漠；從全球工業化程度最深的北美、歐洲、紐澳與日本到仍以初級產業生產為主的非洲都有原住民的蹤跡，其中尤其以熱帶雨林區最多。然而，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原住民的生活領域已經比五百年前歐洲白人開始大肆掠奪全球土地與資源之前減少了大半。原住民過去曾佔有全球絕大多數土地，現在則僅保有地表約百分之十二的土地；就人口而言，它們的數量約在兩億五千萬左右(Davis, 1993; Durning, 1992)。

絕大多數的原住民都直接仰賴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各種資源作為生存的唯一依據。但是除此之外，土地也更是提供原住民生命意義、歷史、傳說、宗教、祭儀等部落文化、族群認同與凝聚力的來源。離開了土地及土地之上的樹木、作物、花草、溪流、山岳等這些孕育原住民文化的自然環境泉源，原住民便失去了與大自然界連結為一體的憑據，而原住民也就不再繼續成為原住民了。西雅圖酋長語重心長的告白便是全球原住民與自然環境之關係的最好寫照。

原住民在過去由於人口稀少、生活方式簡單，且大都仰賴當地自然資源維生，他們與周遭環境多能保持較和諧的關係，不致於大肆破壞當地生態。然而，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廣化和深化，他們舊有的生活方式甚至族群的生存都飽受威脅(當然，也有不少原住民社群逐步地擁抱市場經濟或受其影響，因而也改變了他們與自然環境的關係)。近年來，國際社會逐漸重視原住民的生存權及他們所能提供現代社會學習與醒思的地方，而1992年的地球高峰會及1993年的國際原住民年都在提醒世人必須重視原住民的生活及他們傳統知識的貢獻。然而，這些呼聲卻抵擋不住資本主義的巨輪，每年在全球各地仍有許多原住民族遭受摧殘乃至滅族。

原住民族群的遭受迫害代表著全人類寶貴文化遺產的毀滅，以及重要生態知識的從此消失。除了前述的巴拿馬原住民例子之外，全球從南美的亞馬遜河流域到中美洲、非洲、南亞、東南亞、新幾內亞及大洋洲的熱帶雨林裡都居住著一群群的原住民部落。這些熱帶雨林雖然只佔地表6%面積卻擁有超過地球一半的生物，因而也正是目前全球生物多樣性最重要的區域(Wilson, 1992; McNeely, etc., 1990)。換句話說，原住民是目前全球生物最多樣地的守護者；由於他們的存在，維繫自然生態體系的動植物基因庫的保存才有可能，否則這些地方將更容易與輕易的被「開發」的怪手摧殘。同樣的，居住在各種「偏遠地區」(極地、山岳、沙漠等或其它遠離主流文化地區)的原住民也以他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維護了當地的自然生態。我們將在下文更仔細的討論這個面項。

除了上述原住民以他們的生活方式保存了完整的生態體系與維持生物多樣性之外，由於他們長期與大自然互動，他們對於當地的生態環境有著豐富的知識。這些包括四時的運行、氣候的變化、動物昆蟲的習性、植物的藥用等等寶貴的知識都保留在他們語言、風俗習慣與生活中。「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就強調原住民能提供現代社會關於森林、山地、旱地等複雜的生態區資源管理的經驗(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12)。而由於絕大多數原住民並未發展出書寫文字，

他們對於自然生態的知識並不容易被外人所知悉與流傳。因此，當原住民族群逐漸消失時，他們也將帶走這些千百年來所累積的寶貴生態知識。更有甚者，一旦全球原住民族群被資本主義社會所吞噬，他們長期所處之地的生物多樣性以及提供人類社會文化活力的文化多樣性也將隨之消失。如此一來，人類社會的生存及文化的延續都將倍受威脅。下文我們便試圖從生物多樣性的角度來探討原住民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

然而，究竟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之間有什麼樣子的關係呢？首先，前文提到，地球上生物多樣性最高的地方在熱帶雨林區。而今天的雨林覆蓋面積已經只剩過去已知的覆蓋面積的一半。再者，一般估計，這些雨林每年正以平均0.6%—1.6%的速度消失中；在有些地方，如西非的象牙海岸、奈及利亞、南美的巴拉圭以及亞洲的尼泊爾，每年熱帶雨林消失的速度更超過4%。在南美的厄瓜多爾西部熱帶雨林區，過去40年來90%的森林已被砍伐，而該區域中至少50%的物種已經消失（McNeely, 1990; Wilson, 1992）。森林遭砍伐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不外林木採收、開採石油、採礦、修路、水力資源利用（淡水資源與發電廠）及放牧等。然而，由於全球有多數的原住民都住在雨林裡，當「開發」的巨輪捲下時，雨林與其中的無數物種和原住民都將一起遭到碾斃的命運。

目前地球上如此多樣的生物種類是經過大約40億年的長期演化而來的，而除了幾次自然引起的大滅絕之外，生物演化律乃是由簡而繁，由少樣而多樣。物種的絕跡雖然也發生在包括「自然淘汰」等方式的自然過程，然而，Wilson的研究顯示，由於人類的大量干預，目前物種消失的速度大約是在沒有人類干預狀態下的1,000到10,000倍（Wilson, 1992: 268）。由這個數據我們幾乎可以斷言，人類正走向一個由多樣而少樣的「反演化」危險之旅。對於這個危險之旅，國際間目前已有共識及許多條約試圖來緩和物種消滅的速度。然而，國際間對於隨著森林砍伐而消逝中的原住民的關切，似乎並不如對生物多樣性那般的關注；這其實是犯了近視短利與沒能掌握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間密切關連性的本質之錯誤。全球眾多原住民文化的存續，不但攸關著生物多樣性的維護，它也影響著人類文化的長久健康發展。

前文提到，在過去的歷史中我們往往發現，隨著森林的砍伐，原住民也跟著消逝。其實，反之亦然：隨著原住民的消逝，森林就跟著被砍伐。（當然，這樣子的關係，並非表示原住民與自然之間是一層不變的「本質」關係，而是會隨著原住民社會的變遷而有所改變，我們在下文將會對這部分有更多的討論。）大多數的原住民社會不但善用森林資源維生而不過度剝削這些資源，並且也累積了無數關於當地動植物、氣候、生態與醫藥知識。相對的，非原住民居住地方的自然環境多半被愈來愈多的人為環境所取代；即便是農地與林地也都傾向於破壞了原來的多樣面貌而將之轉變為單一農作或林木。

這種情形，在過去五百年來歐洲白人殖民全球的過程擴及了全世界。帶著征服自然與剝削資源的目的，白人所到之處，該地生態大都隨即遭受改變與破壞。白人的殖民史其實便是全球的環境變遷史及物種的銳減史（Crosby, 1992）。當然，它更是其他無數民族的災難史。當然，其它非受白人殖民的地方以及獨立後的各國，在近一百年來也逐漸因人口成長與工業發展等因素而漸次的破壞了該地的自然生態。而唯有未遭殖民者入侵的原住民長久居住之處，該地的生物多樣性得以被保存下來。在生物多樣性的價值被普遍重視的今天，我們可以清楚的做如下的陳述：地球上，有相當大成分的生物多樣性是靠著原住民才得以被保留下來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不同的自然生態，孕育了不同的族群文化，而相對的，不同的族群文化也會對自然生態有不同的價值觀。舉例來說，作者所任教的東華大學位於花蓮南邊，共擁有251公頃的校地，而至今所使用的部分只佔一半左右，因此作者在上課時便指著窗外對學生說：「我們常常說，學校裡還有許多『荒地』。」然後我接著解釋，所謂的「荒地」，其實是特定於某種文化與生產方式之下的觀點。我們認為的荒地，在其它文化看起來並不一定是「荒地」。在漢人還沒來到壽豐之前，此地的阿美族與太魯閣族人不時前往這塊沖積平原進行狩獵採集的活動，包括目前還時常出現在校園內的環頸鴉、野兔、老鼠等，以及許多野菜類，這都是他們日常生活所需的食物來源。因此，對他們而言，這些地方是非常豐富的狩獵採集地，絕對不會是「荒地」。

然而，人類自從實施農業定耕之後，對於土地使用的單一化亦逐步提高，而這個狀況隨著「工業化」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愈來愈深化，只有更加嚴重。而伴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世界貿易組織」所鼓吹的是「世界分工」——在一個地方（國家）生產少數專門化的產品以減低生產成本，增加競爭力。然而，所謂「專門化」，從生態的角度來看，便是「單一化」；美國、加拿大廣大的農業種植面積是最好的例子，而台灣的「出口成長」經濟定位，也在過去十幾年來漸次地吞噬了許多的沿岸與

山丘地。在這些農業與工業生產方式及文化之下，對於沒有被開墾成農地，整為建地、廠房與道路之土地，便被視為「荒地」了。

上述這些人類社會的發展，才是破壞「生物多樣性」最根本的動力。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重要性，在此情況下便顯得相當重要與急迫。然而，重點是我們必須懂得「區辨」，區辨出對於生物多樣性保育造成壓力的真正來源為何，而非不加區辨地將所有人類都一視同仁地當成破壞的來源。今天，全球陸地上生物多樣性最高的地方（也因此往往被選為需要「保護」的地方），大多是原住民居住的地方，主要原因便是在於過去的歷史中，他們並不是破壞者，而是長久以來與當地生態「共同演化」（co-evolution）的夥伴（Maffi, et al., 2000; Smith, 2001）。過去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常常犯的錯誤，便是未能區辨這些原住民（以及其它當地居民）以及造成保育壓力的其它人類與社會組織。

因此，愈來愈多的學者提出證據並主張，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之間有複雜的密切關係（Durning, 1992; Maffi, 2001）。世界野生生物協會（World Wildlife Fund International）在近年來所研究的900個生態區域中，指認出238個最重要的生物多樣性區域，而這些區域證實了高生物多樣性與高文化多樣性之間的關連性（Maffi, et al., 2000）。這些發現與主張，漸漸地改變了過去對於「自然生態」與人類之間之關係的觀念。

二、從「未經人類干預」到「人與自然共同演化」的認識轉變

過去十多年來，有關生物多樣性保育研究一個最主要改變的觀念，便是愈來愈多研究者不再誤以為（堅持）當前全球許多保護區的自然生態，都是因為「未經人類干預」而得以保存下來的。愈來愈多的研究發現證實，過去被認為是「未經人類干預」的「自然野地」，其實大都充斥著人類的蹤跡，從極地、沙漠、雨林、草原到高山都是如此。而所謂「未經人類干預」的說法，不過是人類在歷經工業破壞與污染之後，所產生的浪漫想法罷了。

在美國的黃石公園，這個全球第一個成立的國家公園，當初整個創設的理念便是「排除人類影響」。因為在美國白人從東部漸次開發（破壞）至西部的歷程中，他們看到了自然被改變與破壞的狀況，而當時也有不少保育者呼籲自然保存的工作，以留給後人所觀賞、使用（Keller and Turek, 1998）。然而，直到近一、二十年來，不論是在美國國內或國際保育界（包括台灣），不斷地將黃石公園塑造成「未經人類干預」而且必須持續「排除人類影響」的說法與想像，卻是忽視當地原住民（主要是Crow、Shoshone與Bannock族群）千百年來在該地持續活動的事實。當代的考古與人類學研究便顯示，現今「國家公園」內的一種黑曜石是原住民用來製造石刀與其它工具的材料，他們在「公園」內打獵，也前往使用具有靈性療效的溫泉，有些群體並留下供奉物品。再者，他們定期性的燃燒部分土地與樹木，除了方便他們自己的行進路徑與狩獵採集之外，也豐富了當地的多樣生態（Spence, 1999）。

然而，在19世紀末時，白人對於自然生態與原住民這些同為「人類進步過程中的障礙」以及「最好保留一些給後人參觀」之對象，所採用的是同樣的「區隔」、「孤立」的方式，因而他們不但無視原住民在該地持續使用的事實，編造出類似「印地安人害怕噴泉因此未出現在此地區」的謊話，最後並驅趕原住民出國家公園範圍，並將軍隊駐紮於公園管理處以阻止原住民進入。原住民自此便被阻絕於他們長久以來持續使用的土地與自然。這也使得原住民與一些自然生態開始產生了隔閡，其中便有人如此的感嘆：「白人弄了一些小島^[1]給我們，一些小島給四隻腳的，而年復一年我們兩隻腳的和四隻腳的距離便愈來愈遠了。」（Spence, 1999: 3）

現今在西海岸被稱為優勝美地的地區，當地的Ahwahneechee原住民視他們所居住的地區為世界被創造時，土狼(Coyote)特別引導他們來居住之地；此地為創造者預備了豐富的果實、魚、藥用植物、根、水果、野梅、鹿以及其它動物，讓他們有食物吃、獸皮衣穿與床褥睡（Spence, 1999）。早期白人來到此地時，由於他們發現當地原住民相當友善與可親，因而彼此之間維持了一小段時間的和諧相處。有些白人則認為印地安人出現於優勝美地區，是與當地的自然相呼應的。然而，等到優勝美地在1890年被劃歸為國家公園之後，這一切就開始改觀了。

由聯邦騎兵駐守的國家公園開始嚴格執行禁區管制與禁獵等措施，這嚴重地影響了原住民在公園高山區域進行的狩獵採集活動。不但如此，一些白人也提出了有關原住民與當地自然景觀不相協調的論

調，這包括在美國保育界頗負盛名的Muir，他說優勝美地地印地安人：「大多是醜陋，有些甚至是可憎的。他們並不屬於這個地景。」同時，他也認為當印地安人在場時，他並無法感受荒野的、肅穆的寧靜（Muir,引自Spence, 1999）。Muir的說法，其實是呼應了美國19世紀後期有關「未有人居、原始」的「荒野」浪漫想法，以及印地安人終將消失、被同化的信念。雖然優勝美地國家公園並未如黃石公園般，在公園成立之初便完全限制與禁止原住民在公園內居住，但透過各種管理手段，最終也逐漸地將原住民隔離出國家公園的範圍之外了。

美國黃石與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對待當地原住民的政策因此影響了全球有關「無人公園」的理念，一直到1980年代才開始改變。台灣於1980年代時開始成立國家公園，當時便是由於輕率地將美國以及後來經IUCN採用的這套國家公園理念與制度移植於台灣，而未嚴肅地面對國家公園內原住民的生計、文化以及其它權益等問題，才會導致原住民不斷地抗議以及衝突的後果（紀駿傑、王俊秀，1996）。

美國的國家公園政策在1987年開始有了正式的轉變，在它的「原住民關係經營政策」中，責成國家公園單位不但要「容忍」原住民在公園內與周遭的存在，更需尊重與主動地鼓勵及提倡原住民文化，使其成為公園本身的一部份（Keller and Turek, 1998）。因此，即使經過了一百多年，黃石國家公園內已經沒有原住民定居於公園範圍內，但是國家公園管理處目前也透過諮詢周遭原住民的方式，讓原住民參與國家公園事務。

三、傳統知識、傳統使用與生物多樣性

有了前述這些認識上的轉變，國際社會從1980年代末開始，便對於原住民與當地自然環境的關係，尤其是他們所累積的傳統生態知識，他們對於自然領域的傳統經營方式，以及透過他們的生計與文化活動而豐富當地生物多樣性的過程等進行深入的探討與研究。而這些研究的成果，也一一展現在1990年代的各項國際公約與規章之中。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中，於「序言」部分提到：

「（締約國）認識到許多體現傳統生活方式的原住民和地方社區同生物資源有著密切和傳統的依存關係，應公平分享從利用與保護生物資源及持續利用其組成部分有關的傳統知識、創新和實踐而產生的惠益。」

同時，在其第十條「生物多樣性組成部分的永續利用」條文中也指出：

「（每一締約國應儘可能並酌情）保護並鼓勵那些按照傳統文化慣例而且符合保護或永續利用要求的生物資源的習慣使用方式。」

而在第八條「就地保護」中亦強調：

「參照國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維持那些原住民與地方社區中，依照傳統生活方式並且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持久使用相關的知識、創新與做法，並促進其廣泛應用，由此等知識、創新和做法的擁有者認可和參與其事並鼓勵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識、創新和做法而獲得的惠益。」

此外，長期以來在全球許多原住民地區進行各不同人類社會看待與使用當地自然方式之研究的國際民俗生物學會，在他們1998年所訂定的倫理規範（Code of Ethics）中則是主張：「文化與生物多樣性之間存在著複雜的關連性，此關連性主要是立基於原住民對於全球最重要多樣生態系統具相當大部分之傳統知識與管理。」筆者於2000年參加該學會於美國喬治亞州喬治亞大學舉行的年會中，共有兩百多位研究者針對他們在各原住民地區進行的生物、醫藥知識、基因科技與傳統文化之關係，以及這些研究成果的智慧財產權問題，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其中，如何確保當地居民可以因為這些研究而獲得應得的利益或回饋便是此次大會的主軸關懷之一，而會議中還發生墨西哥籍代表指控美國的一個研究團隊掠奪他們在墨西哥南部查帕省（Chiapas）研究成果之智慧財產權的插曲。

因此，今天當我們開始體認生物多樣性維護的重要性，便同時必須認識到，生物多樣性的維護，必須要兼顧原住民文化、生計與生態知識的保護、延續與應用，如此才有可能真正做好這個工作。然而，長久以來有關上述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文化之間的關係，以及原住民傳統知識和傳統使用/經營的重要

性，它們不但不被認可與尊重，更常常引致原住民社群與保育機構/團體之間的嚴重衝突，最主要的原因乃在於：

- 1) 國家、國際組織與相關學界未清楚地認識到，原住民生活方式及文化與維護生物多樣性的密切關係。
- 2) 因為上述原因，在過去有許多原住民族群成為各種保護生物多樣性措施的直接受害者，他們不是被驅離保護區，就是被限制各種傳統使用與經營生態資源的行為。
- 3) 因而，不但原住民的人權受到壓迫、生計遭到困難，他們傳統的生態知識也逐漸流失。

另外，自從1980年代以來，利用民俗植物以及基因工程研究來發展新藥物與食物，開始成為重要的市場獲利來源。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機構往往是結合了生化公司、製藥公司與國家及學院內研究單位的複合體，這些機構常常在借重了原住民的傳統生物知識之後，粹取出他們所要的成果並加以專利化以販售圖利，這使得原住民反而無法使用他們傳統的生態資源（包括生計與醫療使用），對他們的生計與健康造成莫大的傷害；印度的環境工作者Shiva（1997）稱這樣子的現象為「生物海盜」行徑。

因此，如何透過國際公約內容的履行，國內對於原住民土地、資源權益的保障，以及原住民實際的參與他們生活、生計、文化等相關的环境與資源管理事務等方式來確保原住民的傳統知識、傳統使用得以延續，這便是當代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一個重要的課題了。這其中，前述有關國家公園以及保護區與當地或附近原住民之間關係的改變，主要便是透過新的、合作模式的「共同經營」機制來推行。

四、從排除到合作：美國、加拿大與澳洲國家公園的共同經營

模式

一如前文所述，美國做為全球設立國家公園的創始者，它同時也深深地影響了全球有關國家公園/保護區的經營理念。但是在面對現實的狀況（尤其有關原住民在國家公園內部或附近活動的事實），以及本文前述有關對於人與自然之間關係認識的改變，國家公園對於當地原住民的政策在過去一百多年間也作了不少的調整。這些政策主要可以分為下列四個階段：1) 政府強制性地取得相關用地；2) 停止強制性地土地取得，但持續地漠視當地原住民的文化、條約權利與其它需求；3) 為了積極爭取他們的相關權益，原住民的抗爭活動；4) 新的，致力於跨文化和諧與合作的國家公園政策（Keller and Turek, 1998: 233）。

在美國的阿拉斯加與加拿大Yukon Territory的國家公園，1980年代開始相繼建立了國家與當地居民合作經營(co-management)的模式。不同於傳統國家公園反對公園內的人類活動，合作經營模式主要是為了兼顧以下的目標：1) 將人類活動導致的過度使用與有害的環境影響減至最低以保護自然資源。2) 允許原住（居）民使用國家公園內的自然資源以維護他們的文化、發展、營養、政治與心靈上的需求（Sneed, 1997:151-2）。在實際作法上，兩國均是在國家公園組織下成立一個有當地原住（居）民參與的委員會來討論與提供有關住民使用公園內資源的方式與限制的建議給國家公園主管機構。此外，合作計畫也規範國家公園應優先錄用當地原住（居）民成為正式職員。

在加拿大北邊Yukon Territory的Kluane國家公園，這個被聯合國文教基金會劃定為「人類文化資產地」之區域，同時也是Champagne and Aishihik原住民的傳統居地。他們在1993年時與加拿大聯邦政府簽署了自治協定，獲得了自治的地位，其中協定內容便包含了有關原住民社群與國家共同經營Kluane國家公園的條文。條文的主要內容包括成立一個Kluane國家公園的管理委員會，而委員會的四位成員當中由原住民社群推派兩位，另外兩位則由加拿大環境部推派；此外，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或他指定的代表則擔任無投票權的委員。委員會最主要的職責與權限便是針對國家公園的範圍、範圍、經營方式以及原住民的資源使用權等提出意見（Minister of Indian Affairs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 1993）。這樣子的共同經營模式雖然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與衝突，但比起過去國家強制性的保育而犧牲原住民的資源權，確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學者Sneed根據上述兩個共同經營的經驗，建議共同經營模式應朝著下列的目標與方向努力：

- 1) 保障原住民自己界定的文化信仰、行為與組織的維護與強化。

- 2) 提供原住民社區參與政策形成、計畫、實際經營與評量國家公園的機制與管道。
- 3) 給予原住民否決權或要求委員會委員對於問題的全面共識以強化他們的參與權。
- 4) 必須使委員會委員，不論是政府官員、原住民或其它人士對於他們做的決定負責任。
- 5) 國家公園或保護區應將原住民的傳統知識納入其政策、計畫與經營管理系統中；在所有的文化與自然資產的解說活動中，應該要運用傳統知識與當地的專家。
- 6) 在維護生態永續的前提之下，保障當地住民對於自然資源的生計使用權。
- 7) 給予當地原住民所有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職位的優先錄用權，並提供他們在職訓練。
- 8) 對於因保護區的設立而損害到當地原住民資源使用權提供賠償。

(Sneed, 1997: 152-4)

在澳洲Northern Territory的國家公園，原住民享有比上述美、加北部原住民更多的資源全與經營管理權。以當地的Kakadu與Uluru-Kata Tjuta國家公園為例，這兩個分別被UNESCO認定為「世界資產地」與「生態保護區」的國家公園之土地權分別在1976年的「原住民土地權」法案(Aboriginal Land Rights (Northern Territory) Act)與後續的追認程序中有條件的劃(還)給了當地原住民。這個條件便是原住民同意將這兩塊地區租給澳洲自然保育局(ANCA--Australian Nature Conservation Agency)，同時，原住民也取得與ANCA共同經營的權利、租金以及部份門票收入(De Lacy and Lawson, 1997)。

租約中並有許多保障原住民權益的條文，包括：

- 1) 原住民持續享有進入、視察、使用與佔有他們土地的權利。
- 2) 鼓勵並保護相關原住民的利益。
- 3) 保護原住民重要的地點與物件。
- 4) 鼓勵原住民傳統的保存。
- 5) 採取所有實際步驟來促進原住民經營、管理與掌控國家公園。
- 6) 在實際可行範圍下，盡量鼓勵原住民在國家公園內或相關範圍提供服務。
- 7) 利用原住民個人或團體的傳統技藝來經營國家公園。
- 8) 鼓勵原住民在國家公園內發展與經營事業/商業。

(De Lacy and Lawson, 1997:164-6)

而上述條文的執行是仰賴有超過半數原住民席位的國家公園經營委員會來完成。由於有了上述的安排，不但原住民的權益在公園內可以得到保障，他們的傳統文化得以延續與保存，他們更能從國家公園獲得就業機會與可觀的收益。以Uluru-Kata Tjuta國家公園為例，光是1994年一年的門票收益就有美金六十萬元左右。也難怪當地原住民普遍的對這樣子的安排與結果感到滿意(De Lacy and Lawson, 1997)。

上述「共同經營」的模式不但確保了當地原住民各項權益的獲得保障，更透過這個機制內的各項措施來達成原住民傳統知識與傳統經營方式被尊重與被納入當代管理體制中，而原住民社群的許多與這些資源使用、生態經營的文化（例如狩獵文化以及各種祭典活動），也因此而得以延續、發展。同時，這樣的作法，也使得原住民與國家公園之間能從過去的敵對者變成了合作者的嶄新關係。

結論：邁向保育與文化保存的雙贏模式

本文從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來談近年來，全球有關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開始重視當地原住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本文主張，過去對於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的那套「原始、未經人類干預的自然野地」浪漫化認知，已經逐漸被更符合事實的「人類在自然中活動、運作」之認知所取代。因此，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必須同時兼顧自然生態與當地住民的生活、文化，如此才有成功的可能。

性。本文也引美國、加拿大與澳洲的國家公園與當地原住民「共同經營」的例子來說明新型態的、合作式的保育工作如何可能。

歸結而言，作者認為我們談論生物多樣性保育時必須同時關照原住民參與的主要理由有下列三點：（1）這是符合社會正義與環境正義的作法；（2）這是國際上正確的趨勢；（3）更重要的，這才是真正有效的生物多樣性保育方式。台灣過去有著許多原住民與保育機構，尤其國家公園之間的嚴重性衝突，最主要原因便是在於當地原住民不但被排除於國家公園規劃與執行工作之外，他們更因為這些國家公園的成立而在經濟、文化與傳統資源使用活動上遭受莫大的限制。因此，如何重新設計、規劃出符合本文所討論的合作模式便是當前國家公園管理機構最重要的任務了。

最後，作者也必須提醒，本文所舉的國外「共同經營」模式雖然非常值得我們參考，但是我們卻也不能期待可以斷然移植這些模式來到台灣而能立即收到成效。台灣以及台灣的原住民有許多不同於本文所介紹的「共同經營」模式地區之特色，依作者觀點，主要包括下列：（1）台灣的國家公園領域內事權複雜，而非僅由單一機構負責管理；（2）台灣地區原住民土地多已個人私有化，過去部族共有、共管的狀況與機制在許多地方已不復存在；（3）由於台灣地狹人稠，即使原住民傳統居住地區受市場經濟與主流文化之影響也往往非常深遠。在這些狀況與條件之下，許多原住民社區可能需要時間重新發展出可以集結社區意志與力量的機制。作者認為，我們可以將「共同經營」視為長遠的目標，但是在短期內，應該從成立社區「諮詢委員會」開始做起，讓當地原住民有參與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的管道。如此一來，原住民一方面可以為他們的社群權益發聲，另一方面可以貢獻他們的傳統生態知識，延續傳統自然資源使用方式，並透過此確保他們的文化延續。

參考文獻

- 紀駿傑、王俊秀，1996，〈環境正義：原住民與國家公園衝突的分析〉，收於《台灣的社會學研究：回顧與展望》論文集。台中：東海大學。
- Crosby, Alfred W. 1986.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Shelton. 1993. "Introduction." In *Indigenous Views of Land and the Environment*, edited by Shelton Davis.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 no. 18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Durning, Alan Thein. 1992. *Guardians of the Land: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Health of the Earth*. Worldwatch Paper 112. Washington, D.C.: Worldwatch Institute.
- French, Hilary F. 1995. "Forging a New Global Partnership." In *State of the World 1995*.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 Keller, Robert H. and Michael F. Turek. 1998. *American Indians and National Park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 McNeely, Jeffrey A. etc. 1990. *Conserving the World's Biological Diversity*. Gland, Switzerland: IUCN.
- Maffi, Luisa. 2001. "Introduction: On the Interdependence of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Pp. 1-50 In *On Biocultural Diversity*, edited by Luisa Maffi.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Maffi, Luisa, Gonzalo Oviedo, and Peter Bille Larsen. 2000. *Indigenous and Traditional Peoples of the World and Ecoregion Conservatio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onserving the World's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A WWF Report. Gland, Switzerland: WWF International.
- Minister of Indian Affairs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 1993. *The Champagne and Aishihik First Nations Final Agreement Implementation Plan*. Ottawa.
- Shiva, Vandana. 1997. *Biopiracy*. Boston: South End.
- Smith, Eric A. 2001. "On the Coevolution of Cultural, Linguistic,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Pp. 95-117 In *On Biocultural Diversity*, edited by Luisa Maffi.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Spence, Mark David. *Dispossessing the Wilderness: Indian Removal and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al Park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Edward O. 1992. *The Diversity of Life*. London: Penguin books.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 這裡的「小島」，並非真正的水中之島，而是指一小塊一小塊孤立的「陸上之島」。

楊舜行
應用地質技師

前言

地球上生物多樣性快速喪失已是廿一世紀全球環境保育的重大議題。根據估計，到2050年時，世界將有四分之一以上生物物種會自地球上消失，嚴重影響生態平衡。台灣面積雖小，但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依學者概估全島的生物約有十五萬種，佔全球物種數的1.5%，其中三成的物種是台灣特有種。根據調查，台灣生物資源具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與高比例的特有種與亞種等特色。在植物資源方面，維管束植物有四千多種，苔蘚植物約一千五百種，真菌類有五千種。動物資源概估有十四萬種，已發現哺乳動物約七十種，鳥類約五百種，爬蟲類近百種、魚類約二千五百種，已命名昆蟲有一萬八千種。生物物種因調查而在增加中。但由於台灣人口密度高、開發壓力大，以及環境敏感、地質地形脆弱等因素，生物物種易受衝擊，因此，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工作更形重要。

「生物多樣性」之觀念在國內起步較晚，但過去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各項保育工作，在國內已進行多年。為了推動台灣生物多樣性保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2000年2月15日完成台灣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草案），送行政院永續會審查，供我國未來推動本工作之參考。2001年8月15日行政院永續會之「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提出「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經行政院院會通過，該方案針對台灣生物多樣性所面臨的五項課題，包括生物多樣性之國家機制未整合、管理架構鬆散、研究與資訊未有效整合、教育及民眾參與不足以及工作連結薄弱等，提出現階段推動生物多樣性重點工作，期能保育生物多樣性，使自然資源可永續被利用。

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簽訂的「生物多樣性公約」是目前最大的全球保育公約，有133個締約國，迄今已有177個國家簽署，為目前國際上極為重要公約組織。該公約成立之目的在保育並永續利用遺傳、物種和生態系多樣性，並公平分享生物多樣性所帶來的利益。世界各國正努力依循公約的建議，加強生物多樣性的保育研究、教育與資訊的傳播，以提升各國履行公約的能力，而在世界如此熱烈參與之際，台灣怎能缺席呢？然而現今台灣存在的空氣、水、土壤污染、地景系統之破碎化與棲地劣質化、珊瑚與森林生態系之破壞、物種滅絕、地層下陷、酸雨以及土石流頻仍等問題，在面對「生物多樣性」工作範圍涵蓋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與生態系多樣性三個層次之時，如何保護生物多樣性、促進資源之永續利用，則必須全盤考量包括：1.農林漁牧和社經發展對生物多樣性的衝擊；2.原住民的農林漁牧狀態與檢討；3.目前政府設置保護區對多樣性維護有何具體的成果；4.都會區公園綠地的保育功能；5.目前相關生物多樣性的體制法規的檢討；6.相關研究和教育的情況；7.全球生態與政商變遷的情況等七大課題，是為生物多樣性工作之成敗關鍵。

世界各國生物多樣性推動情形

1991年聯合國環境計劃署（UNEP）發起制訂的「生物多樣性計劃與實施策略」（BDPS），則是對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育的一項前所未有規模廣大的行動計劃，它對保育和搶救瀕危物種、生態系以及生物資源的永續利用發揮巨大作用。1992年巴西所舉行之地球高峰會議上，更有153個國家的元首或政府代表簽署了「生物多樣性公約」之舉，公約目標包含：1.保育生物多樣性；2.永續利用其組成；3.公平合理分享由遺傳資源所產生的效益。為此，許多亞洲國家如中國大陸、日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與新加坡等紛紛成立「國家生物多樣性中心」，以加強生物多樣性的國際合作。世界各學術組織也配合國際上對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需求，在1990至1991年間，由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IUBS）、國際環境科學委員會（SCOPE）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發起一項「生物多樣性方案」(IUBS/SCOPE/UNESCO Programme on Biodiversity)，其主要目的是增進對生物多樣性在物種、群聚、生態系和地景層次上的功能認識，以便加強對它們進行管理的科學基礎。

美國國家科學院與史密斯森研究院於1986年主辦「生物多樣性國家論壇」，多位著名的生物學家共同聲明：「物種滅絕危機對人類文明造成的威脅僅次於核戰」。美國科學基金會為了加強生物多樣性研究，另於「生物多樣性國家論壇」研討會之後，設立了「保育生物學和復育生態學」學門研究。1993年，美國政府改組其舊有許多環境與生物相關機構，成立「生物調查局」，當年生物多樣性研究經費多達一億七千萬美元，邀請了850位研究人員與學者廣泛地調查美國境內的各種生物，並結合生物科技，以期尋找人類的新食物與藥物。

到了1996年，另外三個國際科學組織：國際科學聯合總會(ICSU)、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全球變遷與陸域生態系(IGBP/GCTE)、微生物協會國際聯盟(IUMS)也分別加入，計劃的名稱改為：生物多樣性科學計劃(DIVERSITAS)，為生物多樣性科學提供一個發展的方向，其內容分為：主計劃(生物多樣性的起源、保育和喪失、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系功能、生物多樣性的清查、分類和相互關係、生物多樣性的評估和監測、保育、復育和永續利用)和跨學科計劃(生物多樣性的人文方面，土壤和沉積物的生物多樣性、海洋生物多樣性、微生物多樣性)。該計劃將持續10年，其中監測活動還要延續更長時間。1999年，世界上1500位以上的專家組成了「全球生物多樣性評估小組」，以查明未來生物多樣性研究目標及知識的鴻溝。而DIVERSITAS又在2001年推出“生物多樣性觀察年”(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 Observation Year, IBOY)，足見生物多樣性保育與研究，已成為20世紀末及21世紀的人類重大議題。

近二十年來，保育專業學會、基金會、《公約》及國際保育計劃的發展，學界風起雲湧般的開始投入「生物多樣性」研究，保育生物學或生物多樣性科學已成為一新興科學領域，針對1.對特殊物種的個體生態學和族群生存力的分析；2.以生物群聚、生態系統、景觀和區域為保育工作關注的焦點；3.將保育和永續利用相結合近年來，各國政府及保育組織積極開展了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利用的研究等，積極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利用之研究。

而在生物多樣性的調查，各國都面臨相當大的困境，迄今為止，系統學家已經描述的物種只有170萬種，但有待發現和描述的生物仍有一千萬到一億種之多，換言之，世界上80%以上的物種不知其名，更遑論其它生物學知識，在缺乏系統學家所提供的基本生物學知識前，物種的價值是難以發揮的。因此，世界系統學界於1994年，針對生物多樣性面臨的危機，提出“2000年系統學議程：制定生物圈計劃”。該議程確定了三項彼此關聯的研究任務：1.全球生物多樣性的發現、描述和編目；2.分析所獲得的信息，並將其融合於一個能呈現生命史的分類系統；3.將信息整理成為一種有效、可查詢的形式，以滿足科學和社會的需求。

1998年5月召開的“生物多樣性締約國大會第四次會議，便呼籲各國應參與全球分類學行動。2000年系統學議程係從分類單元著手提出了全球生物多樣性的一個前景展望，對保護和利用生物多樣性的計劃，如生態學界提出的永續性生物圈計劃來說，2000年系統學議程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台灣生物多樣性推動現況

台灣在保育工作上的起步較晚。1983年農委會下增設的保育科，是第一個主管全國保育與研究工作的政府機構。1984年起，台灣的國家公園陸續成立，至今已有六個，各國家公園皆曾委託學者對域內生物資源做過短期的普查。十餘年間，農委會與國家公園曾支持多種保育類動物的基本生物學與復育工作。1992年省政府成立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由其負責逐縣調查台灣各地的物種與分布。這是對台灣生物多樣性首度有系統的調查，但由於人力有限，完成一次全省的普查約需十五年；換言之，這對生物多樣性的登錄皆嫌不及，惶論對資源的保育與經營管理。

台灣保育工作的重點與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重點有很大的差距。台灣仍以瀕危或明星物種為主，對物種生活史的調查與研究，則集中在高等動物、植物及農業昆蟲等，對其他類群所知有限，至於生態系及基因多樣性保育與調查研究工作更嫌不足，而保護區的經營管理是以生物為主，幾無社會學、法律、經濟學人士參與，

且都是各自進行，缺乏跨領域與整合性。過去二十年來的世界保育經驗指出，傳統上各自為政、局部性的保育與研究工作已無法解決當今生物多樣性保育所面臨的困境。因此，推展整合性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是常務之急。

為了推動台灣的生物多樣性保育，行政院於1997年8月23日進一步將「行政院全球環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擴編成立「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以加強推動保護地球環境、保育自然生態、合理利用資源、參與國際環境保護相關事務，俾追求永續發展；本階段並初步完成8個工作分組。其後又依時勢所需，於民國八十八年由行政院副院長召集完成改組，擴編成為11個工作分組；直至2001年再增設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及永續國土發展工作分組；嗣於2002年6月經行政院重新檢討後，將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重新改組合併，設置了八個工作分組，而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即為其中一個工作分組，由農委會擔任召集單位。

行政院對於生物多樣性工作，早在1996年12月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第七次會議，指示於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永續會）下農委會召集之「生態保育與永續農業工作分組」負責推動，並委請農委會早日完成台灣地區生物多樣性策略與行動方案（簡稱國家報告）。農委會於2000年2月13日完成「台灣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並於3月31日與中華民國世界瀕危物種保育協會推動召開「邁向廿一世紀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育國際研討會」中，正式向國際間提出「中華民國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為達成台灣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保育目標，該報告內容於生物多樣性的具體行動方案第三章第三節中指出，將成立「國家生物多樣性工作跨部會推動委員會」，負責國家報告、生物多樣性基金與中心之規劃、訂定生物多樣性工作優先順序等事宜，亦即規劃設置國家層級的「生物多樣性中心」，而為因應聯合國通過「生物安全議定書」對經生物技術改造的物種在國際間越境轉移、安全處理等規範，將規劃成立跨部會「生物安全推動小組」，並研提「生物安全推動工作方案」，透過修訂法規、建立監督系統及資料庫，因應未來該議定書生效後，對我國農業、生物科技發展、國家貿易所產生的衝擊。

然而2000年5月間，永續會開會審查，並未通過國家報告，迄今雖國家報告仍未通過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未通過，有關生物多樣性公約中所宣示生物多樣性保育原則，以基本法之方式立法化以利後續相關法令修正、組織及中央應扮演角色但在學者不斷鼓吹生物多樣性之保育與永續利用之重要性，為提升推動「國家報告」之行政效率，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於2000年底成立「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簡稱工作分組），工作分組召集人為蔡清彥政務委員，顯示政府高層對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的重視。2001年8月15日行政院核定通過「工作分組」所提「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該方案2年來經過各部會、各領域之專家學者、永續會「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的協商討論完成，並開始實施推動。該方案於2001年8月15日經行政院院會通過，針對生物多樣性之國家機制未整合、管理架構鬆散、研究與資訊未有效整合、教育及民眾參與不足以及工作連結薄弱等所面臨的現況課題，進行生物多樣性推動工作，已向生物多樣性工作邁向一大步。再者，方案為能有效落實，乃要求「各部會編列推動生物多樣性工作之經費與編撰生物多樣性計畫」。而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及各管理處為最重要的就地保育單位，理應制定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策略，以符合行政院之要求與《公約》之規定。

從「生物多樣性公約」簽署至今十年間，台灣在生物多樣性工作之推動，多藉由行政院做出政策宣示之方式來作為相關法規或政策之制訂與執行，並沒有一部類似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架構性立法將重要的保育原則以及組織面的規範列出。雖說所涉及亟待訂定或條整之法律、組織權限重疊或權限不清以及資源與人力進行調整等問題，不是一蹴可及之任務；但究其因，恐怕主要是缺乏高層跨部會的國家生物多樣性指導委員會與政治上有影響力的人「領導規劃」，致使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推動滯礙難行；再加上永續會之「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將生物多樣性工作交由農委會辦理，因層級較低，造成政府相關單位大多僅指派科員出席，且由相關單位依原預算科目編列經費執行，在法規、組織及人力經費所面臨各項窘境下，政府執行面與民眾重視面明顯低落，如是出爐之國家報告及行政院所通過之「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能否落實，是各界普遍的疑慮。對於台灣生物多樣

性工作處在規劃階段，該如何具體落實，已迫在眉睫，而對於法律的規定落後國際間及科技上的現況及在這期間所損失或遺失的生物多樣性資源，著實令人堪憂。

未來工作推動方向

台灣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育規劃時，成效不彰的原因便在於缺乏強而有力的領導團隊，由國際與我國過去的經驗上看，當初以農委會為推動國家報告規劃核心的政策就不甚恰當。因此寄望新政府能儘速成立「國家生物多樣性跨部會推動委員會」，廣泛地舉辦研討會，普及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育知識，並要求各部會積極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育規劃，我國的保育才可能出現新局面。

生物多樣性為人類生存與福祉的基礎，它提供人類民生必需之物資、藥物和工業原料，同時也是農林漁牧品種改良的基因庫，並提供人類穩定水文、調節氣候、促進養分循環以及維持物種演化等重要的服務功能。此外，生物多樣性在育樂、美學、科學、教育、社會文化、精神與歷史各方面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傳統物種保育工作以保育瀕危物種為主，而生物多樣性工作則以所有物種為保育對象，並特別重視棲息地之復育、保持與物種永續利用（表一）。所以，環顧世界各國推動生物多樣性強調全面、整體性與永續利用，並致力於生物技術開發、政府機制協調整合與全民參與、資訊共享以及國際合作之時，台灣生物多樣性工作之未來，應以：1. 單位領導人之積極參與；2. 宣導教育之廣泛推廣；3. 經費支持；4. 加強研究；5. 社區保育；6. 永續利用生物資源等六大發展目標發展，以達成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之目的，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

表一、傳統物種保育工作與生物多樣性工作之區別（林曜松，1998）

	傳統物種保育工作	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
保育目的與重點	物種及保護區保護為主	重視生態系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基因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強調全面、整體與永續性（時間、空間、內涵的擴大）
利用方面	限制利用	永續利用
參與人士	保育科、保育人士	涉及影響、利用、保護、買賣生物多樣性之政府、民間、企業等單位（例如從事農、林、漁、牧相關人士，並強調非生氣專長人一，如法規，經濟、外交等方面）
參與官員位階	中層為主（處、署等）	各階官員參與 各國最高首長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
生物技術	未強調	用生物技術開發新藥物、食物、防污染新材料等 管制生物技術安全
利益	未強調	公平合理分享利益
保護區內之原住民	限制	重視原住民傳統利用資源的智慧，人與環境共存
國際性	參與較少	國際合作頻頻、分享知識與經驗，具軟性約束
受破壞地區	閒置	保育生物、環境工程、遺傳工程指導下恢復或重建自然環境
資訊	較少流通	主張資訊共享，並促進流通

參考文獻

全球多樣性保育策略，1993，世界資源研究所，國際自然與自然保育聯盟、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中國科學院生物多樣性委員會譯，中國標準出版社出版。

台灣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草案），2000年2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編印，共90頁。

林曜松，1998，生物多樣性保育，社教雜誌245期，10-13頁。

林曜松，2001，生物多樣性保育與國內保育改革，社教雜誌274期，4-6頁。

Dobson, A.P., 1996, Conservation and Biodiversity,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264pp.

第十四章

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的互動與對話—

原住民族傳統狩獵

盧道杰、吳雯菁

一、前言：

前面章節談及有社區參與、在地知識與共有財產學理基礎與願景的社區取徑的保育思維，也談到原住民族的傳統生態知識為核心的文化多樣性，可以在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工作上扮演積極的角色，也以部落地圖為例審視在地知識的收集與復振的一些問題。本章節延續前面兩章的論點，而以現前頗受各界矚目的原住民族傳統狩獵為例，進一步討論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接連會遇到的一些議題。

原住民族傳統狩獵的議題之所以在這陣子受到大眾的關注，主要是 2004 年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在丹大地區進行的「丹大地區野生動物狩獵規範草案研擬及試辦計畫」一案¹，由於國內雖然禁獵已有相當的時日，盜獵對野生動物的威脅卻未曾停歇，該計畫的施行引起媒體相當的注意，也因為該計畫涉及原住民族的狩獵議題，在保育與族群的雙重敏感與矛盾下，引發不同意見人士的激烈論辯²。本章不是要去分析丹大狩獵試驗計畫，也不是要去評論誰的主張的對與錯，而是希望藉原住民族狩獵的實例，深入探尋主張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文化多樣性保育和輔相成共存共榮的新興論述，其以在地社區（部落）人與其周遭環境資源的關係基礎，從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的面向出發，統籌考量生物多樣性保育、族群文化、部落發展、乃至鄉村政策的課題，以凸顯生物多樣性議題涉及社會人文面向的生活性與複雜性。

本章以「什麼是原住民族狩獵？」的提問切入，先對狩獵的內容作一番解構，以南部山區屏東縣霧台鄉 L 部落為例敘說狩獵人文意涵的演變，再由近年國際保育社會與仟禧年後政府倡言的與原住民族建構伙伴關係著手，討論原住民狩獵與野生動物保育的可能連結，最後回顧整理由原住民族狩獵議題所揭櫫的，對生物多樣性保育議題應有的人文面向的思考。

¹ 該計畫案請參考王穎、陳美惠（2005）。

² 相關各方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丹大狩獵的爭論，可參考與媒體對抗網站討論區中原住民族的原住民與狩獵專題（<http://www.anti-media.org/phpBB/portal.php>），或環境資訊協會網站環境資訊中心的狩獵與保育專題（<http://green.ngo.org.tw/hunt/>）。

二、原住民族部落社會的演進與狩獵

要談什麼是原住民族狩獵？首先就必須對狩獵這名詞加以定義。狩獵顧名思義是人類一種徒手或藉助工具，以捕捉鳥獸獲取動物蛋白質與相關皮毛等動物產製品的行為，也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生活或生產的形態³。在台灣如果以從事狩獵行為人的族群來作區分，可以約略分為非原住民族的狩獵與原住民族的狩獵。由於台灣現居的非原住民族在四、五百年前遷入時，早已以定居農耕為主要生活生計生產的方式。其狩獵的行為除休閒娛樂外，多純屬商業性質，較少所謂人地關係的連結。因此，本文將其排除在外，而聚焦於原住民族的狩獵。若從行為與過程進一步分析狩獵的內容，我把狩獵細分成：獵人、獵具、獵季、獵區、獵物等元素。每一項元素都還可以因為時空、族群不同而有不同的內涵，而由所屬族群文化的社會機制所串連控制。在部落裡，誰可以成為獵人？怎樣成為獵人？誰或怎樣的程序來認定獵人的身份？獵人應遵守哪些規範？規範是誰訂的？如何修改調整？誰來執行？這個「獵人」及其所奉行的「行為規範」即是狩獵所指涉的社會制度的核心，也是串連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族或在地社群生活實作與生產行為的關鍵。⁴

考古人類學者推估：台灣現存屬南島民族的原住民族大概是在六千年前出現在台灣，島內的遷徙則可能晚至兩、三百年前才開始，而其分佈在最近的一百年並沒有大移動（李壬癸 1997）。汪明輝（2003）討論原住民族與外來統治政權的關係，將其分為四個階段，其中 1624 年以前屬原始自治時期，1624-1930 年屬相對自治時期。以此推論，也就是說，台灣的原住民族從六千年前到日治時代，基本上都是在所謂部落社會的型態下生活。在這個時期，原住民族的社會係以部落為基本單元，深深倚賴著周遭的自然資源，生活多以農耕為主，漁獵為輔，部落族人有著泛靈信仰，部落內部自有其社會制度與組織在運作。在這段時期的部落社會裡，狩獵與其相關的社會機制等行為規範就是生活的一部份，其屬以經驗法則累積行之久年的風俗慣習，外加一些超自然的信仰，以嚇阻不當的行為或避免災害的產生。由於部落與最近 400 年來在平原地區逐步開墾發展的漢人移民社會有地理上的隔離，相對獨立自主生活在深山地區，長久以來其與賴以維生的資源環境發展出緊密的互動關係，累積建構了許多生活的知識與技術，配合著部落共有與私有的社會制度與組織，因應著自然環境的變化而符碼化於祭典、儀式、禁忌與慣俗中。

自日治時期開始，日治政府採取林野國有政策，奠定國家政府在森林土地與資源經營管理上的主導與掌控的地位（李文良 1996、1997）。第二次世界大戰

³ 張嘉文（1988）主編的「辭海」對狩獵的解釋：用獵具或鷹犬來捕捉鳥獸（p561）。吳悉真（1969）翻譯與主編的牛津高級英英英漢雙解辭典對 hunt 的註解為：go after (wild animals) for food or sport（p523）。

⁴ 本段內容部分摘自盧道杰（2004）。

後，國民政府來台，全面廢除日治時期的頭目制度與理蕃區域，建制鄉里村落的行政體制與實施地方自治，並開始以漢化與資本主義化為取向的原住民族政策（陳宗韓 1994）。1966 年政府公佈施行「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准許原住民取得土地所有權，開放合法公私營企業或個人使用原住民保留地，以“山地現代化”為標的。然而，1960-1970 年代國家當時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進程所製造的就業市場，吸引了大批的原住民湧向都市平原，山地企業開發凌駕農業發展的優勢，使得山地開發政策卻反而強化了原住民離開部落社會的力量。此時，原住民族部落的經濟模式已經由原本的狩獵、採集、漁撈轉變成農業發展，普遍使用貨幣，融入主流的資本主義市場（陳宗韓 1994）。

1950 年代前後西方基督教信仰陸續進入原住民族地區，在各地建立教會，時至今日，在許多的原住民族部落，基督信仰幾乎徹底取代了傳統的超自然信仰，重新形塑了原住民族的世界觀與生活規範（鍾思錦 2000，盧道杰 2003a）。近年，行政體制與民意代表逐漸替換部落的傳統社會制度與組織，既有的農耕與漁獵無法維持生計，大量族人外流，傳統的超自然信仰又被基督信仰所取代，自然資源早已劃歸國家經營管理，1970 年代中期後政府又宣布全面禁獵，這些種種都直接或間接切斷了原住民族部落與其周遭資源環境間的連動。1990 年代以來，早期活躍山林的部落中堅逐漸退隱，中壯年以下的年輕人，不僅多自幼即離家到平地或城市接受現代教育，成人後也囿於都市型態的職場生計，不再擁有走風獵人的能力，部落與山林及自然環境的文化與生活的傳承逐次凋零，族人原有的山林本能也漸成為傳說軼聞（盧道杰 2003a）。近年國內企業為降低成本與提高競爭力紛紛引進外勞，嚴重排擠原以勞動為主的原住民的就業機會，部分人力回流部落，重拾靠山吃山的生活。也是自 1990 年代後期開始，政府為因應參加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即一般所稱的 WTO）在鄉間與偏遠地區鼓勵產業轉型發展觀光服務業，許多原住民地區紛紛投入，一時間民宿、風味餐、傳統歌舞、異族文化的生態旅遊產業型態成為原住民部落發展的指標與願景。不料從 921 大地震後，台灣氣候迥異，幾次的風災重創山區，甚至是影響大都會區的運作機能。為此政府擬具封山策略，準備還山林給大自然。於是，原住民部落在現今資本主義市場與生態保育的夾擊下，進一步地被邊緣化，其與資源環境間的關係也面臨完全斷絕的困境（盧道杰 2003b）。

三、原住民族狩獵意涵的演變⁵

把場域聚焦到南台灣山區的西魯凱族的 L 部落，在魯凱族特有的頭目（貴族）與平民的階層社會裡，獵場的擁有權屬於頭目（貴族）家族，獵人需透過貢賦的賦予取得狩獵權力，而獵物更需要跟部落所有族人分享。狩獵在傳統部落社會裡，不僅是部落動物蛋白質的來源，是男子取得地位與榮耀的管道，其行為也

⁵ 本節部分內容摘錄自吳雯菁（2004）與 Wu（2005）。

是跟信仰、祭儀結合的社會文化表現。凡獵得五至六頭公山豬的獵人，在公開與族人分享後可公開獲頒百合花頭飾，成為部落的英雄。百合花頭飾所象徵的榮耀與分享是部落核心的規範與精神所在。男子從小被期盼成為獵人，青少年期即隨著父兄在山林中學習，熟悉地形與各種原野的技能，知曉各種的祭儀、占卜與禁忌。魯凱人認為能打到獵物不純然是技能或運氣，更重要的是祭儀、占卜等的能力，也就是如何與神靈溝通的能力。而學習狩獵的過程，包括共同出獵、恪守狩獵規則、集體維護獵場與獵徑、分享獵物等，其實有如男子由家人成為部落的人的社會化過程，也是部落社會對男性角色扮演的期待。另外，狩獵的行為與獵場的使用及開拓，隱約也有捍衛疆土與部落間領域競爭互動的意涵。有一點十分重要的是，狩獵並不是傳統部落社會的主要維生方式，不僅十分耗費時間與體力，更會影響農耕收穫。所以在個人資質、家庭狀況等許多因子的影響下，傳統部落社會裡可配戴百合花頭飾者，並不多見。然早期追求百合花頭飾的榮耀幾乎是所有男人的願望與一生努力的目標，由此可知在傳統部落社會裡狩獵的意涵，是遠超越其所狩得的動物蛋白質的價值，而在社會網絡與組織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隨著大環境的改變，族人的生活方式有了巨大的變化，許多族人下山到城市裡工作棲身，頭目與長老不再把持部落的公共論壇，基督信仰更瓦解了傳統的泛靈信仰，加上法律上的禁獵，狩獵在 L 部落族人現今的生活中，逐漸脫離青年人的生活經驗，年輕人不再為追求榮耀而狩獵，獵物也不再與全部落的族人分享，反而是兼職、遊憩休閒的性質居多。另一方面，狩獵卻在逐步抬頭的原住民族運動中，被許多原住民族視為傳統文化的象徵圖騰之一。許多原住民族的朋友認為狩獵是其族群（部族）的自然權利之一，其內涵與任何作為皆該由原住民族自己決定（陳士章 2004）。

四、傳統原住民的狩獵就是在地自然資源經營管理體制

當我們認知游牧漁獵是原住民族傳統的生活方式之一時，以現今的自然資源經營管理學理來看，部分學者主張可以將原住民族的傳統狩獵視為在地的自然資源經營管理體制（Dei 1993, Williams & Baines 1993, Berkes *et al* 2000），其以狩獵者及其相關的社會機制為核心。就狩獵者（獵人）而言，為了進行狩獵的行為，行為者本身需要擁有一些條件，包括：健康的體魄，對山林環境與狩獵對象的基本知識，因應突發氣候變化的能力等，才能在環境瞬息萬變，地形崎嶇難行的山林中維護己身的安全，找到獵物，並能順利狩獵得手。這代表狩獵的行為似乎並非每個人都有能力為之，除個人身體條件外，知識與經驗的傳承與累積也是必要的條件。另外，早期狩獵行為跟個人與部落族群的生活生計（生業）有關，係一種動物性蛋白質的採集與分配。部落社會常透過信仰禁忌、獵區、漁場的分配與承襲、及貢賦制度的運作等社會機制，來建置部落對山林空間與資源的控

制。這綜合以能力、知識、身份、社會分配與規範、及信仰與宇宙觀元素，呈現於生活實作中的即是所謂的在地野生動（植）物資源的經營管理體制（Berkes & Folke 1998，Berkes 1999，Berkes *et al* 2000，Kothari 2003）。

然由於傳統已融入生活與文化的狩獵體制在外來國家與市場體制的侵蝕下，已逐步崩解消逝，不僅部落裡明瞭傳統規範的獵人只剩少數碩果僅存的耆老，最重要的是有體能有意願留在部落的年輕人，在部落找不到可以期盼與可以倚賴的未來。在今天當狩獵逐步退出部落的生活與社會文化，當狩獵逐漸成為一種兌換貨幣的手段，反過來國家機器囿於本身對山野的經營管理能力與執法能力有限，無法有效維護位處偏遠卻蘊含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而萌起與在地自然資源經營管理體制連結之議時（Brandon & Wells 1992，IUCN 1993，McNeely 1994、1998），原住民族的狩獵勢必需要重新回顧整理與論述分析，這其中又特別以部落對其狩獵意涵的再創造與再詮釋（陳思仁等譯 2002），尤需要審慎地考量，以探思其族人本身的意願，及與國家體制的可能連結。

前面章節提及臺灣的自然保育（生物多樣性保育），或更直接地說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自來即採行人與自然隔離的策略，力行政府與菁英集權的管理取徑，嚴格限制在地社群（尤其是原住民族）的利用，甚至將其視為最大威脅。裴家騏（2001）認為這樣的政策不僅不見得有成效，而且因為 1974 年的狩獵法與 1990 年的野生動物保育法的全面禁止狩獵（包括原住民族傳統狩獵），國內原住民族飽受「野生動物殺手」惡名的指摘，使得政府與保育界，尤其是前者跟原住民間呈現長期的緊張關係（也請參考台邦·撒沙勒 2004）。1990 年代中期，國內隨著國際保育社會對原住民族與自然關係認知的改變，開始在自然生態學界與原住民運動中出現原住民具有「生態智慧」，可以被作為「山林守護神」的論述（孫銘燐 2001，陳律伶 2004，台邦·撒沙勒 2004）。有學者主張若能連結當地的傳統狩獵制度與科學性的野生動物監測機制，當可發展出一套由政府與居民共管的自然資源管理計畫（裴家騏、羅方明 1996，羅方明、裴家騏 1997，裴家騏 2001、2003）。

五、原住民族狩獵與野生動物資源保育

盧道杰等（2005）以在地參與、在地知識與共有財等社區保育的幾個學理基礎部落，提出一個整合原住民族狩獵、以部落（社區）為基礎的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的架構。其以前幾個章節提及的共有資源管理面向來論，認為要能建構傳統狩獵文化與野生動植物資源經營管理的連結，關鍵在於能否形成有效的控制機制，而共有財產化野生動植物資源則是思考的一種手段（Ostrom 1990，Hanna *et al* 1996，Ostrom *et al* 1999）。因此，防止獵場經營的個人化或私有化似

乎是一個體制討論的重點。部落裡熟悉野生動物資源、獵場地形、環境生態變動，經常奔走於山野中，甚至依賴其為生的獵人可以是、也應該是在地共有野生動物資源的經營管理者。但獵人應是在地共有野生動植物資源的主要元素，而非全部。曾在傳統社會組織上扮演重要角色的部落，在體制連結上的角色應該被突顯出來，以作為跟國家政府直接對應的主體與窗口，也是社會體制與文化傳承運作的平台。以現代社會裡技師證照制度為例，如果搭配傳統的社會機制，在部落裡建立有一套獵人的認證制度（包括成為獵人應具備的條件、篩選、培訓、考試、執業與終身學習等），其可以是部落與獵人間的連結，獵人藉之取得部落的授權與正當性，成為掌管傳統生態知識與技術及實際執行工作者，而為在地自然資源經營管理體制的運作中心。部落則在分群分工上發揮，推動植物採集、獵物處理、儀式典章、政治決策與衝突解決等事宜，並形塑管制規則與執行獎懲。傳統上以社會性的懲罰為主的架構，或可部分保留，並適度與現代國家法規制度接軌，以為公權力介入的管道。

當獵人重現於部落社區之後，接下來就得思考怎麼讓「獵人」這個身份，或者工作，或者行業得以在現今的部落社區裡生存生活下來。過去獵人在部落社會裡享有英雄、尊貴與領袖的地位，也是財富的象徵。今天要重建狩獵與部落社會的連結，就必須再造獵人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空間。也許適度開放狩獵來塑造獵人生存的空間與合法性，兼授予傳統社會文化傳承的角色，再以旅遊導覽、獵物的有限販售、加上巡護山林的工作機會進一步提供經濟上的誘因，可以是一個嘗試的起點。在部落社區政治上，當狩獵再度活化，成為部落社區的一項生業，身為狩獵體制運作中心的獵人自然擁有一定的影響力。而在與國家機器連結接軌的議題上，以組織運作取得部落社區在經營管理體制上的正當性，可創造部落社區社會機制在現代社會裡的空間；野生動物資源的監測與回饋則可證明經營管理的效能，兩者是說服主流社會原住民族狩獵可以是有效經營管理野生動物資源的方式之一的最佳利器。

然而，在地參與的面向上的一個嚴肅的議題是，原住民參與的意願與本身對其狩獵文化乃至（舊）部落發展的想法。以前節在地參與著重參與對在地社群（區）的意義這個面向來論，參與這項工作的原住民部落朋友可能必須先面對自己，說服自己，說服部落，到底狩獵對其個人、部落、乃至族群能做什麼？狩獵是凝聚部落共識的必須？回復與再造傳統文化的關鍵嗎？原住民族（我們部落）在現代的環境社會裡要什麼樣的傳統文化？狩獵真可以提供部落發展的誘因？其程度與範疇為何呢？

國內在1990年公告施行的野生動物保育法取代狩獵法後，雖列有利用區與證照制度等相關條文，但由於未曾有任何經公告劃設的利用區，形同全面禁獵的延續。相關原住民傳統文化部分，則受到野生動物保育法的尊重，2004年修法

通過後，法規賦予相關區域、季節、物種、可狩獵數量等的規範架構已較前成熟許多。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公告施行進一步開放原住民族在原住民族地區獵捕野生動物的自用空間（第19條）。當原住民族個人獵捕野生動物在特定區域的傳統使用或自用的行為獲得法律的保障時，狩獵的內部社會機制（集體規範）在野生動物資源的保育與經營管理上益形重要。而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的狩獵行為是不是可以產生其他如經濟、社會、政治的附加效益，受到特別的關注。在主流社會普遍對山區國土保安、生態保育的期盼下，政府甚至擬具了相關的法規與行動政策⁶，發展狩獵觀光旅遊產業，帶動部落生態休閒產業或者是可行的方式。

六、狩獵、旅遊與野生動物資源保育：以霧台鄉西魯凱部落為例⁷

就前節所提出的以在地原住民族部落與獵人爲主的在地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體制架構，本節以屏東縣霧台鄉的西魯凱族部落爲個案對象試作討論：

（一）魯凱族簡介

魯凱族分佈於臺灣中央山脈南段東西兩側的屏東縣、高雄縣及台東縣，四周有排灣族、卑南族與布農族的勢力環伺，長期以來各有消長，族群關係複雜。其中魯凱族與排灣族不僅毗鄰分佈、在體質、社會組織、百合花與百步蛇信仰方面極爲接近，但在語言、祭典、埋葬方式與繼承制度上仍有顯著差異，日據時代人類學者乃將其分別獨立（王長華 1984，許木柱等 1995，文上瑜 2002）。目前魯凱族人口總數約有一萬餘人⁸，並依地域、語言與文化的不同，大致可分爲下三社群（濁口群）、西魯凱群（魯凱本群或隘寮群）與東魯凱群（大南群）三群（許木柱等 1995）。其中西魯凱群（魯凱本群或隘寮群）分佈北起大母山、南抵隘寮南溪谷，傳統獵場範圍往東越過霧頭山至台東縣境。西魯凱群居住分佈的行政區域主要屬於屏東縣霧台鄉，包括位於隘寮北流域的阿禮、吉露、霧台、大武與佳暮等六個村，以及位於隘寮南流域的好茶村。另外在瑪家鄉三和南村的美園社區、三地門鄉的青葉村、德文村的相助巷與三地門村等地，也都有日治時期從霧台鄉集團移住或光復後陸續遷出的魯凱族人。

魯凱族部落傳統上有嚴謹的貴族（或譯爲頭目）與平民社會階層體系：每

⁶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行政院院會於 2005 年 1 月 19 日通過國土復育條例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草案）及國土復育條例（草案）（請參照行政院經建會網站：

http://www.cepd.gov.tw/business/business_sec3.jsp?businessID=1342&parentLinkID=7&linkid=99）

⁷ 本節內容大部採自盧道杰等（2005）。

⁸ 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2004 年 9 月的統計，魯凱族人口有 11,168 人，其中已辦理族別登記的有 7,587 人。

位部落族人的社會身份地位係依其血緣基礎承襲，其中貴族階層又以是否當家（本家）分為大頭目與小頭目（許功明 1987，許木柱等 1995，巴神一 2003，巴清雄 2004）。在傳統的魯凱部落裡，每個階層皆有其自己及與其他階層間應負的權利義務關係，所有族人的社交互動與生活都在各自所屬的位階上進行（巴神一 2003）。魯凱族貴族階層擁有土地領主權（或稱租稅權）與象徵特權兩項（衛惠林 1963，許功明 1987，喬宗恣 1990）。在傳統的魯凱部落中，除少數公用財產如道路（kadalang）、社內集會所（talupaurupoang）、敵首棚（ada'adakang）等等屬於部落全體所公有外，一切部落境內的自然財產，如山林（kasikase）、河流（dakara）、獵場（talupang）、土地（kadang）、家屋基地（pangipangisane），以及自然地上的一切附屬物、甚至山上石頭、樹木野草野花、山林中之鳥獸、溪流中之魚貝，原則上均屬頭目家所有，平民階層如要使用則需向頭目家族繳交不同名目的租賦（sualupu）（李汝和 1972，王長華 1984，許功明 1987，喬宗恣 1990，巴神一 2003）。貴族階層一方面透過這樣的租稅貢賦制度具體地兌現土地領主權，另一方面亦藉由名制與裝飾上特有的徵號顯示其抽象的身份地位。租稅與特權讓予制度中，透過全體部落族人在儀式過程的共同參與，使平民分享生產所得、貴族分享財富與特權，形成了物質與非物質的流動與交換，是一種再分配（redistribution）的機制（許功明 1987）。這樣的交換與再分配機制，其實也「調和」了貴族與平民階層的緊張關係（巴清雄等 2004）。巴清雄等（2004）認為，象徵特權（特別是裝飾權）其實是榮耀（lrigu）的表徵，儘管個人的階層歸屬是天生而無關於能力的，但社會地位的高低評價，卻可透過榮耀的取得提升。許功明（1987）則認為榮耀為部落規範的核心，其不僅消弭了貴族與平民可能的緊張關係，也進一步串連了自家與他家、個人與部落、本部落與他部落。

多數的魯凱族部落是由兩個以上的頭目家系為中心，率領其旁系、臣屬與平民等構成的複合體系。部落（tsekal）是魯凱族獨立完整的自治地域單位，主要由一集中聚落、或數個毗鄰聚落聯合組成，內部亦可再分為若干住區單位（pangipangisane）。部落本身不僅是一個地域界線完整分明的單位，亦是一個共同祭祀體，以及結合政治、經濟與軍事的聯合防禦體。當部落有超乎親族關係的公共事務需協調處理時，會由多位部落長老（或稱耆老，marudrane）共同協商決議，並經由各式公眾會議的召開來解決與執行（巴清雄等 2004）。

魯凱族的傳統信仰屬泛靈信仰（animism），意即魯凱人相信所有自然界的物體或現象都存有精靈在內（許木柱等 1995，謝繼昌 1995）。動物也有靈魂，所以看到或夢到不同的動物物種或行為就有不同的占卜意涵，其與超自然的神靈分類與祭祀儀式及禁忌（li si）在初民生活與風俗慣習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林美容與王長華 1985⁹，許木柱等 1995，謝繼昌 1995，巴神一 2003）。

西魯凱族分佈的自然環境，土力不十分肥沃，年平均雨量僅一千五百公釐

⁹ 林美容與王長華（1985）所編著的霧台鄉誌，當年於鄉公所座談發表時，有許多與會的在地耆老及鄉公所人士都對內容有不同的意見，因此至今未正式刊行發表。

左右，且主要集中在夏季，雨季時容易發生土壤沖蝕，僅適於耐旱耐瘠的作物。面臨如此的生態環境，魯凱族的傳統生計係以山田燒墾式的農業為主，而以狩獵、捕魚、採集與有限的牲畜飼養為輔（許木柱等 1995）。芋、薯是魯凱人的主食，粟（小米）則多在儀式性的場合中食用，為具有社會、宗教意義的作物（許木柱等 1995）。

魯凱族的農地（kadunungan）範圍廣及部落內外，一般而言屬於頭目家族所有，但也有一說墾殖者投注的開墾勞力等後天因素多，原耕墾家族在使用權上比頭目的所有權較受到族人的尊重（許木柱等 1995）。傳統獵場與漁區則皆為貴族所有，在下三社群的多納社，概念上大河卻是部落共有的，頭目家族不能單獨決定大河水域權力的轉讓與餽贈；而小河則分屬十數個頭目與平民家庭，擁有河段的家庭可以限制他人的捕魚活動並收取魚獲作為租稅，並可以轉讓與餽贈，呈現有私有財產的傾向（王長華 1984）。

在魯凱族的傳統生計生活中，農作是最重要的生計來源，主要以家戶為單位進行。但由於魯凱族的男性常需從事狩獵活動，因此農耕的勞動力便常仰賴女性，但墾殖等較耗體能的工作仍以男性為主；而漁撈則是不論性別與年齡都可從事的活動（戴永禎 2000）¹⁰。

（二）西魯凱的狩獵

以屏東縣霧台鄉 L 部落的魯凱族（西魯凱群或隘寮群）而言，至少在光復以前，部落族人普遍認知狩獵是男人的天性，從小即耳濡目染，並在適當的年齡開始隨父兄進入山野。狩獵是取得動物蛋白質的方式，更是獲取社會地位的途徑，獵獲五到六隻以上的公山豬即可配戴百合花頭飾是魯凱族獵人身份被部落認定的一項榮譽。獵人們多三兩成群出獵，以獵槍、陷阱為主要的獵具。出獵行前、過程中皆有許多占卜或儀式的規定，如夢占、鳥占等，除是祈求祖靈的庇佑外，也是對獵物的一種崇拜與尊敬。獵區基本上以父傳子為原則，卻也有傳給善獵年紀較輕輩份較低的宗親或親密朋友（獵友）的例子。凡捕獵獵物均需將心臟與右後腿供奉給頭目，頭目再行分配給其他族人。在他人獵區獵捕也需繳交部分所得給擁有者。幾個祖靈聖地（如：大小鬼湖）被列為禁忌不得進入打獵。雲豹、百步蛇與熊鷹則被魯凱族人視為家人，也不能打。

裴家騏（2001）從生態學的視角分析霧台鄉魯凱族的狩獵制度，認為其主要狩獵物種均為繁殖力較高的草食或雜食性動物，對狩獵壓力的承受力較大；季節性的狩獵活動提供野生動物喘息的機會；散佈式的獵區，加上同一狩獵區中的狩

¹⁰ 關於魯凱族的漁撈文化，詳見戴永禎（2000）。

獵地點每隔幾年會調整，分散了狩獵壓力；每一獵區都被不狩獵的區域所包圍，加上對神聖空間的迴避，有禁獵區或保護區功能，提供動物繁殖與生育的環境；獵區的專屬制度加上單一獵人的狩獵能力的限制有壓抑狩獵量的效果；傳統的禁忌與習俗如鳥占等，對狩獵活動有隨機性地降低狩獵的頻率。這些機制理論上能減少連續或密集的狩獵活動，不需要專門的管理人力，依附信仰、社會制度來運行，傳統魯凱的狩獵制度不啻是一適應力強又富彈性且與生活相連結的在地野生動物經營管理體制（Berkes & Folke 1998）。

（三）在地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體制的推演

魯凱族傳統上有嚴謹的社會階層制度，頭目名義上擁有部落所有的獵場，其與長老及貴族在部落事務與空間資源的分配上擁有相當的發言權，而百合花頭飾則是其獨特的獵人榮譽制度。雖然現今霧台鄉各部落傳統社會制度在國家機器、經濟市場與外來宗教的侵蝕下，超自然信仰、禁忌、傳統社會規範皆已不再為族人所奉行，法令的禁獵、人口的外移、加上專業狩獵轉為休閒活動，造成族人逐漸遠離山林，狩獵文化缺乏傳承，個別狩獵能力也大幅消弱。但是在田野工作中，也發現幾個部落（村落），尤其較靠山區，也是西魯凱族部落社會核心的幾個村（部落），皆有族人有意願有熱忱希望能活化狩獵與傳統文化，促進部落發展，創造族人持續生活山林的空間。而在人口外流嚴重的今天，要活化傳統生態知識與狩獵文化，最重要的就是「把人找回來，把人留下來」。這不僅涉及文化事項，更是生活生計的大事，包括就業機會、教育福利、醫療服務等公共系統的建構。

首先以前節所提出在地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體制的關鍵—獵人與部落的連結一事來說，魯凱族特有的百合花頭飾制度是相當好的切入點。在操作上可將目前各部落現存已公開獲頒配戴百合花頭飾的獵人直接認證為「獵人」，尚未被公開授予百合花頭飾但部落周知有從事打獵活動的獵人為「助理獵人」。「獵人」可獨立帶團從事狩獵行為，而因獵槍多是獵人自行製造，為避免刀槍使用產生意外，也因為法規的限制與保險的適用問題，建議僅由「獵人」執行狩獵行為。「助理獵人」則必須隨團或依文化狩獵的條款申請自行獵獲五或六隻公山豬，公開獲頒百合花頭飾後，方能成為可獨立帶團作業的「獵人」。「獵人」為現場作業需要可聘請「助理」隨行，「助理」與「助理獵人」在整個「獵人」養成教育裡，除野外時數外，均需接受教育訓練，以吸收其他相關的知識與技能，如：地理資訊系統與衛星定位系統的使用、判圖、測量方位與收集相關野生動植物資訊、溝通解說、民俗動植物學等。這樣的認證制度結合原有的社會機制與現代山林保育巡護的技能，除能活化文化的傳承，兼顧榮譽表揚外，也能在林務、保育或其他單位有巡護山林機會時，拓展獵人的就業機會。

而在狩獵與觀光旅遊方面，倘觀賞野生動物資源的市場需求日增，或者同

時也會促使獵人主動調降狩獵量，留有市場機制運作的空間也是樁好事。獵人以狩獵、嚮導、解說，加保育巡護，甚至調查研究的角色，再造其在部落立足生活的行業，而獵物後續的處理與後勤支援系統，民宿餐飲的配合，或者可以帶動整個生態產業的起飛。整個計畫的精神在用狩獵帶動觀光旅遊，用嚮導與解說製造文化產業，以獵人制度進行文化傳承，以附加價值平衡狩獵量的需求。當然，這樣的主張並無法產生大肆繁榮的局面，但應可提供部分願意留在山上年輕人的小康生存空間。人一旦願意留下來，部落就會有希望，文化就會有生機，山林間的傳說也就有繼續流傳的機會。

七、原住民族狩獵—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的人文面向思考

本章所提相關屏東縣霧台鄉西魯凱部落以狩獵與觀光旅遊，加上山林巡護來與野生動物資源保育作連結的想法，雖然只是學理上的一些推演，其也顯示本土在地社區與其社會體制於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上扮演積極角色的可能性。誠如台邦·撒沙勒（2004）所言：國內原住民獵人長期背負的生態殺手的罪名是種污名化的現象，是不正義的社會建構的環境殖民主義，是長期以來存於保育社會與原住民族間權力與利益分配不平等的事實，原住民族狩獵在其部落社群裡的社會文化意義與儀式性功能，實不能以二分法簡化之。此也凸顯生物多樣性的理解不能只有生物、生態等較具物質科學取向的面向，還需要重視社會人文的脈絡，特別是在歷史比較久遠的在地社群與原住民族文化裡，要能運用其富涵緊密的人地關連與社會組織及制度，維護生物多樣性，更需要秉持以人權為基礎的多元文化、多元價值的開放性思考。

Berkes（2004）呼籲保育必須跨越社區部落、地方區域、國家聯盟與國際等地理尺度；提供各權益關係者參與的誘因不宜止於經濟面向，需要多面化；在地與原有的知識應受到尊重，並與科技知識融整以發揮最大的功效；國際保育社會應廣納不同文化的觀點重新詮釋保育的意涵。在現今台灣的社會裡，生物多樣性保育呈現著多樣的論述，有以宗教護生為基礎的保育觀點，有以野生動物植物資源永續利用為主的論調，也有再見荒野隔離塵世的主張等，但卻都還比較侷限在本位的執著與生物生態的架構裡。由國際社會的經驗與論辯的進展，從本土個案實證的觀察，國內相關生物多樣性保育的論述與文化多樣性間的連結，尚有許多尚待發掘與加強的空間，尤其政治經濟與社會人文的考量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與尊重。希望本章的陳述除了能在彰顯生物多樣性社會人文面向的思考外，也能在相關概念的推廣與參與式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理念的溝通上，提供一些參考。

六、參考文獻

- 巴神一。2003。魯凱神山風俗誌。潮州高中，屏東。
- 巴清雄。2004。霧台魯凱族植物頭飾之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
- 巴清雄、王嵩山、嚴新富、陳翼漢。2004。從頭飾（bengelrai）談榮耀（lrigu）在魯凱社會的運作—以霧台部落配戴百合花頭飾為例。未發表。
- 文上瑜。2002。魯凱族下山社群的族群與音樂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王長華。1984。魯凱族階層制度及其演變—以多納為例。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穎、陳美惠。2004。丹大地區野生動物狩獵規範草案研擬及試辦計畫報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研究系列第 93-25 號。
- 台邦·撒沙勒。2004。尋找失落的箭矢—部落主義的視野和行動。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台北。
- 吳悉真（主編）。1969。牛津高級英英英漢雙解辭典。東華書局，台北。
- 吳雯菁。2004。傳統生態知識、文化資本、與自然資源管理—從魯凱族 L 部落的狩獵文化變遷談起。發表於「疆界／將屆：2004 年文化研究學生研討會」。2004 年 12 月 18、19 日。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國立交通大學，新竹。
- 李壬癸。1997。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常民文化，台北。
- 李文良。1996。日治初期臺灣林野經營之展開過程--以大嵙崁(桃園大溪)地區為中心。臺灣史研究 3 (1): 144-169。
- 李文良。1997。林野整理事業與東臺灣土地所有權之成立形態(1910-1925)。東臺灣研究 2: 169-195。
- 李汝和（編）。1972。臺灣省通志卷八同胄志魯凱族篇。臺灣省文獻會，南投。
- 汪明輝。2003。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回顧與展望。收錄於「兩岸社會運動分析」。95-135 頁，張茂桂、鄭永年主編。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 林美容、王長華。1985。霧台鄉誌。霧台鄉公所。未出版。
- 孫銘燐。2001。誰的馬告檜木國家公園。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論。
- 張嘉文。1988。辭海。智揚出版社，台北。
- 許木柱、李壬癸、楊翎、王長華、潘英海、詹琪芬。1995。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同胄篇。臺灣省文獻會，南投。
- 許功明。1987。由社會階層看藝術行為與儀式在交換體系中的地位-以好茶村魯凱族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62: 179-203。

- 陳士章。2004。要談狩獵“否”？“請”先尊重原住民族。2005 年 6 月下載自環境資訊中心專題：狩獵與保育。<http://green.ngo.org.tw/hunt/2005/ht05012102.htm>。
- 陳宗韓。1994。戰後台灣原住民政策分析：國家與社會的觀點。國立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論。
- 陳律伶。2004。從馬告國家公園爭議試論對原住民族運動之影響與反省。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碩士論文。
- 陳思仁、徐文路、洪靜宜、潘宗億、蕭道中（譯）。2003。被發明的傳統。台北：貓頭鷹出版社。台北。（原著：Hobsbawm, E.J. and T. Ranger. (Eds.). 1982.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 喬宗恣。1990。魯凱族的經濟變遷與社會階級制度—以霧台鄉大武村為例。國立台灣大學人類所碩士論文。
- 裴家騏。2001。善用傳統知識共管資源。收錄於：「把人找回來：在地參與自然資源管理」。205-201 頁。李秋芳主編。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 裴家騏。2003。再造山林守護神—雙鬼湖野生動物保護芻議。臺灣林業 30(1)：26-33。
- 裴家騏、羅方明。1996。魯凱族的永續狩獵制度。野生動物保育彙報及通訊 4(4)：5-10。
- 衛惠林。1963。魯凱族的親族制度與階級制度。中國民族學報 3：67-83。
- 盧道杰。2003a。財產共有至與在地參與在野生動物資源之運用—以屏東縣霧台鄉好茶部落為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報告。
- 盧道杰。2003b。社區林業與原住民關係之研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委辦研究計畫報告。
- 盧道杰。2004。社區林業在原住民部落之發酵。二十一世紀山林論壇研討會。時報文化基金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04 年 12 月 28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國際會議廳。
- 盧道杰、吳雯菁、裴家騏、台邦、撒砂勒。2005。從社區保育的觀點看原住民的狩獵與野生動物資源的管理。發表於「2005 年社區保育研討會」。2005 年 4 月 29-30 日。花蓮師範學院。
- 戴永禎。2000。魯凱族之漁撈文化。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 15：105-169。
- 謝繼昌。1995。大南魯凱族的神靈觀念。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五十期抽印本。
- 鍾思錦。2000。魯凱族百合花制度之研究。未出版。
- 羅方明、裴家騏。1997。霧台鄉魯凱族的狩獵習性及獵區標定。原住民狩獵傳統與自然資源永續利用研討會。魯凱族自然資源保育基金會。

- Berkes, F. 1999. Sacred Ecology -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Taylor and Francis, U.K.
- Berkes, F. 2004. Rethinking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Conservation Biology* 18(3): 621-630.
- Berkes, F. and C. Folke. (Eds.) 1998. Linking soci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 -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social mechanisms for building resil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 Berkes, F., Colding, J. and C. Folke. 2000.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s adaptive management.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10(5): 1251-1262.
- Brandon, K.E. and M. Wells. 1992. Planning for people and parks: design dilemmas. *World Development* 20 (4): 557-570.
- Dei, G. J. S. 1993. Indigenous African knowledge systems: local traditions of sustainable forestry.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14: 28-41.
- Hanna, S., Folke, C. and K. Maler. (Eds.) 1996. Rights to Nature - Ecolog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of Institutions for the Environment. Island Press, USA.
- IUCN. 1993. Parks and Progress. IUCN, Switzerland.
- Kothari, A. 2003. Community-oriented conservation legislation: Is South Asia getting somewhere? In: *Innovative Governance: Indigenous Peoples, Local Communities and Protected Areas*. pp. 61-83 (Jaireth, H. and D. Smyth Eds.), Ane Books, India.
- McNeely, J. A. (Ed.) 1998. Major Conservation Issues of the 1990s - Results of the World Conservation Congress Workshops, IUCN, Switzerland.
- McNeely, J. A. 1994. Protected areas for the 21st century: Working to provide benefits to society.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3(5): 390-405.
- Ostrom,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 Ostrom, E., Burger, J., Field, C. B., Norgaard, R. B. and D. Policansky. 1999. Revisiting the commons: Local lessons, global changes. *Science* 284:278-282.
- Williams, N. M., and G. Baines. (Eds.) 1993.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Wisdo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entre f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Australian University, Canberra, Australia.
- Wu, W. -C. 2005. What and who is the indigenous hunter? Recogn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hunters in Rukai, Kuichapungan, Taiwan. An article presented in the 11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ociety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Ostersund, Sweden, 15-19 May 2005, European Tourism Research Institute, Mid-Swede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建構社區保育、原住民狩獵與 野生動物經營管理間的連結

Establishment of the Links Among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Indigenous Hunting and Wildlife Management

盧道杰* 吳雯菁** 裴家騏*** 台邦·撒沙勒****

Dau-Jye Lu Wen-Ching Wu K. Jai-Chyi Pei Sasala Taib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articipatory-based strategy has been gradually recognized by the conservation bodies worldwide. A number of cases concerning local involvement in the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were also available in Taiwan. In this paper, we focused on the western Rukai, a branch of Rukai living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in Pingtung County, for a case study to build up the loc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wildlife resources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core principals of the community conserved area and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which wer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local knowledge and common property.

*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助理教授，通訊作者 (e-mail: djlu@ntu.edu.tw)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stry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

Master, School of Forestry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所教授

Professor, Institute of Wildlife Conservation,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博士

Ph. D.,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

Traditionally, Rukai was a hierarchical society in which the tribal people regarded hunting as one kind of livelihood, honor, and the process for a man to integrate into the tribe. Hunting activity was also a complex of local knowledge and belief, and the logo of indigenous culture and politics. Although the traditional Rukai society has been invaded and ruined by the modern State institutions, western religions, and capital market, they still preserve some traditions relevant to hunting in the tribes up to now, and many initiatives keen to re-activate them. We argue that the community could be the management unit and its core part was the hunter, who had local knowledge and ability to work in the mountains and forests. In addition, the lily cornet, a traditional symbol of recognition for outstanding hunters, which is still practiced and respected by the local Rukai, can be adopted as the certificate system for hunters. We sugges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add modern inventory techniques and ec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bility into hunters' training course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ir capac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tribe can link with the Government by several new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tribe council (or meeting) or grassroots associations. This kind of loc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s expected to improve the natural guarding,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tourism industrial, as well as contribute to reshape the social system of common property in the tribe. This may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wildlife management, land conservation and indigenous development in the mountainous Taiwan.

Keyword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common property, community conserved area, indigenous institutions, Rukai.

摘 要

近年來，國際保育社會逐漸重視參與式取徑，國內自然資源經營管理也出現相關的個案與趨勢。本文以社區保育涵蓋的參與、在地知識與共有財產等學理為基礎，納入社區保育區的概念，以屏東縣霧臺鄉魯凱族為對象，架構一個以部落和狩獵為核心的在地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的體制。在魯凱族的傳統階層社會裡，狩獵既是生業、榮耀，是男人部落化的過程，也是在地知識與信仰的綜合體，以及文化與政治的圖騰。雖然在現代國家行政、外來信仰與市場機制的影響下，傳統社會組織逐漸瓦解，但各西魯凱部落仍留存相當的狩獵傳統，也有許多社區組織願意投注文化復振與部落發展。本文主張以部落為治理單元回應參與取徑，而以擁有在地知識與遊走山林能力的獵人為經營管理的重心，藉目前仍受部落族人遵循敬重的百合花頭飾，加上現代山林調查巡護與解說的內容，建立獵人的認證制度。用部落會議或議會或其他社團組織來成就部落與國家體制的鍵結，發揮山林巡護、文化傳承、旅遊產業的作用，重塑部落共有財產的社會制度，以在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國土保育與原住民族發展間，追求多贏的成果。

關鍵字：社區參與、共有財、社區保育區、傳統體制、魯凱

生物多樣性保育與原住民族

長久以來，自然資源的經營管理向為菁英與官僚掌控、中央集權及科學技術為主，具有排除其他相關權益關係者參與決策的傾向。世界各地自然保護區的傳統典範——黃石國家公園就是最好的例子，她不但面積大、國家政府直接介入，園區內也已經沒有永久性的居民 (Hales, 1989; McNeely, 1994; Wright and Mattson, 1996; Holdgate and Phillips, 1999)。然而，由於每個自然資源的保育與管理計畫所面臨的政經架構、民情脈絡與地理環境不同，這種模式未必都能有理想的效益，甚至反導致政府與居民的衝突 (Western and Wright, 1994; IDRC, undated)。於是，國際保育社會從 1950、1960 年代即開始出現一些先驅的試驗 (Borrini-Feyerabend and Tarnowski, 2005)，而在 1980 年代後期與 1990 年代前期，萌現許多對傳統菁英官僚集權的尋思與反省，包括：1. 重新建構人與自然的關係，因為許多考古證據均顯示，現今地球上絕大部分的景觀與人類文明活動的發展息息相關 (Gomez-Pompa and Kaus, 1992; McNeely, 1994; Ghimire and Pimbert, 1997)；而人為因素在許多生態系的運作與生物多樣性的組合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因此，棲地或生物多樣性的保育應積極面對人的因素，釐清其在整體生態作用裡的位置，尋找整合共存的方式 (Miller, 1996; Litke, 1998)。2. 在現實的行政條件下，人力、物力與財力的支援往往不足，中央集權式的經營管理對位於邊陲的保護區，常無法有效地執行 (Feeny *et al.*, 1990; Zazucta, 1995)。3. 最重要的是，保育專家不再視在地（鄰近）社群為破壞者，而將他們（特別是少數族群或原住民族）重新認定為主要權益關係者 (stakeholder) 與關鍵的夥伴，亟欲與他們合作 (Brandon and Wells, 1992; IUCN, 1993; McNeely, 1994; 1998; Brosius *et al.*, 1998)。4. 為避免自然資源（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地區成為生態的孤島，也是呼應前所述對人類因子的重視、政府能力的有限、和要與在地社群建構伙伴關係的期盼，近年國際保育社會倡導跨界的思考，期以連續面與區域的尺度，來規劃與整合更多的部門與資源 (Martinez, 1995; McNeely, 1995; Saunier and Meganck, 1995; Dudley *et al.*, 1999; Sayer, 1999)。

2003 年，世界自然保育聯盟 (IUCN) 在其所舉辦的第五屆世界保護區大會 (the 5th World Park Congress) 中，綜整建塑了新的保護區經營管理典範¹ (Phillips, 2003; Berkes, 2004; Brosius, 2004)，其顯現了有別於傳統典範的特質：具多元社會與經濟的目標、多元的治理型態、鼓勵與在地社群緊密互動、考量多向連結的網絡、營造社區²對保護區的認同與國際的關注、在技術之外增加政治的考量、充分且持續的財源、多元的技術需求和重視在地知識 (Phillips, 2003)。顯然，傳統的菁英集權、科技至上的思維不再是唯一選項，參與的取徑已成為保育的主流趨勢之一，保育科學家與專業人士需發展與原住民族及在地社群共事的新方式 (Berkes, 2004; Brosius, 2004)，以社區為基礎的參與式思維與操作，將勢必在保育計畫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該次大會並且決議：建議各國擴展保護區治理的型態，考量採行在地社區（群）實際參與的共管、私人與社區等機制，俾以應付複雜的經營管理需求，並提出「社區保育區」³ (Community Conserved Area) 的主張 (Borrini-Feyerabend, 2003; IUCN, 2003; 盧道杰, 2004a; b; Brosius, 2004)。2004 年，第七屆生物多樣性公約會員國大會將社區保育區列入正式決議事項，建請各會員國參採；同年 11 月，世界自然保育聯盟在泰國舉行的第三屆世界保育大會 (World Conservation Congress) 發佈：「原住民族與在地社區所組成的社會圍籬 (social fencing) 正逐漸取代 (保護區原本) 以槍與政府保衛所建構的圍籬」 (IUCN, 2004)。這連續幾次的國際保育盛會顯示，在地社群、原住民

族在自然保育工作的參與，不僅已是國際社會的普遍認知，其角色扮演也已跨出學理的推演，而邁入實際操作的階段。

Brosius (2004) 認為第五屆世界保護區大會在全球的保育思想上做了重大的突破，凸顯了社區、公義與治理的面向，宛如生態孤島的保護區被重新放入一個較廣大的地景鑲嵌體中，尋求與主流社會的政經、社會、人文全面接軌。其引用大會裡來自全球各地的原住民族代表與國際保育團體領袖的對話，呼籲保育團體與原住民族攜手共創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新聯盟⁴。而在大會裡保育領袖向原住民族請教的：如何將全球的優先轉譯入在地的現實裡？正也是國內保育界在日益重視原住民族傳統權益的政治現實下，所面臨的亟需尋找保育與原住民族間連結的挑戰。

就國內長久以來自然保育界對在地社群，尤其原住民族參與保育工作的不放心⁵，加上近幾年相關政策計畫的鋪陳，常在缺乏足夠學理推演與論述的情況下推出，耗費大量國家與民間的資源，直接衝擊現有資源的分配，常未解決既有的不正義，卻又製造新的不正義，受到各界許多的詰疑，也在學術領域引起許多辯論。如馬告國家公園芻議提出「原漢共管」口號，卻一直沒能推演建構出可操作的論述，這雖不見得是不同立場陣營間強烈衝突的主因，卻也是無法擴大支持面，持續醞釀的關鍵之一⁶。為能在政策決定與付諸執行前能有較深入的探討、分析與辯論，本文借鏡近年來國際保育社會的積極作為，擬從近年社區保育的學理中，發展出一個論述架構，而以研究團隊長期互動與經營、比較熟悉的霧臺鄉西魯凱部落，近十餘年累積但無論如何仍屬有限的田野資料⁷，在這個論述架構下，做一番推演與討論。我們認為涵括參與、在地知識與共有財產等學理的社區保育論述與「社區保育區」的主張⁸，讓原住民族傳統慣俗與在地網絡能有發揮的空間，或許是可以嘗試的方向。希望在引介與信賴原住民族可以與保育共存共榮的理念下，以社區保育的理論基礎，能對保育與部落的連結，做出一些貢獻。

國內原住民族與野生動物保育

1. 原住民族與其周遭自然資源

考古人類學者推估：臺灣現存屬南島民族的原住民族大概是在六千年前出現在臺灣，島內的遷徙則可能晚至兩、三百年前才開始，而其分布在最近的一百年並沒有大移動（李王葵，1997）。汪明輝（2003）討論原住民族與外來統治政權的關係，將其分為四個階段，其中1624年以前屬原始自治時期，1624-1930年屬相對自治時期。也就是說，臺灣的原住民族從六千年前到日治時代中期，基本上都是在所謂部落社會的型態下生活⁹，以部落為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基本單元，生活深深倚賴著周遭的自然資源，由早期以漁獵採集維生，漸轉為晚期多以農耕為主，漁獵為輔，部落族人有著泛靈信仰，部落內部自有其社會制度與組織在運作。在這段時期的部落社會裡，狩獵與其相關的社會機制等行為規範就是生活的一部份，其以經驗法則累積行之久年的風俗慣習，外加一些超自然的信仰，以嚇阻不當的行為或避免災害的產生。由於部落與最近400年來在平原地區逐步開墾發展的漢人移民社會，有地理上的隔離，相對獨立自主生活在山區，長久以來，其與賴以維生的資源環境發展出緊密的互動關係，累積建構了許多生活的知識與技術，配合著部落共有與私有的社會制度與組織，因應著自然環境的變化，而符碼化於祭典、儀式、禁忌與慣俗中¹⁰。

自日治時期開始，日治政府採取林野國有政策，奠定國家政府在森林土地與資源經營管理上的主導與掌控的地位（李文良，1996；1997；顏愛靜與楊國柱，200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政府來臺，全面廢除日治時期的頭目制度與理蕃區域，建制鄉里村落的行政體制與實施地方自治，並開始以漢化與資本主義化為取向的原住民族政策（陳宗韓，1994）。1966年，政府公佈施行「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准許原住民取得土地所有權，開放合法公私營企業或個人使用原住民保留地，以「山地現代化」為標的。然而，1960-1970年代，國家當時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所創造的就業市場，吸引了大批的原住民湧向都市平原，山地企業開發凌駕農業發展的優勢，使得旨在促進山村發展的山地開發政策，卻反而成為強化原住民離開部落社會的力量。此時，原住民族部落的經濟模式已經由原本的狩獵、採集、漁撈轉變成農業發展，普遍使用貨幣，融入主流的資本主義市場（陳宗韓，1994）。

西方基督教信仰是在1950年代前後陸續傳入臺灣的原住民族地區，在各地建立教會，時至今日，在許多的原住民族部落，基督信仰幾乎徹底取代了傳統的超自然信仰，重新形塑了原住民族的世界觀與生活規範（黃應貴，1992；鍾思錦，2000；清水純，2004；吳雯菁，2005）。近年，行政體制與民意代表逐漸替換部落的傳統社會制度與組織，既有的農耕與漁獵無法維持生計，大量族人外流，傳統的超自然信仰被基督信仰所取代，自然資源早已劃歸國家經營管理，1970年代中期後，政府又宣布全面禁獵，這些種種都直接或間接切斷了原住民族部落與其周遭資源環境間的連動。1990年代以來，早期活躍山林的部落中堅逐漸退隱，中壯年以下的年輕人，不僅多自幼即離家到平地或城市接受現代教育，成人後也囿於都市型態的職場生計，不再擁有走風獵人的能力，部落與山林及自然環境的文化與生活的傳承逐次凋零，族人原有的山林本能也漸成為傳說軼聞（黃長興，2000；巴蘇亞·博伊哲努，2002；台邦·撒沙勒，2004；楊雅淳，2004；吳雯菁，2005；盧道杰，2005a）。

然而，近年國內企業為降低成本與提高競爭力紛紛引進外勞，嚴重排擠原以勞動為主的原住民的就業機會，部分人力回流部落，重拾靠山吃山的生活。也是自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政府在鄉間與偏遠地區鼓勵生態旅遊的部落產業發展，許多原住民地區紛紛投入，一時間民宿、風味餐、傳統歌舞、異族文化的生態旅遊產業型態，成為原住民部落發展的指標與願景¹¹。不料，921大地震和之後的幾次風災，重創了山區，甚至影響到大都會區的運作機能。為此政府擬具封山策略，準備還山林給大自然。於是，原住民部落在現今資本主義市場與生態保育的夾擊下，進一步地被邊緣化，其與資源環境間的關係，也面臨完全斷絕的困境（盧道杰，2003b；2005b）。

2. 野生動物資源保育

近代臺灣的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係依循西方傳統人與自然隔離的策略，採政府集權的管理方式，嚴格限制在地社群（尤其是原住民）的利用，甚至將其視為最大威脅，其不僅不見得有成效，政府與原住民間也呈現長期的緊張關係¹²。特別自1972年全面禁獵與1989年野生動物保育法頒佈以來，狩獵在法規上受到禁止，國內原住民族也飽受「野生動物殺手」惡名之苦（Eu, 1969; McCullough, 1974, cited in Patel and Lin, 1989; 紀駿傑與王俊秀，1996；陳永禹，2000；趙啟明，2002；台邦·撒沙勒，2004；巴蘇亞·博伊哲努，2005）。謝孝同（1985）曾質疑禁獵的規定不是無法執行就是未被執行，而最重要的是，原住民族在山區的狩獵也一直未停止^{13, 14}。近年，狩獵更為國內原住民視為其傳統文化的關鍵元素，觀光旅遊發展的重點，甚至是自主認同的政治符碼（趙啟明，2002；台邦·撒沙勒，2004）。

1990年代中期，隨著前述國際社會對原住民與自然關係的認知轉移，原住民具有「生態智慧」、

可被視為「山林守護神」的論述，也開始在臺灣的自然生態學界與原住民運動中出現（裴家騏與羅方明，1996；羅方明與裴家騏，1997；孫銘燐，2001；趙啟明，2002；台邦·撒沙勒，2004；陳律伶，2004）。部份學者甚至主張，若能連結當地的傳統狩獵制度與科學性的野生動物監測機制，當可發展出一套由政府與居民共管的自然資源管理計畫（裴家騏，2001；2003）。

2000年臺灣政黨輪替後，部分中央權能下放地方，原住民的權益受到各界的重視，而在自然保護區或現地（域內）保育的範疇裡，也出現一些原住民部落的自主性棲地保育與部落發展的計畫（如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的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還有許多或自力、或受基層地方官署協助的封溪護漁運動（如臺北縣烏來鄉、新竹縣尖石鄉、高雄縣三民鄉、臺東縣海瑞鄉等）（蕭代基等，2000；盧道杰，2001；2004a；王鴻濬與吳俊賢，2005）。同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自2002年推出社區林業保育共生計畫，其尤以原住民族部落社區為重點，在各地頗受到好評，原住民族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育計畫，乃至自然資源經營管理工作，漸受到各界的矚目（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02；盧道杰，2003a）。然在現實政策上，狩獵仍是國內自然資源經營管理最敏感的議題之一，2004年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丹大狩獵試辦計畫引起各界的激辯即是個例子。但該案卻也是國內首次引用國際參與式的保育主張，試圖與原住民族部落共構夥伴關係，因應現有經營管理體制失靈的問題。¹⁵

另外，由於自921地震以來，每遇颱風土石橫流，造成無數財產損失，政府考量臺灣易遭天然災害的特殊地質地形，與防護工程成本日增，擬訂「國土復育條例」草案，其最主要的內容在限制山區的開發行為，除原住民族部落自給之農耕外，禁止農耕、採伐林木。而為考量原住民族權益，國土復育條例草案2005年2月的修訂版，特別增列第五章「原住民族權益之特別保障」。雖國土復育條例尚未經立法院三讀通過，行政院將其重要內容整理成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依項編列預算，積極推廣¹⁶。國土復育法規與政策的擬訂，除凸顯氣候變遷對人類文明活動的影響，也象徵著主流社會對國土保育的殷切期待，同時顯現國家山地政策的一大轉變。值得注意的是，該草案提及山區原住民族部落相關產業發展，僅限符合聯合國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永續發展原則之溫泉、生態、工藝、文化及傳統慣俗之產業（草案第2條19款）；原住民族部落可以受政府委託經營保育區，或訂定部落保育公約或保育事業計畫等（草案第17、38條）。姑不論其可行性如何，從其願意考量原住民族自治與自主精神而言，不啻代表參與式的取徑已成為國家國土保育政策的考量原則之一。

討論架構的建構

1. 社區保育區的概念

原住民族部落因為常存在有歷史長遠的人地互動關係，常在社區保育的研究或實際應用個案中被列為重點對象（Berkes and Folke, 1998）。但是，也因為許多國家地區政府亟欲掌控自然資源的利用與分配，加上資本市場無所不在的事實，在原住民族部落施行社區保育計畫，涉及不同尺度階層間複雜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互動與議題，如環境正義、土地倫理、部落發展等，尤其是資源所有權，或是經營管理權，與在地社群的傳統權利（Kothari *et al.*, 1998; Borri-Feyerabend, 2003; Phillips, 2003; Berkes, 2004; Borri-Feyerabend, Kothari and Oviedo, 2004）。但，總的來說，這些相關資源治理的討論，則總不脫權利（rights）、責任（responsibilities）與能力（capacities），加上對人權尊重議題的交織相映

(Western and Wright, 1994; Borrini-Feyerabend, Kothari and Oviedo, 2004; Borrini-Feyerabend *et al.*, 2004)。

為創造原住民族、游牧民族（遷徙性民族）與在地社群參與保育計畫的機會，尤其是涉及保護區的議題，前文提及近年國際保育社會戮力推廣社區保育區的構想，其基本上屬於社區治理的保護區型態，已在許多國家被採用¹⁷ (Pathak *et al.*, 2005; Borrini-Feyerabend, Kothari and Oviedo, 2004; Borrini-Feyerabend *et al.*, 2004)，也確能在保育上扮演正面積極的效用 (Nepstad *et al.*, 2005)。「社區保育區」係指為原住民族或在地社群藉傳統法規 (customary laws) 或其他方法，志願保育的天然或與人為因子互動的，富有顯著生物多樣性價值、生態價值與文化價值的生態系 (IUCN, 2003; IUCN CEESP, 2003; Kothari, 2003; Phillips, 2003)。

社區保育區有幾項特徵：與在地認同及文化連結；在地社群倚賴其資源（生態系、棲地、物種等）維生；雖管理目標不一樣，卻會產出保育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的成果；涉及共有產權控制下的共有資源與土地，或受社群規範的私有財產；原住民族、游牧（遷徙）民族或在地社區是決策與執行的主角；維持成本低。社區保育區因其產生方式可約略分為三大類：社區自主產生、在民間組織協助下產生、由國家政府的計畫或個別官員引動。社區保育區有幾項優點：協助消弭貧窮、促進性別平等、確定環境永續性、維持文化多樣性與安全。許多社區保育區基於複雜的生態知識系統而建，係以資源永續利用為基礎，可與現代知識整合更具保育成效，是一個增進國家正式保護區網絡的強效工具。其可提供培育社會邊緣族群與團體的機會，有效減緩傳統取徑的保護區所產生明顯卻分配不公平的經濟、社會與環境效益，及投入的成本 (Borrini-Feyerabend, Kothari and Oviedo, 2004; Pathak *et al.*, 2005)。文化是社區保育區的重要驅動力，許多社區保育區即為宗教與精神理由而保育的聖地，協助保護語言、傳統、知識與實作，甚至重振地方文化的榮耀，也是保育文化多樣性的一個間接的、卻很有效的工具 (Borrini-Feyerabend, Kothari and Oviedo, 2004)。社區保育區在尋求國家政府正式認可時，會產生幾種影響與結果：獲國家支持尊重在地社群的完全自治與決策權力¹⁸；在地社群與政府機關分享管理權與責任，此將改變社區治理的型態，而傾向共管的保護區 (co-managed protected areas)；國家政府與原住民族或在地社區關係不斷轉變，而以一個特別委員會或機制的基礎持續協商。許多原住民族部落與在地社群都不喜歡正式的保護區，而多傾向社區保育區的治理方式，但社區保育區設立的原則在於其對保育的作用與貢獻，如果過於遷就生活生計與資源的利用，而有損於保育的作用，就失去其最初的構想 (Borrini-Feyerabend, Kothari and Oviedo, 2004)。

社區保育區面臨的挑戰包括：缺乏國際社會與國家政府法規的支持；需要另類的發展思維；社區缺政治權力以抗衡主流社會的知識與信仰系統；市場力量與現代生活方式的影響，增加社區對外界的依賴，更改變其年輕人的想法與期盼；外界的價值與以科學為基礎的教育模式，逐漸取代社會規範基礎的知識系統；易受來自民間與政府的開發壓力影響；正當性不足無以抵抗外人的侵略；內部可能為某些少數份子所掌握、常被政黨與權力政治染指；缺乏經營、會計與市場行銷的管理能力等。地權的確認、決策的公平與透明、在地領導與伙伴關係的聯結是社區保育區成功運作的幾項關鍵因子 (Pathak *et al.*, 2005)。目前南美洲的國家公園中，有高達 84% 屬於部落或社群的傳統土地，也許很快該區將有許多保護區全部或部分移交予原住民族或社群來管理 (Oviedo, 2002, cited in Borrini-Feyerabend, Kothari and Oviedo, 2004)。

基本上，社區保育區的概念包含了社區保育的核心論述，包括讓在地社群自主管理，這是程度甚高的參與；以傳統法規（慣習）為基礎，其代表的是在地知識與社會體系的被採認；志願管理則蘊涵著以社會規範為主的共有財運作體制。而社區保育區所面臨的與國家體制的連結，涉及體制的排置、權力的分配、產權與經營管理權的宣示，經濟誘因的提供，違反規定者的社會懲罰與法律處罰的競合等，不啻是社區保育極致的實務展現。加上其頗能迎合原住民在自然資源與土地傳統權利上的主張，及自治的訴求，其既有學理的鋪陳，也有現實的考量，所以我們以其為體制論述的焦點。

2. 傳統原住民狩獵就是在地自然資源的經營管理體制

以社區保育區的思維為架構，我們採認許多學者的主張，將過去或現在仍存於部落（聚落）社會的生活及其周遭環境資源的互動，視為在地自然資源經營管理體制的基礎（Dei, 1993; Williams and Baines, 1993; Berkes and Folke, 1998; Berkes, 1999; Berkes *et al.*, 2000; Kothari, 2003），以原住民狩獵為軸線¹⁹，再做進一步的推演。首先，解構狩獵：狩獵顧名思義是人類一種徒手或藉助工具，以捕捉鳥獸獲取動物蛋白質與相關皮毛等動物產製品的行為，也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生活或生產的形態²⁰。為了進行狩獵的行為，行為者本身需要擁有一些條件，包括：健康的體魄、對山林環境與狩獵對象的基本知識、因應突發氣候變化的能力等，才能在環境瞬息萬變，地形崎嶇難行的山林中，維護己身的安全，找到獵物，然後運用個人技巧，善加利用獵具，以能順利捕獵得手，最後把獵物背回部落處理及與族人分享。狩獵的行為有其困難度，並非每個人都有能力成為善獵者，除上列條件外，經驗（含技術與知識）的傳承與累積也是必要的²¹，還有運氣的成分存在（吳雯菁，2005）。

早期狩獵行為跟個人與部落族群的生活生計（生業）有關，係一種動物蛋白質的採集與分配，也是部落武力與安全防禦的儲備²²。部落社會以榮耀鼓勵狩獵，透過信仰禁忌、獵區、漁場的分配與承襲、及貢賦制度的運作等社會機制，來建置部落對山林空間與資源的控制。如此以能力、知識、身份、社會分配與規範、及宇宙觀綜合而成為一野生動（植）物資源經營管理的體制（Berkes and Folke, 1998; Berkes, 1999; Berkes *et al.*, 2000; Kothari, 2003）。

若從行為與過程進一步分析狩獵的內容，可以把狩獵細分成：獵人、獵法（具）、獵季、獵區、獵物等元素。每一項元素都還可以因為時空、族群不同而有不同的內涵，而由所屬族群文化的社會機制所串連控制。在部落裡，誰可以成為獵人？怎樣成為獵人？誰或怎樣的程序來認定獵人的身份？獵人應遵守哪些規範？規範是誰訂的？如何修改調整？誰來執行？雖未行之如文，卻都有著約定成俗的行事規則。而「獵人」與其所奉行的「行為規範」，即是狩獵所指涉的社會制度的核心，也是串連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族或在地社群生活實作與生產行為的關鍵。一般來講，獵人的行為規範包括：獵具的種類與使用、狩獵時間與區域（獵季與獵區）、哪些動物可以打？哪些不能打？哪些是視情況而定？有哪些不同情況的組合？與獵物處理的方式等。這些行為規範多是以經驗法則累積行之有年的風習慣俗，外加一些超自然的信仰，以嚇阻不當的行為或避免災害的產生。

由於其經常被符碼儀式化，所以當部落的信仰改變，或文化儀式流失，就會發生記憶與傳承斷裂的情況（Kleymeyer, 1994）。失去文化傳承與社會連結的原住民獵人，與視野生動物為商品物資的非原住民族獵人一般，不僅缺乏對自然的敬畏，更不見其與部落族人及鄉土的互動（McCullough, 1974, cited in Patel and Lin, 1989; 吳雯菁，2005）。由此可見，文化的集體性與部落的主體性，可以說是維護與再造傳統狩獵體制的重要課題。然由於傳統已融入生活與文化的狩獵體制，在外來國家與市場體制的侵

蝕下，已逐步崩解消逝，不僅部落裡明瞭傳統規範的獵人只剩少數碩果僅存的耆老，最重要的是，有體能、有意願留在部落的年輕獵人，在部落找不到可以期盼可以倚賴的未來。今天，當狩獵逐步退出部落的生活與社會文化，當狩獵逐漸成為一種兌換貨幣的手段，反過來國家機器囿於本身對山野的經營管理能力與執法能力有限，而萌起與在地自然資源經營管理體制連結之議時 (Brandon and Wells, 1992; IUCN, 1993; McNeely, 1994; 1998)，我們必須重新對原住民族的狩獵作一番論述與分析，在田野中傾聽與收集部落對其狩獵的再創造與再詮釋 (Hobsbawm and Ranger, 1982)，才能務實地以探思其與國家體制的可能連結。

3. 野生動植物資源的共有化 (部落或家族獵場) 與私有化 (個人獵場)

以社區保育的學理所包含的參與、在地知識與共有資源管理的面向 (盧道杰, 2004b)，來建構傳統狩獵文化與野生動植物資源經營管理的連結，可從資源系統的屬性、地方群體的屬性、體制的排置與外在環境著手 (Agrawal, 2001)，關鍵在於：1. 部落社區為治理的單元 (社區為基礎)；2. 有能力的人力配置 (在地知識與執行)；3. 可否形成有效的控制機制 (處罰)；4. 法規正當性 (國家社會的支持)；5. 誘因 (在地持續參與的動力)；而以野生動植物資源共有財產化來思考 (Ostrom, 1990; Murphree, 1993, 1994; Hanna *et al.*, 1996; Ostrom *et al.*, 1999; Pagdee *et al.*, 2006)。

我們認為部落裡擁有在地空間、自然資源方面知識的獵人，因為熟悉野生動物資源、獵場地形、環境生態變動，經常奔走於山野中，甚至依賴其維生，可以是、也應該是在地共有野生動物資源的經營管理者。但獵人是使用者，屬部落的一部份，應該僅是在地共有野生動植物資源的主要元素，而非全部。擁有獵場等公共空間的最後決策權的部落，應該是資源的治理機構，其在體制上的角色應該被突顯出來，以作為跟國家政府直接對應的主體與窗口，也是社會體制與文化傳承運作的平臺。至於與國家社會的連結與包裝，許多國家政府對野生動物資源的掌控，多由擁有權 (物權) 切入，而多以表列的方式進行物種的保護或保育，採狩獵證或採集證的證照制度及法律規範與警察權，來執行相關的工作。其中，證照制度為關鍵的運作機制，更有許多空間來保障或管理特別的行為人。透過證照制度可以規定相關狩獵的事項，包括：野生動物的物權、狩獵權、條件限制行為人 (管制獵人身份、數量、季節時間限制、區域限制)、條件限制被狩獵動物 (物種、性別、年齡、可狩獵數量)、獵法等。另外，越來越多國家 (尤其在歐洲) 要求申請者需先通過測驗，才能申請狩獵證 (Klemm and Shine, 1993)。國內相關自然資源經營管理法規中 (如野生動物保育法、森林法、國家公園法等)，也包含有採集、狩獵、垂釣等證照制度，已初步富有國際相關保育法規的精神，也有收費的規定 (有使用者付費之意)。我們認為證照制度不僅是保育法規的主流，也是國家可以介入保障在地體制的所在²³，連結的關鍵重點在如何呈現在地體制為體的操作。我們主張援借證照制度，在部落裡建立有一套獵人的認證制度 (包括成為獵人應具備的條件、篩選、培訓、考試、執業與終身學習等)，而由部落體制來考核與認證，或許可以串起現代部落社會與獵人間的連結。獵人藉之取得部落的授權與正當性，成為掌管傳統生態知識與技術及實際執行工作者，而為在地自然資源經營管理體制的運作中心。部落則在分群分工上發揮，推動植物採集、獵物處理、儀式典章、政治決策與衝突解決等事宜，並形塑管制規範與執行獎懲。傳統上以社會性的懲罰為主的架構，或可部分保留，並適度與現代國家法規制度接軌，以為公權力介入的管道。這種以部落 (社區) 為基礎的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的架構，由於相當程度倚賴在地原住民族的傳統社會組織與在地知識，倘能有明顯的區域界線，就與社區保育區的概念十分吻合。關於此點，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近年積極推動繪製的，以部落居住空間、耕地、獵漁場與神聖空間（祖靈聖地）等生活空間為主要組成的傳統領域（土地），或可以作為連結的單元²⁴。

如何讓「獵人」得以在現今的部落社會裡生存生活下來，是在地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體制面臨最大的挑戰。過去獵人在部落社會裡享有英雄、尊貴與領袖的地位，也是財富的象徵（吳雯菁，2005；盧道杰，2005a）。今天要重建狩獵與部落社會的連結，就必須思考再造獵人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空間。我們主張適度開放狩獵來塑造獵人生存的空間與合法性，兼授予傳統社會文化傳承的角色，而旅遊導覽、獵物的有限販售、加上巡護山林的工作機會，可進一步提供經濟上的誘因。在部落政治上，當狩獵再度活化，成為部落的一項生業，擁有部落公共空間知識，身為狩獵體制運作中心的獵人，自然擁有一定的影響力。另外在部落與國家機器連結接軌的議題上，我們認為部落組織化或法人化（如社區發展協會，或近來有些地區提出或已開始著手運作的部落會議等），都可以爭取部落在現代國家體制裡的運作空間²⁵；而野生動物資源的監測與回饋措施則可顯示經營管理的效能，並向主流社會呈現：狩獵可以是有效經營管理野生動物資源的方式之一。

然而，在地參與的面向上的一個嚴肅的議題是，原住民參與的意願與本身對其狩獵文化乃至（舊）部落發展的想法。以在地參與著重參與對在地社群（區）的意義這個面向來論（Kiss, 1990; Bass *et al.*, 1995; Slocum *et al.*, 1995; Furze *et al.*, 1996），參與這項工作的原住民可能必須先面對自己，說服自己，說服部落，到底狩獵對其個人、部落、乃至族群能做什麼？狩獵是凝聚部落共識的必須？回復與再造傳統文化的關鍵嗎？原住民族（我們部落）在現代的環境社會裡要什麼樣的傳統文化？狩獵真可以提供部落發展的誘因？其程度與範疇又為何呢？

以霧臺鄉西魯凱族部落為例

就我們在前節所提出的，以在地原住民族部落與獵人為主的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體制架構，本節以屏東縣霧臺鄉的西魯凱族部落²⁶為個案對象試作推演：

1. 魯凱族簡介

魯凱族分布於臺灣中央山脈南段東西兩側的屏東縣、高雄縣及臺東縣，四周有排灣族、卑南族與布農族的勢力環伺，長期以來各有消長，族群關係複雜。其中魯凱族與排灣族不僅毗鄰分布、在體質、社會組織、百合花與百步蛇信仰方面極為接近，但在語言、祭典、埋葬方式與繼承制度上仍有顯著差異，日據時代人類學者乃將其分別獨立（王長華，1984；許木柱等，1995；文上瑜，2002）。目前魯凱族人口總數約有一萬餘人²⁷，並依地域、語言與文化的不同，大致可分為下三社群（濁口群）、西魯凱群（魯凱本群或隘寮群）與東魯凱群（大南群）三群（許木柱等，1995）。其中西魯凱群分布北起大母山、南抵隘寮南溪谷，傳統獵場範圍往東越過霧頭山至臺東縣境。西魯凱群居住生活的地點在行政上主要屬於屏東縣霧臺鄉，包括位於隘寮北溪流域的阿禮、吉露、霧臺、大武與佳暮等五個村，以及位於隘寮南溪流域的好茶村。另外在瑪家鄉三和南村的美園社區、三地門鄉的青葉村、德文村的相助巷與三地門村等地，也都有日治時期從霧臺鄉集團移住，或光復後陸續遷出的魯凱族人。

魯凱族部落傳統上有嚴謹的貴族（或譯為頭目）與平民社會階層體系；每位部落族人的社會身份地位係依其血緣基礎承襲，其中貴族階層又以是否當家（本家或在家）分為大頭目與小頭目（許功明，

1987；許木柱等，1995；巴神一，2003；巴清雄，2004）。在傳統的魯凱部落裡，每個階層皆有其自己及與其他階層間應負的權利義務關係，所有族人的社交互動與生活都在各自所屬的地位上進行（巴神一，2003）。魯凱族貴族階層擁有土地領主權（或稱租稅權）與象徵特權兩項（衛惠林，1963；許功明，1987；喬宗志，1990）。在傳統的魯凱部落中，除少數公用財產如道路（*kadalanang*）、社內集會所（*talupaurupoang*）、敵首棚（*ada'adakang*）等等屬於部落全體所公有外，一切部落境內的自然財產，如山林（*kasikase*）、河流（*dakaral*）、獵場（*talupang*）、土地（*kadangan*）、家屋基地（*pangipangisane*），以及自然地上的一切附屬物、甚至山上石頭、樹木野草野花、山林中之鳥獸、溪流中之魚貝，原則上均屬頭目家所有，平民階層如要使用則需向頭目家族繳交不同名目的租賦（*sualupu*）（李汝和，1972；王長華，1984；許功明，1987；喬宗志，1990；巴神一，2003）。貴族階層一方面透過這樣的租稅貢賦制度具體地兌現土地領主權，另一方面亦藉由名制與裝飾上特有的徵號顯示其抽象的身份地位。租稅與特權讓予制度中，透過全體部落族人在儀式過程的共同參與，使平民分享生產所得、貴族分享財富與特權，形成了物質與非物質的流動與交換，是一種再分配（*redistribution*）的機制（許功明，1987）。這樣的交換與再分配機制，其實也「調和」了貴族與平民階層的緊張關係（巴清雄等，2004）。巴清雄等（2004）認為，象徵特權（特別是裝飾權）其實是榮耀（*lrigu*）的表徵，儘管個人的階層歸屬是天生而無關於能力的，但社會地位的高低評價，卻可透過榮耀的取得來提升。許功明（1987）則認為榮耀為部落規範的核心，其不僅消弭了貴族與平民可能的緊張關係，也進一步串連了自家與他家、個人與部落、本部落與他部落。

多數的魯凱族部落是由兩個以上的頭目家系為中心，率領其旁系、臣屬與平民等構成的複合體系。部落（*tsekal*）是魯凱族獨立完整的自治地域單位，主要由一集中聚落、或數個毗鄰聚落聯合組成，內部亦可再分為若干住區單位（*pangipangisane*）。部落本身不僅是一個地域界線完整分明的單位，亦是一個共同祭祀體，以及結合政治、經濟與軍事的聯合防禦體。當部落有超乎親族關係的公共事務需協調處理時，會由多位部落長老（或稱耆老，*marudrane*）共同協商決議，並經由各式公眾會議的召開來解決與執行；跨部落或部落間的議題，則由各部落頭目與長老居中協調（巴清雄等，2004；汪明輝等，2005）。魯凱族的傳統信仰屬泛靈信仰（*animism*），意即魯凱人相信所有自然界的物體或現象都存有精靈在內（許木柱等，1995；謝繼昌，1995）。動物也有靈魂，所以看到或夢到不同的動物物種或行為，就有不同的占卜意涵，其與超自然的神靈分類與祭祀儀式及禁忌（*li si*），在族人生活與風俗慣習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林美容與王長華，1985²⁸；許木柱等，1995；謝繼昌，1995；巴神一，2003）。

西魯凱族分布的自然環境，土力不十分肥沃，年平均雨量僅一千五百公釐左右，且主要集中在夏季，雨季時容易發生土壤沖蝕，僅適於耐旱耐瘠的作物。面臨如此的生態環境，魯凱族的傳統生計係以山田燒墾式的農業為主，而以狩獵、捕魚、採集與有限的牲畜飼養為輔（許木柱等，1995）。魯凱族的農地（*kadunungan*）範圍廣及部落內外，一般而言屬於頭目家族所有，但也有一說因為墾殖者投注的開墾勞力多，原耕墾家族在使用權上比頭目的所有權較受到族人的尊重（許木柱等，1995）。傳統獵場與漁區則皆為貴族所有，在下三社群的多納社，概念上大河卻是部落共有的，頭目家族不能單獨決定大河水域權力的轉讓與餽贈；而小河則分屬十數個頭目與平民家庭，擁有河段的家庭可以限制他人的捕魚活動，並收取魚獲作為租稅，並可以轉讓與餽贈，呈現有私有財產的傾向（王長華，1984）。農作主要以家戶為單位進行，但由於魯凱族的男性常需從事狩獵活動，因此農耕的勞動力便常仰賴女性，

但墾殖等較耗體能的工作仍以男性為主；而漁撈則是不論性別與年齡都可從事的活動（戴永提，2000）。

2. 西魯凱的狩獵

以屏東縣霧臺鄉好茶部落的魯凱族（西魯凱群或隘寮群）而言，至少在光復以前，部落族人普遍認知狩獵是男人的天性，從小即耳濡目染，並在適當的年齡開始隨父兄進入山野。狩獵是取得動物蛋白質的方式，更是獲取社會地位的途徑。男人直接或協助獵獲或接受五到六隻以上的公山豬者，即可取得配戴百合花頭飾的資格²⁹，此制度是魯凱族獵人身份被部落認定的一項榮譽。獵人們多三兩成群出獵，以獵槍、陷阱為主要的獵具。出獵行前、過程中皆有許多占卜或儀式的規定，如夢占、鳥占等，除是祈求祖靈的庇佑外，也是對獵物的一種崇拜與尊敬。早期獵區都是部落內的獵人們共同使用，獵人狩獵前不需先徵求頭目同意，但需在事後繳交部分獵獲物予頭目作為租賦。這顯示魯凱族人的獵場雖在名義與概念上屬於頭目，但在運作上卻接近於部落集體共有。日治時期鐵製陷阱普及後，為避免誤踩他人獵陷，專屬獵區的默契逐漸形成，但會隨獵人數目、季節變化、野生動物族群量興衰而流轉更替，甚或開創新獵區。好茶部落的主要獵場由獵徑聯繫，而通往後山（臺東境內）獵場的主要獵徑上有五個共用區，內設公共獵寮，供獵人集結。每個獵人遇公用獵徑雜草叢生或土石坍塌，皆有修護與清理的義務，否則會遭公開譴責。獵人們在部落裡的聊天與集體互動中，交換獵穫、打獵經過、獵場與獵徑路況等訊息。獵區基本上以父傳子為原則，卻也有傳給善獵的年紀較輕、輩份較低的宗親或親密朋友（獵友）的例子。

西魯凱族人的狩獵行為，除了依據其對山林的認識，並遵循彼此默契相互約束外，傳統泛靈信仰的影響也頗大，如在大鬼湖、小鬼湖等祖靈聖地，不得任意前往打獵；在高海拔地區還不規則地散佈著許多小塊的禁地，亦不得任意進入；而獵人也不會繼續在部分曾發生意外的地點狩獵，或狩獵前需行祭拜儀式。雲豹、百步蛇與熊鷹則被魯凱族人視為家人，也不能打³⁰。

過去獵人打獵若有所獲，返回至接近部落的山頭時，會以不同的呼聲知會部落族人，一方面傳遞獵獲獵物的種類大小，一方面邀請眾人來分享。獵物的分配除有些嚴謹的獵租稅規範外，基本上係以部落共享的原則來進行：獵人自行留下獵物頭部（以展示打獵的成績），心臟與右後腿供奉給頭目（以前頭目會再分配給其他族人），在他人獵區獵捕也需繳交部分所得給獵區擁有者，其他則與沿路遇見者、幫忙背東西者、親朋好友、鄰居等分享。早期，各部落間對彼此的獵場十分尊重，日據之後因為林野國有化的政策，也是部落傳統組織的沒落，年輕一代的獵人不再遵循部落間與其他家族及個人的獵場宣告。近年，本研究團隊在繪製傳統領域計畫裡發現，各部（村）落頭人（包括頭目、貴族、長老、獵人、村長、鄉代等）皆相當重視自己部落的獵場，各部落的傳統領域大致界線分明，透過對話也多能對有爭議處多所釐清。

裴家騏（2001）從生態學的視角分析霧臺鄉魯凱族的狩獵制度，認為其主要狩獵物種均為繁殖力較高的草食或雜食性動物，對狩獵壓力的承受力較大；季節性的狩獵活動提供野生動物喘息的機會；散佈式的獵區，加上同一狩獵區中的狩獵地點每隔幾年會調整，分散了狩獵壓力；每一獵區都被不狩獵的區域所包圍，加上對神聖空間的迴避，有禁獵區或保護區功能，提供動物繁殖與生育的環境；獵區的專屬制度加上單一獵人的狩獵能力的限制，有壓抑狩獵量的效果；傳統的禁忌與習俗如鳥占等，對狩獵活動有隨機降低狩獵頻率的效果。這些機制理論上能減少連續或密集的狩獵活動，不需要專門的管理人力，依傍信仰、社會制度來運行。傳統魯凱的狩獵制度不啻是 Berkes and Folke (1998) 所稱

的一種適應力強又富彈性、且與生活相連結的在地野生動物經營管理體制。

3. 在地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體制的推演

魯凱族傳統上有嚴謹的社會階層制度，頭目名義上擁有部落所有的獵場，其與長老及貴族在部落事務與空間資源的分配上擁有相當的發言權，而百合花頭飾則是其獨特的獵人榮譽制度。雖然現今霧臺鄉各部落傳統社會制度在國家機器、經濟市場與外來宗教的侵蝕下，超自然信仰、禁忌、傳統社會規範皆已不再為族人所奉行，法令的禁獵、人口的外移、加上專業狩獵轉為休閒活動，造成族人逐漸遠離山林，狩獵文化缺乏傳承，個別狩獵能力也大幅消弱。但是在田野工作中，也發現百合花頭飾仍普遍為各部落所採認遵循，頭目、長老也受到族人與鄉公所一定的尊重。幾個部落（村落），尤其較靠山區，也是西魯凱族部落社會核心的好茶、阿禮、霧臺、大武等村，皆有族人有意願有熱忱希望能活化狩獵與傳統文化，促進部落發展，創造族人持續生活山林的空間。

以前述社區保育區藉傳統法規或其他方式志願保育自然資源為標的，將傳統原住民狩獵視為在地自然資源的經營管理體制，來共有化部落佔傳統領域大部分面積的獵場及其蘊涵的野生動植物資源，我們認為獵人與部落的連結是關鍵，而魯凱族特有的百合花頭飾制度就是相當好的切入點。其不僅有榮耀與社會規範的意涵，最重要的是在部落裡仍持續為族人所認同並遵行運作³¹，有構成準共有財的條件。我們認為百合花頭飾基本上可以被視為西魯凱族內部對獵人的一種認證，其以榮譽吸引與鼓勵部落內的男性終身追求，其狩獵行為，及衍生的獵技、獵具、獵場、祭儀與傳承，還有最重要的獵物分享，則是將此制度進一步根植於生活生計的機制。我們主張：可將目前各部落現存已公開獲頒配戴百合花頭飾的獵人，直接認證為「獵人」；尚未被公開授予百合花頭飾，但部落周知有從事打獵活動的獵人，則認證為「助理獵人」。「獵人」可獨立帶團從事狩獵行為，而因獵槍多是獵人自行製造，為避免刀槍使用產生意外，可考慮僅由「獵人」執行狩獵行為。「助理獵人」則必須在不違反現行法令下，達到傳統標準並公開獲頒百合花頭飾後，方能成為可獨立帶團作業的「獵人」。「獵人」為現場作業需要可聘請「助理」隨行，「助理」在符合一定條件後，可升為「助理獵人」。「助理」與「助理獵人」在整個「獵人」養成教育裡，除野外時數外，均需接受教育訓練，以吸收其他相關的知識與技能，如：生態學、保育生物學、地理資訊系統與衛星定位系統的使用、判圖、測量方位與收集相關野生動植物資訊、溝通解說、民族動植物學、山林救護、野火防制等。如此安排係一方面能顧及部落中遵循傳統的資深獵人仍繼續有狩獵的事實，另也希望年輕的獵人能夠吸收現代化的山林知識，可以與傳統知識互補整合，並增加與國家自然資源經營管理體制的連結，與產業發達的機會。

在地知識與社會規範部分，則由獵人、長老與頭目講授，或在實務儀典中演練。而由於獵人熟知部落相關的傳說軼聞、傳統規範，擁有民族生物學的知識，又具穿越山林的能力，不啻是絕佳的嚮導與解說員。百合花制也可以是嚮導與解說員的認證制度，在高山越嶺與生態旅遊的活動上，扮演積極的角色，同時催生部落的觀光旅遊產業³²。又部落裡的在地山林知識與其相關的禮儀、規範、禁忌與信仰等傳統文化事宜，也可以透過這套與百合花制相連結的獵人、嚮導與解說員認證制度，促進其宣導與傳承。獵人可在部落內的非正式教育系統裡，協助收集在地文史與生態知識，甚至擔任講師的工作，帶領年輕的族人認識部落家園；對來自部落外的訪客，以在地的角度，詮釋在地的景觀、動植物、特有風俗習慣與藝術文物等；到外地去介紹與宣導魯凱的景致與文化，形塑魯凱的特色。這樣的認證制度結合原有的社會機制與現代山林保育巡護的技能，除能活化文化的傳承，兼顧榮譽表揚外，也能

培訓獵人現代的山林調查與記錄技術，甚至解說與溝通的方法，除可拓展獵人的就業機會外，更有助於部落旅遊產業發展的人力資源發展。

部落在這個百合花的認證制度上需要展現：審核、監督、訓練、管理、發證等功能。傳統上頭目、長老與資深獵人是百合花頭飾頒授的核心機制，目前族人還相當重視與尊奉狩獵方面的授花機制，只是逐漸式微的獵人規範倒是需要重新振興，甚至在規範的重新建構與詮釋上，尋求全體族人的參與。在幾年的田野中，我們發現還留在部落生活的族人，對狩獵都尚抱持著一份堅持，許多年輕獵人都都願意跟隨部落資深獵人的腳步，學習相關的慣習、技巧與空間知識，可以連結相關工作機會與產業發展，更是部落所樂見。目前，面臨比較大的問題是，如何得到法律的正當性與授權，以進行相關的施作、傳承與體制鋪陳。雖然原住民族基本法容許族人可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由，在非營利的情況下，獵捕野生動物（第 19 條），但仍需符合野生動物保育法與森林法相關規定。更重要的是，國內法規缺乏對部落共享、共有、共用的完整論述，無法提供部落在地體制強力的支持。因此，我們在部落與國家體制間的連結方面，採取比較開放的思考，主張除了傳統社會制度外，也應適當地考量現代民主的政治元素。在傳統階層化社會制度仍深植於部落民間的西魯凱族地區，我們認為除了傳統的頭目、長老與獵人間連線外，也需顧及現今民選官員與全體族人的參與。無論是現代社會機制裡的協會、或是部落會議等³³，只要對內能獲得大多數居民族人的認可，對外可與國家政府體制接軌，都可以考慮。以近年部分部落（如阿禮、好茶部落）試行的部落會議而言，就具有內部意見整合的初步效果，族人也頗為接受。

獵區是狩獵的重要元素，也是各部落傳統土地的主要組成。部落獵區分佈呈現出該部落的生存領域及勢力範圍，也彰顯出部落跟部落間的關係。傳統上，若侵犯到其他部落獵區，是會有引起部落間征戰戰爭的可能。西魯凱的獵區以靠山的大武、阿禮與好茶部落為主，阿禮部落的獵場主要範圍在阿禮部落以東，翻越中央山脈直至臺東大南一帶，北鄰大武部落的獵區，南以霧頭山與好茶部落為界，中央山脈以東之獵區則與臺東大南部落共用。由於阿禮當代的頭目與臺東大南部落的頭目系統有親緣關係，故中央山脈以東至嘉蘭的獵區，阿禮部落也有使用權。西魯凱幾個部落間的傳統領域或傳統土地，大致界線分明，唯在現代國家體制介入後，有部分區塊有些爭議³⁴。

以阿禮部落為例，其獵區被視為頭目所有，由頭目管理³⁵。依照部落裡年逾七十歲的長老描述，阿禮部落早期盛行團獵的制度，並沒有區別個人獵場，阿禮的獵場乃是一個整體，為部落的共同資產。其搭配團獵制度，發展出一套嚴謹的分配獵物的規範，除了將獵物的心臟、右後腿留給頭目之外，其他則會依照貴族、平民，以及貢獻的大小，分配獵物。至於獵物分配之糾紛產生時，則由頭目、及長老出面調停。因為，獵區具有的共有財性質，也是行政原住民族委員會有以傳統領域作為原住民族自治基礎的傾向³⁶，我們認為部落以獵區為主要組成的傳統領域，可以作為社區保育區的基本單元。

而在其他經濟與部落發展的誘因，倘觀賞野生動物的市場需求日增，或者同時也會促使獵人主動調降狩獵量，因此，適度的市場機制運作將有助相關體制的持續發展。獵人以狩獵、嚮導、解說，加保育巡護，甚至調查研究的角色，再造其在部落立足生活的行業，而獵物後續的處理與後勤支援系統，民宿餐飲的配合，或者可以帶動整個生態產業。整個體制推演的精神在以山林守護正當化獵人的角色，用狩獵帶動觀光旅遊，用嚮導與解說製造文化產業，以獵人制度進行文化傳承，以附加價值平衡狩獵量的需求。當然，這樣的主張或許無法產生大肆繁榮的局面，但應可提供部分願意留在山上年輕人的

小康生存空間。人一旦願意留下來，部落就會有希望，文化就會有生機，山林間的傳說也就有繼續流傳的機會。

在部落普遍人口外流嚴重的今天，我們認為要活化傳統生態知識與狩獵文化，除了要「把人找回來」，更要能「把人留下來」。這不僅涉及文化事項，更是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各面向的生活生計的大事，除前述推演的運作機制外，應包括就業機會、教育福利、醫療服務等公共系統的建構。本文所推演的只是核心的體制，相關整體部落發展的議題與層級，可能就需要實務操作、或整合性計畫的投入與政府的介入，才能略窺全貌。

結語：挑戰與未來

Berkes (2004) 總結第五屆世界保護區大會的辯論，呼籲保育必須跨越社區部落、地方區域、國家聯盟與國際等地理尺度；提供各權益關係者參與的誘因不宜止於經濟面向，需要多面化；在地與原有的知識應受到尊重，並與科技知識融整以發揮最大的功效；國際保育社會應廣納不同文化的觀點重新詮釋保育的意涵。這段話恰可為國際保育社會近十幾、二十年來的典範轉移作一註解，參與式取徑所扮演的角色正日漸吃重，自然資源的治理也愈見多元，相關體制的排置更愈加細緻，社區保育區、共管與傳統政府主導的菁英集權式取徑，已然形塑成現地保育治理的連續質譜。近年國內自然資源主管官署逐漸感到己身能力有限，亟欲跨界吸納其他社會力量的投入，而有了社區取徑的思考；恰逢原住民政策的改弦易轍，原住民族的權益、傳統土地、在地知識受到重視；又，國土保育意識逐漸抬頭。因此，原住民族自主發展與保育的連結已是勢所趨。但是原住民狩獵的議題始終無法獲得適當的對待與妥善的處理，兼顧原住民族文化傳承、山林保育、部落自主與產業經濟自足，將是現階段國內原住民部落發展與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的重要命題。

本文以包括參與、在地知識與共有資源／共有財產理論的社區保育論述為基調，提出以社區保育區為標的，以分布於屏東縣霧臺鄉的魯凱族隘寮群為個案推演，重新發掘與定位原住民狩獵，為以部落為單元的在地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體制主張。借重霧臺鄉魯凱族至今尚得族人敬重與遵循、象徵榮耀的百合花頭飾制度，加入現代生態科學技術與教育解說的訓練，建構整合在地知識的獵人認證機制，以再串連起部落、文化傳統、組織制度與使用者間的社會連結；而配合野生動物資源永續利用、山林巡護、與旅遊產業的發展等誘因，將獵人在部落的經濟空間找回來；最後，以現行的部落政治組織，整合傳統頭目、長老與現代民選官員，及各社區組織代表，營造族人參與的正當性，以將社會規範與國家體制接軌，重塑共有資源的經營管理架構。

回顧臺灣過去三、四百年的發展歷程，雖然成就高度的物質發展成果，卻也犧牲了環境及在地社會文化與土地的鏈結，尤其是原住民族傳統的權利與資源管理體制，在現代國家體制、外來信仰與自然資本市場機制的侵蝕下，逐漸崩解。近年當全球力倡永續發展，留予現世代與後世代生活存續的空間，在地社群，特別是原住民族的人權與傳統智慧受到高度的重視，社區保育的典範於是成為舉世的焦點之一。就在國內追隨時代趨勢，面臨國土保育、人權與社會公義、資源經營管理的交相挑戰之際，本文提出以原住民狩獵串起的社區保育區概念，希望能在相關的論述上做出貢獻，更期盼能提供相關政策的參考，尋求環境、族群與發展的多贏。

資源監測系統的建置與效益分析是本文比較少著墨，卻或許是說服主流社會的必須，或者在後續的研究中宜列為探討的重點。本文論述係以我們近十餘年累積，但無論如何仍屬有限的田野資料與文獻回顧為基礎，進行體制的推演，屬政策思辯與建議的本質，原即無法考量所有實際操作可能面臨的問題，旨在拋磚引玉，期盼能豐富政策施行前的論辯。另，本研究以有階層社會特質的西魯凱為對象，然國內各原住民族各具社會組織特色，不盡然能將此架構直接應用於其他如泰雅、布農等社會制度與魯凱差異大的族群，雖是原理與精神足供參考，卻也需要詳究其在地脈絡，方能做進一步的鋪陳與論述。

謝 辭

本文田野研究與論述的初擬接受許多人的幫忙與協助，包括提供經費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參與討論的黃世輝老師、馮祥勇老師與閔河嘉老師，還有汪明輝老師與林端老師領銜的傳統慣習研究團隊，摯友蔡炯民博士的評論，歷年加入研究田野的同學與助理們，特別是在部落現場有許多長輩與朋友，不僅分享其經驗與知識，更在生活與精神上給予我們相當的照顧，由於人數眾多無法一一列名，除在此表達誠摯的謝意，也希望研究結果未來可以對部落做出實質的貢獻。最後謝謝兩位審查委員的意見，讓本文的論點能平暢連接，更為準確地表達與呈現。

註 解

1. IUCN 自 1962 年起每十年舉行一次的世界保護區大會 (World Park Congress)，不僅是國際上對全球現地保育 (*in situ* conservation) 的定期回顧與檢討，更是保護區經營管理典範論辯與醞釀的關鍵場域。
2. 社區 (community 或譯為社群) 的定義十分多樣：蔡宏進 (1985) 指述社區為一定地理區域內的人及其社會性活動與現象的總稱 (p.5)；陳其南 (1997) 主張社區蘊含共同體的意義，是具共識的社會單位，其意涵應由居民或成員自己來定義 (p.6)；宋鎮照 (1997) 認為社區的概念包含人口、地理、社會、組織與心理等要素 (p.604-5)；黃世輝 (2000) 則強調在現代民主社會的生活架構下，社區為現代人追求居住品質，提升生活品味的基本單位 (p.117)。Leach *et al.* (1997; 1999) 及 Agrawal and Gibbon (2001) 則認為當涉及保育議題時，應從行動者、過程與體制的面向來理解什麼是社區：社區係由多元利益的多重行動者所組成，行動者間的互動過程，與特別是架構他們互動的體制安排是社區保育的焦點議題。本文以為社區保育論述裡的社區可以是社區，也可以是社群，在地社區與保育計畫有地緣關係，保育團體心繫保育，既注重地理區位，更重視社會關係，社區的成分與組成應可以有較多元與彈性的表述空間。在後文西魯凱部落的敘述裡，由於屏東縣霧臺鄉靠山的幾個部落間的界線明顯，彼此對各自的傳統領域也有相關共識，我們認為部落可以等同前述的社區概念。
3. 相關「社區保育區」的定義與討論，請參考後文。
4. Brosius (2004) 引用 Redford and Stearman (1993) 所提出的保育生物學家與原住民族是天生一對的

- 主張，期盼保育生物學能對 engagement 找出一個有生產力的詮釋，並呼籲「我們不應再辯論保育目標與原住民族權益是互斥衝突的，生物多樣性的命運部分操之在保育社群如何因應原住民族、遷移性民族與在地社區所揭顯的挑戰，還有其可否掌握機會開創保育的新聯盟」。
5. 2004 年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在丹大地區試辦狩獵計畫引起社會各界軒然大波，部分動物福利與保育團體競相抨擊，以可能商業化造成野生動物資源的浩劫，期期以為不可，不同意見的團體與個人在主流與大眾媒體激烈論辯。我們認為這裡面其實隱含了對原住民族能力的不信任，及對原住民族視為其文化重要元素與政治圖騰的狩獵的理解不足。相關贊成狩獵與反狩獵的論辯請參考 2005 年 8 月《野生動物保育彙報及通訊》第九卷第三期的原住民族狩獵專輯（盧道杰編，2005）與《臺灣動物之聲》2005 年春季號（釋傳法編，2005）。
 6. 馬告國家公園籌設雖提出「原漢共管」的口號，且有部分人士將其譽為「新國家公園運動」，但其在醞釀與操作的過程中，卻處處顯示其政治的本質（廖朝明，2001；孫銘燐，2001；林益仁，2002；蕭惠中，2003；陳律伶，2004；賴俊銘，2004；簡慧慈，2004；Yang, 2005），尤其是各造皆持善意，因為對現有政府與法規的理解及態度不同，切入族群與部落發展面向不同，竟導致後續的衝突場面。我們認為該案立意雖佳，發展鋪陳過於急切，在學理辯論上未能有整體邏輯的推演，致在社會面與制度面的操作上稍有不足，或者在付諸實行前，需要更長時間與空間的醞釀。
 7. 尤其是近五年來的田野資料。
 8. 有關社區保育參與、在地知識與共有資源／共有財產的學理內涵討論，請參考盧道杰（2004b）。
 9. 本文所指的原住民族不包括平埔族，因為後者雖在荷據時期仍多倚賴漁獵維生，但與荷據、明鄭與清治時期的政權及漢人密切互動，當時不僅臺灣的平原地區大量農田化，平埔族與自然資源間的關聯也在政治體制與市場經濟的影響下，融入現代國家的體制裡（顏愛靜與楊國柱，2004）。
 10. 相關原住民族與其周遭環境資源間的關係，本文係以狩獵為例。雖然在許多民族誌裡都有狩獵的敘述，但多從族群或部落生活面向切入，由經濟生業、祭儀、傳說、與罪及罰等視之，早如 1910-1920 年代初期小島由道（1914-1922）所編撰的《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晚近如王嵩山（1990）、黃應貴（1992）等。針對傳統狩獵的研究，或將狩獵與生活生計、社會制度與組織、泛靈信仰、禁忌、儀式等連結在一起，而應用於自然資源經營管理，乃至生物多樣性保育，有生態智慧或永續利用之說，是近年國內學界才引進與興起的思維，相關文獻可參考如：梁秀芸（1996）、紀駿傑（1996）、裴家騏與羅方明（1996）、傅君（1997）、奧威尼（1996）、王俊秀（1997）、羅方明與裴家騏（1997）、黃長興（2000）、李秋芳編（2001）、裴家騏（2001；2003）、汪明輝（2003）、盧道杰（2003b；2004c；2005a）、台邦・撒沙勒（2004）、顏愛靜與楊國柱（2004）、吳雯菁（2005）等。其中，傅君（1997）比較特別，其對原住民族是否必然是山林守護者，是否在狩獵上具永續的生態智慧，提出批判性的陳述。
 11. 原住民族地區發展觀光產業可追溯自 1970、1980 年代，甚至 1960 年代，開發較早的地區受到觀光發展負面衝擊多（請參考如：謝世忠，1994；陳永龍，1994；2003；黃國超，2001 等）。在 1990 年代中期後，一方面是全世界生態旅遊的崛起，其有照顧在地社區與居民的精神與本質，一方面是保育與觀光的政策影響，再者是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簡稱原民會）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等相關政府單位計畫的鼓勵與支持下，以生態旅遊為目標的部落發展普遍展開（請參考如：

- 黃躍雯，2001；王進發與辜雯華，2005；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6a；鄭凱方，2006等）。
12. 相關政府與原住民間緊張關係，尤其是保護區（主要是國家公園）或森林管理方面，有許多文章敘述與討論（如：紀駿傑與王俊秀，1996；1998；蔡志堅，1996；張誌聲，1998；紀駿傑，1998；黃躍雯，1998；宋秉明，1999；2001；倪超倫，2000；裴家騏，2001；張長義等，2002；張長義等，2003；趙啟明，2002；台邦·撒沙勒，2004等）。
 13. 除本研究的田野，許多文獻資料也透露類似的訊息，如：撒可努（1998）、黃瓊瑤（1999）、倪超倫（2000）、陳英明（2002）、南投縣政府（年代不詳）。
 14. 在 2004 年文化臺灣發展協會及 2005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陸續舉辦的，相關丹大狩獵試辦計畫與原住民狩獵的座談會上，皆有原住民朋友發言論及：「其族人在山林裡的狩獵雖已勢微，卻仍持續進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05）
 15. 同註 5。
 16. 相關國土復育條例草案與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請參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網站：<http://www.cepd.gov.tw/index.jsp>。
 17. 社區保育區係世界自然保育聯盟的環境、經濟與社會政策委員會（the IUCN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簡稱 CEESP）於千禧年代初所提出，其主要用意在於認知與尋求世界各地一些最老的保育經驗與實作的合法正當性。相關議題請參考該委員會網站：<http://www.iucn.org/themes/ceesp/>，特別該委員會與世界自然保育聯盟的另一世界保護區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Protected Areas，簡稱 WCPA）合作的原住民、在地社群、公義與保護區的主題小組（Theme on Indigenous & Local Communities, Equity & Protected Areas，簡稱 TILCEPA），http://www.iucn.org/themes/ceesp/Wkg_grp/TILCEPA/TILCEPA.htm。
 18. 澳洲 2001 年所採認施行的原住民保護區（Indigenous Protected Areas），與哥倫比亞將一社區保育區公告納入其國家公園系統（Alto Fragua-Indiwasi National Park），是兩個有名的社區保育區的案例（Borrini-Feyerabend, Kothari and Ovideo, 2004）。
 19. 在臺灣如果以從事狩獵行為人的族群來作區分，可以約略分為非原住民族的狩獵與原住民族的狩獵。由於臺灣現居的非原住民族在四、五百年前遷入時，早已以定居農耕為主要生活生計生產的方式。其狩獵的行為除休閒娛樂外，多純屬商業性質，較少所謂人地關係的連結。因此，本文將其排除在外，而聚焦於原住民族的狩獵。
 20. 張嘉文（1988）主編的《辭海》對狩獵的解釋：用獵具或鷹犬來捕取鳥獸（p.561）。吳悉真（1969）翻譯與主編的《牛津高級英英漢雙解辭典》對 hunt 的註解為：go after (wild animals) for food or sport (p.523)。
 21. 所以霧臺的獵人長老巴神一（2003）說狩獵是需要投注相當努力的工作。
 22. 衛惠林（1963）。
 23. 《國內發展觀光條例》於 2001 年修正時，增列為保存、維護及解說國內特有自然生態及人文景觀資源，…在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所設置之「專業導覽人員」（第 2 條），旅客進入相關區域，應申請專業導覽人員陪同進入，以提供旅客詳盡之說明，減少破壞行為發生，並維護自然資源之永續發展（第 19 條）（相關規定除《國內發展觀光條例》外，也請參考交通部擬訂施行的《自然人文生態

- 景觀區專業導覽人員管理辦法》)。雖然援以現代法規條文來與傳統慣習連結的方式，仍有許多討論的空間(汪明輝等，2005)，但訴諸法律規章確是政府保障在地傳統慣習體制，建構正當性的主要方式之一。
24. 近年相關原民會推動的傳統領域(土地)繪製計畫的文章眾多，請參考如：張長義等(2002)、張長義等(2003; 2004)、立法院(2003)、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3)、顏愛靜等(2005)、張長義等(2005; 2006)等。
 25. 高德義等(2004)提出部落會議、民族鄉公所與代表會，及自治政府與民族議會的魯凱族自治政府架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006年3月10日訂定《原住民族部落會議實施要點》(原民企字第09500071256號令)，希望能結合部落傳統與現代民主社會公開、民主、平等的程序原則，集合部落頭目、長老、各社團組織、機關學校、宗教團體代表，共同營建原住民族部落的自主協商及發展機制。2004-2006年間，本研究團隊在屏東縣霧臺鄉的田野中觀察記錄到，阿禮村與好茶村分別各自組織與召開部落會議，尤其後者係原民會族群代表委員所主導，其羅列部落各團體代表，包括傳統體制的頭目、長老，現代民選的村長、鄉代，宗教方面的各教會，有立案的民間團體，組成部落會議，希望能成為未來部落自治的基礎。
 26. 以霧臺鄉西魯凱群為個案，主要係因為前有裴家騏自1990年代初期的野生動物資源調查與獵人團的組織，台邦·撒沙勒在1990年代後期以其家鄉好茶為主，進行博士論文的田野工作，盧道杰的團隊則自2002年起以霧臺鄉為基地，從獵人、獵場、傳統祭儀、風俗慣習等，著手研究原住民族狩獵與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的連結。統加起來，本研究團隊在西魯凱地區，有十餘年資料與人情組織脈絡的累積。從田野與文獻中也發現，雖歷經日治時代與國民政府時代的政府體制影響，社會結構、生活方式與信仰價值皆已改變，西魯凱迄今仍保有相當程度的傳統社會階級制度，對頭目、長老皆有一定的尊重，百合花頭飾仍普遍存於各部落，狩獵與獵人雖大幅減少，卻也還在進行(裴家騏與羅方明，1996；裴家騏，2001；盧道杰，2003b; 2004c; 2005a；巴清雄，2004；高德義等，2004；台邦·撒沙勒，2004；吳雯菁，2005；汪明輝等，2005)。
 27. 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004年9月的統計，魯凱族人口有11,168人，其中已辦理族別登記的有7,587人。
 28. 林美蓉與王長華(1985)所編著的霧臺鄉誌，當年於鄉公所座談發表時，有許多與會的在地耆老及鄉公所人士都對內容有不同的意見，因此至今未正式刊行發表。霧臺鄉公所則自2005年重新再啟動鄉誌的編撰工作，由鄉公所主編，邀各村(部落)頭人與文史工作者主筆，再邀集頭目、長老、村長、代表、與相關的仕紳舉行會議確認，最後由鄉公所彙整。然該版鄉誌在2006年初送鄉代表會審議時，因為代表們意見紛歧，又遭到擱置。
 29. 百合花的配戴與頒授在狩獵方面，除當事人狩獵所得超過標準可佩戴外，正式委託他人代獵或指定轉讓成績，也都是容許的，這顯示狩獵對魯凱男性的重要意義，不善獵者也千方百計要獲取百合花的頭飾配戴，而考量個人的能力與狩獵的困難度，部落在佩戴標準上也有一些彈性。另巴清雄(2004)提及百合花頭飾的應用不僅限於狩獵事項，尚包括女孩子的純潔與祝福。女孩子的戴花係由家長出面備妥禮物向頭目買換，貴族女兒的戴花儀式往往結合與平民間的結拜，在魯凱社會階層間的人際互動網絡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30. 關於西魯凱的傳統狩獵與獵人，詳見裴家騏與羅方明（1996）、盧道杰（2003b; 2004c; 2005a）、吳雯菁（2005）與汪明輝等（2005）。
31. 本研究團隊 2002-2005 年的田野顯示，霧臺鄉各部落仍不時為合格的獵人舉行百合花的授頒儀典，也常利用豐年祭舉辦少女配戴百合花的結拜儀式，每逢部落重大事件或重要公開活動，百合花頭飾更是耆老與勇士們必備的正式服裝配件，而於原住民族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繪製調查研究計畫的田野中，也觀察記錄到族人對配戴百合花的資深獵人的尊敬與信任。這些種種都顯示，百合花頭飾制度尚存於西魯凱族人的生活中運作。同樣的現象可參考：盧道杰（2003b; 2004c; 2005a）、吳雯菁（2005）、汪明輝等（2005）。
32. 此點意在與《國內發展觀光條例》的「專業導覽人員」做連結。
33. 如自 1990 年代初中期，國家政府開始普遍支持各社區部落成立或改組社區發展協會，後成為各部會相關社區計畫的主要對口單位，其擁有較多席次的理監事會，在社區民眾與部落族人的參與上頗有助益。又如最近在屏東縣霧臺鄉阿禮村與好茶村，或已開始運作幾次，或正在籌備試運作中的部落會議，都是可以嘗試的選擇。
34. 依照兩位部落長老的說法，日治時期，出自大南頭目系統的霧臺頭目央請臺東大南的頭目 *GUGA*，將小鬼湖以北的聚落獵區劃給霧臺部落。後來，林地國有化後，阿禮與霧臺部落的獵人就常為獵場誰屬而有爭執。
35. 部分部落耆老與文史人士認為頭目僅是部落的代理人，獵場雖名為頭目所有，其實係部落共有。
36. 請參考盧道杰（2005c）。

引用文獻

- 小島由道 (1914-1922) [大正 3—大正 11]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第四冊，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1996），臺北：中研院民族所。
- 巴神一（2003）魯凱神山風俗誌，屏東縣潮州鎮：潮州高中。
- 巴清雄（2004）霧臺魯凱族植物頭飾之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
- 巴清雄、王嵩山、嚴新富、陳翼漢（2004）從頭飾 (*bengelrai*) 談榮耀 (*brigu*) 在魯凱社會的運作——以霧臺部落配戴百合花頭飾為例，未發表。
- 巴蘇亞·博伊哲努 (浦忠成) (2005) 從部落出發：思考原住民族的未來，臺北：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
- 文上瑜（2002）魯凱族下山社群的族群與音樂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
- 王長華（1984）魯凱族階層制度及其演變——以多納為例，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俊秀（1997）原住民土地狩獵文化與土地永續利用，原住民土地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國土地經濟學會。
- 王進發、辜雯華（2005）原住民族部落生態旅遊產業之初探，第九屆臺灣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一民族，第四世界：原住民族的生活空間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279-293。
- 王嵩山（1990）阿里山鄒族的歷史與政治，臺北：稻香出版社。
- 王鴻濬、吳俊賢（2005）以社區為主體之保育經營——新武呂溪溪流魚類保育區之保育策略與模式發

- 展，農業與經濟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s*)，35: 119-138。
- 立法院 (2003)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第一七二二號，委員提案第五三六四號，臺北：立法院。
- 台邦·撒沙勒 (2004) 尋找失落的箭矢——部落主義的視野和行動，臺北：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
-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3) 辦理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計畫工作手冊，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6a) 行政院原住民族資訊網——計畫管理，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http://www.apc.gov.tw/official/aboutus/plains/plains04.aspx> [2006.2.22]。
-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6b) 原住民族部落會議實施要點，95年3月10日原民企字第09500071256號令，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002) 社區林業——居民參與保育共生計畫補助須知，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http://www.forest.gov.tw/web/service/service-all.htm> [2003.1.15]。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005) 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祭儀需要狩獵規範座談會逐字稿會議紀錄，4月19日，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吳悉真主編 (1969) 牛津高級英英漢雙解辭典，臺北：東華書局。
- 吳雯菁 (2005) 再見／再現獵人：一個魯凱族部落的獵人意涵探索，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所碩士論文。
- 宋秉明 (1999) 論臺灣原住民文化受國家公園衝擊的因應，國家公園學報，9 (1): 65-80。
- 宋秉明 (2001) 美國與加拿大國家公園和原住民互動關係之比較，國家公園學報，11 (1): 96-114。
- 宋鎮照 (1997) 社會學，臺北：五南。
- 李壬癸 (1997) 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臺北：常民文化。
- 李文良 (1996) 日治初期臺灣林野經營之展開過程——以大嵙崁 (桃園大溪) 地區為中心，臺灣史研究，3 (1): 144-169。
- 李文良 (1997) 林野整理事業與東臺灣土地所有權之成立形態 (1910-1925)，東臺灣研究，2: 169-195。
- 李汝和編 (1972) 臺灣省通志卷八同胄志魯凱族篇，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 李秋芳編 (2001) 把人找回來——在地參與自然資源管理，花蓮：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 汪明輝 (2003) 臺灣原住民族運動的回顧與展望，張茂桂、鄭永年主編，兩岸社會運動分析，臺北：新自然主義，95-135。
- 汪明輝、林端、裴家騏、巴清良、盧道杰、吳雯菁 (2005) 原住民族傳統慣習之調查整理及評估納入現行法體系之研究——鄒族、魯凱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辦研究計畫報告。
- 林美容、王長華 (1985) 霧臺鄉誌，屏東：霧臺鄉公所。
- 林益仁 (2002) 一個新的國家公園運動——馬告國家公園催生運動的發展與論述，宜蘭文獻，57: 80-105。
- 南投縣政府 (年代不詳) 南投縣環境保護計畫，南投：南投縣政府，<http://www.ntepb.gov.tw/Sa000/Sa006/> [2006.2.21]。
- 紀駿傑 (1996) 原住民、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拓邊／扣邊社會學研討會，臺中：東海大學社會系。
- 紀駿傑 (1998) 蘭嶼國家公園：新環境殖民或新契機？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主編，守望東臺灣研討會

- 論文集，臺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23-142。
- 紀駿傑、王俊秀 (1996) 環境正義：原住民與國家公園衝突的分析，臺灣的社會學研究：回顧與展望論文集，臺中：東海大學。
- 紀駿傑、王俊秀 (1998) 環境正義：原住民與國家公園衝突的分析，山海文化雙月刊，19: 86-104。
- 倪超倫 (2000)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野生動物管理制度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 孫銘燁 (2001) 誰的馬告檜木國家公園，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高德義、童春發、陳毅峰、林福岳 (2004) 原住民族自治制度之研究與規劃——排灣族、魯凱族及雅美族，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辦研究計畫。
- 張長義、伊凡諾幹、汪明輝、林益仁、紀駿傑、陳毅峰、孫志鴻、裴家騏、蔡博文、關華山 (2002) 原住民族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調查研究報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辦研究計畫。
- 張長義、劉炯錫、劉吉川、范毅軍、倪進誠、李建堂、官大偉、汪明輝、林益仁、裴家騏、蔡博文、盧道杰 (2003)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研究報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辦研究計畫。
- 張長義、劉炯錫、劉吉川、范毅軍、倪進誠、李建堂、官大偉、汪明輝、林益仁、裴家騏、蔡博文、盧道杰 (2004)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研究報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辦研究計畫。
- 張長義、蔡博文、倪進誠、盧道杰、丁志堅 (2005)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研究報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辦研究計畫。
- 張長義、蔡博文、倪進誠、盧道杰、丁志堅 (2006)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研究計畫書，中國地理學會。
- 張嘉文 (1988) 辭海，臺北：智揚出版社。
- 張誌聲 (1998) 太魯閣國家公園設立對當地原住民土地資源利用衝突之研究，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主編，守望東臺灣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59-186。
- 梁秀芸 (1996) 太魯閣群的狩獵文化與現況——花蓮縣秀林鄉為例，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清水純、鄭家瑜 (譯) (2004) 獵人與精靈——保佑能捕獲獵物的一種雙方關係，臺灣文獻，55 (2): 85-109。
- 許木柱、李壬癸、楊翎、王長華、潘英海、詹琪芬 (1995)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同胥篇，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 許功明 (1987) 由社會階層看藝術行為與儀式在交換體系中的地位——以好茶村魯凱族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2: 179-203。
- 陳永禹 (2000) 打山豬 人類的原始衝動 用文化作幌子，聯合報，2月16日讀者投書。
- 陳永龍 (1994) 觀看地方自主性與社會權力：試論觀光過程中的看與被看，山海文化，2: 47-51。
- 陳永龍 (2003) 觀光發展與臺灣原住民，第四世界全球虛擬網路圖書館，
<http://wildmic.npust.edu.tw/sasala/tourism.htm> [2006.2.20]。
- 陳其南 (1997) 社區家園化——論社區總體營造，社區營造：社區發展與總體營造，曠野雜誌／跨世紀小百科 5，臺北：曠野雜誌社，6-14。

- 陳宗韓 (1994) 戰後臺灣原住民政策分析：國家與社會的觀點，國立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律伶 (2004) 從馬告國家公園爭議試論對原住民民族運動之影響與反省，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英明 (2001) 臺灣各地區山豬、山羌、白鼻心及環頸雉野生族群存量估計，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 傅君 (1997) 臺灣原住民「生態智慧」與野生動物保育，山海文化雙月刊，17: 42-51。
- 喬宗志 (1990) 魯凱族的經濟變遷與社會階級制度—以霧臺鄉大武村為例，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所碩士論文。
- 黃世輝 (2000) 竹山鎮社寮地區文化地景的災後重建與反思，黃世輝研究論文集，臺北：建築情報。
- 黃長興 (2000) 東賽德克群的狩獵文化，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15: 1-104。
- 黃國超 (2001) 原住民觀光：徘徊在抉擇的十字路口上—以新竹縣尖石鄉鎮西堡 (*Cinsibu*) 部落為例。南方社區文化網路，<http://www.esouth.org/sccid/south2001117.htm> [2001.12.17]。
- 黃應貴 (1992) 東埔社布農人的社會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黃瓊瑤 (1999) 臺灣地區山豬野生動物管理制度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躍雯 (1998) 臺灣國家公園建制過程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地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黃躍雯 (2001) 臺灣原住民部落發展生態旅遊的概念架構與實踐方針，國家公園學報，11 (2): 192-212。
- 奧威尼·卡露斯 (1996) 雲豹的傳人，臺中：晨星出版社。
- 楊雅淳 (2004) 魯凱族知識青年對傳統狩獵文化的認知，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所碩士論文。
- 廖朝明 (2001) 國家公園與原住民衝突之分析：以棲蘭國家公園之設立與當地泰雅族原住民之互動關係為例，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裴家騏 (2001) 善用傳統知識共管資源，李秋芳主編，把人找回來：在地參與自然資源管理，花蓮：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205-201。
- 裴家騏 (2003) 再造山林守護神—雙鬼湖野生動物保護芻議，臺灣林業，30 (1): 26-33。
- 裴家騏、羅方明 (1996) 魯凱族的永續狩獵制度，野生動物保育彙報及通訊，4 (4): 5-10。
- 趙啟明 (2002) 重返舊部落，臺北：稻鄉出版社。
- 撒可努·亞榮隆 (1998) 山豬·飛鼠，臺北：耶魯國際文化出版。
- 蔡宏進 (1985) 社區原理，臺北：三民書局。
- 蔡志堅 (1996) 國家公園內原住民生態參與模式之建構—以玉山國家公園與東埔社布農族為例，國立中興大學資源管理所碩士論文。
- 衛惠林 (1963) 魯凱族的親族制度與階級制度，中國民族學報，3: 67-83。
- 鄭凱方 (2006) 從宜蘭縣大同鄉崙埤部落的社區營造歷程探討原住民社造政策的落實，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盧道杰編 (2005) 野生動物保育彙編及通訊 2005 年 9 月第 9 卷第 3 期，屏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
- 盧道杰 (2001) 分權、參與與保護區經營管理—以宜蘭無尾港與高雄三民楠梓仙溪野生動物保護區為

- 例，地理學報，30: 101-124。
- 盧道杰 (2003a) 社區林業與原住民關係之研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委辦研究計畫報告。
- 盧道杰 (2003b) 社區參與及財產共有制在野生動物資源之運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辦研究計畫報告。
- 盧道杰 (2004a) 臺灣現地保育的治理－1990 年以來一些新興個案的回顧，臺大實驗林研究報告，18 (1): 13-27。
- 盧道杰 (2004b) 臺灣社區保育的發展－近年來國內三個個案的分析，地理學報，37: 1-25。
- 盧道杰 (2004c) 傳統狩獵文化與生物多樣性保育－以屏東縣霧臺鄉為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委辦研究計畫報告。
- 盧道杰 (2005a) 財產參與及財產共有制在野生動物資源經營管理之運用 (III) 屏東縣魯凱族大武與佳暮部落狩獵文化與空間關係 (3/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委辦研究計畫報告。
- 盧道杰 (2005b) 從國土規劃與保育的面向探討原住民族地區林區及農區發展的可能性，原住民族與國土規劃研討會 (Indigenous peoples and National land planning Conference)，7 月 21-22 日，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國際會議廳，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中華民國原住民知識經濟發展協會主辦。
- 盧道杰 (2005c) 我 (我們) 參與部落地圖計畫的經驗與反省，3 月 9 日午餐演講講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 蕭代基、張瓊婷、郭彥廉 (2000) 自然資源地方自治制度芻議，森林資源保育與經營研討會論文集，林業叢刊第 126 號，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15-34。
- 蕭惠中 (2003) 一個抵抗空間的建構：馬告國家公園脈絡下的部落繪圖實踐，國立臺灣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賴俊銘 (2004) 從部落發展的角度看馬告爭議的虛實－以 Peyanan 部落為例，私立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戴永提 (2000) 魯凱族之漁撈文化，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15: 105-169。
- 謝孝同、劉小如譯 (1985) 野生動物－被遺忘的孤兒，(原載於大自然，1984，1 (3): 86-89)，野生動物保育論文集 (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生態研究室。
- 謝世忠 (1994) 山胞觀光：當代山地文化展現的人類學詮釋，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謝繼昌 (1995) 大南魯凱族的神靈觀念，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50: 1-12。
- 鍾思錦 (2000) 魯凱族百合花制度之研究，未出版。
- 簡慧慈 (2004) 權益關係人解讀保護區「共管機制」之研究－以霧巖中之馬告國家公園為例，國立花蓮師範學院生態環境教育所碩士論文。
- 顏愛靜、官大偉、李順榮、周以倫 (2005) 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與原住民族土地調查及處理委員會組織法之研究，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辦研究計畫報告。
- 顏愛靜、楊國柱 (2004) 原住民族土地制度與經濟發展，臺北：稻香出版社。
- 羅方明、裴家騏 (1997) 霧臺鄉魯凱族的狩獵習性及獵區標定，原住民狩獵傳統與自然資源永續利用研討會，屏東：魯凱族自然資源保育基金會。
- 釋傳法編 (2005) 臺灣動物之聲 2005 春季號，臺北：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

- Hobsbawm, E. J. and Ranger, T. (eds.) (1982)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陳思仁、徐文路、洪靜宜、潘宗億、蕭道中譯 (2002), 被發明的傳統, 臺北: 貓頭鷹出版社。
- Agrawal, A. (2001) Common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al sustainability. In: Ostrom, E., Diets, T., Dolsak, N., Stern, P., Stonich, S. and Weber, E. (eds.) *The Drama of the Commons*, Washington, DC, USA: National Academy Press, 41-86.
- Agrawal, A. and Gibson, C. (2001) The role of communities in 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In: Agrawal, A. and Gibson, C. (eds.) *Communities and the Environment: Ethnicity, Gender, and the State in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U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31.
- Bass, S., Dalal-Clayton, B. and Pretty, J. (1995) *Participation in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K: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IED).
- Berkes, F. (1999) *Sacred Ecology -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UK: Taylor and Francis.
- Berkes, F. (2004) Rethinking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Conservation Biology*, 18 (3): 621-630.
- Berkes, F. and Folke, C. (1998) Linking soci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 for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In: Berkes, F. and Folke, C. (eds.) *Linking Soci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Social Mechanisms for Building Resilienc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5.
- Berkes, F., Colding, J. and Folke, C. (2000)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s adaptive management,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10 (5): 1251-1262.
- Borrini-Feyerabend, G. (2003) Governance of protected areas-innovative in the air. In: Borrini-Feyerabend, G. (ed.) *Community Empowerment for Conservation*, IUCN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Policy Matters, 12, 92-101.
- Borrini-Feyerabend, G. and Tarnowski, C. B. (2005)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 "Columbus's Egg". In: Brosius, J. P., Tsing, A. L. and Zerner, C. (eds.) *Communities and Conservation: Histories and Politics of 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USA: ALTAMIRA, 69-90.
- Borrini-Feyerabend, G., Kothari, A. and Oviedo, G. (2004)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and Protected Areas: Toward Equity and Enhanced Conservation*, Gland, Switzerland and Cambridge, UK: IUCN.
- Borrini-Feyerabend, G., Pimbert, M., Farvar, M. T., Kothari, A. and Renard, Y. (2004) *Sharing Power: Learning by Doing in Co-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throughout the World*, UK: The Natural Resources Group and th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Livelihoods Programme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IED) and the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Working Group (CMWG) of the IUCN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CEESP) of 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IUCN).
- Brandon, K. E. and Wells, M. (1992) Planning for people and parks: design dilemmas, *World Development*, 20 (4): 557-570.
- Brosius, J. P., Tsing, A. L. and Zerner, C. (1998) Representing communities: histories and politics of

- 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11 (2): 157-168.
- Brosius, J. P. (2004) Indigenous peoples and protected areas at the world parks congress, *Conservation Biology*, 18 (3): 609-612.
- Dei, G. J. S. (1993) Indigenous African knowledge systems: Local traditions of sustainable forestry,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14: 28-41.
- Dudley, N., Gujja, B., Jackson, B., Jeanrenaud, J., Oviedo, G., Phillips, A., Rosabel, P., Stolton, S. and Wells, S. (1999) Challenges for protected areas in the 21st century. In: Stolton, S. and Dudley, N. (eds.), *Partnerships for Protection*, UK: Earthscan, 3-12.
- Eu, H. T. (1969) *Forest Recreation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 in Taiwan*, A projec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sis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and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USA: UNDP and FAO.
- Feeny, D., Berkes, F., McCay, B. J. and Acheson, J. M. (1990)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wenty-two years later, *Human Ecology*, 18 (1): 1-19.
- Furze, B., Lacy, T. D. and Birkhead, J. (1996) *Culture, Conservation and Biodiversity*, UK: Wiley.
- Ghimire, K. and Pimbert, M. P. (1997) Social change and conservation: an overview of issues and concepts. In: Ghimire, K. and Pimbert, M. P. (eds.) *Social Change and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Impacts of National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UK: Earthscan, 1-45.
- Gomez-Pompa, A. and Kaus, A. (1992) Taming the wilderness myth, *BioScience*, 42 (4): 271-279.
- Hales, D. (1989) Changing concepts of national parks. In: Western, D. and Pearl, M. (eds.) *Conserv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9-144.
- Hanna, S., Folke, C. and Maler, K. (eds.) (1996) *Rights to Nature - Ecolog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of Institutions for the Environment*, USA: Island Press.
- Holdgate, M. and Phillips, A. (1999) Protected areas in context. In: Walkey, M., Swingland, I. R. and Russell, S. (eds.) *Integrated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UK: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24.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IDRC) (undated) *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Volume 2 of CBNRM Social Science Resource Kit. IDRC's 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CBNRM) program in Asia, Canada: IDRC.
- IUCN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IUCN CEESP) (2003) *Community Empowerment for Conservation. Policy Matters Issue 12*, Switzerland: IUCN.
- IUCN (2004) *Can Communities Replace Guns, Guards and Fences?* News released by the IUCN at the World Conservation Congress in Bangkok, Thailand, on 21 November 2004.
- IUCN (1993) *Parks and Progress*, Switzerland: IUCN.
- IUCN (2003) *The Website of the Vth World Park Congress*, Switzerland: IUCN, <http://www.iucn.org/themes/wcpa/wcpa/wcpaindex.htm> [2006.1.23.].
- Kiss, A. (ed.) (1990) *Living with Wildlife - Wildlife Resource Management with Local Participation in Africa*, World Bank technical paper, no. 130. African Technical Department series, USA: The World Bank.

- Klemm, C. De and Shine, C. (1993) *Biological 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the Law: Legal Mechanisms for Conserving Species and Ecosystems*, Gland, Switzerland and Cambridge, UK: IUCN.
- Kleymeyer, C. (1994)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In: Western, D. and Wright, R. M. (eds.) *Natural Connections - Perspectives in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USA: Island Press, 323-346.
- Kothari, A. (2003) Community-oriented conservation legislation: Is South Asia getting somewhere? In: Jaireth, H. and Smyth, D. (eds.) *Innovative Governance: Indigenous Peoples, Local Communities and Protected Areas*, India: Ane Books, 61-83.
- Kothari, A., Pathak, N., Anuradha, R. V., and Taneja, B. (eds.) (1998) *Communities and Conservation-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South and Central Asia*, New Delhi, India: Sage.
- Leach, M., Mearns, R. and Scoones, I. (1997) Challenges to community-bas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ynamics, entitlements, institutions, *IDS Bulletin*, 28 (4): 4-22.
- Leach, M., Mearns, R. and Scoones, I. (1999) Environmental entitlements: Dynamics and institutions in 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World Development*, 27 (2): 225-247.
- Litke, S. (1998) *National Parks: Their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UK: Brecon Beacons National Park Authority.
- Martinez, A. (1995) The new regional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Saunier, R. E. and Meganck, R. A. (eds.)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and the New Regional Planning*, Switzerland: IUCN and US: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93-99.
- McCullough, D. R. (1974) *Status of Larger Mammals in Taiwan*, Taipei, Taiwan: Tourism Bureau.
- McNeely, J. A. (ed.) (1998) *Major Conservation Issues of the 1990s - Results of the World Conservation Congress Workshops*, Switzerland: IUCN.
- McNeely, J. A. (1994) Protected areas for the 21st century: Working to provide benefits to society,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3 (5): 390-405.
- McNeely, J. A. (1995)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traditional agroecosystems. In: Saunier, R. E. and Meganck, R. A. (eds.)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and the New Regional Planning*, Switzerland: IUCN and US: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21-31.
- Miller, K. R. (1996) *Balancing the Scales: Guidelines for Increasing Biodiversity's Chances through Bioregional Management*, USA: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 Murphree, M. W. (1993) *Communities as Resource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UK: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IED).
- Murphree, M. W. (1994)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In: Western, David and Wright, Michael (eds.) *Natural Connections - Perspectives in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USA: Island Press, 403-427.
- Nepstad, D., Schwartzman, S., Bamberger, B., Santilli, M., Ray, D., Schlesinger, P., Lefebvre, P., Alenvar, A., Prinz, E., Fiske, G. and Rolla, A. (2005) Inhibition of Amazon deforestation and fire by parks and

- indigenous lands, *Conservation Biology*, 20 (1): 65-73.
- Ostrom,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strom, E., Burger, J., Field, C. B., Norgaard, R. B. and Policansky, D. (1999) Revisiting the commons: Local lessons, global changes, *Science*, 284: 278-282.
- Oviedo, G. (2002) *Lessons Learned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nagement of Protected Areas by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South America: Enhancing Equ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cted Areas and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hange*, Switzerland: IUCN, <http://www.iucn.org/themes/ceesp/Publications/TILCEPA/CCA-GOviedo.pdf> [2006.1.22].
- Pagdee, A., Kim, Y. and P. J. Daugherty. (2006) What makes community forestry management successful: A meta-study from community forests throughout the world,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19 (1): 33-52.
- Patel, A. D. and Lin, Y. S. (1989) *History of Wildlife Conservation in Taiwan*, Taipei, Taiwa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 Pathak, N., Kothari, A. and Roe, D. (2005) Conservation with social justice? The role of community conserved areas in achieving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In: Bigg, T. and Satterthwaite, D. (eds.) *How to Make Poverty History: The Central Role of Local Organizations in Meeting the MDGs*, UK: IIED, 55-78.
- Phillips, A. (2003) Turning ideas on their head - The new paradigm for protected areas. In: Jaireth, H. and Smyth, D. (eds.) *Innovative Governance-Indigenous Peoples, Local Communities and Protected Areas*, India: IUCN and Ane Books, 1-27.
- Redford, K. H. and Stearman, A. M. (1993) Forest-dwelling native Amazonians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nterests in common or in collision? *Conservation Biology*, 7 (2): 248-255.
- Saunier, R. E. and Meganck, R. A. (1995) Introduction. In: Saunier, R. E. and Meganck, R. A. (eds.)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and the New Regional Planning*, Switzerland: IUCN and US: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1-6.
- Sayer, J. A. (1999) Global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protected areas. In: Stolton, S. and Dudley, N. (eds.) *Partnerships for Protection*, UK: Earthscan, 29-38.
- Scott, W. R. (1995) *Institu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Science*, USA: Sage.
- Slocum, R., Wichhart, L., Rocheleau, D. and Thoman-Slayter, B. (eds.) (1995) *Power, Process and Participation: Tools for Change*, UK: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 Western, D. and Wright, R. M. (1994) The background to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In: Western, D. and Wright, R. M. (eds.) *Natural Connections -Perspectives in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USA: Island Press, 1-12.
- Williams, N. M. and Baines, G. (eds.) (1993)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Wisdo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nberra, Australia: Centre f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Australian

University.

Wright, R. G and Mattson, D. J. (1996) The origin and purpose of national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In: Wright, R. G (ed.) *National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Their Rol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SA: Blackwell Science.

Yang, K. (2005) *Rethinking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s Social Reform: A Case Study of the proposed Magao National Park in Taiwan*, MSc thesis of Stockholm University.

Zazueta, A. (1995) *Policy Hits the Ground: Participation and Equity in Environmental Policy-making*, USA: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95 年 4 月 21 日 收稿

95 年 8 月 25 日 修正

95 年 11 月 3 日 接受

論壇一：原住民獵人說狩獵

主持人：浦忠勇助理教授（國立中正大學）

引言人：魯馬夫（布農族）

引言人：黃長興（太魯閣族）

引言人：亞榮隆·撒可努（排灣族）

魯馬夫
布農族

各位來賓好：

我是南投信義鄉布農族丹社群的青年，很高興今天有這樣的機會，能夠參加談論有關「原住民狩獵文化」的議題，讓更多人深入的了解布農狩獵文化的內涵。布農族是很守法、安份、合群、樂天，懂得與自然環境和諧生活的民族。而個人的德行經常包含在社會德性之內，部落的利益超乎一切，充滿集體主義的色彩。

一、布農族傳統狩獵禁忌

（一）狩獵前的禁忌

布農族的傳統狩獵禁忌非常的複雜，尤其是狩獵前的禁忌特別的多，只要觸犯禁忌會帶來整個家族災禍，布農族人對於狩獵禁忌是有一套的規範，從過去到現在還是有遵守這樣的 Sanu（禁忌或誠命）。

有關狩獵前的禁忌裡，其中一項常會被提到，所有要參與狩獵的獵人要和家人分開睡，也就是遠離家人到別的地方睡，例如到山上的工寮、野地、山洞等地方去睡。

獵隊在家裡前的禁忌觀點，可以歸類行動的象徵、味道象徵、聲音象徵等幾項：1.行動象徵：搗新小米是象徵新的開始。2.氣味象徵：獵人在家中不可餵食家豬，因為味道很重又臭，怕獵人把味道帶到獵場讓獵物聞到跑掉。3.聲音象徵：獵人在家中打噴嚏，是怕獵物聽到我們的聲音。

獵隊在家中也是有非常多禁忌，部落裏的耆老及獵人也主張部落有結婚、死亡、祭儀活動時，都不能去山上狩獵，這是犯了嚴重的禁忌，必須要讓這事情辦完才能上山狩獵。

在布農族各社群裡也是存在著對狩獵前的特別禁忌，例如：在整個狩獵前的儀式是很複雜，必須通過祈福儀式才能出發狩獵，如果祈福儀式不順利，代表這次的狩獵會不順利，所以必須休息幾天再重新做儀式，如果儀式順利就可以去狩

獵了。獵人狩獵時是很忌諱聊天的，筆者曾聽祖父說過：剛出門狩獵時是不能聊天，因為從部落到獵場的途中是對天神的祈福時段。

（二）狩獵中的禁忌

布農族人無論是在獵場中或前往的路途上，都有必須要遵守的禁忌，通常獵隊從家裡出發直到抵達家中，都屬於狩獵過程裡的一環，而狩獵是一項非常神聖及嚴謹的事，所以有非常多的禁忌要遵守，如：看到蛇一定要打死，才能在獵場上打死獵物

獵場是一個很神聖的地方，獵隊在獵場時是不能開玩笑，尤其是 Atmangatmang（誇大其詞亂說話）的人，是會趕走獵隊的好運；如果當中有 Atmangatmang 亂說話，則會被長輩罵，甚至會叫這個人回去不能跟去獵場。在狩獵的過程中長輩的話是最大的，所以獵隊中最年長的就是獵隊的領導，每一個獵人都要聽領導的指示。在布農族傳統裡敬老尊賢，是布農族人常常教導小孩子的課程，若是晚輩不敬老尊賢，是會被族人或家族的人所唾棄。

當獵隊前往獵場時有可能會碰到其他獵隊，這時我們要如何處理呢？筆者以前最常聽到的是長輩回來時我們要給獵物，卻還沒有聽說過要如何接受別人的獵物。花蓮丹社的老獵人 Aki Liba 這樣說：出獵時路上看到其他獵人回來，這些獵人會拿一點獵物給我們時，不能馬上吃，要在與那些獵人分開二十公尺左右，才可以休息坐下來吃，並且用小火苗將肉燻一下，同時口中要說：“Matuasumusupa”（希望可以持續都這樣獵到獵物謝謝你們），如此行後收下的這塊肉才能吃，要全部吃完，不能帶去獵場吃這是禁忌。

1. Tusungsung（語言禁忌）

在獵場中有一個特別的禁忌，就是語言禁忌，即不能 Tusungsung（直接講）。在獵場是不能 Tusungsung（直接講）獵物或物品的名稱，要講獵物及東西的名稱時，必須用 Tangsala（另外一種方式講述），否則會 Maqusbung（帶衰）的人打不到獵物。改過的名稱如：Via（配刀）改成 Siqili（刀柄）、Qidang（血）改成 Tiquis（動物和植物的血）都可以、Silup（腸子）改成 Takinaza（身體下面的部

位)、Vanis (山豬) 改成 Qaba (很結實)、Kangvng (水鹿) 改成 Mavakang (右腳左腳之間很開)、Sidi (山羊) 改成 Batu (石頭), 因為山羊比較喜歡在岩石上、Sakud (山羌) 改成 Makusiqu (很會鑽或是很滑) 的意思, 因為他們的毛很滑所以不好用手捉、Hutung (猴子) 改成 Takiluksi (喜歡在樹上)、Madisbung (槍聲) 改成 Dingbukai (裂開) 的意思、飛鼠以下小的動物都稱是 Qazang (鳥), 而小鳥真正的名稱叫 Loqi、Qanup (鳥), 狩獵時改成 MasiQazango (打小鳥), 若有人問你打什麼獵物, 便要用改過後的名稱來回答, 不可直接講原本的名稱。這樣的禁忌一直要持續到整個狩獵過程結束後才能說出原本的名稱, 所以若犯了這種禁忌, 會被罰不能吃飯或是被責罵。

2. Anaviliang (鳥占)

在布農族人狩獵中有一個很特別的儀式是 Anaviliang (鳥占) 的禁忌, 它的意思是當鳥從右飛往 Anaviliang (往左邊代表不好) 的意思, 獵隊剛從部落出發時碰到鳥從左邊飛往右邊是稱 Unavanaz (往右邊代表很好) 的意思, 此時獵隊碰到這樣的情形時要 Kainaskalnga (快樂) 的意思, 因為過去布農族認為人的右手是比較有力量的, 如果鳥從右邊飛左往邊是不好的, 也是稱 Anaviliang 這表示小鳥叫獵人不要繼續往前走, 必須要折返到部落, 或是停留休息待明日再行鳥占, 若不遵守鳥占的禁忌而強行狩獵, 結果必定是受傷或者狩獵沒有收穫。路途上看到野鳥或獵物, 第一槍一定要命中, 若打不到獵隊要折返回去。

(三) 狩獵後的禁忌

布農族狩獵後的禁忌, 是指從獵場回到返回家中, 這項禁忌是獵人特別須要留意的, 禁忌就是要獵人懂得分享。如在路上碰到上山狩獵的獵人時, 要 Masivi (分享) 的意思, 布農族人懂得分享的觀念, 不啻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想法。分享對於獵人而言是一種回饋, 無論是分享給前往獵場路途上的獵人或部落裡的族人, 都是在回應族人所給的祝福。當獵人分享所打到的獵物時, 受饋人一定會對獵人說一句 "Matuasumususupa" (這是一句祝福的話, 表示祝福獵人狩獵時都有好收穫, 並且能一直到永遠)。

獵人於狩獵結束返回部落時，會把最上等的肉放在獵包的最上層，這樣的作法有利於將上層最好的肉，如大腿、肋骨、脊椎骨，分送給路程中所碰見上山的獵隊，如此一來獵隊在路上就有菜餚可以吃了。

獵隊回到部落分肉時有禁忌：獵人回到自己的家族時，一定要把所有的獵物分給家族裡的人，惟小孩子有些 Kasamu（禁止食用）的部位是不能吃，如山羊的頭，因為怕小孩子會變瞎子或視力會變差；也不可以吃獵物 Insumang（肛門）的肉糞便出來的地方，怕會被人家 Katamalu（看不起）；Putlu（心臟）不能吃，怕小孩子心跳不會很強，走路時很快就累；Bahak（肺）不能吃，因為肺很軟怕小孩子吃了沒有力量。以前的長輩都會給小孩子吃猴子的眼睛，如此小孩子的眼睛就會 Makalsi（明亮），狩獵時能輕而易舉的看見獵物。Kasamu（禁止食用）是一個孤兒所研究的，他是被收養的。長大後喜愛狩獵也很敬愛他的養父母，為了讓養父母吃到獵物最好的部位，便研究出了 Kasamu，這就是 Kasamu 的由來。

狩獵回來時，大家分配獵物背著，即將到達部落時，他們會以呼聲的長短調來傳達歸來的訊息，並在村落附近能聽度範圍以內須鳴槍報告族人。族人聞得槍聲後，會跑出去接他們，而狩獵回來的獵人會分些燻好的獵物給來迎接的族人。

以往布農族會將所獲獵的獵物內臟直接在獵場煮了食用，剩下的肉全部用火燻烤，背回部落後再行集體分配，分配的方法有一定遵循的規則，最先獵到獵物的，以及有獵到獵物的，都有分配的規定。所有獵物必須與家族的人和親朋好友一同分享，獵人不可單獨自家享用，同時按照獵物身體的器官分送給親人及朋友，所獵到的獵物幾乎都是分給所有的族人，獵人自己只留頭、骨、皮、角等物。狩獵時如果獵場是別的家族所擁有的，必須先得到獵場主人的同意，並且獵場主人也有分到一隻前腿的資格。

二、布農族傳統狩獵哲學

布農族傳統狩獵哲學相當的豐富，在此僅想要探討談布農族傳統狩獵哲學中最為突出的部分，內容有：狩獵是多元關係連結的過程，如獵人對狩獵、獵槍、獵場的關係，其二是談論到獵人對生命的尊嚴與重視，如獵狗和獵物，最後則要討論到布農族人分享的傳統狩獵哲學。

（一）狩獵是多元關係連結的過程

布農族傳統狩獵是多元關係連結的過程，是獵人需要透過狩獵的過程與他人、或它物，有所互動關係。狩獵不是只有單向與獵人的互動，而是透過很多連結關係：如獵人與狩獵的關係、獵人與獵槍的關係、獵人與獵場的關係。

1. Qaqanuptubunun（獵人）與 Qanup（狩獵）的關係

對過去布農族獵人來說，狩獵是非常神聖的活動，絕對不能抱著開玩笑與輕薄的心態，來參與這項狩獵整個過程，因為在過去，狩獵對布農族來說是最重要的經濟生活，同時也是布農族人的生活的一個部份。布農族社會裡是以群體家族為主，也就是群體的生活模式。在過去布農族的觀念裡，家族是所有事物的權力核心，所以布農族在決定每一件事，都是經過家族會議決定之後才能去執行的。

獵人在狩獵的當下，即一個生命教育哲學，也是生命教育旅程，狩獵教導布農族獵人如何尊重長輩、及尊重自然生態，藉以達到人與狩獵之間的關係，有所互通與連結，並且也讓獵人習得在獵場上如何和自然生態學習在獵場並存的功課。本人和多位獵人在交流的談話中，曾論到何以在狩獵期間必須遵照長輩所教導的話語去行，很有默契的，我們的看法一致是認為長輩的經驗是非常的豐富，獵場中有很多事情是非常危險且無法被預期的，例如在獵場裡並非所有的水都可以生飲，特別是由鐘乳石流下來的水是不能生飲的，因為在獵場的水含太多礦物質，喝多了容易導致腳抽筋而無法走動，所以含太多礦物的水，必須煮過才能喝。以上例子都是長輩們過往的經驗談，這些寶貴的經驗都是會傳給下一代的獵人，如果新一代的獵人不懂得尊重長輩及虛心請教，或許長輩就不願意教導、傳授這些智慧及寶貴的經驗。有些智慧則是藉由自然生態來被啟示、被教導的，當獵人看到山林就如同想到母親一樣，山林教導獵人獵物都是山林所養育的，所以我們要用敬畏的心來對待山林，更不能破壞自然生態環境，否則棲息在其中的所有獵物就沒有可生存之地，因此獵人在獵場上是不會砍樹林、也不會帶著違害山林的物品，只帶著一顆敬畏的心去學習如何狩獵。

達西烏拉鸞·畢馬所著的《台灣的原住民—布農族》書裡有著不同的觀點：狩獵是以前台灣原住民取得高蛋白質營養的方式，所以狩獵也是生存的最原始方

法，同時更為一種「生命學習」。狩獵在青春時期階段，是既可以展現出智慧，又能夠使勇氣成長與親身經歷體驗的表現，同時擁有社會地位的肯定，獵到的獵物不是只由某一個獵人所獨享的，而是讓家族裡的長輩來分配獵物，叫家族裡的每一個人都能來分享。布農族人對狩獵英雄非常的尊敬，乃看做男人中的男人意思。作為一個優秀的獵人，除了必須具備智慧與堅忍的精神外，在深山荒林裡，不但要克服惡劣的自然環境，還要與各種獵物鬥智慧與比力量。因此，獵人除了在獵場狩獵，除此之外還要學習生命的意義和精神的價值。狩獵的智慧與技巧，在於要能洞悉動物的習性、氣候、地形，以及善於利用獵具。很會狩獵的獵人，往往都是女孩子心目中結婚的理想對象。過去布農族獵人的生活非常艱苦，男人少年時即要跟著 Madaingaz（長輩或自己的父親），學習 Hanup（狩獵）的各種技巧；必要時為了追獵物，兩三天都無法進食，甚至連水都很少喝。長輩們訓練小孩子也是希望能夠在大自然的環境下得到技能，在狩獵過程中倘若小孩子獵不到獵物，有些長輩很可能就不給小孩子飯吃。其實，最為嚴格的教導，大都是挑水、煮飯、學習清洗、處理獵物、燻烤獵物等，這樣的教導小孩子最主要也是期望他們能夠從中學習狩獵的生存技能。¹

所以，獵人與狩獵的關係中，存在著一個獵人與長輩、獵人與自然生態的關係，而這些關係隱含著敬畏的心，但獵人本身所學習的則是一生的道德品格。如果沒有長輩教導過去的經驗，也許新一代的獵人是無法與大自然共同生存的；如果沒有山林的教導，或許過去的布農族獵人是無法得著狩獵的哲學。

2. Qaqanuptubunun（獵人）與 Busul（獵槍）和 Busulqahqha（弓箭）的關係

在過去布農族人狩獵，獵槍是最重要的伙伴，換句話說就是意味著獵槍要和獵人結合，才能發揮獵槍的功能。過去獵人是相信獵槍是具有生命的，不可對獵槍不尊敬，因為獵槍是保護生存的工具，所以獵人出發到獵場時，Busul（獵槍）要改成 sikut（拐杖）來稱呼，這是一種尊敬它的象徵。再者，不能任意丟棄、唾棄和輕視獵槍，以及跨槍、嘲笑獵槍等動作，若犯了這些禁忌，獵槍主人會因而打不到獵物，又偷獵槍者會誤傷自己或其他人，於是在過去是無人敢偷獵槍。

¹ 達西烏拉彎·畢馬，《台灣的原住民——布農族》（台北：臺原，2003），頁 126-127。

另外，過去布農族人的獵槍都是經過祭司團的祈福儀式，而祭司團的祈福儀式中也有下咒詛，所以女人、小孩子、偷獵槍者、或其他人，摸了這把獵槍會 Tis qavit² 中咒詛，之後會不斷咳，直到咳到吐血而死亡的。

每年舉行一次的打耳祭活動裡，必有這樣的祈福儀式，獵槍在祭過以後就不能隨意的觸碰了，通常獵人會把獵槍放在爐灶上的高處，一方面用煙燻的方面讓獵槍保持乾燥、以防蛀蟲咬槍托，另一方面是避免女人、小孩觸摸，當女人、小孩以及偷獵槍者觸摸了獵槍，一定會 Tis qavit（咒詛）。新完成的獵槍或是剛買回來的獵槍，都必須在打出第一槍時打到獵物，否則往後就會射不準；倘若獵槍在第一次打出時便打到獵物，則必須用獵物的血沾在獵槍的槍托，並且口中念著：希望以後都可以這樣打到獵物。獵人假使打錯到獵狗，或差點誤傷人，獵槍就必須送給其他獵人，原本的獵槍主人不能再使用這支獵槍了。

在布農族還未擁有獵槍時，獵人都是使用弓箭來狩獵。使用弓箭必須是從小開始經常使用，因為它必須用相當大的臂力來操作，並且準度也是要常常練習才可以很精準的，因為弓箭並不像獵槍那麼容易，只要瞄準槍管就好了。使用弓箭的好處是布農族人可以自己製作，然而獵槍和火藥就必須向漢人購買，這是一筆很大的開銷。本人曾聽祖父說過，在他們的時代裡一支獵槍的價格約在三仟元左右，所以過去的獵人看待獵槍是如同寶貝一般。當時布農族人對獵槍的觀念，不僅止於它是一個物體而已，而是相信獵槍具有生命，因為獵槍與獵人的結合，是會產生一個生命的共同體。獵槍和獵人不契合時，就會讓獵人打不到獵物，甚至是誤傷到其他人或獵狗，所以布農族人相信每一支獵槍一定有相契合的主人。當獵槍找到合適的主人，會帶給主人好運，也就是好收穫，就算獵槍是用借的也是同樣的信念。在過去借獵槍者狩獵回來時，一定要分一點給獵槍主人，從這一點可以得知，獵槍是被看成有生命的一個物體，因為獵槍能夠帶給獵隊好運，以及豐盛的收穫。這樣的好運都是獵槍帶來的，好運是藉由獵槍轉給獵人，讓獵人能

² Tis Qavit 在布農族中咒語，因為過去布農族人每年的打耳祭和狩獵前，會把獵槍拿到祭司面前做祈福的儀式，而祈福中祭司會下咒語，所以女人、小孩子、其他人都不能觸摸，會受到咒語的傷害，會一直吐血而死亡。

有好收穫，這就是為何布農族人不能講獵槍的壞話、看不起，甚至是任意丟棄獵槍的原因，這些都是對獵槍的不尊敬。

3. Qaqanuptubunun (獵人) 與 Qanupang (獵場) 的關係

布農族狩獵哲學中有一特別的關係，就是獵人與獵場的關係。在布農族觀念中獵場是一個家族的財產，獵物則是在該家族的土地上被養育的，養育獵物的主人是 Dihanin (天神)，所以獵場中的獵物是不能浪費的。

以往布農族獵人為了獵場會起爭吵及相互獵首，這才促使布農族人制定獵場的分界線，界線是以自然地形的山脊、山峰、溪谷、岩石等為邊界，有的是以疊石頭壓茅草為 Paqan (界線)，表示界線狩獵時不能越區，當獵人看到 Paqan 為界線的記號時，獵人就不能越過界線狩獵，這樣的制度是防止獵人到其它家族的獵場狩獵。³過去狩獵時曾經用獵狗來追獵物，若獵物跑到其他家族的獵場，捉到獵物時是要跟該家族的人一半，倘若不分獵物給對方，這是很有可能會引起戰爭。獵場如同獵槍的觀念，也可以跟某家族的人借，不過有一定借用的相關規定；到其它家族的獵場狩獵必須帶獵場的主人，或是對該獵場非常熟悉的人，很理所當然的，原獵場的主人會被選為這次獵隊的領導者，假定這獵場的家族裡沒有人可以帶領時，就必須詢問原獵場的主人，在該獵場上狩獵時有沒有必須注意的事項，大致上所問的不外乎是獵寮、水源⁴、Daqdaq⁵ (溫泉)、及獵物常覓食的地方，詢問好之後就可以安心的出發前往獵場。當狩獵結束，獵隊回來時也要給原獵場主人一些獵物，這是借獵場的規定，如果不分一點獵物給出借的獵場主人時，該獵場的主人就不會再借獵場，這樣的觀念與借獵槍是同樣的。布農族人的獵場是如何劃分呢？布農族有五大社群，而每一個社群擁有專屬自己的傳統獵場，例如丹社群擁有所指定的大區域獵場，但是丹社群是由很多家族所組成的，所以丹社群的大區域獵場會劃分成多塊小區域獵場，再分給丹社群裡的各個家族，這便

³ 達西烏拉彎·畢馬，《台灣的原住民——布農族》(台北：臺原，2003)，145。

⁴ 在狩獵時水源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獵隊和獵物飲用的水源，所以獵物也會在這裡出沒。

⁵ Daqdaq 布農族語是指舔東西的意思，而在布農族狩獵觀是指溫泉意思，但在布農族長輩的教導 Daqdaq 是獵物的酒，獵物只要舔了 Daqdaq 就比較笨很好捉。而獵物為什麼很喜歡到溫泉，因為溫泉所流出來水都含有大量的礦物質，也就是溫泉粉。布農族的狩獵觀認為溫泉粉是獵物的鹽巴，因為獵物也需要鹽分，所以會去舔溫泉粉。

是布農族傳統獵場的劃分方式，藉由這樣的劃分方法可以讓每個社群不會超越自己的可狩獵範圍。

綜觀以上的觀點，布農族人的長輩是為了後代子孫著想，避免想狩獵卻沒有獵場，甚至是獵場上沒有動物可以狩獵的窘境發生，這樣的觀念代代相傳，使用獵場及獵槍的方式也同樣不斷延續的教導晚輩，直至到現在。縱使布農族獵人追求「英雄」的稱號，但是絕對不會為了虛榮的名號，而將長輩所教導的傳統狩獵觀念拋在腦後，繼而把獵物全部獵盡，布農族人乃是把握獵得足夠生存的數量即可得到溫飽。在這布農族人休獵的觀念裡，獵物就可以得以永續生存，這便是布農族獵人的自然生態法則。借用其他家族的獵場，這般的觀念內容說明了整個獵場是屬於布農族人所共有的資產，而非單單由某個家族來獨有、獨享，即使整塊獵場被劃分為許多的小區塊，不過獵場是可以互相借用的，只是借用的獵隊要分配一份獵肉給原有獵場的主人。所以筆者常常聽長輩們說：因為用尊重的心態與遵守自然法則的方式來狩獵和看待獵場，自然獵場裡的獵物是永遠打不完的；獵物不似家畜是被圈養的，乃是在天神所創造的大自然生態裡被養育著，是能夠自行移動到不同的獵場覓食。

（二）生命的尊嚴與重視

在布農族傳統狩獵哲學裡包含有對生命的尊嚴與重視！在此討論 Qaqanuptubunun（獵人）對 Tismumut（獵物）的尊重。

獵物是過去布農族人所需蛋白質的來源，每年的夏天、秋天時各家族的獵人就相約狩獵。春天、冬天不是狩獵的好時機，春天不能狩獵是因為正是獵物繁殖的時間，而冬天乃由於果樹不長果子，獵物不會走動覓食。布農族人對獵物的觀點，有著非常特別的看法，獵物是布農族人主要食物的來源，所以對獵物是非常的尊重，不能夠把狩獵到的獵物留置在原地，任由獵物慢慢腐壞，這是犯了嚴重的禁忌，因為若沒有獵物的犧牲，就沒有今日的布農族人。

本人曾與部落的長輩談過，有些獵人違反禁忌，而遭到天神的咒詛當場死亡。事因起源於這些獵人狩獵到水鹿後，卻只取水鹿的鹿茸，而把水鹿留置在獵場原地，任其水鹿屍體漸漸腐爛。對布農族而言，獵物是有 Isang 生命、靈魂，獵殺

太多獵物，獵物也會反擊。Dihanin（天神）會 Pidila（破壞），整句翻譯是天神會處罰，所以獵殺太多動物時，天神會處罰我們。這些獵人們因為獵殺公水鹿，卻只拿公水鹿的鹿茸來賣，並任其屍體慢慢的腐壞，這樣的行為是會受到天神的懲罰。不帶走動物而讓動物的屍體任意腐爛，這是非常不可取的行為，更是犯了最大的禁忌，必定會因為犯了天神的禁忌而受制裁。以往這一項禁忌是長輩教導後代獵人中最為重要的事情，務必要把獵物看為寶貴，每一塊肉都不能浪費，不論用怎樣的方法一定要把獵物全部帶回家，不可棄之不管而任其腐壞，即使肉已腐壞也要拿一部份帶走；如果著實無法將整個獵物背回去，也須把剩餘的肉用燻烤的方法保存，並且回到部落時召集族人回到原地，撿回那些獵物，因為狩獵是不容易的，打到獵物更為難得的，一都是天神所賜，也是天神所 Sinaipuk（養育）的，我們更是不能 Masalaz（浪費）。

隨意讓獵物留置在獵場而任其腐壞，在過去這些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不過現今在資本主義的衝擊下，的確讓布農族獵人失去了自己的尊嚴及犯了狩獵的禁忌，只關心利益上的課題，卻破壞了禁忌及自然生態法則，這使得目前的布農族獵人，開始共同擔憂活在資本主義下的布農族獵人，會如何一再的去抵觸禁忌與破壞獵場環境的平衡生態。

（三）分享的傳統狩獵哲學

布農族人有一個很好的狩獵哲學，那就是分享。分享的觀念在過去布農族社會裡是常常被應用到的，尤其是在狩獵時最為顯著。在之前也提及過去獵人們在前往獵場，或回來部落的途中如果碰到其他的獵人，獵人們會互相分享食物或獵物。

當獵人分享獵物給家族的人，甚至其他獵人時，會常聽到回敬的祝福話。誠然，布農族傳統獵人聽這樣祝福的話時，早已將前面辛苦狩獵的過程拋到九霄雲外，心底更認為所有為狩獵所做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回敬祝福的話便是對獵人最好的回饋，想當然爾，這一句話對於獵人是非常重要的，若說是無價之寶也不為過，著實是由於這句話帶著族人滿心的祝福和鼓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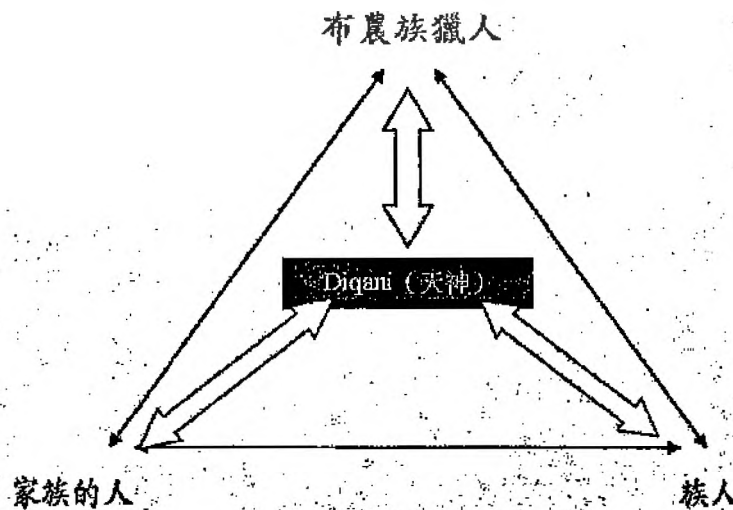
過去布農族人這樣的分享制度，是人與人之間維繫生活關係的方法。只是，本人常常聽到非布農族人表示，倘若布農族人的分享是採用這樣的制度，肯定是會吃虧，然既然過去布農族的傳統分享的制度能夠流傳至今，一定是有其原因的。或許布農族人有利他主義的想法，鮮少為自己思量，只顧及他人的利益，這便是布農族人傳統分享的哲學。也可以這樣說：布農族人的分享哲學就是共享制度。所以布農族人利他主義的個性，是屬於互助合作的美德。

所有布農族人的傳統分享哲學，自存在著一套的規則，這是每一個布農族人所要共同遵守的制約，特別可以在狩獵哲學裡發現，並且也是最為明顯的。分享在獵人的觀念裡是超乎經濟利益之上，不是擁有金錢就可以得到，好比只要一句祝福的話，這對於獵人而言便是無價的祝福。布農族的分享制度，更是在在的影響著獵人的地位，過去布農族男人主要的工作是狩獵，於是常常獵到獵物的獵人，以及獵過首的都被稱做 Mamang（非常狠的人、勇猛的人、超越常人），也是指 Bataztiti⁶（很會狩獵的人），意即獵物的終結者，這樣 Mamang 的人在以前的布農族社會是被受尊敬的。當部落裡的族人們一起飲酒時，第一個飲酒的就是這些 Mamang 的人，打耳祭時也會叫他們一同跟祭司團祈福，所以在過去 Mamang 的人是很有地位的，因為他們對部落有貢獻，而且 Mamang 的名聲是會流傳到後代，也間接影響著後代子孫的地位。

最後感謝貴單位的邀請，不但能藉著這場合，讓非原住民族群的朋友，對狩獵文化不再只是表面上的認識，可用更多面向的看見狩獵意涵，也能很榮幸的與其他來賓有所交流。

⁶ Bataz 布農族語是指殺人、殺獵物等，但是在狩獵時，是指殺獵物的意思。Titi 布農族語是指所有的肉，但是狩獵時，是指獵物的意思。

布農族人的分享觀三角形解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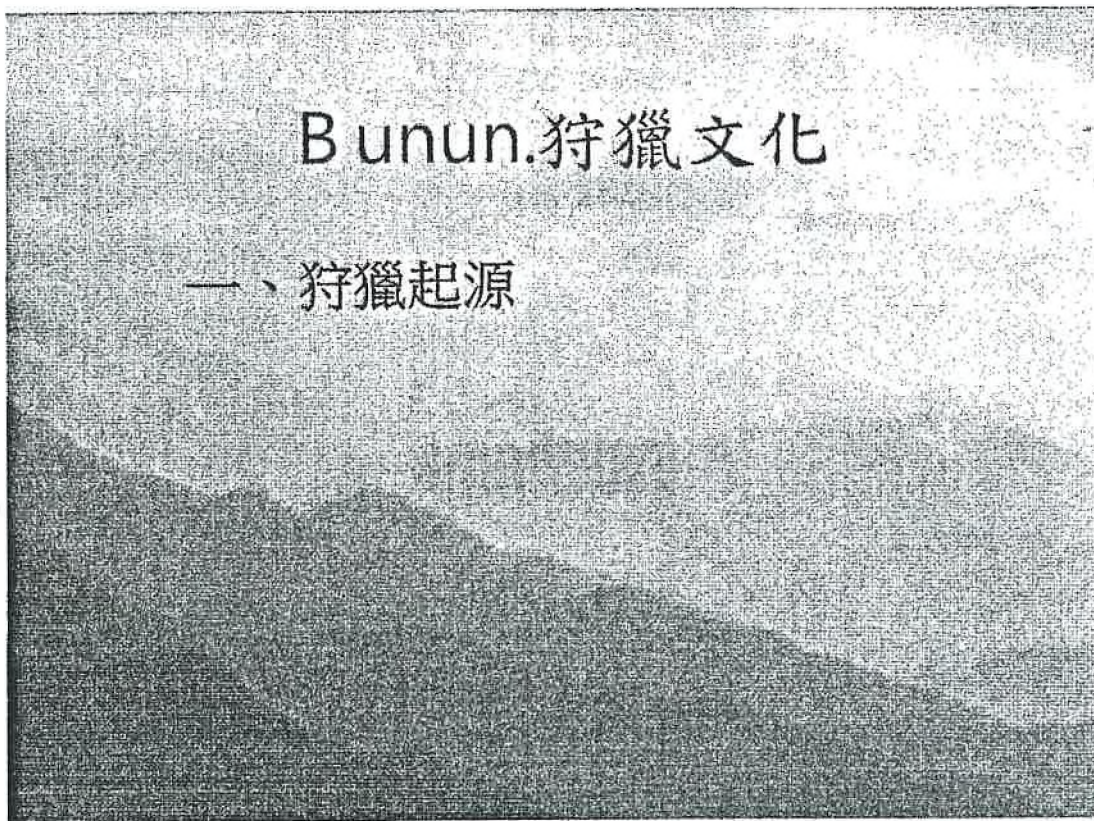
※布農族人的分享觀三角形解釋圖說明

Diqani (天神) 是在分享觀三角形圖中間，而 Diqani 在布農族人的觀念裡，是掌管者和創造者。Diqani 還有特別的功能就是回應和祝福布農族人，所以圖中的粗箭頭就是被分享者向天神祈求祝福那分享者，天神也必定施予祝福給那願意分享獵物的族人。

外圍的角色代表者每一位族人士分享者，亦是被分享者；因著布農族彼此的分享與接受，而受到天神的祝福與庇祐。

Bunun. 狩獵文化

一、狩獵起源



二、獵人狩獵禁忌



三、獵人的狩獵哲學

1、狩獵是多元關係連結的過程

* Qa qanup tu bunu

(狩獵) 的關係

* Qa qanup tu bunu

Busul qah q

* Qa qanup tu bunu

(獵場) 的關係

2、生命的尊嚴與重視

布魯族人對 Qa qanup tu Asu (獵狗) 的重視

tu bu

munut (獵狗)

(獵狗)

的尊嚴

分：傳統經營哲學

Matu asu mususupa (希望你們
到獵物謝謝你們)

Matu asu mesusupa (希望孔武特
到獵物謝謝你們)



狩獵文化與生態智慧

Lowsi · Rakaw (黃長興)

一、導言：

(一) 原住民的生活形態：

臺灣原住民族迄今雖然已有部份少數的族人從業於工商或公教事業，或服務其他行業而移居都會區，但絕大多數仍然居住於山區或山麓地帶，族群社會生活的各種活動和生活習俗，脫離不了與大自然及野生動物為伍，因生活環境所趨，傳統的「狩獵活動」，是山區生涯的主要活動，因而在生活方式、習俗、戒律、禁忌等社會規範，均與山林的大自然環境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關係，長年生活習性的歷練，養成了族人尊重自然的共識，而形成別具一格的「狩獵文化」。

昔日族人以登山狩獵為征服山林的看家本領，男人馳騁高山原野的叢林生涯是英雄作為，淵源於狩獵習俗的許多戒律和忌諱，主導了族群社會的生活規範。今日族人的狩獵行為，則已成為男人在山林中最引以自豪的業餘活動，也是最具體的全能運動。

臺灣原住民族上山下海的傳統漁獵生活方式，大致相同，也各有特色，雖因社會環境的改變與進步而稍有變遷，但永與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生活理念，並無太大的改變，凡族人涉水越嶺特殊的生活方式，迄今依然是各族人們健身活動的最愛。

(二) 狩獵文化的內涵和影響：

在臺灣的原住民而言，狩獵文化是傳統文化的主流，蘊涵有深厚的社會文化的意義，從獵人的資格與條件、獵區的劃分管制、獵場規範、狩獵習俗與禁忌等各項的全面結合，構成一套嚴密而完整的生態保育文化體系，以嚴格的進山禁忌和戒律，為社會生活規範的主要依據，如主導著 Truku 生活習俗的『Gaya』，深具有族群傳統生活勸人向善的造化作用，是昔日族人社會規範的主要依據。

今日受到社會環境及現實經濟價值的影響，曾經主導族人社會規範及造化人性向善的狩獵習俗和各種禁忌戒律，卻已受到嚴重的衝擊而逐漸被淡忘失傳，以維繫山林生態與培養族人對自然資源永續利用觀念的獵區劃分制度，亦因政策的歧視與錯誤，而完全瓦解。

因此，傳統的狩獵文化，除了狩獵技術方面部份尚有留存外，其他則迭遭世風日下的現實環境，確已面臨了失傳變遷的命運，狩獵習俗也已失去了影響力而致造成族人社會風氣的日趨墮落與腐敗。這是今日臺灣的原住民狩獵文化的普遍現象，東臺灣地區的原住民，雖居於曠野山林的向陽前山，其狩獵文化同樣也難免被波及。

二、狩獵文化與生態保育：

（一）獵區劃分與管理：

在傳統的狩獵習俗中，各個族群的狩獵區域，都有嚴格的劃分和管理，從家族到各族群之間，都擁有自己的獵區，所有的狩獵活動，絕不能逾越進入他人的獵區，也不容他人侵入自己的領域，壁壘分明，互不侵犯，自己的獵區的狩獵活動，就像田園運用一樣，由家族的獵人共策規範，嚴密管制和保護，以維護生態的永續利用。

以太魯閣族人而言，傳統獵區的劃分是整體性的，從家族與家族，到族群與族群之間，均有嚴格的規範，保護與管制各自的獵區，絕不讓他人進入自己的獵區，自己也不能踏入他人的獵區。在獵場的運用方面，小至各家族亦均有輪流進獵的規則，每年只能進入一個獵場，以滋繁獵場的生態狀況，俾利族人獵場上的永續利用；一個擁有三個獵場的家族，其每一個獵場，開放入山狩獵的時間是每三年一次，這種的狩獵規範，是太魯閣族人必須信守的社會規範。

此俗乃寓意族人對大自然的尊重和敬意，訓練族人的狩獵技能，嚴守各項入山的禁忌，在上山進獵之前，必須先詳細熟悉獵區的生態狀況，精練各項狩獵與登山技術，俾使獵者能以精湛的獵法，在預期的時間內，獵捕鎖定的獵物，有嚴格的節制戒律，絕不任意濫捕濫殺。這就是臺灣山區雖曾歷經千百年來原住民各

族群的狩獵活動，因受世代族人嚴格的生態保育規範，族群生活領域上的獵物生態狀況，依然相當興盛。

對獵區糾紛的處理，大致由部落長老協議決定。太魯閣族例外，各家族承襲先祖領域獵場，家族之間，彼此均有嚴密的協議，嚴守獵場規範，少有獵區糾紛。一旦發生侵入他人獵場，多循以兵刃相見解決，日據時期起，改由日警處理，是理性處理紛爭的開始。

唯此獵區管理制度，從國府遷臺後就完全被否定而瓦解，臺灣山區一天內可往返的近程山區獵場，頓成獵者暢為所欲為的公共獵區，太魯閣族傳統領域內的遠程獵場，目前仍有部份後裔獵人守護。

(二) 禁獵規範：

1. 禁獵時節：

概略在春夏兩季，是保育期和天然效應所形成停止狩獵時期。凡原住民的獵人們，在這段時間鮮有冒險上山者。

2. 禁獵習俗：

(1) 族群的都有嚴格的禁獵習俗，以太魯閣族人而言，家族中遇有婚喪或有重大意外事件時，則須全部停止一切上山的所有活動，以避免滋生意外。若獵人親生父母過逝，則此獵人必須停獵兩年以上。這是神靈所賜的自然保育時期，不容違悖。

(2) 進山前、進山途中、獵場上、狩獵回來後和獵物之處理等，均有各式各樣的狩獵禁忌，真正的獵人，必須嚴守自律。

3. 獵物禁食習俗：

不食幼小動物，與春夏季禁獵息息相關。另外禁食獵物中的腦、眼睛、橫隔膜、睪丸、尾巴等禁忌多與保育和獵物永續利用有關。

4. 目前獵區的進獵規則

國府遷臺六十年來，族人在山區的传统獵場，均已悉數先被劃歸林務局管制，或以各種莫名奇妙的名稱被列入「禁區」，而實際上是仍然承接日人侵占族人生活領域，有計劃的官商勾結，逞其大舉「濫伐」、「濫墾」及「石礦濫採」；半個世紀以來的恣意破壞，確已釀成臺灣生態的嚴重癱瘓，造成數十年來此起彼落的土石流慘狀，動植物的生物鏈失去依附關係，而致使許多原生動植物的絕種，將這滔天的生態破壞栽贓於原住民的狩獵活動，類此代罪羔羊的角色，正是今日「狩獵文化」令人扼腕憤慨的窘境。

尤其目前到處設置「國家公園」和公布所謂的「保育法」，特別雷厲執行於各個山區的原住民社會，在執法單位的眼裡，族人「登山狩獵」是犯法的行為，而「開礦」、「濫墾」和林務局的「濫伐」等真正破壞生態的官商行為，均在合法範圍，永無止境的繼續蔓延。原住民尊重自然與保護農作物的狩獵行為，卻被視為犯法行為，一意孤行著迫使族人終止「狩獵活動」的愚民政策。

事實上，由於以上政策的嚴重偏差與誤導，根本不瞭解原住民「狩獵文化」的真諦和內容，造成族人對政府的反感和不信任，縱然有保育單位的嚴密把關看守，而族人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的狩獵活動，仍然有增無減，族人們依然照常的活躍於高山原野之間，狩獵活動仍然是山區居民的主要生活方式，因為這是族人珍貴的「文化遺產」。

因此，族人進山的狩獵活動，從未終止，更因獵區劃分的解體，全台灣的山區自然成了「公共獵區」，原住民獵人詭譎神秘的狩獵活動，數十年來的行蹤幾乎遍跡臺灣山林。惟在獵場規範中的進獵規則，於秋冬狩獵期間，獵場之所屬，端視獵者入山之先後而定；誰先進入此獵場從事狩獵活動，則此山區獵場即屬於此獵者，後來陸續進山者，若未經前者之容許，須自動撤退。所以在獵前偵察時，必須詳為觀察獵場狀況，若發現有他人新開的獵徑、捕獸陷阱、獵寮等情事時，則應即離開此獵區，擇日另尋獵場。或者，在進山時，先探詢其他獵者們各人的獵場，獵者之間先行協調，決定本期進獵地區，在獵前偵察時在現場詳為規劃分配，多於夏末秋初實施。

無論是近山或遠山，類此獵場規則，正是當今獵場規範中獵區運用的實際現況，目前族人中真正的獵人，均能奉行誓守之。

（三）從熟悉獵物的習性洞察動物的生態：

1.摘要介紹目前常被獵捕的野生動物

（1）長鬃山羊

（2）山羌

（3）臺灣野豬

（4）飛鼠

2.狩獵時節：

（1）狩獵季節

每年的秋冬兩季，群山是一片林木茂盛，蒼翠蓊鬱，山區裡的獵物們時值秋高馬壯的活躍於山林原野，又因正逢農閒時期，是世代以來族人的「狩獵季節」，每逢此獵季，獵人們就會四處進獵，前往各自選定的獵場，獵捕所需之獵物。時至冬天下雪期間，中央山脈屋脊線上的寒帶高山地區，偶有獵手為捕捉山羊而須付出高度的耐寒體力，近山微寒地帶才是熱門獵場，最適獵手們登山遊獵樂園。

目前的獵手們，其主要獵捕的對象，大型獵物以山豬、山羊和山羌為最多，在小型的獵物方面，則以樹棲類的鼯鼠和鳥類的竹雞較為多見，其他的飛禽走獸中，偶會遇見者尚有很多，因非獵捕之對象，故予以省略。

多數族人的登山狩獵，並非以殺戮獵物而為，而是以鍛練強健的體魄和承繼祖傳的膽識和勇氣，踏遍高山原野，培育族人珍貴的山林在地智慧和特殊的登山技能，領受向太陽、風雨和艱苦地形挑戰的經驗，與風雨共舞，砥礪族人們征服大自然的特有本能。

（2）禁獵時段：

春夏兩季，原為禁獵季節，今日卻因社會習俗與客觀環境的更易，獵人們已不太重視季節禁獵的規範，尤其在山麓地區的農園地帶，保護農作物的方法，狩獵手段仍然是最佳的有效措施。所以於春夏期間，近山低海拔的山區裡，族人們的狩獵活動，並未停止。此期間仍以山豬為主要獵捕對象。

其他獵物因在熱天下易於腐爛而停止獵捕，尤其在夏季烈日的「天然效應」；颱風頻繁、毒蛇猖獗及瘴癘之禍，為獵人最所忌憚。

（四）以登山技能與生態智慧為重的狩獵活動

1. 登山技能與生態智慧

（1）獵人的條件：

精通登山技能是進山狩獵的先決條件，在崇山峻嶺的叢林莽原中，凡越嶺開路、攀岩、尋找水源、獵寮搭建、天候觀察及動植物識別等，皆有其特殊的本能和生態智慧，而獵人靈活的身手與熟能生巧的使用各種獵具，才是獵人的基本條件。

（2）開設獵徑的特色：

獵人在山林中的狩獵活動，獵徑的開設是方便進出獵場的主要手段，由入山口直驅獵場，獵徑之開設有沿用遵循先祖舊有獵徑，亦由當代獵人依地形和生態狀況而另開設新獵徑者。

如太魯閣族人登山獵徑的第一個特色是與山陵的坡度平行直線而上，凡前往山頂方向前進的路線，必定只向攻頂的目標抄近路直線而上，以考驗獵人的體力和耐力，縮短進出獵場的距離，節省狩獵的時間。而在獵道的整建部份，除主線獵道外，餘其他支線獵徑，僅重點砍除擋路的樹枝和少許的雜草，所砍取下來的樹枝和雜草，亦須妥為藏好，維持獵區的自然景觀，以避免驚動獵場動物生態。另沿路裸露於峭壁上的樹根、枝幹、茅草等，均須妥為保護留存，俾作獵者攀爬時之支撐依附及強固土質防止山崩之需。

其次是於追獵或陷獵時，獵徑之開設，以不用刀為原則，僅以雙手擲開雜草樹枝穿梭而行，或折樹枝、茅草作記號，遇溪谷時有壘石塊為記號者，以方便後者跟隨和回程的識別記號。

2. 獵人的生態智慧：

(1) 入山忌諱：

- A、炎夏烈陽下，能迅速消耗體力，易疲憊濕熱而患瘴癘之禍，又有毒蛇、毒蜂出沒，此時期宜全停止入山狩獵活動。
- B、陰天突然大地一片稱呈色，氣溫又特別悶熱，為颱風即將來臨之前兆，若身在身山中時，須立即下山，以免被困在山中。
- C、颱風山洪爆發災後，所有獵徑、獸徑全毀，山崩地裂，林木倒塌折斷現象，必須暫停入山。
- D、因季風或梅雨而造成滂沱大雨不停，獵徑安全堪虞時，亦不得不暫停登山活動。

(2) 入山裝備的攜行，端視各人體力、目的、距離遠近，所須時間和交通路況等而定。

(3) 山中取水之道：

- A、山溝、溪谷、凹窪地區和潮濕的岩壁等地帶較易能找到水源位置。
- B、山嶺中凹地縱橫，林木茂盛的灌木或闊葉樹地帶，而常有雲霧彌漫的山谷叢林地區，易能找到水源。
- C、晴朗的天氣下，鳥類經常聚集的叢林地區，經常是水源的位置。
- D、在山野叢林裡的窪地區域，若到處有野豬挖翻的痕跡或獸徑密集之處時，附近必有水源。
- E、高原草坪形的窪地位置，經常是天然的積水區（天池）。
- F、裸露的枯木樹洞或岩石凹洞等，雨後必有豐富的壙擠集水（Tgnu）可飲用。

G、芭蕉的嫩心含有多量的水份，雖帶有澀味，但在缺水的狀況下，吸吮此嫩蕉心時，確有解渴之實效。

H、水桐樹 (Tmaq) 切皮取水法。

(4) 動植物識別 (區分低、中、高海拔各山區，獵人進入山林須先熟悉此山之生態狀況)。

(5) 方位辨識 (各族在山林中各顯神通，鮮有獵人在山中迷路者)。

3. 詮釋太魯閣族人的 Bhiring (長期在山中觀察領悟出來的“靈力”或稱“獵魂”)。

4. 生態識別中的跟蹤術是獵人的特有技能，歷年來在艱苦的山難救護或天然災害救難任務中發揮其頗具效率的功能，非一般教育訓練所能抵，須自幼長期活躍在山林獵場中培育養成，若以目前政府禁獵的政策而言，這珍貴廉價的人力資源就將消失在我們的國度裡。

三、結論

狩獵活動是台灣原住民世代以來文化習俗的生活常態，並非須以「祭典」為由才能進山狩獵，日據時期也沒有這規範，是近年來國民政府誣蔑族人狩獵文化所制定的行政手段，根本不瞭解原住民的文化精神和生活習俗，既不溝通亦不願到部落現場實際瞭解，這種政府將如何取得民心？

狩獵文化與生態智慧

黃長興

壹、原住民的生活型態

- 原住民社會生活的各種活動和生活習俗，世代以來居住於山區或山麓地帶。長年與大自然及野生動物為伍，在生活方式、習俗、戒律；禁忌等社會規範，均與山林的大自然環境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關係，在獵場生涯中培育了豐富的生態智慧，長年生活習性的歷練，養成了族人尊重自然的共識。

而形成別具一格的「狩獵文化」。

貳、狩獵文化的內涵和影響

- 狩獵文化是教育、訓練、運動、信仰及人格培育的基礎，從獵人的資格與條件、獵區的劃分管制、獵場規範、狩獵習慣與禁忌等各項的全面結合，構成一套嚴密而完整的生態保育文化體系，狩獵文化嚴格的進山禁忌和戒律，為社會生活規範的主要依據。

- 族人以登山狩獵為征服山林的看家本領，男人馳聘高山原野的叢林生涯是英雄作為，淵源於狩獵習俗的許多戒律和忌諱，主導了族群社會的生活規範。目前仍然是族人在山林中最引以自豪的業餘活動，因為進山狩獵是最具體最廉價的全能運動。

參、狩獵活動中的生態智慧

一、氣候變化的觀察：

- (一)夏秋季時節白天大地突然一片呈紅色，氣溫又特別悶熱，為颱風即將來臨之前兆，不宜進山活動。
- (二)容易起雲霧的山嶺(山谷、山角或山腰地帶)，常有水源。
- (三)陣雨須過後的炎陽普照，坍塌地帶在風勢較強時易起山崩落石。
- (四)下雨時清澈的溪水突然變成混濁黑水，上游有大水下來，快速撤離溪谷溪邊。
- (五)遇圓月時不易下雨，可進行登山活動。

二、草木生態的利用與維護

- (一)伐木時節宜在十月至次年二月期間，俾利再生成長。
- (二)造林育林須視地形緯度的高低，須適合在地的氣候和土質。
- (三)柴火用木並非限於乾柴枯木，深山中有許多原木可輕易用於起火。
- (四)工寮或獵寮多利用樹穴和石穴，不須砍樹架設木屋，以維護自然生態。

(五)通過岩崖或陡坡路上的樹幹和樹根不可砍除(含崖芒)，俾利攀爬扶持，兼顧路況堅硬，不易崩塌。

(六)利用彈性的樹木竹枝或藤枝，可快速裝設陷阱及製作弓箭。

(七)陷獵裝具能變化無窮，可大可小，視對象依現地自然生態設立。

(八)諳熟叢林路徑、岩崖通道及溪流渡河點。

三、動物生態的辨別

(一)可從動物的足跡及蹊徑，可辨別動物的種類及大小。

(二)從動物在山林活動的狀況，可顯示動物的分類(辨別公母)，經過時間，進而判斷其目前所在位置。(包含人類)

(三)從動物的足跡及糞便，可辨別其物種即曾在此活動的時間。

(四)山林中捕獵動物或尋找

失蹤者山難救護的秘訣，不外有跟蹤、埋伏、狙擊、沿蹊徑、步道溪床尋找、烽火求救、燈光顯示、空中探索等。

(五)跟蹤術是獵人的特有技能，歷年來在艱苦的山難救護或天然災害救難任務中發揮其顯具效率的功能，非一般教育訓練所能抵，須自幼長期生活在山林獵場裝培育養成，以目前政府禁獵的政策而言，這珍奇廉價的人力資源就將消失在我們的國度裡。

肆、結論

一、多數族人的登山狩獵，並非以殺戮獵物而為，而是以鍛鍊強健的體魄和永續祖傳的膽識和勇氣，踏遍高山原野，培育族人珍貴的山林在地智慧和特殊的登山技能，領受像太陽、風雨和艱苦地形挑戰的經驗，與風雨共舞，砥礪族人們征服大自然的特有本能。

二、狩獵活動是台灣原住民世代以來文化生活的常態，並非須以「祭典」為由才能進山狩獵，日據時期也沒有這規範，所謂「逢祭典才能進山狩獵」是近年來國民政府誣鱗族人狩獵文化所制定的行政手段，根本不瞭解原住民的文化精神和生活習俗，既不溝通亦不願到部落現場實際瞭解，這種政府將如何得民心！

亞榮隆·撒可努

排灣族

用身體實踐作為一種敘事方式

前言：

我用書寫來述說老一輩的故事，而獵人的身體經驗是我書寫主題。在童年時期，每一次上山，我都跟著部落老人和父親，總是在身後看著他們身體的巧妙和身體的移動如何與自然容為一體，在他們身後跟著的我，如同在看一部正在上演的戲碼，有時，老獵人會指示我，也要跟著他的身體輕緩的移動、停止、再移動；緩行、潛行、將視線定焦、凝視，如同準備要伏擊的雲豹。對我來說，當時的情境和任何話語，一舉一動，就像安排好的故事情節，如同儀式般的進行，是一種默契的結合，沒有任何的安排演練及進行和前置，在非洲的馬禮多瑪一書中提到：我們用儀式讀懂彼此，用習慣看穿對方的行為，在沒有任何的語言傳達，是因為我們的生活，不斷地在上演，再重複的模式。有時，即興的表演，如同默劇般，不斷的在大自然重複的上演。

身體實踐的敘事方式可以生動到有如劇本或影片般的分斷與定格，每個段落明確到在述說故事時，每個畫面都清晰浮現眼前，猶如身歷其境般的感同身受。

身體實踐亦可以說（或轉化成）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種展演，日常生活空間即是個活生生的展演空間，人們在日常生活的互動就像戲劇一樣。

高夫曼（Goffman）用戲劇概念解釋生活，認為社會行為就是社會表演，社會成員在社會舞台上小心翼翼地扮演自己的多種角色，從而使自身的形象能恰到好處地為自己欲達的目的服務。他提出了「前台」與「後台」的概念：若沒有前台，社會秩序將會出問題；但是如果沒有後台，生活將會太沉重。「前台」：是指人際面對面交往的舞台，整體演技取勝，每一個人都是主控姿態傳送的表演者。「後台」：人們比較放鬆，不那麼注意形象，可以有一點隱私，暫且擺脫辛苦的檯面工作。表演要求的表述一致，指出了「人性自我」與「社會自我」間存在著重大的差異（陳惠玲，2002）。

在歷史上或文化上對於什麼是或不是「表演」沒有固定的界線，表演存在於日常生活、藝術領域、動作表情、技術、性別、儀式、遊戲……中。Schechner認為：「存在」是生活的方式，「行為」是所有活動的存在，「表現所作所為」是表演，「解釋表現的行為」是表演研究工作，然而，「行為」與「表現所作所為」經常不斷的在變化，二者是流動的（Schechner，2002）。

Tuan 則強調「經驗」是感覺、知識和觀念的全部，是感覺外在世界和思想外在世界的綜合；人透過自身的知覺（嗅覺、視覺、聽覺、觸覺）才能經驗世界的存在，也才有理解環境的可能，而且這些理解是以情感為主要連接方式（Tuan，1977）。

本論文試著從獵人及自我的身體經驗，輔以《山豬·飛鼠·撒可努》、《走風的人》2本書去述說身體實踐（經驗）如何作為一種敘事方式。

本文：

一、獵人哲學—「等待」

「等待」是獵人訓練的一部分，牽涉獵人人格的養成，但這種人格特質無法藉由書本傳授，而必須藉由「身體實踐」，過程中，那是身體也在進行的一種過程，等待，未必是停止、休息與完全的被動，相對的，是另一個層面的看見及準備與出發，更是身體獲得力量的一種方式。

父親說過一段很棒的獵人哲學，他說：「獵人的孤獨和寂寞，是精神和力量最大的來源之處；兒子，你要學做一個好的獵人，就要學會『等待』的耐性。」

在〈走風的人〉文中，寫道：

秋天快來的時候，這裡的山羌一定會聚集在這裡，闊地上的 zaku 所掉落的果實，是他們愛吃的，尤其是小山羌，這裡簡直是他們的天堂，他們的父母帶他們來之後，還告訴他們，此地的闊地和果實，是這裡的山羌所共享、擁有的。去年這個時候，我也來這裡看他們開會，山羌知道這裡可以順便提親，明年再來的時候，就可以結婚喝喜酒了。

這是在一次進入獵場的經驗裡，父親帶著我觀察山羌，要我盡量適應周遭的感覺，隨自然節奏起伏，否則就難以看到大自然中隱藏的生命跡象。而還有一次，父親要我輕聲地移動身體，到某個隱密的地方休息，同時也用身體示意我看向岩壁上方一處黑暗的地方。發現那灰黃色配著斑點黑棕色的動物竟然是排灣族稱為：「里古颺」的雲豹。

「那是排灣族的里古颺，上次我看到這裡的山羌那麼多，就知道部落老人曾告訴我，里古颺一定會來，這次總算讓我等到了，他終於來了。」

「其實他早就來了，前一天晚上他就在岩壁上休息、等待，熟悉這裡所有周圍的感覺和氣味，我來了他也知道。我知道他看到我們的時候離開了一陣子，但到了黃昏又折回來，在岩壁上等待晚上的到來，他知道我們人類到了晚上，能力會降到零……，獵到里古颺的獵人，就像出征、出草一樣，戰功是同等的對待。」

等待是一種靜止

二、山林中的身體經驗轉化為故事

小時候，只要有蜜蜂飛過我的身邊，我就能判定，並且還能找到蜂窩的位置；然而經驗的獲得，是因為身上不知道被多少種蜜蜂螫過，才換來對蜜蜂敏銳的觀察力和敬畏感。

能夠做出這樣的判定，都是靠著對地方的熟悉和身體的實踐。「不知道被多少種蜜蜂螫過」的強烈身體經驗強化了對於土地和生存其中的各種生物的感受。

更多時候是身體在土地上有親密的連結，身體原來透過強烈的刺激時，會產生深刻的記憶，而將身體原本的模式作為改變，這樣的改變，卻是有助於對轉化成故事的更真實和貼近情境。

這時父親開始慢慢的移動身體，像蛇一樣遊走，把前面芒草的芒尾，綁在我們腳後的芒草根上，好讓身子被芒草包隱著。……父親這時候用下巴指著闊地上的大樹下，我慢慢輕輕的撥開擋在面前的芒草，正想高興地尖叫起來時，父親卻用力的將手按在我的大腦殼上，讓我的臉貼地，跟著土地一樣呼吸。這時候，父親輕聲地靠在我耳邊告訴我，聲音像跟空氣結合，緩緩又慢慢，而周圍的一切像

遺忘我們似的，這時候我才感覺到，父親順著自然的節奏讓自己跟自然合體，跟土地一樣呼吸……。

當我們把山林當成我們的生活場域，時常走動，及用身體感受時，與自然萬物就不會那樣的疏離，身體本身的知能會再回來，身體就會建立一套適應山林的習性。當視覺、嗅覺、聽覺、觸覺等感官經驗適應山林環境，並與其交融時轉化出來的故事，將是一種具「身體感」的書寫。透過「身體」作為媒介說出一個故事。

王荷沙指出：原住民生命語言雜糅講說與書寫媒介、個人和文化敘述，是複雜的「語言表達」，而講述生命故事更有口說、表演、藝術等多種形式，含納歌吟、說故事、舞蹈、靈視及藝術繪畫作品。也正因為說故事傳統在原住民書寫的關鍵位置，述說著隨性而起、嘎然而止，生命敘述脫離起承轉合順性的編派，以軼事/零碎的生活片段呈現。說故事是三度空間的藝術，繪畫圖像則為兩度空間藝術，兩者結合，超脫了書寫敘述單向度線性的囿限，開展一個更為豐富多元的展演空間。

三、在身體實踐建構出來的敘事空間裡，讓故事有生命

愛聽部落老人家說故事，養成了也愛說故事的個性。在〈小米圈的故事〉文中提到：

……這樣子是為了通知祖靈，請祂們下來跟我們共享我們的東西，幫助我們年年有收穫、不要生病。煙是我們和死去的祖先共通的語言，如果當我們想念他們的時候，夜晚我們生火，冒起煙，煙會把你身上的味道帶到祖先的地方，祖先聞到了你身上的味道會尋著煙飄來的方向而下。假使你看到煙像百步蛇行走的樣子，那就是他們來了。如果煙散到你身上，表示祂們確定你是祂的親人，他們很想你，讓生病和惡靈不要靠近你。

這裡的「煙」有各種形狀，也會像人一樣說話。在這個敘事空間裡，營造出一種視覺上的饗宴。小時候，部落的獵人常在夜裡燒著火說故事，在那樣的情境及氛圍裡，敘述他們自己所擁有或曾經有過的故事，而那樣的故事發生，有想像、

經歷、創作、發想或即興，甚至有時將煙更具體的扮成另一個主角，像小孩子玩遊戲般，由故事模擬出情境，讓人感受更加的貼切。因為親身到過山上，感受過煙是怎樣地出現在身邊，才能將細微地生命歷程呈現在故事裡。

小結：

獵人經由個人上山的經驗，鑲嵌記憶，個人經驗是獨一無二，無法被取代的。身體是獲得知識的第一個媒介，「經驗」是實際的接觸與互動，每個人都必須親自藉由感官知識來認識地方的各種物質與事件，才會對事物產生關聯，再延伸出記憶與意義。

文化是透過身體不斷地實踐而顯露光芒，而「故事」也是；那是一種累積，而且是「被生活出來」的一種歷練。因為身體不斷地在實踐，人與土地、人與土地上其他萬物的關係便更加交融在一起，集結起來的故事。

劇場(表演)像一面鏡子，告訴我們該反省什麼，日常生活也像一面鏡子，接觸到的人事物都會投射出互動後的因果。然，在表演中，因觀眾背景的不同，所以看戲時吸收的程度也不同，這與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一樣，當背景不同，看事情的態度亦不同。事件的獨特不是在他的物質而是在他的互動，我上山的次數雖然多到數不清，但每一次上山對我而言都是新的感受與體驗，因為時空、人員、環境、心境及在山上遇到的事物、狀況都不同。然而，什麼是或不是表演，並不能取決於一件事上，而是取決於那件事如何被接受與被安排，在現在，沒有一樣人類活動不被視為展演活動，在科技文明與全球化的現下，展演與非展演、藝術與非藝術間已經沒有一個清晰的界線存在。

參考資料

一、期刊論文

吳春慧，2010，《勞動與知識的辯證：夏曼·藍波安與亞榮隆·撒可努作品中的身體實踐與身體書寫》，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拉姆路·卡造，2009，《吉拉米代部落獵人的身體經驗與地方知識》，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心雅，2009，〈美國原住民的自我書寫與生命創化：以荷根與安姬姿為例〉，《歐美研究》，39：2。頁 264。

二、書目

亞榮隆·撒可努，2005，《山豬·飛鼠·撒可努》，台北：耶魯。

亞榮隆·撒可努，《走風的人—我的獵人父親》，台北：耶魯。

Kathryn Woodward 編，2004，《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林文琪譯，台北：韋伯文化。

Tuan, Yi-Fu, 1988 (1977),《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潘桂成譯，台北：國立編譯館。

馬里多瑪·派崔斯·梭梅 (Malidoma Patrice Some)，2000，《非洲馬里多瑪：原住民的治療智慧》，江麗美譯，台北：智庫。

三、文章

Schechner Chapter, 2002, <Performance Studies An introduction>,《2.What is performance?》, p22-32。

四、網路資料

陳惠玲，2002，〈Goffman 劇場理論主要概念的提出〉，《南華網路社會學期刊》，第 20 期。

取自網址：<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20/20-14.htm> (2012/01/09)

附錄

親愛的第一階課「帶者」節束的學員們大家好

我是妳們的大哥撒可努，我相信很多的學員還再想著那片美麗的楓樹林基地營，我要各位去回想課程節束後的妳，心情和情緒的轉變是什麼，也許妳有很多的疑問和想問，為什麼又或妳自滿的或以為獵人學校的課程就這樣喔，我都要跟妳說這樣的體驗都留給自己。

獵人學校的課第一階段再處理的是未來妳再接受所有課程的認知和發芽，它就只是一個獵人爸爸帶著孩子去山上讓孩子感受它的生活，這個爸爸有很多的東西要給，為了讓以後的妳們能跟上

第一階段的課，這是基礎，沒有基礎就不會有開始，用力的去回想我對妳們所說的話，自然就會跑進我們的身體裡之後會慢慢的開始住下來，我們的心會慢慢的體近，知道找到節奏而順應對自然順從進到自然而擁有順暢的體態。

讓心思和想法成為觀念，讓身體的記憶成為經驗就是獵人，獵人學校在給的不是我們普世所認知的獵人，那是一種價值，是要被喚醒的。

很高興能帶著妳們去看見那美麗的相遇給妳們，下一段話是我小時後上山老人家跟我說的話想跟妳們分享。

我的孩子

你看

去用你的眼睛

看

那個遙遠的

看

不到

如果我們走不到

就沒有看到

樣子

就沒有記憶，想象

我們的世界就會慢慢的消失

我們的存在就會只是故事和傳說

你是我的孩子

這裡一直在等你

都會等你

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就是記憶

你以後可以跟你的孩子說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我去過

那天老人家說的話一直在我的心裡

帶你們上山去想那個「那麼好」，如果你可以我有一天會帶你們去更遠的地方。

親愛的第二階課「跟者」節束的學員們大家好：

很喜歡你們內，對我自己來說每個人的來到有著自己的想象和看見。

在夜裡我們走了很遠的路，跟自己，黑夜在一起，我們怎麼可以在夜裡走這麼的久，我相信這是你們在夜裡走最久的一次，又低又爬又跨又是在「深」林裡。

我要各位很用力的去回想我在山裡對你們說的話如果你們聽的懂背後有很多的意義和意思。

獵人學校在教的不是技術獵人學校不是要給你去成為「那個」原住民或去學到什麼樣利害的技術，我們要喚醒的是回到人最初所共有的「回到」，我不教打獵，我不教爬山，我們不教野外求生，想給的只是單純的獵人體驗，你們跟久了就會是經驗，自己的經驗就會是老師。

第一階段的課走到第二階段的課是另一個不同的課程層次：

有了體驗不等同有感受，

有了經驗不等同有感覺，

有了感受未必那是回應，

有了感覺未必那是反應。

學會去梳理自己的思緒，就更能熟悉你的身體，任何對你的回應和對話，為什麼我們可以那麼的近，這樣被療癒似的跑出很多的思緒去跟一群也許只見過面一次伙伴說話。

也許自己的「我」還沒有完全的放開，但自己感受的我在當下是不一樣的。

我會永遠的記得在夜裡看著你們臉的記憶，謝謝你們的「跟」讓我跟輔助員是可以如此的對你們盡情很盡興的帶著你們。

我們一直知道要找到能可以跟我一樣或能一起的人是不容易的，我們來自的地方各不同，我們早喪失了嗅出或識別同伴的能力，我們只能倚靠最後的能力，就是帶著你們去到我們可能同屬或有過的看見。

在你們的眼神和體態，感受的分享裡我們知道，我們越來越近來的可能及相近，那個感覺很好。像找到似的，像重逢預見般。

學會安靜可以讓人在大自然隱身，學會寧靜可以讓人看穿自然，學會心靜了你會看到在自然的我是那麼的怡然自得，我們睡的很少吃的很少卻是興奮一直持續的，是什麼的力量讓我們可以那麼的一直，現在不用去急著要找到什麼答案，體悟的那一天很快就會到來的，你們就會理解。

去相信儀式的溝通的存在那是接觸的開始是你靈性的被識別。

我一直相信過去的人可以與神界的人互相往來，但因人類的背叛，而失去了一再被原諒後的那個相信。

我們的自私、自利和對大自然的破壞，讓原有的神界因此消了，我們不再使用「神語」，不在有「神感」，更掩蓋了原有能看穿任何事物的「神視」，以及能被「神界」辨識的內在「神態」；僅留存那破碎的靈魂和自以為是的醜陋軀體。

我們的無知，以及現代化文明和科技所帶來的便利，讓我們喪失了真實的體驗和感受，我們直接接受快速的知識，並相信眼見為憑，因而遺忘了身體原有可以傳遞訊息和能量的能力，最終是我們漠視了我們自己，並摒棄可以接觸開啟神界的體感和能力。

我們的心智不再透過身邊的體驗去經驗試煉靈性的直通，我們變得軟弱，以逃避來顯耀依賴，盲從，不相信，依附著宗教來得到慰藉，又或是拿出學校的文憑和分析理論來隱藏自己的無知。

「別再長時間呆坐在課室、冥想活動或會議室裡，對於認知性的理解、解釋少一些依附。

原始靈性要我們更為由衷地去關愛、分享、與彼此坦然相遇；移動肢體、嘲弄心智，而勿讓身體靜止，或僅僅對腦中的心思點頭致意。」

離開了就不會在有一樣的相同和看見，我的心開始期待第三階段課的看到你們，理解什麼，也不需任何高超概念的學習

我問你們酒是什麼

酒是回家的路，

酒是讓我們近入那神秘的國度啊！

下次讓我跟你們一起喝。

愛你們

排灣名：亞榮隆·撒可努

〈漢名：戴志強〉

3 個女兒

部落的青年之父

1972 年出生於台東太麻里新香蘭部落。

2000 年以『山豬•飛鼠•撒可努』一書被哈佛大學中文應用系及加洲大學收錄並獲第 21 屆「巫永福文學獎」。

2000 年 9 月『走風的人』一文獲第一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散文首獎

2002 年 1 月出版「巴里的紅眼睛」故事繪本

2002 年 6 月親自編寫、講述的音樂童話有聲書《Vu Vu 的故事》由風潮唱片出版。

2002 年『山豬•飛鼠•撒可努』一書，其中多篇文章收錄於國中國文教科書中

2002 年 12 月出版第二本著作〈走風的人〉

2002 年榮獲文建會頒發「二零零零年文學人」榮譽講座，與鍾肇政、陳若曦、楊牧等多位文壇資深前輩同享殊榮

2005 年 11 月《山豬•飛鼠•撒可努》一書改編成電影『山豬•飛鼠•撒可努』上映

2005 年以電影『山豬•飛鼠•撒可努』一片受邀參加美國影展

2006 年返回校園

2008 年發動第一次為尊嚴而走活動，由台東步行至屏東北上台北總統府前遞交原住民土地宣言

2008 年獲中央通訊社「2008 台灣十大潛力人物」族群和諧類獎

2010 年國立空中大學畢業，繼續攻讀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2010 年『山豬•飛鼠•撒可努』一書，收錄於國小教科書中

2011 年《山豬•飛鼠•撒可努》一書改編成動畫『山豬•飛鼠•撒可努』上映

2012 年出版第三本著作「外公的海」

2012 年走風的人一書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收錄

阿美族人採捕海中生物現況與法規說明

蔡政良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一、現況說明：

臺灣原住民族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不同山海民族各自發展與其環境有關之山海文化。都蘭部落阿美族人也發展出獨特的海洋文化。太平洋中的生物提供了部落族人豐富的蛋白質，也發展出與阿美族社會文化習習關關的各種生活傳統與祭儀，其中最重要的根基在於日常生活實踐中採捕海中生物的知識和技能（包含潮間帶採集Lakelaw、放網捕魚Mitilo、灑網捕魚Mitafokod、以及魚槍射魚Micinko等）。

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而制定的《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一款明定原住民族具有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獵捕野生動物之非營利行為。然而，各相關主管機關不論在制定法規或者在不察阿美族海洋文化的情況下，多項行政規則莫衷一是，甚至只是注意到山區原住民族森林狩獵之文化，而忽略了海洋民族的漁獵文化，導致部落族人不斷發生被執法機關海巡署取締或勸導之情事（例如持有合法漁槍仍限制重重，甚至擔心被取締罰款，使得部落族人延續千百年的漁獵傳統遭受政府法規的限制，部落族人延續傳統的漁獵活動，也有如驚弓之鳥，在自己的傳統領域中，有如當小偷般的不堪。目前的法規規範，已有危害海洋民族，例如阿美族或達悟族的基本權利之虞。因此建請相關主管機關修改行政規則，以符合各相關法令之立法原意。

二、法規執行單位海巡署回覆相關法令：

關於上述現況，海巡署東巡局針對原住民族持合法漁槍下海採捕海中生物的相關法令回覆如下：

就民眾（含原住民、漁民）持有合法魚槍下海捕魚實施法令說明：

1. 「漁業法」第 9 條：為開發或保育水產資源，或為公共利益之必要，主管機

關於漁業經營之核准時，得加以限制或附以條件；「漁船建造許可及漁業證照核發準則」第 23 條：不再核發潛水器漁業執照，故現行漁民出海作業，不得潛水使用魚槍採捕水產生物。

2. 「漁港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商港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港區域內禁止採捕水產動、植物，違反規定者函送該管主管機關裁處。
3.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係就水域活動之種類、範圍、時間及行為予以規範，民眾從事「潛水」活動應同時具備「攜帶魚槍」與「射魚」行為，方得依違反「管理辦法」第 17 條第 3 款及第 27 條第 7 款函送主管機關處罰，安檢單位若發現民眾「岸際」射魚或潛水未採捕水產生物，則善意告知法令規定避免觸法受罰。
4. 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第 1 款及「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規定：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獵捕野生動物之非營利行為，但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惟僅限於有限之活動時間、範圍內，並經事前申請許可為之。超出申請許可範圍使用魚槍潛水採捕海域生物，仍受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規範，倘漁獲量達實質漁業行為，亦受漁業法規範（由漁政機關依據採捕數量、次數及有無販售牟利行為判定）。
5. 綜上，本署基於依法行政之立場，執行海岸、港口秩序維護，並依主管機關訂定之法規執行勸導取締，建請諒達。如仍有疑問，歡迎來電 089-224166（東部地區巡防局檢管科）另法規層面有疑慮部份，建請逕向主管機關釋義。

以上與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採捕海中野生動物行為的相關的管理辦法中，漁港法較無疑義，主要以「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以及「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兩個管理辦法影響族人傳統海洋文化最鉅，而海巡署東巡局引用之漁業法，或是「漁船建造許可及漁業證照核發準則」則是牛頭不對馬嘴，濫用職權。以下進一步說明管理辦法對照其母法以及立法原意之後，不合理之處。

三、相關主管機關法規說明

就以上海巡署回覆的相關法令，就相關主管機關解釋之法規說明如下表一：

表一 相關管理辦法主管機關與其母法

相關管理辦法	主管機關	母法
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	原住民族委員會 農委會 林務局	原住民族基本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	交通部	觀光發展條例
漁船建造許可及漁業證照核發準則	漁業署	漁業法

根據以上的相關辦法、主管機關以及相關的母法依據，以下將列出戕害海洋民族阿美族與達悟族依據傳統採捕海中野生動物法規上不合理之處如下表二：

表二 相關法規對於阿美族人依照傳統採捕海中野生動物之限制

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	
條文	母法依據
第4條：須事前（30天或5天前申請）。 第5條：主管機關審查，副知單位無海巡署。 第6條：主管機關審查依據的傳統領域、文化及祭儀...附表。	野生動物保育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
疑慮	問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大海難測，誰知道5天後的海象是否能下海？ ● 既然主管機關要審查，並副知執行單位，為何沒有海巡署？ ● 傳統文化並非依照附表所列，文化就是生活，附表所列幾乎都只有祭儀？況且日常生活沒有潛水漁獵練習，祭儀時是會淹死人的。 ● 依照此辦法，釣魚、採集潮間帶生物皆必須事先申請？ ● 本辦法只較為針對山居原住民在森林狩獵，完全忽略海洋民族的漁獵文化性質不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第3條第一款，魚類也被定義為野生動物 ● 第21-1條（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之依據） ● 第51-1條違反管理辦法者，第一次不罰，之後處1000-10000元罰金。 ●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非營利限制，為何漁民捕魚可以販賣？（影響阿美族人生計）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	
條文	母法依據
第十七條第三款 不得攜帶漁槍射魚及採捕	觀光發展條例第36條

海域生物。	
疑慮	問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本條款法規說明二如後：「漁業法對非屬漁業人從事採捕海域生物並無明定禁止及處罰規定，野生動物保護法則以經公告之物種為管理主體。潛水活動為休閒性活動，禁止攜帶魚槍及採捕海域生物，以保護海洋資源，並避免與漁業之衝突。」潛水活動對於阿美族人而言，並非休閒活動。且此法規有違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 ● 違反該法，依照水域遊憩活動違反本條例及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裁罰標準表處 5000-15000 罰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為維護遊客安全，水域管理機關得對水域遊憩活動之種類、範圍、時間及行為限制之，並得視水域環境及資源條件之狀況，公告禁止水域遊憩活動區域；其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主要的規範標的為「遊客安全」
漁船建造許可及漁業證照核發準則	
條文	母法依據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第 23 條：不再核發潛水器漁業執照。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漁業法第七條及第八條第三項
疑慮	問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阿美族與達悟族原住民下海射魚都是岸際下水，並非漁民乘魚船出海，本管理辦法不適用於岸際下水的原住民族。 ● 綜合漁業法與本辦法，完全無針對原住民族岸際持合法魚槍射魚之限制。 ● 海巡署東巡局進一步說明，曾函文農委會漁業署針對岸際下海射魚的合法性要求回函，漁業署回函說明認為若採捕數量、次數及利用型態上均足以認定實質漁業行為者，適用漁業法。 ● 請問：到底何種數量、次數與利用型態為明顯違反漁業法？法規上並無明確認定，所以主管機關，「官說了算？」，這還是法治國家嗎？ ● 請問：並非法規命令之公文書，是否可以作為海巡署取締原住民族下海射魚之依據？既然法規無明確規範，要人民如何守法？海巡署則擴大解釋公文書，以之為要件取締，是否有【寧可錯殺一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依照海巡署東巡局的回覆，引用此法乃依據於漁業法第九條「為開發或保育水產資源，或為公共利益之必要，主管機關於漁業經營之核准時，得加以限制或附以條件」。除該條文無明確規範之外，亦無適用於原住民族之限制。主要規範之目標為漁民。

不願縱放一人】超過執法比例原則之情事，導致原住民族人下海射魚，宛如驚弓之鳥？	
--	--

四、解決之道

根據以上的現況與相關辦法的整理，主管機關的相關法規事實上並未依照不同原住民族的文化特性而定，且多以山區狩獵民族為基礎設定法規辦法，而屬於海洋民族阿美族與達悟族則身受其害，建議相關主管機關盡快根據海洋民族的特性，修改管理辦法，以符合立法原意並且維護海洋原住民族之傳統文化與生活權利。

事實上，各先進國家中，魚槍已不再是管制品，而是傳統文化與現代休閒運動的項目之一，美國的海洋與大氣總署（NOAA）甚至積極研究夏威夷當地悠久傳統的射魚文化對於夏威夷社會文化的重要性（請參閱 NOAA Technical Memorandum NMFS-PIFSC-31），甚至積極選派海岸巡防隊成員到大學中進修海洋知識，並與當地原住民族合作，透過原住民族的傳統海洋知識了解當地的海洋資訊（包含流水、地形、風向、季節、生物、潛在危險...等各種原住民族傳統海洋知識），以便在任何的意外或執法的情況中，迅速掌握地區性的海洋狀況，迅速解決問題。這樣的做法，可以在法規及執行上，做到兼顧傳統與國家管理的雙贏目標。臺灣作為一個海洋國家，各公部門機關更應積極了解海洋原住民族的海洋文化，這才是法治國家的管理之道。

最後，如果您在家裡拿冰箱的食物，還要鬼鬼祟祟，擔心被抓被罰款，這是不合理之事。而海岸的阿美族，就是將大海當作自己的冰箱，在現今各主管機關管理辦法蒙昧不清或者相互矛盾之下，又未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立法原意進行行政規則的訂定與執法，使得海洋原住民族卻是要在自己的家像小偷一樣，情何以堪。

《會議實錄》

司儀：

各位貴賓接下來是我們第一場次，論壇一。論壇一的主題是：原住民獵人說狩獵。我們論壇的主持人是由國立中正大學浦忠勇教授，來為大家主持。而這個論壇的引言人有 Lumav 以及黃長興先生然後還有 Sakinu 先生。

浦忠勇：

我們在座的三位，我們的發表人，跟在座的長官、立委、各位專家學者，今天的論壇分為三個場次。第一個場次就請部落的獵人，實際上打獵的、有狩獵經驗的來當第一場的引言跟發表。我覺得是我們主辦的單位一個非常精美的、非常好的一個安排。

事實上很多的獵人不太會講，我最近在接原住民的社會狩獵文化、漁撈文化的一個專題研究，我跑了很多很多的部落。我現在已經初步會分類。很會打獵的通常在那個地方他會沈默。他會在那個地方觀察，很安靜的很沈穩的在那個地方。所以我們經常會有一些場合，特別是在臺北這個地方來談狩獵，我們要請獵人不太容易。所以今天特別高興，有三位願意分享一些部落的一些狩獵的文化。從實際的一個經驗、實際的一個部落的生活的文化。我們再進一步，接下來的論壇二、論壇三。我覺得這是主辦單位的一個巧妙的安排。

今天很高興，我們第一個會發表的是我們布農族的 Lumav，他說：我會打了一個咳嗽不太會響，我偷偷聽到的。其實獵人一開尊口，都是字字珠璣，真的是要待會我們好好來分享。第二個是，他說從七歲開始打獵，到今年七十七歲了，三個七耶，黃長興先生。再來其實這位人物是不需要介紹的，Sakinu，Sakinu 他有三本巨作，還有很多的其他的文章，還有一些小著作就不計其數。第一本書，《山豬飛鼠是 Sakinu》，我在中正大學的時候，台灣文學研究所，這個是必讀的，還有《走婚的人》，這是一定要念的。如果說不會念這個的話，他們就不算是在台灣文學研究所讀過書的。他們後來讀他的書之後，他竟然說 Sakinu 應該很會

打獵。我說真的很會打獵，不然不可能會寫出這麼精彩的書。那我們在今天也特別感謝他能夠在這個地方。

Lumav :

因為我今天我的報告其實我是從我在玉山神學院的道學碩士的論文，我濃縮，我從十幾萬自我濃縮到一萬字，然後今天突然又要再濃縮。沒有關係我就給它點出來比較重要的部分。

那布農族狩獵，談到比較重要的就是禁忌的部分，比較是我們講的 sanu、sanu。因為 sanu，在所謂的列隊出隊以前，一定要有這些儀式。

那剛剛我們的孫大川，我們的老師、教授，他有講過說夢，其實今天我們沒有講夢的部分是因為其實狩獵在夢的這個部分，在狩獵前，一定會談到。今天我們談到夢的時候，我們的獵人他會回去家裡或是工寮，或者是躲在草裡面睡覺，真的是草叢裡面，讓那種親近大自然那種情境。他們在出隊以前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在那邊討論說：「誒，今天你的 ba-hi 是什麼，昨天晚上你夢到什麼。」然後一定會有長者一定會在那邊在解夢。比如說七個獵人裡面，他們狩獵的時候，其中有一個獵人他夢到不好的話，這整個獵隊都要解散，所以是非常嚴謹的。

我們布農族狩獵前的部分，有一些是象徵的動作。從搗小米開始，是一個。因為我們要去出獵以前，我們要去打獵以前，一定要帶小米、地瓜，自己做的、自己帶的這個小米，一定要自己搗，然後帶去山上，然後這個從新的開始。

然後是氣味的部分，所以獵人在家裡餵豬，還有一些放屁拉等等這些事情，如果你犯了這個禁忌，整個獵隊也不能上去打。

再來就是，聲音的象徵。聲音的象徵比如說，打噴嚏，那個也不好，因為老人家會講說，你今天打噴嚏山上都會聽到，他早就聽到，你不用去山上，他很早、很早就跑掉了。

在這個部分因為很嚴謹，所以今天要出隊的時候，一定有祭師在討論說，到底今天你們在打獵的時候，這整個過程長輩都會敘述你們會碰到什麼樣的事情發生。像我之前在，我打獵的時候，我就夢到了，我就在家裡做夢我就夢到我的爺

爺，我夢到好像下雨，然後我阿公就跟我講說，你去山上的時候要小心。我說怎麼樣，他說你去就知道了。他沒有阻止我，但他告訴我講說，你做這個夢，他沒有說很好，也沒有說不好，但是你去山上要注意。結果我去山上，一棵是我打了十隻白色的飛鼠，就像是他講說象徵那個動作。我夢到了我打那個飛鼠的時候一隻一隻掉下來，就好像我感覺上在下雪一樣，因為是白面飛鼠，我就說原來是這樣子啊！所以從這個部分我去想到說，我的祖父曾經跟我講到說，在狩獵的部分，從狩獵前一直到狩獵中，他對上天的一種祈福。所以你在出獵以前完成之後，你才可以進入到獵場，整個獵隊才可以進入到他們整個獵場裡面。

狩獵中裡面有一個很重要是，獵人要去山上以前，我們講說不要 atmangatmang, atmangatmang 的意思是說不要誇大其詞。比如說那個獵人會講說：「哎呀放心拉，等下我們的獵包全部都滿滿的。」那是犯了禁忌。我們會講出 atmangatmang，你這個人 atmangatmang，從此已後不會帶你這個人。因為你講話太誇張了。所以我們的獵人去山上的時候不愛講話，然後就要觀察那個腳印，觀察是不是有公的、是不是有母的？一直在山林裡面。所以這些獵人在山上，他們討論的都是他們往山上他們在打獵的時候我們的獵隊要怎麼進行？然後他們會觀察大自然，是不是有下雨？那是不是有天災？如果有天災，全部的獵隊就要下來。

還有一個就是，當獵隊上去的時候碰到第一個當獵隊下來的時候我們必須要分享，我們今天從山上下來的他們是滿載而歸，那上去的他們是空空的。所以當碰到的時候他們會講「你們獵到什麼？你們獵到什麼？」然後通常獵人都說：「啊沒有拉，就獵到小鳥。」我們不會講說獵到幾隻水鹿拉、幾隻山羊，我們不會那麼誇張。我們都講說：「啊沒有拉只有獵到一、兩隻小鳥而已。」當這個獵人、這個獵隊他們要交叉而過的時候，從山上下來的不能馬上把這個獵物給給他們，一定要經過二十公尺之後，有一個小孩、一個比較年紀小的小孩子，然後他要去追那個要上去的那個獵隊，然後分享給他們。這個獵隊他一定會講說：「Uninang mu mahtuan masasaupa」，他的意思是說：「希望你以後持續就是可以打到這些獵物。」我們的獵人就比較會…那種心情會覺得：「說好舒服啊」很爽，就像我在山上打獵好幾天，都沒有洗澡、肚子餓，但是都值得，因為聽到了那句話。

狩獵裡面我們還有一種語言禁忌。到獵場的時候我們都會把所謂的物品，用不一樣的語言代替，也是用布農族語言，但是變成是另外一種的講法。比如說我們講說佩刀是 siqili，然後我們都會講說他是刀鞘；然後我們比如講說血，我們不能講說 qidang，我們一定會講說 tiqiqu，給它翻過來。我問一些老人家說，為什麼要講這些，他說因為在山上，我們講的 tamindo 祂早就聽到，祂聽到的時候，祂會把這些獵物趕走。所以我們的老人家很早就跟我們講說你到山上的時候，你不能直接講，比如說獵槍，你不能講 busul，你要講 culku。因為讓那個魔鬼祂聽不懂他在講什麼，祂不知道你們這一隊人去山上是做什麼。

我們還有一個就是鳥占，anaviliang，祂說如果這個鳥是往左邊飛的時候，代表你們這次狩獵不好。那你在那個地方，休息到下午，把所有獵到的東西全部倒出來，然後重新裝，就是新的開始。如果牠是往右邊飛走，這個鳥的時候，代表很好。那去山上打獵的時候，如果在路上看到鳥，第一鎗一定要打到。如果你打不到，你上去怎麼都打不到。所以有關狩獵的部分很忌諱很多很多。

再來就是談到狩獵後的部分。不外乎就是談到就是分享。布農分享的部分我們會講說 masivi，masivi 的部分一定要給，因為今天我們的獵人、我們的長輩告訴我們講說：「你今天不會分享，你別想以後你都會打到獵物。」這個是我們過去老人家、長輩一直告訴我們的，那一直到像我的老婆他會講說：「你為什麼要分享，你辛辛苦苦去山上打獵結果你打到水鹿，結果你一隻腿分享給別人，那我們要吃什麼？」我說：「這個是我們布農的文化。」我們不會在意那個肉是怎樣，我們在意那個就是分享的部分。還有談到就是有一些東西不能吃的。

我們的獵人到現在，我一直在反省這個，我們的獵人都是人家講的是英雄。打到獵水鹿是英雄、打到山豬是英雄，但是一直到現在，我們獵人已經變成狗熊啊。為什麼要躲躲藏藏？而且會怕，變成說我們會覺得我們很沒有尊嚴。所以現在的獵人，年輕的都覺得說幹嘛去狩獵？那是落伍的觀念啊。我會跟他們講說，其實狩獵是我們的根啊！狩獵從以前一直到現在，延續我們布農族的生命，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們今天可以活在這裡嗎？我們的祖先從低海拔一直往山上爬，為了是什麼？要追獵物阿！打到獵物，然後給我們的族人吃。

後面我比較想要講的東西就是我們布農對於生命的尊嚴的部分。我們對獵物的部分一定會看重。今天我們打了一鎗下去的時候，像現在的年輕人，打了以後不會去看，然後覺得說打不到。但是，過去的老人，只要你打了一鎗然後，他們一定會過去那邊看是不是有受傷？然後一直追追追追追，可能追了好幾公里才會找到那個獵物。老人家告訴我們的觀念講說：「獵物你一定要尊重牠的生命，不能說，這個獵物任意讓牠爛掉。」以前我們有一些品德比較不好的獵人他們會打了獵物…打了水鹿，公的，結果呢，就拿這個鹿茸，身體都不拿。我記得，有兩個人，他們就是這樣打了七隻水鹿，結果。他們在回程的時候在山上有一個其中暴斃死掉。回到家裡的時候，剛好又告別禮拜的時候，另外一個年輕人他的家裡全部燒起來。我們的老人一直在講說，這就是我們講的 Dihanin 會 Pidila，就是說，我們的上天會破壞你們這些動作。也就是說你們做這樣的事情是不合我們布農狩獵的精神。

到後面，我們這邊有一個布農族的分享觀的部分，在手冊第十六頁裡面有一個三角圖，那是我自己解釋的。我們會講說，布農族的獵人當你學會分享給我們的族人、分享給我們的家族的人的時候，當那個所有家族的人、所有你們族人當他們回一句話講說：Matuasumusuppa 的時候，那個是告訴我們的上天，告訴我們 Diqani 說，再一次祝福這位獵人。Uninang mu mahtuan masasaupa，就這句話，那個獵人他從高山辛苦了好幾天回來，他聽到了他會覺得值得。我辛苦了那麼多天，我值得。所以心情一定會是很開闊，然後回到部落的時候，我們的部落的人全部都分享，我們一定會選先從寡婦然後從孤兒開始分，最後就是我們的獵人，一直這樣子分。為什麼我們會講說從我們的這些寡婦、從我們的孤兒？因為我們的老人家跟我們講說，我們要照顧這些…就是說他沒有辦法有那種自生能力的人，所以我們的老人家跟我們講說，今天因為你有能力、你有力量，那你要讓這個部落、我們整個社會裡面，我們布農族的社會裡面，沒有一個人餓死，沒有一個婦女就在那邊看著：「我好想吃。」但是我們女人、女孩子不能去山上打獵。所以我們一回來的時候我們都會分好，這個獵物是要給這些寡婦的，這個獵物是要給這些孤兒的。最後可能就分到這樣子一點點，那個獵人他會覺得說那是值得，

因為我們今天是回饋到我們族人的身上。所以當分享給他們的時候，他們一定都會回那句話。

我們在丹大林場打獵的時候，就是我的舊部落。那其中我那時候帶了幾個年輕人，因為我那時候在那邊教育實習。那時候司馬庫斯的那些年輕人，我就帶他們去看看我們的獵場。那我們的那些年輕人，那些年輕人那些長老講說：「哇！你們這邊的動物那麼多啊！很像那個動物園。」剛開始去的時候他們帶那個 balang，就是那個背籃小小的，我跟他講說：「你帶這個，我們要背什麼？」然後他說：「這樣就夠了，我們是打 yabi。」我說：「不是啊，我們這邊的都是那種大型動物比較多啊。」當我們去的時候，一次打了六隻，他們就講說「我們怎麼背啊！」我說還是要背啊，沒辦法。

主要我想分享我們部落的這個狩獵精華是在分享的這個部分，不管你怎樣，多麼的神勇、多麼的厲害，但是最後你沒有分享的時候，那個不是神勇，那個不是我們講的 Mamang。今天 Mamang 的布農要懂得去分享。

浦忠勇：

很精彩的一個分享，從狩獵、禁忌、獵物分享，這個地方來做一個，很精辟的一個分析。那我特別想問禁忌，布農族夢到美女的話，是好嗎？

Lumav：

好的。

浦忠勇：

好的，好像台灣的原住民都是喔。我一直在疑惑「不能讓女人跟，可是夢到女人是好的」這是我一直在思索的一個問題。

剛剛特別提到，你不能先講你要到什麼地方。我再用一點時間講一個小例子：「有一個某考試委員，他前一陣子要跟著獵人去。因為人面很廣，他說：『我要去打獵，明天下午大概幾點的時候我會回到家，你們就過來。』結果真的一群人

就到某考試委員的家，結果什麼都沒有打到。」這個是禁忌？對不對？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禁忌。可能的話，希望某考試委員以後要上山的話，要遵守。

我們再請我們的太魯閣的我們的老獵人，黃長老來做分享。

黃長興：

在我還沒有進入主題之前，我先講兩個例子。去年的八月，臺北的登山隊的隊長，在太魯閣國家公園清水山那邊不見。當時所看到、所知道資訊，聯繫上的報紙都登說被熊吃掉了。因為清水山我們有六個部落，太魯閣部落在那邊，我剛剛從那邊走了兩趟。我就知道那邊的確有狗熊，只有黑熊。但是我是想在我們太魯閣族人當地的歷史當中，熊沒有吃過人耶。動員了當時花了上千萬訓練的那個山難救助隊，找了一個多月，決計就是被熊吃掉了。但是不曉得什麼時候，我的影像在電視上出現了，他的爸爸打電話給我說能不能幫我找？我是當地人，沒有找過嗎？他說山難救助隊不必拉，他去找就可以了。好，我派人，叫陳茂松的，剛好已經過世了，找兩天，找到了。那人已經死了。這是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是，也是前年的事件，奇萊山，大概將近三百公尺的懸崖，人車掉下去了。同樣的，都台灣的山難救助隊，浩浩蕩蕩的，上去了。用繩子接不到，找進口找不到，從早上九點到下午三點還沒辦法救出。這個時候，有一個警員，就是那個山警隊。這個山警隊也是很可憐，他不是獵人，他也沒辦法，但他知道有人在這裡打獵，就是朱家兄弟，也就是最有名的部落主席，朱德光，他帶他的弟弟上去，兩個小時把人抬上來。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這個就是我現在要講的，生態智慧。狩獵啊，一個是狩獵文化的內涵，什麼叫狩獵文化？往往很多人都認為這是在殺、抓動物。其實我從七、八歲開始，現在剛剛過滿七十七歲大壽，我在深山裡面狩獵的經驗，十次進山大概只有一次是為了殺動物。其他在幹什麼？教育、訓練、運動、信仰以及人口培育。這裡面涵蓋著什麼？涵蓋著氣象學、地理學、還有生態學，動植物的生態學，涵蓋多種的常識在裡面。如果不是長時間的在這個山區裡面活動，我想你要進這個山，恐怕有去無回。所以很多的登山隊，為什麼一定要請我們？如果找不到布農族一定找我們太魯閣人做他的嚮導。

像現在我所知道的，林務局的林相的調查，造林育林，幾乎百分之八十是布農族，林相的調查我們太魯閣族人也有參與，東台灣的。如果只有這些人的話，這個工作怎麼弄？還有很多現在舊有的纜車，舊有的纜車如果那個線不打掉，萬一打到人要國家賠償法。林務局也通通把它拆掉了，誰去拆？我們頭門和秀林的這些人啊！都是我的登山隊的隊員，就他們去拆的，那真的很危險的工作。這種這個高山峻嶺危險性的工作，為什麼我們會做的到？原因就是因為他從小時候就在這個深山裡面跑來跑去。

剛才我所講的，我們山難救護隊找不到的，甚至拿不回來，我們只去了兩個人，九個小時把人找到了。原因是什麼？他從小時候就知道了，這個裡面他包含它的進出口在哪裡？哪裡有水？那個人不見的時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跟蹤。跟蹤就是我們戰場上原有的這個技術。埋伏、狙擊。這個都是戰場上經常有的。賽德克巴萊裡面那個戰術就是獵人的戰術，很遺憾那個獵人的戰是韓國人教我們的，是韓國人來指導的，但的確是獵人的戰術。高砂義勇隊曾經闖進南洋群島，當時可以說是替日本人立了不少大功。不要說是美國人怕他，我爸爸也是其中一個，連日本人自己也怕。高砂義勇隊一進到森林裡面的時候，你就不能跟著去，他反正看到就殺人，你不要進去就是了。所以當時在尤其是馬來西亞森林，率領之下四個族的，印度是英國人，十六師團只有一萬六千人，其中前面是八百個高砂義勇隊，就把它擊破了，一直攻擊新加坡。原因在哪裡？就是獵人的戰術。所以獵人的戰術，我想獵場的這個規範和細瑣這個裡面各種結合，就構成非常嚴密的教育訓練的，也有涵蓋保育的。

在過去獵人是英雄，現在好像不是。我告訴你，現在還是英雄。我剛剛所講的這些人，這些困難弟兄能夠把這些人找到，如果他不是用這個生態智慧的方式，那怎麼辦？所以現在目前一樣都是阿。目前這個是我帶的布農族的人。布農的，我們不是狩獵，是用狩獵的方式把布農族從信義鄉搬到那個，現在那個...東光部落還有馬遠部落的那個布農族的路線，部落都找到，就是他們用狩獵的技術一個一個的找到了。我在東台灣，從北至南五大山，南到秀姑巒山，以台灣的屋脊線上，東台灣的位置，我整整走了十年，然後我動員了將近一百二十五個人。這一百二十五個人是各部落各部落，不是那個這個部落那個不行。秀林是秀林的，橫

門是撲門的，馬遠是馬遠的，每一個部落都有的人。都組成了這個部落。我當時那個秀林的鄉長以及各村的村長推選以後，找一百個之後我大概知道兩三個人。這裡面我有很多條件，第一個你必須是獵人，獵人因為經常去嘛。要不然，當然體力是一定很重要的。體力不好就不行。我非常嚴格管制的是，非常遺憾的是，在場會喝酒的不要生氣。我非常討厭喝酒，為什麼我現在已經七十七歲，我會挑戰說我們去奇萊山走看看。原因在哪裡？喝酒，不是不好，但是當你頭昏腦脹的時候，我們在深山，這個在這個，懸崖絕壁上行走的時候萬一掉下去怎麼辦？所以我有講過，我說那個，這個是我們鍾家兄弟阿，當時去找抓那個抬那個人上來就是他們，兩個小時把，從兩百公尺下面，為什麼？那個是他的獵場嘛。他當然知道這個進出入口在哪裡。那麼，我是想喔，這個我現在直接講到本體了，那生態知識是什麼？我現在氣象學方面，就舉這個例子，實際上好幾個，不是只有這些，像夏天都不能去打獵，容易去...怎麼樣去找水，容易去找水這個，這個可以，容易氣候...又打錯了...還有，這個大概很少人會注意到，第三項，如果今天下大雨，明天突然，可以說，大太陽，這個時候要注意到，下大雨然後是大太陽，下大雨的時候，這個山崩塌就不可能，因為黏住了。如果要挑大太陽的時候，黏住的泥土不是鬆了嗎？如果風一吹，就山崩了。太魯閣這邊，經常，前幾天還山崩阿。原因就在這裡，不是只有在大下雨的時候山崩，大太陽，就是前一天有大太陽的時候，我經常是去那個，過去阿，我到那個太魯閣國家公園這個地區，活動的時候，我覺得如果今天下大雨，當第二天是大太陽的時候我不去。這個時候石頭什麼時候掉下來我不知道。另外，如果在河川的下游，這個全台灣都一樣，你在下游突然下雨的時候，那個溪水突然變黑水了，這個時候要注意到，已經上面阿，上游已經有大水下來。很快就下來，這時候要趕快離開。所以，還有，我們我這十年當中，我經常判斷什麼事？什麼時候進山。因為我們一進就至少是一個多禮拜嘛。就是看圓夜的，有月亮的時候。也許別的，我們東台灣，就奇萊山一直秀姑巒山這個中間，這區的山區，幾乎在有月亮的時候不會下雨。一般這個是我的經驗，這個是合乎科學不科學那我不知道，這我的經驗。這個時候就趕快進去。等到沒有月亮的時候那個會下雨，那個時候那就比較麻煩。所以像這些，這個就是，我們在那個太魯閣大山，也是澳花溪上游，懸崖絕壁上。這個路，這個這段路，這個路是怎樣呢？我們下來的時候，兩條水鹿掉下來。我們就，水鹿

大概是被我們追，追下來死掉了。但水鹿從這裡走，我們就這裡清除。這些人都是泰山級的。我本人，雖然我也是從小在深山裡走來走去，畢竟過去有一段時間，有很長時間不在山裡面，有二十七年在軍中。幾乎都在山裡面的時間比較少。所以這個時候，這個他現在背的是我的背包，我就輕裝上去，我不敢背很多東西，我在這個裡面，我們這個有三十幾次登山的這個勘查那個傳統地的時候，我們秀林鄉這邊總共有兩百一十五個部落，萬隆鄉是一百二十五個部落，總共多少？這個部落是在哪裡？從秀林鄉跟萬隆鄉以及一部分的卓溪鄉，不是現在的部落，就在山裡面的，不是現在這個部落，在山裡面的。我從來沒有發生過山難，也沒有失蹤任何東西。因為掉個那個東西，有一句是剛我講，這個是校務訓練，我們進山之前，必須要實施講習。最近秀林鄉曾經辦過一個，那個大規模的狩獵活動，我曾經一個部落一個部落去，把那個進山的集合起來，就告訴他們怎麼做。其中最重要的，大家都認為是不要打保育類，不是這個問題，最重要是安全問題，如果這個山有三個人進去，尤其是有監視器的時候，有那個槍獵的時候。三個人裡面只能一個人帶槍，我想，我曾經為了這個到高雄法院一趟，就見證阿。結果就是為了這個事情，結果兩隻槍的話，就發生走火，會發生槍走火的事情。非常遺憾，資料裡面恐怕沒有那麼多。那麼，這個事情我不講拉，因為這個時間快到了。那我們經常是什麼，我這邊有一個照片大概是最近，這是什麼？在墓穴，這裡還有一個，這個是在石穴。這些洞，這些山洞或是木洞是什麼，就是我們過去到現在，這個都是現在的人喔，他們不是去打獵，這是我們當時找到抗日的根據地。曾經在這裡，跟日本打了七天的戰役，但雖然是戰敗了，但寫下了最後是大將被我們槍擊而死。我為了這個事情曾經到東京大學跟他們辯論過。是我們太魯閣人槍擊而死，他們不是摔死的。我當時，我到現場去了好幾趟。那是一個平台阿，你怎麼摔死？那個平台有六個部落包圍著，有兩百多隻步槍在那邊等著他。這當然被槍擊的。然後我告訴他，你說不是在那邊戰死的，為什麼這個神社設在天祥，那不是你們武士道的精神，在這裡戰死才設立這個神社嗎？

最後的結論。多數的登山，我剛剛說了，不是為了殺戮，是為了就是傳授我們的經驗，傳授我們的教育，我們的下一代，繼續把這個非常非常廉價的人力資源保持下去，不要讓它離開我們的國度。台灣原住民的這個狩獵文化，那個本來

是我們生活的常態嘛，哪裡還有一定要經過，有那個祭典之後才準去打獵，這個什麼規定這個，我是非常反對這個的。這個是我們政府污蔑我們狩獵文化造成一個，我說實在很抱歉，很多律師在這裡喔。這個是我的觀念，我不代表，我自己的經驗。這個的確是我們的生活常態，你怎麼一定要祭典才能夠進山，沒那回事。所以這個部分來講，陳采邑律師大概在吧，他也曾經聽我的課，我們也曾經，在現場，都向檢察官，都向陳律師去學習，到部落裡去觀察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我反對這個，我反對祭典才進山，就是因為部落的這個現實的實際的狀況脫離太久，太慘。一句話，你根本不了解原住民，尤其是我們的文化。這個是我認為是必須要加強的。好，謝謝！

滿忠勇：

好我們謝謝我們的長老，來分享他狩獵文化的觀點，教育訓練運動信仰跟培育，我們相信我們在這個地方有很多我們法界的人士，他談狩獵的尊榮的時候，沒有一個說殺幾隻，都是在講教育訓練信仰禁忌人格培育，這是一個很珍貴的，狩獵文化的核心，台東的排灣族人。我們再請排灣族的，我們的 Sakinu 來做分享。

Sakinu：

我就直接站在這裡就開始了，各位與會的來賓大家好，我是 sakinu，台東的排灣族人。私の愛する子，我親愛的孩子，政府は私たちの川を盗みました，這個政府偷走了我們的河川，私たちの集落を取りました，拿走了我們的屯墾區，私たちは山の中で旧友を取りました，拿走了我們深山中的老朋友，ブローク、私たちの生活を傷つけます，弄壞了、弄傷了我們的生命，私たちは、もはや支持者自身の栄光を遵守していません，我們不再遵從那個崇尚榮耀的自己。這個是我小的時候很喜歡聽我們部落的老人家講的一段事情。

我的父親是獵人，他曾經被台東地方法院判竊佔國家土地。他就跟法官講說，那個是我阿公的阿公的阿公的阿公，有提出證明，那是我阿公的阿公的阿公，很久以前就在那裡了這樣，然後卻被林務局告。前一陣子他的槍，又被告槍砲法。所以他就把這兩個起訴書，放在他的家裡面。永遠地告訴他的孩子說：「我

曾經跟這個國家打過仗，這個是我的獎狀。」然後他就跟我講過，我們的高高祖父，曾經在日本人離開之後，犯中國人的法，來到了台灣。我的爸爸是這樣子的劣根性，我的祖父更加的劣根性。他說法官在判他的時候有拍桌子。我的阿公嚇一跳，也拍桌子。法官罵他說：「你幹嘛拍桌子！」他罵法官說：「你幹嘛嚇我！」各位這就是我們。

森丑之助來到台灣之後，好好的研究台灣。他說這個民族太特別了，沒有任何的法典。但是那時候他在書上面就寫到：他們有三種特質：第一個，擁有獨立的精神；第二個，善戰；第三個，他們沒有任何的法典。為什麼彼此間，部落跟部落的可以維持得這麼好？這是文明社會所不能觸及的一個文明的頂點。這群人卻活在台灣的土地上面。各位，當我看到這點的時候，我就在想，為什麼過去我們的老人家是用這種方式在這個土地上面生活？

我昨天去看了我的一個沒有血親的妹妹當了媽媽。誰說獵人沒有價值？我教了很多的人，我帶了很多漢人的孩子。各位，漢人的男人沒有史瑞克、沒有阿凡達、沒有綠巨人在他們的身上，但我們這群獵人的身上，卻有史瑞克跟阿凡達。各位你們的爸爸沒有辦法教你們，但我們可以給你們。

有一個孩子在我身邊，他是一個同志，是女生，是女生的男生，我好好弄了三年的時間修理她，因為她是花蓮師範學院的學生，來到我的身邊要做碩士論文。我就讓她跟在我身邊。她就說：「Sakinu 大哥我可以在你們家寫碩士論文嗎？我被前面的原住民拒絕了。」我說：「好啊！」我就讓她在我們家白吃白喝半年。你問漢人，怎麼可能在你們家白吃白喝半年？就只有原住民讓她白吃白喝半年。然後她跟我說：「我是我們家唯一要拿到碩士論文的人。」各位，她的媽媽說如果你這次沒有拿到碩士論文你就不要讀碩士了。她真的拿到碩士論文，然後她回去接她的產業。她很抗拒，她不想接她部落的產業。她回去接部落的產業、接家裡的產業，我才知道她們家是台灣裡面數一數二做台灣貿易的大老闆。之後，她又回歸正常，因為她好好的跟獵人相處。我要告訴她這個才叫真正的男人，女人你想當男人，你就好好的當女人，我在山上跟她說。當她看到我背起一隻水鹿的時候，我說：「你想當男人，背看看。」從那下重擊她的靈魂，回歸她本身的女

人。各位你想，當一個爸爸來說，當他的孩子回歸到可以替他們家接產業，拿到了碩士論文，又當了一個媽媽。這不就是一個爸爸想要的事情嗎？

各位，我的能力不及，我不能說我多麼厲害，但我透過獵人的方式、的教育方式，好好的讓一個漢人的女人當媽媽。我有沒有在這個台灣上有獵人的價值？有！我給她的是這個。她的爸爸有一天打電話給我：「Sakinu 我有一台哈雷摩托車，很適合你！你的個性太適合它了！」我就跟他說，我不要這個，因為如果我騎這個，別人會說我是不是有某種特有關係。我說我還是走路好了。各位如果你去想像你是一個媽媽，如果你站在懸崖，你的孩子過來握住你的手，他是皮皮挫的。我們台灣的孩子就會皮皮挫。如果這個媽媽受過獵人的訓練，喜歡大自然，孩子一握到媽媽的手的時候，那個媽媽是 very strong！媽媽直接給孩子的就是史瑞克跟阿凡達。

各位，在台灣的原住民、在台灣的人，沒有好好的去想，真的不要騙我。我是去過美國跟加拿大、去日本參加過狩獵會議的人。美國打獵，是十月到隔年的三月。加拿大打獵是九月到隔年的四月。臨近的日本是十月到隔年的三月。就只有台灣中華民國的政府，給原住民打獵一個禮拜，原住民好高興！我到底……各位，難怪警察會一直抓啊，你們不要罵警察，要罵這個 government，這些人在處理這個政策的時候，沒有好好的讓原住民去想，法官也不要那麼累啊。但是各位，我們的處境卻是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當你去開人家會議的時候，各位，你花那麼長的時間這樣子在半年的時間裡狩獵，裡面又制定了很多的細則。待過這麼長的時間，才是一個文化的傳遞。各位，一個禮拜怎麼傳遞文化？所以原住民會想要一直打啊。剩下一個禮拜超過的時間，都是盜獵。

當然也可以維持文化，去年發生了兩件事情，我看台灣的島紀錄片報導墾丁國家公園養了太多的水鹿。那些水鹿就去咬別人的火龍果、咬別人的植物。那些老百姓就跟國家公園抗議說：「你養那個水鹿吃我們的火龍果，不是國家的嗎？你要賠錢啊！」國家就說：「好像沒有這個法條喔？」然後他就說：「啊！你們可不可以叫山上的那個一些原住民來打這些獵物？」也不行喔。第二件事情，玉山國家公園的水鹿太多，都把樹咬死。要開放狩獵，就問布農族說：「你們有沒有

願意去那裡打那個水鹿？因為水鹿氾濫。」布農族的人就回答他說：「你們有派直升機嗎？」布農族太遠了，然後他就講一句話說：「我們部落就有了。」

各位，你可以理解我想要告訴各位的嗎？也就是說在台灣有很多的人，沒有去想我們在想的事情。也沒有用我們的明白來了解我們，總是在誤會我們。不好意思我是一個文學家，所以我會用這樣的方面去看待一件事情。

最後我想跟各位做分享的就是有一年我跟孫主委、原民會去了所羅門。就在所羅門那裡看到台灣派去的農耕隊。那個農耕隊就在那裡跟我們原民會的人講解說：「我們來這裡教導所有的人種田，……。」各位，我從所羅門回來的時候，回來罵我爸爸。我說：「爸，誰教你們種田的？」他說：「漢人啊！」我說：「種田幹什麼！？那麼累，又要挖地墾地積水飲水，然後又要養牛餵牛，然後開地墾地。然後那個米種下去的時候，裡面還沒有種子！然後還要破殼打殼，那麼辛苦。」我就看到所羅門的人，我們農耕隊的人竟然講出一句白人優越感的話，跟我們原民會的人說他們很懶惰。他們不喜歡種米。可是我在那裡看到他們的地瓜好大！一坨好大！各位，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理解我想要說的，我們現在被對待的方式就是這樣、我們被植入在腦袋裡的東西就是這樣。

所以當我們要談我們自己東西的時候……上禮拜我問我的父親，我說：「爸，你不要給我講聖經的東西，你可不可以好好跟我講說什麼叫做我們的法律？」各位，過去的排灣族人會圍圍牆，這是你的土地，這是我的土地。那個圍牆的很清楚。但是土地內一丈，跟土地外一丈，那個叫安全地帶，我們在這裡種芋頭，我們在這裡種放屁豆，他也在這裡種南瓜，他也在這裡種地瓜。誰都能不能越過去，叫安全地帶。所以我對範圍的概念很曖昧但卻很有關係，我們很能處理、很能夠告訴他說：「這樣就好了。」所以這個圍牆在告訴我們說，這個你的一丈跟我的一丈是握手言和的事情。你有種地瓜、我有種放屁豆，我們在這裡交換。但是國家來到我們的土地上面的時候，就用一條線畫區，這個是一零一、這個是一零二。我們的界線裡面就出現了一條線，我們也不知道在哪裡。然後我們那個曖昧的關係也沒有了。所以當我們在處理自己的東西時候，我們的法的認知上面，已經被丟掉了。我們也回不到我們的身體裡面、去看見。

有很多的獵人在部落裡面，就回到剛才孫老師說的，過去原住民在日據時代犯法的時候被打而已，但是現在的獵人，會被掛上莫須有的罪名！那個比被打還恐怖、還焦慮。所以你問現在的獵人，他要不要當真正的獵人？「我不要」。到現在，我們的槍砲法已經在二十年前就已經過了，但是直到現在的原住民他還是不敢申請。我們的警員常常嚇我們的老人家，所以我們原住民處在一個不相信 my government，不相信我們的政府。這個不相信已經讓我們產生一種畏懼跟一種害怕。即便今天法官站在部落：「你們去登記、沒關係沒關係。」他還是害怕，他還是覺得法官沒有很大，小小的警員比較大。所以我們的迫害，不是被這個大國家上面的人，是在以下的人不清楚，甚至不經意、甚至也不小心。

各位，我的工作就是森林警察，但我都主張……在我的隊上告訴長官說：「現在原住民拿鎗跟原住民去打獵，我們當警員的就好好輔導他嘛。」你為什麼去打獵？噢你家裡有人死掉，就附帶嘛！你們家裡有死掉，所以要去打獵。這個現在有習慣法了嘛，對不對！那你為什麼有槍，就像我爸爸，法官問他為什麼有鎗，我的兒子送我的，為什麼有那種禮物啊？他就是這樣子。所以在台灣的社會，我必須要去主張，就像剛才孫老師提到的，我們真的很不一樣，不能因為我們只有一個人，我們就不能被看見。我相信這個民族要發展一個意識起來，要凝結更多的人。

現在我們在台東的部落在處理的問題，像知本過去的問題、卑南族的問題、打獵的問題，是部落跟國家。可是現在，國家的問題處理好了，他們不會去騷擾我們了，但是現在變成部落跟部落的問題。我們會跟卑南族人講：「你們不要再跑來我們的獵場。」這樣的問題是很好的，為什麼？因為我們在彼此互相處理，我們的界線在那裡。如果那個時候原住民都很清楚我們的界線在哪裡的時候，各位，就不要國家來告訴我們在哪裡了。這個就是我們彼此互相再看見狩獵的東西。不是這麼的小、不是這麼的單一、不是這麼的簡單。它在讓我們彼此看見在這個土地上的族群的知識、方式、方法，甚至從所謂的意識上面去表張，原住民的狩獵概念跟意識上在讓這個台灣，有一天就像日本一樣，可以武士道的精神。講到台灣的時候，各位，我們拿什麼告訴別人？我們台灣的精神是什麼？各位，從中國大陸過來到這裡，沒有一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叫做偉大的人。日本有四十七浪

人，忠誠、效忠，但是我們的關公跟岳飛都是被害死！沒有一個故事告訴我們。但是剛才那個布農講的，我看到我的爸爸背那麼大的水鹿，很帥！各位他背水鹿的那個樣子，成為一個孩子內心的偉大。那個拿槍的樣子成為他內心的永遠。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這個就是我們存在這個台灣上的一個價值。

浦忠勇：

在這邊感謝 Sakinu，欲知詳情他有三本書，都還在上架當中。他的書非常精彩，他今天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他沒有唱歌，我一直喜歡聽他唱歌。

這個場次有一個特別來賓，蔡政良。我們給你幾分鐘的時間，做一個分享。在表定上是沒有他的名字，可是他要提供特別的文章，這個是一個很精彩的，關於我們阿美族漁撈的說明。

蔡政良：

我前兩天看到這個會議訊息的時候，我很高興，哇！終於要談狩獵，這一看，海去哪裡了？因為當獵人真的不簡單，可是海洋的獵人跟山上的獵人真的是一樣的，包含個性、包含禁忌，包含跟社會關係的連結。而且現在在東海岸，我們去年跟海巡署一直有對話，因為我們族人一樣一直被抓。所以在這個手冊裡面我們甚至有整理了目前莫名其妙的、互相衝突的法規、法條、行政辦法。原民會還有林務局辦的這個裡面的一些法條，都會出現一些。

第一個矛盾就是只有從從山的觀點來看狩獵，一直忽略到海洋狩獵的部分。我要講的是，我家裡在蓋的時候，我住在都蘭，我在都蘭部落，我一個裝潢的師傅他是立秋的排灣族人，他也是獵人。他每次放假回去的時候，他也會跟我們講說他要去打獵，他每次來的時候他就會帶著一個一槍打到的山羌的腿來這裡。然後我們就會給他我們一口氣打到的魚給他交換回去。所以我們在聊天過程、在交換過程中，他也說：「原來山上獵人跟水底下的獵人是一樣的。」包含個性、包含這些禁忌，完全一模一樣，而且遇到的問題也一模一樣。

包含我們現在漁槍也是一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裡面要管制的同樣的也是一樣，我們部落警察講說：「最好不要去申請，不要申請！」對不對？申請很麻煩，結果不申請就被抓了。好就被抓了，然後第一次勸導，第二次就要去送。

所以其實像這樣的一個情形，我是建議是說未來在談狩獵的時候，千萬不要忘了我們在東海岸的阿美族人，包含蘭嶼，蘭嶼可能是因為 government 管不太到。東海岸很多 government，還有又多了一個東管處，所以蠻多 government 的。

我這邊也建議原民會這邊，因為七月份那個海洋委員會要成立、要掛牌。我那天去參加前任立法委員邱委員，海洋這個討論會、研討會。裡面中央部會、各部會都來了。我注意一下，誒？原民會呢？我覺得就是說包含海洋這部分，我想可以多去參與一下，不要忘了我們在東海岸的阿美族人。

浦忠勇：

非常感謝，我當時在承攬原民會的狩獵文化的時候，本來是狩，那個漁是被括弧的，我們主委是阿美族的，他就看到了，他就說怎麼可以把狩獵，漁是括弧的，他說不行。後來這個計劃的名稱就被改了，狩獵暨漁撈文化。在那之後就不會忘記了。

然後我在閱讀阿美族的整個文獻的時候，我們一直有一個誤解說他們就是吃草的民族，只會游泳、抓魚。錯了，看到他們的文獻，我看到狩獵陷阱精巧的程度，我經常看到。誒，我是不是在讀阿美族的？把封面再翻一下，沒錯，是阿美族的啊！然後再繼續看，會以為是排灣族、布農族或者是其他族的。阿美族他們不但有很特殊的漁撈文化，他們的狩獵也是非常的精巧。那其他的也都是一樣，所以我們的狩獵、漁撈應該是不會被偏廢，你們放心好了。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如果說有特殊的、想要跟我們在座的講者有一些對話的，或者是有問題的，你想要提出來的、你必須要講的，我們就有兩、三個問題，是針對想要再進一步去釐清了解的，有嗎？

與會者發言：

目前我們國家的法令管槍，一個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它底下有一個申請管理辦法。另外一個是管野生動物的獵捕，那有野生動物保育法以及它所訂的這些管理辦法。這些管理辦法都是要申請，然後呢政府核准以後你才可以按照這個數量去持有槍或者去狩獵。

持有槍有非常嚴格的對於自制獵槍的定義，之前是只能有前膛的，現在是還可以加一點，但限制非常嚴。請問三位對國家這樣子的管槍、管狩獵的法律，你們覺得以你們的想法該怎麼樣去把它改掉？有一種改法是說請把擁有槍支、槍支管理的權力或是是請把狩獵跟狩獵的規範管理的權力還給部落、還給原住民。如果還給部落、還給原住民，由原住民自己管的話，如何讓這些官員們認為說你們不會過度的狩獵或者是持有殺傷力強大的機關槍？

浦忠勇：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很嚴肅的問題。我們指定三位，每個人兩分鐘，就開門見山講你的觀點。

Lumav：

我覺得獵槍的部分真的是要回歸到我們自己的族人來管理，然後再來我覺得他管理的辦法是綁手綁腳。以前我們的獵槍是沒有在家裡的，我們的獵槍都是放在獵寮裡面。我們的獵槍人家是不會偷拿的，因為我們都有用一些慶典，我們講的 tis qavit, tis qavit 如果有人去偷的話，那個人他馬上就會中我們的那個咒詛，在那邊都有祭師，是因為現在這些祭師、祭師團已經全部沒有了，所以造成現在因為在國民政府來以後，綁手綁腳。所以到現在我們的獵槍還用這樣的條句式，我們的族人都很怕去登記。

黃長興：

我們最近連續辦了幾次狩獵文化的活動，在一年以前在南區要向總統報告這個，也寫了一個案。我的原則是你剛才所講的，回歸部落去管理，兩者都回歸部落。但是我們要加強我們的內在的訓練跟教育。有一件事就是要進山，因為現在進山的並不多，頂多是跟著去的，跟著去的話就看嘛、去湊熱鬧嘛，真正的獵人

才帶槍才去狩獵。那他覺得他去享受這些高山運動、健身運動而已。那麼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就經常講如果現在自治法一旦通過以後，對我們太魯閣族來講那是我們工作的開始。會鬧起來的，因為什麼？事先沒有規劃。所以我們要開放之前、要回歸部落管理之前，最好還是由我們的 government 來做一個規劃。每一個部落、每一個族都組成一個監督小組，自己監督自己，不是政府來監督。像我們現在保育的話，我們有季節的保育啊，不是沒有然後全天候在打獵，不是談。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獵區管理。這是你的獵區、那是你的獵區。你的獵區有兩個國家，我們過去太魯閣族的時候完全是槍對槍，沒有商量的餘地。日本人把我們，從理性、從派出所去解決，但是我在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曾經看過兩個獵人在派出所刀對刀、為了獵場紛爭。這些問題現在目前來講，我們可以透過現在部落的組織規劃起來，先從內部訓練出來。如果開放的話，我告訴各位，先決條件是你的部落準備好了沒有？

浦忠勇：

我們的重點就在部落的自我管理，我們再請 Sakinu。

Sakinu：

直接站在槍的觀點上，原住民只要自己做槍，沒有不合法的概念，但對政府來說那是不符規定。我們要跟我們的獵人這樣說不符規定。再者就是，當然我很期盼，這個世界都在進步，直到現在台灣的原住民還在使用十七、十八世紀的火槍，真的是替世界保留了很棒的遺產。全世界裡面，就只有台灣的原住民是全世界擁有最多槍支，但是卻沒有殺過一位警察。你知道這個是一個多麼高的民族的智力嗎？只有打到自己，第二個，打到他的獵物。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觀點的時候，當然我們會很希望以現有的環境，我們的槍的確要擁有另一個方式，甚至自己經營、甚至在自我的管理上面或者怎麼管理這個槍支，要有自己的態度、自己的主張。但不外乎的是，當然有時候，當我們透過合議，對自己的族人約束的時候不達到約束自律的時候，國家某個程度上它必

須要去做介入的。不然對原住民來說，如果你又不主張讓自己對狩獵的意識有狩獵的概念，甚至使用槍支的認知。你不能講說你當過兵、拿過 M16 步槍，回去就可以當獵人，不是，但是現在這個態度卻在部落裡面慢慢的起來。我們必須要有很多長輩去約制、去約束，甚至灌輸什麼叫做獵人的行為？獵人的知識、獵人的態度、獵人的素養。

浦忠勇：

好，我們感謝我們三位很精闢的回應。我們這個場次就是請部落的獵人來做一個分享，從他們三個所提到的，我們會有一個概念就是狩獵它其實是一種生活，是一種整體的、一個圓的，一個一個...一個活動。可是我們國家的法令就是把，最大的爭議點是：槍支、生態再來是動物。這樣的東西把它一個一個的抽離出來。抽離出來之後，比如說槍支，剛剛的問題，最爭議的就是槍支。

現在我自己的部落的人我們前幾天才做一個部落的獵人尾牙，小小部落獵人尾牙居然幾十個人出席。但是我們的槍呢？沒有在山上，在哪裡？不知道。現在我們的部落事實上狩獵槍支非常非常多，可是現在變成完全都地下化，怕警察、怕法官、怕檢察官，什麼都怕，怕動保人士，全部都怕。那是不是我們就是放任這樣的一個發展？還好我們聽了獵人的聲音之後，這是我們這個研討會非常精心的一個設計，下午的第一個場次就是法官來講他們的一個觀點，其實很多法界的人士比現在我們想像的更前進。

原住民獵場管理與野生動物保育的夥伴關係

裴家騏

從野生動物經營管理與保育的角度來看，最近大家在討論狩獵議題時，常提到的「狩獵行為對野生動物保育是傷害」的論點，跟我自己的認知差距很大。大約在1985年之後，強調野生動物保護的保育學界和強調野生動物資源利用的經營管理學界之間，就已經達成合作互利的共識，不再是對立的了。在那之後，最常聽到的論點反而是「野生動物保育需要經營管理（的實務操作與經驗、技術）」，以及「使用野生動物永續利用（的手段）來達到保育的目的」。因此，最近國內的討論倒很像1985年以前國際上相互爭論的狀況。以下針對幾個大家常提起的原住民狩獵議題或疑問做一些說明。

狩獵文明嗎？

一個常見的說法是「狩獵是不文明的、是不符合動物權的、是不人道的」。不過狩獵（和漁撈一樣）到現在都是所有人類社會普遍可見的行為，只是工業化國家中比較多的人口是進行運動性和休閒式的漁獵活動，其他國家則多是生活化或生計性、經濟性的狩獵。因此，狩獵與否應該與文明進程無關。至於「動物權」方面，我自

己比較不常講動物權，因為我覺得礦物、植物和動物的分類，其實只是反映了人類對萬物的理解和認識的程度不同罷了。難道植物沒有感情世界、沒有思考能力、沒有感覺嗎？我相信很多人已經不同意這樣的說法了。100多年前絕大多數的科學家都不認為比人「低等」的動物有感覺，可是現在我們對其他動物的認識大大增加了，已經沒有人反對「人不是這個世界上唯一有情感、有認知能力的動物」的說法了。我想再過一段時間，大家也一樣會普遍承認植物甚至礦物都是有感情和知覺的。不過，雖然我不太講動物權，但是當談到狩獵的時候，我則是堅持要顧及人道要求與動物福利的，我反對誤傷非目標動物，也反對虐殺或凌遲式的獵捕過程。

現代的原住民還尊重傳統禁忌、慣習和傳統知識嗎？

另一個常見的疑問是：「傳統禁忌、慣習和知識還存在嗎？」事實上，很多禁忌和慣習現在確實都還存在。例如夢占，現在的獵人還會說夢到好夢就要趕快上山，才不會錯過祖靈要給他的禮物；有不吉祥、不吉利的事情發生，大家仍然會視為是一種警訊而取消出獵行程。再例如，大家也多覺得：決定收穫量豐富與否的，不是狩獵技術是否高超，而是獵人的品德；出發前講會豐收的大話仍然是禁忌；不破壞環境和分享仍然是美德……等。當然，我們也會遇到一些完全不在乎傳統慣習的獵人，但是我要強調的是，這些傳統的禁忌或慣習確實有助於永續的利用野生動物資源，但並非永續利用的關鍵或決定性因素。事實上，在西魯凱族的狩獵研究中，我們很早就認識到多山難行的地景和季節性惡劣的氣候，是台灣的環境條件對山區狩獵活動自然形成約束的主因，再加上原住民部落族人的在地化、實質且有效的管理獵場內的狩獵活動，才是一直以來山

羌、山羊、水鹿、野豬這些獵物得以持續收穫的重要因素。一直到現在，上述這些物種都仍然是台灣自然環境中，最常見的幾種較大型的野生動物。

同樣的，「傳統知識還有在傳承嗎？」事實上，我現在傾向用「在地知識」而不用「傳統知識」來說明在地人或社群對當地環境的累積認知或知識，因為知識甚至文化都應該是流動的、動態的，不應該被「傳統」兩個字凍結在歷史上的某一個年代；而「在地」兩字則隱含了在當地的時代演變。我在台灣東部看過很多原住民部落，他們百年來文化遭受激烈的破壞，被長距離集團移住過，原本分居的家族被故意混居；但到了現代，他們在新的居住地依然產生了新的狩獵秩序和新的獵場管理。也就是說，這些部落即使經歷了劇烈的文化迫害和破壞，仍然有能力發展出新的、有效的治理機制，展現出文化主體性的韌性。這些新的治理內涵或許和數百年前的「傳統」有所差異，但也確實因地制宜的發展出「在地」且有用的機制，並在共同生活的社群中被肯認和有效實施。不過，因為台灣的主流社會近年來普遍對原住民族狩獵活動的污名化，使得獵人們都不太願意公開的談論其細節，令外人難窺其全貌。其實，只要我們願意承認並尊重在地治理現況的存在，這些在背後支撐的在地知識就有機會被討論、被科學性整理和被文本化。在地知識經文本化之後，就可以運用在現代的自然資源治理上。

非營利自用的開放會造成野生動物的浩劫嗎？

針對可能會將原住民的「非營利自用」納入許可狩獵的範圍一事，許多反對者都認為自用沒有明確的定義，因此，「親朋好友間的餽贈算是自用嗎？」「以物易物算是自用嗎？」有些人認為若這

些人情或日常慣習沒有定義清楚，則一定會產生過度使用的現象，台灣的野生動物將會面臨大屠殺的命運。其實，無論如何定義「自用」，都只是定義「使用目的」，但是否會過度使用，則只需要對總使用量進行管理即可。在總使用量的限制之下，其中即使有部分被用來餽贈或交換就都不是重點了。許多國家現在都採取總量管理再加上族群監測，這兩件管理工作能做到的話，應該就能做到永續了。

事實上總量管理並不是新的概念。鄒族的老人家會說「你不要以為你想打多少就可以打多少動物啦！祖靈給你的就是這麼多的，不會再多啦！」這就是總量（上限）的概念；以現代生態學的角度來看，一個地方有其動物數量的上限（就是所謂的環境負載量的概念），也就是說，單位面積內會有多少隻山羌、山羊……等動物，雖然不至於會是一個一成不變的固定數字，但仍會是在一個相對小的數字範圍內浮動。

而受限於地形和地貌，獵人在他們的獵場內總是只能狩獵到其中的一部分。例如，西魯凱族的獵人每年大約只在他們獵場的5%範圍內獵捕動物，其他則是休獵區和可及性低、或不宜狩獵的環境，任何人要想明顯的擴大狩獵範圍以增加收穫量是有實質困難的。而萬一真的有人以合法掩護非法，採取某種無法被察覺的非法手段而大量增加了收穫量，並因此傷害了野生動物的族群，而致有無法永續之虞時，原則上也一定會反映在族群的監測結果上，管理機構仍然可以即時做出必要的反應（例如：降低總量、短期禁獵、縮短獵期……等），以阻止持續的過度使用，並讓動物族群得以恢復。

為什麼只有原住民可以狩獵？

常聽到「野生動物保育法（簡稱野保法）為什麼要讓原住民有狩獵的特權？」的批評，這個批評是來自於野保法第21之1條，「特別允許」原住民族為了傳統文化、祭儀所需，經過事前申請且獲得政府許可後，可以狩獵野生動物，甚至包括保育類的物種。我覺得這裡面有些誤解。其實，根據野保法第17條的規定，縣市政府是可以公告狩獵區，讓一般國人都有機會在狩獵區內進行運動性、休閒性或自用性的狩獵。只是野保法從1989年公告以來，還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政府公告了狩獵區。但這麼多年幾乎是全面禁獵的情形都過去了，好像也沒有漢人朋友強烈的要求地方政府非公告狩獵區不可，我想應該與漢人少打獵有關，這是文化和生活慣習上的差異。不過，漢人中有相當多的人喜歡溪釣或海釣，但野保法中對於釣魚這項慣習行為卻沒有納入管理（只有公告不能釣的魚種而已），這應該才是一個最大的特權。未來，我們的野保法應該要與其他已工業化的國家一樣，漁、獵都有經營管理才對。

其實，野保法21之1條的現行規定，幾乎與原住民的傳統慣習是違背的，與「尊重」原民傳統文化的目的並不相符。全台灣有700多個部落，每年按照21之1條去申請合法的傳統祭儀狩獵的有多少個部落？應該是少之又少吧！大家都不去申請，正是因為規定與慣習有衝突。比如說，現行的申請書要填寫以下資料供審查：部落裡有哪些獵人，預計在何年何月何日、在哪些山區地點，打算要用何種狩獵工具，目標是哪些物種，各預備獵捕多少隻；光是這個申請書就讓很多原住民卻步了，因為絕大多數的獵人都仍然相信獵物是祖靈給的禮物，如果在狩獵之前如此囂張自滿的預告狩獵成果，乃是

冒犯祖靈的行為，上山打獵將不會受到祝福。再加上所附的獵人名單有相當多的個資，甚至可能因此而引來警察的「關心」，所以大家不太願意填寫與申請。我們應該要想辦法去改善這樣與慣習矛盾的狀況，否則21之1條形同虛設，更成為無效的管理。

同時，現在大家所批評的野保法第21之1條，其實是限縮了原住民只能為了「傳統祭儀」所需而狩獵，完全忽略了「傳統文化」的狩獵需求。事實上，日常自用的狩獵本身就是原住民族的文化，本身就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現行規定不但限制了原住民族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甚至還因為事前申請制度與傳統信仰嚴重的抵觸，而不被大多數原住民部落所接受與遵行，該項規定也形同虛設，不但沒有達到尊重文化的目的，更無益於野生動物之保育。這種雙輸局面亟待改善。我們常常看到原住民因為狩獵山羌和山羊而被移送法辦並被判刑的新聞。官方網站的資訊顯示，2004年以來，至少有259個案件、382位原住民因為日常性狩獵被起訴¹，很多案例只因

1 法律扶助基金會台東分會陳采邑律師在司法院網站上，以判決中有（野生動物+原住民）或（自製之獵槍+原住民）作為檢索條件，檢索自民國93（2004）年1月1日到民國105（2016）年6月30日之間，判決理由中有敘明被告為原住民身分之狩獵案件所得到的結果（排除單純持槍或其他犯罪之案件和地檢署偵查終結之案件）。但民國102（2013）年1月1日司法院原住民族專庭或專股設立前，判決中沒有強制要註記原住民身分，因此，102（2013）年以前之原住民狩獵遭判刑之案件應該要更多才對。這些案件所牽涉到的保育類野生哺乳類動物有山羌、山羊、水鹿、白鼻心、棕葉貓、獼猴和穿山甲，均非瀕臨絕種的動物，且除了穿山甲僅少數地區常見外，其他6個物種在台灣都是全島性很常見、野外數量不是穩定就是局部增加中，但在總共260個案件中，分別就有高達168個和55個案件是因為獵捕山羌或山羊而被起訴。穿山甲則有2個案件各1隻、各1人遭判刑。

為山羌、山羊是保育類動物，當事人就被判刑（布農族獵人王光祿就被判了3年6個月），完全忽略了這兩種動物分布非常普遍、數量非常多的事實。原住民獵人除了打獵外，更肩負維護部落安全與疆域完整的責任。當這些原本應該是部落裡的英雄人物，紛紛變成不名譽的階下囚時，對文化、社會的維繫，對土地、資源的管理機制又將產生多大的破壞呢？

野生動物的數量都不知道，開放狩獵怎麼管理？

「不知道野外的動物數量，可以開放狩獵嗎？」是另外一個常見的反對狩獵的意見。其實，台灣從來沒有真正「禁獵」過，鄉間和山區的狩獵活動一直都存在的。現在希望能夠將非營利自用納入許可範圍的作法，並不是要「開放」或「恢復」不存在的狩獵活動，充其量就是將一種長久以來的慣習除罪化而已，並期待因此可以正式的納入管理。畢竟，缺乏管理的狩獵活動比不知道數量還糟糕。也就是說，台灣的現況就是充斥著沒有數量依據、沒有科學化管理的狩獵活動，而常見物種如山羌、山羊、水鹿、野豬等，之所以沒有因此而逐漸減少，應該和台灣的自然條件有很大的關係（見前述西魯凱例子）。當然，大多數原鄉的獵場仍然有某種程度的在地管理機制，也是原因之一。其實，有效管理和永續利用野生動物無須以族群數量為依據，尤其是類似前述的常見物種。他們的野生族群量原本就會在年與年間有隨機的明顯波動，在其他工業化國家也都是以掌握族群趨勢作為狩獵管理的依據，這也顯示出長期的族群監測是多麼的重要了。族群趨勢的監測（通常是用指標）無須知道正確的族群量，只需知道指標是增加或減少即可，因此，獲得趨勢要比獲得實際數量方便非常多。我們現在開始監測還來得及，因為常

見物種的族群現況是可以提供永續利用的。一旦有了監測資料，我們將可以對於狩獵活動進行實質的管理，更能達到野生動物保育的長期目的。

不過，缺乏管理的狩獵，確實會對野生動物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眾所皆知，台灣可考據的野生動物利用和管理歷史中，就有過因過度捕獵並因此重創野生動物的紀錄。例如，在荷蘭時期，鹿科動物的毛皮和內臟大量的被輸出貿易，讓台灣的野生梅花鹿族群從此一蹶不振，並於1960年代在野外完全滅絕；日治時期的野生動物皮草貿易也是，當時大量的收購食肉目動物毛皮，非常可能就是造成後來雲豹、水獺滅絕和石虎瀕臨絕種的主要原因。根據報紙的報導，1928年當年全台獵獲的熊就有565隻、豹2隻、山豬1000多頭，而消費的彈藥數是25663發。另一項統計資料則顯示，1933年的下半年，當時政府在原住民地區總共收購了山貓（石虎）毛皮1000多張。我估計那時候的石虎族群量應該有5000-6000隻的規模，而當年那樣的狩獵量一定是過量的，因為後來就愈抓愈少了，並且使得石虎族群一蹶不振，到了現在，已經剩下不到500隻了。所以，掠奪式的狩獵確實會造成傷害，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一定要有實質的管理。

很遺憾的，近代我國的狩獵管理並沒有更好。日治時期之後，1949年開始我們採行了1932年在中國大陸設立的「狩獵法」，將名錄修改成台灣的物種。當時狩獵法的管理單位是經濟部跟內政部，經濟部是因為野生動物有經濟利用的效益，內政部則是警政單位負責管理狩獵活動和狩獵工具（包括槍械）。到了1973年為了配合槍砲彈藥的管制，就凍結了狩獵法，一直到1989年野生動物保育法取代了狩獵法。兩位對台灣的野生動物有相當了解的美國學者，

Richard Taber和Dale McCullough²，他們對台灣的看法是：1949-1973年這段時間的狩獵法是「無效的管理」，因為幾乎不及於農村跟山區；鄉下的農民跟山上的原住民大多有打獵，但大多不知道曾經有過狩獵法的管理。至於1973-1989年那段凍結狩獵法的年代，他們的評論是「流於紙上管理（就是沒有實質管理的意思）」；事實上，這段時間正是台灣山產市場最熱絡的年代。也就是說，雖然凍結了狩獵法，狩獵行為並沒有被凍結。台師大的王穎教授曾在1985年估計全台灣山產店賣的山肉數量，當時一年可能有高達25,000隻的山羌被消費掉，而水鹿則達數百隻。最後，到了1989年以後的野保法年代，Taber的觀察則是：台灣是工業化國家當中，野生動物狩獵管理最不到位的國家。也就是前面所講的，儘管想要維持全面禁獵的規定，卻同樣的沒有做到。這就是我擔心的，如果無法禁獵，就應該要做到管理。不過，野保法的施行似乎減少了山產店，也明顯的減少了較大型動物營利性的狩獵³，算是有成效的部分⁴。只是自用性狩獵仍然存在。

2 台灣做野生動物研究的人，對他們兩位應該都不陌生，尤其是Dale McCullough，他於1973年受政府的邀請來台灣進行過全島性的較大型哺乳動物普查，是日治時期之後的第一人。這兩位學者都得到Aldo Leopold Award終身成就獎。Aldo Leopold（李奧波）被譽稱為野生動物狩獵管理（保育）之父，對現代的影響很大。

3 1970-80年代，獵人獵到的100隻較大型動物中，大概就有80隻是賣到山產店的。可是到了1990年代以後，這個情形就逐漸消失了。

4 也有人認為是因為山產店已經不流行了，所以才減少的。就跟過去走私紅毛猩猩一樣，後來是因為台灣的市場沒了，才不再走私進口。不過，無論如何，野保法應該還是發揮了一定的功效。

保育類動物可以開放狩獵嗎？

當然可以。

其實，現行的野保法中所謂的「保育類野生動物」，包含了殘存數量太少而且還在減少中的「瀕臨絕種」動物，以及數量其實還好甚至極為常見的「珍貴稀有」動物和「其他應予保育」的動物。這三類保育類動物的名單，是在1989年野保法首次面世的時候，由專家們共同商討出來的。當時對野生族群的狀況普遍缺乏資訊，因此，不少物種的保育地位是不正確的。到了2008年，我們才採取了一套較有科學依據的名錄制訂辦法，每個物種根據牠們野生族群分布的普遍與否、野生成年個體數量的多寡、野生族群數量增減的趨勢、是否為本土的特有物種、棲地消失的速度，和獵捕利用壓力的高低等項目，分別進行評估並給分。之後，先將超過兩個項目評估不佳⁵的物種挑出來，再根據這些物種所得總分數的高低，分成三級列入保育類動物名錄⁶。

5 所謂族群現況不佳的意思是：在台灣是零星分布或局限分布、數量是稀少或非常稀少、族群下降中或快速下降中、棲息環境在10年內將喪失50%以上、被獵捕及利用之壓力對其生存會有高度或嚴重影響。任一物種只要出現以上1-2項的評估結果，就會被建議納入保育類動物的名錄。

6 不過也有例外，就是如果已經放在名錄裡的物種，即使完全沒有前述不佳的評估結果，也只能一次降一級，這是一種國際上常用在名錄調整時的預防措施，以避免保育位階的調降造成該物種面臨未預期到的生存風險。例如：山羌和獼猴就是因為在1989年的名錄中列為第二級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當在2008年名錄重新檢討時，雖然沒有任何族群不佳的現象，理論上是可以從保育類動物的名錄中刪除的，但因為這個預防措施，當時也只調降一級，都成為第三級其

因此，瀕臨絕種、珍貴稀有或其他應予保育的這三個動物名單，是有族群危急程度不同的分級概念的，理論上應該要有分級的保育或管理措施才對。例如：對於第一級瀕臨絕種的動物應該要嚴格進行個體的保護，個體到哪裡，就得保護哪裡，而且要採取必要的手段阻止族群數量繼續的漸少，並要設定在一定的年限內幫助族群量回覆到安全的水準，以擺脫瀕臨絕種的陰影；對於大多數族群狀況穩定無虞的第二級、第三級保育類動物，應該進行長期或定期的族群監測，以確實掌握變動趨勢，而如果也同時是傳統的狩獵物種，則可以用永續利用的管理流程，來擔任長期族群監測的任務。但這種比較合理的分級管理制度，在我們的野保法中並不具備。事實上，大多數的國家都是另立專法⁷來強力復育瀕臨絕種的物種，而以狩獵法來管理其他的物種；只有強力的作為才有可能讓瀕臨絕種動物起死回生，讓名錄越來越短。我國以一個野保法來管理族群狀況天差地別的所有物種，又沒有分級管理的機制，形成保育強度輕重不分的現況；也因此，對瀕臨絕種動物的照顧不足，讓他們無法擺脫厄運，而對其他物種卻保護過當、缺乏監測與實質管理。

由於野生動物永續利用（包括狩獵）多採取適應性管理⁸的取

（續）

他應予保育類動物。也就是說，再下一次的名錄檢討時，沒有意外的話，這兩種動物都會調降成一般類的野生動物，不再是保育類物種了。同樣的，從山羊和水鹿近年來的族群變動趨勢來看，持續降級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

7 例如美國在1973年通過的「瀕臨絕種動物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對瀕臨絕種和即將成為瀕臨絕種的動物採取高規格的保護措施，並要求政府要限期實質改善這些物種的狀況。

8 適應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是一種「執行→監測→檢討→修改→執行」的循環式管理決策模式。基本上，是現代化國家在管理或保育充滿變數的野生動物族群時的慣用策略。

徑，而在持續實施的過程中，會自然產生族群長期監測的資訊，有利保育策略的擬定、微調或修正，因此，國際上甚至會將永續利用的選項納入復育瀕臨絕種野生動物的策略中，尤其是當資訊尚有不足的時候。一向以保護瀕臨絕種野生動物為最高目標的華盛頓公約（CITES），就有幾種附錄一物種⁹的營利性貿易的特例。例如：會造成農民生命財產損失的花豹和獵豹，非洲原產國因為會有必要的危害防治獵捕需求，因此CITES特許這些國家可以合法的出口這些危害防治所獲得的毛皮；各國的出口配額數量不同，但都需要持續的監測並提供族群動向給CITES大會參考。還有，目前數量分佈極不均勻的非洲象，也允許分級列表，在數量稀少的國家是附錄一物種，在數量多的國家則是附錄二物種，並許可屬於附錄二的國家營利性的出口大象或其產製品，也算是一種對保育有成效的獎勵。

我對未來的期待

一直以來，原住民的狩獵從來沒有停止過，在可見的未來應該也不會停止狩獵，或停止吃山肉。這就好像住在海邊、河邊的人家，餐桌上常會有捕來的或釣來的魚，一樣的自然。近代即使是經歷了1970-80年代的山產市場的大量獵捕，但並沒有造成主要狩獵物種的消失。現在，山羌、山羊和野豬在絕大多數的山區都仍然是最常見

9 華盛頓公約（CITES）針對幾個附件名錄進行不同程度的營利性貿易管理，以期達到物種保育的目的。其中附錄一物種是那些受到營利性貿易行為高度威脅的瀕臨絕種動物，附錄二是那些商業貿易活絡且可能因此而瀕臨絕種的動物。針對附錄一物種基本上是禁止營利性貿易的，而附錄二物種的營利性貿易則受到嚴格的國際監控，以防過度利用而對牠們造成傷害。

的較大型物種，而水鹿也在部分地區持續的增加中。這些現象反映出目前的狩獵活動，還沒有傷害這些野生動物的族群。不過，如前所述，這種狀況的存在並非是因為我國狩獵管理上軌道所致，未來仍然有非永續利用的可能性。因此，一個現代化狩獵管理機制的發展仍然有其必要。現在是國家統一治理山林及野生動物，政府使用同一套森林法、國家公園法、野生動物保育法在管理全台灣，但這樣子的治理模式從1949年以來都已經呈現是無效的，未來如果能夠回到過去，將台灣的山區化整為零，以數千個上萬個的原住民族獵場為單位，推行各地的在地狩獵自主管理，取代現在的中央集權式管理機制，再搭配野生動物的族群監測，相信會更有效、更實質的管理狩獵活動，也才能做到名副其實的野生動物保育。

裴家騏，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與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教授，積極推動各層面的野生哺乳動物的族群生態學、保育生物學和保育人文學。他成立了屏東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也參與世界保育聯盟（IUCN）的鹿科、野豬和野生動物健康等專家群。

大法官解釋進階查詢

釋字第646號解釋

瀏覽人次：4190 < 第 646 筆 / 共 801 筆 >

[回列表頁](#)

解釋字號

釋字第646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7 年 09 月 05 日

解釋爭點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22條違憲？

解釋文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處行為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對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子遊戲場業者，科處刑罰，旨在杜絕業者規避辦理營利事業登記所需之營業分級、營業機具、營業場所等項目之查驗，以事前防止諸如賭博等威脅社會安寧、公共安全與危害國民，特別是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情事，目的洵屬正當，所採取之手段對目的之達成亦屬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意旨，與憲法第八條、第十五條規定尚無牴觸。 1

理由書

人民身體之自由與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八條及第十五條定有明文。如以刑罰予以限制者，係屬不得已之強制措施，具有最後手段之特性，自應受到嚴格之限制。如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且施以刑罰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而刑罰對基本權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及行為對法益危害之程度，亦合乎比例之關係者，並非不得為之（本院釋字第五四四號、第五五一號解釋參照）。惟對違法行為是否採取刑罰制裁，涉及特定時空下之社會環境、犯罪現象、群眾心理與犯罪理論等諸多因素綜合之考量，而在功能、組織與決定程序之設計上，立法者較有能力體察該等背景因素，將其反映於法律制度中，並因應其變化而適時調整立法方向，是立法者對相關立法事實之判斷與預測如合乎事理而具可支持性，司法者應予適度尊重。 1

電子遊戲為個人休閒活動之一，電子遊戲場乃成為現代人抒解壓力及娛樂之場所。電子遊戲場業之經營，除涉及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外，由於電子遊戲之情節引人而具輸贏結果之特性，易使兒童及少年留連忘返，而兒童及少年長時間暴露於學校與家庭保護之外，難免荒廢學業、虛耗金錢，而有成為潛在之犯罪被害人或涉及非行之虞，又因電子遊戲之操作便利、收費平價，亦吸 2

引一般社會大眾大量進出或留滯，一方面影響公共安全與社區安寧，另一方面往往成為媒介毒品、色情、賭博及衍生其他犯罪之場所，因此電子遊戲場業之經營，亦涉及兒童、少年保護、公共安全及社區安寧等問題。為健全電子遊戲場之秩序，使基於抒壓及娛樂之目的而進入電子遊戲場所之消費者，可分別接觸適當之個人休閒活動，不致因各該場所之疏於管理，而誤涉犯罪或成為明顯之犯罪對象，並同時兼顧公共安全與社區安寧，是我國對電子遊戲場業之管制，由來已久。初期由警政機關主管，一度採取全面禁止之管制措施，中華民國七十九年起，改由教育部負責，同年訂定發布遊藝場業輔導管理規則。由於欠缺法律位階之有效法規，主管機關僅得援用公司法、商業登記法、營業稅法及其他相關法規，對包括未經登記即行營業在內之違規行為加以處罰。嗣由於電子遊戲場業之經營對社會治安與善良風俗之影響甚鉅，相關弊案引發社會普遍之關注與疑慮，電子遊戲場業於八十五年間改由經濟部為主管機關，八十九年制定公布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以期透過專法導正經營，並使電子遊戲場業之經營正常化與產業化。本條例施行後，行政院曾函送修正草案至立法院，刪除刑罰規定，惟其後鑑於電子遊戲場業經營之負面影響過大，難以與一般產業同視，為加強管理乃又恢復刑罰之制裁手段。惟兩項修法草案，均未完成立法。

由於電子遊戲場業性質特殊，其營業涉及社會安寧、善良風俗及國民身心健康等問題，故電子遊戲機之性質與內容，依本條例規定應區分為普通級及限制級，限制級電子遊戲場雖亦可附設益智類電子遊戲機，但未滿十八歲之人仍不得進入遊樂。且為貫徹強制分級之管理措施，普通級與限制級不得在同一場所混合經營，以應實際執行管理之需要（本條例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參照）。又為達前開管理目的，故電子遊戲機之製造業、進口人或軟體設計廠商，應於製造或進口前，就其軟體，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評鑑分類文件；並於出廠或進口時，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查驗，合格者，發給機具類別標示證（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參照）；電子遊戲場業者不得陳列、使用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評鑑分類及公告之電子遊戲機及擅自修改已評鑑分類之電子遊戲機（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參照）。另由於電子遊戲場業其營業場所之公共安全攸關消費者生命財產安全，故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應符合都市計畫、建築與消防法令之規定（本條例第八條規定參照）。此外，由於電子遊戲場對社會安寧會造成一定之影響，故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應距離對於環境安寧有極高要求之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院五十公尺以上（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參照）。

本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未依本條例規定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者，不得經營電子遊戲場業。」所謂「辦理營利事業登記」係兼指依本條例第十一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營利事業登記證」及「營利級別證」，辦理營業級別、機具類別、營業場所管理人及營業場所地址之登記而言。而辦理營業級別、機具類別、營業場所管理人及營業場所地址之登記，應符合前述本條例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及第八條等之規定，足見本條例第十五條要求電子遊戲場業辦理營利事業登記，旨在透過事前管制，以達維護社會安寧、公共安全，並保護國民，特別是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目的。

本條例第二十二條進而規定：「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處行為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對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子遊戲場業者，科處刑罰，其立法目的在於藉由重罰杜絕業者規避辦理營利事業登記所需之營業分級、營業機具、營業場所等項目之查驗，以事前防止諸如賭博等威脅社會安寧、公共安全與危害兒童

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等情事，其保護之法益符合重要之憲法價值，目的洵屬正當。本條例第二十二條所採刑罰手段，有助於上開目的之達成。雖罰鍰或屬侵害較小之管制方法，惟在暴利之驅使及集團化經營之現實下，徒以罰鍰顯尚不足以達成與限制人身自由之刑罰相同之管制效果。又立法者或可捨棄以刑罰強制事前登記之預防性管制方式，遲至賭博等危害發生時再動用刑罰制裁，惟衡諸立法者藉由本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所欲達成之管制目的，涉及普遍且廣大之公共利益，尤其就維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而言，一旦危害發生，對於兒童及少年個人與社會，均將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況依內政部警政署提供之數據，自八十五年起至九十六年止，查獲無照營業之電子遊戲場所中有高達九成以上涉嫌賭博行為，另統計九十六年查緝之電子遊戲場賭博案件中，有照營業涉嫌賭博行為者，尚不及一成，而高達九成係無照營業者所犯，顯見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與賭博等犯罪行為間確有高度關聯，故立法者為尋求對法益較周延之保護，毋待危害發生，就無照營業行為，發動刑罰制裁，應可認係在合乎事理而具有可支持性之事實基礎上所為合理之決定。是系爭刑罰手段具有必要性，可資肯定。

末查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科處刑罰，雖可能造成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子遊戲場業之人，即使其經營未涉及賭博或其他違法情事，亦遭刑事制裁，惟因系爭規定之法定刑已賦予法院針對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施以不同程度處罰之裁量空間，再配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微罪不舉、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緩起訴、刑法第五十九條刑之酌減及第七十四條緩刑等規定，應足以避免過苛之刑罰。又現行法對其他與電子遊戲場業性質類似之娛樂事業之管制，就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營業者雖有僅處行政罰者，然對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並非謂某法律一旦採行政罰，其他法律即不問相關背景事實有無不同，均不得採刑事罰。且實務上屢發現業者為規避營利事業登記之申請及其附隨之諸多管制，不再於固定地點開設電子遊戲場，而藉由散見各處之小型便利超商或一般獨資、合夥商號作為掩護，設置機檯經營賭博，相較於其他娛樂事業，電子遊戲場業此種化整為零之經營方式，顯已增加管制之難度，並相對提升對法益之危害程度，相關機關因此決定採較重之刑事罰制裁，其判斷亦屬合乎事理，應可支持，尚難驟認系爭規定對基本權之限制，與所保護法益之重要性及行為對法益危害之程度，顯失均衡，而有違比例關係。

綜上，本條例第二十二條有關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子遊戲場業者科處刑罰之規定，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意旨，與憲法第八條、第十五條規定尚無牴觸。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賴英照

大法官 謝在全 徐璧湖 彭鳳至 林子儀

許宗力 許玉秀 林錫堯 池啟明

李震山 蔡清遊

意見書、抄本等文件

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林大法官子儀及李大法官震山共同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646抄本(內含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不同意見書、林大法官子儀及李大法官震山共同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相關法令

[展開/收合]

憲法第8條(36.01.01)

憲法第15條(36.01.01)

憲法第23條(36.01.01)

司法院釋字第544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51號解釋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5條(89.02.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6條(89.02.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7條(89.02.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8條(89.02.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9條(89.02.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11條(89.02.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15條(89.02.03)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22條第1項第6款(89.02.03)

相關文件

釋字第646號解釋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本件聲請係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法官葉啟洲所提出。聲請人對所審理的二件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以下稱本條例）案件，被告等分係超商及冷飲店負責人，均未依本條例第十五條規定辦理「電子遊戲場業」營利事業登記，逕於超商及冷飲店內擺設電子遊戲機，經營電子遊戲場業。嗣為警察臨檢查獲，查扣機台及機台內之硬幣，並經檢察官起訴。

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處行為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聲請人審理結果，認為上開二案之被告等固涉有違反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之罪嫌，然因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有違憲疑義，爰依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網站地圖·瀏覽人次:10902768·線上人數:233

Copyright © Constitutional Court, Judicial Yuan, R.O.C.

2019/09/19, 原民

獵人最怕的不是毒蛇猛獸，而是警察——台灣如何讓原住民「自己狩獵自己管」



AAA



李修慧



我們想讓你知曉的是

嘉義縣阿里山鄉族獵人協會理事長高德生說：「你知道獵人在森林裡面最怕什麼？所有人都以為是毒蛇猛獸，但獵人會跟你說『我最怕警察』。」如今，林務局的新計劃，將改變這樣的現象。

文：李修慧 | 圖表設計：高嘉宏

鄒族獵人浦少光在半露天的獵寮（獵人休息用的工寮）旁，放了個跛腳的小茶几，茶几上一桌好菜已經擺好，除了燉南瓜、筍筍湯、酒雞腳之外，還有兩盤離開部落後很難吃到的菜餚：山羌肉炒青菜、涵山豬肉。席間幾位鄒族獵人，一邊閒話家常，一邊夾起這些菜送入口中，彷彿忘記，這些他們如今送入口中的山肉，曾讓他們在「狩獵生活」與「禁獵法律」的巨大鴻溝間惶然不知所措。

現在還有原住民在打獵嗎？

外界常認為，現代原住民的狩獵只為了「祭典」，然而，對許多原住民來說，狩獵仍然是生活的一部份。出生特富野部落，「阿里山鄉鄒族獵人協會」（後簡稱「獵人協會」）理事長高德生估計，以阿里山鄉為例，目前8個鄒族部落，大約還有300人有狩獵的習慣。

今年58歲的浦少光就說，他從8歲就開始跟著長輩上山狩獵。而中正大學教授、獵人協會理事浦忠勇解釋，等長大了可以獨當一面後：「我們打獵是，剛好今天沒什麼事，然後天氣也不錯，冰箱的肉已經沒了，又剛好有一些夢境、徵兆、訊息，（告訴你）這個時候上去（打獵）是可以的，一個人去、兩三個人去，就走了。」浦少光用更生活化的比喻說，就像我們在都市，某天說「我好想吃這種肉，我就去市場去買。我們是到我們後山的冰箱去拿。」

當狩獵成為原住民生活的一部分，才自然而然與宗教祭典結合。高德生以鄒族最重要的「小米收穫祭」舉例：「小米收穫祭整個儀式結束後，會有一個『獵場祭』，每個家族到他的獵場去，去（巡視）獵場的資源有沒有完整，也對當地土地神作敬拜的儀式。」

曾在阿里山鄉特富野部落拍攝狩獵紀錄片的導演林建亨，也以漢人的角度，將狩獵在鄒族人心中的意義比喻得更清楚：「如果你阿嬤，初一十五到廟裡拜拜，你不讓她拜，她會不安，獵人，如果他不給他打獵，他會不安。獵人不進行狩獵，很多儀式無法完滿。」



當時，《野保法》第5條就明定，「保育類野生動物，除本法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獵捕。」違法的話，最高可以被處3年有期徒刑。而針對非保育類的一般野生動物，《野保法》16條雖然規定可以狩獵，但是必須在縣市政府劃定的「狩獵區」內進行，但全台沒有一個縣市政府有劃定狩獵區，《野保法》的頒布，等於開啟了台灣「全面禁獵」的時代。

直到2004年，《野保法》才增訂兩條與原住民狩獵文化有關條文，寫明原住民族如果為了傳統文化或祭儀，必須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可以不受那麼嚴格的限制。但相關的詳細辦法（也就是《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一直到2012年才頒布。

《野保法》除了長年忽視原住民狩獵的需求，訂定的《辦法》也與原住民文化不合。浦少光和浦忠勇說，這個《辦法》至少有兩點規範，對原住民來說太「強人所難」。

首先，《辦法》要求獵人在申請狩獵前，必須先經過部落會議同意。而舉辦部落會議的流程非常繁瑣，需要整個部落過半家戶出席會議，會中還得有過半家戶同意，才能送出狩獵申請書。

另外，《辦法》要求狩獵前5天向縣市政府提出申請（如果是為了傳統祭儀的狩獵，需要20天前申請），申請書上必須寫明獵人資料、狩獵區域、狩獵時間、以及預估要打幾隻動物。其中，預估自己要打幾隻動物，嚴重觸犯鄒族的傳統禁忌，對鄒族人來說，獵物不是自己獵到的，而是土地神賜予的，浦少光就說：「在我們的傳統慣習，尤其是（面對）土地神，預知拿什麼東西，絕對會拿不到，不能先講出來、不尊敬。」



浦忠勇說，「這個結論是，誰理你，最後就變成地下化。」嘉義林管處也表示，從2012年頒布《辦法》至今，鄒族人只申請過兩次，而且兩次都沒通過縣政府審核，但根據浦忠勇與高德生的估算，鄒族8個部落加起來，每年就至少有300人次上山狩獵【註1】。林務局的狩獵《辦法》形同虛設。

台灣狩獵規定年表 從全面禁獵到「自己狩獵自己管」



《1989年》發布《野生動物保法》

保育類動物不能狩獵，一般類動物可以在縣市政府劃設的「狩獵區」申請狩獵，但全台沒有劃設任何狩獵區。→等於全面禁獵

《2004年》《野保法》新增原住民狩獵相關條文

原住民族為了傳統文化可以依「詳細辦法」申請狩獵。→但詳細辦法一直沒發布

《2012年》頒布詳細辦法

很多僵化的 SOP，不符合原住民文化，實際上也很難達成。→原住民打獵很難申請通過，還是只能「偷偷來」

《2017年》農委會在全台 11 個地區試辦「原住民狩獵自主管理」

讓原住民自訂符合文化的「狩獵公約」，自己的狩獵自己管，配合野生動物保育學者監測動物數量。

《未來》農委會將修改《野保法》的詳細辦法

原住民能與政府簽訂「狩獵行政契約」，讓法律授權原住民自己管理狩獵。

上山打獵最怕的不是毒蛇猛獸，是警察

在《野保法》、《辦法》的規定下，狩獵在原住民心中，也從光榮的象徵，變成令人害怕的違法行為。

高德生說，「你知道獵人在森林裡面最怕什麼？所有人都以為是毒蛇猛獸，但獵人會跟你說『我最怕警察。』」



浦少光長年保有狩獵習慣，談起那段被《野保法》限制，原住民權利運動又還不盛行的1980年代，他說：「那時狩獵在部落是英雄，有一陣子要躲躲藏藏。」而獵物對他的個性產生什麼影響，他說的很婉轉：「現在又有一點恢復啦，這個對一個人的信心，會比較正面。」

曾忙於工作、1990年代才回到部落重新開始狩獵的浦忠勇也有類似的經歷，「我們有一次（上山打獵完），開車快到部落了，突然看到一部警車要開過來，我們幾個人二話不說——我那時候是台大農學院的博士，我當時的工作是校長，可是看到一部爛警車——照樣把槍啦、獵物啦全部甩出去。」他沈痛地說：「獵人喔，為什麼這麼沒有尊嚴。」

隨著原住民族文化復振運動，2010年，台灣陸續有部落出面，抗議《野保法》等法規對狩獵文化的不友善。2013年，台東縣布農族獵人王光祿因為狩獵被捕，經過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2017年，最高法院為王光祿案聲請釋憲，原住民的「狩獵權」再度引發大眾關注。

- 屬於他們的正義在哪裡？太魯閣族感恩祭前遭「國家公園法」剝奪狩獵
- 「政府要我們傳承文化，又要抓人」原住民打獵遭判刑，最高法院首度聲請釋憲

狩獵自主管理計畫：林務局讓原住民「自己的狩獵自己管」

為了解決狩獵行為長期地下化的問題，農委會林務局從2017年起，讓全台8個林管處與11個原住民部落或原住民組織合作，推行「原住民狩獵自主管理計畫」。

全台12個地區試辦「原住民狩獵自主管理計畫」



三光里、羅浮里泰雅族

桃園市復興區

武道麓散、沙崙子、爺亨、復華、哈凱、高坡部落

梅花部落-泰雅族

新竹縣尖石鄉梅花村

南勢部落-泰雅族

台中市和平區南勢里

達瑪密部落-布農族

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

雙龍部落-布農族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

阿里山鄉鄒族

嘉義縣

特富野、達邦、來吉、樂野、里佳、山美、新美、茶山部落

樂水村泰雅族

宜蘭縣大同鄉

東堡、碼崙、智腦部落

德卡倫部落-泰雅族

宜蘭縣南澳鄉澳花村

銅門部落-太魯閣族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

吉拉米代部落-阿美族

花蓮縣富里鄉豐南村

卡大地布部落-卑南族

台東縣卑南鄉知本、建業里

來義鄉排灣族

屏東縣

古樓、南和、寧嘉、文樂、丹林、義林、來義、大寮部落

▲ 2019年開始試辦，其餘為2017年開始

2017年起，全台8個林管處都與該地區的原住民合作，進行「狩獵自主管理計畫」，其中，有的原住民以部落為單位與林管處合作，如台東縣卑南鄉的卡大地布部落，有的以鄉鎮市區為單位，如屏東縣就是來義鄉全境的排灣族，共同成立組織與林管處合作。

- 委託野生動物保育學者監測狩獵物種
- 輔導原住民成立狩獵組織，建立自主管理公約
- 改善申請狩獵的方法

黃秀娥表示，林管處首先跟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教授裴家騏、翁國精的團隊合作，從2014年，就在鄒族狩獵區域阿里山鄉，監測狩獵物種。裴家騏說，鄒族會狩獵的大型動物，只有台灣水鹿、台灣野山羊（又稱「台灣長鬃山羊」）、山羌、山豬和台灣獼猴5種，因此5年多來，都以自動照相機監測這5種動物的族群數量。

黃秀娥說，接著，是輔導鄒族成立獵人組織，規劃出獵人自主管理的規範。嘉義縣阿里山鄉的鄒族也在2018年5月4日正式成立「阿里山鄉鄒族獵人協會」，並同時頒布了規範狩獵行為的《獵人協會自治自律公約》。

另外，改善狩獵申請的方式，原本《辦法》規定的由獵人本人單次申請，後來，改為由獵人協會進行年度申請狩獵，同時也改變過去不合時宜的申請、審核、回報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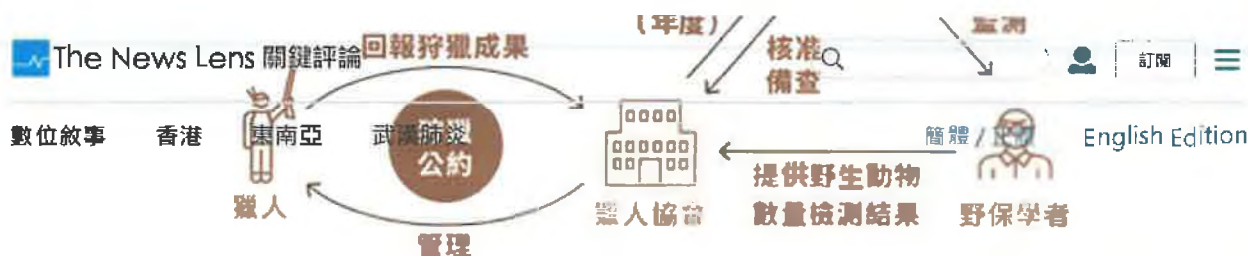
過去和現在的狩獵管理有什麼不同？

《過去》《野生動物保育法》規範



《現在》狩獵自主管理計畫





過去的《辦法》要求，狩獵前得先在申請書上預估自己要打幾隻動物，但現在，是由獵人協會估算阿里山鄉8個部落每年的需求量，在前一年向地方政府申請下一年會打幾隻獵物。以2019年5月～2020年4月底來說，獵人協會預估整年將打720隻獵物。

過去依據《辦法》，申請前，得經過部落會議同意，才能送出申請書。但新計畫的審核的機制，改由獵人協會把關，從「狩獵者」、「狩獵行為」兩方面進行管理。

「狩獵者」方面，鄒族人現在如果想要狩獵，得先參加獵人協會舉辦的生態保護、狩獵文化、狩獵技巧3門課程，接著經過獵人協會各部落分會、獵人協會總會、縣政府的審核同意，才能取得「獵人證」。唯有擁有獵人證，才能按照計畫狩獵。高德生表示，全阿里山鄉，他估計有大概300人仍有狩獵習慣，而目前取得獵人證的有179人。

「狩獵行為」方面，必須符合《自治自律公約》。《公約》除了要求獵人遵守鄒族傳統規定（鄒族人稱einu，念法近似於「ㄟ衣努」），也強調不能射殺瀕臨絕種的動物，如果誤射或誤殺，必須向獵人協會回報，讓獵人協會向野保單位尋求協助。《公約》也規定如果遇到天災人禍，讓環境產生重大破壞，獵人協會可以決議停止狩獵，待環境復原。

而過去《辦法》規定，獵人打獵完，必須交「執行報告書」，說明打到哪些動物、打獵時間區域人員。而新的「狩獵自主管理辦法」，只要求獵人如實回報狩獵數量，不問狩獵者姓名。浦忠勇表示，之所以設計成不須回報姓名，是因為大多數獵人，對於政府計劃仍然缺乏信任，擔心資料曝光後會被警方抓捕。

狩獵規定差異比較表



《過去》《野保法》規範

《現在》狩獵自主管理計畫

遵守什麼規定？

不合原住民文化的《野保法》的詳細辦法

原住民自訂的「狩獵自治自律公約」



數位敘事

申請形式 東南亞

華文申請

年度申請

簡體 / 正體

English Edition

何時申請？

狩獵前 5 天提出「申請書」

狩獵前一年

怎麼預估？

預估每次要打幾隻動物

預估一整年、所有人會打幾隻動物

誰來管理獵人？

縣市政府

獵人協會

怎麼審核？

申請前，要經過「部落會議」同意

經過部落、獵人協會、縣市政府三關審核，取得獵人證

要回報什麼？

打獵完 30 天內，繳交「執行報告書」

向獵人協會回報打到幾隻獵物

原住民狩獵協會跟大學動保所合作，獵物與文化都不再怕「滅絕」

自主管理的困難：草創時期，我們只能「亂估一通」

這樣由原住民、農委會林務局、縣市政府、野生動物保育學者共同討論出來的狩獵自主管理計畫，看似美好，但其實，讓原住民恢復對於國家單位的信任、讓長期地下化的事情能被社會大眾信任，並不容易。

比如該如何預估整年會打幾隻獵物，由於過去從來沒有官方統計數量，對鄒族獵人來說，上山狩獵又如同「上市場買菜」一樣是臨時性的事務，獵人協會就只能「盲測」。當我問道720隻獵物的數量如何估算出來，浦忠勇半開玩笑的說：「我們亂估一通，林務局也亂核一通。」720這個數量，的確沒有經過任何調查，只能由有經驗的獵人協會幹部憑感覺評估。

不過，為了確定野生動物在狩獵的狀況下，仍維持族群平衡，在阿里山鄉監測了5年動物族群數量的裴家騏表示，他們設計了幾個預警值，如果族群數量「降到某個程度，大家就得減少狩獵。但山羌、山羊、水鹿、野豬和台灣獼猴這5種數量是很多的，預警制度有點『過度保護』。」他說，「5年在阿里山地區看到的這5種狩獵物種都是穩定的，其中甚至有兩種動物，山羌跟水鹿，在阿里山去年有微幅成長的現象。」【註2】

除了第一年預估數量令人頭疼，要說服對鄒族獵人據實回報狩獵結果，也不容易。

目前獵人協會是透過Line群組回報狩獵數量，浦忠勇說，雖然也有的獵人樂於回報，但還是有很多人很不習慣。「因為一回報很多人會知道。老獵人喔，以前都是可以打幾十隻，現在打不到十隻，（就會被調侃）『欸？是不是老了？』」浦少光也說，「以前，你跟人家講你拿到的數量，那就是跟人家挑釁。」因此回報狩獵結果，對許多老獵人來說，是需要長時間溝通才能接受的新觀念。

但浦忠勇說，「回報獵獲量」是他們面對現代社會質疑時不得不接受的方式，因此獵人協會也正在嘗試建置匿名系統，避免用Line群組回報，提高老獵人回報的意願。此外，獵人協會也鼓勵年輕獵人把動物在山林逗留的痕跡（糞便、足跡、啃食植物的痕跡）拍下來。浦忠勇說，雖然他也是算是老派的獵人，但「這是我們在說服動保團體，他們說我們過度打獵，這是說服他們的科學的方法，不然我們說動物很多，誰相信你啊？我們也要提供更多的數據給他們。」

數位敘事

香港 東南亞 武漢肺炎

簡體/正體

English Edition

目前，沒有進行計畫的地區，原住民想狩獵仍然得依照《辦法》。林務局保育組主任投止羅尤娟表示，未來，農委會將修改《辦法》，政府跟原住民組織將可以簽訂「行政契約」，讓原住民可以「合法」的自主管理狩獵。今年8月13日，阿里山鄉公所也已經和獵人協會簽訂「合作意向書」，確認修法後，雙方會以「行政契約」的模式合作。

裴家麒也透露，玉山國家公園跟太魯閣國家公園，大約兩三年前，也開始跟當地原住民討論，是否可能在全台灣保育法規最嚴謹的國家公園內，讓原住民擁有部分狩獵權。

雖然原住民狩獵的前景看似一片光明，不過羅尤娟也透露，目前在進行計畫的另外11個原住民地區，許多只開始做動物監測，但「自主管理的組織因為還要跟原住民他們去討論、去溝通、協調，所以這部分就是慢慢的等他們的組織或是內部能夠凝聚共識之後，才有辦法去成立這樣的組織。」浦忠勇也提到，剛開始在部落推行「狩獵自主管理計畫」時，很多獵人不願加入，就是擔心，「你們是不是要弄名單，到時候刑事警察局馬上就抄你。」

再想想浦少光的例子，從小視狩獵為榮譽，卻曾被禁獵摧毀信心。這個計畫，或許不只是讓狩獵從「地下化」回到「陽光下」，也代表國家正視這個曾被切斷的文化活動，也可能是原住民與政府重建信任關係的第一步。

延伸閱讀：

- 提倡「野生動物保育」，就一定會打到「原民狩獵」嗎？
- 文化與保育本不該對立！有了部落「禁忌條款」，獵人也能是山老鼠終結者

【註1】由於狩獵至今沒有官方的統計數據，鄒族整年狩獵次數僅能用估算的。浦忠勇估計，在申請獵人證的179人中，約有7成會常常狩獵，而鄒族人狩獵通常在11月到2月農閒時連4個月，常狩獵的人一個月約上山2次，估計起來，鄒族一年至少有1002人次上山狩獵。但高德生認為，阿里山鄉鄒族經常狩獵的約只有40~50人，若以高德生的估計方法，鄒族一年約有300人次上山狩獵。

【註2】裴家麒的監測結果，與林務局近年來的「野生動物保育名錄」呈現的趨勢相同。台灣的野生動物可以分為「保育類」與「一般類」，其中保育類又被分為三級：分別以I、II、III為代號，從I到III分別是「最危急」到「最不危急」，而農委會每年都會依據野生動物的族群數量調整保育類動物名單。

在鄒族會獵捕的5種野生動物中，山羌、台灣獼猴在2019年1月9日被從從第III級移出保育類名單，成為一般野生動物，而台灣野山羊和台灣水鹿則從第II級改為較不危急的第III級。

核稿編輯：羊正鈺

數位敘事

香港

東南亞

武漢肺炎



訂閱此作者

收藏文章

簡體 / 正體

English Edition

最新發展：

- 狩獵與保育的兩難抉擇：一位都市原住民青年的自述 7月前
- 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是共管還是限制？以宜蘭德卡倫部落為例 8月前

Tags：

狩獵 • 鄒族 • 獵人 • 獵人協會 • 阿里山 • 嘉義縣

More...



中文 | English Edition

NEWS WORTH KNOWING,
VOICES WORTH SHARING
分享觀點從這開始

新聞 | 評論 | 影音 | 書摘 |
插畫 | 圖輯 | 關鍵懶人包 |
特別報導 | 品牌聯名頻道

藝文 | 職場 | 教育 | 環境 |
健康 | 生活 | 政治 | 科學 |
社會 | 運動 | 國際 | 性別 |
中國 | 原民 | 人文 | 勞工 |
財經 | 城鄉 | 科技 | 動物

關於我們 | 專欄作者 |
品牌聯名頻道 | RSS | 聯繫編輯

訂閱電子信

請輸入您的電子信箱

訂閱



關於我們

條款與政策

業務發展

旗下媒體與產品

聯絡我們

集團介紹

品牌介紹

品牌介紹與業務發展

品牌介紹

Laketa 全球版

品牌介紹

info@thenewslens.com

品牌介紹

品牌介紹

品牌介紹

品牌介紹

品牌介紹

品牌介紹

info@thenewslens.com

品牌介紹

品牌介紹

品牌介紹

品牌介紹

品牌介紹

品牌介紹

info@thenewslens.com

品牌介紹

品牌介紹

品牌介紹

品牌介紹

品牌介紹

品牌介紹

info@thenewslens.com

FAQ

品牌介紹

品牌介紹

品牌介紹

品牌介紹

品牌介紹

info@thenewslens.com

數位敘事

香港

東南亞

武漢肺炎

簡體 / 正體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21 TNL Media Group



TITV 16
Alian 96.3

財團法人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Indigenous Peoples Cultural Foundation
原住民族電視台 & 原住民族廣播電台
Tainan Indigenous TV & FM96.3 Alien Radio

每日新聞

前進世界

族語新聞

Lima 新聞世界

部落大小聲

原觀點

新聞性節目

熱門標籤 ▼

焦點 秋冬防疫專案逐步鬆綁! 3/1起高鐵開放飲食

中華職棒即將開打 啦啦隊開訓迎接新球季

來義成立狩獵者協會 建立部落主體機制 觀看次數 / 923 次

2018-01-15 【palang paljaljuman 屏東來義】

小 中 大

原民會和農委會去年共同發布，「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解釋令，新增自用非營利目的的狩獵行為，依據此條例林務局積極推動狩獵管理示範區計畫。

1月13號跟屏東縣來義鄉公所還有屏科大合作，成立第一個跨部落的原住民狩獵者協會，希望落實「以部落為主體」的自主管理狩獵機制，保障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益。

(林務局屏東林管處長 張偉顗：

因為我們發現，我們來義地區在野生動物，這個獵場上面的規畫，其實是跟西方的那種保護區的觀念是非常地近似的，因為我們有一些是禁獵區，有一些是緩衝區，有一些是永續利用區，其實是有有一個分區的概念，而且我們獵人們自己本身都有一些，相關的一些的約束力在。)

(屏東縣來義鄉長 賈望義 排灣族：

這樣的一個幹部，我們各村所選出來的，一個村最好是有一個，然後再加上我們公所的同仁，去幫我們大家去爭取，有成功的話將來通過的話，我們要做的這些事，是保障我們在座的大家。)

來義鄉排灣族傳統文化狩獵協會的成立宗旨，在維繫傳統狩獵文化，並能合宜調整可獵捕獵物對象跟數量，使自然資源得以永續，當地獵人和村長都有高度的認同。

(獵人 郭坤旺 排灣族：

我是滿認同的，也是保障我們文化狩獵的部分，尤其我們獵人，部落上山打獵都有一個保障，也是相對，也是所謂保育，保護我們山上的一些資源。)

(屏東縣來義鄉望嘉村長 周榮進 排灣族:

其實這個對我們原住民文化傳統是有相當大的幫助，因為我們原住民很多祭典跟這個狩獵是無法分開的，都是連結的，所以如果有這樣的一個協會成立的話，以後我們上山去打獵，我們也就不會去偷偷摸摸，也不會去害怕被抓。)

現行法規獵人必須在五天前申請狩獵，但排灣族的除喪儀式，都需要獵人的獵物當作祭品，獵人不可能預測部落族人的生死，因此長期造成部落的困擾，狩獵協會未來可以做為部落與公部門的協調平台，協助各部落申請合法而且符合傳統文化需求的狩獵。

相關報導

- | | |
|------------|------------------------------|
| 2020-03-23 | [每日]中教大開原民流行音樂學程 創作歌手任講師 |
| 2020-03-12 | [每日]力推原校法 立委聚焦師資培育議題 |
| 2020-03-10 | [每日]台東部落食尚計畫 盼飲食文化結合在地資源 |
| 2020-02-04 | [族語]Pinanaman 幼兒園 打造全阿美語學習環境 |
| 2020-01-21 | [族語]博屋瑪國小培養軟實力 辦活動學生增自信 |
| 2020-01-16 | [族語]久美部落族群混居 民族教育困難重重 |

關鍵字

屏東來義

狩獵

文化

Facebook 留言



原文會之友



Facebook



youtube



APP 下載



LINE

認識本會

公開資訊

會務相關

[關於本會](#)
[組織架構](#)
[董監事及經營團隊](#)
[交通資訊](#)
[LOGO 下載](#)

[組織人事](#)
[營運業務](#)
[法令規章](#)
[製播節目](#)
[研究報告](#)

[參訪基金會](#)
[招標公告](#)
[求才專區](#)
[託播查詢](#)
[原住民族電視台
節目版權目錄](#)
[購物商城](#)

觀眾服務

[線上客服](#)
[RSS 訂閱](#)
[網站地圖](#)
[歲時祭儀](#)

相關連結

[WITBN 世界原住民廣電聯盟](#)
[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族語線上詞典](#)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 2013 Indigenous Peoples Cultural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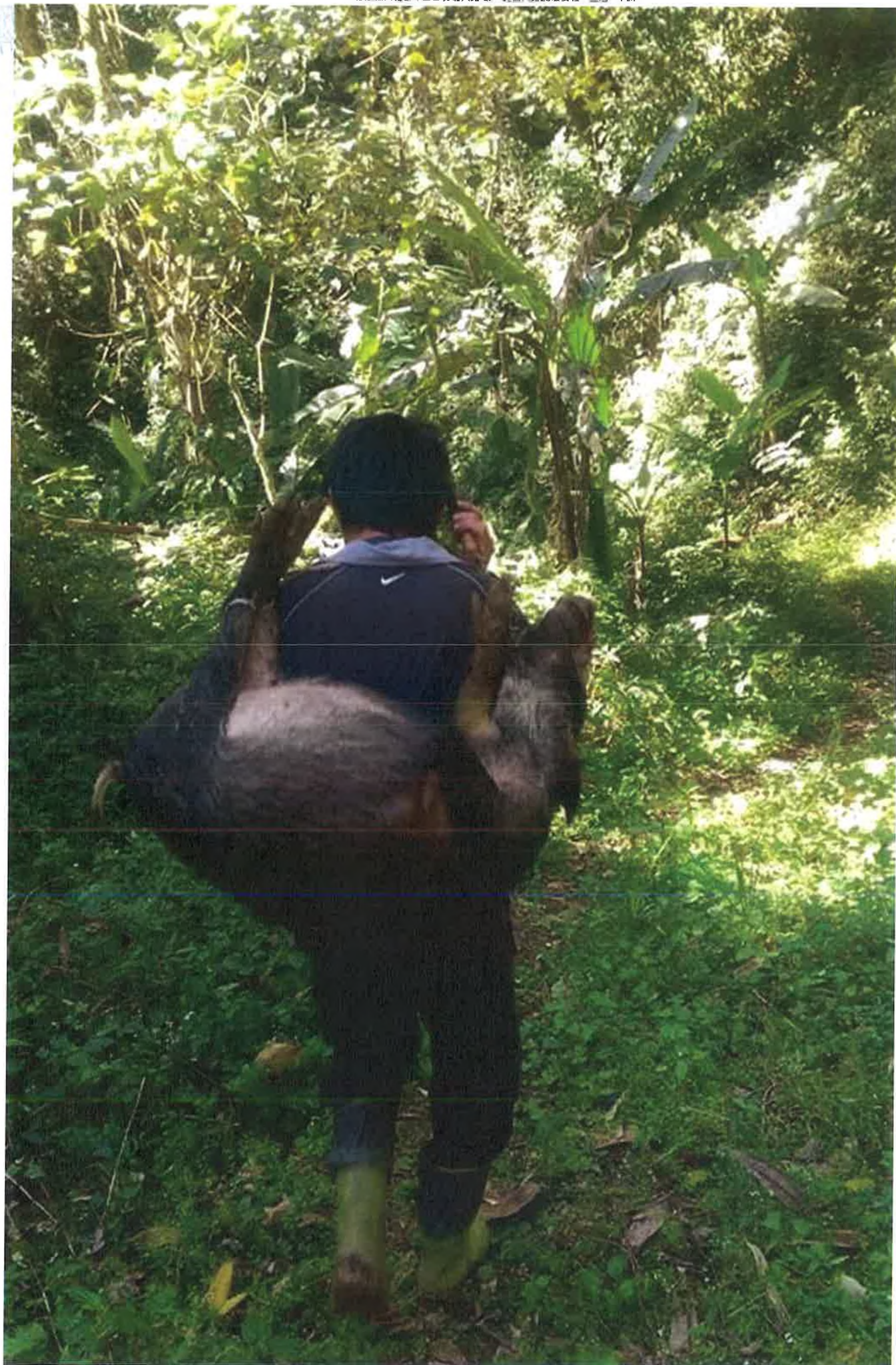
電話：(02)2788-1600 傳真：(02)2788-1500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 120 號 5 樓



首頁 / 生活

鄒族獵人協會全台首發獵人證 最年輕獵人是26歲女性

20:33 2019/03/20 · 中時 張亦惠





鄒族獵人協會20日首度頒發獵人證，89位通過審查的獵人中，有4位是女性。（莊信然提供）



林管處主任李志珉頒發獵人證給女獵人。(嘉義林管處提供)

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去年5月4日成立，20日全台首度頒發獵人證，鄒族獵人認為，獲頒獵人證象徵著獵人的榮耀，也代表著對鄒族社會發展與環境永續的神聖責任及使命，獵人協會總幹事浦珍珠表示，這次共有106人申請，89人通過，其中有4位鄒族女性，最年輕的獵人更是僅26歲的鄒族女性田曉芬。

鄒族獵人協會今天在阿里山鄉杜鄉長力泉、嘉義縣武縣議員清山見證下，頒發89位獵人的獵人證，鄒族獵人協會理事長高德生長老表示，獵人擁有豐富的山林生活經驗及智慧，未來除了進行正常狩獵活動之外，每位獵人將是鄒族狩獵文化與傳統知識的傳承者，將山林智慧代代相傳。

這次申請獵人證的共有106人，89人通過初審及聯合審查，審核通過率為84%，通過的獵人中有60多歲的年長獵人，而最年輕的則是來自茶山村的田曉芬。

鄒族獵人協會總幹事浦珍珠表示，鄒族傳統觀念狩獵是男性的工作，審查資料時對田曉芬這樣年輕女性有狩獵經驗也一度有所遲疑，但經由實地訪查後了解，田曉芬從小跟著父親田信傳走山林、學習狩獵，目前在嘉義市工作的她回部落時也會跟著父親一起去打獵。

高德生表示，唯有讓山林資源豐盛永續，大家的狩獵活動才能維持，所以未來獵人除了願意付出心力守護獵場的einu文化，也願意配合國家保育政策，特別是嘉義縣政府及林管處要求的「定期回報狩獵成果」，藉著掌握完整的獵獲數量，進行獵場野生動物族群數量的監測與狩獵活動評估。

高德生強調，「自主管理狩獵」是鄒族開始自主管理傳統領域中自然資源的機會，獵人會珍惜這樣的機會，找回山林智慧與自然資源的管理權利。

► 英國保誠這款定期壽險 免健告網路輕鬆投保

► 泰勒絲無預警發專輯 生日反送大禮給歌迷

(中時)

#獵人 #鄒族 #狩獵 #協會 #人證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勿任意轉載違者依法必究 © 1995 - 2021 China Times Group.

[首頁](#) > [生活](#)

東部首創狩獵共管 太魯閣族發獵人證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與太魯閣族獵人協會今天頒發294張獵人證，依村落進行編組管理，確實掌握獵人入山時間、目的與獵獲回報量，踏出東部狩獵自主管理的第一步。（記者王錦義攝）

2020/08/01 13:39

【記者王錦義／花蓮報導】今天是原住民日，歷經4年的運作與共識凝聚，由花蓮林務局所轄區率先東部啟動，以秀林鄉太魯閣族為主體，橫跨全鄉9村及16個部落，成立獵人組織「花蓮縣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經過課程後今天頒發294張獵人證，依村落進行編組管理，確實掌握獵人入山時間、目的與獵獲回報量，踏出東部狩獵自主管理的第一步。

今天一大清早，在文蘭耆老黃長興的傳統獵前儀式、理事長帖喇·尤道宣誓詞、各村代表鳴槍及放狼煙宣誓後開始，帖喇·尤道說，未來獵人協會除了秉持傳統狩獵規範傳承獵人文化，永續治理自然環境，也將結合學術單位及政府機關合作機制，進行動物族群監測，以及建立山林巡護的保育體系，下一階段希望拓展到太魯閣國家公園，將原本太魯閣族與自然萬物互為主體的保育觀念，重新復振在太魯閣族的土地上，進而實現太魯閣族自治的歷史正義與民族大業。

帖喇·尤道說，太魯閣族的祖訓：「土地是血，山林是家。」已經清楚告訴大眾真正能夠守護太魯閣山林的就是太魯閣族，族人將承續著先祖的山林智慧，永續的保護與經營傳統領域，讓世代代的子孫能夠踏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實踐自己的文化，延續著Gaya的信仰；下一步將接續向太魯閣國家公園申請非營利自用狩獵申請，那裡才是太魯閣族真正的祖居地，太魯閣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也期待政府能夠真正落實原住民族「轉型正義」，讓原本荒蕪的太魯閣族文化場域重新復振，找回太魯閣原有自然與人文的生態環境。

帖喇·尤道強調，太魯閣族的祖居地皆源自於太魯閣，太魯閣山區具備大量的文化教育題材，只可惜遭國家體系與環保團體以保育為名，侵害族人在傳統領域實踐文化的基本人權，隨著耆老的逐漸凋零，傳統智慧與記憶也隨之消逝，歷代政府與當代環團，嚴然切斷了太魯閣族與祖居地的連結，與其說太魯閣國家公園是世界級的風景區，不如直白的說是一座巨型的文化墳場；期待政府真正落實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讓太魯閣族先祖即將消逝的山林智慧與記憶能夠重新找回。

花蓮林管處長楊瑞芬說，首先恭喜秀林鄉的太魯閣族人們，獵人證授證是部落踏出狩獵自主管理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花蓮林管處於自2017年起積極輔導族人，去年銅門獵人團已完成辦理狩獵自主管理的機制，並迅速的帶動整個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的成立，未來林管處也將持續協助太魯閣族獵人協會辦理各項獵人培訓課程，期望將來與獵人協會一起攜手合作，共同達成台灣山林生態環境欣欣向榮的願景。

長期以來協助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與研究的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的戴興盛教授認為，這幾年參與銅門部落會議的族人展現了團結的自主精神，是部落自主管理得以順利推動的主要原因，現在整個已拓展到全鄉，甚至未來希望要進展到國家公園，這都是太魯閣族族群內部凝聚力的表現，最後也必須感謝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花蓮縣政府以及秀林鄉公所，一路以來的開放態度和行動支持，在環境保育與民族權益上，展現了政府機關與部落族人相互協力最佳典範。

秀林鄉長王玫瑰說，協助部落族人爭取族群權益以及復振傳統文化，一直是身為她最重要的責任。從協會前身「還我原住民族狩獵權自救會」到太魯閣國家公園及到總統府陳情，一直到籌組階段與成立階段，只要組織提出需求，公所無不在能力所及的情況下協助，今天不只是獵人協會最重要的日子，也是所有太魯閣族最重要的日子，感謝所有曾經支持爭取太魯閣族狩獵權益的每一個人；未來還有更重要的地方要去爭取，就是族人的祖居地、傳統領域；太魯閣！接下來還要更加團結，讓真正懂得這座山林的太魯閣族，管理自己的土地，Mhuway su balay。

太魯閣族獵人協會指出，前會員總計332人，符合獲得獵人證資格者共計294人，包括銅門90人、文蘭58人、水源40人、佳民6人、景美29人、秀林37人、富世18人、崇德7人、和平9人，後續獲證者，需完成本會開設自然生態保育、獵人文化培訓、狩獵安全、法律規範及獵區踏查課程滿20小時後，即發放獵人證。接下來幾年秀林鄉林務局範圍內也將在屏東科技大學裴家騏教授團隊協助下，以在地獵人為主體，建置自動紅外線動物族群監測和獵獲物回報系統，讓科學技術與原住民族在地生態知識互補，矯正彼此過去知識權力不對等的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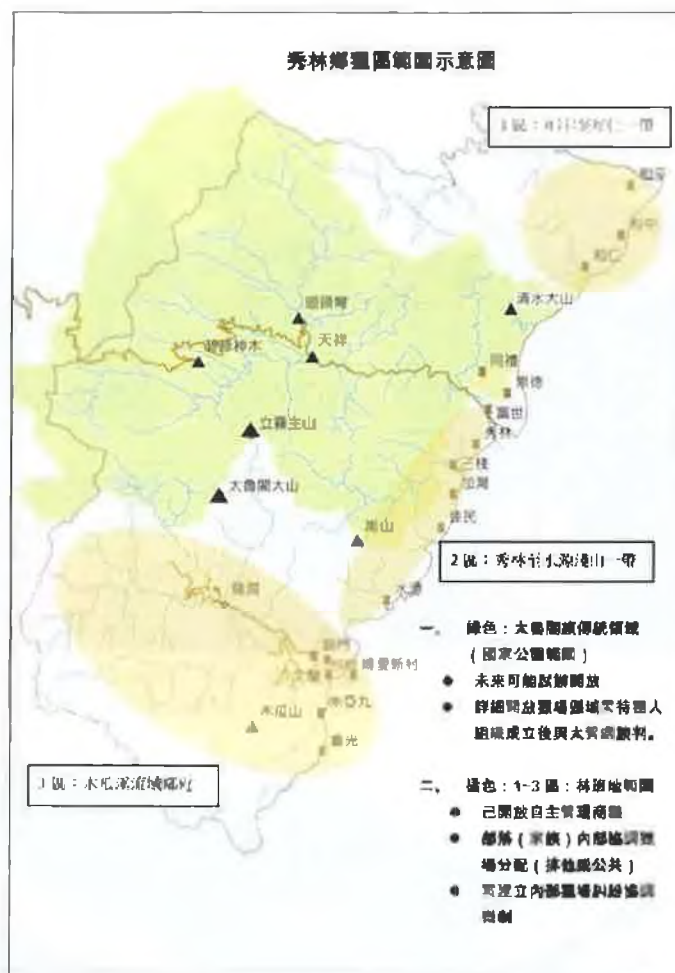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與太魯閣族獵人協會今天頒發294張獵人證，依村落進行編組管理，確實掌握獵人入山時間、目的與獵獲回報量，踏出東部狩獵自主管理的第一步。（記者王錦義攝）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與太魯閣族獵人協會今天頒發294張獵人證，依村落進行編組管理，確實掌握獵人入山時間、目的與獵獲回報量，踏出東部狩獵自主管理的第一步。（記者王錦義攝）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與太魯閣族獵人協會今天頒發294張獵人證，依村落進行編組管理，確實掌握獵人入山時間、目的與獵獲回報量，踏出東部狩獵自主管理的第一步。（記者王錦義攝）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與太魯閣族獵人協會今天頒發294張獵人證，依村落進行編組管理，確實掌握獵人入山時間、目的與獵獲回報量，踏出東部狩獵自主管理的第一步。（記者王錦義翻攝）

自由時報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2021 The Liberty Times. All Rights Reserved. *

附錄三：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自治自律公約

1. 中華民國一〇七年五月四日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成立大會通過全文 20 條

表 1 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自治自律公約

條 文	說 明
名稱：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自治自律公約	本自治自律公約名稱為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自治自律公約。
第一章 鄒族獵人之使命	
第一條 鄒族獵人以傳承狩獵 einu（狩獵傳統慣習、狩獵禮儀暨倫理道德規範）、自律守護傳統領域及其內之野生動物資源、自然環境多樣性之神聖平衡與和諧，在鄒族獵人之共識下，訂定本公約。	本條明定本公約之制定目的。
第二條 鄒族獵人應本於自治自律之精神，積極且誠實執行職務、遵守狩獵 einu、接受 nsou 和 piepia（命格）、砥礪品德、維護信譽、精研狩獵事務、維護鄒族民族尊嚴、榮譽及價值，並促進自然生態之保育與動物之福祉。	本條明定鄒族獵人之基本精神、任務及使命。
第二章 鄒族獵人之資格及養成	
第三條 鄒族原住民生而具有鄒族獵人資格。 鄒族原住民得申請加入鄒族獵人協會（以下稱獵人協會）。 經獵人協會審查合格，並完成狩獵傳統文化、狩獵技術及生態保護之訓練合格後，為協會獵人，並得申請登錄於協會獵人名簿，及請領獵人證書。但於本公約公布施行前，經長老會議認可具備資格者，不在此限。 前項訓練之實施方式、合格之標準、退訓、停訓、重訓等有關事項，由獵人協會諮詢長老後，依鄒族狩獵傳統慣習定之。	一、第一項明定鄒族原住民均具有鄒族獵人資格。 二、第二項明定鄒族原住民得申請加入獵人協會成為協會會員。 三、經獵人協會審查合格並完成狩獵傳統文化、狩獵技術及生態保護之訓練合格後，得登錄於鄒族獵人協會之協會獵人名簿並請領獵人證書；同項但書設受訓練之例外資格。 四、鄒族狩獵傳統文化與狩

	<p>獵技術訓練規則等由獵人協會擬定，諮詢長老討論後定之。</p> <p>五、未來需設計鄒族之統一格式獵人證書。</p>
<p>第四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協會獵人，亦不得發給獵人證書：</p> <p>一 經法院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確定者，並依其罪名，經獵人協會認定其已喪失執行狩獵之信譽。</p> <p>二 其他曾受本公約所定除名處分。</p> <p>三 經醫院證明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勝任獵人職務。</p> <p>四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p> <p>發給獵人證書後，有前項情形之一者，註銷其獵人名簿之登錄，並收回其協會獵人證書。</p> <p>於原因消滅後，得向獵人協會申請准其回復協會獵人資格。</p>	<p>一、第一款明定，經法院判刑確定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且無狩獵信譽者，已不適合加入需要以名譽為主之本協會。</p> <p>二、因違反本公約遭除名者已不適合加入本協會，故於第二款明定。</p> <p>三、因心智障礙或受監護宣告者，無法勝任獵人職務，爰規定於第三款及第四款。</p>
<p>第五條 獵人協會，應置協會獵人名簿，應記載事項如左：</p> <p>一 姓名（含鄒族傳統之拼音）、性別、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住址。</p> <p>二 獵人證書編號。</p> <p>三 加入獵人協會及登錄之年、月、日。</p> <p>四 曾否受過本公約之懲戒。</p>	<p>本條明定獵人名簿之應記載事項。</p>
<p>第六條 獵人證書應記載事項如左：</p> <p>一 姓名、性別。</p> <p>二 槍號、陷阱編號。</p> <p>三 狩獵場域。</p> <p>四 所屬團體。</p>	<p>本條明定獵人證書之應記載事項。</p>
<p>第三章 協會獵人之權利及義務</p>	
<p>第七條 協會獵人依第二章之規定登錄後，得於合法申請之區域內狩獵。</p>	<p>本條明定登錄於獵人名簿取得鄒族獵人證書之獵人，其狩獵範圍為依法申請之區域</p>

	內。
<p>第八條 獵人協會受嘉義縣鄒族庫巴特富野社文化發展協會及嘉義縣阿里山鄒族達邦社庫巴文化發展協會（二協會以下稱庫巴協會）監督，並遵守獵人協會會員大會所為之決議。</p>	<p>一、明定獵人協會之監督機關為特富野社及達邦社之庫巴文化發展協會。</p> <p>二、獵人協會遵守會員大會之決議。</p>
<p>第九條 協會獵人對於獵人協會、庫巴協會、檢察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不得有矇蔽或欺誘之行為。</p>	<p>本條明定鄒族獵人之誠實義務與守法義務。</p>
<p>第十條 協會獵人捕獲之野生動物以非營利自用之方式使用。自用係指非藉此獲取利益，僅供本人、親屬或依傳統文化供分享之用。</p> <p>協會獵人應於每次狩獵後回報獵獲資訊予獵人協會。獵人協會應於每季將所有獵人之獵獲資訊彙整後，報請由庫巴協會核備。</p> <p>前項獵獲資訊係指狩獵起訖時間、每次參與狩獵人數、獵獲動物之物種名、性別及數量。</p>	<p>一、依據目前法規之規定，捕獲之獵物以非營利自用之方式使用始為合法。非營利自用之方式，排除「買賣」以及「互易」等行為。</p> <p>二、狩獵獵獲資訊包括種類、獵場（獵獲地點）、性別、數量等。</p>
第四章 鄒族狩獵 einu	
<p>第十一條 鄒族獵人應遵守之 einu 如左：</p> <p>一 於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後不狩獵。</p> <p>二 維護野生動物棲息地，維護自然環境、不棄置垃圾、不破壞他人之農林作物；並禁止電魚、毒魚、炸魚。</p> <p>三 不採集、焚毀或砍伐森林植被。但為生活慣俗、文化或經獵人協會或庫巴協會認可之需求者，不在此限。</p> <p>四 尊重他人之狩獵範圍及狩獵行為，維護他人之陷阱，不竊取他人之獵獲物。</p> <p>五 進入其他家族或他人之獵場狩獵前，應事先取得同意；因追獵動物進入其他家族或他人之獵場，無法事先取得同意時，應於事後告知。</p> <p>六 適時回收陷阱所捕獲之獵獲物，且考量自</p>	<p>一、本條明定鄒族獵人應遵守之狩獵傳統慣習及狩獵禮儀暨倫理道德規範。</p> <p>二、範圍包括槍獵、陷阱獵及漁獵。</p>

<p>身之搬運或揹負能力，不浪費獵獲物。</p> <p>七 因狩獵所需而取用他人獵寮之物，應儘速告知獵寮所有人，並於下次上山時補充取用之物於該獵寮。</p> <p>八 村落之近鄰周遭，不進行槍獵活動。</p> <p>九 於獵人協會登記後，始得於狩獵時帶領非鄒族原住民之人士（含研究人員）進入獵場。</p> <p>十 其他鄒族傳統所應遵循之規範。</p>	
第五章 槍枝及陷阱使用安全	
<p>第十二條 槍口應指向安全之方向，不得朝向自己或他人。</p> <p>應以槍枝內已有子彈上膛之態度使用槍枝。除真正射擊時外，手指不可接觸扳機。</p> <p>射擊時先確定狩獵目標所在及其後方有無安全顧慮。</p> <p>槍枝使用安全等有關事項，由獵人協會以狩獵槍枝使用安全規則另定之。</p>	<p>本條明定用槍之基本安全。槍枝使用安全之規定過多，若規定於此處恐顯龐雜，爰於第四項規定另定規則處理之。</p>
<p>第十三條 獵槍之使用應避免射殺瀕臨絕種動物。若因自衛射殺該動物者，應將其屍體攜回或於現場妥善安置後，向獵人協會回報誤殺之情事。若造成該動物受傷，則應即通知獵人協會尋求協助。</p>	<p>本條明定槍獵之方式應避免射殺瀕臨絕種動物及其後續處理方式。</p>
<p>第十四條 陷阱之使用應避免誤捕非目標動物、避免造成獵獲動物長時間緊迫、避免動物受傷逃脫。</p> <p>陷阱之設置應避免誤捕瀕臨絕種動物。若發生誤捕活體之情形，需於安全無虞之條件下現地釋放，或應即通知獵人協會尋求協助。若該動物已死亡，應將其屍體攜回或於現場妥善安置後，向獵人協會回報誤捕之情事。</p>	<p>本條明定陷阱獵之方式應避免誤捕非目標動物以及瀕臨絕種動物，及其後續處理方式。</p>
第六章 鄒族獵人之懲戒	
<p>第十五條 協會獵人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付懲戒：</p> <p>一 有違反第十一條之行為者。</p>	<p>本條明定受懲戒事項。</p>

<p>二 有其他違背本公約或獵人協會章程之行為，情節重大者。</p>	
<p>第十六條 協會獵人應付懲戒者，由獵人協會處理。 獵人協會對於應付懲戒之協會獵人，得經會員大會之決議，予以懲戒。</p>	<p>一、本條明定協會獵人懲戒事項之處理程序及組織。 二、本條第二項規定經會員大會決議，得懲戒協會獵人。</p>
<p>第十七條 被懲戒之協會獵人對於獵人協會之懲戒決議有不服者，得向獵人協會請求覆議。 覆議之處理及程序，由各部落長老各派一人定之。</p>	<p>本條明定獵人懲戒之覆議制度。</p>
<p>第十八條 懲戒處分如左：</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 警告。 二 申誡。 三 停止協會獵人資格二年以下。 四 廢止獵人證書。 五 除名。 <p>受警告處分三次者，視為申誡處分一次； 受申誡處分三次者，應另予停止協會獵人資格之處分； 受停止協會獵人資格期間累計滿三年者，應予除名。 懲戒處分應登錄於獵人名簿。</p>	<p>一、本條第一項明定懲戒處分之種類。 二、第二項明定各種懲戒處分之關係。 三、第三項明定懲戒處分應登錄於獵人名簿，以明其責。</p>
<p>第十九條 若遇特殊天災或人為之因素，致環境產生重大之破壞或傷害時，獵人協會得決議暫時停止狩獵。</p>	<p>本條規定環境產生重大破壞或傷害時，獵人協會得決議暫時停止狩獵，以使環境復原。</p>
<p>第七章 附則</p>	
<p>第二十條 本公約自公布日施行。</p>	

太魯閣族獵人協會自治自律公約

條	文	說	明
名稱：太魯閣族獵人協會自治自律公約草案		名稱暫定為太魯閣族獵人協會自治自律公約。	
第一章 太魯閣族獵人之使命			
第一條	太魯閣族獵人以 Gaya 傳承狩獵 (狩獵傳統慣習、狩獵禮儀暨倫理道德規範)、自律守護傳統領域及其內之野生動物資源、自然環境多樣性之神聖平衡與和諧，在太魯閣族獵人之共識下，訂定本公約。	本條明定本公約之制定目的。	
第二條	太魯閣族獵人應本於自治自律之精神，積極且誠實執行職務、遵守狩獵 Gaya、砥礪品德、維護信譽、精研狩獵事務、維護太魯閣族民族尊嚴、榮譽及價值，並促進自然生態之保育與動物之福祉。	本條明定太魯閣族獵人之基本精神、任務及使命。	
第二章 太魯閣族獵人之資格及養成			
第三條	太魯閣族原住民生而具有太魯閣族獵人資格。協會組織成立後第一年，需上滿本會開設之自主管理課程 4 小時，即符合獵人資格，太魯閣族原住民得申請加入太魯閣族獵人協會(以下稱獵人協會)，其餘非獵人協會第一年之太魯閣族人，須完成狩獵傳統文化、狩獵技術、文化傳承課程及生態保護之訓練培訓課程 20 小時後，為協會獵人，並得申請登錄於協會獵人名簿，及請領獵人證書。但於本公約公布施行前，經會議認可具備資格者，不在此限。前項訓練之實施方式、合格之標準、退訓、停訓、重訓等有關事項，由獵人審核委員會會議後，依太魯閣族狩獵傳統慣習定之。	一、第一項明定太魯閣族原住民均具有太魯閣族獵人資格。 二、第二項明定太魯閣族原住民得申請加入獵人協會成為協會會員。 三、獵人審核委員會，由理事長、與常務理事組成 (5 名)，一聘四年。每年召開 2 次獵人審核委員會定期會議，另依情形召開臨時會議 2 次，會議決議內容為核定、廢除及懲戒協會獵人資格。 五、未來需設計太魯閣族之統一格式獵人證書。	
第四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協會獵人，亦不得發給獵人證書：	一、因心智障礙或受監護宣告者，無法勝任獵人職務，	

<p>一 經醫院證明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勝任獵人職務，並經獵人審核委員會認定者。</p> <p>二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p> <p>發給獵人證書後，有前項情形之一者，註銷其獵人名簿之登錄，並收回其協會獵人證書。</p> <p>於原因消滅後，得向獵人協會申請准其回復協會獵人資格。</p>	<p>爰規定於第三款及第四款。</p>
<p>第五條 獵人協會，應置協會獵人名簿，應記載事項如左：</p> <p>一 姓名(含太魯閣族傳統之拼音)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住址。</p> <p>二 獵人證書編號。</p> <p>三 加入獵人協會及登錄之年、月、日。</p> <p>四 曾否受過本公約之懲戒。</p>	<p>一、本條明定獵人名簿之應記載事項。</p>
<p>第六條 獵人證書應記載事項如左：</p> <p>一 姓名、性別、族群。</p> <p>二 槍號、陷阱編號。</p> <p>三 狩獵場域。</p> <p>四 所屬部落與分會。</p> <p>五 協會獵人依第二章之規定登錄後，得於協會公告之範圍(所屬部落)。</p>	<p>一、本條明定獵人證書之應記載事項。</p> <p>二、明定登錄於獵人名簿取得太魯閣族獵人證書之獵人，其狩獵範圍申請之區域內。</p>
<p>第三章 協會獵人之權利及義務</p>	
<p>第七條 協會獵人對於獵人協會、檢察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不得有賄蔽、隱瞞集欺誘之行為。</p>	<p>一、明定太魯閣族獵人之誠實義務與守法義務。</p>
<p>第八條 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得以村或部落為單位成立分會，各區域得依會員意願自行參予或成立分會，專司狩獵自主管理之事務。</p> <p>各分會受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所監督。</p> <p>分會須確實回報協會獵人之獵捕數量與物種</p> <p>分會需定期召開獵人會議，二分之一獵人必須參加，得邀請相關主管機關列席參加。</p>	<p>一、協會項下可分別以部落或獵區成立分會，分會長(即獵人長)為該部落或獵區之代表，討論提案狩獵相關之議題與規範。</p> <p>二、明定分會受獵人協會及部落所監督。</p> <p>三、明定以各分會之獵人會議作為例行自主管理相關事務之商議方式。</p>
<p>第九條 協會獵人捕獲之野生動物以非營利自用之方式使</p>	<p>依據目前法規之規定，捕</p>

<p>用。自用係指非藉此獲取利益，僅供本人、親屬或依傳統文化供分享之用。</p> <p>協會獵人應於每次狩獵後回報獵獲資訊予獵人協會分會。各分會應於每季將所有獵人之獵獲資訊彙整後，報請由獵人協會核備。</p> <p>前項獵獲資訊係指狩獵起訖日期時間、參與狩獵人數、獵獲動物之物種名、性別及數量。</p> <p>狩獵獵獲資訊包括種類、獵場（獵獲地點）、性別、數量等。</p>	<p>獲之獵物以非營利自用之方式使用始為合法。非營利自用之方式，排除「買賣」以及「互易」等行為。</p>
<p>第四章 太魯閣族狩獵 Gaya</p>	
<p>第十一條 太魯閣族獵人應遵守之 Gaya 如下：</p> <p>有關獵徑修建規範如下：</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 範圍包括槍獵、陷阱獵及漁獵。 二 行為觸犯禁忌 bsanig、偷竊、傲慢、詐騙、破壞他人獵具獵寮...等違悞 gaya 的各項行為。 三 獵道之修建開闢，公共路線部分，須由進入本路徑的所有獵人共同勘查開通，未參加砍草開路者，禁入行經此獵道。 四 未經開路者同意，不得行經他人私自砍草開通的徑村落之近鄰周遭，不進行槍獵活動。 五 於獵人協會登記後，始得於狩獵時帶領非太魯閣族原住民之人士（含研究人員）進入獵場。 六 須嚴守獵人風範；禁談不吉祥言論，不做傷風敗俗的行為。 七 遇喪事及喜事者，均須暫時不得參加進山狩獵活動。 八 獵捕獵物須適可而止，獵獲肉類須全數帶回，禁止拋棄獵物，暴殄天物，觸犯祖靈。 九 獵季結束後，獵場上的陷阱獵具必須予以全部拆除收回。 十 維護野生動植物棲息地，維護自然環境，不棄置垃圾，不破壞他人的農林作物；並禁止電魚、毒魚、炸魚。 十一 不任意焚毀、砍伐森林植被及挖掘移動石塊。但為生活慣俗、文化或經獵人協會認可之需求者，不在此限。 十二 不竊取他人之獵獲物及獵具。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公共獵徑是所有進出的獵人必經的通路，砍草開路須全體動員，未參與者就不能經此進入獵場。 二、私人開路本是私人自用，擁有掌控之權利，他人不得逾越。

<p>十三 其他部落傳統所應遵循之規範。</p>	
<p>第十二條 有關獵場範圍規範如下：</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 部落獵人不得超越協會公告及所屬部落之他區狩獵範圍進行狩獵。 二 於獵人會議中，由各部落家族(分會)推派之獵人耆老共同決議統一規範各家族獵場位置。 三 獵人須在自己所屬之獵場從事捕獵活動，未經同意或邀請，不得進入他人之獵場，避免產生糾紛。 四 有人放置陷阱之山區，除本人外，其他獵人絕對禁止進入，尤忌任意進行槍獵或野放獵狗。 五 所獲獵物需據實回報，若發生隱匿、謊報等情事，經舉報後，將移送至獵人審議委員會懲處。 五 公共獵場，經協會議定之太魯閣族傳統領域內屬年久無人狩獵之區域，經協會公告一個月，未有其他分會或部落家族表示異議者，即定為公共獵場，公共獵場狩獵時間與區域範圍及其他相關規定，以獵人協會定之。 六 若發生獵場爭議，由獵人組織邀請當事分會召開內部協調會 七 國家公園之獵區待組織成立後，由本協會代表參與磋商授獵區域與限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明定獵人須於其之區域及部落狩獵區內及公共獵場行獵。 二、族人的狩獵活動是平時生活的常態現象，凡正規的獵人都擁有自己的獵場，進山狩獵必須在自己常去的獵場上從事狩獵活動，擁有自己獵場，不進入他人獵場本是獵人 GAYA 的戒律。
<p>第五章 槍枝及陷阱使用安全</p>	
<p>第十五條 使用槍獵者必須使用合法槍械狩獵。</p> <p>槍口應指向安全之方向，不得朝向自己或他人。應以槍枝內已有子彈上膛之態度使用槍枝。除真正射擊時外，手指不可接觸扳機。</p> <p>射擊時先確定狩獵目標所在及其後方有無安全顧慮。</p> <p>槍枝使用安全等有關事項，由獵人協會以狩獵槍枝使用安全規則另定之。</p>	<p>本條明定用槍之基本安全。</p> <p>槍枝使用安全之規定過多，若規定於此處恐顯龐雜，爰於第四項規定另定規則處理之。</p>
<p>第十六條 獵槍之使用應避免射殺瀕臨絕種動物。若因自衛射殺該動物者，應將其屍體攜回或於現場妥善安置後，向獵人協會回報誤殺之情事。若造成該動物受傷，則應立即通知獵人協會尋求協助。</p>	<p>本條明定槍獵之方式應避免射殺瀕臨絕種動物及其後續處理方式。</p>
<p>第十七條 一 陷阱之使用應避免誤捕非目標動物、避免造成</p>	<p>本條明定陷阱獵之方式應避</p>

<p>獵獲動物長時間緊迫、避免動物受傷逃脫。</p> <p>二 陷阱之設置應避免誤捕瀕臨絕種動物。若發生誤捕活體之情形，需於安全無虞之條件下現地釋放，或應即通知獵人協會尋求協助。若該動物已死亡，應將其屍體攜回或於現場妥善安置後，向獵人協會回報誤捕之情事。</p>	<p>免誤捕非目標動物以及瀕臨絕種動物，及其後續處理方式。</p>
---	-----------------------------------

第六章 太魯閣族獵人之懲戒	
第十五條 協會獵人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付懲戒：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 有違反第十二條之行為者。 二 有其他違背本公約或獵人協會章程之行為，情節重大者。 	本條明定受懲戒事項。
第十六條 協會獵人應付懲戒者，由獵人審核委員會處理。 獵人協會對於應付懲戒之協會獵人，得經獵人審核委員會之決議後，送交協會執行，予以懲戒。	本條明定協會獵人懲戒事項之處理程序及組織。
第十七條 被懲戒之協會獵人對於獵人協會之懲戒決議有不服者，得向獵人協會請求覆議。 覆議之處理及程序，由各分會代表及理事長合議定之。	本條規定獵人懲戒之覆議制度。
第十八條 懲戒處分如左：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 警告。 二 申誠。 三 停止協會獵人資格二年以下。 四 廢止獵人證書。 五 除名。 受警告處分三次者，視為申誠處分一次；受申誠處分三次者，應另予停止協會獵人資格之處分；受停止協會獵人資格期間累計滿三年者，應予除名。 懲戒處分應登錄於獵人名簿。	一、本條第一項明定懲戒處分之種類。 二、第二項明定各種懲戒處分之關係。 三、第三項明定懲戒處分應登錄於獵人名簿，以明其實。
第十九條 若遇特殊天災或人為之因素，致環境產生重大之破壞或傷害時，獵人協會得決議暫時停止狩獵。	環境產生重大破壞或傷害時，獵人協會得決議暫時停止狩獵，以使環境復原。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條 本公約自公布日起施行。	

「行政契約」共管狩獵將入法 獵人自律、科學監測保生態永續

【當部落傳統遇上現代治理：原民狩獵自主管理專題】

🕒 2020年11月05日

環境資訊中心 特約記者賴品瑀 嘉義報導

「越多的權力、更大的責任！」鄒族特富野社頭目如此看待原民狩獵自主管理的發展。2~4日第三屆「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獵人大會」於阿里山舉辦，其中〈原住民族狩獵辦法〉修正草案搶先亮相，供在場原民獵人團體討論。

此辦法完成後，未來將朝向各地獵人團體與政府簽訂「行政契約」的模式共管狩獵行為，逐步取代現行以主管機關許可的作法，企圖以科學監測與集體自律來重建原民狩獵秩序，並維護生態永續。

且在林務局的規劃中，尚有發展林下產業、生態旅遊與共同管理保護區等，後續也將朝向「行政契約」方式長期合作。以有彈性的定期契約，走出過去法令由上而下、且無法處理各地多元的原民生活樣態的缺失，此舉將是政府返還原住民山林權利的重大突破。



第三屆「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獵人大會」4日落幕。攝影：鄭雅云。

原住民族狩獵辦法將完備 以行政契約邁向自主管理

〈原住民族狩獵辦法〉由台北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張惠東負責起草，經多年研究與試辦後，草案目前已進入林務局與原民會內部最後討論，並即將完成法制程序，預定於明年向各地原民部落與獵人團體進行說明。

現行法律中，原民合法狩獵有三類型態，包括傳統文化狩獵、祭儀狩獵及自用狩獵。但過去前兩項在原基法與野保法都已有規範，但自用狩獵卻僅在原基法有、野保法並無，因此2017年先由農委會與原民會會銜發佈解釋函，對自用狩獵提出定義，農委會並開始訂定此辦法，補完法制程序。

該辦法將狩獵管理分為三階段，「祭儀及傳統文化狩獵」、「暫定自主管理狩獵」與「自主管理狩獵」。

在完成自主管理行政契約簽訂前，部落、原民團體、與狩獵自主管理試辦計畫為「暫定自主管理狩獵」，而無加入自主管理組織的原民獵人，則繼續使用現行法令。

有意進行自主管理者，必須成立狩獵自主管理組織、制定自治自律公約、規範獵人資格、製發狩獵證件（如獵人證）。持有獵人證的獵人必須向組織回報其狩獵結果，自主

管理組織則必須定期向回報集體的狩獵成果。

獵人精準觀察不輸生態學者 裴家騏：可雙重確保永續

自主管理組織所回報的狩獵成果數據，如動物的種類與數量等，將作為後續主管機關裁量申請數量的依據，也因此，生態學者更進一步希望各地自主管理組織可以與學術機構合作，狩獵同時協助管理維護自動監測的設備，雙重確保生態資源的狀況。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教授裴家騏建議，學術監測與原民獵人回報兩套並行，讓狩獵自主管理在「目標、規劃、執行、監測、評估」之間持續滾動性修正，以確保生態永續。

裴家騏強調，其實這並非只是學術的理論，回顧過去原民對獵場的管理，其實就已是這樣的概念。獵人回報狩獵成果，可以建構出各地的空間生態學；再者，非獵物的回報也同樣對環境管理有所幫助，例如目前水鹿數量過剩，其對山林植物破壞的狀況，獵人的第一線觀察能讓管理機關更瞭解實情。

目前例如阿里山鄒族與屏科大教授翁國精合作維護自動照相設備、花蓮太魯閣銅門部落獵人與裴家騏合作統計飛鼠族群等計畫等。裴家騏表示，在部分物種上，獵人做的量表與學術觀察紀錄兩者已是高度相關，他認為兩者的資料可以互通，但目前山羊、山羌、野豬的統計兩者落差較大，也許是雙方的邏輯不同所致，仍須找到方法整合。



2010年3月13日台東林管處在太麻里溪查獲盜獵案，起出土製獵槍7支、山羌10隻、大赤鼯鼠1隻。圖片來源：台東林管處新聞照片。

他認為獵人長期在山上所得觀察可能其實比學術調查更為細緻，未來獵人的數據可能足以取代科學觀察。

慎重以待 11獵人團體試辦經驗談「慢慢走比較快」

自2017年林務局展開示範計畫，目前已有11個獵人團體試辦中，目前以「嘉義鄒族獵人協會」進度最為領先，已與林務局嘉義林管處合力完成行政契約內容，幾是法案正式上路後即可簽訂，「屏東來義鄉傳統狩獵文化協會」亦開始草擬契約。

不過，與會獵人皆認為行政契約的簽訂不需要搶快，經過團體內細緻磨合出共識才最為重要，必須紮實打底出屬於自己的經驗。因為狩獵自主管理是其他自主管理的開頭，他們相當慎重看待。

「慢慢走比較快。」嘉義鄒族獵人協會理事長高德生表示，他們在2018年成立獵人協會前，已經舉辦9年「獵人尾牙」聯絡當地獵人的感情先試著組織起來，初期其實只想要組

成特富野部落的獵人協會，但在討論中，另一大社達邦也開始有意願加入，目前阿里山鄒族8部落一起組成協會，已有335位會員。



「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成立之初，創始會員即有160人。圖片提供：林務局。

協會不但負責發放獵人證、統計狩獵成果，更舉辦培力課程，因為對他們而言，這不只是傳承狩獵更是傳承傳統規範「EINU」。他們也正在討論要將獵人證分級、並有意據監測資料將生態敏感區劃為禁獵區，以公約互相約束。

狩獵自主管理第一步 未來還有生態旅遊、林下經濟

對於鄒族獵人協會可望第一個完成行政契約簽訂，高德生表示，相較於其他團體，鄒族人口集中在阿里山無與其他族群混雜、且目前設定的獵場範圍也僅限於阿里山，先不涉及過去與布農族等其他族群重疊的地區，是他們相較其他團體較簡單的條件。

對鄒族而言，事情要有開頭才能越談越好，因此他們願意積極與林管處配合。但每個地區的狀況各自不同，只能互相交流激盪靈感來找出自己的路，並無法將別人的經驗整個複製移植。

協助屏東來義鄉傳統狩獵文化協會草擬行政契約的屏科大森林系助理教授吳幸如表示，雖然來義最早成立傳統狩獵文化協會，但由於來義鄉範圍廣大，當中各部落的傳統文化有些許落差，要協調出公約並不容易，但他認為這段過程不能心急必須紮實進行，且他們著眼的不仅是狩獵自主管理，後面更龐大的林下經濟、生態旅遊等產業發展，更是他們已經在全盤規劃與準備走向自主管理的。

※ 本文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生物多樣性 台灣新聞

獵人 原住民 狩獵 共管 生態旅遊 當部落傳統遇上現代治理：原民狩獵自主管理專題

作者



賴品瑀

新店溪下游人，曾在成大中文與南藝紀錄所練功打怪撿裝備，留下《我們迷獅子》、《我是阿布》兩部紀錄片作品。現為人類觀察員，並每日鍛鍊肌肉與腦內啡，同時為環境資訊電子報專任記者，為大家

搭起友誼的橋樑。

捐款支持 更多環境獨立報導



★ 依議題類別瀏覽 | 環境政策 | 生活環保 | 空氣污染 | 動物福利 | 環境經濟 | 生態保育 |

★ 依議題類別瀏覽 | 能源議題 | 生物科技 | 全球變遷 | 土地水災 | 永續發展 | 環境哲學 |

2021/2/23

「行政契約」共管狩獵將入法 獵人自律・科學監測保生態永續 | 環境資訊中心

★ 在 野 蠻 的 訓 練 場 | 野 蠻 的 訓 練 場 | 野 蠻 的 訓 練 場 | 野 蠻 的 訓 練 場 | 野 蠻 的 訓 練 場 |

maintained by 1016 / powered by a1016 / enhanced by 1016 Tiger

企劃處

行政院 函

受文者：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九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發文字號：院臺疆字第09100017300號

附件：

傳 真：(〇二)三三五六九二〇

主旨：所報為落實「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有關「原住民族地區」條文之規定，謹擬具台北縣烏來鄉等三十個山地鄉及新竹縣關西鎮等二十五個平地鄉（鎮、市）合計五十五個鄉（鎮、市）為「原住民族地區」之具體範圍一案，同意照辦。

說明：復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台（九十一）原民企字第91-01402號函。

正本：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副本：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副本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函

受文者：

企劃處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發文字號：台（九十一）原民企字第九一〇一四〇二號

附件：

主旨：為落實「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有關「原住民族地區」條文之規定，謹擬具「原住民族地區」之具體範圍，詳如說明，敬請 鑒核。

說明：

一、查「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五條規定：「原住民族地區之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其僱用下列人員之總額，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原住民：一、約僱人員。二、駐衛警察。三、技工、駕駛、工友、清潔工。四、收費管理員。五、其他不須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非技術性工級職務。前項各款人員經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

機關地址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三號七樓

傳 真 (02) 二三四五—四五一〇

電 話 (02) 八七八九—一八〇〇轉三〇七

承辦人：林添輝專員

構列為出缺不補者，各該人員不予列入前項總額計算之。原住民地區之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進用需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其進用原住民人數應不得低於現有員額之百分之二，並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完成。但現有員額未達比例者，俟非原住民公務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本法所稱原住民地區，指原住民族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經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地區。」第十一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辦理位於原住民地區未達政府採購法公告金額之採購，應由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或團體承包。但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或團體無法承包者，不在此限。」為落實上開規定，保障原住民工作權，爰依第五條第四項規定，擬具「原住民地區」之具體範圍，報請核示。

二、本會經審慎評估，以三十個山地鄉及二十五個平地鄉（鎮、市）合計五十五個鄉（鎮、市）為原住民地區，上開鄉（鎮、市）臚列如下：

（一）三十個山地鄉包括：台北縣烏來鄉、桃園縣復興鄉、新竹縣尖石鄉、五峰鄉、苗栗縣泰安鄉、台中縣和平鄉、南投縣信義鄉、仁愛鄉、嘉義縣阿里山鄉、高雄縣桃源鄉、三民鄉、茂林鄉、屏東縣三地門鄉、瑪家鄉、霧台鄉、牡丹鄉、來義鄉、泰武鄉、春日鄉、獅子鄉、台東縣達仁鄉、金峰鄉、延平鄉、海端鄉、蘭嶼鄉、花蓮縣卓溪鄉、秀林鄉、萬榮鄉、宜蘭縣大同鄉、南澳鄉。

（二）二十五個平地原住民鄉（鎮、市）包括：新竹縣關西鎮、苗栗縣南庄鄉、獅潭鄉、南投縣魚池鄉、屏東縣滿洲鄉、花蓮縣花蓮市、光復鄉、瑞穗鄉、豐濱鄉、吉安鄉、

壽豐鄉、鳳林鎮、玉里鎮、新城鄉、富里鄉、台東縣台東市、成功鎮、關山鎮、大武鄉、太麻里鄉、卑南鄉、東河鄉、長濱鄉、鹿野鄉、池上鄉。

三、本會以前開五十五個鄉（鎮、市）為原住民地區之理由敘明如下：

（一）法規措施明定，行諸多年：

查臺灣省政府前於民國三十四年起針對山地特殊行政狀態，建立行政體制，即劃編山地鄉村鄰，將原有理蕃區域按照地方行政體制，根據山地地理環境及交通情形，劃編村鄰，建立鄉公所及代表會，並委派原住民（當時稱山胞）任鄉長（後改為選舉）。是以山地鄉公所分別於三十四年底至三十五年成立，全省十二縣計分三十個山地鄉、二百一十七村。此為我政府第一階段的山地重要施政，建立原住民行政工作之基石。復查臺灣省政府於民國四十一年二月十一日頒發「臺灣省山地鄉公所組織補充辦法」以適應山地實際需要，配合地方自治及加強山地行政措施，並附「臺灣省各縣山地鄉公所編制員額表」，爾後部分山地鄉名稱並依規定變更為現行名稱。是以三十個山地鄉已行諸五十餘年。至於平地原住民鄉（鎮、市）之沿革，查臺灣省政府前以民國四十四年二月十日（肆肆）府民一字第一三六七〇號令頒「臺灣省政府輔導平地山胞生活計畫」，以提高平地原住民（當時稱平地山胞）生活水準，明定以各縣平地行政區域內原住民為推行對象，並以原住民集中地區花蓮縣、台東縣、苗栗縣為實施地區，其中花蓮縣、台東縣各有十個鄉（鎮、市），苗栗縣則有南庄鄉計有二十一個鄉（鎮、市）。復查民國四十五年五月十日（肆伍）府民一字第四九六九〇號令頒「臺灣省

平地山胞生活改進運動辦法」之施行地區，除上述所列之二十一個鄉（鎮、市）外，另劃定苗栗縣獅潭鄉（賽夏族居住）為平地原住民鄉，計二十二個鄉（鎮、市）。另查民國五十六年一月十二日府民一字第二九七一號令頒「臺灣省政府輔導平地山胞生活計畫（第三次修訂）」明定平地原住民鄉（鎮、市），除前述二十二個鄉（鎮、市）外，並將新竹縣關西鎮（泰雅族居住）、南投縣魚池鄉（邵族居住）、及屏東縣滿洲鄉（排灣族居住）等三鄉（鎮）劃入，共計二十五個平地鄉（鎮、市）。是以上開平地鄉（鎮、市）亦有行諸四十餘年之行政史。若將上開五十五個鄉（鎮、市）列為原住民民地區，既符合長久以來之行政習慣，亦延續法規措施，展現施政之一貫性。

（二）原住民民族傳統居住，並具原住民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

查前開五十五個鄉（鎮、市）為原住民民族傳統居住，並具原住民民族各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之地區，且為原住民民族社會之共識，以往政府推動原住民施政，以該五十五個鄉（鎮、市）為行政區域，即秉持此種考量，是以將其訂為原住民民地區，既符合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肯定多元文化之精神，亦符合原住民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五條第四項所稱原住民民地區之定義及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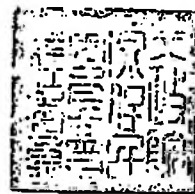
（三）反映民意需求，行政可行性高：

衡諸原住民民族民意，以及地方行政鄉（鎮、市）長之反映，前開五十五個鄉（鎮、市）訂為原住民民地區，其行政可行性最高，並符合地方行政需要。舉凡位居前開五十五個鄉（鎮、市）之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均已以此基本認同，是以原住民

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相關條文於原住民族地區保障原住民工作權之意旨，當能落實執行。
盱衡前開論證及理由，本會擬以三十個山地鄉及二十五個平地鄉（鎮、市）為原
住民族地區之具體範圍，敬祈俯允為禱。

正本：行政院
副本：本會各處、室、會、局

主任委員 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原訴字第15號

聲請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謝文生

選任辯護人 林育萱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漁業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08年度偵字第3114號），本院受理後（109年度東原簡字第48號），認不應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謝文生犯漁業法第六十條第一項之非法採捕水產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緩刑參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萬元，暨接受參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扣案電魚設備壹批（含電瓶壹顆、電網壹枝、電桿壹枝及變壓器壹組）均沒收之。

事 實

一、謝文生明知臺東縣達仁鄉大竹溪邊（衛星定位座標：X軸：235348、Y軸：0000000；下稱案發處所）位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所管轄之大武事業區第24林班，屬「大武山自然保留區」，依法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且非為試驗研究目的，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使用電氣採捕水產動物，竟仍因配偶親族離世，為獲取食材以喪宴親友，即基於非法採捕水產動物、妨害文化資產保存之犯意，於民國108年10月26日6時許，在案發處所，持己身所有之電魚設備1批（含電瓶1顆、電網1枝、電桿1枝及變壓器1組），使用電氣採捕日本瓢鰭鰻（即俗稱之「和尚魚」、「日本禿頭鯊」）、溪蝦等水產動物共2袋（含袋重各4公斤、5公斤），同時破壞案發處所之自然狀態。嗣經警據報於108年10月26日11時30分許，在臺東縣達仁鄉土村產業道路上，當場緝獲謝文生，並扣得上開電魚設備及漁

01 獲（業發還臺東縣政府農業處漁業科），而查悉全情。

02 二、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報告臺灣臺東
03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04 理 由

05 壹、證據能力部分

06 本判決所引用之供述證據（詳後所引用者），其中屬傳聞證
07 據部分，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或其
08 他規定之傳聞證據例外情形，因均經當事人、辯護人於法院
09 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
10 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且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
11 時，亦無事證顯示各該陳述之作成時、地與週遭環境，有何
12 致令陳述內容虛偽、偏頗及與法定程序相違等情事，認為適
13 當，依同法第159條之5規定，為傳聞法則例外，有證據能
14 力；至其餘非供述證據，經查尚乏事證足認係實施刑事訴訟
15 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未經當事人、辯護人
16 於本院審判程序中有所爭執，同有證據能力。

17 貳、實體部分

18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暨所憑證據

19 上開事實欄一所載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謝文生於本院審判
20 期日時坦承不諱（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09年度原訴字第15號
21 刑事一般卷宗【下稱本院卷】第123至126頁），核與證人
22 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大武工作站巡山
23 員尤如成、證人即臺東縣政府農業處漁業科技士陳哲明各於
24 警詢時之證述（證人尤如成部分：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
25 七總隊保七九大刑偵字第1080004259號刑案偵查卷宗【下稱
26 警卷】第7至9頁；證人陳哲明部分：警卷第10至12頁）大
27 抵相符，並有偵查報告、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臺東分
28 隊搜索、扣押筆錄、自願受搜索扣押同意書、保七總隊第九
29 大隊臺東分隊扣押物品發還領據、大武事業區第24林班違法
30 電魚位置圖、大武山自然保留區查詢列印資料、違反漁業法
31 、文化資產保存法蒐證資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9

01 年2月7日林保字第1090703457號函、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
02 察第七總隊第九大隊109年3月19日保七九大刑偵字第1090
03 001153號函暨附件、死亡證明書各1份（警卷第2頁、第17
04 至21頁、第22頁、第23頁、第24頁、第25至26頁、第27至30
05 頁，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3114號偵查卷宗第
06 15頁、第16至23頁反面，本院卷第67頁）在卷可稽，自足認
07 被告前開任意性之自白係與事實相符，亦有上開證據可資補
08 強，堪信為真實。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事實欄一所載
09 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10 二、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

11 （一）論罪

12 1、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03條第1項第7款之罪，係以「改
13 變」或「破壞」自然保留區之「自然狀態」為其要件；其
14 中所謂「自然狀態」，係指自然保留區內，非具人力參與
15 而天然生成之一切情狀，舉凡自然保留區內之生物、非生
16 物，或其等所處之環境，乃至於彼此間之互動、交互作用
17 等現象，均包含在內；而該款所稱「破壞」，係指足使自
18 然保留區之自然狀態遭受有形損毀或無形損害之所有行為
19 之謂；至於同款之「改變」，則係指雖未達至「破壞」之
20 程度，然足致自然保留區之自然狀態產生變化、更動，而
21 與原有狀態相異之行為，均屬之。查被告本件係在案發處
22 所，使用電氣採捕日本瓢鰭[？]虎、溪蝦等水產動物乙情，
23 業經本院認定在前，是其所為顯已就案發處所之現有生物
24 為消滅性之處置，亦對該處生態系統產生結構性之損害，
25 揆諸前開說明，自核與「破壞」自然保留區之「自然狀態
26 」之要件相合；至公訴意旨認被告本件所為僅係「改變」
27 自然保留區之自然狀態，尚有未洽，應予更正之，併此指
28 明。

29 2、核被告所為，係犯漁業法第60條第1項之非法採捕水產動
30 物罪，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03條第1項第7款之妨害文
31 化資產保存罪（其改變自然保留區自然狀態之低度行為，

為破壞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本文規定，應從較重之非法採捕水產動物罪（本院按：主刑之種類如下：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2 月以上15年以下；但遇有加減時，得減至2 月未滿，或加至20年；拘役：1 日以上，60日未滿；但遇有加重時，得加至120 日；罰金：新臺幣1,000 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二項標準定之，刑法第33條、第35條第1 項、第2 項、第3 項前段各定有明文；而核漁業法第60條第1 項、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03 條第1 項第7 款所定各罪之最重主刑均為有期徒刑，且最高度係屬相等，皆為5 年，然最低度則分別為1 年、6 月，是揆諸前開規定，二者應以漁業法第60條第1 項之非法採捕水產動物罪為重）處斷；惟依同條但書：「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之規定，本院於適用漁業法第60條第1 項規定量定其宣告刑時，自不得科以較輕罪名（即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03 條第1 項第7 款之妨害文化資產保存罪）最輕本刑（即有期徒刑6 月）以下之刑，附此指明之。

- 3、至辯護人雖一度為被告主張以：被告本件犯行非為營利，係因配偶親族離世，始為煮食慰問遺族而為之，屬於排灣族既有喪禮禮儀，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所定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之目的，且其所捕撈之日本瓢鰭鰕虎、溪蝦，長久以來即為排灣族人所食用之物種，亦非保育類動物，更何況排灣族人本有以漁籐毒魚之捕撈文化習慣，而現今科技已進步至有利用電氣電魚之捕撈方式，實不應限制原住民族僅得以舊有工具或方式進行獵捕，尤其電魚不會造成魚類死亡或無差別、大範圍捕撈，故不會造成自然狀態破壞，爰請依原住民族基本法與憲法保障原住民文化、權利

之角度予以從輕量刑，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等語（本院卷第129至147頁）。而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485號、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理由參照）；基此，本院審酌被告係因配偶親族離世，為獲取食材以喪宴親友，始為本件犯行，是其主觀犯罪動機、目的雖均非惡劣，然核被告案發時業為年滿50歲之成年人，心智已然成熟，社會歷練亦屬豐富，更身為在地鄉民，對於不得在自然保留區內之案發處所採捕水產動物，乃至於使用電氣為之，顯無從諉為不知，竟仍予違反，自難認其犯罪動機、目的同屬單純，且被告係遲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始坦承全部犯行，犯罪後態度亦非得與自始坦承者相比，加以案發處所屬環境敏感區域，內含物種、環境等生態系統極易因人為不當活動而受有嚴重影響，尤以被告本件採捕水產動物方式係使用電氣為之，而電氣之傳導範圍廣，對於水生物種更不具選別性，於案發處所之溪流生態系統顯具相當破壞力，其因而所採捕得之日本瓢鰭鰕虎、溪蝦等水產動物合計甚達9公斤之多，要非少量，則被告本件犯行之客觀犯罪情節同非輕微；從而，本院顯難認有何顯可憫恕之事由，即本件在客觀上已足引起一般同情，或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等情形存在，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餘地，辯護人此部分主張，要無理由。

（二）科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件犯行係於性質屬環境敏感區域之自然保留區所為，併係使用傳導範圍廣、

對於水生物種不具選別性之電氣採捕水產動物，其因而所採捕得之日本瓢鰭[?]虎、溪蝦等水產動物合計更達9公斤之多，是其本件犯行之客觀犯罪情節顯非輕微，所為確屬不該；另念被告本件犯罪動機、目的雖均非單純，然仍非惡劣，且犯罪後態度堪可（以上併詳如前開貳、二、（一）、3部分所述，茲不贅）；兼衡被告以打零工維生、家庭經濟狀況貧困、教育程度小學肄業、家庭生活支持系統難認充實（警卷第31頁，本院卷第124頁），及檢察官、辯護人各自關於本件量刑之意見（本院卷第12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三）緩刑

查被告前於74年間，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本院以74年度易字第377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月、3月，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75年8月12日期滿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09年度東原簡字第48號刑事簡易第一審卷宗第15至16頁）在卷可佐，惟前開案件執行完畢後，迄至被告於108年10月26日為本件犯行時，已逾5年，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之前提要件；而本院復審酌被告本件犯行時距前案執行完畢業逾30年之久，期間亦未有何因案經科處罪刑之前案紀錄，同有前引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素行非差，且係因配偶親族離世，為獲取食材以喪宴親友，始為本件犯行，事出有因，自足認其係一時失慮，方罹刑典，且被告至遲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尚知坦承全部犯行，犯罪後態度堪可，仍非無懊悔之意，當堪認其歷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被告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之期間，以勵自新；惟為期被告切實記取教訓、深刻瞭解自然保留區之重要性及利用電氣採捕水產動物之危害性，認仍有科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參酌檢察官、被告暨辯護人之意

見（本院卷第126頁）後，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8款規定，命其應於如主文所示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暨接受如主文所示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末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宣告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發揮附條件緩刑制度之立意及避免短期自由刑執行所肇致之弊端，以期符合本件緩刑目的，並觀後效。

（四）沒收

查扣案電魚設備1批（含電瓶1顆、電網1枝、電桿1枝及變壓器1組）均屬被告所有、持用為本件犯行之器具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判期日時供陳（本院卷第120頁）明確，依刑法第38條第2項本文規定，本院自應俱宣告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299條第1項本文，漁業法第60條第1項，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03條第1項第7款，刑法第11條本文、第55條、第74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4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38條第2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琇棋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謝慧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8 月 14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官 邱奕智

法官 吳俐臻

法官 陳偉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01 書記官 楊茗璋
02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8 月 19 日
03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
04 漁業法第60條第1項：
05 違反第48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06 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15萬元以下罰金。
07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03條第1項第7款：
08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09 臺幣50萬元以上2,000萬元以下罰金：
10 七、違反第86條第1項規定，改變或破壞自然保留區之自然狀態
11 。

裁判字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2 年度原花簡字第 62 號 判決

裁判案由：野生動物保育法

裁判日期：民國 102 年 04 月 30 日

相關資料：歷審裁判(0)・起訴書(0)・法條(9)・司法判解(1)・行政函釋(0)・法學論著(0)・
附件(0)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02年度原花簡字第62號

聲 請 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舒浪達道

黃信華

上列被告因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刑（102年度偵字第2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非法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扣案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參隻
及臺灣野山羊壹隻、喜得釘貳拾肆顆、鋼珠貳拾壹顆及土造獵槍
貳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均沒收
。

乙○○共同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非法獵
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扣案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參隻及
臺灣野山羊壹隻、喜得釘貳拾肆顆、鋼珠貳拾壹顆及土造獵槍貳
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甲○○○、乙○○ 2人均係太魯閣族原住民，均明知山羌及
臺灣野山羊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列為保育類之野生動物
，族群量未逾越環境容許量，不得予以獵捕、宰殺，及在國
家公園區域內不得狩獵動物，2 人竟意圖供己食用，而共同
基於獵捕保育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於民國 102年1月8日凌
晨 1時許，由甲○○○及乙○○分別攜帶其等所有未經許可
持有，惟供其等生活之用，具殺傷力之土造長槍各 1支（槍
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違反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部分，另經不起訴處分），在花蓮縣秀林鄉沿海
林道山區即太魯閣國家公園區域內，以前揭槍枝獵捕屬保育
類野生動物之山羌3隻、臺灣野山羊1隻，得手後準備攜回家
中分食。嗣於同日凌晨 3時53分許，為警在花蓮縣秀林鄉臺

八線171.6公里處查獲，並扣得上開山羌3隻、臺灣野山羊 1 隻（均為死體）及其等所有之上開土造長槍2支、喜得釘 24 顆及鋼珠21顆。

二、證據：

- （一）被告甲○○○、乙○○（下稱被告 2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調查之自白。
- （二）證人即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課技士高欽於警詢中之證述。
- （三）屏東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附設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臨時物種鑑定表。
- （四）現場圖、照片、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具領結單）、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野生動物保護區一覽表。
- （五）扣案之山羌3隻、臺灣野山羊1隻、土造長槍 2支、喜得釘 24顆及鋼珠21顆。

三、論罪科刑：

- （一）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1條第2項係規定，於劃定之野生動物保育區內，犯前項之罪者，為其成立要件。亦即行為人係於劃定之野生動物保育區，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方可成立。然太魯閣國家公園並非行政院農委會核定、縣政府公告之野生動物保護區，有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野生動物保護區一覽表在卷可佐，且依卷內證據資料，亦無證據足資證明被告 2人係於野生動物保育區內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以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2項加重刑度。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2人亦係犯同法第41條第2項之罪，容有未洽，合先敘明。
- （二）次查國家公園法第25條前段僅係行政罰鍰，而同法第25條後段之規定，必須情節重大，且因而導致嚴重損害者，始足當之。所謂情節重大，必須以被告 2人所為狩獵動物之目的、方法、範圍等綜合判斷之。本件被告 2人均係持供其等生活之用，具殺傷力之土造長槍狩獵動物，被告2 人狩獵之目的係為供己及家人食用，而渠等狩獵之範圍亦小，影響國家公園之情節自非重大。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2人亦犯國家公園法第 25條後段之違反國家公園法第 13條第2款之損害國家公園罪，亦有未洽，併予敘明。
- （三）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而犯同法第 41條第1項第1款之非法獵捕保育類動物罪。被告 2人先後實施獵捕山羌、臺灣野山羊犯行之犯罪時間、地點均屬密切接近，客觀上足認係單一行為

之多次舉動，侵害法益種類亦屬相同，且被告主觀上所認識者亦應屬基於單一犯意所為之接續舉動，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為接續犯，論以單純一罪。被告 2 人就上開犯行彼此間互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四) 爰審酌被告 2 人均係太魯閣族原住民，有渠等個人基本資料查詢 2 份在卷足參，狩獵為原住民之傳統生活方式，且渠等獵捕山羌、野山羊之目的係供渠等與家人食用，並非藉此牟利，惡性尚輕，然獵捕物種應以一般類野生動物為限，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對自然生態之平衡造成危害，本案獵得之保育類野生動物為 4 隻，侵害法益之程度非鉅，兼衡渠等係使用原住民自製獵槍之傳統方式獵捕野生動物之犯罪手段，且犯後被告 2 人均坦承犯行，態度良好等一切情狀，就被告 2 人所犯之罪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 又被告 2 人均未曾因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2 份在卷可稽，復被告 2 人非屬屢次或大量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以牟利之特別惡劣者，而均屬初次違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犯罪情節較輕，又渠等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良好，被告 2 人經此科刑之教訓，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等所受刑之宣告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均宣告緩刑 2 年。

(六) 末查，扣案之山羌 3 隻、臺灣野山羊 1 隻（均死體），均係屬保育類野生動物，爰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52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至扣案之白面鼯鼠 2 隻（均死體），並非保育類野生動物，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又共同正犯因相互間利用他方之行為，以遂行其犯意之實現，本於責任共同之原則，共同正犯應對所參與犯罪之全部事實負責，有關從刑之沒收部分，雖為他共同正犯所有供犯罪所用或預備之物，亦應於其本身所處主刑之後，併為沒收之諭知（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692 號判決意旨參照）。扣案之喜得釘 24 顆、鋼珠 21 顆及土造獵槍 1 支（槍枝管制編號 0000000000 號）為被告乙○○所有，另扣案之土造獵槍 1 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 號）為被告甲○○所有，均為供犯罪所用之物，為被告 2 人於警詢時一致供明（見警卷第 2-8 頁），且被告 2 人為共同正犯，本於責任共同之原則，自應依上開規定，在被告 2 人之主文項下，均併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 449 條第 1 項前段、第 454 條第 1 項、第 450 條第 1 項，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2 條第 1 項，

刑法第11條、第28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 74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4 月 30 日
花蓮簡易庭 法 官 王凱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5 月 1 日
書記官 游士霽

附錄論罪科刑之法條：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六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未具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條件，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第18條第1款：

保育類野生動物應予保育，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殺或為其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在此限：

一、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者。

相關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 11 條（102.01.23版）

中華民國刑法第 28 條（102.01.23版）

中華民國刑法第 41 條（102.01.23版）

刑事訴訟法第 449 條（102.01.23版）

國家公園法第 13 條（99.12.08版）

國家公園法第 25 條（99.12.08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8 條（102.01.23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1 條（102.01.23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52 條（102.01.23版）

司法判解：最高法院 100年度 台上 字第 692 號 刑事裁判（100.02.17）

資料來源：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www.lawbank.com.tw

裁判字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39 號 判決

裁判案由：野生動物保育法

裁判日期：民國 99 年 05 月 13 日

相關資料：歷審裁判(3)・起訴書(0)・法條(12)・司法判解(2)・行政函釋(0)・法學論著(0)・附件(0)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9年度訴字第139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法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丙○○

乙○○

甲○○

上列被告因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9年度偵字第1623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丙○○共同未具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二款之條件，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累犯，處有期徒刑柒月。扣案之山羌死體伍隻、土造獵槍貳枝、大赤鼯鼠死體壹隻、白面鼯鼠死體壹隻均沒收。

乙○○、甲○○共同未具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二款之條件，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各處有期徒刑捌月，均緩刑參年。扣案之山羌死體伍隻、土造獵槍貳枝、大赤鼯鼠死體壹隻、白面鼯鼠死體壹隻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於犯罪事實欄一、之首補充「丙○○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台灣台中地方法院98年交易字第 28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4月確定，於民國98年10月2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仍不知警惕。」，並將第 2行「一般類保育類野生動物大赤鼯鼠、白面鼯鼠等」更正為「一般類（非保育類）野生動物大赤鼯鼠、白面鼯鼠等」、將第 4行之「竟於」，補充更正為「竟共同基於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犯意聯絡，於」，在證據欄補充「被告丙○○、乙○○、甲○○ 3人於本院之自白」，並依檢察官當庭所述，刪除所犯法條欄之「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 2項」（因太魯閣國家公園並非行政院農委會核定、縣政府公告之野生動物保護區，當無依照該條第 2項加重刑度之理）、「國家公園法第13條第2款、第25條」（因尚難認被告之獵捕行為已達情節重大，致引起國家公園嚴重損害之程度）以及有關想像競合犯之記載外，其餘犯罪事

實、證據、應適用之法條，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 二、查山羌係保育類野生動物，且未經公告族群量逾越環境容量，被告 3 人亦非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而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獵捕，故其等並不具備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所規定之條件，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核被告 3 人所為，同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之規定，應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之規定處罰。被告 3 人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被告等雖獵捕山羌 5 隻，僅侵害一個社會法益，自屬單純一罪。至於大赤鼯鼠、白面鼯鼠均非保育類野生動物，業經證人即太魯閣國家公園職員王如華於警詢中證述明確，又有與其證詞相符之屏東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附設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臨時物種鑑定表乙份在偵卷可參，故起訴書將鼯鼠載為「一般類保育類野生動物」，顯係誤載，爰更正如上。
- 三、被告丙○○有如前所述經執行有期徒刑完畢之事實，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乙份附卷可稽，其於 5 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刑法第 47 條第 1 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 四、爰審酌被告丙○○為大學畢業之建築工人，負責提供車號 DT-4361 號自小客貨車作為交通工具，並在車內等候，由被告乙○○、甲○○持扣案土造獵槍 2 枝，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 5 隻，目的係供己食用，及被告乙○○、甲○○均為布農族原住民，乙○○為高中畢業之自耕農，甲○○為國小畢業之板模工，其等犯罪之動機、智識程度、手段及造成之損害，犯罪後均能坦承犯行，態度尚佳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被告乙○○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被告甲○○曾於 79 年間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台灣台中地方法院 79 年度訴字第 119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3 月、緩刑 3 年確定，之後即無犯罪紀錄，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乙份在卷可稽，其等自述因生活所迫，獵捕野生動物欲供己食用，經此教訓，應知警惕，當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分別依照刑法第 7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之規定，宣告緩刑 3 年，以啟自新。
- 五、扣案之山羌 5 隻死體，係被告非法獵捕之保育類野生動物，爰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52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扣案之土造獵槍 2 枝（1 枝合法申請，1 枝未合法申請）係被告犯案所用之獵具，爰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52 條第 1 項後段之規定宣告沒收。至扣案之大赤鼯鼠、白面鼯鼠各 1 隻（均死

體)係被告等因犯罪所得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宣告沒收。而 DT-4361號自小客貨車僅係被告等人前往現場之交通工具，尚非犯案所用之器具，且沒收亦違反比例原則，爰不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273條之1第1項、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2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47條第1項、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8條第1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宇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9 年 5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蕭一弘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99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附錄本判決論罪之法律條文：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

保育類野生動物應予保育，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殺或為其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在此限：

一、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者。

二、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

前項第1款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利用，應先經地方主管機關許可；其可利用之種類、地點、範圍及利用數量、期間與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前二項申請之程序、費用及其他有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金：

一、未具第18條第1項第1款之條件，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二、違反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三、違反第19條第1項規定，使用禁止之方式，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於劃定之野生動物保護區內，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三分之

— 9 —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歷審裁判：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99 年度 訴 字第 139 號判決 (99.05.13)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99 年度 訴 字第 139 號裁定 (99.06.22)
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 99 年度 上訴 字第 148 號判決 (99.11.16)

相關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 2 條 (99.01.27版)
中華民國刑法第 11 條 (99.01.27版)
中華民國刑法第 38 條 (99.01.27版)
中華民國刑法第 47 條 (99.01.27版)
中華民國刑法第 74 條 (99.01.27版)
刑事訴訟法第 299 條 (98.07.08版)
國家公園法第 13 條 (61.06.13版)
國家公園法第 25 條 (61.06.13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 條 (98.07.08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8 條 (98.07.08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1 條 (98.07.08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52 條 (98.07.08版)

司法判解：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79年度 訴 字第 119 號 刑事裁判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8年度 交易 字第 286 號 刑事裁判 (098.08.11)

資料來源：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www.lawbank.com.tw

裁判字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93 年度花簡字第 366 號 判決

裁判案由：野生動物保育法

裁判日期：民國 93 年 08 月 03 日

相關資料：歷審裁判(0)・起訴書(0)・法條(12)・司法判解(0)・行政函釋(0)・法學論著(0)・附件(0)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九十三年度花簡字第三六六號

聲 請 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乙○○

右被告等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九十三年度核退偵字第三六二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甲○○、乙○○共同未具保育類野生動物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及非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條件，使用電氣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均以參佰元折算壹日，均緩刑貳年。扣案之電瓶（含高壓線圈）、漁網、電漁桿、尼龍袋、頭燈、頭燈電瓶各壹個及保育類野生動物鱸鰻參條，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之記載。
- 二、被告甲○○、乙○○二人所為，均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二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及漁業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均應分別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及漁業法第六十條第一項之規定處罰。被告二人以一電氣捕獵鱸鰻之行為，觸犯上開二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五十五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處罰。
- 三、被告二人前均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二份在卷可按，其等因一時失慮，致觸犯刑典，犯罪後已坦承犯行，諒其等經此案科刑教訓後，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綜核各情，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予宣告緩刑二年，以啟自新。
- 四、扣案供犯罪所用之電瓶（含高壓線圈）、漁網、電漁桿、尼龍袋、頭燈、頭燈電瓶各一個及保育類野生動物鱸鰻三條，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沒收。
- 五、聲請意旨另以：被告甲○○、乙○○基於犯意聯絡，於九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凌晨一時許，在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太魯閣國家公園內之立霧溪支流沙卡礑溪畔，非法使用電氣獵捕包含保育類野生動物鱸鰻三條在內之水產動物，因認被告二人另違反國家公園法第十三條第二款之規定，應依同法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處罰等語。惟查：(一)被告二人在國家公園內以電氣獵捕魚蝦及鱸鰻共約二台斤之事實，除據被告二人所自承外，並有卷附照片六幀可資佐證。(二)國家公園法第十三條第

二款規定：「國家公園區域內禁止左列行為：二 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同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違反第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六款、第九款、第十六條、第十七條或第十八條規定之一者，處一千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致引起嚴重損害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即該法規定於國家公園內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之行為，需情節重大，致引起嚴重損害者，始需負刑罰之責任，否則僅屬行政罰之範疇。而被告二人係以電瓶、漁網、電漁桿等工具小規模獵捕魚蝦，所得之漁獲亦僅重約二台斤，情節尚非重大，亦未引起嚴重損害，應不符合該法第二十五條後段之規定，而課處刑罰，惟公訴人指此部分事實，與前揭認定有罪之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四百五十條第一項、第四百五十四條第二項，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漁業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六十條第一項，刑法第十一條前段、第二十八條、第五十五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第七十四條第一款，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二條之規定，逕為簡易判決。

七、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八 月 三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花蓮簡易庭
法 官 蘇 佩 文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附繕本）

法院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八 月 三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八條第一項

保育類野生動物應予保育，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殺或為其他利用。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在此限：

一 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者。

二 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

獵捕野生動物，不得以下列方法為之：

三 使用電氣、麻醉物或麻痺之方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一未具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條件，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二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使用禁止之方式，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漁業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

採捕水產動植物，不得以左列方法為之：

三 使用電氣或其他麻醉物。

漁業法第六十條第一項

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台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相關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 11 條（92.06.25版）
中華民國刑法第 55 條（92.06.25版）
刑事訴訟法第 449 條（93.06.23版）
國家公園法第 13 條（61.06.13版）
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 2 條（82.02.05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 條（93.02.04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8 條（93.02.04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9 條（93.02.04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1 條（93.02.04版）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52 條（93.02.04版）
漁業法第 48 條（91.12.18版）
漁業法第 60 條（91.12.18版）

資料來源：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www.lawbank.com.tw

原住民族基本法未完成立(修)法之相關子法辦理情形及預定期程表

原住民族基本法尚未完成立(修)法之相關子法辦理情形及預定期程表			
106年7月11日製表			
編號	名稱	法令種類	權責單位
1	國家公園法	法律	內政部
2	原住民依生活慣習採取森林產物管理規則	法規命令	農委會
3	森林法	法律	農委會
4	水土保持法	法律	農委會
5	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工作要點	行政規則	農委會
6	原住民族自治法	法律	原民會
7	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條例	法律	原民會
8	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	法律	原民會
9	原住民族土地受限制所生損失補償辦法	法規命令	原民會
10	部落公法人組織設置辦法	法規命令	原民會
11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	法規命令	原民會

編號	法令名稱	權責機關	填寫機關	辦理情形及預定進度 (請權責機關詳細填寫)	尚未完成立(修)法之原因	是否依原基法第34條第2項 規定作成解釋適用及其辦理 進度	預定立(修)法期 程
1	國家公園法	內政部	內政部 原民會	<p>◆內政部106年6月22日內授營園字第1060809285號函復內容：</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目前國家公園法修正草案業於第4條、第24條、第31條、第32條增訂相關條文，前經105年4月28日本部召開「國家公園法修正草案涉及原住民族事務相關條文研商會議」討論，惟原住民族及動物保護團體等意見難有共識。 原住民族委員會於105年8月2日函送建議條文，本部於105年12月1日函送可行性研析意見予原民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擬於修法前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4條第2項規定，透過解釋來排除國家公園法第13條第2款對於對於原住民「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之限制，鑒於以往國家公園法之修正因涉及資源保育及居民權益之衝突等課題而無法通過，本部將於作成解釋後，再參酌解釋之內容及相關配套措施，修正國家公園法草案，循法制程序陳報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 <p>◆原民會 【經濟發展處】</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本會分別於104年12月9日、105年8月26日及105年12月14日就國家公園法第十三條第二款規定解釋令邀集內政部、法務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召開3次研商會議在案。 內政部花次長敬群等3人於106年6月6日來會，說明內政部關於以解釋或修正國家公園法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對於原住民權 	<p>◆內政部106年6月22日內授營園字第1060809285號函復內容：</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本部自89年起即基於保障原住民權益等原因提案修正國家公園法，惟修正草案因涉及資源保育及居民權益之衝突等課題而眾所關注，多次進出立法院皆因各界意見紛歧而尚未通過。 支持原住民文化之觀點略以：原住民族基本法係各該領域或政策措施之基本原理原則或基本方針；原住民與山林鳥獸共存共生共榮之情境中蘊育出視狩獵為生活必要、價值正當、識別族群之生活與思考方式，因此，狩獵即為原住民族之傳統文化及權利。 支持資源保育之觀點略以：野生物之保育為國家公園之宗旨，國家公園係全民所有，具有種原保存庫的意義、野生物的存續是原住民文化存續的要件；野生物之保育具有不可逆性，基於預警性原則，在無法清楚調查動物 	<p>◆內政部106年6月22日內授營園字第1060809285號函復內容：</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原民會擬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4條第2項規定作成「解釋」以排除國家公園法第13條禁止獵捕之規定，本部前於105年8月30日召開諮詢會議，作為研析處理方案之參考，嗣經本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105年12月14日及106年1月3日舉行2次副首長協商會議後，本部政務次長並於106年6月6日率員前往原住民族委員會拜會衷將，拔路兒主委。 基於目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修正草案已增訂「非營利自用」為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之條件並增訂部落自主管理之機制，可逐步落實原住民傳統文化之尊重，又國家公園為保育的核心區域，物種存續的種原庫，而野生動物保育具有不可逆性及預警性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本解釋案建議俟國家公園區外執行有 	<p>◆內政部106年6月22日內授營園字第1060809285號函復內容：</p> <p>本部業已研擬國家公園法修正草案，惟因涉及原住民狩獵與資源保育之衝突等課題，且野生動物保育法亦有相關修正草案，為免爭議將俟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後，參酌相關執行經驗與成果，修正國家公園法草案，循法制程序陳報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p> <p>◆原民會 【土地管理處】</p> <p>宜由權責機關內政部預定修法期程。</p>

				套措施，修正國家公園法草案。 4. 內政部政務次長嗣於106年6月6日率員拜會本會主委，表示基於目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修正草案已增訂「非營利自用」為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之條件並增訂部落自主管理之機制，有關本會擬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4條第2項規定作成「解釋」以排除國家公園法第13條禁止獵捕之規定一案，建議俟國家公園區外執行有一定經驗及成果時，再予參考訂定適當作法。		律上之拘束力。 3. 本會擬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4條第2項規定作成「解釋」以排除國家公園法第13條禁止獵捕之規定一案，內政部建議俟國家公園區外執行有一定經驗及成果時，再予參考訂定適當作法。	
2	原住民族採取傳統領域土地森林產物管理規則	農委會	農委會 原民會	◆農委會106年6月19日農林務字第1060220780號函復內容： 1. 農委會業依森林法第15條第4項規定，擬具「原住民族採取傳統領域土地森林產物管理規則草案」，並於105年8月1日草案預告，徵詢外界意見30日。 2. 迄105年8月30日止，共接獲民眾個人、學者專家、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原民會、國產署、內政部營建署等中央機關及各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等各界意見共12件。各界認同擬具本管理規則草案之作為，均表示訂定後，可保障原住民族使用森林資源權利。但綜整各界意見，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之定義」、「得採取森林區域之指定」、「森林產物之種類」、「有償、無償」、「如何兼顧原住民族權益與保護森林資源及保育生態」、「應否事先申請或事後報備」、「是否允許原住民個人申請」及「是否採共管機制」等事項，仍意見分歧。 3. 因各界意見分歧，林務局已重新擬具草案條文，於105年11月8日、28日邀原民會等單位研商，原民會對於草案規劃以部落為申請主體，採取區域、種類及時期之程序及管理事項，表示須攜回研究，以提供處理意見。經原民會於106年5月31日函復意見略以： (1) 個人採取森林產物，無償者應免申			

			<p>益保障之立場。</p> <p>【土地管理處】</p> <p>1. 本會(土管處)前以105年8月2日原民土字第1050042151號函就國家公園法修正草案第4條(土管處)、第31條(土管處)及第32條(經發處)，提供建議修正條文及說明在案，其中：</p> <p>(1) 第4條第3項建議增訂：「主管機關於原住民族地區依第一項規定選定、設立國家公園及變更其區域，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徵得當地原住民族同意。」規定。</p> <p>(2) 第31條建議修正為：「原住民族地區經劃設為國家公園者，其經營管理，應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生活型態、自然資源利用方式、土地擁有利用與管理模式之權利，並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兼顧環境資源保育，其共同管理機制之實施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p> <p>(3) 第32條建議參酌「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有關原住民依法得獵捕野生動物等相關規定辦理。</p> <p>2. 本會(土管處)復於105年12月2日以原民土字第1050072891號函建請內政部卓參上開建議修正條文並依原基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辦理。</p> <p>3. 案經內政部以105年12月1日內授營園字第1050073894號函表示，鑒於以往因狩獵事宜涉及資源保育及居民權益之衝突課題而無共識，又本會擬於修法前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4條第2項規定，針對國家公園法第13條第2款「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放寬原住民狩獵，為凝聚共識，後續將配合本會作成解釋後，再參酌解釋之內容及相關配</p>	<p>資源狀態下，允宜謹慎處理狩獵問題；開放國家公園內獵捕野生動物亦將影響臺灣國際形象。</p> <p>◆原民會 【經濟發展處】</p> <p>1. 關於以解釋之方式，排除國家公園法禁止獵捕之限制1節，內政部建議俟國家公園區外執行有一定經驗及成果時，再予參考訂定適當作法。</p> <p>2. 國家公園法修法1節，未來將視配合本會作成解釋後之辦理情形，再參酌配套措施修正國家公園法。</p> <p>【土地管理處】</p> <p>內政部表示業已研擬國家公園法修正草案，惟因涉及原住民狩獵與資源保育之衝突等課題，且野生動物保育法亦有相關修正草案，為免爭議將俟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後，參酌相關執行經驗與成果，修正國家公園法草案，循法制程序陳報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p>	<p>一定經驗及成果時，再予參考訂定適當作法，以確保生態資源及原住民文化的永續。</p> <p>◆原民會 【土地管理處】</p> <p>1. 本會業依原基法第22條規定，會銜內政部等機關訂定發布「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規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原住民族地區劃設國家公園前，應徵得當地原住民族同意，並建立共同管理機制。爰經評估國家公園之劃設及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部分，尚無須依原基法第34條第2項規定，會同內政部另為解釋。</p> <p>2. 按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則，原基法第22條規定僅於新劃設之國家公園，始有適用餘地。惟國家公園共同管理機制之建立，係國家肯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體現之一環，原基法公布施行前已設置之國家公園，亦有依該法第22條規定之精神，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之必要，該共管機制之建立，並應透過國家公園法增訂相關條文，或由該法授權訂定相關規定，以課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p>
--	--	--	--	--	--

				<p>請、免許可及免查驗。</p> <p>(2) 「採取區域」定義為「原住民族地區」，另納入原住民個人可申請採取。</p> <p>4. 原住民族採取野菜等森林副產物食用係屬其生活習慣，若不指定採取區域、免申請即進入自由採取，在森林管理上如何區分有權、無權者之採取？林務局正研擬如何保障原住民個人微量採取野菜自用等非營利行為之權益，且同時兼顧森林保護與管理之可行性條文，將與原民會協商定案後，繼續辦理後續法制作業。</p> <p>◆原民會 【經濟發展處】 本會106年5月31日原民經字第1060035440號函送「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產物之管理規則」(草案)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p>			
3	森林法	農委會	原民會	<p>◆農委會106年6月19日農林務字第1060220780號函復內容：</p> <p>1. 林下經濟即在不影響國土保安、林木生長及不致產生災害等前提下，先建立一套可因地制宜，包括(但不限)物種選擇、作業方式等要素之林業用地之作業技術體系，以為日後推動林下經濟之科學基礎。爰農委會105年已啟動105年至108年之林下經濟試驗研究，通盤評估林下經濟之態樣並建立可操作之林下經濟作業體系，再行研修林地相關法規，俾推動林下經濟法制化，以正本清源。</p> <p>2. 農委會105年10月間業成立「林下經濟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由林務局、水土保持局、林業試驗所、農業試驗所、農糧署及各區農業改良場擔任小組成員)並於同年10月13日及12月14日召開研商會議，重要結論略以：</p> <p>(1) 人工林之經營係以森林主產物收穫為</p>	<p>◆原民會 【土地管理處】 農委會說明應先行建立一套可因地制宜之作業技術體系做為基礎推動科學基礎，再進行修法事宜。</p>	<p>◆農委會106年6月19日農林務字第1060220780號函復內容：</p> <p>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4條第2項，就「森林法」第15條第4項「森林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者」作成解釋：</p> <p>1、貴會已與本會達成共識，由貴會擬具「森林法」第15條第4項解釋令稿如下：「核釋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作成森林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解釋如下：一、查森林法於九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增訂第十五條第四項前段規定，森林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者，原住民族得依其生活慣俗需要，採取森林</p>	<p>◆原民會 【土地管理處】 俟與農委會取得共識後方能確認修法期程。</p>

其主要目標，倘不破壞森林環境與組成，維持既有森林之樣貌及功能等原則下，於人工林造林、撫育至伐採期間，林下經營森林副產物於政策上可歸屬為「林業使用」之一環，自應為林業用地及森林管理所容許。

(2) 基於森林副產物於林下經營之技術體系甚為廣泛多元，為能符合森林永續經營之原則，應採正面表列方式容許之。

(3) 林業用地得否於森林冠層下經營森林副產物之議題，於維持森林永續經營之原則下，目前由林業及農業相關研究機構持續盤點其技術體系，以作為農委會未來在科學上鬆綁林地管制相關法令之政策決定依據。

3. 農委會林務局已規劃於106年6月下旬召開本小組第3次研商會議，再行確認森林冠層下經營森林副產物之技術體系後，俾據以提供研擬配套之土地使用管制事宜。

◆原民會

【經濟發展處】(106年6月22日填復)

本會106年5月31日原民經字第1060032994號送「森林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解釋令稿1份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 現行森林法第6條規定略以：「…經編為林業用地之土地，不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並未將原住民族土地利用之型態納入考量，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3條規定應尊重原住民族資源利用方式、土地擁有利用與管理模式之立法意旨不符。

2. 考量原住民族混農林業及經濟性林木之土地利用需求，本會105年12月2日以原民土字第1050073374號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擬解釋函妥處。(本會建議：原住民保留地經編為林業用地者，經該土地原住民

產物。復查原住民族基本法於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五日制定公布施行，並於同法第十九條規定，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之採集野生植物及菌類等非營利行為。二、森林法第十五條第四項前段所稱「森林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者，原住民族得依其生活慣俗需要，採取森林產物」，係指位於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第三款所定原住民族地區之國有林及公有林。」。

2、目前貴會已函本會辦理會銜發布事宜。

◆原民會

【經濟發展處】(106年6月22日填復)

1. 本會會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預定於106年6月29日原民經字第1060032994號、農林務字第1061740634號令，作成森林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解釋。

2. 解釋令內容如下：

(1) 查森林法於93年1月20日增訂第十五條第四項前段規定，森林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者，原住民族得依其生活慣俗需要，採取森林產物。復查原住民族基本法於94年2

				<p>族關係部落同意得供混農林業或種植經濟性林木使用者，得依森林法第6條第2項規定，徵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地政主管機關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准。）</p> <p>3. 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年3月2日以農林務字第1061710131函復略以：因考量「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土地容許使用之相關規定，且山坡地超限利用之管制應無分族群，一體適用，又該會刻正研議於林業用地推行「林下經濟」，在科學上必須符合不影響國土保安、林木生長及不致產生災害等為前提，宜先建立一套可因地制宜，包括物種選擇、作業方式等要素之作業技術體系，以為日後推動林下經濟之科學基礎。故該會尚不同意以解釋方式辦理。</p> <p>※備註： 《森林法》第15條第4項業依原基法第34條第2項規定於106年6月29日發布解釋令。</p>		<p>月5日制定公布施行，並於同法第十九條規定，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之採集野生植物及菌類等非營利行為。</p> <p>(2) 森林法第十五條第四項前段所稱「森林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者，原住民得依其生活慣俗需要，採取森林產物」，係指位於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第三款所定原住民族地區之國有林及公有林。」</p> <p>※備註： 《森林法》第15條第4項業依原基法第34條第2項規定於106年6月29日發布解釋令。 【土地管理處】 本會於105年12月2日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原基法規定會同本會研擬解釋函，經該會函復應先行建立一套可因地制宜之作業技術體系做為基礎推動科學基礎，尚不同意以解釋方式辦理。</p>	
4	水土保持法	農委會	原民會	<p>◆農委會106年6月19日農林務字第1060220780號函復內容：</p> <p>1. 林下經濟即在不影響國土保安、林木生長及不致產生災害等前提下，先建立一套可因地制宜，包括(但不限)物種選擇、作業</p>	<p>◆原民會 農委會說明應先行建立一套可因地制宜之作業技術體系做為基礎推動科學基礎，再進行修法事宜。</p>	<p>◆原民會 本會於105年12月2日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原基法規定會同本會研擬解釋函，經該會函復應先行建立一套可</p>	<p>◆原民會 俟與農委會取得共識後方能確認修法期程。</p>

			<p>方式等要素之林業用地之作業技術體系，以為日後推動林下經濟之科學基礎。爰農委會105年已啟動105年至108年之林下經濟試驗研究，通盤評估林下經濟之態樣並建立可操作之林下經濟作業體系，再行研修林地相關法規，俾推動林下經濟法制化，以正本清源。</p> <p>2. 農委會105年10月間業成立「林下經濟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由林務局、水土保持局、林業試驗所、農業試驗所、農糧署及各區農業改良場擔任小組成員)並於同年10月13日及12月14日召開研商會議，重要結論略以：</p> <p>(1) 人工林之經營係以森林主產物收穫為其主要目標，倘不破壞森林環境與組成，維持既有森林之樣貌及功能等原則下，於人工林造林、撫育至伐採期間，林下經營森林副產物於政策上可歸屬為「林業使用」之一環，自應為林業用地及森林管理所容許。</p> <p>(2) 基於森林副產物於林下經營之技術體系甚為廣泛多元，為能符合森林永續經營之原則，應採正面表列方式容許之。</p> <p>(3) 林業用地得否於森林冠層下經營森林副產物之議題，於維持森林永續經營之原則下，目前由林業及農業相關研究機構持續盤點其技術體系，以作為農委會未來在科學上鬆綁林地管制相關法令之政策決定依據。</p> <p>3. 農委會林務局已規劃於106年6月下旬召開本小組第3次研商會議，再行確認森林冠層下經營森林副產物之技術體系後，俾據以提供研擬配套之土地使用管制事宜。</p> <p>◆原民會</p> <p>1. 原住民保留地經查定為宜林地如作農業使</p>	因地制宜之作業技術體系做為基礎推動科學基礎，尚不同意以解釋方式辦理。	
--	--	--	---	------------------------------------	--

				<p>用，依現行水土保持法第22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6條規定，即被認屬超限利用違法行為，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3條規定應尊重原住民族資源利用方式、土地擁有利用與管理模式之立法意旨不符。</p> <p>2. 考量原住民族混農林業及經濟性林木之土地利用需求，本會105年12月2日以原民土字第1050073374號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擬解釋函妥處。(本會建議：原住民保留地經編為林業用地者，經該土地原住民族關係部落同意得供混農林業或種植經濟性林木使用者，得依森林法第6條第2項規定，徵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地政主管機關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准。)</p> <p>3. 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年3月2日以農林務字第1061710131函復略以：因考量「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土地容許使用之相關規定，且山坡地超限利用之管制應無分族群，一體適用，又該會刻正研議於林業用地推行「林下經濟」，在科學上必須符合不影響國土保安、林木生長及不致產生災害等為前提，宜先建立一套可因地制宜，包括物種選擇、作業方式等要素之作業技術體系，以為日後推動林下經濟之科學基礎。故該會尚不同意以解釋方式辦理。</p>			
5	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工作要點	農委會	農委會 原民會	<p>◆農委會106年6月19日農林務字第1060220780號函復內容：</p> <p>1. 林下經濟即在不影響國土保安、林木生長及不致產生災害等前提下，先建立一套可因地制宜，包括(但不限)物種選擇、作業方式等要素之林業用地之作業技術體系，以為日後推動林下經濟之科學基礎。爰農委會105年已啟動105年至108年之林下經濟試驗研究，通盤評估林下經濟之態樣並建立可操作之林下經濟作業體系，再行研修林地相關法規，俾推動林下經濟法制</p>	原民會土地管理處 本會業已召開會議確認通案處理原則，爰無須辦理修法。	農委會106年6月19日農林務字第1060220780號函 「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工作要點」應踐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第2項原住民族諮商同意程序： 1、貴會於105年12月13日召開研商會議，決議略以：查定作業係就4項環境自然因子進行科學調查，其執行無涉及原基法第21條規定，但	原民會土地管理處 無須修法。

			<p>化，以正本清源。</p> <p>2. 農委會105年10月間業成立「林下經濟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由林務局、水土保持局、林業試驗所、農業試驗所、農糧署及各區農業改良場擔任小組成員)並於同年10月13日及12月14日召開研商會議，重要結論略以：</p> <p>(1) 人工林之經營係以森林主產物收穫為其主要目標，倘不破壞森林環境與組成，維持既有森林之樣貌及功能等原則下，於人工林造林、撫育至伐採期間，林下經營森林副產物於政策上可歸屬為「林業使用」之一環，自應為林業用地及森林管理所容許。</p> <p>(2) 基於森林副產物於林下經營之技術體系甚為廣泛多元，為能符合森林永續經營之原則，應採正面表列方式容許之。</p> <p>(3) 林業用地得否於森林冠層下經營森林副產物之議題，於維持森林永續經營之原則下，目前由林業及農業相關研究機構持續盤點其技術體系，以作為農委會未來在科學上鬆綁林地管制相關法令之政策決定依據。</p> <p>3. 農委會林務局已規劃於106年6月下旬召開本小組第3次研商會議，再行確認森林冠層下經營森林副產物之技術體系後，俾據以提供研擬配套之土地使用管制事宜。</p> <p>◆原民會 【土地管理處】</p> <p>1. 本會以105年8月31日原民土字第1050051484號函建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如查定結果之公告處分，使當地原住民對既存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之使用、收益權利，產生喪失及變更之法律效果時，應於公告處分前踐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第2項諮商原住民族同意程</p>	<p>查定完成後，其公告之行政處分所產生之法律效果，倘係增加原住民原本所無之限制，原民會核屬原基法第21條第2項規定限制土地利用。</p> <p>2、因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為山坡地保育利用之重要前置工作，攸關國土保安與永續發展至鉅，亦涉及直轄市政府權責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事宜，需進一步研商及釐清。貴會已與本會於106年4月25日啟動雙方副首長協商機制，並取得共識如下：</p> <p>(1)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規定，加強保育地係沖蝕極嚴重、崩坍、地滑、脆弱母岩裸露之土地，基於保障原住民族周遭居住安全，按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附件第5點第2項第2款規定，同意第1次查定結果為加強保育地之土地，無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第2項限制土地利用之適用。</p> <p>(2)修正105年12月13日「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第2項」研商會議第2案決議。</p> <p>3、後續本會水土保持局視需要檢討修正「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工作要點」，另因該工作要點係屬行政規則，且與貴會已達成上述共識，爰建請解除列管，免於「原住民族基本法未完成立(修)法之相關子</p>
--	--	--	---	---

			<p>序。</p> <p>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05 年 11 月 23 日水保監字第 1051814195 號函表示，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為山坡地保育利用之重要前置工作，且涉及原住民保留地之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作業等議題，為避免個案認定，仍建請本會邀集相關機關召開會議研議通案處理原則。</p> <p>3. 本會於 105 年 12 月 13 日及 106 年 4 月 25 日邀集農委會、水保局及各地方政府等相關單位召開會議研議如何落實原基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會議決議政府依職權辦理查定結果之公告處分，如核屬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第 2 項限制土地利用者，應於公告處分前踐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諮商原住民同意程序。</p> <p>4. 查定結果之公告處分是否核屬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第 2 項限制土地利用之認定，依下表適用之：</p> <table><tr><th>查定前 查定後</th><th>宜農牧地</th><th>宜林地</th><th>加強保育地</th></tr><tr><td>無查定地</td><td>X</td><td>X</td><td>X</td></tr><tr><td>宜農牧地</td><td>X</td><td>0</td><td>0</td></tr><tr><td>宜林地</td><td>X</td><td>X</td><td>0</td></tr><tr><td>加強保育地</td><td>X</td><td>X</td><td>X</td></tr></table> <p>0 為核屬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第 2 項限制土地利用。 X 為非屬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第 2 項限制土地利用。</p>	查定前 查定後	宜農牧地	宜林地	加強保育地	無查定地	X	X	X	宜農牧地	X	0	0	宜林地	X	X	0	加強保育地	X	X	X		<p>法辦理情形及預定期程表」繼續填列辦理進度。</p> <p>原民會土地管理處 本會業已召開會議確認通案處理原則，爰無須再依原基法第 34 條第 2 項作成解釋。</p>
查定前 查定後	宜農牧地	宜林地	加強保育地																						
無查定地	X	X	X																						
宜農牧地	X	0	0																						
宜林地	X	X	0																						
加強保育地	X	X	X																						
6	原住民族自治法	原民會	<p>原民會 (綜合規劃處)</p> <p>1. 依照總統原住民族政見主張及 106 年 3 月 20 日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第 1 次會議主席裁示：「原住民族自治之推動應奠基於包括明確的空間範圍、自治權限、以及固定財源之上；就自治政府的組織架構，要由原住民族與政府對等、充分協商後才產生，並且透過『部落公法人』建</p>	刻正草擬法案。	無法依原基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解釋。	完成法案草擬後，將尊重各族的多元需求、廣泛徵詢不同部落的意見，並循法制作業程序報請行政院審																			

				<p>制，厚實、累積民族自治的基礎與能量。</p> <p>2. 本會刻正依照總統裁示，研修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擴大徵詢各界意見後，續依法制作業程序完成跨部會協商，報請行政院審查。</p>			查，核轉立法院審議。
7	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條例	原民會	原民會	<p>1. 本會於96年5月4日以原民地字第0960022111號函請行政院審議「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法(草案)」；行政院於97年2月15日以院臺內字第0970004347號函送立法院審議。</p> <p>2. 立法院於98年5月18日第7屆第3會期內政委員會第27次會議以政黨輪替為由決議撤回。</p> <p>3. 本會參酌立法院委員會審議意見重行草擬「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條例(草案)」，於100年3月11日以原民地字第1001008562號函送行政院審議。行政院秘書長於100年7月22日以院臺內字第1000037163號函請本會參照有關機關意見重新檢討。</p> <p>4. 本會於101年4月22日、101年10月18日及101年12月4日召開二次跨部會協商會議及部落暨專家學者諮詢會議共同研商本法內容。</p> <p>5. 鑒於本條例涉及對於傳統知識保護水準之政策方向及我國於國際談判之立場，本會再行修正草案條文，並於104年6月24日及9月1日召開2場次跨部會研商會議，全案條文討論完竣，惟因各部會仍存有歧見，依會議決議於9月21日函請各部會提供修正條文文字後，依跨部會研商會議決議及各部會建議修正草案條文完竣。</p> <p>6. 為求審慎起見，本會復以105年8月15日1050048061號函請各部會確認修正意見，105年10月5日各部會皆已回復，待彙整後簽辦後續法制作業程序。預計106年5月底前報院審議。</p>	待彙整各部會確認修正意見後簽辦後續法制作業程序。	本條例係依據原基法第13條已授權本會訂定「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條例」，發布施行後即可據以維護原住民族傳統知識之相關利益，爰無須依原基法第34條第2項規定作成解釋之方式處理。	預計106年8月底前報院審議。

8	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	原民會	原民會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立法院第6屆第6會期，行政院96年11月26日送立法院審議，計7章35條，因屆期不續審。 立法院第7屆第1會期，行政院97年2月15日送立法院審議，計7章35條。立法院第7屆第3會期內政委員會第26次會議附帶決議，因政黨輪替，政策不同，請行政院撤回重新研議，行政院於98年12月15日函請立法院撤回重新研議。 立法院第8屆第8會期，行政院104年7月17日送立法院審議，計7章39條，因屆期不續審。 立法院第9屆第1會期，行政院105年2月1日送立法院審議，計7章39條。為落實改組後行政院政策及蔡總統政見，就原送法案撤回重新檢討，行政院105年6月23日函請立法院同意撤回。 本會依總統原住民族政策主張，並配合「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之規定，刻正重新研修土海法草案內容，俟提送原轉會專案報告取得各族代表共識，據以辦理法制作業完備後，報請行政院審議。 	刻正重新研修土海法草案內容，俟提送原轉會專案報告取得各族代表共識，據以辦理法制作業完備後，報請行政院審議。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規定略以：「左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一、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 次按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條第3項規定：「原住民族或原住民所有、使用之土地、海域，其回復、取得、處分、計畫、管理及利用等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有關原住民族土地、海域之回復、取得、處分、計畫、管理及利用等事項，依上開中央法規標準法及原住民族基本法均明文應以法律定之，尚不宜依原基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辦理。 	本法案需提送原轉會專案報告，經各族代表就法案內重要事項等大政方針取得共識，據以辦理相關法制作業，尚無明確規劃期程。
9	原住民族土地受限制所生損失補償辦法	原民會	原民會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本辦法草案業已完成初稿，惟因部分規範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草案)之內容，將參依該辦法之內容修正後，辦理內部研商會議。 預訂將於完成內部研商後，邀集各公產機關及縣市政府代表召開跨部會研商會議及地方諮詢會議，以博諮眾議及徵詢實際執行建議後，於法制程序完備後公告實施。 	本辦法草案業於105年6月完成草案初稿，惟因其部分規範涉及「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之內容，將參依該辦法之內容修正後，於106年3月起接續辦理內部研商會議、邀集各公產機關及縣市政府代表召開跨部會研商會議及地方諮詢會議。	原基法第21條於104年6月24日修正後，已授權本會訂定「原住民族土地受限制所生損失補償辦法」，發布施行後，主管機關即可據以寬列預算補償，爰無須依原基法第34條第2項規定作成解釋之方式處理。	於完成相關法制作業程序後，預計於106年12月前公布施行。
10	部落公法人組織設置辦法	原民會	原民會 (綜合規劃處)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本會105年度辦理各縣市諮詢座談會中，因部分鄉(鎮、市、區)公所、村(里)長及部落代表仍就部落公法人之權限分工意見容有不一，爰配合前次綜整意見修正法規草案及相關推動方案。 預計於自106年7月20日起至9月20日 	部分鄉(鎮、市、區)公所、村(里)長及部落代表仍就部落公法人之權限分工意見容有不一，故再行研修法規。	無法依原基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解釋。	待徵詢完畢彙整各界意見後，規劃後續法規發布作業，預計於106年12月前完辦。

				止，再行辦理 13 場原住民族重大政策諮詢座談會。俟徵詢程序完辦並視各界意見收攬程度，規劃後續法規發布作業。			
11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	原民會	原民會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總統於 106 年 6 月 14 日公布之《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 25 條第 1 項明定，本法施行三年後，原住民參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公費留學考試，應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 2. 故上開法案公布施行後，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當可確立列為原住民族特考應考人之應試資格；惟對於其所適用認證級別，尚須審慎評估，以符社會期待。基此，待認證級別確立後，即可據以修正原住民族特考考試規則相關規定。 	俟《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施行三年後，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當可確立列為原住民族特考應考人之應試資格。	已依《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 25 條第 1 項辦理，尚不須依原基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作解釋處理。	俟《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施行三年後，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當可確立列為原住民族特考應考人之應試資格。

96 年度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土地調查後續計劃 成果報告 I



委託單位：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執行單位：鄒族文化藝術基金會

96 年度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後續計劃

《成果報告 I》

執行單位：鄒族文化藝術基金會

計劃主持人：汪明輝（台灣師大地理學系）

協同主持人：台邦·撒沙勒

（大仁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

海樹兒·友刺拉菲（中研院台史所）

根誌優（星亞傳播有限公司）

張國楨（台灣師大地理學系）

研究助理：官大偉、吳宛憶、梁錦德、朗 蔚、

江冠榮、蕭世暉、趙一先、趙品宣、

林 杏

的範圍，而對傳統布農族部落的整體概況也在日本統治台灣中末期資料即已確立，攸關傳統領域的移動—布農族的遷徙，也在馬淵東一等人的研究調查下獲知其梗概。

2000 年以來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研究，基本上是由上而下、由外而內的進行，在中央部分，五篇全部是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台大教授張長義主持，參與的布農族人不算多。而在地方方面，以台東縣延平鄉之調查成果最為翔實，也是最多在地族人共同參與的地區。

整體來看近年進行之布農族傳統領域調查，多在於「部落」的範疇進行調查，然因部落與部落之間的區隔原本就很難定出，這除了跟布農族傳統 siduh（氏族）在部落內的運作方式和彼此互動關係有關外，更因著 1930 年代前後日本實施的集團移住政策，造成族人在生活領域、生活方式、社會關係之大變動，使部落的傳統領域內涵更為混淆，siduh（氏族）間的領域更難做釐清。再者，成效除了喚起「傳統領域的意識」及領域資訊化外，也似乎僅在於傳統地名意義的蒐集。倒是布農族自發性申請經費進行的傳統領域調查較有布農族「地區領域」的內涵。但可惜的是它只呈現部分地區，因之，「布農族傳統領域」（布農族與他族之間）的範疇與內涵實仍缺乏。

貳、布農族領域變遷史

布農族的領域，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地域範疇，要對布農族領域的變遷有所了解，需建立在認識布農族的民族遷移上。

布農族的遷移，在現今族人的記憶裡，很清楚知道 Asang daingaz（或謂 Mai-asang）之曾為族人的聚居地域，但在 Asang daingaz 之前源自於何處？普遍的說法是在 Lamungan¹⁴²。我們可以 Asang daingaz 及 Lamungan 地區之間為分界，在聚居於這區域以前的來源可以說是相當模糊，或許我們現在概念裡的「布農族」尚未出現，而只能說是「前布農族」。

布農族的歷史進入到 Asang daingaz（布農族祖聚居地）時期後，可以說是開始進入布農族較清楚的口述歷史時代，文獻的記載也從此開始被紀錄成真實的發生。日本著名的布農族研究者馬淵東一，曾透過他在 1930 年代走訪布農族地區所進行之調查研究，而將布農族的遷移分為二期：第一期是從傳說中的西部平地各處，經 Lamungan 而到 Asang-daingaz（或謂 Mai-asang），時間上是極為緩慢而長久，路線也有不同的說法；這一期布農族移動的地域僅限於中央山脈以西和玉山以北之地。此一分期形成的結果是：以諸部族之 Asang-daingaz 為中心，而設立許多「蕃社」，部族及氏族組織之基礎藉以成立。第二期，則是族人普遍熟

¹⁴² Lamungan 一地，族人相信是今天之民間、社寮之地，乃至於竹山、及集集之間的區域。這個區域也是布農族人普遍認為的最初族源地。

悉的，從 Asang-daingaz 往東部花蓮、台東及南部高雄等地區的移動。

1895 年，日本勢力進佔台灣，1930 年前後其推動的移住政策，造成布農族傳統領域，包括領域範圍、領域內族人生活方式等最大的改變，也奠定現今布農族領域的生活範疇，1945 年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在日治時期理蕃政策的基礎下，繼續「私有化、國有化」布農族的傳統領域。

一、原有領域之形成與變遷

布農族傳統領域之形成或擴張，係在布農族 siduh（氏族）移動的基礎上進行。以下，擬從布農族遷移的歷程去看布農族傳統領域之變遷：

（一）第一期遷移

1. 從 Lamungan 到 Asang daingaz（舊大社區域）

談到布農族的遷移史，Lamungan 是一個常被提及的地名，按文獻記載及一些族人的描述，其位置大概在今南投縣民間、竹山、乃至於集集水里這一塊區域。這一區域也剛好是濁水溪從深山下來的廣大出水口區域，從這一塊區域連結至濁水溪上游布農族人所述的 Asang daingaz（舊大社區域），正是布農族文化的發祥地，相信也是布農族形成的孕育地，因而也是布農族最初的傳統領域。至今，仍有不少布農族耆老視之為古老的民族聖地。如於 2008 年 9 月 12 日，一群以 Takbanuaz（巒社）群為主的南投地區布農族耆老，即來到設於民間之南投休息站，該休息站名稱也特以布農族之命名而稱之 Lamungan。

依馬淵東一對布農族第一期遷移的敘述，謂 Isbukun（郡社群）最初是經過卓社地域來，後來再往南方向沿著郡大溪流域，以 Asang bukun（郡大社）為中心，在此建立其勢力區。而 Takbanuaz（巒社群）Takibakha（卡社群）Takitudu（卓社群），則都是在從 Lamungan 入山途中，或是在濁水溪上游與郡大、丹大溪之間的會流處地區，開始分散。Takbanuaz（巒社群）以 Asang banuaz（巒大社）為中心建立其勢力範圍；Takitudu（卓社群）以 Asang tudu（卓社）為中心，在濁水溪上游處建立其勢力範圍；Takibakha（卡社群）則以 Asang bakha（卡社）為中心，在卡社溪及與濁水溪的會流處附近，建立其勢力區。隨後 Takivatan（丹社群）從 Asang banuaz（巒大社）這裡，再分出一個部族。起先，Takibakha（卡社群）從 Takbanuaz（巒社群）分出，之後，Takitudu（卓社群）又從 Takibakha（卡社群）中分出。其分出的時間因為遙遠而很難推算。至於 Takivatan（丹社群），在馬淵東的記錄裡謂約在 17 世紀開始，但在荷蘭時期文獻，早已出現了 Takivatan 的社群，亦即在 17 世紀之前即已形成¹⁴³。而 Takivatan（丹社群）之形成，在族人之記憶裡似乎尚很清楚。筆者聽過丹社群人說：當時都還是屬於 Takbanuaz（巒社群），有一部分族人因為耕作地及狩獵之關係，而常常居住在丹

¹⁴³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DZIV(c)637。

裁判字號：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6 年原訴字第 2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11 月 28 日

裁判案由：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6年度原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潘德清

選任辯護人 陳慧敏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潘崑虎

指定辯護人 黃偉倫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潘春貴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張宏惠

被 告 李昭慶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5 年度偵字第778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戊○○犯非法持有空氣槍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 所示之物沒收。又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之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如附表編號1 、2 、4 、5 所示之物均沒收。又共同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之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扣案如附表編號1 、2 、3 、6 所示之物均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拾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沒收部分併執行之。

丁○○共同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之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捌月。

扣案如附表編號1、2 、3 所示之物均沒收。

甲○○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非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陸萬元。

扣案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物沒收。

乙○○無罪。

事 實

- 一、戊○○明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具殺傷力之空氣槍，竟基於持有具有殺傷力之空氣槍之犯意，自民國104 年底某日，在其胞弟潘德順（96年間死亡）地址不詳之住所尋獲具有殺傷力之空氣槍（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1 支進而持有之。

- 二、戊○○明知灰面鵟鷹（學名：Butastur indicus）係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列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族群數量並未逾越環境容許量，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以獵槍以外之槍械獵捕，戊○○竟基於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於105年10月11日晚間，在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活動中心後方山區，以頭燈照明，持前開具有殺傷力之空氣槍射擊獵捕灰面鵟鷹，以此方式獵捕灰面鵟鷹20隻。
- 三、丁○○亦明知灰面鵟鷹係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列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族群數量並未逾越環境容許量，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以獵槍以外之槍械獵捕，竟與戊○○共同基於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於105年10月14日晚間，共同前往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活動中心後方山區，由丁○○負責以頭燈（起訴書誤載為手電筒，應予更正）照射樹上確認有無灰面鵟鷹休憩，如發覺有灰面鵟鷹即由戊○○持前開具有殺傷力之空氣槍射擊獵捕之，以此方式共同獵捕灰面鵟鷹9隻。嗣於翌（15）日凌晨1時10分許，在前址山區，戊○○為執行反獵鷹埋伏勤務之員警當場查獲，並扣得上開空氣槍1支（內裝有鋼珠9顆及瓦斯鋼瓶1瓶）、頭燈2具、灰面鵟鷹9隻（現場查獲死體8隻、活體1隻，惟活體經救助仍死亡），丁○○自現場逃離嗣後始經警循線查獲。後警方又於105年10月19日持搜索票至屏東縣○○鄉里○村里○路00號搜索，扣得戊○○前於105年10月11日晚間獵捕所獲並業經切割處理之灰面鵟鷹屠體1隻及內臟3包（含心臟19顆、胃14顆），及與本案無關之瓦斯空氣長槍1支、喜得釘長槍1支（槍枝管制編號分別為：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均不具殺傷力）、手機1支、瓦斯鋼瓶1罐、槍管1支、握柄1支、零件4支，始查悉上情。
- 四、甲○○明知灰面鵟鷹係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列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族群數量並未逾越環境容許量，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宰殺，竟基於宰殺（起訴書誤載為「獵捕」，經檢察官當庭更正）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於105年10月16日上午5時許，在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山頂路旁牧草原，拾獲因不明原因掉落在地尚存活之灰面鵟鷹1隻，旋即在欖仁溪旁某處將之宰殺，並冰存於屏東縣○○鄉里○村○○路○○○○○○○○號0000000號）。嗣為警於105年10月19日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屏東縣○○鄉里○村○○路○○○○○○○○號0000000號）搜索，扣得灰面鵟鷹1隻（屠體），始悉上情。
- 五、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 理 由
- 甲、有罪部分：
- 壹、證據能力部分：

-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 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亦有明文。本件被告戊○○、丁○○、甲○○、辯護人及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已表示對於本判決所引用之傳聞證據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05 頁），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及與本案待證事實間之關聯性，認以之作為證據要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1 項規定，該等傳聞證據自有證據能力。
- 二、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為之規範，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傳聞法則之適用。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因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本案之證據。

貳、實體部分：

- 一、訊據被告戊○○、甲○○對於本案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被告潘昆虎雖坦承有於105 年10月14日晚間配戴頭燈與被告戊○○共同至屏東縣滿州鄉里得村活動中心後方山區，並知悉被告戊○○係欲獵捕灰面鵂鷹等情，然矢口否認有何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 項第1 款、第3 款之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犯行，辯稱：我沒有用頭燈幫戊○○照，也沒有幫戊○○撿打下來的灰面鵂鷹，我只是陪戊○○一起上山而已云云。被告戊○○之辯護人則為其辯稱：被告戊○○所持有之空氣槍為被告胞弟潘德順所遺留，但結構簡單、材質粗糙，為原住民自製獵槍，且被告戊○○持之獵鷹供自己食用，仍屬原住民文化傳統行為，並無為其他犯罪行為，故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 項之規定、立法理由與實務見解應為不罰；另被告戊○○獵捕灰面鵂鷹之行為係為供自己與親族食用，並無證據證明其有販售行為，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 第1 項、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之規定，其係基於傳統文化所為之獵捕、宰殺野生動物行為，應無適用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 項第1 、3 款處罰規定之餘地等語。被告丁○○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被告丁○○僅陪同被告戊○○上山，因不勝酒力即獨自返家，並無參與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又縱認被告丁○○有與被告戊○○共同獵捕，亦合於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 第1 項、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非基於營利目的獵捕野生動物，且符合傳統文化之要件，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 於立法時，立法院曾為附帶決議謂「有關第21條之1 第2 項之許可辦法，應特別尊

重原住民族之傳統飲食文化」，被告戊○○、丁○○之部落中確有食用候鳥灰面鵟鷹之習慣，屬於傳統飲食文化之需求，雖被告戊○○非職業獵人，但在部落中生活的族人依然有類似之獵捕行為。檢察官未能提出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戊○○、丁○○獵捕野生動物係為營利，即應認係為自用，而應不罰等語。經查：

- (一)、被告戊○○有於上開時間、地點，持有殺傷力之空氣槍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灰面鵟鷹之行為，及被告甲○○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灰面鵟鷹之行為等情，業據被告戊○○、甲○○於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305-306 頁），並有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技佐王弘毅之鑑定報告書1 份、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滿州分駐所105 年10月15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 份、查獲照片6 張、本院105 年聲搜字第786 號搜索票影本3 紙、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屏東分隊105 年10月19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各2 份（搜索編號F1、C1、C2）、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技佐王弘毅之鑑定報告書2 份、搜索照片4 張、被告戊○○指認獵捕灰面鵟鷹地點照片及GPS 定位照片7 張、灰面鵟鷹屠體及內臟照片4 張、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105 年11月2 日農特動字第1053605562號函1 紙、被告甲○○指認拾獲灰面鵟鷹地點照片及GPS 定位照片5 張在卷可稽（見恆警偵潘字第10532046800 號卷【下稱警一卷】第13頁、第14-17 頁、第20-22 頁、保七八大刑偵字第1050004159號卷【下稱警二卷】第19-23 頁、第37-43 頁、第47頁、第49-59 頁、第137 頁、第139 頁、第155 頁、保七八大刑偵字第1050004890號卷【下稱警三卷】第17-20 頁、第24頁、第38頁、第144-145 頁、105 年度偵字第7780號卷【下稱偵一卷】第78-79 頁），並有附表所示之扣案物可佐，被告戊○○、甲○○之自白堪信為真實。
- (二)、本案扣得被告戊○○持有之空氣槍（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1 支經送鑑定後，結果為：送鑑空氣槍1 枝（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認係氣體動力式槍枝，以小型高壓氣體鋼瓶內氣體為發射動力，經以金屬彈丸測試3 次，其中彈丸（直徑5.991mm、質量0.883g）最大發射速度為194.7 公尺/ 秒，計算其動能為16.7焦耳，換算其單位面積動能為59.2焦耳/ 平方公分，且按認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槍枝殺傷力之標準，係以在最具威力之適當距離以彈丸穿入人體皮肉層之動能為基準（最高法院84年度台非字第115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殺傷力之相關數據，依日本科學警察研究所之研究結果，彈丸單位面積動能達20焦耳/ 平方公分，則足以穿入人體皮肉層；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對活豬作射擊測試結果，彈丸單位面積動能達24焦耳/ 平方公分，則足以穿入豬隻皮肉層（參照上開鑑定書所載殺傷力之相關數據

）等節，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5 年11月28日刑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1 份在卷可查（見105 年度偵字第94 21號卷【下稱偵二卷】第19-20 頁），本件扣案之空氣槍經試射結果，換算單位面積動能為59.2焦耳/ 平方公分，顯已逾前開科學實驗之結果，足以穿入人體皮肉層，可見上開扣案空氣槍確實具有殺傷力。

(三)、又被告丁○○雖於本院審理中辯稱僅係陪同被告戊○○上山，隨即因酒醉而下山，未參與被告戊○○獵捕灰面鵟鷹之犯行云云（見本院卷第259 頁），然經證人即被告戊○○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述：我有與丁○○於105 年10月14日晚間一起上山打獵，我跟丁○○說我要去獵灰面鵟鷹，叫他幫忙，他就答應，丁○○用頭燈幫忙照射，我負責用空氣槍打，在丁○○的幫忙下我有打到灰面鵟鷹，丁○○也有幫忙撿幾隻掉落的灰面鵟鷹，被警方查獲時我有叫丁○○的名字，但他不知道跑哪裡去了，現場掉落的頭燈有一個是我的，另一個應該是丁○○的等語（見本院卷第317-323 頁），質諸被告丁○○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承：我跟戊○○是親家關係，我們沒有仇隙，感情很好等語（見本院卷第259 頁），則被告戊○○理應無故意虛構事實誣陷被告丁○○之動機，其證詞尚屬可信。再者，警方於105 年10月15日凌晨1 時40分查獲被告戊○○時，於現場扣得頭燈2 具乙節，有屏東縣政府恆春分局滿州分駐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 份在卷可稽（見警一卷第14-16 頁），若被告丁○○並未以頭燈幫忙照射，實無必要於凌晨深夜時分攜帶頭燈陪同被告戊○○入山，故被告丁○○上開辯解顯不可採。被告戊○○、丁○○有於105 年10月14日晚間至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活動中心後方山區共同獵捕灰面鵟鷹乙節，應堪認定。

(四)、被告戊○○之辯護人雖主張被告戊○○所持有之空氣槍為原住民自製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故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 項之規定、立法理由與實務見解應為不罰等語。然查：

- 1、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 項規定「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或漁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漁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處新臺幣2 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例有關刑罰之規定，不適用之」。其修法理由係在尊重原住民族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之原則下，逐步將原住民為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而製造或持有自製獵槍之行為，從刑事罰改為行政罰。然其排除適用刑罰者，應僅以「原住民自製之獵槍」為限（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328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自製之獵槍」係指「原住民」為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而「自行製造」同條例第4 條具有獵槍性能之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枝而言；「供作生活工具之用」之解釋，雖應因應生活型態之改變而放寬，只要「本於與其傳統習俗文化目的有關」而「自行製造

」或「持有」之獵槍，即應認係供作生活工具之用，不以專恃狩獵維生或以狩獵為其生活主要内容者為限（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5093號判決意旨參照）。

- 2、綜合上述最高法院對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之闡釋，可知該項規定須持有人具「原住民身分」，且持有之客體（獵槍）為「原住民自製」，持有目的係供作「生活工具之用」，此三項要件必須同時該當，始有前揭免責規定之適用。經查：本案被告戊○○為排灣族平地原住民，具原住民身分，有戶役政連結作業系統查詢結果可憑（見本院卷第47頁），惟其供承本案扣得空氣槍（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是其胞弟潘德順（已歿）生前所有，其於潘德順過世後發覺並供作自己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02頁），故該空氣槍並非被告戊○○所自製，應可認定。又該空氣槍為氣體動力式槍枝，以小型高壓氣體鋼瓶內氣體為發射動力，握把處為木柄，連接金屬槍管等節，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5年11月28日刑鑑字第1058001462號鑑定書1份、照片3張在卷可查（見偵二卷第19-20頁），則依該空氣槍之構造、動力來源與製造材料以觀，應屬具製造空氣槍枝技術之業者打模，結合數種材料製造組裝而成，而非一般原住民可自行製造之火藥獵槍，此為衡諸一般經驗法則堪以認定。本案被告戊○○或其辯護人既未能提出相關證據證明扣案空氣槍為潘德順或其他原住民所自製，自難符合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之「原住民未經許可，持有自製之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之免罰規定。辯護人請求援用該項規定，於法無據，尚非可採。
- (五)、另被告戊○○、丁○○之辯護人均辯稱被告戊○○、丁○○獵捕灰面鵲鷹之行為係為供自己與親族食用，並無證據證明渠等有販售等營利行為，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項、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之規定，其係基於傳統文化所為之獵捕野生動物行為，應無適用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項第1、3款處罰規定之餘地等語。然查：
 - 1、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基本國策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下合稱兩公約）第1條第1項均明白揭示「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根據此種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與文化之發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7條更規定：「凡有種族、宗教或語言少數團體之國家，屬於此類少數團體之人，與團體中其他分子共同享受其固有文化、信奉躬行其固有宗教或使用其固有語言之權利，不得剝奪之。」從而，「原住民族文化權」業經我國憲法及兩公約明白肯認，自應為我國立法者與法律解釋者所尊重。基此，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一、獵捕野生動物。二、採集野生植物及菌類。三、採取礦物、土石。四、

利用水資源。前項各款，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定有明文。又按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限制。前項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應經主管機關核准，其申請程序、獵捕方式、獵捕動物之種類、數量、獵捕期間、區域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亦定有明文。前揭條文均係為保障原住民傳統文化中之狩獵文化，為我國憲法與兩公約對於原住民族文化權保障之具體落實。惟原住民為履踐其狩獵文化，狩獵過程中之獵捕、宰殺野生動物行為將造成野生動物數量減少（尤以保育類野生動物影響更為重大），此即與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生物多樣性與自然生態（亦即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立法意旨）之法益衝突。故為了求取尊重原住民文化與保育生態間之利益調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與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並非無條件允許原住民族任意獵捕、宰殺野生動物，而係需「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此要件規範目的即係避免原住民個人超越其文化範圍而過度濫殺、濫捕野生動物，甚至進而牟取利益，而使保護原住民文化權之美意淪為盜獵犯罪者之免死金牌，先予敘明。

- 2、由於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項條文文字未載明臺灣原住民族得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獵捕、宰殺或利用之野生動物是否限於「一般類野生動物」，或兼及「保育類野生動物」，過去對我國司法實務者適用法律時造成莫大困擾。惟審酌94年2月5日公布施行之原住民族基本法，其立法目的為落實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其中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2項明定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儀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獵捕「野生動物」之非營利行為，並未將保育類野生動物排除在外。又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項於93年2月4日自第21條第5款移列而單獨立法，亦明定臺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同法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限制，用以特別保護原住民族之傳統獵捕文化。是原住民族於其傳統文化、祭儀期間，若供各該傳統文化、祭儀之用，且符合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2項授權規定而訂頒之「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第6條及其附表之各項規定，僅事先未經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持自製獵槍獵捕屬上開辦法第6條第2項附表所列准許獵捕之保育類野生動物，不能因野生動物保育法第51條之1僅規定對於未經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動物」科以行政罰，即認同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謂野生動物僅指一般類野生動物而不包括保育類野生動

物，此已為最高法院106 年度第2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所是認。從而，若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就原住民獵捕野生動物行為之三項限制：1、於原住民族地區內；2、非營利行為；3、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以及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 第1 項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之必要（同條第2 項規定僅係行政管制規定，違反之效果為課予行政罰），無論獵物為一般類野生動物或保育類野生動物，均不受刑罰所處罰。

- 3、所謂「原住民族地區」，係指原住民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地區，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 條第3 款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原住民族地區』之定義依據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5 條第4 項規定，係指『原住民族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本院核定之地區。』」本法從之，另本院（註：係指行政院）業已核定上開地區包括30個山地鄉及25個平地原住民鄉（鎮、市），共55個鄉（鎮、市）。而行政院前於91年4 月16日以院臺疆字第0910017300號函核准屏東縣滿州鄉為「原住民族地區」，則滿州鄉屬原住民族基本法所稱之「原住民族地區」，殆無疑問。被告戊○○、丁○○均為排灣族平地原住民，有2 人之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2 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7-49 頁），渠等居住之地理區域、警方搜索查獲保育類野生動物處所、被告戊○○所稱獵捕位置均位在屏東縣滿州鄉境內之原住民族地區，亦無疑問。本案有爭議之部分為：被告戊○○於105 年10月11日晚間在原住民族地區以空氣槍獵捕灰面鵟鷹，以及被告戊○○、丁○○共同於105 年10月14日晚間在原住民族地區以空氣槍獵捕灰面鵟鷹之行為，是否均屬於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之行為？
- ①、被告戊○○於警詢、偵訊中供述：我和丁○○於105 年10月14日獵殺灰面鵟鷹是要對分自己食用，沒有要販賣，105 年10月11日獵捕的灰面鵟鷹是我自己食用及和朋友分食，我知道灰面鵟鷹是保育類野生動物等語（見警一卷第4 頁、警三卷第22頁、偵一卷第27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述：我打到的灰面鵟鷹是要自己吃的，105 年10月19日扣到的灰面鵟鷹心臟與胃是我吃剩下來的內臟，我會獵那麼多隻是因為我看到就獵殺，打多一點回去夠吃，可以吃兩、三天，105 年10月11日打的20隻灰面鵟鷹除了我自己吃還分享給族人，我不記得分享給哪些人，他們都是滿州鄉的朋友，他們聽到我打了灰面鵟鷹就來跟我要，我有很多喝酒的朋友，我當時酒醉了忘記他們是哪些人，一個叫「小黑」，一個叫「阿宗」，我不清楚他們的本名，他們是住隔壁村的，大概來了4、5 個人，我都不熟，我不清楚他們怎麼知道我有抓到灰面鵟鷹，有些我有拿回去給我太太、兒子、媳婦吃，我們把20隻灰面鵟鷹在2 天內都吃掉了，以前灰面鵟鷹來的時候我都沒

有去打，我平常也沒有打獵的習慣，我平常是做雜工，沒有固定工作，以前我爸媽也會打灰面鵟鷹，我是抱著好奇心去打的等語（見本院卷第258-259 頁）。依被告戊○○供述，其過去未曾狩獵野生動物，更遑論有狩獵之習慣，然以被告戊○○於行為時年逾50歲觀之，其若長年生活於排灣族部落並遵循部落內傳統禮俗、狩獵文化，應當曾有單獨或與族人共同為舉行慶典或生命禮俗之需要而獵捕野生動物之經驗，故被告戊○○辯稱其係好奇想要獵捕供己食用等語，實有可疑之處；又被告戊○○於105 年10月11日一次獵捕20隻灰面鵟鷹，數量甚為龐大，間隔3 日後竟又於105 年10月14日與被告丁○○再次上山獵捕，至被員警查獲時扣得9 隻灰面鵟鷹乙節，有扣押物品目錄表2 份在卷可佐（見警二卷第49-55 頁、警一卷第14-17 頁），被告戊○○若僅係為供自己與親族食用，實無必要獵捕如此大量之灰面鵟鷹，其辯稱是為了自用或與親朋共食而狩獵，難認有據；再者，被告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對於其與何人分食獵得之灰面鵟鷹乙節模糊其詞，甚至稱係不熟之隔壁村民，亦不知悉渠等如何得知其有捕獲灰面鵟鷹等語（見本院卷第258-259 頁），然衡諸常情，被告戊○○縱使欲邀請族人分享獵物，亦應係與自己關係緊密之親朋、族人分享之，而非隨意任由不熟識之他人食用，此均與原住民之傳統文化不符，被告戊○○所辯難謂可信。

- ②、證人即被告之配偶丙○○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述：我有吃到戊○○帶回來的灰面鵟鷹，總共4 位大人、2 位小孩吃，我不知道吃了幾隻，我們分3 天晚餐吃，可能吃了10幾隻，我吃到的都是肉，還有骨頭熬湯，以前戊○○沒有帶灰面鵟鷹回來過，但他會帶一些養的雞或蔬菜，本案發生時我和戊○○分居，幾個禮拜才回來一次，他大部分住在工寮，我下班時我媳婦說灰面鵟鷹是戊○○帶回來的，灰面鵟鷹是戊○○煮好的，我們一餐起碼吃了4、5 隻，我不清楚戊○○平常有沒有在打獵，他的工作是打零工、水泥工、農業，只要有工作他就做，我不知道戊○○有沒有把灰面鵟鷹分給其他族人，我只記得戊○○帶灰面鵟鷹回來是在105 年10月，不記得是哪一天，我媳婦沒有告訴我戊○○帶回來幾隻灰面鵟鷹，我也沒有去冰箱看，我不知道戊○○是獵來的，還是買來的，我沒有問過戊○○，他在我們部落裡不算獵人等語（見本院卷第307-316 頁），其證述內容雖與被告戊○○供述：有些（灰面鵟鷹）我有拿回去給我太太、兒子、媳婦吃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258- 259頁），惟證人丙○○僅證述其曾於105 年10月間某日有食用到灰面鵟鷹乙情，至於其係何時食用、食用之數量、灰面鵟鷹之來源（獵捕或購買）均未能明確說明，縱其確實曾食用被告戊○○交付之灰面鵟鷹，是否與本案被告戊○○之獵捕犯行有關已難以證明；況依證人丙○○所述，其於本案發生時與被告戊○○分居，對於

被告戊○○之生活狀況、交往情形並不清楚，若其於工作返家時突遭家人告知被告戊○○帶回烹煮完成之保育類野生動物灰面鵟鷹作為晚餐，理應倍感驚訝而加以詢問，然證人丙○○竟證稱其未詢問被告戊○○該灰面鵟鷹之來源，亦未詢問其媳婦灰面鵟鷹之數量，與常理有違；再查，證人丙○○雖證述其與家人在3 天內食用10幾隻灰面鵟鷹等語，然灰面鵟鷹乃屬猛禽，並非小型鳥類，成鳥體長約47-51 公分乙節，有灰面鵟鷹之簡介1 份、查獲照片2 張在卷可佐（見警聲搜卷第112-114 頁、警一卷第13頁），則證人丙○○證述其與家人連續3 日晚餐將10餘隻灰面鵟鷹屠體食用完畢，難謂與經驗法則相符。考量其與被告戊○○具有配偶關係，證述內容尚有上開瑕疵，實不足以證明被告戊○○於105 年10月11日晚間獵捕20隻灰面鵟鷹係供作自用之事實。

- ③、又警方於105 年10月19日搜索屏東縣○○鄉里○村里○路00號扣得灰面鵟鷹屠體1 隻及內臟3 包（含心臟19顆、胃14顆），被告戊○○先於警詢時辯稱：我不知道扣到的灰面鵟鷹屠體及內臟是何人所有，該處房屋是我弟弟潘德全所有，目前沒有人居住，查扣之灰面鵟鷹不是我獵捕的，我都住在屏東縣○○鄉里○村里○路00號後方工寮等語（見警二卷第12-14 頁），嗣又改稱：灰面鵟鷹屠體1 隻及內臟3 包是我弟弟的，因為房子是他的等語（見警二卷第16之1 頁反面），遲至105 年10月25日警詢時方坦承上開扣案物係其於105 年10月11日獵捕所得等語（見警三卷第14頁），足見其遭查獲之初尚有以屏東縣○○鄉里○村里○路00號非其住所作為否認理由之意。若被告戊○○於105 年10月11日獵捕灰面鵟鷹係供自己食用，應會將灰面鵟鷹之屠體存放在其實際居住地（即其戶籍地後方工寮）或其戶籍地，以便利煮食，實無必要特別將之藏放在其胞弟潘德全所有且無人居住之屏東縣○○鄉里○村里○路00號內。被告戊○○顯係為躲避檢警查緝，而預先尋覓處所藏放捕獲之灰面鵟鷹屠體與內臟，其行為與一般獵捕野生動物供自用者大相逕庭。

- ④、另被告戊○○、丁○○獵捕灰面鵟鷹之時間為10月間，依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第6 條及其附表規定，屏東縣滿州鄉排灣族原住民10月間固定舉辦之祭儀為「五年祭」、「五年後季送善靈」，獵捕動物之種類為熊鷹（頭飾使用之羽毛）、山豬、山羌、臺灣野山羊、飛鼠；不定期舉辦之傳統禮俗包含「生命禮俗（嬰兒出生、滿月、房屋落成）」、「感恩祭」、「播種祭」、「生命禮俗（結婚、慰喪、除喪、成年禮、尋根、傳統身分象徵飾物）」，獵捕動物之種類包含山羌、山豬、臺灣野山羊、飛鼠、野兔、雉雞、臺灣獼猴、臺灣水鹿、松鼠、山老鼠、溪魚、溪蝦、鼬獾、大冠鷲、鵪鶉、蛇類、熊鷹（頭飾使用之羽毛），上開傳統文化祭儀所需獵物均不含括灰面鵟鷹，足見被告戊○○、丁○○獵捕之目的與部落祭儀並無

關連。雖原住民一般為了取得食物而狩獵之物種並非僅限於上開表列動物，然此附表仍得作為原住民飲食文化、喜愛狩獵物種之參考。傳統排灣族原住民獵人在部落受人尊重，且獵人取到食物，會先帶到頭目家內、再與族人分享，獵人必須具有謙虛與尊敬的態度，對於供給食物之山林應心存感敬畏恩，雖因社會變遷與經濟型態改變，我國原住民族已少有專以狩獵為生者，然若有狩獵需求，多仍會遵循部分狩獵傳統習俗為之。被告戊○○、丁○○雖有原住民身分，然在灰面鵟鷹過境滿州鄉時密集、大量獵捕，且僅獵捕單一種類之獵物，又於狩獵前、後無任何與傳統狩獵行為有關之表現，被告丁○○甚至於飲酒半醉之際與被告戊○○共同狩獵，實與排灣族獵人敬畏大自然且不過度捕獵之文化有所差異。從而，本案雖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戊○○將105年10月11日晚間獵捕所得之灰面鵟鷹販賣予何人，及被告戊○○、丁○○於105年10月14日獵捕所得之灰面鵟鷹係預備販賣予何人，然依被告2人獵捕之數量、獵物種類、狩獵型態綜合判斷，足認渠等獵捕之初並非因傳統文化，亦非供祭儀或自用所需，故不得依據原住民基本法第19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免除刑事責任。

- 4、綜上，本院認為求保護生物多樣性，以公平合理分享遺傳資源所生惠益，不過度耗用生物資源造成生物多樣性迅速衰減，進而帶來多數物種滅絕之浩劫，維繫環境保護之永續發展，原住民族固得依照其傳統生活習慣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含一般類及保育類），然仍須視個案情節檢視其行為是否確實為祭儀或自用所需，而不應以被告具有原住民身分逕行推定其獵捕行為必然與傳統文化有關。被告戊○○、丁○○、甲○○所涉犯行事證明確，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 (一)、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項第1、2、3款，均係就不同情形下，對於保育類野生動物為獵捕、宰殺之處罰規定，如僅有其中一款情形之獵捕或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固祇成立其中一款之獵捕或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如兼具其中多款之情形，因獵捕、宰殺之行為只有一個，仍只成立一罪（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402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戊○○、丁○○明知灰面鵟鷹族群量未逾越環境容許量者，亦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單獨或共同使用獵槍以外之其他種類槍械獵捕灰面鵟鷹，渠等行為同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9條第1項第5款，故核被告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空氣槍罪、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共2罪）。被告丁○○所為，係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被告甲○○所為，係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之非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罪。

- (二)、被告戊○○、丁○○於105 年10月14日晚間共同至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活動中心後方山區獵捕灰面鵟鷹，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 (三)、被告戊○○於104 年底某日開始持有其胞弟潘德順（96年間死亡）遺留之具殺傷力空氣槍，至105 年10月15日方才為警查獲而終止，應成立繼續犯而論以一罪。其所犯非法持有空氣槍、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 項第1 款、第3 款之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犯行（共2 次）之3 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 (四)、被告丁○○前於104 年間因傷害案件，經本院以104 年度原簡字第116 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並於105 年1 月22 日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丁○○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 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
- (五)、按「犯第1 項、第2 項或第4 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 條第6 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自始即坦承其持有上開空氣槍（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之客觀事實，又其持有之具殺傷力之空氣槍雖已逾一般認定殺傷力之客觀標準，惟考量被告持有之槍枝係作為獵捕灰面鵟鷹所用，其獵捕行為已另成立他罪加以評價，此外並無事證足認其意圖持以危害他人生命財產安全或社會秩序，故被告戊○○持有空氣槍對社會治安之危險性與一般擁槍自重者之可責程度尚屬有別。另查，被告戊○○持有空氣槍數量僅1 支，期間僅1 年餘，犯罪情節相對輕微，如科以本罪最輕本刑3 年以上有期徒刑，尚嫌過重，亦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立法本旨原在以重刑防制暴力犯罪、避免槍枝氾濫之意旨有違。爰就被告戊○○所犯非法持有空氣槍之罪，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 條第6 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 (六)、就被告戊○○、丁○○、甲○○科刑事事由分別審酌如下：
- 1、爰審酌被告戊○○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前科（不構成累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素行普通，其持有具殺傷力之空氣槍之行為構成社會治安之潛在性威脅，另其明知灰面鵟鷹為保育類野生動物，不思予以保育，雖具原住民身分，但非基於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之目的而於短時間內大量獵捕29隻，對生物多樣性與生態保育造成危害，且亦反於原住民傳統對山林鳥獸尊重並與之共存共榮之態度，所為實有不該；另衡酌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其自述學歷為國中肄業、職業為臨時工，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一切情狀，分別就所犯各罪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諭知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 日之易服勞役折算標準，再合併定應執行刑。
 - 2、再審酌被告丁○○有違反懲治盜匪條例、藏匿人犯等前科（

累犯不重複評價），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素行非佳，雖具原住民身份，但非基於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之目的與被告戊○○共同獵捕9隻灰面鵲鷹，對生物多樣性與生態保育造成危害，反於原住民傳統對山林鳥獸尊重並與之共存共榮之態度，且於犯後矢口否認犯行，未見悔意，實有不該；並考量其在犯罪分工上處於較為次要之地位（協助照明），及其自述學歷為國中畢業、職業為油漆工，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 3、末審酌被告甲○○前有詐欺之前科（不構成累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素行普通，其拾獲因不明原因掉落在地尚存活之灰面鵲鷹後竟不思予以救助或交由有關機關處理，而為圖口腹之慾將之宰殺，對生物多樣性與生態保育造成危害，實有不該；另衡酌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其自述學歷為國中畢業、職業為農，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 (ㄅ)、被告甲○○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詐欺罪之前科判處罰金2000元），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此次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考量其僅宰殺1隻灰面鵲鷹供自己食用，犯行相對較輕微，且事後已知坦認犯行，足徵其悔意，信經此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以暫不執行其刑為當，爰併予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之期間，以啟自新。又為使被告甲○○深切記取教訓，勿再蹈法網，並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其應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及應給付之期間。以上為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若違反上開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聲請法院撤銷其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又被告戊○○之辯護人雖辯護稱：請給予被告戊○○緩刑之宣告，以啟自新等語（見本院卷第364頁），然考量被告戊○○前於81年間曾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經判決處有期徒刑8月，緩刑4年，又於105年間因買賣保育類野生動物食蛇龜遭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本院105年度原訴字第18號案件尚在審理中），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戊○○又犯本案之罪，顯非一時失慮所為，若再諭知緩刑宣告，將使刑罰之特別預防功能失其效用，辯護人所辯難調可採，附此敘明。

三、沒收：

- (一)、按犯第40條、第41條、第42條或第43條第3項之罪，查獲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得沒收之；查獲之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及供犯罪所用之獵具、藥品、器具，沒收之，野生動物保育法第52條第1項固有明文。然按刑法施行法於105年6月22日修正公布第10條之3之條文規定：「中華民國104年12月

17日及105年5月27日修正之刑法，自105年7月1日施行。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則依前揭之規定，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是本件不再適用前揭刑法沒收修正前之野生動物保育法第52條第1項有關之沒收規定，而應適用裁判時之刑法規定，合先敘明。

- (二)、被告戊○○持有之具殺傷力之空氣槍1支（內含瓦斯鋼瓶1罐、鋼珠9顆，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規定未經許可不得持有之違禁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分別在被告戊○○所犯3罪主文項下宣告沒收。又按共同正犯因相互間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遂行其犯意之實現，本於責任共同之原則，有關沒收部分，對於共犯間供犯罪所用之物，自均應為沒收之諭知（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5583號、89年度台上字第6946號判決意旨參照），上開空氣槍為被告被告丁○○與被告戊○○共同獵捕灰面鵂鷹所用之物，而扣案之頭燈2具，分別為被告戊○○、丁○○所有，且係供渠等2人犯本案非法獵捕灰面鵂鷹所用之物，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為沒收之諭知。
- (二)、警方在屏東縣○○鄉里○村里○路00號扣得之灰面鵂鷹屠體1隻、內臟3包（含心臟19顆、胃14顆），為被告戊○○於105年10月11日晚間非法獵捕之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即為其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規定沒收。另警方於105年10月15日查獲當場扣得之灰面鵂鷹屍體9隻（現場查獲死體8隻，活體1隻，惟活體經救助仍死亡），為被告戊○○、丁○○共犯非法獵捕之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且依被告戊○○於警詢中供述：如果沒有被查獲我和丁○○射殺灰面鵂鷹是要對分等語（見警一卷第4頁），故於本案查獲時，上開灰面鵂鷹死體既未及分配，仍屬被告戊○○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規定沒收。至在屏東縣○○鄉里○村○○路○○○○○○○○號0000000號扣得之灰面鵂鷹屠體1隻，為被告甲○○宰殺之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為其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規定沒收。
- (三)、其餘在屏東縣○○鄉里○村里○路00號扣得被告戊○○所有之瓦斯空氣長槍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為氣體動力式槍枝，單位面積動能為19.0焦耳/平方公分，非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管制之槍砲；喜得釘長槍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係土造長槍，經操作檢視，欠缺槍管，無法供發射彈丸使用，依現狀認不具殺傷力；瓦斯鋼瓶2罐、槍管1支、握柄1支、槍枝零件4支，均非屬公告之槍砲主要組成零件等節，有內政部106年6月20日內授警字第1060871882號函、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6年1月

17日刑鑑字第1058006383號鑑定書各1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7頁、偵二卷第27頁），均非屬違禁物，且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行有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乙、無罪部分：

-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明知灰面鵲鷹係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列為保育類珍貴稀有野生動物，且係過境候鳥，族群量並未逾越環境容許量，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予以騷擾、虐待、獵捕、宰殺或為其他利用。竟基於宰殺（起訴書誤載為「獵捕」，經檢察官當庭更正）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於105年10月17日上午6時許，在其屏東縣○○鄉○○村○○路00巷00號住處旁檳榔園，撿拾掉落在地之灰面鵲鷹1隻，並將之屠宰以供食用。嗣為警於105年10月19日持搜索票至屏東縣○○鄉○○村○○路00巷00號搜索，扣得灰面鵲鷹1隻（屠體），因認被告乙○○涉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之非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嫌等語。
-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另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 三、公訴人認被告乙○○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105年10月19日搜索屏東縣○○鄉○○村○○路00巷00號之現場照片、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鑑定報告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105年11月2日農特動字第1053605562號函各1份為其主要論據。
- 四、訊據被告乙○○堅詞否認有何非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行，辯稱：我在家裡附近的檳榔園發現那隻灰面鵲鷹已經死掉了，我才把它撿回來，我撿回來後有把灰面鵲鷹的毛拔掉，嘴巴與腳去掉，肉的部分放在冰箱要自己吃，我沒有宰殺或獵捕灰面鵲鷹，我只是撿拾屍體來食用，我有聞，還沒有

發臭，只是眼睛有長螞蟥，我判斷還可以吃等語。經查：

- (一)、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固規定：保育類野生動物應予保育，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殺或為其他利用，然該法並未對何謂「宰殺」為定義性規範。自文意解釋以觀，宰殺應係指以人為方式使活體生物死亡，而自體系解釋以觀，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條第1款規定：「野生動物：係指一般狀況下，應生存於棲息環境下之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兩棲類、魚類、昆蟲及其他種類之動物。」第6款規定：「野生動物產製品：係指野生動物之屍體、骨、角、牙、皮、毛、卵或器官之全部、部分或其加工品。」明顯就「野生動物」與「野生動物產製品」各有不同之定義。而野生動物之屍體既屬野生動物產製品，則「野生動物」本身應指活體之動物。故宰殺野生動物自應係指以人為方式使野生動物活體死亡之行為，而不及於動物死體之支解或其他處理，否則即無法與野生動物產製品加以區別。
- (二)、檢察官所舉證據，其中雖記載被告乙○○自白，然細究被告乙○○於警詢時供稱：警方所查扣的灰面鵟鷹屠體1隻是我在家裡附近的檳榔園拾獲的，撿到時已經死亡，我徒手拔毛，用刀剖開取出內臟，內臟已經丟棄等語（見警二卷第2頁）；偵查中供稱：我早上6點多要去割檳榔，在檳榔園附近撿到灰面鵟鷹，撿到時已經死了，我撿回來要吃，我沒有獵殺保育類野生動物等語（見105年度偵字第7948號卷【下稱偵三卷】第10頁），其自始堅稱係撿拾已死亡之灰面鵟鷹屍體，而未自白獵捕活體之灰面鵟鷹，故雖被告乙○○於偵查中曾經檢察官訊問後供述：我承認涉犯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犯行等語（見偵三卷第10頁），然其應係對法律規定不瞭解而為錯誤之意思表示，難認有真摯之自白。另公訴人所舉之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照片、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鑑定報告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105年11月2日農特動字第1053605562號函等（見警二卷第25-33頁、141-153頁、偵一卷第86-88頁），固得證明警方係在被告乙○○住處扣得灰面鵟鷹屠體1隻，惟依該灰面鵟鷹之搜索扣押照片（警二卷第145-151頁），其於搜索扣押時已經除毛、喙部與爪部經切除、內臟經取出，處在冰凍死亡狀態，並非活體。則搜索扣押所得至多只能證明被告乙○○持有灰面鵟鷹屍體之狀態，尚無法證明被告乙○○取得灰面鵟鷹時，究係活體或屍體，進而推論被告乙○○確係宰殺活體之保育類野生動物。
- (三)、本院為確認在被告乙○○住處扣得之灰面鵟鷹屠體死因是否係受到外傷、宰殺或自然死亡，函詢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經其回覆為：「本處王弘毅技佐現場目視檢視時，因該屠體已無羽毛、嘴喙及雙足，暫無法判斷該屠體死亡之原因，嗣乃轉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鑑定，另潘君持有之屠體經解凍後檢視，該屠體之背面2處及腹面1處

有穿刺之痕跡。」，有該管理處106 年7 月13日墾保字第1060005256號函1 份及照片2 張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36-238 頁）；另本院函詢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經其回覆為：「本分隊於105 年10月19日持屏東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於屏東縣○○鄉○○村○○路00巷00號起出之保育類野生動物灰面鵟鷹（屠體）當時尚處於結冰狀態，當場無法知其相關傷痕之成因。當日於責付墾管處保管時於屠體解凍後確實有疑似外力所造成之孔洞2 處」，有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106 年7 月17日保七八大刑字第1060002703號函1 份及照片2 張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48-250 頁）。然依上開函文內容以觀，僅能認定扣得之灰面鵟鷹屠體外觀有2 至3 處孔洞之事實，然造成孔洞之原因則未能確認。況質諸被告乙○○供述其拾獲灰面鵟鷹屍體後有以刀子切開並取出內臟等語，則上開屠體上之孔洞亦可能為被告乙○○將灰面鵟鷹剖開剔除內臟時導致，其抗辯非無理由。故依卷內現有證據，尚無法認定被告乙○○究係宰殺活體野生動物，或係撿拾屍體之野生動物產製品。

-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證據固能證明被告乙○○持有扣案灰面鵟鷹屠體1 隻，惟被告乙○○抗辯係撿拾屍體，搜索扣押所得只能證明其持有灰面鵟鷹屍體，鑑定結果則只能證明扣案之屠體為保育類野生動物灰面鵟鷹，均不及於取得狀態與死亡原因。本院認卷存證據均無法認定被告乙○○確係宰殺活體之灰面鵟鷹，而與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 項第1 款之構成要件不符，自難以該罪相繩，應為被告乙○○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理條例第8 條第4 項、第6 項，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 項第1 款、第3 款，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51條第5 款、第47條第1 項、第41條第1 項前段、第42條第3 項前段、第74條第1 項第1 款、第2 項第4 款、第5 項、第38條第1 項、第2 項、第38條之1 第1 項，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甯先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 法 官 簡光昌
法 官 劉容好
法 官 陳盈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郭松菊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空氣槍或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枝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枝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 一、未具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條件，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 二、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 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使用禁止之方式，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於劃定之野生動物保護區內，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所有人	附註
1	空氣槍（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	1支	戊○○	內含瓦斯鋼瓶1 罐、鋼珠9 顆。
2	頭燈	1具	戊○○	
3	頭燈	1具	丁○○	
4	灰面鵟鷹屠體	1隻	戊○○	在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里德路31號搜索扣得
5	灰面鵟鷹內臟（含心臟19顆、胃14顆）	3包	戊○○	在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里德路31號搜

				索扣得
6	灰面鵟鷹屍體	9隻	戊○○	在屏東縣滿州鄉里 德村活動中心後方 山區扣得
7	灰面鵟鷹屠體	1隻	甲○○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原訴字第38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潘崑全

選任辯護人 李榮唐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董秀花

選任辯護人 吳忠諺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6年度偵字第8818號、107年度偵字第10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戊○○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之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扣案之灰面鵟鷹屠體參拾貳隻均沒收。

丙○○無罪。

事 實

一、戊○○明知灰面鵟鷹（學名：Butastur indicus，俗稱國慶鳥）係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列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且係過境候鳥，族群數量未逾越環境容許量，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殺或為其他利用，詎其竟基於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單一犯意，於民國106年10月15至17日間之夜間某時許，在屏東縣滿州鄉秀林路附近山區（GPS座標：X：234154、Y：0000000；未經劃定為野生動物保護區），持獵槍以外其他種類槍械之不明空氣槍（未扣案；無證據足認對人體具有殺傷力）接續射殺灰面鵟鷹，以此方式獵捕灰面鵟鷹32隻。戊○○獵捕上開灰面鵟鷹後，隨即將灰面鵟鷹屍體帶至屏東縣滿州鄉某處河床邊（GPS座標：X：234968、Y：0000000），持菜刀1把將上開灰面鵟鷹屍體脫毛（俗稱屠體），其為避免遭查緝，遂將上開

01 屠體攜至丙○○（無證據證明丙○○事前知情而與戊○○有
02 獵捕之犯意聯絡，詳後述）位於屏東縣○○鄉○○路000巷
03 0弄0號住處廚房之小型冷凍櫃藏放。嗣於106年10月20日
04 員警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丙○○上址住處搜索，扣得
05 上開灰面鵞鵝屠體32隻，戊○○經員警通知到案說明後，於
06 同年月27日自行交付上開菜刀1把與警方扣案，始悉上情。

07 二、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大隊報告臺灣屏東
08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09 理 由

10 甲、有罪部分：

11 壹、證據能力部分：

12 一、被告戊○○及其辯護人固爭執秘密證人甲1於偵訊時之證述不
13 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4頁反面、第134頁），惟此部分
14 既均未經本院執之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自無論述
15 其證據能力之必要。

16 二、除前揭已論述者外，本判決引用被告戊○○以外之人於審判
17 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對
18 於該等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無聲明
19 異議（見本院卷第64頁反面、第134頁）。本院審酌上開證
20 據資料之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
21 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
22 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所引非供述證據，與
23 本案均有關聯性，且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
24 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25 貳、實體部分：

26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27 訊據被告戊○○固坦承有於106年10月15日至17日間之夜間
28 某時許，在前開屏東縣滿州鄉秀林路附近山區取得灰面鵞鵝
29 屍體共32隻，並持扣案之菜刀將上開灰面鵞鵝屍體脫毛成為
30 屠體後，攜至被告丙○○上址住處之小型冷凍櫃藏放，然矢
31 口否認有何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

01 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之犯行，辯稱：伊沒有持空氣槍
02 去獵捕，扣案的灰面鵟鷹屠體32隻是伊從山上檢來的，伊是
03 夜間看到有人去打獵，伊尾隨在後，伊開燈大喊不要動，獵
04 人就跑光了，伊就撿拾灰面鵟鷹屍體2包云云。惟查：
05 一被告戊○○明知灰面鵟屬保育類野生動物，非經許可不得獵
06 捕，而其確有於106年10月15日至17日間之夜間某時許，在
07 前開屏東縣滿州鄉秀林路附近山區，取得灰面鵟鷹屍體共32
08 隻，其復將上開灰面鵟鷹屍體32隻脫毛成為屠體後，攜至同
09 案被告丙○○上址住處之小型冷凍櫃藏放，嗣員警持本院核
10 發之搜索票，至同案被告丙○○上址住處搜索，扣得上開灰
11 面鵟鷹屠體32隻等情，業據被告戊○○於本院準備程序、審
12 理時所是認（見本院卷第33頁反面至第34頁正面、第63頁反
13 面至第64頁正面、第180頁正反面），核與同案被告丙○○
14 於本院審理時之供述情節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178頁反面
15 ），並有本院106年聲搜字977號搜索票（受搜索人：丙○
16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搜索筆錄、扣押物品
17 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1份、被告戊○○宰殺灰面鵟鷹現
18 場蒐證照片8張、蒐證照片6張（滿州鄉秀林路山區相思樹
19 造林地）、在同案被告丙○○住處搜索暨扣案物照片共12張
20 、員警乙○○107年3月14日報告、被告丙○○107年3月
21 7日自願勘察、採證同意書各1份、被告丙○○住處相對位
22 置照片17張等在卷可稽（見警卷第93至99、107至111頁、
23 179、181至189、191至201頁；107偵1083號卷第115
24 至119、121、127至139頁）。而扣案之灰面鵟鷹屠體32
25 隻，經送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鑑定結
26 果，認為：「二、經抽取7件檢體核酸物質及比對其粒線體
27 COI序列（666bps），其中4件不明屠體檢體編號為E1，E2
28 ，E3，F1，此應為灰面鵟鷹（*Butastur indicus*）屠體；3
29 件內臟檢體編號為F4-1，F4-3，F4-4，此應為豬（*Sus scrofa*）
30 內臟，詳如附件一。」等情，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
31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106年11月8日農特動字第1063605875號

01 函、鑑定報告書各1份在卷可稽（見警卷第221至223、22
02 5頁），核與被告戊○○前揭供述情節相符，又上開屠體現
03 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研究課技佐王弘毅具領保管乙節
04 ，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為憑（見警卷第227頁），是上開
05 事實首堪認定。

06 二被告戊○○固以前揭情詞置辯。然其於106年11月22日警詢
07 時先供稱：那不是我去打的，別人打的，別人不敢處理，是
08 盧明德打得，他不敢處理，說我很閒沒辦法上山，他拜託我
09 處理的云云（見警卷第6頁），復於106年12月8日偵訊時
10 改稱：「【問：你如何知道那邊有人在打獵？】我騎機車巡
11 ，看到山上有光，我就趕過去。【問：你行動不方便怎麼可
12 能那麼快過去？】他們是打好的鳥的丟在路邊，我看他們從
13 山下一路打到山上的路邊，所以我就在山上路邊等他們，他
14 們也都是在路邊打。」（見106年偵字第8818號卷第265頁
15 ），又於107年1月8日警詢時供稱：「【問：你是用何方
16 式撿拾灰面鵞鷹的？】我打開頭燈嚇唬他們，等他們跑完後
17 ，我再慢慢一一撿拾。」（見警卷第29頁），嗣於本院審理
18 時則供稱：「【問：你是一隻一隻撿的？還是兩包已經包好
19 的？】答：兩包放在一起，我去時人已經跑了，我想說那時
20 無法上山就拿去自己吃。」云云（見本院卷第178頁），可
21 見其對於灰面鵞鷹32隻之來源，供述前後矛盾，且對於其埋
22 伏出聲嚇唬獵人後，其究係1隻1隻撿拾後自行裝袋，抑或
23 是獵人因遭被告戊○○之嚇唬而將已裝入袋中、分為2袋之
24 灰面鵞鷹32隻直接丟包，再由被告戊○○撿拾等情節，前後
25 矛盾不一，已有可疑。又其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打獵的人有
26 4人，且均有戴頭燈，伊埋伏時有戴頭燈但沒有打開，待獵
27 人們靠近伊時，伊才開頭燈並大喊不要動，獵人就把瓦斯槍
28 、灰面鵞鷹、背包都丟在地上跑掉，伊在嚇獵人之前有聽到
29 瓦斯槍的槍聲云云（見本院卷第179頁正反面、第180頁）
30 ，然考量被告戊○○自陳脊椎開刀受傷，腳不方便爬山（並
31 於偵訊時庭呈開刀證明），伊用埋伏嚇唬之方法取得灰面鵞

鷹，這是第1次，伊想說試試看等語（見警卷第23頁；107偵1083號卷第51頁；本院卷第178頁正面），依其所述可認被告戊○○之行動速度應不快，則其竟敢冒險獨自上山，無視可能遭獵人反制而無法迅速逃跑之困境，衡情實在殊難想像；且埋伏當時，獵人人數非少又持有槍枝，獵人們對於被告戊○○所發出之單一聲音，衡情可能會先以頭燈探照聲音來源，甚至可能逕朝被告戊○○之方向開槍而為反抗行為，縱使要逃跑，衡情亦不會特意將可用以自衛防身且為其犯罪證據之槍枝丟下後再行逃跑，是被告戊○○辯稱獵人們逕將瓦斯槍、灰面鴛鷹、背包都丟在地上後逃跑云云，實與常情乖違，尚難遽採。綜上可認被告戊○○辯稱扣案之灰面鴛鷹32隻係伊以嚇唬獵人之方式撿拾而來云云，實屬矯飾卸責之詞，自難憑採。

三另觀諸卷附扣案之灰面鴛鷹32隻屠體照片（見警卷第193至199頁），該等屠體身上均有圓形孔洞，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供陳，伊在現場埋伏時有聽到瓦斯槍的槍聲，獵人遭其嚇唬後當場丟棄在地的也是瓦斯槍等語（見本院卷第179頁反面至第180頁正面），而證人即承辦員警乙○○於本院審理時亦結稱：伊於106年10月7日18時許至（屏東縣滿州鄉永靖村）門馬羅山埋伏，當時有看到燈光及聽到槍聲，槍聲應該是空氣槍，是「啵」的聲音，不是「碰」等語（見本院卷第138頁反面、第140頁正反面），並有員警乙○○於106年10月16日製作之偵查報告書1份在卷可稽（見106警聲搜1216卷第10頁），是依被告戊○○所陳及員警乙○○於埋伏時之見聞，非法獵捕灰面鴛鷹者所用之工具均為空氣槍即瓦斯槍，此與前揭灰面鴛鷹32隻屠體上之圓形孔洞互核相符，復衡以灰面鴛鷹為鳥類，依其善於飛翔及常在樹上棲息之特性，衡情若欲將之射殺，槍枝無疑是能有效達成目的之工具，綜上可認扣案灰面鴛鷹32隻屠體身上之圓形孔洞之成因，確係遭空氣槍射殺所致之事實，堪以認定。被告戊○○既自陳扣案之灰面鴛鷹32隻係其1人自上開山上取得，又其

前揭辯稱係撿拾他人射殺後取的云云，並不可採，業如前述，則扣案之灰面鵞鷹32隻應係被告戊○○持未扣案之空氣槍在上開地點射殺獵捕而得之事實，至為灼然，別無他想。而上開空氣槍雖未扣案，致無從鑑定其是否對人體具有殺傷力，而另構成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空氣槍罪，惟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應認該未扣案之空氣槍未對人體具有殺傷力，故被告戊○○並未另犯非法持有空氣槍罪；然被告戊○○既係持用空氣槍即瓦斯槍獵捕灰面鵞鷹32隻，該空氣槍即顯非獵槍，則被告戊○○所為即已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9條第1項第5款「不得使用獵槍以外其他種類槍械，獵捕野生動物」之規定，而該當同法第41條第1項第3款「違反第19條第1項規定，使用禁止之方式，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者。」之構成要件，自應論以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

四又本案有無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項、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之規定，基於傳統文化所為之獵捕野生動物行為，免除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項第1、3款之刑罰責任？經查：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規定：「原住民族得在原住民族地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海域依法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一、獵捕野生動物。二、採集野生植物及菌類。三、採取礦物、土石。四、利用水資源。前項海域應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公告。第一項各款，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而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明定：「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限制。前項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應經主管機關核准，其申請程序、獵捕方式、獵捕動物之種類、數量、獵捕期間、區域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是上開規定均係為保障原住民傳統

01 文化中之狩獵文化，為我國憲法與兩公約對於原住民族文化
02 權保障之具體落實。惟原住民為履踐其狩獵文化，狩獵過程
03 中之獵捕、宰殺野生動物行為將造成野生動物數量減少（尤
04 以保育類野生動物影響更為重大），此即與保育野生動物、
05 維護生物多樣性與自然生態（亦即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立法意
06 旨）之法益衝突，因此，為求取尊重原住民族文化與保育生態
07 間之利益調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與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08 21條之1並非無條件允許原住民族任意獵捕、宰殺野生動物
09 ，而係需「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及有其「必要性
10 」，此要件規範目的即係避免原住民個人超越其文化範圍而
11 過度濫殺、濫捕野生動物，甚至進而牟取利益，而使保護原
12 住民族文化權之美意淪為盜獵犯罪者之免責事由。

13 ?又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項條文未載明臺灣原住
14 民族得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獵捕、宰殺或利用之野生
15 動物是否限於「一般類野生動物」，或兼及「保育類野生動
16 物」，過去對我國司法實務者適用法律時造成莫大困擾。惟
17 94年2月5日公布施行之原住民族基本法，其立法目的為落
18 實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
19 共榮之族群關係，其中第19條第1項第2款、第2項明定原
20 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儀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獵捕「
21 野生動物」之非營利行為，並未將保育類野生動物排除在外
22 。又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項於93年2月4日自第
23 21條第5款移列而單獨立法，亦明定臺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
24 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
25 同法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各款規定
26 之限制，用以特別保護原住民族之傳統獵捕文化。是原住民
27 族於其傳統文化、祭儀期間，若供各該傳統文化、祭儀之用
28 ，且符合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2項授權規定而訂
29 頒之「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
30 動物管理辦法」第6條及其附表之各項規定，僅事先未經向
31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持自製獵槍獵捕屬上開辦法第6條第2

項附表所列准許獵捕之保育類野生動物，不能因野生動物保育法第51條之1僅規定對於未經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動物」科以行政罰，即認同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謂野生動物僅指一般類野生動物而不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最高法院106年度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換言之，原住民依上開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規定，若原住民所獵捕「野生動物」已合於上開免責之要件，則不論所獵捕「野生動物」為一般類野生動物或保育類野生動物，均不受刑罰所處罰。

?又所謂「原住民族地區」，係指原住民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地區，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原住民族地區』之定義依據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5條第4項規定，係指『原住民族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本院核定之地區。』本法從之，另本院（註：係指行政院）已核定上開地區包括30個山地鄉及25個平地原住民鄉（鎮、市），共55個鄉（鎮、市）。」。且行政院前於91年4月16日以院臺疆字第0910017300號函核准屏東縣滿州鄉為「原住民族地區」乙節，有原住民族委員會108年9月9日原民經字第1080056461號函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5頁正反面），則屏東縣滿州鄉自屬原住民族基本法所稱之「原住民族地區」。經查，本案被告戊○○為排灣族平地原住民，有其全戶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1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6頁），而其居住之地理區域、其自陳之獵捕位置、警方搜索查獲保育類野生動物處所，均位在屏東縣滿州鄉境內之原住民族地區，是本案應進一步探討，被告戊○○之犯行是否符合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項、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免責之要件。

?本案被告戊○○於106年10月15至17日某時許在原住民族地區以空氣槍獵捕灰面鵟鷹之行為，是否符合「基於原住民傳

01 統文化、祭儀或自用」，而有其「必要性」之要件？
02 ?被告戊○○獵捕灰面鵟鷹為106年10月間，然依「原住民族
03 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
04 第6條及其附表規定，屏東縣滿州鄉排灣族原住民10月間固
05 定舉辦之祭儀為「五年祭」、「五年後季送善靈」，獵捕動
06 物之種類為熊鷹（頭飾使用之羽毛）、山豬、山羌、臺灣野
07 山羊、飛鼠；不定期舉辦之傳統禮俗包含「生命禮俗（嬰兒
08 出生、滿月、房屋落成）」、「感恩祭」、「播種祭」、「
09 生命禮俗（結婚、慰喪、除喪、成年禮、尋根、傳統身分象
10 徵飾物）」，獵捕動物之種類包含山羌、山豬、臺灣野山羊
11 、飛鼠、野兔、雉雞、臺灣獼猴、臺灣水鹿、松鼠、山老鼠
12 、溪魚、溪蝦、鮑獾、大冠鷲、鸛鶉、蛇類、熊鷹（頭飾使
13 用之羽毛），上開傳統文化祭儀所需獵物已不含括灰面鵟鷹
14 ，可見被告戊○○獵捕之目的與部落祭儀毫無關連，自與前
15 揭「基於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之免責要件不符。
16 ?另就單純自用之免責要件而言，為避免原住民個人超越其傳
17 統文化範圍而過度濫殺、濫捕野生動物，自應在「必要性」
18 之要件謹慎審酌，以免使保護原住民文化權之美意，淪為盜
19 獵犯罪者脫免刑罰規範之藉口。查被告戊○○於警詢、偵訊
20 時始終供稱：扣案這些灰面鵟鷹的用途是要拿來食用，伊因
21 身體脊椎受傷自己要吃的，聽說吃這個對開刀後有營養補給
22 的功效等語（見警卷第13、23頁；106年偵字第8818號卷第
23 265頁），嗣於本院審理時則供稱：「【問：你抓那麼多是
24 否要自己吃？】答：是。【問：你一次大概要吃幾隻？】答
25 ：看家人，我要分給家人吃。【問：你家裡有多少人？】答
26 ：超多，30人左右，都是我兄弟姐妹的兒子。【問：你打算
27 一次煮32隻還是要分幾次吃？】答：應該要分批吃，一次怎
28 麼可能吃那麼多。【問：你自己一餐可以吃幾隻？】答：兩
29 隻。」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反面至第181頁），是被告
30 戊○○對於獵捕32隻灰面鵟鷹之目的，先於警詢、偵訊時始
31 終一致供稱係為自己脊椎開刀進補，嗣於本院審理時，起初

01 先供稱係為自己食用，經進一步追問其1人1次要食用幾隻
02 時，則又改稱也要分給家人吃、家人有30人左右，可見其供
03 述前後不一致；且其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伊的兄弟姊妹只剩
04 潘文章與其同住在屏東，其餘兄弟姊妹都住在台中等語（見
05 本院卷第179頁反面），而被告戊○○之弟弟丁○○於本院
06 審理時亦結稱，目前兄弟姊妹中只有被告戊○○和潘文章住
07 在屏東，伊和伊的小孩都住在台中等語（見本院卷第135頁
08 反面至136頁正反面、第137頁反面），可見被告戊○○之
09 兄弟姊妹及渠等之子女住在屏東者甚少，則被告戊○○辯稱
10 要分給家人食用、家人有30人左右，都是伊兄弟姊妹的兒子
11 云云，顯有疑義；其縱係為供自己食用，竟需如此大量之灰
12 面鵞鷹，衡情亦實值懷疑；又不論是自用或分享給親族，於
13 權衡原住民文化（然獵捕灰面鵞鷹非前述排灣族之傳統文化
14 、祭儀）與生態保育間之利益衝突時，更難認被告戊○○食
15 用如此大量之灰面鵞鷹，有何超逾生態保育目的而應被優先
16 尊重保護之利益，自與前揭「必要性」之免責要件不符。

17 ?綜上，本案被告戊○○雖有原住民身分，然其於灰面鵞鷹過
18 境滿州鄉時，密集、大量獵捕，且僅獵捕單一種類之獵物，
19 其復自陳獵捕目的均與傳統文化、祭儀無關，另就其為供自
20 用之目的上，其獵捕如此大量之保育類動物，亦顯逾越「必
21 要性」之程度，是本案被告戊○○之獵捕行為，與前揭「基
22 於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而有其「必要性」之要件
23 不符，自難依原住民基本法第19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
24 第1項規定免除刑事責任。

25 五至公訴意旨認被告戊○○「將灰面鵞鷹屍體帶至屏東縣滿州
26 鄉某處河床邊（GPS座標：X：234968、Y：0000000），
27 持刀『宰殺』灰面鵞鷹並將之脫毛（俗稱屠體）」乙節，按
28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固規定：「保育類野生動物應
29 予保育，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殺或為其他利用」，然
30 該法並未對何謂「宰殺」為定義性規範。自文意解釋以觀，
31 宰殺應係指以人為方式使活體生物死亡，而自體系解釋以觀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3條第1款規定：「野生動物：係指一般狀況下，應生存於棲息環境下之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兩棲類、魚類、昆蟲及其他種類之動物。」第6款規定：「野生動物產製品：係指野生動物之屍體、骨、角、牙、皮、毛、卵或器官之全部、部分或其加工品。」明顯就「野生動物」與「野生動物產製品」各有不同之定義。而野生動物之屍體既屬野生動物產製品，則「野生動物」本身應指活體之動物。故「宰殺」野生動物自應係指以人為方式使野生動物活體死亡之行為，而不及於動物死體之支解或其他處理，否則即無法與野生動物產製品加以區別。準此，本院認扣案之灰面鵟鷹32隻係被告戊○○持未扣案之空氣槍射殺獵捕而得，業如前述，又卷內並無其他證據證明扣案之灰面鵟鷹32隻遭被告戊○○開槍射殺後是否立即死亡而為屍體，抑或尚有生命跡象而係遭被告戊○○持扣案之菜刀宰殺後方始死亡，是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應認被告戊○○持空氣槍射殺後，扣案之灰面鵟鷹32隻均已當場死亡，故被告戊○○繼而持扣案之菜刀1把將上開屍體脫毛之行為，不該當前揭「宰殺」之要件，而僅係被告戊○○於持槍「獵捕」犯行完成後之不罰後行為，不成立犯罪，是就公訴意旨前揭「持刀『宰殺』」之用詞，因與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之法條用語相同，為免產生誤會，故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戊○○上開所辯要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規定：「保育類野生動物應予保育，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殺或為其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在此限：一、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者。」，同法第19條第1項第5款規定：「獵捕野生動物，不得以下列方法為之：五、使用獵槍以外之其他種類槍械。」，由於灰面鵟鷹屬保育類野生動物，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迄今尚無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族群量逾越

環境容許量之相關公告，故灰面鵲鷹之族群量目前並未逾越環境容許量，而本案被告戊○○明知灰面鵲鷹屬保育類野生動物，未經許可禁止獵捕，其竟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持用獵槍以外其他種類槍械之空氣槍，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灰面鵲鷹，其行為同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第1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故核被告戊○○所為，係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

二又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項第1、2、3款均係就不同情形下，對於保育類野生動物為獵捕、宰殺之處罰規定，如僅有其中一款情形之獵捕或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固祇成立其中一款之獵捕或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如兼具其中多款之情形，因獵捕或宰殺之行為祇有一個，仍只成立一罪，不能認為係法規競合或犯罪競合，並無刑法第55條之適用，其判決主文應將各款情形順序揭明，理由並應引用各款，俾相適應（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402號判決參照）。是本案被告戊○○非法獵捕灰面鵲鷹之行為，雖同時符合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處罰要件，參諸上開說明，仍僅成立一罪。又被告戊○○先後獵捕灰面鵲32隻之行為，其時間密切連接，地點相同，侵害法益同一，為接續犯，亦僅論以一罪。

三被告戊○○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經本院以101年度訴字第159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年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0萬元）、7月，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併科罰金10萬元），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02年度上訴字第723號判決撤銷原判決關於非法持有空氣槍罪及定執行刑部分，改判處有期徒刑2年（併科罰金8萬元），前揭撤銷改判部分與上訴駁回之共同犯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部分，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6月（併科罰金8萬元），嗣經最高法院以102年台上字第4995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於104年11月2日因縮短刑期假

釋出監，所餘刑期付保護管束，迄105年7月14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6至13頁）。依此，被告戊○○假釋期滿未經撤銷，其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則其於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之累犯要件；本院考量被告前揭構成累犯之罪與本案所犯之罪之犯罪類型、罪名、侵害法益同質性甚高，可徵其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茲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並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就被告本案犯行，裁量加重其刑。

四 爰審酌被告戊○○除前揭構成累犯之非法持有空氣槍獵捕灰面鵲鷹犯行外（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其前於88年間，即因持玩具空氣槍獵捕灰面鵲鷹而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87年度上更（二）字第263號判決有期徒刑10月確定等情，有前揭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87年度上更（二）字第263號判決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至13、71至72頁反面頁），竟又為本案相同犯行，可見其不思悔悟，且於本案犯後矢口否認犯行，矯飾卸責，態度非佳，實應予以非難；復審酌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持空氣槍獵捕之手段、於本案獵捕灰面鵲鷹共32隻，數量非少，對自然生態危害非微之犯罪情節；兼衡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已婚，育有5個小孩均已成年，現在從事種植愛玉、抓溪蝦，月收入約1萬多元等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82頁）之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戒。

三、沒收部分：

一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扣案之灰面鵲鷹屠體32隻為被告戊○○持空氣槍獵捕而得，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屬被告戊○○之犯罪所得，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01 二按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供犯罪所用
02 、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
03 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1項、第
04 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戊○○犯罪所用之未扣案之空氣
05 槍1支，因被告戊○○否認持空氣槍獵捕之犯行，卷內亦無
06 證據證明該空氣槍係被告戊○○所有，亦無證據證明係他人
07 無正當理由提供被告戊○○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又無證據
08 證明其具有殺傷力而屬法定之違禁物，自與刑法第38條第1
09 項、第2項之規定不合，無從為沒收之宣告，附此敘明。

10 三至扣案之菜刀1把，雖係被告戊○○所有，且係供被告戊○○
11 ○持用以將灰面鵲鷹32隻屍體脫毛、去除內臟所用之物，然
12 上開行為與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之「宰殺」要
13 件不符而不構成犯罪，業如前述，自非刑法第38條第2項「
14 供犯罪所用」之物，無從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15 乙、無罪部分：

16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與被告戊○○共同基於獵捕保育
17 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戊○○於106年10月15至17
18 日間某時許，在屏東縣滿州鄉秀林路附近山區（GPS座標：
19 X：234154、Y：0000000），持不明之空氣槍射殺灰面鵲
20 鷹，以此方式射殺獵捕灰面鵲鷹32隻。被告戊○○獵捕上開
21 灰面鵲鷹後，即將灰面鵲鷹屍體帶至屏東縣滿州鄉某處河床
22 邊（GPS座標：X：234968、Y：0000000），持刀宰殺灰
23 面鵲鷹並將之脫毛（俗稱屠體）。被告戊○○屠宰完後，為
24 避免遭查緝，而與被告丙○○協議，將屠體藏放在被告丙○○
25 ○位在屏東縣○○鄉○○路000巷0弄0號住處之冰箱藏放
26 。嗣於106年10月20日，為警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被告
27 丙○○住處搜索，並扣得灰面鵲鷹屠體32具，並依被告丙○○
28 ○之供述循線查獲被告戊○○，並在被告戊○○住處扣得菜
29 刀1把，始悉上情。因認被告丙○○所為，亦涉嫌違反野生
30 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項第1、3款非法獵捕及使用禁止之
31 方式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嫌等語。

01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02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
03 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
04 ，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
05 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
06 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
07 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08 ，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
09 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10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
11 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
12 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
13 號判例意旨參照）。再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
14 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
15 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
16 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
17 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
18 意旨參照）。

19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丙○○涉犯上開罪嫌，係以證人甲1、龔秀香
20 於偵訊時之證述、查獲照片、現場照片及被告丙○○住處相
21 對位置照片、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被告丙○○
22 住處部分）、通聯明細示意圖、通聯I2分析表為其主要論據
23 。

24 四、訊據被告丙○○固坦承扣案之灰面鵟鷹屠體32隻，確係員警
25 在其住處廚房之小型冷凍櫃中查獲，然堅詞否認有何共同非
26 法獵捕及使用禁止之方式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行，辯稱
27 ：被告戊○○拿灰面鵟鷹32隻到伊住處置放時，伊並不知情
28 等語。經查：

29 一扣案之灰面鵟鷹屠體32隻，確係員警於106年10月20日，持
30 本院核發之搜索票，在被告丙○○位於屏東縣○○鄉○○路
31 000巷0弄0號住處之廚房小型冷凍櫃中搜索而查獲乙情，

業如前述，是上開事實固堪認定。

二惟按現行刑法關於正犯、從犯之區別，係以其主觀之犯意及客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其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苟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為正犯，必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為從犯。故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且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5407號判決意旨參見）。又按刑法上之幫助犯，須以正犯存在為前提，除此以外，且須於他人實施犯罪之前或犯罪之際，予以助力，使之易於實施或完成犯罪行為之謂，故以「事先幫助」及「事中幫助」為限，若於他人犯罪行為完成後，予以助力，即學說上所謂「事後幫助」，除法律別有處罰規定外，不成立幫助犯（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843號、74年度台上字第6362號裁判意旨參照）。

三同案被告戊○○供稱：伊將（撿拾他人射殺之灰面鵞鷹32隻）拖去攬仁溪殺，毛跟內臟當場放火燒掉，伊再於凌晨5點（將處理完畢之屠體）拿去丙○○家放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正反面），並有前揭在被告丙○○住處搜索暨扣案物照片在卷可稽（見106年偵字第8818號卷第51、59頁），可認證人即同案被告戊○○係將脫毛後之灰面鵞鷹屠體32隻攜至被告丙○○住處冷凍櫃藏放之事實，堪以認定；而對於同案被告戊○○攜帶上開灰面鵞鷹32隻屠體至被告丙○○住處冰箱藏放時，被告丙○○表示伊並不知情（見本院卷第178頁正面），又縱認被告丙○○當時應係知情，由於同案被告戊○○之犯罪行為即「獵捕」灰面鵞鷹32隻犯行既已完成，且

其後續所為之脫毛行為經本院依卷內證據及「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認為不該當「宰殺」之要件而不構成犯罪，業如前述，則被告丙○○繼而協助藏放屠體之行為既非屬「獵捕、宰殺」之構成要件行為，又係於同案被告戊○○之犯罪行為完成後方始提供協助，揆諸前揭說明，即應評價為事後幫助之行為；復觀諸野生動物保育法之全部條文，均未對此種犯行之事後幫助設有刑罰之處罰規定，則被告丙○○之行為自屬刑罰上不罰之事後幫助行為，不構成犯罪。

四至公訴意旨認被告丙○○與同案被告戊○○係共同基於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由被告丙○○提供住處冰箱藏放灰面鵞鷹32隻屠體等情，然為被告丙○○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見本院卷第64頁反面、第65頁正面、第178頁正面），而同案被告戊○○前於警詢時供稱：「【問：你是如何將32隻灰面鵞鷹（屠體）拿至丙○○住處冰存？你拿至丙○○住處冰存時何人在現場？】我清晨拿過去的我不知道丙○○的電話，所以我拜託龔秀香打電話請丙○○開門，我就直接拿到冷凍冰存。」、「【問：丙○○是否知道你冰凍的東西為何物？你有無告訴她？】我沒有正確跟她說冰什麼東西，她到底知不知道，我不曉得。」等語（見警卷第13、15頁），復於偵訊時結稱：「【問：你有無跟丙○○講你要拿老鷹過去？】沒有。【問：你叫丙○○開門不就是會遇到她？】那應該是她開門後就去睡了。」等語（見106年偵字第8818號卷第269頁），綜合上開同案被告戊○○之供述，至多僅能證明同案被告戊○○將灰面鵞鷹32隻之屠體攜至被告丙○○上址住處藏放時，被告丙○○有開門讓同案被告戊○○入內，然無法執此逕認於此之前，2人即已就同案被告戊○○獵捕灰面鵞鷹之犯行形成共同之犯意聯絡；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丙○○有因協助藏放屠體之行為獲得何種利益，自無從認定其係基於為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又依秘密證人甲1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內容，其對於證稱同案被告戊○○有上山獵捕、被告丙○○有參與獵捕後宰殺灰面鵞鷹之

行為，其均未親眼見聞，其係聽說而得（見本院卷第144至148頁），是其證述內容之憑信性已有可議。而公訴人提出之證人龔秀香於偵訊時之證述、通話明細示意圖等證據（分見106年偵字第8818號卷第313至314頁；107偵1083號卷第97至101頁），由於證人龔秀香於偵訊時結稱「【問：（提示通話明細表）為何去年10月10日戊○○打電話你後，你就馬上打給丙○○？】有時朋友聯絡要聊天或說做工的事情，比如說戊○○要找兩個人去做工，我就會打給丙○○問她要不要一起。【問：戊○○有次他打電話給你，叫你打電話給丙○○，請丙○○開門？】這麼久我忘了。【問：照你的說法，他家門鎖著的機會不大，你真的沒有印象戊○○有請你打電話嗎？】若門鎖著，人不在，我們就會在外面坐，但我真的沒有印象有請丙○○開門，我除了要工作才會找丙○○，我沒事也不會叫丙○○開門，若人家在睡覺，我幹嘛還要打電話吵他。」等語，故此部分證據亦僅能證明同案被告戊○○、被告丙○○與證人龔秀香於106年10月間確實有以電話聯繫之事實，然均無從據此證明被告丙○○於同案被告戊○○為獵捕灰面鵲鷹32隻之犯行之事前、於犯行過程中但未完成前，2人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之事實；復參以證人即員警乙○○於本院審理時結稱，渠等決定對被告丙○○執行搜索之時間點，是因為專案快結束，並無具體情資使渠等決定應在106年10月20日對被告丙○○執行搜索等語（見本院卷第143頁），益徵本案並無具體證據足認於同案被告戊○○為本案之獵捕灰面鵲鷹32隻犯行前，同案被告戊○○與被告丙○○即已形成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共識。

五綜上所述，被告丙○○與同案被告戊○○間主觀上究竟有無共同獵捕灰面鵲鷹之犯意聯絡，尚無足夠之證據予以證明，本院認為仍存有合理之懷疑，猶未到達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自不能遽認被告丙○○確有被訴之此項犯行；而同案被告戊○○將灰面鵲鷹32隻屠體攜至被告丙○○住處藏放時，假使認為被告丙○○係知情而協助藏放，亦僅屬事後幫助行為

，並不構成犯罪。此外，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資以證明被告丙○○確有所指之犯行，揆諸首揭法律規定與說明，既無足夠證據確信聲請意旨之指述為真實，不能證明被告丙○○犯罪，本院自應為被告丙○○無罪判決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刑法第11條前段、第47條第1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彥凱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楊宗翰

法官 曾思薇

法官 劉容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美玫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未具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條件，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二、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使用禁止之方式，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於劃定之野生動物保護區內，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

01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從原民文化和狩獵 看布農族與黑熊的人熊情誼

◎ 2019年02月28日

環境資訊中心記者 吳宜靜報導

環境資訊中心於去年（2018）舉辦黑熊系列講座，由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秘書邦卡兒·海放南（以下簡稱邦卡兒）主講「原住民文化中的人熊關係」，並邀請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張君玫教授與談，從保育與原住民傳統文化兩種不同視角探討狩獵議題。兩位講者與現場聽眾擦出許多火花，本文將該場講座重點內容整理如下。

邦卡兒從一張合照作為演講的開場，指出照片中一位叫做「海栗」的前輩（漢名林淵源），他是一位資深的布農族獵人，協助黃美秀教授從事黑熊野外調查，前後長達十多年的時間。黑熊野外調查依賴繫放的方式搜集黑熊活動的資料，但調查之始，台灣並沒有太多關於「抓黑熊」的資料，於是黑熊調查工作便仰賴布農族獵人以「布農族的方式」進行。在黃美秀的調查中，一共抓過12隻熊，全數都用布農族語命名。

台灣黑熊多半出沒在中央山脈海拔 1000~3000 公尺的山區，邦卡兒說明，台灣黑熊的棲息地剛好和住在高山的布農族、泰雅族，和鄒族等原住民族的活動範圍重疊。其中，布農族是台灣垂直分佈最廣的民族，生息在崇山峻嶺之中，他們熟悉地理、植物特性、動物習性，長久以來便在山林中開展出獨特的狩獵文化與生活智慧，也與黑熊交疊出深遠的共同生活經驗。

布農人看黑熊：友伴、同盟、尊敬、恐懼

邦卡兒出身於布農族巒社群，24歲就進入玉山國家公園任職，玉山山脈、雪霸、太魯閣的山脈他大都爬過，「剛開始進入以前祖父、爸爸、叔叔口中的山，我們也覺得很陌生，」



講者邦卡兒·海放南講述布農族與黑熊的故事。攝影：吳宜靜

「我們從來沒有把黑熊當作食物。」邦卡兒開宗明義地說。黑熊之於布農族，就像精靈一般的存在，並不是山羊、山羌一類「看到就可以打」的動物。經過多年研究發現，黑熊獨愛玉山國家森林公園一帶，尤其喜歡在布農族祖居的大分地區出沒。

因為世世代代都和黑熊有所交集，在赤手空拳、獵槍和配刀並不充足的狀況下，布農族自然地發展出對於黑熊又敬又畏的態度。儘管布農族有不同的社群，但是受過嚴正傳統教育的族人們，對身形巨大、力大無窮黑熊所抱持態度是一致的敬畏和禁忌。



位於中央山脈東側之大分地區。圖片來源：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在布農族語中，對黑熊有四種不同的稱呼：**Tumaz**（督瑪斯）、**Tutumaz**（督督瑪斯，原意為「英雄」）、**Dahdung**（達動，黑色的意思）、**Hanidu**（哈尼度，泛指神、鬼、精靈等來無影去無蹤的靈體）。透過這些稱號，大致可以看出布農族對於黑熊的敬畏，「遠遠聽到黑熊的聲音，大概就是要趕快先跑了，絕對不是跑去看熊或是去獵捕牠。」族人聽說黑熊出沒，通常不敢輕易靠近，而且「有熊的地方，通常也沒有東西可以吃了，」邦卡兒說。

熊的身影反覆地出現在布農族的神話傳說、禁忌、家族教誨裡頭，人熊之間的故事在族人之間世代流傳著，遠遠多過其他原住民族。傳說中，布農族人也曾和黑熊一起生活，關係就像夥伴或兄弟一樣，向黑熊學習分食等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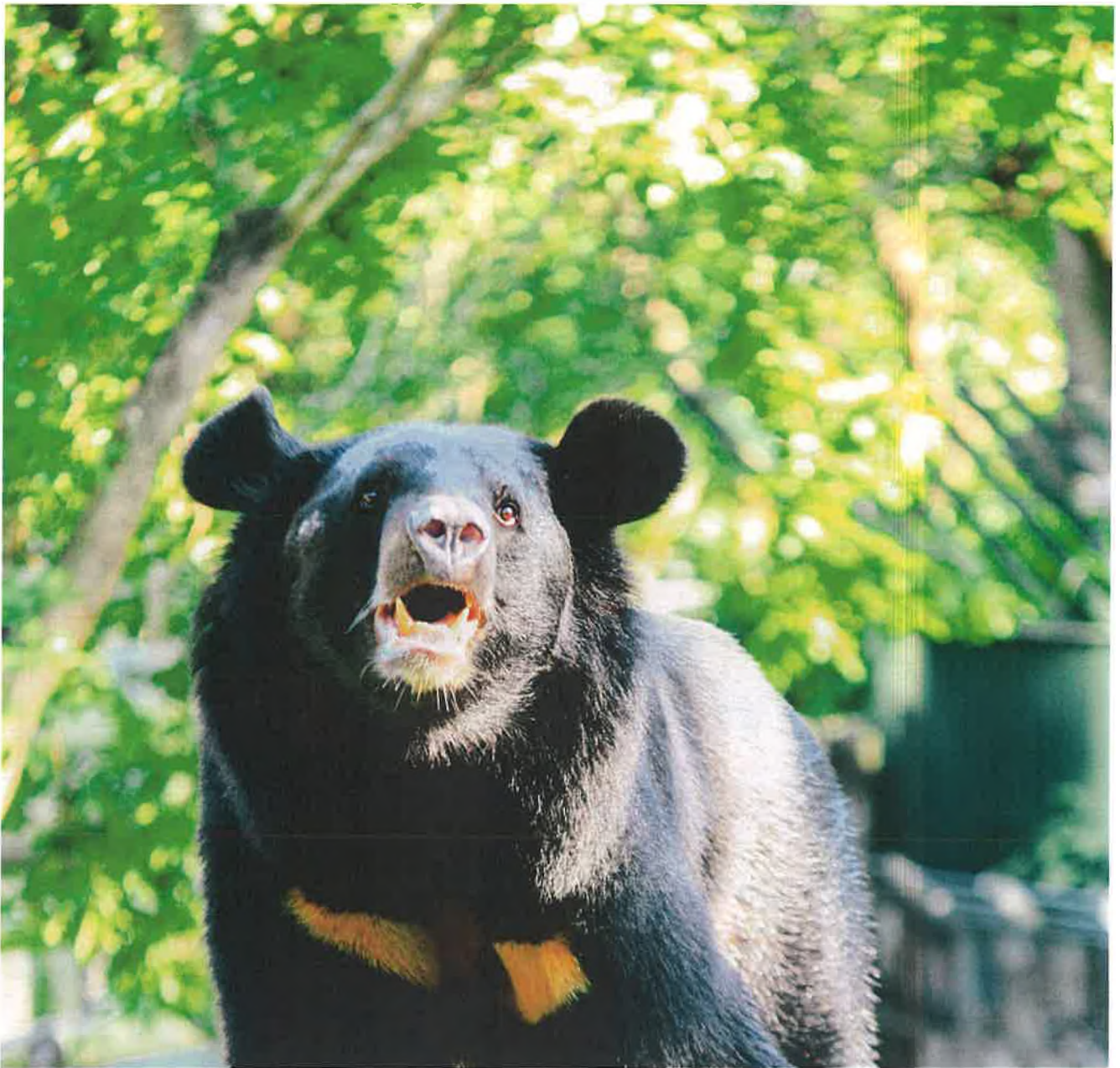
「懶媳婦與小米」就是一個廣為流傳的寓言故事。傳說中，布農婦女只需要用一粒小米就能煮出一大鍋飯，有個婦女懶得只取出一粒米，直接將整把米倒在鍋子裡面煮，沒想到小米飯越煮越多，幾乎塞滿了房舍。眾人配蜂蜜或者其他食物，都吃不完眼前海量的米飯，後來搭配著熊肉吃，才把這麼多的小米吃完。這個故事警惕布農族人：婦女要勤

於家事，別為了一時懶惰釀成大禍；而東埔地區的布農族人，也曾傳說因為熊肉太好吃，配著小米卻忍不住將糧食都吃光的故事，因此族人一直把獵捕黑熊視為貧窮的象徵。

因為黑熊兇猛，部落也流傳黑熊吃人的傳說，族人不但恐懼，也相信黑熊是一種禁忌，很多人把獵熊視為不吉祥或麻煩的事情。族人也相傳，如果在種植小米到結穗期間獵到熊，小米結果之後會變黑，像燒焦了一樣。若真的獵到了黑熊，熊肉也不能直接帶進家裡，要放在房子外面，否則以後就會諸事不順。

山林生活發展出深厚且複雜的人熊關係

邦卡兒分享他聽說過的狩獵經驗，據說黑熊是非常聰明的動物，被陷阱夾到之後，牠會躲藏在陷阱周圍，等待獵人回來查看，再趁機將獵人打死、吃掉作為報復。因此獵人對黑熊向來敬而遠之，放陷阱時也格外戒慎。有時，黑熊甚至會觀察獵人設置的陷阱，並且把陷阱當成是現成的「便當」，把落入陷阱的動物吃個精光。



布農族人對台灣黑熊十分敬畏，並流傳相當多與熊有關的傳說。圖片來源：waychen_c via Flickr.
(CC BY-SA 2.0)

狩獵不僅是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也是自我表現、爭取社會認同的方式，更是文化、祭典的重要象徵。即便部落有獵熊的禁忌，但因為黑熊兇猛且數量稀少，不易捕獲，打到熊又被當作是一件很不簡單的事，認為獵熊是英雄表現。邦卡兒由此點出，早期的原住民族一方面視熊危險而盡量迴避，另一方面也視獵熊為英雄行為，山林生活經驗使得黑熊和布農族的關係顯得非常複雜。

狩獵文化其實只是「一起生活」的一部分

布農獵人出門前，從不張揚，也不敢做任何像是「我要打五隻山羌、三隻水鹿」之類的目標設定，邦卡兒說，在傳統文化中，打獵的成果是上天給的，心中不能帶任何盤算，就是把自己交給山林、交給祖靈，安靜地出門打獵。姑且不提狩獵的危險，僅僅是出門一趟，就必須經過許多道關卡：出發前做了不好的夢，出發時放屁了，或看見某一種鳥從天邊飛過，也或者是出門後有人打個噴嚏，又或是被什麼東西刺到，按照傳統習俗，都要立刻返家，不能繼續入山。

與談人張君玫回應，布農人原生的知識，視其他生命與自身是相互關連的，在意的是對自然資源的適度利用，非常符合整體生態的概念。在狩獵文化之下，人與動物的關係就是人和不同的生命共同生存於生態系統裡頭的「生活方式」。因此，在狩獵文化下和在肉品生產線下，動物所過的生活，是非常不一樣的。「然而，原住民文化卻常常成了生態女性主義或動物保護倡議者的代罪羔羊，狩獵被視為『殺生』或是不尊重生命的行為。」她提出反思。



講者邦卡兒·海放南與與談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張君玫教授。攝影：吳宜靜

近年也有人對於原住民祭儀「走調」提出批判，認為某些豐年祭活動流於形式或是傷害動物。張君玫認為，「評判他人」這件事情，在台灣社會中經常發生，身為動保倡議者，她認為「吃肉」本身不一定是件錯誤的事。人類祖先利用動物的生活方式由來已

久，而「吃肉」之所以成為環境負擔，根本的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系統下肉品的生產方式。她認為，過一個合乎「生態合理」的生活、與其他生命共存，或許是更務實的思考方向。

如何在現代生活傳承傳統狩獵文化？

幾位講座參與者對於傳統狩獵文化的傳承表達關切：現在漢人和原住民處在同一個教育和生活環境中，該如何傳承祖先和自然共存的傳統智慧？

邦卡兒說起自己的生命歷程，「從小不敢承認自己是原住民，只想要把國語說好、把學科學好，以免被貼上『山地人』的標籤」。直到年，他才發現「啊！原來獵人很重要，原來我的文化很重要。」現在政府推動原住民實驗小學、族語認證、加強文化傳承等措施，他認為已經為時太晚。他舉自己改回傳統姓名為例，當他將名字恢復成「邦卡兒·海放南」之後，便遇到許多困難，「花了超過半年的時間才完全將和姓名有關的事情改過來，包含身分證、職章、護照、存摺、戶籍資料.....」，光是改名字已經這麼繁複，更不用說是悠遠又複雜的狩獵文化了。



講座現場有多位關心狩獵議題與原民文化之民眾提問。攝影：吳宜靜

回復狩獵文化的議題，首先是為時已晚的困難，同時也會面臨來自其他領域的壓力，諸如宗教團體、動物權團體等等。再者，若要讓孩子學習原民傳統文化，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壓縮「正規」教育的時間，父母難免會擔心孩子跟不上一般學生。面對主流社會，如何不讓傳統成為現實生活的負擔，至今還在拉扯著。

張君玖認為，原住民族的知識系統確實帶給人們很多啟示，然而，另一個陷阱是把原住民文化浪漫化——一旦認為原住民族有義務要體現、維持傳統生活的樣貌，便形同是一種物化。傳統與現代互動，勢必會不同於以往，而歷史結構的不正義、個人主義式的競爭都會對原住民族的生活造成莫大的影響。從文化多元主義的觀點出發，她特別提醒：不同民族必須有意識地保持「一起生活」的覺知。

過一個「生態合理」的生活

「如果原住民持有更強大的工具，例如火槍等等，是不是會改變布農族對於黑熊的敬畏？」邦卡兒回應，打到黑熊這件事情在布農族中不是沒有發生過，但他舉出布農族打到黑熊的「後果」還可能會讓家族女性不孕，造成斷子嗣的後果。一旦不能傳宗接代，就等同是家族的滅絕，他認為即使擁有進步的工具，布農族還是會把打到黑熊視為禁忌。

科技和自然科學發展帶給人類的另一個反省就是「當你知道越多，你就會發現自己不知道的其實更多」。布農族害怕黑熊，其實也可以視為原住民知識的一部分。有機會退一步看未知與不足，才能和其他生命共同生活著。

在原住民社會中，黑熊不只是受到敬虔、禁忌的動物。黑熊也存在於原住民無形的空間之中，在文化裡頭，在古老的傳說中。演講最後，邦卡兒以一首詩作結：

黑熊是原住民生命中的一部份，
牠是神話中的生命文學，
牠被視為與人甚至比人更高一級的生命體，不敢去獵捕，也不敢正視牠，
牠帶有不可侵犯的靈形，
牠像風一般的遊走在山林中，
進入那濃霧的氣息，
牠隨時會出現在
石頭、
枯樹、
岩石或是樹梢上，
牠深邃的眼眶看透你的動向，
在你刀鞘移動剎那，
牠已離開好遠好遠。

※ 人與野生動物主題報導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合作刊登

物種保育 生態保育 環境哲學 生物多樣性 自然人文
地方自治 人與動物衝突觀點討論 台灣黑熊 狩獵文化 原住民

作者



吳宜靜

右手按快門，也寫字。念過歷史、勞工關係和攝影。企圖用說得動自己的方式傳達環境訊息。

捐款支持 更多環境獨立報導



★ 依議題類別瀏覽 | 環境政策 | 生活環保 | 公害污染 | 動物福利 | 環境經濟 | 生態保育 |
★ 依議題類別瀏覽 | 能源議題 | 生物科技 | 全球暖化 | 土地水資源 | 永續發展 | 環境政策 |
★ 依專欄類別瀏覽 | 環境專題 | 選地政策 | 保護野生 | 生物多樣性 | 綠色消費 |

maintained by TEIA / powered by drupal / enhanced by NETiviser



- 認識原住民族
- 原民新聞
- 活動訊息
- 社會福利
- 研究資源
- 網站資源
- 影音資源
- 原住民族知識地圖

認識原住民族

族群介紹

部落介紹

歲時祭儀年表

原住民族節慶日曆

族群總論

[回上頁](#)

族群概論

族群歷史

社會組織

生命禮俗

祭典儀式

語言文化

傳統信仰

一般而言，台灣原住民諸族的傳統信仰應為「泛靈信仰」，所謂的「泛靈」指的是天地萬物、自然界現象、祖靈等皆有其靈。因此，早期的台灣原住民諸族衍生出各種山神、海神、河神、太陽神、樹神、小米神等「自然崇拜」；以及族人感念祖先渡海來台、創生起源的「祖靈崇拜」等傳統信仰面向。再者，原住民傳統社會倚賴「祭師」的信仰脈絡亦是一個重要的面向。原住民傳統信仰的活動裡通常是由「祭師」主持，「祭師」除了主持祭儀，「祭師」也經常替人治病、問卜、解梦等，「祭師」更是族群信仰、歷史傳說的優先詮釋者，藉由宗教祭儀的思維建構，可以進而理解一個族群的宇宙觀及其生命基調。

在宗教信仰方面，原住民各族均有不同的人類起源及族群發祥地的傳說，形構成不同的宇宙觀。泰雅、排灣、阿美、卑南認為人類是神所創造或神的後裔，排灣族人以為人類始自大武山，鄒族認為大神hamo創造人類，玉山是人類的發祥地，阿美與雅美則以海洋為人類起源的場所。從平穩社會的精密信仰，到階級社會的多神信仰及其相應的宗教儀式，不但與其不同的社會制度有所關聯，也被用來解釋各種未知的現象和指導人際和群際的對應（王嘉山 2001：82）。

傳統祭儀

祭儀是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極重要的部分，而一般人並不能理解原住民的祭儀。往往以慶祝豐收的豐年祭等簡單而且高度漢人中心化的概念來看原住民的祭儀。事實上，原住民的祭儀種類很多，族群互異；而各族群本身不同的祭儀也具備不同的意義。要了解原住民的文化，理解他們各種祭儀的意義是絕對必要的（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 1995：70）。因此，原住民傳統祭儀的舉行經常是在依山傍水的環境裡，以天地為舞台，以夜幕為背景，是一種敬拜神明、崇敬祖先的部落倫理與社會生活實踐的重要一環。以泰雅族為例，各種傳統祭儀的施行，其實就是對祖靈信仰的實踐，祭儀多與農業生計、狩獵及獵頭順利等有關。例如開基祭、播種祭、除草祭、收割祭、豐年祭、收穫祭、開倉嘗新祭、獵頭祭、祖靈祭等等。

綜觀台灣原住民各種傳統祭儀中，諸如泰雅與太魯閣族的「祖靈祭」、邵族的「新年祭」、賽夏族的「矮靈祭」、布農族的「射耳祭」、鄒族的「戰祭」、沙阿阿阿族的「貝神祭」、排灣族的「五年祭」、阿美族的「小米收穫祭」、阿美族的「海祭」與「豐年祭」、卑南族的「猴祭」與「大獵祭」、達悟族的「飛魚祭」與「新船下水祭」、以及平埔諸族逐漸復振的「夜祭」等等。這些多元的各式傳統祭儀類型，可再次說明台灣原住民文化的多元性與豐盛性，及其深具文化意涵的社會機制。

當代信仰

一般而言，台灣原住民各族的當代信仰體系中，以基督教長老教會及天主教為最多，另有耶穌教會等。除此之外，仍持傳統信仰及淨人民間信仰者亦有少數。而在平常生活裡，原住民各族傳統信仰裡的部份「禁忌」仍是被遵守著。



二月 2021 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第20屆大武山文學獎】

廣原國小學生藝術創作美展
tu uvaaz tu kamahtugan tu
hansip

一首關於家、關於土地的
《福爾摩莎頌》

屏東縣原住民族文化會館-109
年度展覽系列活動

巧手創意特展

卑南遺址發掘四十週年：搶
救考古檔案回顧展

【聽歌的表情】原住民族生
活歌謠特展

好萊塢社傳統石板屋修復人
才培訓工作坊與文化傳承行
動第二季工作坊課程

2020Pulima藝術節展覽計畫
—Minukuy 播種者

Tulik嶺美-阿美族傳統編織技
藝展

【Yusam a kemasi Kibahar
古達利永康-當代排灣族人的
遷徙紀事主題特展】

Rimua 粥食特展

牽手平埔：臺灣南部西拉雅族、馬卡道族、大武壠族文化特展

Mihoyo來交換吧！

「臺灣原住民族與二二八」

「臺灣植物散策」主題策展



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 - 認識原住民族 - 族群介紹

以泰雅族為例，有部分地區的泰雅族在日治時期便已接觸到西方基督教，但西方宗教進入泰雅族社會被其接納，主要是戰後時期，包括天主教、基督教等各教派，現今大多數的泰雅族人都已是各派教會的教友了，也因新宗教的進入，泰雅各項傳統信仰、祭儀開始逐漸被捨去。忘卻，而太魯閣族是台灣第一個信仰西方宗教的原住民，當代的族人多信仰耶穌，只是每人選擇的教派並不全然一致，每個太魯閣部落內總是有一間以上的教會，包括基督教長老教會、天主教、真耶穌教會等，耶穌信仰不止成為族人重要的宗教信仰，且教會進而成為族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例如每週六日族人上教堂禮拜，週間日子族人則參加家庭禮拜，而各年齡階層又有屬於自己的話班、團契或聚會，再加上教會平時舉辦各類活動，因此一個信仰虔誠的族人，其生活可說與教會息息相關。

相對於基督教與天主教在大多數原住民族群社會裡的宗教優勢，噶瑪蘭族則表現出另一個傾向漢人民間信仰的當代風貌，清嘉慶元年(1796)漢人成功入墾蘭陽平原後，漢人民間信仰逐漸注入噶瑪蘭傳統宗教體系中，而清廷也將漢人宗教的推行視為「教化熟番」的工作，在基督教、天主教傳入之前，噶瑪蘭人普遍接受漢人民間信仰，後則因教會所提供的經濟誘因較強而轉向依賴基督教與天主教，19世紀晚期開始，大批族人入教受洗，宜蘭平原上共成立了25間噶瑪蘭教會，漢人信仰逐漸衰微，然而，自20世紀起，日本政府對台的宗教政策有諸多限制，隨著教會影響漸弱，噶瑪蘭人逐漸轉向依賴漢人村廟的祭祀圈，在宗教信仰及生活適應上找到依託；不過，遠離漢人聚落的族人如宜蘭流社人等大部份仍保有基督教信仰。

中心館藏

《臺灣原住民祭典完全導覽》，劉還月編著、攝影；李娜莉、涂麗娟、陳佩儀文；劉於晴繪圖，臺北市：常民文化，2001。

《台灣原住民族祭典的盛會》，王煒昶撰文攝影，臺北市：南天，2004。

《原音聲響：原住民祭儀音樂論文選》，孔吉文、巴奈·母路主編，花蓮縣吉安鄉：原住民音樂文教基金會，2002。

《臺灣原住民的祭儀生活》古野清人原著；葉婉奇翻譯，臺北市：原住民文化事業公司，2000。

關於本網 / 聯絡我們 / FAQ / 服務條款 / 網站地圖



原住民族委員會版權所有©2015

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地址：106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北側廣場地面層
電話：(02)3366-3776 FAX：(02)3366-3770
EMAIL：ntutiprc@ntu.edu.tw
瀏覽人數：19,856,148 人